童小鹏 著

# 风雨四十年

（第一部）

# 为《风雨四十年》序

杨尚昆

童小鹏同志要我为他所写的、以回忆周恩来同志为主要内容的《风雨四十年》写个序，说几句话。

周恩来是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杰出领导人之一。他生前从不愿意称赞自己的功绩，而且在病中留下遗嘱，死后要把骨灰撒向祖国大地，不愿后人为他树碑。可是，他为中华民族解放，为人类进步事业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高尚品德，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早已为人民所崇敬，作为学习的楷模。因而，有关周恩来的传记、文章和文学作品，一问世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广为流传；故此，用各种体裁、从各个角度介绍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供正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努力的人们学习，是党史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童小鹏正在做的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童小鹏是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的。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后几天，他就随周恩来到西安工作，以后又一直在南京、武汉、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和党的长江局、南方局工作，1946 年又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南京，直到 1947 年 3 月 7 日随董必武等最后一批人员撤回延安。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一方面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一方面又负责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在敌后开辟第二战场的工作，为此，党中央成立了中央城市工作部，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李维汉率领城工部机关随叶剑英和我领导的中央后委机关去山西临县三交镇附近工作。童小鹏任城工部秘书处长，负责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秘密电讯工作。1948 年 9 月，中央城工部改为中央统战部后，童小鹏任副秘书长、秘书长。1958 年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直到 1966 年 6 月“ 文化大革命 ”开始调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 文革 ”浩劫，童小鹏也未幸免，被打成“ 走资派 ”，又以“ 特嫌 ”为由隔离审查，下放劳动，直到 1973 年才回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这时，周恩来虽患不治之症，仍关心并指导统战工作，直到弥留之际。

童小鹏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近四十年，许多老同志都希望他尽早把他所知道的周恩来写出来。他早在 1984 年就制定了《风雨四十年》的写作计划，陈云同志还为他题了书名；他征求过我的意见，我极表赞成，并同意作序。可是因为他几年来一直忙于负责过去战争时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 长江局 ”、“ 南方局 ”、“ 南京局 ”的党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工作，同时出版了他的影集《历史的脚印》，无暇动笔。现在上述工作都已结束，他决心“ 叶落归根 ”定居到福建去完成这一任务，这是一个好主意。除了文字的叙述外，他还准备按内容插载当时当地他亲自拍摄的珍贵照片，堪称文图并茂。我想这本书的出版，一定能够深受读者的欢迎，并从中汲取精神食粮，以实际行动来完成革命先辈未竟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祝愿《风雨四十年》的早日问世和取得成功！

1991 年 11 月

# 风雨四十年

# 初识“胡公”在中央苏区

## 他像强力磁铁般吸引人

1932 年春，我在红四军政治部工作。听说周恩来于 1931 年底已经离开上海党中央，化装经过广东、福建秘密到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他来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为便于化装成富豪迷惑敌人周恩来在进苏区前就蓄了长胡子，到瑞金后一直留着，所以有人叫他“胡子”，但大都尊称他为“胡公”。这个代名一直沿用了几十年。直到建国后一些老同志私下谈到周恩来时，仍称“胡公”，尽管他的胡子在西安事变后就剃掉了。当时，红军中大多是十几岁的“红小鬼”，把长胡子的都看成是老年人，我认为周恩来一定也是老年人了。

1932 年 8 月，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那时我在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政治部工作，一直在前线，没有机会看到总部首长。同年 10 月，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调回瑞金主持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后来才知道，是受“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批判，排挤他对红军的领导），周恩来代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以后就叫周恩来为“总政委”，但私下里仍常常称他“胡公”。

1933 年 2 月底，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在江西乐安、南丰之间，打了大胜仗。先在黄陂附近，一举消灭了向中央苏区进攻的蒋介石嫡系五十九师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师长李明因伤被俘，五十二师师长陈时骥被活捉；3 月下旬，又在草台岗消灭敌十一师大部，从而胜利地打破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当时毛泽东虽然被临时中央调离前线，但朱总司令和周总政委敢于坚持正确意见，改变中央攻击敌人坚固据点南丰城的指示，仍运用毛泽东集中红军主力，运用大兵团伏击运动中的敌人的作战方针，因而取得这次伟大胜利。这使红军中的高级干部们认识到周恩来不仅是个政治家，也是个军事家，他在红军中的威望更高了。

蒋介石的四次“围剿”失败后，接着积极准备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我红军主力利用蒋介石准备新的“围剿”的间隙，在永丰，广昌之间以藤田为中心的地区，休整了一段时间。一方面总结作战经验，进行政治教育；一方面扩大红军，进行部队整编。为此，总政治部于 1933 年 5 月 24 日召集红一方面军全军干部大会，进行动员，朱德、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我当时已调到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工作，也参加了这个会。我曾多次见过朱德，他还是和过去一样，朴实得像个“伙伕班长”。在这次会上，我和许多同志都是第一次看见周恩来总政委。他和大家一样，头戴五星军帽，身穿褪色灰军衣，腰围皮带，腿打绑带，脚穿布草鞋。对他的许多传奇故事人们早已熟悉，所以，他的到来格外引人注目。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主席台。他眉毛粗黑，目光炯炯，两腮和上唇、下巴都长着粗黑的胡须，英俊而又严肃，腰杆挺得笔直，一派军人的气概。从脸上的胡须看，像是 50 岁的人，可是奕奕的神采又像是二三十岁的英俊青年。周恩来亲切注视着大家。就像一块强磁力的吸铁石，立刻把在场干部的目光都吸引到他身上来。台下都在惊奇地窃窃私议，这就是有名的总政委周恩来——胡公吗？

朱德宣布开会了。他知道许多干部都没有见过周恩来，就向大家介绍说：

多年来周恩来同志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大革命时期，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南昌暴动的主要领导人，现在他是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我们请他作报告。台下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以洪亮高亢的声音作了长篇报告，他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从红军当前的任务，讲到部队整编的目的。一千多人的会场，鸦雀无声，人们都被他富有鼓动性的言词和从容不迫的风度所吸引。每讲到精采之处，会场上则是掌声如雷。报告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这个报告，对于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对于部队整编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大报告，印象极深。当天，我在日记本上，记下了这样一段话：“早饭后，排演要到总政治部比赛的话剧。十一时出发到总政参加干部会，周恩来总政委作了四个钟头的报告，内容是：红军整编的意义与今后工作及扩大红军的伟大成绩。报告极为周密详细。”这天，给我留下了一生难忘的印象。

6 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进行整编。一军团取消了三军、四军的番号，编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师；三军团则编为第四、第五、第六三个师。每个师辖二个团或三个团。整编后，调整和充实了领导干部，补充了兵员，加强了战斗力。

6 月 30 日，中革军委决定以举行南昌暴动的 8 月 1 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 月 1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批准了这个决定。

整编后，三军团执行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指示，组成东方军深入福建作战。一军团和五军团仍留江西苏区准备对敌作战。为了庆祝“八一”红军建军节，并检阅部队整编后的素质，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决定，一方面军 7 月 31 日在总部驻地东沙陂举行运动大会，以团为单位进行军事、政治、文化等各项竞赛，军团和师直属队也参加政治、文化和演剧比赛。8 月 1 日，举行阅兵、授旗、授勋等典礼。8 月 3 日，运动会结束，给优胜单位发奖旗。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自始至终参加和主持大会，并做了总结。几天来，大家同周恩来熟了，逐渐解开了一个谜，听领导同志说，周恩来才 35 岁，难怪他那样神采奕奕呵！许多同志都觉得这样的年纪，竟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业，现在又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总政委，真是了不起的人才！

由于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临时中央、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在军事上推行冒险主义，接着又推行军事保守主义。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仓促退出中央苏区实行长征。

1935 年 1 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听传达说，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都站在毛泽东一边。会上，改组了中央的领导，剥夺了博古和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以后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面的军事行动。朱德仍以红军总司令的身份参加作战指挥。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以后的党中央团结一致，冲破了蒋介石大军的阻击、包围，战胜了雪山草地的艰难险阻，打破了张国焘阻止中央红军北上的阴谋。1935 年 10 月，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 听两天报告，胜读十年书

在整个长征的过程中，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中央负责同志。听说在过草地时，周恩来患了重病，发高烧，肝脏化脓，大家都为他的健康而担心。他躺在担架上还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

1935 年 10 月，中央率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后，听说周恩来的病好了，大家都很高兴。11 月，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官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从此，大家就叫周恩来为周副主席，不叫总政委了。接着，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十五军团会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11 月 20 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一起指挥了直罗镇战斗，歼灭了向苏区进攻的东北军一〇九师及一〇六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936 年 2 月，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的率领下，由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经过七十五天的行军作战和宣传工作，于 5 月初胜利回师陕北。在此时期，周恩来和博古、邓发三人留在瓦窑堡组织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负责支援前线，巩固后方和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为了准备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中央决定从红军中抽调一批高中级干部到瓦窑堡成立红军大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统一战线政策和战略战术。毛泽东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并亲自授课。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务长。陈光、罗荣桓、谭政等高级干部，一面在学校工作，一面参加学习。我也奉调去学习，当然是喜出望外。1936 年 5 月 18 日，我离开度过六年战斗生活和培养我成长的红一军团，于 5 月 20 日到了中央所在地瓦窑堡。红大学生按职务和有关条件分编成一、二、三科。我和另外两个同志职务不够团级，却被破格分配到师团级以上干部的第一科。从此，我就有更多机会看到中央领导同志，并听他们作报告和讲课了。

5 月 21 日，中央党校邀请周恩来副主席作报告——论中国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红大的学生都去旁听并做了记录。周恩来“详细地说明了日本各派侵略中国的策略：海军派、轻工业者主张经济侵略；陆军派主张用武力占领，以争先机。现在采取的是两者之间的调和政策，共同点就是收买汉奸卖国贼进行分裂政策，以达到武装占领及进攻苏联的目的。并清楚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力量的变动，建立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等等”（摘自当天日记）。他根据 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特别说明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指出，只有团结一切爱国的力量参加抗日斗争，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他指出：“左”倾关门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他以 1934 年在中央苏区时拒绝同十九路军合作反蒋抗日，以致十九路军遭到失败，我们反第五次“围剿”也遭到失败的教训，说明“左”倾关门主义的危害性。他解释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和我党提倡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意义等等。从这次报告中，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帮助我们提高了对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在分组讨论时，大家更感到过去在战争中学习得太少了，这次调到红大来学习是极宝贵的机会，应该努力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准备在抗日战争的前线做出更大的贡献。

26 日，学校印发了 1935 年 7 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

的任务》，要同学们先自己阅读，然后进行小组讨论，最后由中央负责同志作报告。由于大家过去在红军中没有看过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也没有看书的习惯，所以特别吃力，坐久了就打瞌睡。对于国际问题似懂非懂，但看到有关中国的内容就很感兴趣，精神也来了。如报告中提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世界无产阶级要支持中国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的斗争；中国共产党要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等。都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正确的，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定，是合乎国际指示精神的。对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7 日，大家特别兴奋，周恩来副主席到红大俱乐部作国际形势报告了。他根据国际七次代表大会和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详细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国际工人阶级的任务，以及国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他特别强调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中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重要性。号召同志们要努力学习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文件，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准备在抗日运动高潮到来时，到全国各地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小组讨论时，大家都认为周副主席讲得透彻，解决了许多思想上的疑难问题，都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6 月 1 日，红军大学正式开学，为准备开学典礼和游艺晚会，全校放假一天。为防备敌机轰炸，开学典礼大会于下午五时在南门外举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亲自到会并讲了话，毛泽东主要讲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学校的任务。当他最后讲到，“黄埔学生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瓦窑堡学生要领导第二次大革命”时，全体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张闻天主要是讲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他说，只有掌握马列主义的真理，才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周恩来主要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全国爱国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大学要继承和发扬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发动广大群众，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把汉奸卖国贼打倒，建立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他的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当天的晚会开得很热闹。有李克农导演的活报剧和双簧；有陕北歌舞团的唱歌跳舞；我还参加了红大演出的话剧。每个节目都得到热烈的掌声。大家对跳舞特别感兴趣，看完后还要“再来一个”。节目演完后，李克农、罗瑞卿等领导同志陪着一位大姐来到后台看望演员，她亲切地和大家握手，称赞大家演得好。李克农向大家介绍，这位大姐就是中央局的秘书长、周副主席的爱人邓颖超同志。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当罗瑞卿特别把我介绍给邓大姐，说我是一军团的老演员，曾扮演过宋美龄时，邓大姐有点惊奇，又来同我握手，顿时我脸红了，不知怎么回答是好。她那慈祥的面孔，热情的笑容，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们这些小弟弟、小妹妹（陕北歌舞团有几个少女）以深刻的难以忘怀的印象。“小超”（周恩来及一些老同志对邓颖超的称呼）的名字我早在中央苏区时就听说过，这次晚会上是第一次同她见面，几天之内连续听两次周副主席的报告，又在一起开晚会，还同他的夫人交谈、握手，对他们的一种亲近感油然而生。

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从南向北分三路进攻瓦窑堡，驻东线绥德、清涧的中央军也配合进攻。当时我党和东北军已有联系，中央决定撤出瓦窑堡，主动让给东北军，以便张学良向蒋介石交代。中央指定周恩来负责指挥部队抗击东线中央军和组织中央机关有秩序地向保安撤退。为争取准备时间，6 月 14

日，周恩来电告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务望火速电令前线兄部停止前进”，否则“造成两方敌对，对目前形势实有大害”。王以哲立即将部队南撤。19日周恩来又电告王以哲：如果中央军将占领瓦窑堡，我们必事先通知你们，由东北军占领。

当周恩来正在组织中央机关撤退时，驻在北线横山的陕北地方势力高双城，派一个营于6月21日突然袭击瓦窑堡我中央机关。周恩来立即指挥红军大学和中央警卫部队还击，掩护中央机关西撤保安。因时间仓促，除人员全部安全撤退外，遗弃了一部分从山西运来的布匹。周恩来又指挥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包围瓦窑堡，同时要李克农与王以哲商量用“打假仗”的办法将东北军引进瓦窑堡。李克农同王以哲商量好后，就带了中央联络局的干部卢伟良、王立人和保卫局的几个侦察员，一个保卫排，煞有介事地布置在瓦窑堡南边的山岗上，双方都朝天放枪，我们且战且退，东北军且战且进，一直进到瓦窑堡城内。因为他们是奉“蒋总司令和张副司令命令”进驻的，所以高双城部队只得撤出去。红军部队也就撤到自己的防地。瓦窑堡就成了红军和东北军和平共处、互相往来的地方，这是4月周恩来和张学良去肤施（即延安）秘密会谈后红军和东北军亲密合作的一个典型例子。随后，中共中央迁到保安（今志丹县）。

保安是陕北的一个小县城。因长期遭受战祸和天灾，城墙已残破不堪，没有一条成型街道，只有一些零落的小店铺，山边有许多石窑，居民多半住在这里面，根本不像个县城，大家进了城还打听“保安还有多远”。常常有人这样形容县城之小，“小小ＸＸ县，三家豆腐店，城圣打板子，城外听得见”。而保安连一家豆腐店也没有。可是这里是陕北人民领袖刘志丹的故乡，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后方，它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成为临时的红色首都。就在这个小小县城里，毛泽东和他的得力助手周恩来以及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一道，指挥着红一、二、四方面军打败蒋介石的进攻、堵截，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指挥红十五军团和陕北地方部队保卫党中央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就在这里领导华北、上海和其他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活动；就在这里派出得力干部到全国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同国民党中央的代表谈判；就在这里接待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大夫马海德，并通过斯诺把“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传播到全中国和全世界。

在陕北这座小小的县城里，住着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和他的夫人贺子珍就住在两间石窑洞里，里间是宿舍，外间是办公室。外面有一个院子，周恩来在靠西边院墙的一间小平房里居住和办公，房内只有一个小土炕和一张小办公桌，两个木凳子。邓颖超白天在中央局办公，吃饭和睡觉才到这里来。叶剑英参谋长的“官邸”，是利用小门楼改建的。住在附近的还有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因蓄有八字胡，大家叫他“小胡子”，以别于“大胡子”周恩来），作战科长伍修权等。张闻天、博古和中央的其他工作人员，住在东边的石窑洞里。

军委机要科长也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尤，和机要科的十来个“红小鬼”，住在西边一个比较大的石窑洞里。我当时名义是毛泽东的秘书，实际上是帮助叶子龙校对电稿、抄录电文，同志们开玩笑说我“是毛主席秘书的秘书”。我和叶子龙、李志忠（现名李质忠）三人在石窑洞里的一个小土炕上，白天在小炕桌上办公，晚上拿走炕桌就睡觉，简单方便，可是盘腿坐在

炕上很不习惯，盘坐不久就要下来伸伸懒腰。同志们开玩笑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在这里同毛泽东、周恩来见面的机会很多，散步、上厕所都能碰到，特别是去小便池还要经过周恩来的门口。

李志忠 1931 年就是中央苏区中央局的译电员，他同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担任苏区中央局和上海临时中央无线电通信的密码翻译工作。1932 年邓颖超从上海到了瑞金，担任中央局秘书长，领导机要工作。听李志忠说，党中央的第一部秘密电台，是周恩来 1930 年在上海中央时亲自建立的，当时只通香港，因为中央苏区还没有电台。1931 年红军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电台后，就正式同上海中央通报了。我党第一本高级密码，是周恩来创制的，并用他的代名“伍豪”来命名叫“豪密”，是 1931 年任弼时带到苏区中央局的。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性格比较懦弱，一见中央领导同志就很腼腆和羞怯，不敢讲话，有时替叶子龙送电报，一送到就赶快离开。开始见到邓颖超大姐也是要脸红的。因为她平易近人，特别关心我们这些“小弟弟”，又常在晚会上一起参加演出，接触多了，也就习惯了。她是女同志中比较活跃的，在晚会上常常被点名唱歌，她喜欢唱“毕业歌”、“摇篮曲”等。她还和王立人副官演过李克农编导的独幕话剧《姐弟》，剧中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同时又侮辱日本妇女的罪行，深受同志们的欢迎。当时我身体很弱，经常患病，有一次我患了重感冒住进医院，她还派人送来慰问信和慰劳食品。那时大家都很穷，保安又买不到东西，得到一点大米、馒头就很高兴了。

1936 年 9 月 30 日是中秋节，那天晚上，我正同叶子龙一起校对电报时，邓大姐忽然亲自送来两个月饼，说是炊事员给毛主席、周副主席做的，我们在加夜班，特分给我们一人一个。她开玩笑说，一个给弟弟（指叶子龙），一个给妹妹（指我）。真搞得我们“却之不恭，受之有愧”，除感谢外，面红得说不出话来。她所以叫我“妹妹”，就是因为她看到我在话剧中扮演过女角。当时红军中很少女同志，演剧时他们常推我演女角，勉强“把黄牛当马骑”。大姐叫我“妹妹”，当然是开玩笑，但也表现出革命同志之间亲密无间的情谊。

#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

## 争取少帅和东北军

1935 年 12 月 8 日，周恩来率军委机关部分人员到达陕北安定县瓦窑堡。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确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与组织全国革命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党在当前最主要的任务。

第二年夏天，中央迁到保安。在周恩来主持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周恩来的工作重点放在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方面。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是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时，奉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撤退到关内的。1935 年 9 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指挥东北军、西北军“围剿”陕北红军。由于士气不振，东北军在与红军交战中连连失败。这使张学良大为震惊，不能不重新考虑“剿共”、“抗日”等问题。东北军遭受损失后，蒋介石不给补充，使张学良更为恼火。12 月，张学良在南京开完会后，曾到上海找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提出要找中共负责人联系，又找杜重远商谈抗日救国之道。这一情况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

党中央分析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情况后，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为此，通过多种渠道，从上层到下层逐步打开统战工作局面。

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是我党对东北军工作取得成效最典型的一个例子。高福源被俘后，即参加瓦窑堡的“白军军官训练班”，因表现好，被选为学习班班长。他认真阅读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和其他抗日救国的书报，在学习班里同大家认真讨论抗日救国道理，很快就认清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赞同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 年 1 月 1 日周恩来邀请训练班的学员参加阅兵式，并在阅兵式前作了“同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的报告，进一步启发了高福源的爱国主义觉悟，他决心要以实际行动来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号召。高福源向训练班的首长建议说，张学良、王以哲都有抗日救国的思想和要求，东北军广大官兵更有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如果他们能了解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是可以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他自告奋勇回东北军直接向七十六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报告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敦劝他们和红军合作抗日。当时军官训练班是红军保卫部主办的，保卫部长兼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听到高福源的要求后，立即报告直接领导白区工作部和中央联络部工作的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定李克农同高福源谈话。李克农在谈话中对高福源说，希望王以哲军长和张学良将军认真考虑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红军愿意和东北军停止对抗，共商抗日大计如果他们愿意，中共可派代表前去谈判。这次谈话后就给高福源发了路费，并派专人护送他回东北军了。1936 年 1 月初，高福源回到王以哲军部驻地洛川。王以哲听了高福源的报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张并秘密报告张学良。这时张学良刚从上海回到西安，正急于找到共产党。他得到电报后就飞到洛川会见了高福源。高福源向张学良详细报告了他在苏区的见闻，并说共产党是诚心诚意主张停

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如果张副司令愿意，中共可派正式代表前来谈判。张学良听了很高兴，当即要高福源带了一封信回到苏区，请共产党派代表到洛川面谈。1 月 16 日，高福源到了瓦窑堡。得到高福源的报告后，中共中央认为张学良确实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遂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到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1936 年 1 月 19 日，李克农在高福源引导下，到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2 月初，中央再次派李克农到洛川谈判。这次除谈判政治、军事问题外，还要谈通商、贸易问题，又派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参加会谈，译电员戴镜元同行。2 月 10 日，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谈话，指示李克农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先谈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问题。嘱咐他先要多听张学良、王以哲的意见，然后再根据情况对不同意见加以耐心解释，对重大的问题要及时向中央报告请示，要他们做好谈不成的思想准备，但要力争谈成。

2 月 20 日，周恩来在瓦窑堡接到中央及军委从东征前线发给李克农的训令，指出张学良同意抗日，愿意和我们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因此，我们的策略是：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同讨代卖国贼不可分离；要求停止内战，不阻止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锋队；原则问题不让步，交涉不破裂。周恩来立即向李克农、钱之光等传达中央、军委的训令，叮嘱他们根据训令精神去谈判。周恩来除在政治、思想上作了详细指示外，还对戴镜元所带的密码的隐藏办法和电台联络的呼叫波长等，进行了检查，走的路线和沿途要注意化装和安全等问题，都详细作了交代。他对钱之光说：“ 如谈判成功，你即从洛川直接到西安去采购一批苏区急需的物资运回瓦窑堡。 ”2 月 21 日，李克农一行在高福源的陪同下，由瓦窑堡出发，于 25 日到达洛川。

张学良原来打算亲自参加会谈，因临时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先谈局部合作问题，重大问题由他同来谈。王以哲是东北军较早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将领，所以谈判比较顺利。通商是当时双方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合作抗日的一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后，就着重谈通商问题。因为东北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个战役遭到重大损失后，就固守在肤施（即延安）、甘泉、鄜县、洛川等城内。周围的农村或者是苏区，或者是我军的游击区，粮食、柴草都很缺乏，公路交通也常被红军和游击队破坏，而甘泉城内的两个营驻军，被我包围了半年之久，给养更困难，空投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们急需和苏区通商，保持公路畅通，以解除对他们的封锁。苏区和红军粮食基本解决，但医疗器械和药品、无线电材料、服装布匹等，因被封锁无法买进，也急需解决。双方互有需求，所以就很快取得一致意见。经过两天谈判后，于 28 日达成了几条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一、为一致抗日，红军与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复六十七军在肤施、甘泉、鄜县之间公路交通及通商；三、肤施、甘泉两城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出城向苏区购买，红军和地方政府可动员群众运粮、柴进城出售，恢复正常通商关系；四、恢复红白两地区通商，双方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安全之责；五、红军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内的部队换防。

这次谈判是个良好的开端，为同张学良会谈作了准备工作。

3 月 2 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当日即亲自驾机飞到洛川和李克农会谈。他身着便装，像个商人，一见面就风趣地说：“ 我是来做大买卖的，

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李克农也幽默地回答：“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立即引起一片笑声。虽是初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久别重逢似的，气氛十分融洽。因为双方早就心照不宣地期待这次见面的机会。会谈一开始，张学良即表示已听过王以哲、赵镇藩的报告，完全赞同双方的口头协议，并希望全面合作。接着他请李克农先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李克农根据我党瓦窑堡会议精神，着重指出，继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三省和热河以后，又向华北进犯，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只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打败日本侵略军，收复失地。为了民族利益，国民党首先要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同意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抗日联军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他提出了几个问题：一、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他认为国家的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蒋有抗日的可能，抗日必须联蒋。二、抗日如何能取得胜利？三、如何取得苏联援助？四、红军东征抗日应取道宁夏、绥远、察哈尔，不应取道山西。李克农一一作了回答，但在联合蒋介石和进军路线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李克农表示：“张将军的意见，我们可以向党中央报告。”

双方商定：一、和苏联联系，双方可各派代表。赴苏路线，张学良答应他可与新疆的盛世才商量；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保持联系，由张给以名义掩护。最后，张学良提出，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来一次，地点在肤施，具体时间由中共方面定。李克农表示，立即向中央报告。

会谈在诚恳友好的气氛中结束。这次会谈，为张学良和周恩来的肤施会谈奠定了基础。当时，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等驻在山西石楼城指挥红军东征。周恩来和博古、邓发由瓦窑堡赶到石楼。3 月 16 日，李克农到石楼向中央汇报了洛川会谈情况。中央立即决定周恩来为代表到肤施同张学良谈判，李克农也同去。

在洛川谈判期间，王以哲派人掩护我们的采购人员到西安，收集了许多报纸和军用地图，这对于中央了解国民党地区的情况和红军东征的行动，都有很大的帮助。洛川会谈结束后，王以哲又送给红军一批七九步枪，子弹数万发，并派少校副官王政用汽车送至红军防地。钱之光则由王以哲派人护送，化装成东北军军官到西安采购苏区急需的物资。经过两个月的努力，采购了许多重要物资，其中有印钞票用的印刷机和高级纸张、油墨、无线电器材、医疗器械和药品等。这些物资，都由东北军用军用汽车送到洛川，再改用牲口转运到双方防地交界处，移交苏区贸易局运到瓦窑堡。这批物资为苏区解决了许多困难，打破了国民党对陕北苏区的经济封锁。

如果说，李克农同张学良、王以哲的洛川会谈，为周恩来同张学良在肤施的会谈奠定了基础，那么刘鼎到西安特别是在洛川和张学良的长谈，则使张学良进一步增强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心和信心。

刘鼎，四川人。1924 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入党。1934 年派往赣东北苏区工作，在方志敏率领的抗日先遣队遭蒋介石围攻失败后被俘。后从九江俘虏营逃出到上海寻找党组织，经友人介绍曾暂住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中。1935 年 12 月张学良到上海会见李杜和杜重远时，表示要找共产党关系。李杜和来庆龄有联系，提出过此事，宋庆龄知道刘鼎住在艾黎家中，她对刚到过瓦窑堡同中央联系的地下党员董健吾说，艾黎家中就住

了一个共产党员，可介绍他到张学良那里去工作。董健吾见了刘鼎，告诉他张学良急于找共产党的关系，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希望他能去西安见张学良，刘鼎经过考虑后表示同意。并在上海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认真研究党中央的《八一宣言》和有关统一战线的文件，对张学良的历史、为人处事的特点等也做了调查。1936 年 3 月，李杜从董健吾处了解情况后，打电报给张学良说：“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学良很高兴，即派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把刘鼎接到西安，秘密往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的东楼内。

刘鼎到西安的第二天，张学良在家里接见他。寒暄以后，张学良严肃地向刘鼎提出三个问题：一、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决不后人，可是你们共产党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二、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样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三、在陕北，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使东北军遭受了严重损失。

张学良一见面就提出这三个质问性的问题，使刘鼎感到有些吃惊。但刘鼎是久经风霜、见过世面的老共产党员，他留学德国，到过苏联，在上海搞过地下党工作。他惊而下慌地回答：张先生这样坦率地提出问题来商讨，我很欢迎。因为这些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考虑一下，明天再详细答复你。张学良同意。并当面叮嘱随从人员，好好照顾刘鼎的生活，要绝对保密。

第二天，刘鼎再次与张学良见面。刘对张说：一、张先生身为东北军边防军司令，率领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守士有责。“九一八”事变发生，张先生执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军不放一枪，一夜之间，沈阳失陷，不到四个月，日寇就占领了东三省，这当然会遭到全国人民的辱骂。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的态度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不表示态度。二、中东路事件，东北当局受了蒋介石和日本的挑唆，首先挑衅，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采取片面行动，苏联对张先生的指责绝非无中生有。三、东北军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已成为蒋介石的“剿共”大军，在鄂豫皖和陕西，使苏区和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在陕北，红军采取自卫反击，使东北军受到挫折，这与苏区和红军的损失相比，算得厉害么？红军是有人民支持的新式军队，蒋介石的百万大军都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其实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借此来消灭东北军。共产党、红军和蒋介石打了十来年交道，深知他剪除异己的一贯阴谋。究竟是红军对东北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对东北军厉害？值得先生考虑。刘鼎接着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形势将军当有深切体会。当今之计，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和东北军最迫切的愿望，也是全国人民对你和东北军的希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也可以一洗“不抵抗”的罪名。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都可以名垂青史。

刘鼎说完后，以为对张当面进行了批评，会使他不高兴。岂料，张学良神态安详，沉思良久后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你就是我的朋友。注在我这里，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谈，慢慢地谈吧！刘鼎说，既然张先生赞同我的看法，可否日内送我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张学良微笑说，过两天我们一同去陕北，先到洛川去住几天再说。但当天张学良就偕刘鼎和公馆随从人员飞到洛川。

洛川是六十六军王以哲的军部所在地，也是接近红军驻地的前沿城市。张学良为了等待周恩来到肤施会谈，同时也准备同刘鼎长谈，不受干扰，所

以只带少数亲信人员到这里来。为了迷惑蒋介石和特务的耳目，他行前以推进“剿共”军事为名，报请南京在洛川设立“西北剿总前进指挥所”，声称自己要到前方督战。他曾致电蒋介石说：“预定设前进指挥所于洛川，学良即日赴前方督剿，以期早奏厥功，释解委座两顾之忧。”蒋介石对张学良自告奋勇上前线指挥“剿共”，颇为高兴。复电称：“陕北军务，得弟亲往督饬，立歼灭之大功，在此一举。”蒋介石那里知道他的副司令，正在积极地秘密“通共”呢？

张学良这时已经决心联共抗日了，但是他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还很不了解，他看出来刘鼎是了解情况又有见解的人，甚至曾对他的亲信应德田说过，怀疑刘鼎是王稼祥的化名。张学良就利用在洛川的时间同刘鼎进行了十来天的畅谈。

张学良对刘鼎的谈话十分赞赏，认为刘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令人佩服，又是位可与之谈心交朋友的人。因而张学良也就开怀畅谈，谈他的身世，谈他怎样在东北易帜，怎样进关以及出国考察等等。一下子就把刘鼎引为知心朋友。这就为张学良和周恩来肤施的会谈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周恩来在去肤施谈判以前,参加了 3 月 20 日到 27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不排除蒋介石允许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可能，没有再次谈反蒋的问题。周恩来在发言中，分析一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已认识到抗日的必要性。提出抓住“联共”的口号和红军率先抗日来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是抗日的中坚力量，要发动、准备组织抗日战争。并提出要正确运用上下层统一战线，推动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的同时，不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的工作。这些主张在当时都是至关重要的。

3 月 29 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签署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为一致抗日告全国民众书》发表。书中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联合抗日；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求全国红军首先集中河北，阻止日军前进等项主张。

周恩来事先做了同张学良谈判的充分的思想准备。

4 月 6 日，毛泽东、彭德怀联名致电张学良：提出：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 8 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 7 日由瓦窑堡启程，8 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4 月 7 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译电员戴镜元及电台、警卫人员，从瓦窑堡出发，8 日晚抵达川口。因下大雨，张学良 9 日上午才带着王以哲、刘鼎由洛川亲自驾飞机到肤施。下午 6 时，张学良派人到川口接周恩来、李克农人城，8 时到达天主教教堂内，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已在那里等候。

张学良和周恩来，都是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的赫赫人物。一个是西北“剿匪”副司令，一个是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直罗镇一仗，是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在战场上指挥的，把东北军一〇九师全部和另一个团消灭，打死了师长牛元峰，可说是冤家对头。可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今天要

“一泯前仇”坐在一起会谈，成为“不打不成交”的朋友，当然都很兴奋。两人一见面，就热情地握手。周恩来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1910 年到 1913 年秋在沈阳读书）。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很奇怪，问张学良，“怎么张伯苓是你的老师？”张学良说：“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是听了张伯苓劝告后戒除的，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并说：“我和你同师。”引得大家都笑了。会谈就在这种亲切而轻松的气氛中开始的。

张学良表示：一、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参与酝酿此事。二、同意红军集中河北，但认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脚，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绥远。如果红军坚持东出，他可以通知在河北的东北军与红军联络。还答应可为北上的红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让路。并说如果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他可以公开和红军联合。三、蒋介石现在歧路上，根据他的观察，蒋介石可能抗日。目前他还不能做到反蒋，如蒋投日，当离开蒋；在未公开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的命令，进驻苏区。他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四、将派代表去苏联，中共方面的人由他派人送至新疆，他可联络盛世才。周恩来表示：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问题很重要，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在谈到抗日救国的道路时，张学良认为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是法西斯的道路。周恩来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是反共反人民的，没有群众基础，在中国行不通。要收复东北，没有全国广泛的群众参加是不可能的。因为张学良的这个观点，在这次会谈前和杜重远、李杜、刘鼎等交谈过，经他们指出这条路走不通后，已有了转变，所以经周恩来一讲，他更清楚了。此外，双方还谈定互不侵犯、互派代表、互相通商等。会谈一直进行到 10 日晨 4 时才结束。双方都很满意。周恩来对李克农等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张学良后来对刘鼎说：“肤施会谈，我太满意了”，“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握别时，张学良赠送《申报》六十周年纪念时出版的中国大地图一本，语重心长地说：“共同保卫中国。”随后，张学良拿出二万块银元和十二万法币，支援红军作军费。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谈，使张学良和东北军同中共的合作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对于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4 月 12 日，周恩来、李克农等回到瓦窑堡，刘鼎也同行。第二天，留在瓦窑堡的中央负责人立即开会，听取周恩来在肤施和张学良会谈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刘鼎到张学良处，任驻东北军代表，继续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邓发为中央代表经西安、新疆赴苏联；在肤施、宜川、洛川、西安等地建立通往白区的交通机关。并决定加紧抗日宣传工作，争取东北军不打红军。周恩来即将肤施谈判和中央会议情况电告在前方的毛泽东、彭德怀。14 日，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

中共中央慎重地研究了张学良逼蒋介石参加抗日的意见。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向华北进攻，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情况下，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受到损害，日本和英美矛盾的发展，也影响国民党内亲英美势力和亲日势力的冲突，而且国内党内也有主张抗日的力量，因此，我们应该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以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参加抗日，最后逼迫蒋介

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参加抗日。

1936 年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把中国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团体并列。提到“汉奸卖国贼”时，第一次没有点蒋介石的名。

1936 年 5 月 5 日，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把“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和各党各派并列。电文第一次称“蒋介石氏”。通电称：“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并向中国国民党人宣言：“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好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

9 月 1 日，党中央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策略上的重大转变。这是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而作出的正确决策。而洛川和肤施会谈中，张学良一再认为蒋介石有可能抗日，应该内劝外逼使他走上抗日道路的意见，也给党中央作出这种决策提供了重要根据。实践证明，这种意见是正确的。由于党中央采纳了张学良的正确意见，不仅使张学良和东北军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而且对于争取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的大多数（包括蒋介石在内）参加抗日，对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有重大的影响。

党中央决定刘鼎担任驻东北军代表后，周恩来就要他同李克农研究在西安建立秘密无线电台，从瓦窑堡到西安和西安到北平、天津、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秘密交通线问题。同红军总供给部长叶季壮、副部长白如冰研究派人到西安采购军装、药品等问题。周恩来指示军委三局局长王净物色一个技术较高的报务员，下次由交通送去西安建立电台，密码则由李克农交给刘鼎先带去并教他使用。

4 月 22 日，周恩来写好给张学良的信。他和李克农一起同刘鼎谈话。周恩来说：党中央决定你去担任驻东北军代表，这件事非常重要，做这样的统战工作是第一次，中央寄予希望，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要善意地帮助张学良，帮助他培养干部，招收青年学兵，他们有很好的条件。有了抗日的干部，东北军就可以成为一支抗日的部队。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以后再派译电员去。和中央的联系要勤。秘密交通线建立了，你要经常检查，保证畅通。接着，周恩来把他给张学良的亲笔信文给刘鼎，信内称：九日会谈，“快慰平生”，中共中央诸同志“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信中诚恳忠告张学良“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兹如约遣刘鼎

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次日早晨，刘鼎在王以哲派来担任秘密交通的王立人的陪同下，进入东北军驻地肤施城，第二大由驻军团长派车送到洛川王以哲军部。王以哲对中共中央派刘鼎到东北军工作表示欢迎。三天后，张学良由西安到洛川，立即和刘鼎见面。

张学良高兴地握着刘鼎的手说：“我估计你会回来，也盼望你回来，果然你就来了。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好呀，真好呀！我很得意。这要谢谢周先生。”

刘鼎说：“毛主席问候你。周恩来同志问你好，很感谢你同他的会谈，谈得非常满意。”又说：“那边，同志们不平凡地欢迎我，不仅因为久别重逢，还有新的因素，即与你很好地相处了一段，仿佛我成了你的代表，有人甚至误认我是东北人。大家问我，张学良先生为什么不顾一切地关心民族前途，敢逆蒋介石的意图，联红抗日？为什么对唯物辩证法有兴趣？为什么能理解红军是不可战胜的？等等。那边的女同志问四小姐好，猜她是个进步女性，总有一天会见面吧！蔡畅、邓颖超同志关心四小姐。因为你，我也成了新鲜人物，你不知道你的勇敢行为多么的动人呵！”

刘鼎交上周恩来的亲笔信。张学良仔细地阅读。当看到“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等警句时，展读再三，似乎是在深思。张学良看到中共主张有条件的联蒋，他的建议被采纳，刘鼎派来作代表，很高兴。几天后，张学良和刘鼎乘专机回西安。他知道刘鼎曾在苏联空军机械学校学习过，就自己驾飞机，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张学良高兴地绕道黄河上空，直到飞机快降落时才交给外籍驾驶员巴尔。到西安后，把刘鼎安置在公馆的东楼上，对刘鼎说：“你名义上是李杜的代表，也是我的随从军官。你要在东北军中多活动，并多多帮助我。”因此，那时人们叫刘鼎为“秘书”。张学良还亲自嘱咐他的随从人员应德田和孙铭九，要好好招待和保护刘鼎。以后又给刘鼎发了自卫手枪。刘鼎在张学良公馆出出进进，同张周围的人事关系都搞得很好。

刘鼎到西安，就积极设法架设秘密电台。他从上海请来曾在苏联学习无线电台的涂作潮（对外称涂木匠）到西安，在张学良公馆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五十瓦的小电台。军委三局派来报务员彭绍坤，他们很快就同军委三局总台联络上了。收发电报都由刘鼎亲自翻译。从此，西安和瓦窑堡之间就架起了一座快速联络的空中桥梁，党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均经过电台转发；党中央的指示和红军、苏区的情况很快可以传到西安；西安以及全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也能及时上报中央。因来往电报多，刘鼎工作很忙，译电又不熟悉，常常搞到深夜，得不到休息。西安事变后，我们去了，他才减少了这项工作。

刘鼎到西安工作后，就着手秘密交通的建设。从西安到苏区党中央（先在瓦窑堡，后在保安），从西安到天津、北平、上海等地的秘密交通，一直是畅通的。他利用关系，在西安东城中国银行盖的七贤庄住宅区租了一号的一个两进的四合院，做为秘密交通站。他从上海请来德籍犹太人海伯特·温奇牙医生在前院开了一个“德国牙医博士海伯特诊所”，在西面的正厅摆设着治牙器械和药品。对外又称是张副司令的牙医。也给国民党的官员和官太太治牙。刘鼎调了一个烈士的遗孀夏明住在东厅做为“二房东”，她负责秘密客人的接待工作。牙医诊所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可惜这位牙医博士海伯

特，在西安事变发生时，听到枪声就往门外看，被流弹打死了！中国人民应该永远记得这位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

刘鼎通过东北军关系买了商用交通车，把经西安去苏区的人送往洛川转陕北。由宋庆龄介绍到苏区的美国记者斯诺和马海德大夫，以及潘汉年、丁玲、张子华等，都是经过七贤庄交通站转送的，中央从陕北派到新疆或转苏联的邓发、王稼祥等中央负责人，也是经刘鼎设法转送的。叶剑英、汪锋、张文彬、张经武等由保安到西安，也是通过这条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东北军派了联络副官王立人帮助，护送重要人物和运送物资时，他随车行动，保证在东北军防区畅通无阻。

刘鼎要涂作潮在七贤庄一号地下室安装了 100 瓦大功率的电台，由军委三局从保安派来报务人员曾三、林青、申仲仁（申伯纯的儿子）等住在地下室，和设在张学良公馆的小电台交错与党中央通报，大台还收抄、转发陕北苏区和红军的电讯。同时，红军总供给部派了干部来西安采购军服、军鞋、无线电器材、药品、文具等，王以哲指定六十六军王政副官帮助。王政和一些东北籍商人在西安开了一个“同和军服庄”，设有被服厂，专门为东北军制军服，红军的军服也是由他们制做的，为党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解决了冬季服装问题。当时大家除发了一套一般的灰棉军装外，还发了一双双鼻子（即在鞋尖上有两条小布脊像鼻子）棉布鞋，大家很高兴，因为第一次穿这种“东北式”棉鞋，又有点好笑。

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接受周恩来的建议积极团结核心力量，训练干部和改造部队，做抗战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他都邀请刘鼎参加并给他出谋划策。1936 年 7 月，张学良筹建“抗日同志会”，9 月正式成立，作为东北军团结的秘密核心组织，吸收有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作为会员。开始主要成员是他的亲信和进步分子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卢广绩、车向忱、刘澜波、苗勃然（两个都是中共秘密党员）等，刘鼎也参加了。以后向军、师、旅长发展，共达 70 多人。张学良自任会长。该会为联共抗日、培养抗日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学良为了整训所属部队的军官，灌输抗日救国思想，革除陈腐作风，商得杨虎城的同意，报经蒋介石批准，在西安南郊王曲创办了“西安军官训练团”，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张学良接受刘鼎的建议，吸收瓦窑堡红军大学的经验，以政治为主，主要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军事为辅，学习运动战和游击战术。训练团改善了部队管理制度，废除了打骂，提倡官兵平等，加强了官兵团结。

张学良很重视军官训练团，第一期他就住在王曲，亲自给学员作报告。张学良、杨虎城讲话，都讲抗日救国道理。张学良公开对学员说：”唯有对外，才能实现真正统一。”“东北军要站在抗日第一线，……东北土地主权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东北军抗日，唯有牺牲是属于我们的。”学员们讨论时，就联系东三省沦亡的实际，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学员们知道了张学良有抗日救国的决心，不断提高了民族意识和抗日救亡的认识；张学良看到训练团学员们高昂的抗日情绪，也更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

刘鼎又向张学良建议办学兵队，从北平、天津招收一些参加“一二·九”运动的进步学生到西安受军训。张学良同意后，由中共秘密党员刘澜波、孙达生等协助招生，学兵队由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领导，管理干部由卫队二营派送。学兵队共三百多人，设在西安东门城楼上。刘鼎常以张学良

随从秘书名义去上课。他讲得很生动，学员们都爱听。他喜欢穿长统花袜子，所以学员都认识这位“穿花袜子的秘书”。学兵毕业后分配到各要害部门和各部队，在各方面都起了好的作用。

刘鼎还和刘澜波等推动东北文化教育界人士发起组织“东北救亡总会”，作为团结东北人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又从上海请来文化界秘密党员吴奚如到西安，主编“抗日同志会”的刊物《文化周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成为畅销刊物。

1936 年 7 月初，张学良住在王曲军官训练团时，突然把刘鼎找去，情绪很紧张地对他说：“我的日子难过。我连想了几天，想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就拉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请你向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周先生报告，我立即派飞机送你到肤施。回来时，我到那里你追到那里，告诉我结果。”当时，张学良正准备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

刘鼎很惊奇地问张学良是怎么一回事？

张学良说：我翻来复去地考虑了几天，现在主意打定了。前面是强大的日本鬼子，后面是比蛇还毒的蒋军，整我，迫我。我的队伍里年轻有为的人不少，但老气横秋、顾虑重重的也很多，加上别有用心的，胆怯而危险的家伙，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干脆撒手。迟分下如早分，与其将来被动，不如现在主动，早下手为强，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我和周先生会谈过了，彼此了解，干脆和你们合在一起，放开手干，大有可为。

“劝蒋介石团结抗日的事，原来我想有可能，现在看，不容易。他自成一系，损人利己，太阴毒。我反复地想了一阵，难得好结果。不如明着眼你们干，旗帜鲜明，干两年，一定会有很大成就，然后再逼他抗日，更有力。”

刘鼎立即回到西安，用十万火急的密电报告党中央。

这时，党中央机关刚从瓦窑堡撤出来，正在向保安转移中。中央得到刘鼎的电报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于 7 月 5 日赶到安塞城。这是一个比保安还破烂的小县城。刘鼎乘张学良专机到肤施后，步行 50 里到达安塞。中央立即召开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到会。李克农也列席了会议。

刘鼎向中央汇报了张学良的要求和东北军内部情况；也谈了张学良已经和山西阎锡山，河北宋哲元以及四川、广东、广西、山东等地方势力建立了联系的情况等。

经过彻夜的汇报和讨论，毛泽东最后说：“东北军处在亡省亡家流落西北的地位，由于我党抓紧对他们的工作，东北军由“剿匪”工具变成抗日军队是完全可能的。

“张学良敢在肤施与周恩来面谈，回去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在东北军这支军阀习气重的军队里训练抗日骨干，宣传抗日，很不容易。有一些高级军官思想不通，甚至反对，是可以想见的。张学良遇此难题，并不奇怪。随着形势的发展，东北军内部分化，张学良竟准备和红军一起干，这是个了不起的转变。

“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救国的力量，成为红军的可靠友军。因此，我价不赞成张学良拉队伍和红军一起干。而且拉出一部分队伍来，就要散掉一部分，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力量。要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

“目前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但是决不会坐机东北军打起抗日旗帜的。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劝他抗日，准备更大的斗争。”

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要刘鼎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意见向张学良传达，多做解释工作，继续帮助张学良做培养和团结干部的工作。

毛泽东在会后又同刘鼎单独谈话。他说：“当前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是争取团结，联合抗日。任何不符合这个方针的都是错误的。要做张学良本人的工作，做团结东北军的工作，使东北军成为一支真正的抗日力量。你不要怕年轻，也不要怕没经验，我们都在做张学良的工作吁！中央支持你。刘鼎，你这个代表要当好哇！”

刘鼎回到西安见到张学良，向他详细谈了安塞中央会议的情况。他说：“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到会，研究了一夜，高度评价你的抗日决心和热情，但你的想法目前时机辽不成熟，要你团结全部东北军，耐心争取蒋介石和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张学良耐心地听后表示理解中共中央的意思。他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我和委员长交情很深，我要认真利用这个地位加快步伐向他进言，争取他幡然省悟。你们党中央既然要我这样办，纵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

张学良又同刘鼎谈改造东北军的事。他主张要加强领导力量，要提拔一批青年军官。又说，“过去有些人说，共产党要吃掉东北军，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国民党军队互相拆台、吞并是司空见惯的事，你们共产党是真正帮助东北军，发展东北军。从今以后，你就大胆工作，我给你撑腰。”刘鼎提醒张学良，争取蒋介石团结抗日并不容易，同时要提防国民党特务破坏。

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意见，抓紧对部队进行改造、团结工作，亲自对军、师长分别谈团结抗日的道理，并根据不同对象透露联共抗日、逼蒋抗日的思想。张学良利用一切机会向蒋介石进言，劝他抗日，但是，蒋介石不管张学良怎样劝告都无济于事，而且亲自到西安当面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向陕北红军“进剿”，否则就把东北军调往福建、十六路军调到安徽，把陕甘两省交给中央军，由中央军“剿共”。虽然张学良、杨虎城一再“苦谏”，甚至“哭谏”，蒋介石仍顽固不化。

刘鼎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争取和帮助张学良以及东北军工作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曾评价说：在争取东北军中，“刘鼎是有功的”！

为了进一步帮助张学良、杨虎城促进东北军、西北军的改造，开展各方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党中央于 1936 年 9 月，派叶剑英、潘汉年、朱理治、汪锋、彭雪枫、边章伍、吴自立等一批干部到西安。

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住在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的家里，对外化名“杨先生”，是张学良的客人。他同时代表党中央直接领导东北军、西北军中的中共秘密组织，和一些上层统战关系直接联系。原住在张学良公馆的刘鼎，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潘汉年是从莫斯科回国，经上海、南京、西安于 8 月到达保安的。他曾代表党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代表张冲会晤，交换改进国共关系、准备共同抗日的意见。他在保安向党中央做了报告，中央要他去西安协助叶剑英工作

一段后，仍到南京、上海，按党中央指示继续同国民党代表会谈。临行前，周恩来同叶剑英、潘汉年一起谈话，要潘到西安同张学良见面，因张对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问题的态度甚为关心，可将国际关心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告他，并同张商量如何以国民党为中心共同进行工作和打通苏联关系的问题。潘在西安活动后即到上海去了。

朱理治为中共特派员，领导东北军中党的秘密组织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

汪锋在 1935 年 12 月就奉党中央指示，携毛泽东亲笔信同杨虎城见面，进行过双方合作的谈判。这次中央要他到西安帮助杨虎城改造西北军，领导西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周恩来要汪锋转告阎揆要（十七路军的团长，中共秘密党员），在杨虎城的部队内不要搞“左”的行动，不要起义。要他吃国民党的饷，做我们的工作。要告诉秘密党员，善于交朋结友，既做官就要老老实实做官，把官位巩固下来。要对人诚恳，多接近各方面的人等。

彭雪枫在西安进行一段上层统战工作后，于 10 月到山西太原，开展对阎锡山的上层统战工作。

边章伍是 1931 年在江西宁都起义后改编为红五军团的干部。他与西北军有历史关系。他在叶剑英领导下进行西北军系统的上层统战工作。

吴自立是军委供给部的干部，他到西安负责红军军用物资的采购工作。

叶剑英等一行人化装成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谈判的代表团，在保安谈判后经西安返回南京。边章伍是河北人，长得魁梧，就化装成负责谈判的“长官”，穿高级呢子军装，挂斜皮带，穿长统皮靴，手持马鞭。潘汉年是秘书，因为他是从上海、南京到保安来的，所以穿上带来的西装，戴上礼帽、金丝眼镜，夹着公文皮包，一副大秘书派头。他知道国民党地区和军队的情况，一切应付裕如。彭雪枫长得一表人才，挂上武装带，很像个副官。叶剑英是个大人物，不让他出头露面，就只好多日不剃胡子，穿上士兵服当“马伕”。当然“长官”是不会亏待他的，在有群众的地方要他牵马，在山沟里没有群众的地方，就让他上马了。其余的人都穿上国民党士兵的衣服当“兵”。李克农派了交通王立人和几个红军带路护送。在苏区内，群众和红军战士见了都很惊奇，有的以为是抓来的俘虏，经解释是南京国民党派来的，又为国共开始谈判而高兴。他们走到直罗镇东北军刘多荃师防地时，受到刘多荃的接待。边章伍、潘汉年当贵宾接待，吃得很好，还有桔子，其他“随员”就住在马号。当刘多荃（刘澜波同志的哥哥）发现“秘书”给“马夫”吃桔子，“官”和“兵”的关系不像国民党的官兵关系时，就心照不宣，给他们平等待遇了。刘多荃早就和红军有关系，他当然不会查问究竟。可这出戏还是露出了一点小小的破绽。从此，他们就注意严格区别“官”和“兵”的关系。到西安以后，照各自的任务和关系，严格保守秘密。据孙铭九回忆：“副司令（张学良）把红军代表交给我，住在我家里，要保证他的绝对安全。这位代表风度翩翩，像个书生，只叫他杨先生。事后才知道，他就是著名的叶剑英将军。”叶剑英在政坛有丰富的经历和斗争经验，当然演得很成功。

叶剑英带了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希望张学良将军“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在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中央档案馆保存了一份《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战的协定》草稿，毛泽东在红军代表款下签了名，但东北军款下没有张学良的签名。时间是 9 月 22 日。我一看，是我的字迹。查了当时的

日记，是 1936 年 9 月 20 日晚我在外交部（即中央联络局）抄写的。中央档案馆曾把这份草稿当成“毛泽东、张学良签订了协定”印在文件上。中央党史研究室也据此引用到《中共六十年大事记》（1982 年版）。此事我认为不能成为正式协定，因为张学良并没有签名，而且是我抄的草稿，还有修改的地方。如是正式文本，肯定会抄得正规的。1982 年我曾问过刘鼎，刘鼎说，他没见过这个协定。我又当面问过叶剑英，他也记不得有此书面协定。这件事有两个可能：一是叶剑英曾带到西安征求张学良意见，因为事实上东北军和中共关系已经很密切，重大问题都已解决，不必签订文字协定；另一种可能是，中央考虑一切可由叶剑英当面同张学良协商，没有带到西安去。不论何种情况，说它是毛泽东同张学良签订了书面协定是不能成立的。

叶剑英在西安时，为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随着我党同东北军、西北军统一战线关系的更加密切，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国民党的特务活动也日益加紧。叶剑英在西安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张学良时刻关心叶剑英，要孙铭九保证他的绝对安全。叶剑英也就很少出外活动。

10 月 22 日，蒋介石从洛阳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他兴致勃勃地游览了秦始皇陵和华山之后，召见了张学良、杨虎城，狂妄地叫嚣要在三个月之内把陕北红军全部消灭，并要张、杨做好一切剿共准备后，即向陕北红军进攻。张、杨不仅不同意继续剿共，而且正式向蒋介石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对张、杨严加训斥，声称“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并亲自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张、杨的部下施加压力。西安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张学良很快将他和杨虎城同蒋介石会谈情况通知了叶剑英。叶立即向中央报告。鉴于形势紧张，10 月 29 日，叶剑英向中央请示，拟于三日后离西安回保安详细报告。11 月初，中央回电同意叶回保安。叶告张学良，中央要他回保安开会。张指示孙铭九，派车和警卫人员护送叶安全出西安到洛川，由洛川的东北军负责护送到红军防地。

叶剑英安全回到保安，向中央政治局详细报告了蒋介石同张学良、杨虎城的谈话内容和蒋介石“进剿”红军的军事部署，东北军、西北军以及各地方实力派的情况等等。党中央肯定了他和刘鼎等的工作成绩。叶剑英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结他的任务。

当政治局会议进行中，机要科长叶子龙送来张学良发来的急电，说西安形势十分危急，请叶先生即来西安，共商大计。

叶剑英一行离开保安时已是 12 月上旬，经过几天跋涉到鄜县交界处时，“双十二”事变已经发生，中央要他回延安，等待飞机飞西安，同周恩来、博古等去担负更重要的任务。

## 争取西北军和地方实力派

西北军的爱国将领杨虎城，青年时代参加辛亥革命，拥护孙中山，以后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战争。1926 年他因坚守西安孤城八个月，策应北代战争并取得胜利而闻名于世。1931 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1933 年 5 月，杨虎城和他所属的十七师师长孙蔚如，曾派参谋武志平（中共秘密党员）到川陕苏区与红四方面军商定“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之后，红四方面军也派出川陕军委参谋部主任徐以新到汉中，同孙蔚如密谈，达成了上述密约。双方根据这一密约，互不侵犯达两年之久。

1935 年 12 月上旬，中央派汪锋携毛泽东亲笔信到西安与杨虎城商谈合作问题，并带去毛泽东给杜斌丞、邓宝珊的信。中旬，杨和汪谈话，消除了杨对红军的一些误会，双方确定了联合抗日的原则。12 月下旬，北方局又派负责人王世英到西安，与杨虎城反复商谈后，达成合作抗日协议。主要内容是：一、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三、十六路军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来往；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1936 年 4 月 5 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情况，说杨虎城过去和我们有关系，这两支军队不仅有可能联合反蒋，而且可能联合陕甘其他部队及孙殿英、宋哲元等部。会议认为杨虎城是可靠的同盟者，应真诚地同他谈判，加强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

在 8 月 10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为了促进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促使国民党政策的根本改变，必须要有几个大联合，即西北的大联合，少数民族的联合，蒙苏的联合，红军的联合。他认为西北大联合是全国大联合的枢纽。事实证明，他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他正为这几个大联合而艰苦奋斗。

1936 年 9 月，党中央派张文彬（原名张纯青，任过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当时在红军大学一科学习）到西安与杨虎城继续谈判，达成了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一、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二、取消经济封锁，设贸易站保障苏区贸易，十六路军负责掩护，苏区不禁止群众供应十六路军粮食；三、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等。

协议确定后，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驻在西安，对外以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名义活动。在西安、宜川、洛川等地设有秘密交通站，与苏区和其他地区联络。他住在西安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尤凤舞的家里，经常在这里和秘密党员及友人接头。

写到这里，使我想起了 1936 年 8 月 13 日那一天。当时，张文彬、张经武和我都在红军大学一科学习，中央决定派张文彬到西安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张经武（长征时曾任军委纵队参谋长，到陕北后任军委二科科长）到山东做韩复榘的统战工作；毛主席调我作他的秘书，都是同一天调出来的。红大教育长罗瑞卿为表示对学员的期望，在保卫局加了几个菜为我们饯别，还有另一些同学参加。外面是狂风暴雨，窑洞内却谈笑风生，吃得很高兴。张文彬是知识分子出身，在学习时喜欢吟几句诗，大家便叫他“诗人”。张经武在白区工作过，有时讲几句生意经，大家便叫他“老板”。饭后海阔天空地闲聊，一提到诗人，大家就说要作诗送别，你一句，我一句，一下就凑成

了一首诗：“狂风暴雨宴经武，且谈且笑送诗人；葡萄美露聊当酒，翘首秦中报捷音。”（吃饭时没有酒，保卫局有一瓶从西安搞来的葡萄露，聊当酒喝）当时党中央对两张外出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是寄予厚望的。他们没有辜负党和同志们的期望，不仅在当时，也在抗日战争中，都为统战工作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张文彬同志 1942 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1944 年在江西泰和马家洲监狱牺牲。

由于我党对杨虎城和西北军，一贯采取团结、帮助的方针，始终以忠诚的朋友相待；由于杨虎城、孙蔚如、赵寿山、孔从周等爱国将领及广大官兵，坚持联共抗日的爱国主义立场，不仅在西安事变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全民抗战中，建立了功勋，而且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伟大牺牲，成为抗战中的坚强力量，因此他们就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杨虎城将军于 1937 年 11 月被蒋介石扣留。在抗战时期，蒋介石又想借助日寇消灭杨虎城旧部三十八军，没有达到目的，他们还立了战功。抗战即将结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还阴谋要消灭他们，在逼得他们无路可走时，三十八军的部队不得不在 1945 年至 1946 年先后在河南洛宁、巩县等地起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杨虎城将军则于 1949 年 9 月 6 日连子女及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儿子等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被杀害（他的夫人早在 1946 年底被特务害死），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与此同时，我党同各地方势力也建立了统战关系。

蒋介石自 1927 年 4 月 12 日叛变革命，取得中央政权以后，一方面继续镇压革命运动，“围剿”红军；另一方面就是采取政治、军事、经济以至特务手段，消灭、收买、分化、破坏地方势力和非嫡系的军事力量，妄图达到他的“统一”，实施法西斯的军事独裁。因此，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和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甚至发展到军事对抗。

“九一八”事变，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在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下，各地方势力都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和我党建立联系。在党中央领导下，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同时，也开展了对地方势力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使之成为“逼蒋抗日”的另一支力量。张学良自确定联共逼蒋抗日方针后，也向各地方势力进行过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活动，起了配合我党开展统一战线的作用。

争取山西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日本帝国主义向察哈尔、绥远进攻时，山西首当其冲，阎锡山为维护自己的封建王国，曾作些抗战的准备。由于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发展，对山西是个威胁，他又积极反共。1936 年 2 月红军抗日先锋队东征山西时，他坚决阻止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并让蒋介石派十个师到山西，妄图消灭红军。中共中央为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于 1936 年 5 月 5 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红军全部回师陕北。因此，蒋介石的中央军已无理由长驻山西，把主力撤出山西，这点阎锡山是高兴的，也是我党利用蒋阎矛盾的一个例子。同时，北方局通过党员和进步分子的关系，也向阎锡山领导集团开展统战工作，1936 年 4 月，一批关押在北平监狱的党员经北方局报请中央批准履行手续出狱后，山西籍的党员薄一波等，就利用社会关系到山西进行统战工作，并得到阎锡山的支持。9 月，中央派彭雪枫经过西安到太原，代表中共和红军同阎锡山建立了正式的合作关系，为 1937、1938 年抗战初期比较好的合作抗战，打下了基础。

争取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还在江西苏区时代，红军

就和陈济棠有过秘密关系，主要是互不侵犯防区和通商贸易。长征中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曾与陈济棠秘密谈判，达成让红军借路西进的协议。李济深是桂系的政治代表人物，在 1933 年福建事变时，同我党建立了联系，经过他的影响以及我党在香港对广西方面做了工作，李宗仁、白崇禧对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有所了解。1936 年 6 月，两广发动反蒋抗日的事变，我党曾肯定他们是抗日的，进步的。事变发生后，党中央从瓦窑堡派了大革命时期曾在广州参加革命运动，以后又参加了广西的红七军的云广英，经天津、香港到达南宁同李宗仁、李济深建立了直接关系，他们都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愿意同中共合作，在此之前，中共北方局联络局的王世英，和李宗仁派在天津的代表刘仲容的父亲有统战关系，并可利用他们的电台发报。

1936 年 8 月底，李宗仁、李济深的代表钱寿康经西安到达保安，要求与中共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协定经过修改后，由钱寿康带回广西。西安事变发生，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通电表示支持。

争取绥远的傅作义。傅作义原来是阎锡山的部属，自 1931 年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后，已逐渐形成一方势力。由于他在 1933 年参加长城抗战，1936 年参加绥远抗战，成为全国人民崇敬的爱国将军。

中国共产党对于傅作义的爱国精神，曾多次加以表扬，并派代表见傅面商合作抗战事宜。1933 年 6 月，中共北方局曾派张经武到归绥同傅面谈。张经武事后告人：傅是坚决抗日的。1936 年 6 月，傅作义把关押在绥远的王若飞送到太原，经薄一波同阎锡山交涉后释放，王回到延安。8 月，党中央派南汉宸携带毛泽东亲笔信面交傅作义，傅同南作了恳切的会谈。10 月，在太原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彭雪枫，又到绥远同傅作义进行商谈。傅对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11 月下旬，傅作义部队取得收复百灵庙的胜利，受到全国人民的慰问。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了关于支援绥远抗战的通电。1937 年 1 月，毛泽东又给傅作义发贺电，并派南汉宸到绥远慰问，送锦旗一幅。给傅作义以极大鼓舞。这些，都为抗战初期八路军同傅作义在山西抗战中密切配合打下基础。

争取四川的刘湘。四川的地方势力，长期处于半独立地位。大革命时期，他们曾受到吴玉章、杨阎公、刘伯承等的影响。1933 年红四方面军到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对他们形成威胁时，他们就积极反共。1934 年底，蒋介石利用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机会，派出以贺国光为首的参谋团到重庆插手川政，并派胡宗南、薛岳等嫡系部队入川，引起刘湘等不满。1936 年 6 月两广事件期间，刘湘同张学良、杨虎城之间有信使往来，同意逼蒋抗日方针，并曾表示愿与西北共同行动。此时，党中央经过上海地下党派了在四川有影响的张曙时等到四川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同刘湘建立了联系。西安事变后，刘湘通电表示赞成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救国主张，希望和平解决，反对武力讨伐。

争取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他们虽有抗日要求，但不敢公开声言抗日，更不敢联共。经过党中央和北方局派人或通过间接关系表达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后，都愿意建立秘密关系。1936 年 8 月，宋哲元派了代表刘子青到西安，同我党建立联系。

争取新疆的盛世才。经过张学良的疏通，自 1936 年下半年以后，盛世才

同我党建立了比较好的统战关系，又对我党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起了桥梁作用。

我还保存一件 1936 年间党中央在保安时派代表与地方势力领导人建立统战关系，由毛泽东签名盖章的空白介绍信。这种介绍信是由李克农主管的中央联络局用复印纸复写在 3×4 寸见方的薄棉纸上的,写好后送毛泽东签名盖章，再填上对象和代表的姓名，由出去的代表密藏在衣服角上带到目的地后面交的。名单均经过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克农具体安排的。记得当时带过这种介绍信的有：到西安见杨虎城的张文彬，到太原见阎锡山、又到绥远见傅作义的彭雪枫，到广西见李宗仁、李济深的云广英，到山东见韩复集的张经武，到宁夏见马鸿逵的张子华等。

信的原文如下：

××先生勋鉴：日寇进攻，国家危急，亟宜一致奋起，组成坚固的抗日阵线。为着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冀、察、晋、绥、山东，与仇敌血战到底之总方针而斗争。弟等对××先生抗日决心甚为钦佩。兹派××同志前来晋谒，请予接洽交换意见，并赐指示，以期驱除强敌共救危亡。临书不胜屏营系念之至，敬致抗日民族战争之敬礼！

毛泽车（盖章）　月　日

和地方势力的这些联系，对于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同南京政府的秘密接触

1931 年 9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全国人民同仇敌汽，掀起了抗日运动的高潮。

但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直采取投降妥协政策。他们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集中全国主要的军事力量（包括从东北撤退到关内的 30 万东北军），对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进行反复的残酷“围剿”。

由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日本阴谋要把中国变力它的殖民地威胁到英美在华利益，引起美国不满，美国国务卿公开发表文告，声称美国对于日本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国民党内抗日力量的发展，以及亲日派和亲英美派的矛盾等因素，使蒋介石被迫秘密进行一些抗战准备工作。为了遏止日本侵略势力的扩张，取得苏联政府的援助，蒋介石采纳了英美派宋子文、孔祥熙等的意见，于 1932 年底恢复了在大革命时中断的中苏邦交。1936 年春，蒋介石曾秘密派陈立夫、张冲到欧洲，想到莫斯科同苏联谈判，后来他认为时机不成熟未执行。

蒋介石在同苏联改善关系的同时，也打算调整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想与中共建立联系，摸摸中共的底，妄图在政治谈判中压服中共，达到他军事上述不到的目的。

蒋介石最早伸出来的触角，是 1935 年 12 月，他要驻苏联武官邓文仪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负责人王明（陈绍禹）提出进行国共两党谈判的要求。王明表示，无论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并指定将由苏回国的潘汉年和国民党联系。潘汉年在莫斯科同邓文仪会面后离开莫斯科回国。

为了保密和便于亲自掌握，蒋介石把打通同共产党关系的事文给陈立夫负责。陈立夫交代他的亲信曾养甫（曾任铁道部次长，当时任广州市市长）物色可能找到共产党关系的人。1935 年 11 月，曾找到谌小岑（铁道部劳工科长），因为谌曾在天津参加过“五四运动”，同周恩来、邓颖超有来往。谌小岑接受任务后便积极进行这项工作，他一方面通过同国民党元老罩振有来往的湖南同乡、历史学家翦伯赞，约了北平中国大学进步教授吕振羽到南京同曾养甫见面。吕当时虽不是党员，但他同北平地下党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两人都是湖南人）有联系，参加了抗日统战活动。周小舟经过市委报告了北方局负责统战工作的王世英。经北平市委批准，昌振羽于 1935 年 11 月底到南京开始同曾养甫会谈。1936 年 3 月，北方局又派周小舟到南京和曾养甫谈判。谌小岑又经过在南京工作的左恭，找到了上海地下党的关系，上海地下党派张子华以中共长江局代表名义到南京同曾养甫会谈。

当时，中共中央还在陕北瓦窑堡，对蒋介石开始寻找共产党关系的问题还不清楚。最早把国民党要求同共产党谈判的消息告知中央的是宋庆龄。她一直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反对对日本妥协投降，她同共产国际有联系，对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中共的《八一宣言》，都表示拥护。她和上海地下党也有密切联系。当她从宋子文、孔祥熙那里听到蒋介石要找共产党谈判的消息时，很高兴，国为她早就盼望国共能恢复和好，共同对日。她急于想把这个消息直

接告知党中央。1936 年 1 月，宋庆龄请和她有联系的董健吾（秘密党员，对外的身份是牧师）面谈，要他将一封密信送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因要经过东北军防区，宋把事先准备好的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 西北经济专员 ”的委任状交给董。董向上海党组织报告后，上海党组织介绍张子华同行。董健吾和张子华到西安后，请求张学良批准他们进入苏区，张学良知道南京的意图后，他也就更放心同中共联络了。

2 月 19 日，张学良把董健吾、张子华用飞机送到肤施，再由当地驻军派骑兵护送到苏区。2 月 27 日，董、张到达瓦窑堡。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不在瓦窑堡，由博古、林伯渠接待并即电告毛泽东、周恩来等。

3 月 2 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和博古，提出对蒋介石、张学良的联络工作应分别进行。对张学良的工作仍经过王以哲，对蒋介石方面可答应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谈判，应以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根本条件。

3 月 4 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中共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谈判的原则：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董健吾带着中共中央的意见返西安，见到张学良后，即回上海向宋庆龄复命。中断了十年的国共关系又开始打通了。

3 月中旬，博古带张子华到山西向中央报告他和曾养甫接谈的情况。周恩来也到了。同时，北方局的王世英也向中央汇报了同杨虎城谈判的情况，并报告了吕振羽、周小舟在南京同曾养甫、谌小岑接谈的经过。

这时，党中央对东北军、西北军、各地方势力以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动向，了解得更清楚了。在 3 月 20 日至 27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分析一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已认识到抗日的必要性，但有人想挑动日苏战争，所以至今国民党对降日还是联俄仍举棋不定。由于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这就尖锐地推动了民族战争的发展。对南京政府说来，或降日，或抗日，其间的余地更狭了。他提出抓住“ 联共 ”的口号和红军率先抗日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是抗日的中坚力量，要发动、准备组织抗日战争。要正确运用上下层统一战线，推动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还提出中共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不放松准备建立，但又不麻痹群众；在抗日讨逆、停止内战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并要求国民党有实际行动；我党保持批评的自由；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的同时，不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的工作。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这里所指的各党各派已经开始把国民党包括在内了。6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致国民党二中全会通电，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潘汉年从莫斯科到上海，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代表张冲会谈后，经西安刘鼎的秘密交通线于 8 月 8 日来到保安。他向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汇报了邓文仪在莫斯科同王明谈国共和谈问题，以及他在上海、南京同张冲、曾养甫谈判的情况。

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了潘汉年汇报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我们的方针是继续同南京谈判。周恩来认为，同南京谈判时应提出实际问题：一、停止内战；二、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并建议放弃“ 抗日必反蒋 ”的口号。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

见，并指出：我们在苏维埃形式、红军形式、土地政策等方面也应有所变动。会议认为，南京是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8 月 25 日.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书中严正指出：“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的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宣布“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共谈判露出微曦，周恩来几乎是竭尽全力促成谈判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以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关系和影响，给社会名流和国民党政要写信，吁请他们为这项正义事业作出贡献。

早在 5 月 15 日，他给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张是校长）写信，称赞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说明中共主张“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希望张赞同，并“请一言为天下先”。同日，又给谌小岑写信，对他为国共合作奔走表示“益增兴感”，希望他“推动各方，共促事成”。并希望曾养甫或谌小岑来苏区共商大计。

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时子周，是周恩来的旧相识，周恩来写信向他说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愿先生广布斯旨于华北，求得抗日战线迅谋建立。”

8 月 31 日，他给曾养甫写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但是“弟等外出不易”，请曾养甫、陈立夫到苏区或陕西省华阴县会晤。

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还写信给国民党党政军的当权人物以至蒋介石，阐明我党的主张，指出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是蒋介石的亲信，又是国民党中枢的核心人物，当时前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后者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主任，且已受命与我党联系。周恩来两次给他们写信，在 9 月 1 日的信中尖锐指出：“近者寇入益深”，“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信中重申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诚意，希望他们敦劝蒋介石“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同时希望他们参加两党谈判。

当时胡宗南任国民党第一军军长，是蒋介石的嫡系，也是进攻陕北红军的主力。胡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和周恩来有师生之谊，他在江西苏区即积极参加“剿共”，并一直尾追中央红军到陕北、山西。周恩来写了一封既含讥讽又有规劝的信给胡宗南。信上说：“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最信赖之人，果能力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胡宗南长期“剿共”屡遭失败，已失掉信心，他曾对张学良说，“剿共”是“无期徒刑”。

9 月 22 日，周恩来给蒋介石写信，重申“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并向蒋忠告：“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

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他同时再写情给陈果夫、陈立夫，希望他们力促蒋介石“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24 日，潘汉年携带周恩来致蒋介石和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以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我党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保安，经西安去南京。

张子华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一直保持着联系。他 4 月离开瓦窑堡，5 月和 8 月又来往两次，传递国共双方关于谈判的意见。因曾养甫调到广州工作，张子华又奉党中央命于 9 月 20 日到达广州，和曾养甫会谈，表示中共的严正立场：（一）日寇进攻甚急，我方愿以全力为助，希望南京方面坚持立场，不作任何丧权让步。（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进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中抗日。（三）欲图和议谈判早日实现，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若一面进攻一面谈判是没有道理的。（四）在进攻未停止、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进行初步谈判，主要目的是实现第一步目标，订立停战协定。

在这次谈判中，国民党方面也提出了四条：（一）共产党公开活动；（二）苏维埃继续存在；（三）苏厄派代表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及待遇，但不变更原有人员。曾养甫又一次邀请周恩来到广州谈判，并给周准备了护照。

党中央表示可接受上述条件。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不再进攻红军，必须在行动上确是停止内战，准备抗日。为了以实际行动表示我方诚意，10 月 15 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军事委员会单方面发布停战令，红军一切部队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并派潘汉年再次去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谈判。

潘汉年于 11 月 10 日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会谈，面交了周恩来给二陈的信，并口头转达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八项条件。这时陈立夫的态度和曾养甫对张子华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陈立夫代表蒋介石答复：既然共产党愿开诚合作，那我就好提任何条件了。他说：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他并说，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潘汉年当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

旧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大概误会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陈立夫急忙转了话题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答应愿和周面谈。他要潘不要把蒋的条件向中央报告。潘汉年立即回答，如下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仅说蒋愿见周，岂不是骗他出来？暂时停战问题了解决，我想周是无法出来的。以后潘汉年和陈立夫又进行了两次谈判，他虽把保留的红军人数由三千改为三万，但根本立场没有改变。国共谈判又是阴霾四佈了。12 月 8 日，中央对潘汉年指示：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谈判显无速成之望。

红军只能扩充，不能减少一兵一卒。离开实行抗日救亡，无任何商量余地。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特别指出：“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不能做无原则让步。”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11 月 21 日，红军在山城堡取得了消灭胡宗南一个多旅的胜利，就是这一明确态度的具体表现。

由于蒋介石对国共和谈无诚意，而且亲自到西安布置对红军“进剿”，使潘汉年和陈立夫的谈判没有具体结果。周恩来 1945 年 4 月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总结这段历史时说：“国民党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

这次国共谈判虽然没有成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但是从 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到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仅仅一年的时间，由于中共中央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艰苦工作，从而争取了张学良及其东北军、杨虎城及其西北军，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势力的积极合作。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内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广大工农群众及青年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也日益增多地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民族资产阶级感到日本侵略的危险，也逐渐同情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国民党的谈判虽然没有得到具体的结果，但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建立了联系，促进了国民党内爱国力量的增长，为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在这一年里，周恩来和毛泽东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一起为制定方针政策，领导全党全军的工作日夜操劳，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付出大量心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在解决西安事变的日子里

## 蒋介石逼出的事变

自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和中共达成“停上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以后，三方面都积极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同时，采取各种方式“逼蒋抗日”。

可是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地贯彻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他虽然派代表同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仍然集中力量布置“剿共”，对张、杨和中共的关系则通过特务加紧侦察和破坏，对抗日救亡运动进行镇压，毫无抗战的实际行动。

12 月 4 日，蒋介石到达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唐明皇和杨贵妃玩乐、洗温泉浴的地方），加紧进行“剿共”布置。他调集“剿共”干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万耀煌、陈继承、陈调元等到西安“督战”。蒋的嫡系中央军陆续开入陕、甘两省，新购置的战斗机，也不断在西安机场降落。大规模内战的乌云笼罩在西安上空。蒋介石直接找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师长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蒋单独召见王以哲说，已知道他的电台与共产党通报。警告王要服从命令。

12 月 7 日，张学良、杨虎城已知道蒋介石准备了两个方案，让他们选择。第一方案是：服从他的命令，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北进攻红军。如果不执行他的命令，就实行第二方案：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陕、甘两省由中央军接管负责“剿共”。蒋介石已内定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

在这个紧急关头，张学良和杨虎城密商对付办法。他们都不愿意执行“剿共”命令，更不愿调到南方去被蒋介石分割、消灭。为了尽最后的努力，张学良决定对蒋介石再作一次诤谏。当天下午，张学良到华清池同蒋介石单独会谈，痛切陈词说，当今抗日是第一大事，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就能统一。又说，东北军将士的抗日情绪不可压制。他表示对蒋一贯忠诚，面临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不能不据理力争，希望委员长慎重考虑。两人争执很久，最后蒋介石对张大发火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回到西安把见蒋的情况告诉杨虎城，两人认为蒋介石是不会改变主意的，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对蒋实行“兵谏”，用武力逼迫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为了做到仁至义尽，张学良建议杨虎城再去劝蒋一次。8 日上午，杨虎城到华清他再次劝蒋，蒋仍不为所动。

蒋介石的顽固态度使张杨彻底失望，于是下了实行兵谏的决心，并立即秘密进行周密的准备工作。

12 月 9 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那天，在中共地方党和救国团体的领导下，西安一万多名大、中、小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召开了纪念大会。大会通过了《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宣言要求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

因得不到地方政府满意的答复，学生们决定去临潼向蒋介石当面请愿。蒋介石知道后，命令张学良制止，并说，如学生不服从，就“格杀勿论”。张学良立即赶到去临潼的路上对游行学生讲话，指出“前面不是坦途”，暗

示学生再前进可能发生流血事件。他诚恳又激动地对学生说：“请你们相信我，我张学良和你们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比你们的要求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负责转达到，我去讲可能比你们更有份量。我保证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学生们见张学良的态度十分诚恳，就同意不去临潼，回到了西安。

当天晚上，张学良向蒋介石当面反映学生的要求。蒋介石不但不接受，而且申斥张学良没有站在他的立场，却站在学生的立场。学生的爱国热情和蒋介石的顽固态度，更坚定了张学良对蒋实行兵谏的决心。

10 日，蒋介石在华清池秘密召开没有张学良、杨虎城参加的军事会议，同时，中央军万耀煌部已经陆续开到潼关，进驻到咸阳。11 日，蒋介石又召开军事会议，同陈诚、蒋鼎文、张学良、杨虎城等商议“剿共”计划，明令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并决定在 12 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

新的“剿共”战争即将爆发。东北军、十七路军或者即上前线打红军，或者被调往外地，再没有回旋余地了。

11 日夜晚，张学良、杨虎城最后决定于 12 日清晨举行兵谏。

1936 年 12 月 12 日晨 4 时，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临潼的骊山山洞里捉到蒋介石，带回西安城内新城大楼里。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扣押了往在西安城内高级宾馆西京招待所的陈诚（这位指挥过五次“剿共”战争的将军是藏在装啤酒的纸箱里被搜出来的）、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继承、陈调元、万耀煌等“剿共”干将和蒋作宾、蒋百里、张冲等高级官员。12 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各地和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电。指出，“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上日蹙，松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爱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通电并提出八项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在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携带电稿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在那里的南京军政要员宣读了通电，要求同意这个通电的人在电稿上签名。结果，朱绍良、马占山、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万耀煌等都签了名。不管他们是否真心同意这个通电，但至少说明他们不敢反对。

通电发出之后，张学良又分别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蒋夫人宋美龄。说明兵谏的目的，只要蒋介石接受抗日要求，将保证其安全。致孔电中说，“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致宋电中说：“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这两份电报，给孔祥熙和宋美龄吃了定心丸，也给他们提供了向主张武力讨代西安的亲日派何应钦斗争的根据。

张学良、杨虎城为争取各地方势力和国民党元老派的支持，分别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邓宝珊、李烈钧、阎锡山、宋哲元、傅作义等，说

明真相，征求意见。

当天零时，一切布置妥当后，张学良才告诉刘鼎电告中共中央：“我已发动捉蒋，请予支持。”晨五时，张学良又致电毛泽东：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接着，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

## 肩负重托赴西安

12 日凌晨，保安军委机要科接连收到刘鼎从西安发来的几个十万火急电报，说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和陈诚等一批高级军官。译电员朱志良立即叫醒机要科长叶子龙，叶即将来电送给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我们同住在一个窑洞里，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的说，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屠杀了多少革命同志，又“剿共”10 年，这个血债累累的“蒋该死”，这回真该死了；有的说，押到保安来公审；有的说，赶快枪毙，别让他跑了，……。叶子龙送报回来，看到大家争论不休，高声说，“你们争什么，一切都听中央和主席的。”大家笑着钻进被窝里。我和大家一样，兴奋得再也睡不着。叶子龙又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三局和西安联络的电台，要加强力量，日夜值班；电报要随译随送。

电报又来了，张、杨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

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他两人二日才到保安的）等中央领导同志整日都在毛泽东的石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军委致红军各军团电报，告以蒋介石已在西安被张、杨扣留，各军加紧准备，待命行动。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张学良电，建议以可靠部队守卫蒋介石，以防意外；应全力团结好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红军即南下向东北军、十六路军靠拢，以应付各种事变。周恩来又起草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杨虎城复电，“恩来拟到西安面商大计。”

13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发言说，根据情况的变化，有可能逼迫蒋介石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周恩来发言中，分析了南京政府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提出要努力争取冯玉祥及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孤立何应钦等亲日派。我们党应准备走上政治舞台，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运动，同时要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张闻天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他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会议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去西安工作，电告张学良派飞机到肤施来接，并派李克农、罗瑞卿和杜理卿（许建国）等分批去西安工作。

中央连续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西安事变的真象和我党采取和平解决、逼蒋抗日的方针。同时打电报给北方局胡服（刘少奇）、上海分局允生（冯雪峰）、潘汉年和西安等地党组织，指示他们宣传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动员各界响应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

14 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表示坚决赞助他们领导的革命事变，建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

有人说，中共中央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的，这不符合事实。西安事变后，中央即把情况电告共产国际书记处。13 日政治局会议后，又把新的情况和我党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逼蒋抗日的方针电告共产国际。16 日，共产国际发来电报，因电码错乱无法译出，中央要求重发。20 日，中央收到共产国际重发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复电。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中共中央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中央的方

针是在国际来电之前就定了的。周恩来 17 日到西安时，并不知道国际有电报，他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先后同张学良、杨虎城谈话，三方就一致同意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了。

这件史实是应澄清的。

我本来体质就弱，一到北方，又不习惯寒冷的天气，吃小米和野菜，营养不足，常患肠胃病。几个龋齿，经常发病，一痛起来苦不堪言，喝凉水、开水都受不了。中央到保安以后，同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已开始派干部到西安、上海工作。我多次考虑向领导提出到西安或上海工作，以便把牙补起来，可是总没有勇气提出，怕不批准，更怕受批评。曾有一次向李克农提出这个要求，但当时没有机会。

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去西安，并配备译电员、报务员。我知道这个消息，立即向叶子龙提出，我去当译电员，一边工作一边补牙和治病。他同意了，要我当面报告周副主席。我没有同周副主席单独谈过话，第一次去就提个人的工作问题，因而顾虑重重。但这是难得的机会，我便鼓起十二分的勇气，利用送电报的机会来到周副主席办公室。交了电报后我羞羞答答地对他说：“报告周副主席，我的牙齿全坏了，吃饭就痛……。”他看到我有话要说，就要我坐下来好好地说。我把要求提出来了。他很和气地回答：“这没有问题，西安刘鼎那里有报务员和译电员，但我们去了电报多，不够用，准备要曾三去搞报务，你就去译电好了，我知道你在机要科中文化高一点，你去正合适，一边工作，一边补牙，有别的病也可以治。”我顿时感到浑身温暖，立即表示：“我一定负责把工作做好。”他要我叫叶子龙科长来，我高兴极了，飞也似地跑去告诉叶子龙。周副主席对叶子龙说：“我们去后电报一定会很多，要多带几套密码去，特别要注意保密。童小鹏随我们去西安做译电工作。这次坐飞机不能多带人，还要准备再派人去。”他说完我们立即回去做准备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和周副主席谈话，感到他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从这个时候起，我便一直跟随周副主席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有幸在他的亲切教导下成长，也亲眼看到他经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中立下丰功伟绩。

14 日清晨，周恩来率罗瑞卿、杜理卿、张子华、吴德峰、曾三、童小鹏、龙飞虎、陈有才、杨家保、邱南章等连警卫战士共 18 人，每人骑一匹马，就像一支骑兵支队那样，在寒风中离开保安城，向肤施方向前进。保安到肤施 170 多华里，因沟深路窄，天寒地冻，马蹄打滑，不能走快，当天只走了 80 里，在安塞西边一个小村子的窑洞里宿营。我在长征中都是靠两条腿走的，今天破天荒第一次骑了一天马，虽然没有摔下来，但很紧张，在马上颠簸一天，下马时腰酸腿痛，比走路还要累，吃完晚饭就倒下去睡觉了。

15 日清早起来，早饭后继续南进。下午 5 时，我们来到肤施城北门外蓝家坪。这里有一支红军部队，负责人黄春圃（即江华）向周恩来汇报说，肤施城里还有国民党的县长和民团驻守，不让红军进城。据说，今天中午从西安来了一架飞机，降落在东郊机场，是来接中共代表团的，因为没有看到代表团的人，又飞回西安去了。这样我们就在这里住下了。

既然飞机已回西安，很难估计什么时候会再来，周恩来当晚就决定第二天绕过肤施城到甘泉去，因为那里有东北军，可以从那里坐汽车到西安去。16 日早饭后，我们即从蓝家坪向西翻山绕过肤施城，翻了几条沟，到杜甫川，已是中午了，我们准备继续沿公路向甘泉走。这时忽然听到飞机的声音。周

恩来说，这一定是张学良的飞机又来接我们了。不久，飞机就降落了。周恩来同张子华商量，要他以“南京派来的谈判代表”身份，同邱南章一起，拿着周恩来写的字条进城去找县长，说明飞机是西安张学良副司令派来接中共代表团的，要求让我们经过南门外绕到东门过延河到飞机场去。经过交涉，县长高仲谦表示同意。不久我们就顺利涉过延水河赶到了东郊机场。张学良的专机已停在那里了。王春圃也带了队伍到机场警卫、送行。有的文章说我们到西安是 17 日，我和王春圃等同志回忆，是 16 日而不是 17 日。

乘这架飞机来接代表团的刘鼎，一下飞机就以张学良的秘书身份到城里给县长打了招呼，县长辽陪刘鼎到机场欢送，周恩来表示感谢。刘鼎向周恩来汇报说，昨天飞机来了一次，没接到又飞回西安去了，张学良将军要我们今天再来接。周恩来对张将军的好意表示感谢，并同美籍驾驶员握手致谢。接着就问驾驶员这架飞机能坐几个人。驾驶员说，除了他们两个驾驶员和刘鼎外，还能坐七个人，一共可以搭乘十个人。周恩来一盘算，根据工作的需要，只去七人不行，问驾驶员是否可以多坐两人？驾驶员说，从载重来说是可以的，但是都坐在机舱内就不能保持平衡，他说有个办法，机头的行李舱是空的，可以躺两个人，这样飞机就平衡了，我们只得同意。谁躺在行李舱里呢？正踌躇间，警卫人员尤飞虎和杨家保自告奋勇地要去行李舱内。周恩来同意，驾驶员就把“飞机鼻子”的盖子揭开，龙飞虎和杨家保就钻进去躺下来，驾驶员又把盖子盖好。周恩来指定罗瑞卿、杜理卿、张子华、童小鹏、邱南章、陈有才随他登机。还有吴德峰、曾三等几人，留下来等飞机来接博古、叶剑英时再去。飞机起飞时，已是下午 4 时了，天正下着雪。

一上飞机，周恩来就要刘鼎汇报西安几天来的情况。刘鼎说：张学良这次扣留蒋介石的动机，是逼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他交代执行捉蒋的官员时说，要捉活的，保证其安全，促其反省，如他答应抗日，还要拥护他。周恩来对此情况很重视。他对刘鼎说，西安事变只扣留了蒋介石，并没有打垮他的军事力量，所以蒋介石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要逼蒋走抗日道路，不要爆发内战。周恩来又问了许多问题，从事变的经过到各方面的反应，从张学良到东北军、杨虎城到十七路军的思想动向以及蒋介石的态度，都一一问到了，刘鼎作了详细报告。我们抵达西安东郊机场，已是黄昏了。龙飞虎、杨家保从“飞机鼻子”里爬出来，龙飞虎诙谐地说：“这次可开了洋荤，在黑洞里糊里糊涂地坐了一次飞机。”大家都相对而笑。

进了西安城，刘鼎把我们安置在七贤庄一号休息。这里是刘鼎布置的秘密联络机关。

周恩来一直是蓄着胡须的，从保安出发时来不及刮脸就匆匆上路了。来到西安，要接触各方面人士，留着长须不便，他下决心把它剃掉。而七贤庄却找不出一把剪子和剃刀，刘鼎忽然想起安装电台的涂作潮家里有，便陪着他坐车到涂家去，才把胡须剃掉。

张学良急于同周恩来见面。刘鼎根据张学良的安排，把周恩来和我们带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这里有三座楼房，西楼和中楼是张学良的起居处和会客室。我们住在东楼，周恩来住在三楼，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住二楼，电台早已设在底层。安顿下来后，张学良在中楼设宴招待周恩来和随行人员。周恩来由刘鼎陪同先到中楼会见张学良。八个月前，周恩来同张学良在肤施第一次见面，进行过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谈。当时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的

问题逐一作了具体的答复，张学良对他的精辟的论述，科学的分析，高度的政治修养和政治家的风度是十分敬佩的，所以这次重逢格外高兴。张学良看到周恩来没有胡须，比在肤施见面时年轻了，就惊奇地问：“哟，你的美髯呢？”周恩来答道：“刚刚剃掉了。”张表示惋惜。接着我们随行人员也都高兴地入席了。张学良首先举杯欢迎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周恩来举杯祝贺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兵谏的成功，并转达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对张将军的问候。随行人员中，除张子华、罗瑞卿、杜理卿有社会经验外，我们都是土里土气的“红小鬼”，今天居然成了“剿匪”副总司令的座上客，不免感到紧张，手脚都无所措，只得照着他们的动作喝酒、夹菜。张学良还笑着给我们敬酒，劝我们吃菜，像老朋友一样看待我们，我们感到很高兴，宴会后，大家回到东楼休息。刘鼎立即向中央发了代表团到达西安的消息。我一边休息，一边准备密码等待周恩来向中央发电，并通知报务员彭绍坤每小时都要同保安中央的电台呼叫一次。

宴会后，周恩来即同张学良单独长谈，开始负起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重任。张学良对周恩来说，蒋介石被扣后，起先拒绝商谈一切问题，现在已允许谈抗日问题了。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作抗日领袖。周恩来赞同张学良对蒋的方针，并就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发表意见。他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他的实力依然存在，西安与南京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团结抗日，一是蒋介石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予以处置。但这样将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亡华制造便利条件。应该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也就是采取说服蒋介石的方针，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我党中央的态度和张学良的方针原则上是一致的。

午夜 12 时，周恩来拿给我致“毛并中央”的第一份电报，报告了和张学良会谈的结果，我立即译好文电台发出，报告周恩来后就回去睡觉，而他仍在思索明天见杨虎城的问题。

17 日上午，周恩来到止园杨公馆拜会杨虎城，讲了他与张学良商谈的情况和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这使杨虎城大出意料之外，他原以为中共和蒋介石有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不会同意放蒋。想不到中共着眼大局，不计前嫌。由于张学良、周恩来意见一致，杨虎城对周恩来的话没有表示异议。但他很担心蒋介石阴险毒辣，被释放后，会翻脸报复。周恩来对杨虎城的顾虑表示理解，但他认为只要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团结一致，蒋介石想报复也报复不成。

## “三位一体”力挽狂澜

“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以及他的“剿匪”干将陈诚等抓起来，这当然是震动世界的大事件。

受震撼最大的首先是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突然群龙无首，陷于一片混乱之中。而反应最快的是亲日派何应钦。他既不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又不是军事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只是一个军政部长，得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利用宋子文还在日本，孔祥熙、宋美龄在上海之机，即于12日下午3时在公馆里召集党政军首脑“谈话会”，制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舆论。国民党老右派戴季陶、居正等，以张学良“劫持统帅”、“犯上作乱”为由，主张立即出兵讨伐，并提出由何应钦主管军事的意见。尽管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主张先弄清情况，说服张、杨，放蒋回京，但主战派还是占了上风。何应钦即在公馆内成立临时办公处，筹划以大军进攻西安，企图发动大规模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由他取而代之。16日，国民党中常委又决定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指挥，分别向西安进逼。

南京主战派，一方面利用《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等舆论工具，宣传“张学良犯上作乱”，动员胡适等人骂“张学良叛国”，用以制造反动舆论；另一方面又封锁西安消息，干扰西安广播电台，扣发外国记者报道张、杨的《八项主张》和西安事变真相的消息。还制造“红军占领西安，洗劫全城”，“蒋介石生命危殆”等谣言蛊惑民心。

日本帝国主义十分关注西安事变后的中国形势，连日开会研究对策。他们对何应钦进军西安表示支持。日本外相有田还公开表示：“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条件下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分露骨地希望中国打内战，以便坐得渔人之利。他们还制造谣言，说西安事变是受苏联指使的，明目张胆地给亲日派何应钦撑腰。

为了表明西安事变的动机和目的，揭露何应钦等制造的谣言，张学良、杨虎城除公布八项政治主张以外，并多次发表公开讲话，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明他们兵谏的目的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在对“剿总”的职员讲话中说：“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张学良又直接给英美派孔祥熙、宋美龄发电报，说明对蒋只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争取他们采取和平解决办法。对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刘湘等地方势力，也分别发电说明事变动机和目的，以争取同情。

在军事上，针对何应钦的“讨伐”，张学良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措施。14日，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另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主任。设参谋团，研究军事方面重大问题，东北军、十七路军主力向西安方面集中，布置东西防线，准备阻击由东（主要方面）和由西向西安进攻的中央军。在陕北，延安、甘泉等地交红军接防，并请红军向南推进，以备配合作战。又成立设计委员会，研究政治措施和宣传问题。

以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为代表的英美派，由于和亲日派政治背景不

同，特别是和蒋介石是亲属关系，首先关心的是蒋介石的安全问题。他们看出何应钦包藏祸心，“戏中有戏”。又得悉张学良、杨虎城并无伤害蒋介石的企图后，就坚决反对对西安用兵，主张用和平办法解决，首先营救蒋介石出来。他们想立即飞西安同张、杨面商放蒋问题，但都被何应钦阻止。宋美龄就请蒋介石的顾问端纳（英籍澳大利亚人）飞西安了解情况，张学良表示欢迎。

根据端纳在西安了解的情况，宋子文也到了西安。

宋子文和张学良见面，张即向他表示西安三方面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周恩来抓住时机，通过随同宋子文来陕的郭增恺说服宋子文和他面谈，否则也要把中共的方针转告他，即：这次事变中共未曾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这是中共团结抗日方针的继续。望宋认情形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郭增恺向宋子文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宋大感意外，对中共的方针十分赞赏。他回南京后，到处宣扬蒋介石很安全，并赞扬周恩来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委员长，相反，还有人要轰炸。”这一来又煞了一下主战派何应钦的气焰。

21 日，孔祥熙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同意宋美龄、宋子文去西安谈判。途经洛阳时，宋美龄告诫各将领，不要进攻西安，飞机也不要飞近西安。她深感一旦内战爆发，不仅使日本乘机大举入侵，也将威胁蒋介石的安全。22 日她飞抵西安，立即会见张学良，要求尽速送蒋介石回南京。

二宋到西安，为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23、24 日，周恩来两次会见宋美龄，第一次还进行了长谈。周恩来首先说明中共没有参加兵谏，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接着，他讲了中国革命历程的艰难曲折，指出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希望团结抗日，1935 年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又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对团结抗日要求始终置之不理，当前是改变政策的好机会，希望他们兄妹劝蒋先生。宋美龄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第二次谈话，宋美龄对和平解决事变显得更有信心了。她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以政治方式解决内政问题，不要擅用武力。

来美龄、宋子文终于使蒋介石同意西安方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决定由他们兄妹两人出面谈判。宋子文与西安三方面商定谈判程序，西安方面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基础，宋子文表示同意，并说，由他们兄妹作代表，商定的条款不签书面协议，以蒋介石的“领袖人格”作担保。西安方面觉得只要大的原则达成协议，不签书面协议也可以。

当时在西安，不少人把张、杨联合红军抗日的局面称为“三位一体”。所谓“三位一体”其实质就是以共产党和红军为政治领导，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现在要以这个“三位一体”为一方，南京的二宋为另一方，进行谈判。这次谈判的成败，是关系到是否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问题，双方都非常重视。23 日上午，正式谈判开始，地点在张学良公馆中楼二层，蒋方由宋子文代表，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我们住在东楼，只看见这大张公馆戒备森严，有点神秘气氛。有几部汽车进来，似有重要人物在这里开会。事后才知道，谈判一开始，先由周恩来发言，他谈了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一、停止内战，南京方面撤军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以上六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和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张、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并主张以它作为谈判基础。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并答应转达蒋介石。

在下午的谈判中，宋子文先提出组织过渡政府、撤军等问题，张、杨、周提议在过渡政府时期先成立西北联军，由张领导进行抗日，宋答复此事可向蒋转达。

24 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除头天参加的人以外，蒋方增加了宋美龄。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并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都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动用武力。”她和宋子文对谈及的一些问题都明确地承诺。周恩来对谈判取得这样的结果是很满意的。

24 日上午谈判基本上结束，下午张、杨处理内部问题，委托周恩来继续与两宋接触。在周、宋的会晤中，宋子文要求中共作他抗日和反亲日派的后盾，并派专人去上海与他保持经常的秘密接洽。周恩来要求和蒋介石见面，经宋子文转达，约定当晚在蒋的住处会面。

当天晚上，周恩来由宋氏兄妹引导，到高桂滋公馆会见蒋介石。宋子文说，蒋委员长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谈话。周一进蒋住室，看见蒋躺在床上。蒋见周进来，勉强欠身而起，请周坐下。周见到蒋面容衰老憔悴，满嘴没牙（上下都是假牙，在华清他逃跑时来不及带丢失了），难看得很，远非当年在黄埔军校的样子。周先向蒋说：“蒋先生，我们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了。”蒋点点头，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抓住话题针锋相对地说：“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

这时宋美龄说：“以后不要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西安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周恩来具体地说明中共当前的方针：一、为抗日救国，共产党坚持联合国内一切党派军队共同奋斗，组成民族统一战线，互相尊重信任，以谋共同发展；二、共产党目前决无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图，它目前的政治目标是对外实行抗日，对内争取民主共和制度；三、红军在南京中央政府抗日时愿意服从统一指挥，但必须保持其独立系统，不得由中央政府任意改编或变更指挥人员；四、抗战发生时红军可改变名称，在全国民主共和制确立之后，苏维埃可取消，实行全国一样的民主制度，但共产党的组织及信仰不能改变。

蒋介石作了三点表示：一、今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说完这三点，蒋介石表现出疲劳的样子，对宋氏兄妹说：“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谈。”周恩来说：“蒋先生休息吧，今后我们有机会再谈。”蒋连声说，好！好！周恩来就告辞了。

周恩来回到张公馆，立即把谈判及与蒋介石会见的情况给中央作了详细报告。这些电报稿交给我时，我看后也觉得谈判取得巨大成功，心里很高兴，十分敬佩周副主席的精明干练。

这时西安发生了放蒋与扣蒋的激烈争论。

宋子文坚决请求西安方面信任他，表示他愿意负责去进行谈判商定的各项内容，要求让蒋介石、宋美龄在 25 日离开西安回南京。宋美龄也要求在圣诞节离开，“取个吉利”。张学良表示同意，并愿亲自送蒋走。周恩来同意这些条件，只是认为走以前还须有一个政治文件来表示，并不赞成蒋在 25 日就走和由张学良亲自送去。

原来在事变发动的当天，根据张学良的指示，成立了一个机构叫“设计委员会”，成员有高崇民、杜斌丞、申伯纯、应德田、王炳南、王菊人等，也就是“三应一体”的三方面都有人参加，以高崇民为召集人，它是事变的政治设计机构，研究张、杨交办的问题，对张、杨负责，同时也可以向张、杨提出建议，类似参议班子。事变以后，它作了不少工作，如撤销“西北剿总”，起草通电，改组陕西省政府，它的许多建议为张、杨所采纳。23 日下午，设计委员会的成员们风闻谈判很快就要结束，蒋介石也将在几天之内就要释放，于是由高崇民主持马上开会。一开始，空气就很紧张。许多人提出，如果没有具体保证，只凭空口说白活就把蒋介石放走，万一以后他不认帐怎么办？有人主张南京军队必须撤出潼关以东，解除我们的军事威胁后，才能放蒋。有人建议由阎锡山作保证人。个别激烈分子愤慨地说：“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只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心里，不听我们的话，干脆先把他干掉。”会议没有作出什么决定，大家意见由高崇民去向张、杨汇报。

张学良非常着急，生怕闹出大乱子来。杨虎城心情沉重，默不作声。周恩来很重视这些情况，赶紧找张学良，建议明天找这些人开个会，好好向他们进行说服解释工作。

24 日下午 2 时，张学良在金家巷公馆他的办公大楼一间小客厅里，召集前一天参加设计委员会会议的人谈话。首先他介绍几天来和宋氏兄妹谈判的经过和内容，透露蒋介石很快就要走，他自己打算亲自送蒋到南京。他很严肃地说：“你们有意见可以向我提，但是我现在要警告你们，不许在外边胡说，更不许胡闹，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做了错事，我们担当不起。”这时大家都默不作声，面面相觑。很久才有人提出：“副司令说的蒋介石答应我们的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他们不认帐怎么办？”张学良很诚恳又很自信地说：“蒋现在关在我们这里，他说什么话，何应钦都不见得肯听，他的命令无效果”，“被迫作出保证，不是心甘情愿的，一定心存报复，那时候怎么办？所以你们那些主意都是行不通的。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要他原则上承认了，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都没有什么关系。”接着他又说：“要阎锡山作保证人，更是不可能。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这次事变我们打电报给阎锡山，他回电只是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这样的人我们不能让他投机取巧占便宜。”

有人问：“副司令要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这是什么意思？”张学良很郑重地回答：“这次事变对蒋介石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走他，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和他共事，所以现在不能再为难他，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

高崇民对张学良的谈话是不同意的，但不好当面争辩，当天晚上写信给张学良，反复说明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更严重的事情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也连夜联名写信给宋子文，提出：“商定的问题必须有人签字，

并须首先将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才能让蒋走，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宋子文看了这封信，大吃一惊，赶紧送给蒋介石、宋美龄，蒋、宋一看，吓得不得了，马上要宋子文找张学良想办法，并要宋子文亲自去找杨虎城恳求早放蒋走。宋马上去找张、杨，保证蒋走后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

张学良以为自己和蒋介石私交根深，对蒋的阴险估计不足。这时他很担心夜长梦多，闹出乱子，觉得不如把蒋早点送走，免生意外。

25 日下午 3 点多钟，张学良拉杨虎城陪着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等悄悄离开住地，乘车直奔机场。因为怕他们的部下知道会发生意外，行动非常秘密，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到了机场，他们看到机场上一二千学生和群众队伍，这些人是来等候欢迎绥远抗日的傅作义的，可是蒋介石不知道，以为是来对付他的，很怕被留难走不了，慌忙地对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再重复一遍：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 25 日起调出潼关，从本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我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五、释放上海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二将军负其全责。蒋介石重申六项诺言以后，即登上飞机。张学良表示愿陪蒋介石回南京，他在飞机旁边写了一个手令，大意是，余去南京期间，东北军归于学忠统率，听从杨虎城副主任委员指挥。张学良也乘上自己的飞机起飞了。这时己是下午 4 时了。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住地，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才得到卫士们的报告，说副司令和杨主任也同蒋介石到飞机场去了。孙连忙报告周恩来，周大为惊愕，立即和孙乘车赶往机场，想劝阻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去南京，可是为时已晚，飞机己腾空而起。周恩来叹息地对人说：“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他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 风云突变　砥柱中流

蒋介飞抵洛阳后，就对张学良颐指气使了。他首先逼令张学良打电报给杨虎城，释放在西安的陈诚、卫立煌等。杨虎城不愿给张学良造成困难，说：“做人情做到家，他叫放就放吧！”当天晚上，杨虎城在新城大楼为陈诚等人饯行，第二天就放他们回南京了。

这时东北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越来越明显，一些少壮派军官认为，扣留这些蒋方大员是张学良回来的保证，释放回去蒋如果扣留张学良，东北军就无所恃了。他们情绪非常激昂。

事态的发展果然是这样。26 日下午，蒋介石的座机到南京机场，国民党大员蜂拥前来迎接。随后张学良的飞机降落，机场上只有一批军统特务在四周警戒，张遂即失去自由。蒋介石背信弃义，竟组织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旋又假惺惺地要南京国民政府将张“特赦释放”，“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遭到长达数十年的软禁。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杨虎城、于学忠二人撤职留任，并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调集五路大军共 37 个师向西安推进，企图压迫西安方面屈服。

这个突然的变化，使西安方面难于对付。一味示弱是不行的，必须在政治上表明严正的态度，在军事上作出有力的部署。连日来，周恩来经常彻夜不眠，和后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博古、叶剑英等研究对策，冷静地处理面临的复杂问题。他同杨虎城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协商，由杨虎城领衔于 1937 年 1 月 5 日发出措词强硬的电报，抗议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和准备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他还在报中共中央批准后，电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开进关中。9、10 两日，红一军团到达耀具、三原，红十五军团到达咸阳，10 日，红二十六军也到达洛川。周恩来在几天内将南进部队急需的弹药、给养和器材迅速补充完毕，并到咸阳看望红军部队，讲述西安事变的意义，鼓舞士气。红军开入关中，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感动。

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仍是继续逼使蒋介石实践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主张和平解决。1 月 10 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说明“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11 日，他又写信给蒋介石，严正指出：“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要求蒋介石撤退进入陕甘的中央军，释放张学良回西北主持军政，这样才能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否则，“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将为亲者所痛而仇者所快。

当时外有大军压境，内有和战之争，杨虎城的处境十分困难。西安主要军事力量是东北军，张学良送蒋走时，要于学忠领导东北军，并听命于杨虎城的指挥。而于学忠在东北军中不是嫡系，领导不了这支部队，杨虎城更是指挥不了。东北军实际上已是群尤无首，所谓元老派、少壮派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十七路军将领中，有的公开叛变，有的态度模棱两可，杨虎城也难于掌握。这时他深感只有张学良回来，才能维系“三位一体”，处理复杂局面。

西安方面的困难，南京了如指掌，它加紧对西安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分化。1 月 13 日，蒋介石派人到西安，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仍返陕北，陕西省政府主席委十七路军的人充任。即所谓甲案。二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移驻安徽

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安徽省主席可委东北军的人充任，甘肃省主席可委十七路军的人充任。即所谓乙案。不论那个方案，对西安都是不利的。权衡之后，接受甲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仍靠拢在一起，“三位一体”不致解体；接受乙案，东北军可移驻较富庶的地区，但“三位一体”自然解体。蒋介石写信给杨虎城，劝他接受甲案；而何应钦又给王以哲、何柱国（均东北军军长）写信，要他们接受乙案。十七路军主张接受甲案，东北军高级将领公开表示接受甲案，暗中却想接受乙案。东北军少壮派则主张先救张学良，其他一概不谈，这样使得西安的内部矛盾更为尖锐。

对于友军的内部问题，共产党不便干预，只能给予建议。1 月 15 日，杨虎城向周恩来表示，如果真的打起来，他没有把握取得胜利。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分析当前的局势，向杨提出三点建议：一、为求得和平解决，须先由杨、于通电就职；二、由他们派人去奉化见蒋介石，对乙案坚决拒绝，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中央军须全部退出甘肃，在西安得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一部，东北军可伸至咸阳；三、主要是军事上三单位靠扰，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来解决问题。杨虎城两次派代表去和蒋介石谈判，都无结果而回。

张学良迟迟不能回来，东北军少壮派加紧活动。他们大都是团营级军官，掌握实权，对张学良怀有深厚的感情，对蒋介石更加痛恨，于是发动签名运动，要求营救张学良，即使与中央军开战也在所不惜。他们不满元老派的和平主张，甚至以为他们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十分气愤。主和的人竟至不敢公开讲话。杨虎城对打仗没有把握，但担心蒋介石报复，也希望张学良回来，因而倾向于少壮派。一时主战的少壮派占了上风。

这时周恩来觉得战端一开，有违西安事变的初衷，也不利于争取张学良回来。面临这个复杂形势，他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着重做少壮派的工作。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看到当时紧张复杂的情况，无不忧心忡忡。1 月 27 日晚上，周恩来邀请少壮派的主要人物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到代表团驻地张公馆东楼会客厅谈话。从客厅里不断传来慷慨激昂的声音，原来少壮派坚持要张学良回来才能撤兵。周恩来耐心地进行说服，指出这样做有可能引起战争。我们现在退兵，“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仍然可以要求张将军回来。少壮派仍不同意。应德田首先陈述他们的意见，大意是：张学良是东北军的中心，他不回来，团体无人领导，必致瓦解；张学良不回来，“三位一体”的局面无法维持，联共抗日的主张也无法实现。张不回来，决不撤兵，蒋军如再进逼，不惜破釜沉舟地打一仗，请红军全力帮助，打垮蒋军的进攻。周恩来听后又耐心地解释道：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是现在我们要坚持要求放回副司令，蒋介石一定不放回，相持之下，很容易发生战争，这对副司令回来的问题更没有好处。很明显，战争打起来，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我们现在退兵，“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副司令一定会回来的。你们应当知道，打起仗来，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副司令前途，都没有好处。我们共产党与蒋介石血海深仇，永远不会忘记，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也永远不会忘记。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

周恩来刚说完，苗剑秋（苗有个绰号叫“苗疯子”）就大哭大闹，乱说

了一阵疯活，什么“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红军开到关中来干什么？”“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就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甚至说出，“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等等。孙铭九也痛哭流涕地向周恩来请求红军出兵，这样一直闹到下半夜。为了摆脱这个僵局，周恩来只好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明天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没过几个钟头，南汉宸也到张公馆来，报告杨虎城找他谈话的情况。南说：凌晨三时，杨把他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南汉宸认为杨虎城这番话，不是对他个人讲的，而是通过他对共产党代表讲的。周恩来觉得事态严重。对南汉宸说：“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开会，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南汉宸又向周恩来报告，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主和派和共产党员。

少壮派的活动更为激烈。在他们的提议下，1 月 29 日，东北军在渭南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四十余人举行军事会议。王以哲因病没有参加，由董英斌代他主持。何柱国发言坚持主和。他认为中央军实力强大，我们打不了，假如打起来，不但张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前途也危险了。何讲完，应德田起来讲话，坚决反对和平解决。他认为蒋介石是在虚张声势，真正打起来他是不敢的。我们愈软，他就愈硬，我们一硬，他就会软下来。只有这样，副司令才有可能回来，我们要做好打仗的准备。为了营救副司令，不惜坚决打一仗。这时会场议论纷纷，空气极度紧张。与会军官在愤激的情绪下，都赞成应德田的主张，反对何柱国的主张。会议当即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回来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这个决议由到会四十多个军官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渭南会议是少壮派鼓动起来的，对渭南会议决议不愿执行。但他们和少壮派已经闹翻，无法说服他们。于是 1 月 30 日派飞机夫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因为他是张学良指定的东北军最高负责人，应由他来作最后决定。于学忠来到西安，两方面都向他申述理由，使他左右为难，但他还是主和的。

1 月 30 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乘汽车到三原云阳镇红军前敌司令部开会。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都参加了会议。大家认为，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但如南京继续进攻，我方要自卫。而我们的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和杨虎城等。与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能否成功，尚是未知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而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且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就会导致敌对情势，这是颇难两全的困难局面。如果拒绝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要求，这两个朋友失掉，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就更加渺茫。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会议作出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支持他们的主张，和他们一起打，在打的过程仍同南京谈判和平。会后，立即从

总部发电报告中央。周恩来、叶剑英当天赶回西安，根据上述的决定，分别告诉杨虎城和少壮派，并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叶剑英并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参谋人员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当日，收到毛泽东、朱德、张国焘从延安回电：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应当同进退；向张、杨表示我们不能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事机紧迫，2 月 1 日晚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个人代表三方面在王以哲家中开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应德田也参加了。会议开始时出现长时间的沉默。杨虎城请周恩来先讲，周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面的意见为意见，还是你们先讲。”杨虎城只好要于学忠讲。于学忠嚅嗫了一阵，才说：“我个人意见，还是应该和平解决。打仗不能把张副司令打回来，打起来他们恐怕更害怕张副司令了。”他分析军事形势说：“我们只顾招架东边的中央军，而西边胡宗南的部队已经到了宝鸡，正向凤翔推进，而我们西边还没有一点布置。加上内部有两个师不稳的消息，这在军事上已成内外夹攻、腹背受敌之势，要打也不能打。因此，我的意见还应和平解决。”王以哲、何柱国都同意于学忠的看法。杨虎城看到东北军主要将领意见一致，就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方面既然是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基本上是甲案）和平解决吧！”杨虎城最后问周恩来的意见。周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为了团结，只要你们双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原来的主张，参加作战。现在你们双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他又提出请双方注意内部的团结，防止少数人进行分裂活动。杨虎城、于学忠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少壮派原来以为这次会议会作出打仗的决定，会议的结果大出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甚为气愤。应德田、孙铭九等认为王以哲、何柱国在会议上没有反映主战派的要求，背叛“渭南会议”，就是“出卖张副司令”，“出卖东北军”，要“拼一死战”，“要除奸”，等等，气焰十分嚣张。

## 挺身而出拯救危局

最高军事会议之后，杨虎城派代表到潼关和顾祝同谈判，准备接受南京的条件，和平解决。少壮派极为气愤，以为是王以哲、何柱国坚持主和的结果。他们一方面策划屠杀主和派，主要对象是王以哲、何柱国；另一方面，准备派武装人员截留杨虎城派去潼关的代表，又包围于学忠，要他营救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作战。西安已被恐怖气氛所笼罩。

2 月 1 日晚上，应德田、孙铭九、何镜华等主战军官就酝酿杀王以哲、何柱国的事。

2 月 2 日一早，东北军一批主战军官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何镜华等十几个人，到孙铭九家里开会，应德田和大家商定即刻派人将王以哲、何柱国两个主和的军长枪杀，要孙铭九派卫队营的人去执行。孙铭九派卫队营连长于文俊带 20 个卫士去杀王以哲。于文俊手持驳壳枪，闯进王的住宅，进入卧室，对王以哲说：“ 军长，对不起你了 ”，随即连发几枪，王以哲就死于血泊之中。当天，他们还杀了原王以哲的副官宋学礼等几人。制造了“ 二二事件 ”。

孙铭九同时又派卫队营营副商同昌带人去杀何柱国，这时何已有所风闻，躲到杨虎城新城公馆的客厅不出来，孙铭九又带人找到杨公馆，由于杨虎城的保护，他们杀何柱国的企图没有得逞。事后，何柱国给杨虎城送了一个银盾，上面刻有“ 再生之德 ”四字，以表示对杨的感谢。

这天上午，我正到大街上买东西，回到金家巷路口，看到警卫森严，架设了铁丝网、路障和轻机枪，几个警卫营士兵持枪守卫，气氛很紧张，不知发生什么事情。我往张公馆走，卫兵把我拦住，问我那里的？我说是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才放我过去。张学良公馆也加了哨兵，围墙上架了轻机枪。同志们正在议论纷纷，神情黯然。这时我才知道是少壮派杀了王以哲。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异常气愤，立即要李克农和刘鼎追查是什么人干的。

孙铭九等杀了王以哲后，杨虎城也很不满，立即在新城和街道加强警戒。弄得人心惶惶。有人指责应德田、孙铭九不该这样乱来。当苗剑秋把周恩来生气的消息告诉孙铭九时，孙铭九知道他们犯了错误，就同苗剑秋去张公馆东楼向周恩来承认错误，并跪下请罪。周恩来要孙铭九站起来后，很严肃地责问孙：杀王以哲是谁搞的？孙说，是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等。我做错了，请宽恕！周恩来气愤地说，“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正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 ”在周恩来的严厉斥责下，孙铭九、苗剑秋都低头认罪。周恩来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要他们回去找应德田等商量怎样处理善后。

这时周恩来心急如焚。为了表示对最早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对建立红军和东北军亲密合作关系作出贡献的王以哲的悼念，为了抗议少壮派的错误行为，他不顾安危，带 着李克农和刘鼎，赶到王以哲家中吊唁。这时王家正乱成一团，周恩来慰问家属，使王的家属和在场的人深受感动。当时西安谣诼纷坛，有人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指使行动的。周恩来以实际行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解，使东北军官兵进一步认识周恩来关心东北军团结，反对分裂行动的明确立场。

周恩来从王以哲家出来，立即到新城杨虎城办公楼商议，杨虎城派他的

代表李志刚到潼关继续同蒋介石的代表顾祝同等谈判。周回到张公馆后，立即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今天发生的事情和处理经过。晚上，中央回电同意继续进行谈判，用一切办法制止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中央对代表团的安全十分关心，嘱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并说已电告云阳前总，情况紧急必要时，派部队到西安保护。

王以哲在东北军是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被杀的消息传到前方，激起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愤慨。2 月 3 日早晨，东北军前线部队调转枪口，撤出渭南防线，渡过渭河开到高陵。刘多荃的部队开回临潼，声言要开回西安为王以哲报仇。中央军开进渭南，逼近西安。周恩来当即派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刘澜波到渭南，向前方将领说明中共对事件的态度，表示中共坚决反对杀害王以哲的错误行为。少壮派原以为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和中央军决战，救回张学良。那知道事与愿违，出现了这种局面。少壮派和许多主战的人都惊惶失措，气焰也顿时消失。

2 月 3 日清晨，周恩来和杨虎城、于学忠等商议，认为少壮派的严重错误可能导致内部分裂，必须严肃对待。但他们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杀王以哲的动机是为了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处置他们。他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毅然决定，派刘鼎把应德田、孙铭九和苗剑秋三人送到云阳红军总部，以免他们再闹事，也使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了打击目标。同时，也商定将孙铭九指挥的卫队团撤出西安。4 日下午，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三人，由刘鼎等陪同，送到了云阳前总，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但是东北军元老派将领刘多荃等，为了泄恨，令人把杀害王以哲的凶手于文俊杀死，并破腹取心去祭奠王以哲。更错误的是，把最早沟通中共和张学良关系的高福源旅长枪杀，误认高参加了“二二事件”。

为了避免意外的损失，周恩来同博古、叶剑英商议，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等代表团大部分人员撤到云阳总部，周恩来自己坚持在西安，和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等共同维系“三位一体”关系，经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时，代表团驻地除周恩来外，仅留下刘鼎和警卫人员龙飞虎、杨家保。机要人员中朱志良、李金德去了云阳，留下我及两个报务员，日夜保持同中央和云阳总部的电讯联系。

2 月 4 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和前总，指出：东北军因王以哲遇害愈加分化，张学良更难回来，东北军有东调安徽的可能。第十七路军一时不会分化，中共难以公开立足。国民党三中全会只能做到宣布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不能提出容共案。并提出党的方针是：坚持三位一体，团结到底，东北军开甘肃以避免分裂；欢迎中央军，避免对立；加强内部组织与团结。

这几天，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最紧张，最困难，也最危险的日子。他十分忙碌，经常夜以继日又一丝不苟地工作。要和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商谈如何对付复杂局面，要做少壮派的工作，既着眼当前，又展望未来，考虑如何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是舌敝唇焦，朝思夕虑。他的眼睛熬红了，鼻子常出血，十分疲劳时，就和衣在床上躺一会儿，连皮鞋也不脱。中央一来电报或来客人，就要叫他起来，不准不叫。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怕他的身体支撑不住，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好在当时他只有 39 岁，正当壮年，尽管遇到种种磨难，当他出现在各方面人物面前时，依然神采奕奕，谈笑风生。面临着这种混乱局面，大家也为他的安全担心。他置身危城，但毫不畏惧。他的伟大气魄，也深深教育了我们工作人员。他以一片真诚对待

朋友，赢得了各方面的信任和友谊，使得他在惊涛骇浪中能够履险如夷。

由于周恩来坚持在西安工作，就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无论东北军和西北军或社会上的各界人士，都相信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正确的。中共是可以信赖的朋友。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诚意和国民党谈判，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从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二事件”破坏了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削弱了西安与南京淡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与地位。2 月 3 日，东线的东北军刘多荃师自动撤退，使中央军得以进驻渭南。刘多荃和缪澂流等高级军官，又在高陵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他们拒绝接受中共代表团接受甲案、东北军仍留西北与红军靠拢的建议，宣布接受乙案，离开西北东调河南、安徽。接着，东北军骑十师师长檀自新、一〇六师师长沈克联名通电投蒋介石。至此，“三位一体”的大势已去，南京又对西安方面施加强大压力，使杨虎城、于学忠不得不通知潼关谈判的代表，按照乙案达成协议，2 月 5 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和平宣言。2 月 6 日，十七路军在西安的部队离开西安撤到三原，杨虎城也到三原去了。“三位一体”解体了。

2 月 8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中央军宋希濂师和平开入西安。国民党特务人员在西安大肆活动，竟在大街上张贴标语，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攻击西安事变。周恩来毅然去见顾祝同，严词质问：“这些标语是谁贴的？想干什么？”逼使顾祝同不得不把政训处长贺衷寒找来，当面“申斥”，要他们立即刷去。第二天，满街的反动标语全部洗刷干净。顾祝同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联络处。

2 月 9 日，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张冲到西安，我党派到南京谈判的代表潘汉年也到了西安。

当天，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全部由张公馆东楼搬到七贤庄一号，成立红军联络处。由于电台合法了，我们就启用更大功率的 50 瓩电台，架起天线，同延安的无线电通讯更畅通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周恩来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但任重道远，他又担负起国共正式谈判的艰巨使命。

## 功垂千古怀念永恒

西安事变虽然以张学良被扣、杨虎城被迫出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被调动和肢解而告终，但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永远熠熠生辉，不可磨灭。没有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蒋介石还要继续推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剿共”战争也不会停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将愈演愈烈，中华民族的存亡绝续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境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公开合法地走上政治舞台，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时期。

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在极端复杂、险恶的环境里，樽俎折冲于各方面人物之中，临危不惧，机智沉着，舍生忘死，力挽狂澜，表现出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也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他的功业是垂千古而不朽的。

周恩来对于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位朋友，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称他们是“千古功臣”。在国共谈判中，不断要求蒋介石释放张、杨两将军，但蒋介石一直置之不理。抗战时期在重庆时，有一次周恩来见到宋子文，他质问宋说：“当时你担保张学良到南京后的自由，为什么没有做到？”宋无可奈何地回答：“其他事情都做了，就是这件事我无能为力。”表示了歉意。1946年在延安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的大会上，周恩来高度评价张、杨两将军的历史功绩。他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先生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建国后，周恩来总以杨虎城没有看到全国解放，张学良不能参加建立新中国为憾。对他们的亲属，从工作到生活，都无微不至的关怀。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在建国后，经过思想教育进步明显，以后安排了全国政协委员。另一个弟弟张学思30年代初就参加共产党，后来在延安学习时，受到周恩来、邓颖超和组织上的关照。建国后，张学思曾任海军参谋长，海军初建潜艇部队时，他亲上潜艇和官兵一起在海中进行训练作业。周恩来知道后感到欣慰并加以称赞。在“文革”初期，为防止红卫兵破坏张作霖在沈阳的“元帅府”和他的陵墓，曾通知东北负责同志加以保护。现在全国政协的办公地址和礼堂地基，是张家从前清遗族手中购买的王府，周恩来任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时，批准用公款按当时市价购买来的，并吩咐将房款分配给张学良几个兄弟。张学思没有领，张学良将军应得份额也给他留着。杨虎城先生的子女，早已成为国家干部。杨拯民现在全国政协担任常委和副秘书长。

195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为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邀请了参加过西安事变的东北、西北两方面和中共有关人士百亲人举行座谈会。周恩来参加了会议并且讲了话。他说：“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千古不朽的人物”。又说，张汉卿在被扣后，“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使人怀念和尊敬的”。周恩来曾对我们说过，蒋介石一直追问张学良西安事变是否受中共指使的？但张先生一直如实地说“没有。”他是敢作敢当的英雄好汉。

1961年12月，为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周恩来邀请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张学思及夫人，杨虎城儿子杨拯民及有关人士20余人座谈并便宴。周

恩来在讲话中，重申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并表达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怀念之情。席间，张学思因台湾报纸发表了经国民党篡改过的所谓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感情非常激动，在向周恩来敬酒时，竟泣不成声。周恩来也流了泪，并深情地对大家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 年了，杨先生牺牲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全场都为此感到心情沉重和激动。会上，周恩来同意杨拯民的建议，把西安事变的经过和前因后果整理成资料公之于世，以批驳蒋介石歪曲事实的《西安半月记》和其他造谣污蔑材料。当场就指定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负责，吸收当时有关人士组成小组进行这工作。这项工作后来因“文革”停顿了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又恢复工作，到 1986 年西安事变 50 周年时，已出版了多种翔实的资料和《西安事变简史》，为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几十年来，周恩来一直十分惦念在台湾的张学良先生，从各方面了解张先生在台湾的情况。他知道张治中将军 1947 年 10 月曾到台湾看望过张学良，1949 年 4 月 1 日，张治中率南京政府代表团来北京后，就向张了解张学良的安全和健康等情况。后来他看到张学良赠张治中的亲笔题诗时，兴致勃勃地反复念诵，似乎看到了张学良就在眼前。

张学良赠张治中诗：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嘉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

1960 年，周恩来趁友人到台湾有可能见到张学良夫人赵媞时，在一纸条上写了“善自珍摄，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16 个字，托友人秘密带至台湾相机转交。该友人到台湾后，利用张学良和夫人赵媞到教堂做礼拜时，以巧妙方式交到赵媞手上。当张学良看到时，当然就心照不宣了。张学良也曾托友人给周恩来捎过信息。这两位中国的伟大政治家，自 1936 年 4 月 9 日在陕北肤施天主教堂秘密结识以后，抗日救国之心就紧紧地把他们联在一起了。1975 年 12 月 20 日，周恩来在弥留之前，仍当面嘱咐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不要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我想，张学良的名字，在周恩来的脑子里是占着第一位的。祖国统一的前途是有望的，但是，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使这两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伟大贡献的千古功臣后会无期，不能不令人十分痛惜！

张学良将军已过 90 高寿，但看起来身体仍很健康，仍旧念念不忘生长他的东北故土，他始终关心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振兴。祝愿他更健康，更长寿，早日回到大陆同老朋友和新朋友相会吧！

# 为了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 西安、杭州谈判初见成果

本来，蒋介石在被释放前，已当面向周恩来许诺，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去谈判。但是张学良一到南京，局势就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背信弃义，对张学良“审判”、“严加管束”，使他失去了自由。周恩来去南京会不会遭到暗算呢？这是大家担心的问题。1 月 5 日和 6 日，毛泽东接连来了两份电报，嘱咐周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无人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当我译好电报拿给周恩来时，深感毛泽东考虑问题周到。

2 月 9 日，周恩来听取从上海来的潘汉年的汇报后，判断蒋介石目前只是准备抗战，能否停止“剿共”，对谈判是否有诚意，都还是个未知数，随即把情况电告中央。当天，周恩来即与顾祝同会见，顾祝同说，蒋介石原约定周恩来于 10 日赴杭州谈判，现在计划推迟了，要他先和周谈。这样，以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为一方的国民党代表，和以周恩来、叶剑英为一方的共产党代表，就在西安开始正式谈判。

当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期已经临近，中共中央为了表示我党团结抗日的诚意，促使国民党转变政策，于 2 月 10 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中央的这个电报，发给周恩来，成为谈判的基本原则。

2 月 11 日和 12 日，谈判继续进行。一开始双方就进入实际问题的谈判。周恩来把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交给顾祝同。谈判进行较为顺利，很快取得如下的结果：（一）中共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分期释放政治犯，对中共党员、中共党组织不再逮捕、破坏，允许中共适时公开。（二）取消苏维埃制度，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国民政府指导，实施普选制。（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与领导。其他边区部队改为地方团队。（四）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军队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五）希望国民党三中全会对中共提出的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及容许民主自由的主张有进一步的表示。

2 月 15 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双方谈判暂时停下来。在三中全会上，抗日派和亲日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 14 人提出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主张，没有被通过，却通过所谓《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老调重弹，实际上反映了国民党政策开始变化：停止剿共战争，争取和平统一。周恩来曾对此作出解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似乎是取消了，苏区改为特区，也似乎取消了，但红军、苏区依然存在。实质是国共合作问题向前进了一步。2 月 22 日，周恩来致电中央书记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表明蒋介石在接受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主张的同时，树起了根绝赤祸的旗帜。我们应在不失立场不放弃原则的情况下接受国民党一切可以让步的条件，以求重登全国政治舞台，参加和组织全国的抗日运动。

在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的几次接触之后，又经过深思熟虑，周恩来

感到谈判的原则和一些重大的具体问题有必要再明确一下。2 月 24 日，他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提出五个问题：“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蒋在西安有改组党的发轫），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 1.5 万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四、红军改编后，共党组织视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党。五、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周恩来的这份电报，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都成了谈判的原则。

2 月 26 日和 27 日，周恩来同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的张冲会谈。张冲对周恩来说，国民党容共的基础已定。周恩来对此早有察觉，对国民党政策的变化给予恰如其分的肯定，又坦率地指出，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和“根除赤祸”的决议案许多措词不当，我们表示遗憾，保留将来发表声明的权利。会谈中红军改编问题是一个关键。周恩来提出红军改编后人数至少六七万，以六个师计，每师三个团，总指挥部在外。张冲坦率地说，蒋介石、顾祝同并非轻视红军，而是怕它壮大，最多只能编为四师四万人。周恩来表示不能接受，并提出从速解决红军给养和停止进攻西路军问题。两天的会谈，红军改编的问题没有解决。张冲的这个方案，比蒋介石 2 月 16 日给顾祝同的电报中所规定的数目，放宽了，蒋介石只让编两个师，八个团，1.5 万人。

会后，双方向各自的中央请示。3 月 1 日和 2 日继续会谈，双方既有坚持也有让步，意见逐渐接近。3 月 8 日的会谈，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决定将一个月来的讨论作一个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当晚电告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监禁中的中共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将目前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行政经费由行政院与省政府规定。（三）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呈报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委会派人联络；将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三个国防师，计 6 个旅 12 个团及其直属之工、炮、通讯、辎重等部队；红军学校办完本期后结束；此外，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这也称为“三八协议”。

国共第一次正式谈判取得了成果，大家都为此而高兴。

没有料到，国民党方面又横生枝节，使谈判取得的成果蒙上了阴影。

原来是周恩来把他起草的“三八协议”草案交顾祝同后，就没有下文了。两天后，突然由贺衷寒提出一个修改案，对原来达成的协议作了重大改动。如红军改编后为三个师，每个师只能有一万人，要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担任，各级副职也要由南京政府逐渐派人充当。“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取消“民选制度”。不提停止进攻西路军。总而言之，是要裁减红军，甚至改变红军的独立领导，肢解陕甘宁边区。周恩来感到问题严重，当即电告中共

中央说：“小问题可以作些让步，上述重大问题须中央考虑。而这些问题不是同顾祝同、贺衷寒谈判所能解决的。”

中共中央于 12 日复电称：“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为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不能迁就。”当晚周恩来约见张冲，指出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根本动摇之可能，要他以原来商定条文电告蒋介石，否则只有请张冲回南京面见蒋介石；同时也表示在西安已无法再谈，只能到南京同蒋介石直接谈判解决。15 日，张冲申明贺案作废，改以 3 月 8 日提案作谈判基础。周恩来要求迅速见蒋介石当面解决问题。

西安谈判到此告一段落，虽然遭到挫折，但也取得一些成果，如在西安公开设立红军联络处，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从 3 月份起国民党开始接济红军的军饷等。

国民党代表张冲，虽然属于陈立夫 CC 系统，但是比较开明，对我党表示友好，2 月 9 日晚上，他收到南京给他的密电，因为没有带秘书，他不会翻译，要中共代表团派人帮他译。叶剑英叫我去，我到张冲的住地西京招待所，他把密码本交我给他译，译完后对我表示感谢。在谈判休息时，他曾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到终南山郊游，一路谈笑风生。我也去了，给他们照了几张照片。以后到南京、重庆，张冲都同我党保持友好态度。他是一个为建立和巩固国共合作作出贡献的人。

周恩来在集中精力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的同时，还做了许多重要工作。

他派张子华到宁夏同马鸿逵建立联系，开展统战工作。派张文彬到兰州对青海的马步青、马步芳进行工作，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收容失散的人员。安排周小舟到山西为陕北购运粮食，进行统战工作。

他亲自和原黄埔学生、中央军将领关麟征、宋希濂、李默庵等商谈，分析时局，宣传党的政策。他们都表示“愿意和平，准备抗战”。他经常听取在西安做黄埔同学工作的宣侠父的汇报，商量开展工作的方法。鼓励原黄埔教官胡公冕到南京做黄埔同学的工作，并通知上海的潘汉年同他联系。他向中央建议，调原黄埔学生陈赓到西安，在黄埔同学中进行工作，陈赓不久到了西安。原黄埔学生徐向前、左权，又都到西安做了一些统战工作。

他听取东北军工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布置东北军调后的工作。并写信给北方局的刘少奇，请北方局和河北、河南省委加强对东北军和东北流亡学生的团结教育工作。

他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向她宣传中共和平统一、团结抗战的主张，并通过她向国际上报道。他了解到史沫特莱想访问苏区，便电告中央做好接待和宣传工作。

他接待了北平、天津的记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建议中央，指定人以化名写文章向《大公报》、《益世报》、《晨报》投稿，参加这些报纸正在进行的统一救国问题的讨论。

他还亲自督促检查红军联络处为延安购运物资、输送青年学生的工作，等等。

我们大家都为周恩来工作的过分紧张而担心，也为我党有这样的杰出领导人而自豪。

1937 年 3 月 28 日，杨虎城、于学忠应蒋介石之召，飞上海转杭州。周

恩来事先也得到蒋介石通知，去杭州直接谈判，他和张冲乘同一架飞机到达上海。潘汉年已先到上海等待。周恩来到上海后，首先会见了宋美龄，把中共中央于3月16日给周的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五项条件拟成书面意见交给宋美龄，请她转交蒋介石。周恩来在上海还同宋子文、蒋鼎文会晤，口头说明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十五项内容。

随后，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到杭州和蒋介石会谈。周恩来见蒋介石后，首先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的。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改编”的诬蔑。在会谈中，周恩来提出六项合理的具体要求：（一）陕甘宁边区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这四万余人；（三）三个师之上必须设总部；（四）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周恩来是应蒋介石的邀请来谈判的，因此蒋介石的态度还比较好。他首先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他说，中共也应检讨过去的决定，坚持新的政策，这样必能得到成功。他也承认由于国共分家，以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并说他过去也有错误，彼此都应该检讨。

谈到合作问题，蒋介石说，不要说与国民党合作，只说和他本人合作。并说：“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常会改变政策，但是一个政策必须行之十年二十年才能见效，我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要能和我永久合作，即使我死了也不发生分裂。我们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周恩来回答：“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

蒋介石说：“你们赶快商量与我的关系及纲领问题。”周恩来一再问：“还有什么具体办法吗？”蒋介石回答：“没有，你们先商量。”

谈到整编红军及边区的问题时，蒋介石说：“这是小节，容易解决。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要开，你们可以参加。行政区要整个的，须由中共方面推荐南京方面的人来担任正职，以应付各方面，副的以下由你们推选，自己干，我们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你们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们决不来破坏你们的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可以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我也决不再打了。”

这是一次坦率的、有成效的会谈，是比较顺利的。看来中心是领袖问题。蒋介石的想法是，共产党的独立组织是不能改变的，拥护他也不会是无条件的，只要拥护他为领袖，提出他认可的条件，合作这个大前提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可以放松一些。否则他就制造困难，逼中共就范，周恩来对此心里也明白。

周恩来带着较为宽松的心情离开杭州来到上海，3月30日，他带着同蒋介石联系的专用密码本，飞抵西安。他把蒋介石侍从室制的密码给我看，是一本明码本加角码的简单密码。他又把在杭州住所门口和张冲的合影给我，我一直珍藏到现在，是一件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了。

4月2日，周恩来乘军用机飞回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等都到机场欢迎。

党中央立刻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杭州谈判的汇报，大家对这个谈判表示满意。会议认为：“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国策基本转变的开

始。”在这以后，“停止内战的阶段已经过去，而转入以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党今后应坚持民族的统一战线方针，不为局部变动而动摇”。会议强调党必须在各种斗争中努力争取领导权。

会议很重视合作和纲领问题，决定由周恩来拟出一个方案，下次会谈时向蒋介石提出。

4 月初，中央政治局举行两次会议，在讨论民族统一战线纲领时，周恩来说：整个统一战线的原则，第一，要有共同纲领；第二，要有联合的组织，才能行动，可以设想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像大革命时代一样，这种形式也有许多困难，不容易实现，另一种是参加联合战线，比较好活动；第三，在承认我们纲领的条件下，可以承认蒋介石为领袖。周恩来又强调，中共在谈判中，要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是组织的独立性，无论如何不能混合；第二是国际性，不能断绝同国际的联系；第三是阶级性，是代表无产阶级的。由此可见周恩来对于这次十分复杂的谈判，头脑异常清醒，把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放在很重要的地位，既坚持了原则，又能灵活对待，又一次显示了他高超的谈判艺术。

4 月 9 日，周恩来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归朕施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

这次他在延安，停留了三个星期。

周恩来后来同我们谈过杭州谈判中的一个插曲。谈判是连续进行的，但有一天，蒋介石忽然通知今天不谈了，要张冲陪同周恩来到莫干山风景区去游览。周恩来心中纳闷，琢磨是否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游览中，才打听到今天是蒋介石要给夫人宋美龄做生日。他暗自惊奇，怎么宋美龄的生日同他是一天？（周恩来生日是 1898 年 3 月 5 日，宋美龄生日是 1897 年 3 月 5 日，是同一天，但蒋介石为什么在 3 月底给宋做生日，一直没搞清楚）他高兴地游玩了一天，并同张冲闲谈了许多事情，心情轻松舒畅。

4 月 25 日，周恩来乘卡车前往西安，准备再次南行与蒋介石会谈。没有想到竟在劳山遇到土匪的袭击。这件事情已有许多文章谈到，这里不赘述了。

劳山遇险的当天晚上，周恩来给西安红军联络处叶剑英发急电，简单说明劳山遇险现己安全回到延安，要叶剑英立即向顾祝同交涉，26 日派军用机到延安接他。当我译出“劳山遇险”几个字时，不觉一惊，不知结果如何，赶快往下译，待译出“已平安回延安”几字时，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我立即把电报送到叶剑英住房，把他叫醒来看。他看完电报，又惊又喜，说了一声：“胡公真命大，是马克思保佑！”时已凌晨，因顾祝同他们还未起床，只有等到八时以后才能交涉飞机。当时邓颖超正在办公处养病，叶说，不要惊动她，等明早交涉飞机后再告诉她。叶剑英穿好衣服，给我讲胡公的故事。他说，胡公遇险不是只这一次。战场上打仗，上海地下党工作不算，坐汽车遇险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 1925 年 8 月 20 日在广州的时候，国民党右派派人暗杀了廖仲恺先生，当天晚上八时起广州戒严。后来把戒严时间提早了，口令也变了，周恩来不知道，他在原定的戒严时间从黄埔带一个警卫员乘汽车到市内去，哨兵问口令，警卫员以原定的口令答复，哨兵因口令不对，就对车开枪，司机和警卫员都负重伤，周恩来立即高声叫：“我是周恩来。”哨兵看到是周恩来才停止射击。你看多危险呵？这次土匪预先埋伏，火力更猛，胡公安全脱险，岂不是马克思在天保佑吗？我说，对。我听后，对胡公

的临危不惧、沉着应付的精神十分钦佩。

26 日清早，叶剑英亲自给顾祝同的参谋长赵启骕电话，告以周恩来昨天在劳山遇险已安全回延安，他带有中共中央谈判方案，请今天派飞机去接。赵立即表示，请周先生在延安等，上午就可以派他坐过的军用飞机去接。叶剑英打完电话，又立即发电报给延安周恩来：军用机（只能乘一人）上午即到，起飞后即电告。电报发出后，我告电台，要连续同延安联络，待延安来电。我就将延安来电和刚才发的电报送给邓大姐看。她开始一惊，接着就安静下来说，安全脱险就好了。又把电报送给李涛（办事处主任）看。约 11 时，延安来电，飞机已起飞。我立即报告叶剑英。因飞机小，约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叶剑英要李涛和警卫员、司机先吃饭，12 时前赶到飞机场接周恩来。我很想去机场，但因只一部小车坐不下，只好和大家一起赶快吃饭后站在大门口等，邓大姐也和大家站在一起。大约下午一时，车子回来了，周恩来依然神采奕奕地走下车来，他先同邓大姐亲切握手。邓大姐高兴地流下热泪说：“又一次遇险，回来就好了，真是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你！”接着又和大家一一握手。我们都为周副主席的安全回来而热泪盈眶。

周恩来休息不久，就到客厅找叶剑英、李涛谈工作。他先讲了大家最关心的劳山遇险和脱险经过，又讲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共谈判的情况，介绍了他带来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主要内容。叶剑英汇报了西安最近的情况。他特别提到蒋介石已下令撤销杨虎城为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逼迫杨虎城离开十七路军出国“考察”和分化十七路军，引起十七路军将士和西安各界人士的很大不满。杨虎城一再要求率部队准备对日作战，都被蒋介石拒绝。杨只得服从，正作出国准备，但思想苦闷。他们商量了一会儿后，周恩来就去新城见杨虎城，把中央提出的《纲领草案》内容向杨虎城通报并征求他的意见。杨表示完全同意。杨说，他出国考察一时期，如果对日作战，他一定回国参战。周恩来看到杨虎城出国已不可改变，就希望他在出国前多做十七路军的团结工作，并表示中共方面将尽量协助，希望杨先生早日回国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周恩来对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还要报复杨虎城，早有预料，但这次同杨虎城的见面成了永诀，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蒋介石 3 月 29 日在杭州召见杨虎城、于学忠时，曾说：“我待人一向宽大，不计旧怨。”可是，过了一个多月就撤了杨虎城的职，逼他出洋，可见蒋介石是个阴险的两面派。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虎城抗战心切，于 11 月回国请缨杀敌时，蒋介石将他囚禁长达 12 年，最后令特务把他残酷杀害！“千古功臣”竟蒙受了“千古奇冤”！写到这里，不禁又引起了我对杨虎城将军的崇敬和怀念。

27 日，周恩来把从延安带来准备同蒋介石谈判的内容告诉顾祝同、张冲，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以后又同张冲谈判，坚持在确定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由国共两党共同发表宣言；和顾祝同谈判及早解决红军经费和夏衣等问题，并商定派红军供给部长叶季壮到西安行营办理领款、领衣和运输问题；要求释放西路军被俘人员等。

5 月，周恩来派张文彬、彭加伦到兰州筹建红军办事处，进行对外联络和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特别要寻找失散的领导人。7 月，中央派谢觉哉为代表去兰州同国民党当局贺耀祖等联系，领导办事处工作。他们营救了不少同志送回延安。

劳山事件后，中央军委组织部队和西北保卫处侦察人员，动员当地群众，

对劳山一带的土匪进行清剿，很快就把他们消灭了。他们有几股，共 200 来人，主要的土匪头子是河南人李清伍。他在劳山作案后，怕红军抓他，离开匪股到一处隐藏，在群众揭发下，这个作恶多端的匪首，和为他在延安打探消息的坐探，一起被处决。自消灭了土匪，加强警戒以后，延安到耀县一带的公路，便畅通无阻了。

5 月中旬，同周恩来一起在劳山遇险的张三逸、孔石泉等，又乘汽车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同周恩来见面。他们互称是“ 战友和难友 ”，我就利用机会给他们三人照了一张相片作纪念。

## 中央考察团到延安

国民党为了了解苏区和红军的实际情况，5 月中旬，顾祝同、张冲向周恩提出派人视察边区问题。周恩来报经中央同意，但提出了两条原则：（一）不能称视察团，应称考察团；（二〕不能让康泽（康是搞特务的）和中共叛徒参加。周恩来同张冲谈后，他们只得同意。接着就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团长涂思宗，副团长萧致平、邵华。团员包括黄埔军校教官胡公冕等，全团 21 人。周恩来派叶剑英、陈赓陪同，我作为秘书和副官邱南章随行。恰好我刚学会照相，就背上李克农从上海买来的一架德国照相机，和考察团一样戴上一顶巴拿马草帽，同志们都说我像一个摄影记者。

考察团于 5 月 28 日从西安乘两辆大客车出发，经三原到中部（现黄陵）县祭黄帝陵。这是国共两党的代表第一次同祭黄陵，象征着炎黄子孙的团结合作。自此以后，每年清明节，西安、延安的国共双方代表即同到黄陵祭奠，这次考察团开了个好头。祭完黄陵即到洛川宿营。29 日，考察团一行到达鄜（今富县）道草铺，进入苏区，沿途受到红军和群众的欢迎。随后，考察团又经过甘泉县，于当天下午五时到达延安城南门。考察团团员们看到延安古城门墙上写有“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和“停止内战”的巨幅标语，城门上面挂了红布白字“欢迎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中央考察团”大横幅，城门上和城门外站满了前来欢迎的红军和群众，大家都很兴奋，下车后手拿巴拿马帽向欢迎群众致意。一进延安南大街，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中共中央代表博古、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早就站在街头热烈欢迎，然后一同进入延安大礼堂（这原是个天主教堂，1936 年 4 月 9 日，周恩来就在这里同张学良进行秘密会谈）。稍事休息后，即由边区政府设宴招待，国共代表欢聚一堂，都预祝第二次国共合作成功。接着，又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以及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萧劲光等红军将领都到会。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致欢迎词。毛泽东说：“今天这个欢迎会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是由国共两党干起来的。现在比那个时候更不同了，民族比那时更危险。两党一致团结，在今天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增加了。”“应巩固两党的团结，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若干必须解决的矛盾，结成坚固团体去对付我们的敌人……，今天这个欢迎会，就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充分表现。”中央考察团团长涂思宗讲话时，也表示国共两党要团结合作，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会后又表演了文艺节目。这天的集会，就表现了国共双方，在民族危机大敌当前的时刻，是可以摒弃前嫌团结对敌的。大礼堂大门上方交叉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和红星镰刀斧头旗，就是国共重新合作的象征。考察团负责人讲话中，公开承认“红军的抗日情绪与艰苦卓绝的作风，共产党领袖团结的诚恳，至所钦佩。”

考察团在延安三天。团长、副团长和毛泽东、朱德举行了单独会谈，交换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救国的意见。毛泽东重申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的精神，希望国民党实行中共的五项要求，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四项保证。针对考察团有人提出共产党是否执行三民主义问题，毛泽东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 1924 年至 1927 年革命胜利的旗帜。但是 1927 年国民党

实行反共战争，招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三民主义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又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要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行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这一席话，使得考察团的负责人点头称是。

考察团在延安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边区政府等，都受到热烈欢迎，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接着又到三原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考察，受到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参谋长左权等热情招待，并开了欢迎大会，战士剧社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以后又到关中富平、陇东的庆阳等红一、二、四方面军驻地考察，刘伯承、贺龙等将领亲自陪同，参观了红军部队的装备、训练等情况。历时半个月才回到西安。在考察中，团员态度一般都表示友好，都认为“百闻不如一见”，看到了红军和苏区人民的真实情况，收获很大。有些团员私下对我们说，过去只听说，红军是衣衫褴褛没有文化的“土匪”部队，参观以后，认为是有组织有纪律也有文化的部队。他们在同红军将领交谈中，同战士的谈话中，都感到共产党是真正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救国的，当然也有个别的在交谈中散布一些错误的言论，如“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等。

总之，通过这次考察团的活动，沟通了国共双方的理解，增强了国共合作的信心，对于国共和谈，也起了促进作用。

毛泽东在 1937 年 7 月写的《实践论》中以这次考察为例说：“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

我本人在这次行动中，也得益匪浅。在叶剑英、陈赓的领导下，第一次同国民党的官员直接接触，做了一些统战工作，增长了见识，交了朋友。而最大的收获是，拍摄了一批红军时期的照片。现在已成为宝贵的革命历史文物了。

## 庐山谈判陷入僵局

周恩来在西安和顾祝同、张冲进行了多次谈判后，于 5 月底飞抵上海。

在上海和南京，周恩来繁忙地和各方面人士接触，争取中共的公开合法地位，并酝酿筹办宣传抗日的刊物，还会见部分秘密党员。

6 月 4 日，周恩来抵达庐山，但直到 6 月 8 日才见到蒋介石，随后进行多次会谈，蒋介石态度大变。本来他提出要中共商量出一个纲领，现在纲领拿出来了，他又撇开不谈，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这个同盟会由蒋介石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的人组成，由蒋介石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讨论。同盟会如进行顺利，将来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也可代替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就是要把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之内。

在杭州时蒋介石有许多承诺，这次会谈也变了。比如，原来他同意三个师之上设总司令部，这次只答应“设政治训练处以指挥之”，并无理提出“朱先生、毛先生出洋”。各地区的武装也要“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对共产党公开的问题不再提起，反而规定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以共产党名义出席”。周恩来对蒋介石态度的变化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表示：组织革命同盟会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三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不能同意；要朱、毛出洋是没有道理的；经与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反复磋商，仍不能解决。

6 月 18 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蒋介石的方案，决定为了顾全大局，可再作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先确定共同纲领，而后承认蒋介石根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准备在 7 月中旬发表宣言，如果蒋介石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改编，否则于 8 月 1 日自行宣布改编。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官，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任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任副长官。这个新方案是照顾蒋介石的要求、委曲求全的方案。周恩来于 22 日致电蒋介石，强调三个师之上如无指挥机关，无法进行改编。朱德不能离开军队。同时致电顾祝同、张冲等，声明朱德去留影响极大，请向蒋介石进言，朱不能离去。这些要求蒋介石都没有同意。

由于蒋介石反复无常，使这次谈判陷入僵局。

6 月 26 日，南京方面电邀周恩来继续谈判。中共中央决定，待国共两党合作宣言拟好后，周恩来再上庐山。

7 月 4 日，周恩来带着这个宣言，偕同博古、林伯渠到达西安，7 日来到上海。就在这天晚上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勇抵抗日寇的侵略，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全面抗战势在必行，斗争将是长期的，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上海，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会见了担任联络工作的潘汉年和即将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指出形势急剧变化，上海、北平都将发生意外事件，我们思想上应有所准备。应抓往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要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注意积蓄革命力量，既反对关门主义，也反对冒

险主义。周恩来的这些指示，对曾经遭到严重破坏的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恢复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上海，周恩来还指示夏衍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多做统战工作，工作方式可多种多样，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要争取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报纸。并和博古、林伯渠一起，拜访宋庆龄，征求宋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宋庆龄表示支持。

为使此次谈判取得进展，7 月 9 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左权、萧克、徐海东给在庐山的林森、蒋介石、汪精卫等及全国军政长官发出通电：“当华北危机存亡之紧急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的二十九军陷于孤军作战，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7 月 13 日（或 14 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一行到达庐山。随即向蒋介石递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4 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愿意在蒋介石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担负起平绥线的抗日任务。

蒋介石却报以冷淡态度。当时蒋介石、汪精卫正邀请各方面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要他们就国事发表意见，中共代表却被排除在外。

14 日，周恩来会见张冲。原来蒋介石曾答应三个师之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张冲却告诉周恩来说：“蒋委员长坚持各师须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这又是向后退了一大步。第二天，周恩来不得不写信给蒋介石，指出：“此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周恩来已暗示蒋介石，如果这样出尔反尔，谈判恐难继续进行。

直到 17 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才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举行谈判。周恩来向蒋介石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在谈判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执的焦点是红军改编的指挥和人事问题。蒋介石态度未变，因而谈判没有解决问题。18 日，周恩来将急需确定的问题写成十二条，通过宋美龄交给蒋介石。主要内容有：应许各报刊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发出书面谈话表示赞同；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和负责人；国共双方派人分赴南方苏区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17 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指出：从大局出发，在谈判中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可以承认平时设政治处指挥，朱德为正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军事指挥部，以资统率。这项内容也包括在十二条之中。蒋介石仍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三个师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严正表示对蒋介石的意见不能接受。这次谈判仍无结果。

中共方面已到无可再让的地步。当时日本侵略军正大举入侵华北，二十九军将士英勇抵抗，华北以至全中国人民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动摇妥协。许多国民革命军将领及国民党地方党部公开通电要求抗战。南京政府也表示了强硬态度，调动军队增援河北、山西、绥远。17 日，蒋介石不得不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面抗战已成不可阻挡的

潮流。张闻天、毛泽东于 20 日电周恩来、林伯渠指出：“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于是周恩来回到上海，观察形势的变化。21 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致电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六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

26 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回到西安，把庐山谈判的详情电告中央。他们三人虽然经过紧张的谈判和旅途的劳累，但仍精神饱满，我就抓着机会给他们照了一张合影。

27 日，周恩来与蒋鼎文会谈。蒋鼎文转告蒋介石催促红军迅速出动抗日的意见。周恩来回答：“这没有问题，国民党应当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他即和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研究红军改编出动抗日问题，决定争取西安行营同意，红军集中三原改编，三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任正职，彭德怀任副职。这时朱德、彭德怀等都在云阳。30 日，周恩来也赶往云阳，安排红军改编事宜。

## 南京谈判合作达成

北平、天津于 7 月 29、30 日先后沦陷。

蒋介石拟召开国防会议，商讨抗日事宜。8 月 1 日，毛泽东转来张冲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第二天周恩来根据中央决定复电张冲：如开国防会议，他与朱德、叶剑英同去。

8 月 3 日，毛泽东、张闻天来电：在南京谈判中要解决：一、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

8 月 6 日，周恩来、朱德从云阳总部到达西安。9 日偕同在西安的叶剑英，和从云南来的龙云同乘一架飞机抵南京。我作随员，同机到达。一下飞机，就受到邵力子、张冲等人欢迎，并参加午宴。

11 日，周恩来和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部的谈话会上分别发言。周恩来强调在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或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周、朱代表中共的意见，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2 日，南京谈判开始。周恩来、朱德和张冲、邵力子、康泽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内容。本来在庐山谈判时，蒋介石曾答应一旦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就发表中共宣言。但是“七七事变”已一个多月，平、津都已失守，蒋介石不仅压着宣言不发表，而且指使康泽出来横生枝节。康泽提出：宣言不提“民主”，要求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等。周恩来当即表示，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并要求他将中共的意见报蒋介石。

8 月 13 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大举进攻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的心脏地带，中日之战再难避免。蒋介石为了调遣红军上前线对日作战，只好同意了中共提出的一些重要意见，同意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骚扰与箝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18 日，双方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编三个师。蒋介石答应国民党不派军官到八路军任职，只在总部和三个师各派联络参谋一人。争执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获得解决。当天，周恩来、叶剑英立即把这一消息电告毛泽东，并建议至少应以一个旅为先遣部队，先行东进。毛泽东也在当天复电同意。从 8 月下旬起，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陆续由韩城等处东渡黄河，经同蒲铁路开赴山西前线作战。

周恩来在南京同各方面广泛接触，会见了冯玉祥、白崇禧、龙云、刘湘等人，商谈合作抗日等问题；同何应钦商谈改编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 8 省 13 个地区红军游击队成立新四军问题。并在上海会见叶挺，请他出面做改编南方游击队的工作，为组建新四军进行准备。

周恩来非常关心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每次同国民党谈判都要提出释放政治犯问题。在我党不断文涉、宋庆龄等大力营救和舆论压力下，江苏高等法院于 7 月 31 日释放了关押在苏州的沈钧儒、李公朴、史良、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等“七君子”。但对于释放在狱的共产党员一直不执行协议。陈立夫则以“要共产党开名单来”为借口拖延释放。由于日

本侵略军向苏州、南京逼近，日机又开始轰炸，国民党对关押在苏州、南京等地的大批政治犯又不愿公开释放，8 月 16 日，由军事委员会公布了《战时监犯调服军役办法》，规定“各监狱长官或反省院长应将合于调服军役之人犯造册报由军政部通盘筹划拨充各部队服务”。周恩来就利用这个机会给国民党“将一军”，8 月 18 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到“首都反省院”看望政治犯，并向他们作抗战形势和国共谈判的报告，希望他们早日出来参加抗日战争，得到他们的热烈拥护。报告完，立即向反省院院长交涉，首先把他熟悉的夏之栩（赵世炎夫人）、王根英（陈赓夫人）、张琴秋（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三个女同志释放。该院长说，张琴秋是顾祝同寄在这里的，他无权释放。夏之栩向周恩来提出，改为熊天荆，周恩来同意，院长也同意。当天下午，我乘车将她们三人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王根英很快到西安同陈赓团聚，夏之栩、熊天荆在办事处工作了一段。叶剑英写信给军政部长何应钦，把张琴秋也保释出来了。以后营救政治犯工作，都由叶剑英负责进行。

中共取得合法地位后，需要在各地设立公开的办事机构。西安、兰州已经设立红军联络处，七七事变后，阎锡山也允许在太原设立办事处。南京谈判中，国民党又同意在南京、上海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经过友人介绍，在傅厚岗租下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一幢小楼成立八路军驻京办事处。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又先后在武汉、长沙等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在南昌成立新四军办事处等。

为了宣传中共团结抗战的方针，联系广大群众，打破国民党对舆论的统制，有必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报刊。这件事情两党谈判一开始，周恩来就非常重视。他同国民党当局多次磋商。8 月间，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批准了中共南京办事处筹办《新华日报》，周恩来非常高兴，他即同朱德探望了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于右任，请他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于欣然同意。周恩来指示潘梓年负责筹备工作，参加工作的还有章汉夫、钱之光、许涤新、何云、吴敏（杨放之）、徐迈进、楼适夷等。《群众》周刊的筹备工作也同时进行。由于南京局势紧张，国民党将迁都，邵力子通知《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移到武汉进行。《群众》周刊于 12 月 11 日出版，而《新华日报》直到 1938 年 1 月 11 日才在武汉和读者见面。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党报和党刊。这两份报刊的公开出版，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件大事，深受广大群众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对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广大人民积极参加抗战和民主运动，都起了重大作用。

这次南京谈判经过十多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还有边区范围和政府负责人等问题没有解决，国共合作宣言还未公布。

党中央决定 8 月 22 日在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知周恩来和朱德回去参加。谈判工作由叶剑英继续进行。21 日，周恩来、朱德离南京回西安，22 日即到洛川参加会议。

洛川会议讨论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研究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会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为了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决定建立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周恩来在会上报告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等情况。洛川会议 25 日结束。29 日，周恩来、博古、彭德怀抵西安，准备一起去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建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因华北战场形势紧张，周恩来临危受命，到山西同阎锡山等商谈八路军作战问题。

9 月 22 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 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宣言》的谈话。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经过半年多艰难曲折的谈判，终于使对立了十年的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周恩来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呕心沥血，亲临前线进行艰苦的谈判，他的功绩永垂史册。

## 西安、南京设八路军办事处

1937 年 8 月 21 日，周恩来和朱德离开南京后，叶剑英留在南京继续进行谈判和营救在狱中的同志等工作。我和他两人就搬到傅厚岗 66 号刚租下的小楼里。从狱中接出来的夏之栩、王根英、熊天荆三个女同志也住在这里。当时床铺被褥都没有，我对南京不熟悉，熊天荆是南京人，我就拿钱给她去购买，因为天热，一床席子、一个枕头和一条被单就行了。她又请了一个保姆来做饭和搞卫生，就正式起伙了。像个小家庭的样子。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从此，叶剑英就以八路军参谋长和八路军驻京代表身份开展统战工作。博厚岗 66 号，也正式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京办公处”，我以办公处秘书名义上街去刻了印章和印制了信纸信封，买了办公用品。当时中央已决定调上海红军联络处处长李克农来当处长，他还没有到任，我们就正式开张了。

第一件工作，就是营救狱中的政治犯。所以第一封公函，就是以叶剑英的名义给军政部长何应钦保释政治犯的。夏之栩等到办事处后，交出一批仍在狱中关押的名单，叶剑英要我写信给何应钦保释。这可难着我了。我虽然在红军中当过几年秘书，为首长写过不少请示报告，都是开门见山，简单明了，有啥说啥，除了最后一个“敬礼”外，什么客套话都没有。我在西安红军联络处半年多，也没有写过公函。我只好向叶剑英请教应该如何写。他手把手地教我：开头写“何部长钧鉴”，中间写要保释某某人出狱调服军役，最后一句是“请核准为荷”。“核”字要抬头另起一行，表示对上级尊重。落款又要在叶剑英上面旁边写一“职”字，表示是他的下级。我就照葫芦画瓢，一字一句地小心抄写。因为很紧张，不是掉了字，就是忘了抬头。只得重写，写了几次才算写好，搞得我满身大汗。送给叶剑英审查盖章才发出。这几天可忙坏了我，既要写公函，又要招待狱中出来的同志，还要翻电报，因为我们没有电台，发电报是我自己送到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驻京办事处代发的。

8 月底，李克农从上海来了，他就负起办事处的总责。钱之光奉周恩来指派也从西安来到南京，他负责军需、财务等工作。因出狱的同志越来越多，李克农就指定从狱中出来的夏之栩、熊天荆、刘顺元、萧桂昌等同志负责接待、登记和审查。先在西流湾租了几间平房，住不下了，又在鼓楼包了一个小旅馆。同志们出狱后，首先是给他们洗澡、理发、补充衣服和日用品，然后登记、填表，学习党中央的宣言、《十大纲领》等。

9 月初，博古以中共中央代表身分到达南京八办。他的任务，首先是同国民党代表商谈中共中央宣言的定稿和发表问题。这个任务已在 9 月 21 日完成，22 日公开发表了。其次就是恢复和建立长江流域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组织。

因为周恩来已到山西同阎锡山、卫立煌等商量山西抗战事宜，董必武、林伯渠分别在武汉和西安，长江沿岸委员会没有建立。所以这项工作就由博古负责，叶剑英参加。由于从狱中营救出大量的党的负责干部，她们有白区工作经验，这就为开展工作提供了干部条件，从 8 月到 10 月，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监狱、反省院先后释放的政治犯，经过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接待的共约千人。其中重要的干部有黄文杰、刘顺元，李世农、王凯、陈农非、

郑绍文、王鹤寿、陶铸、方毅、石磊、钱瑛、张琴秋、刘宁一、萧桂昌、喻屏、林理明、张恺帆、顾玉良、曹莎秋、彭康、邓垦等。博古、叶剑英和李克农商量，指定有组织工作经验和了解狱中情况的黄文杰、刘顺元、王鹤寿、李世农、刘宁一、钱瑛、夏之栩、方毅等负责出狱人员的登记、审查、接待工作。审查后分别处理：狱中表现坚定的，送延安或分配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表现一般的，有些问题的，送延安学习，继续审查；少数表现不好的或有严重问题的，发路费给他回家或自我工作，并嘱咐他们要积极参加抗战。总计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的，约七、八百人，都是南京办事处买好火车票，分批组织起来，发给八路军护照走的。

博古、叶剑英根据干部条件并报中央批准，逐渐建立了许多地方的党的领导机关。9 月，派北平南下的学生杨学诚在武汉成立武汉工委，主要是领导学生工作。10 月初，周恩来从太原电告博古，并派副官邱南章到汉口送信给董必武，陪同董老到南京同博古商量湖北党的组织工作。董老到武汉后，同博古、叶剑英商定，派刚出狱的陶铸、钱瑛去武汉，与从中央派去的郭述申组织湖北省工委，郭述申任工委书记。11 月，博古派从苏州出狱的方毅去湖北，参加工委工作。又商定派郑位三到鄂东任特委书记，加强对高敬亭游击部队的政治工作。派原任西安红军联络处主任李涛到汉口筹建八路军驻汉办事处。

10 月，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中央派张爱萍经南京去上海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叶剑英同张爱萍商谈了在江苏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问题。博古派刘宁一到江苏省委参加工人委员会工作。

11 月，浙江成立临时省工委，安徽成立皖中工委，都是博古从南京派出干部去组织的。

9 月下旬，在赣粤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负责人项英，根据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到南昌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因不了解国共谈判的具体情况，发表了一些不恰当的谈话。中央电告博古、叶剑英，设法派人到江西找项英，传达中央指示，要项英到南京转延安，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博古、叶剑英派了从监狱出来认识项英的顾玉良，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上尉副官的名义，穿上军服，拿上护照到南昌，经过国民党派人带到吉安见到陈毅，口头传达了中央关于南方游击队不能自行集中下山的指示。接着又到赣南大庾找到项英，口头传达了中央的指示，面交了博古、叶剑英托带的信和中央文件。然后又陪项英到南京八办转到延安。

11 月，博古、叶剑英又派顾玉良先到江西铅山赣东北苏区找到领导人黄道，又到福建闽东游击区找到叶飞，向他们传达中央文件和批示精神，并陪同叶飞、黄道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报到。使他们及时了解中央精神，以免上国民党的当。

在宣传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博古、叶剑英、李克农都接见了许多朋友和中外记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八路军的战绩，特别是 1937 年 9 月 25 日八路军 115 师在山西平型关歼灭日军千余人以后，八路军更闻名中外，很多人来打听消息，应接不暇。李克农要袁超俊副官买了一架油印机，将八路军总部发来的战报印发，并用不同方式通过进步或中间报纸在报上透露出去。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办的《金陵日报》，因销路不好，请刚出狱的陈农非（陈办过报，他们认识）去当总编辑，经博古同意，该报因有后台可

不送审，就可经常登载八路军的消息。外国记者爱泼斯坦，还把我们提供的消息发往外国报纸发表。

10 月间，南京有一张小报登载了一条“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报道。李克农看了很生气，同叶剑英商量对该报提出抗议。李克农叫人到街上买了一个少将领章和一个少校领章，他要我和他一起穿上军衣，戴上八路军臂章，他挂上少将领章，要我挂少校领章。他说要给那个报馆的总编辑颜色看。接着就叫副官打电话把该报总编辑找来，他要我在门口招呼，他坐在客厅等候。不久，总编辑来了，我说，我们处长找你有事，就把他引到客厅里。李克农请他坐下，拿着那张报纸对他说：“你们的消息说‘八路军游而不击’，根据什么？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那么大的胜仗，难道你们不知道么？明天登报更正。”那个总编辑只得点头承认错误，说：“明天一定更正，一定更正。”急得满头大汗。第二天就登了一条启事。事后，我们办事处的同志对李克农说：“克公真有两下子。”李克农笑着说：“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嘛。”

11 月 12 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又继续向苏州进攻。19 日苏州失守，日军又向南京方向前进。国民政府急忙迁往重庆、汉口、长沙等地，国民党的大官们慌忙西逃。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分批向汉口转移。为了到汉口向国民党交涉出版《新华日报》和建立南方和西南地区党的组织，博古同章汉夫于 10 月中先乘船到武汉。11 月 19 日，钱之光率夏之栩、齐光、康一民、李应吉等乘火车经郑州去武汉，建立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后来中央决定钱之光为八路军驻仅办事处处长。

叶剑英、李克农、廖承志（原拟去广州，因交通阻塞留南京）、袁超俊、吴志坚和我六人一直坚持工作到 12 月初才走。司机王应絮，原是出租汽车公司的，自愿留下为八路军开车。为了工作需要，10 月间李克农在上海用 700 元买了两辆旧轿车，我们撤退时就顶用了。因为那时兵荒马乱，已租不到车子。袁超俊和王应絮各开一辆，就上路了。当时公路很坏，车辆又多，秩序更乱，我们的车子很破旧，边走边修，走走停停，大家都叫它“烂背骡子”。大约走了五天，经过南昌勉强走到了长沙。车子已破烂不能走了，袁超俊和王应絮留下来修车，我们五个人改乘小轮船于 12 月 10 日左右到达汉口。八路军驻汉办事处还住在“董必武公馆”，大家挤在一起又开始新的工作。

12 月 13 日，日本侵略军已攻占南京，开始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西安红军联络处，是西安事变解决后，我党为维持同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团结，并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共商停止内战准备抗日的问题而设立的。当时国民党也需要中共有正式代表在西安，以便解决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等问题。所以，周恩来向顾祝同提出要在西安成立红军联络处时，顾祝同就答应了。但是，他们又怕中共和红军影响的扩大，采取了“掩耳盗铃”的办法，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可以公开活动，但不能公开挂牌，经过商量，就挂了“国民革命军十七路军教导队通讯训练班”的牌子，并由十七路军派门卫。周恩来和工作人员都穿便服，只内部警卫因身上挂了驳壳枪，才穿国民党的军服。我们机要、电台和公务人员，都是十多廿岁左右（我当时 23 岁，算是比较大的）的“红小鬼”，为和“通讯训练班”的学生身份相符，李克农要我们穿学生装。我们的电台是合法的，就用高竹竿架上天线，真像通讯训练班的样子。当时西安只两家电影院，放映的是无声电影，对学生只收半价，我们就冒充学生看了些半价电影，算是开了洋荤。大家在上班时间都很守规矩，一到吃了晚饭，就在院子里和大门口打打闹闹，所以附近

的群众称号我们是“娃娃店”。

红军联络处，是 1937 年 2 月 9 日中共代表团从张学良公馆搬到七贤庄一号后成立的。当时只代表团留下的十来个人，因工作开展，“二二”筝变后转移至云阳红军总部的叶剑英、李克农、李金德等又回到西安。又从延安调了李涛等几个人来。联络处主任开始是李克农，2 月底李克农到上海治眼，就由李涛负责。因周恩来经常外出活动，李克农给他配了警卫副官陈有才。李克农除教陈有才做好警卫工作外，还教他随周恩来到国民党机关时，如何给传达室通报、递周恩来名片等等。特别给陈制了一套呢子大衣和礼帽。

红军联络处一成立，统一战线工作就立即开展起来，来联络处的爱国将领、民主人士逐渐多起来了。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懂社会上的礼节，刚开始客人来了不知如何接待，站在一边看。周恩来要李克农和李涛教我们如何侍人接物，特别告诉副官和公务人员接待客人的规矩。当时天气寒冷，客人一般都穿大衣、戴礼帽，李克农说，客人来后，先引到客厅门外，帮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在衣架上，再引进客厅请坐、上茶……。尽管如此，还闹过笑后。有一天，某民主人士来了，一个小公务员想照章办事，不待客人站好，就动手把客人头上的礼帽摘下来。幸亏是友好人士，客人只是一笑了之。李克农知道后，就把这个例子作教材，告诉大家要待客人自己取下礼帽后，才接过来挂上，不要先动手。讲得大家都好笑。通过教育和实践，“土包子”也训练为彬彬有礼的服务人员了。

1937 年 3 月，周恩来开始到杭州同蒋介石谈判，中央派林伯渠为中共代表驻红军联络处。林原是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时就负盛名，他到西安后，上层统战工作更加活跃。为进行黄埔同学的统战工作，除了宣侠父（黄埔一期生）常驻西安外，左权、陈赓、徐向前（均为黄埔一期生）等都先后到过西安联络处。联络处还接待过许多党和红军的负责同志。

西安红军联络处，是延安和红军总部通往国民党地区的窗口和交通总站。在开展统战工作、购运军需物资、输送干部和青年学生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上海、北平、天津及南方各地秘密党组织同延安中央的联系，都是通过西安红军联络处的。所以有些同志认为西安红军联络处即是中共办事处，实际作用是这样的，但名义上不能这样说。

“七七事变”加快了国共谈判的进程，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西安红军联络处就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并公开挂牌，由八路军自行警卫。9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八路军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随即改为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

西安红军联络处，从建立到改名前后，只七个月，但在周恩来等的直接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在中共党史和红军军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 武汉三镇的日日夜夜（上）

## 继续同国民党谈判

1937 年 12 月 9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领导新四军工作。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1937 年 12 月 18 日，周恩来同王明、博古、邓颖超、孟庆树等到武汉。这时武汉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军政机关也都迁到武汉办公。

中共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争取蒋介石坚持抗战和巩固与发展国共两党合作。而蒋介石也很想知道中共中央的意见，所以代表团到武汉第三天即 12 月 21 日，周恩来同王明、博古就和蒋介石会谈。王明先说明了抗战形势、两党关系、合作任务及国际活动情形与共产国际的某些建议；博古谈了边区、八路军办事处等问题；周恩来提出了中共的建议，如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两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建立国防工业与征兵机构，补充扩大和改造部队、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问题。蒋介石当即表示，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并说今后两党关系，已告陈立夫和我们代表商谈。这次会谈，就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达成协议。中共方面为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最后蒋介石提出要留工明“在汉相助”。

早在 1935 年 12 月，蒋介石就知道王明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曾派中国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同王明接触过，王明和潘汉年见过邓文仪，表示国共可以谈判，要潘汉年回国后报告党中央。所以举一次见面就当面留王明“在汉相助”。

12 月 23 日，中共代表团同长江局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会上决定：一、鉴于代表团同长江局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合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二、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由项英（在新四军）、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在西安）七人组成。三、暂以王明为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三项须报中央政治局批准。四、长江局下设五个机构：参谋处，叶剑英为参谋长；秘书处，李克农为秘书长；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组织部，博古兼部长；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长江局的工作由王明主持。周恩来作为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

这样，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机关——中共中央长江局就正式成立了。但是由于国民党还不允许共产党的组织公开活动，所以对外只能用中共代表团名义出面，许多工作则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或《新华日报》的名义去做。以后周恩来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名义，王明、博古、董必武以及吴玉章、邓颖超用国民参政员名义，叶剑英用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名义对外活动，活动范围就更广泛了。

长江局一成立，就根据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各方面的紧张工

作，进行着复杂尖锐的斗争。由于王明是空头政治家，不了解国内情况，主要精力用在写文章，宣传他右倾投降的那套观点，所以就加重了周恩来的负担。又由于周在党内外都有崇高的威望，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工作极端负责，所以他实际上是长江局的领导核心。

武汉时期，国共关系比较密切，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战争比较积极。但是蒋介石一直害怕共产党影响的扩大和组织的发展，对于根本性质的问题，不愿意解决，或者采取拖延办法，或者答应了不做，或者拒绝。所以，国共谈判的过程，也是既团结又斗争的过程。

中共代表团第一次同蒋介石会谈时，蒋介石说得很好，并达成了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两党草拟共同纲领的协议。根据第一次两党关系委员会推定由周恩来、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当周恩来把草案拿出来讨论时，国民党方面代表却要移至下次再谈，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两党关系委员会也形同虚设了。

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我党曾提出过三种形式：一、恢复 1924 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形式，将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同盟，其他党也加入；二、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各级共同讨论；三、现在这种形式，遇事协商。但蒋介石拒绝了前两种形式，只剩下临时协商。所以国共两党关系并没有实质性进步，临时协商，主要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进行。

1938 年 2 月初，国民党发动了一场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宣传运动，他们利用《扫荡报》、《武汉日报》、《血路》、《抗战与文化》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共文章。

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挑战，必须坚决予以回击，2 月 10 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陈立夫，说明《扫荡报》等这种宣传运动的严重后果。蒋介石假惺惺地表示：对主义的信仰并不准备加以限制，中山先生已经说过，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修改或反时；对各党派也无意取消或不容许它们的存在，只愿溶成一体。周恩来当即重申：我党一贯的立场，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回答：可以研究。陈立夫提出，能否在两党以外组织一个由双方共同参加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周恩来当时还不明白他们的意图。蒋介石又说，《扫荡报》的言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他个人意见。陈立夫补充说：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自此以后，这类宣传确实少了。一场违背大势不得人心的反共叫嚣暂告收场，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思想和行为，从来没有变化。

为了进一步阐述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3 月 12 日，周恩来利用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的机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题为《怎样纪念孙先生的伟大》的文章。他说，孙中山先生的一个伟大特点，就是善于联合各种革命力量，“他根据每一个时期革命的需要，能将当时各种革命力量革命组织，特别看重的是群众组织联合一起，共同努力！”“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正是目前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极端需要的。”

国民党不愿意搞国共两党共同纲领，但他们要抓抗战建国的旗帜。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宣言和纲领表示要坚持抗战，在抗战胜利后，要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4 月 27 日，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认为国民党的这个纲领同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应该坚决赞助其

实现”。国民党这次代表大会还宣布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说：“我们党对国民党一切口头上要做的好东西，如扩大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6 月 9 日，周恩来见蒋介石时，根据党中央的意见，提出应使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来统一全国的青年运动。蒋介石坚持各党派不能在三青团内进行活动。这样，三青团就成为国民党的御用工具了。

1937 年 8 月，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在南京时，就同国民党谈判取得了关于将南方八个省边区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协议。当年 9 月 28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 月，中共中央决定项英为新四军副军长。但新四军的编制问题尚未达成协议。12 月下旬，叶挺、项英都到达武汉，接着，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等也到了。周恩来、叶挺同何应钦谈判后，确定新四军辖四个支队（相当旅），长江以南各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组成一、二、三支队，集中到皖南地区；在鄂豫皖边区的组成第四支队，就地集中后也开到安徽。在武汉组建军部，然后转到南昌指挥部队集中。12 月 25 日，叶挺、项英在汉口召集了军部机关干部大会，宣布新四军军部成立，在汉口大和街 26 号挂牌办公。1938 年 1 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中共提出的新四军支队以上干部名单、薪饷等。l 月 4 日，项英率军部人员转到南昌。固恩来、叶剑英和叶挺商定，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兼新四军驻汉办事处。同时，党中央和长江局还派了负责干部到南方分头传达党中央的政策和组建新四军的意义，使部队按时集中。

长江局对南方各省边区红军和游击队集中北上后的地方党的工作，也进行了讨论和布置。认为武装集中后，党的组织仍应存在并进行活动，但党组织要严守秘密，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要适应抗日统一战线的环境，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要进行适当的斗争。

周恩来还同蒋介石就承认陕甘宁边区、补充并扩编已在敌后发展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问题，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谈判，并提出过许多合理要求，蒋介石总是敷衍搪塞或故意拖延，所以一直没有解决。由于要抵抗日寇的进攻，蒋介石表面上表示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可是一涉及到党权、政权、军权的问题，他就抓着不放，不解决任何实质问题。

如果说国共谈判中有解决得比较顺利的问题的话，就是《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出版发行。周恩来、博古在南京时曾指定刚出狱不久的潘梓年、章汉夫等开始筹备。因南京危急，他们转到汉口，找到办公地址和印刷厂，并增加了工作人员。因武汉市国民党当局在注册登记上找了些麻烦，他们决定先出版《群众》周刊，该刊于 12 月 11 日创刊，社长兼主编潘梓年，副主编许涤新。12 月 21 日，王明、周恩来、博古会见蒋介石时，周恩来又向蒋介石提出出版《新华日报》的问题，蒋介石表示同意。长江局为准备《新华日报》的出版决定成立党报委员会，以王明为主席，对外另设董事会，王明为董事长；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华岗，总经理熊瑾玎，编辑主任章汉夫。1938 年 1 月 11 日《新华日报》正式出版发行。

《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第一张大报和理论刊物。在报纸出版的前两天，《新华日报》社宴请武汉市长吴国桢和文化、新闻界知名人士沈钧儒、张西曼、张志让、邓初民、洪深、张申府、刘清扬、胡秋原等，以及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苏联记者罗果夫等。王明宣布：“《新

华日报》的努力方向，就是中国人民今天所共同努力的方向，即一、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三、为达到上述救国建国的目的，必须尽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华日报》愿与武汉文化界、舆论界朋友共同努力。”《新华日报》一出版就轰动了武汉三镇，发行网也日益扩大，一直到各省、市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及海外各国。题词祝贺《新华日报》出版的有国民党要人孔祥熙、于右任、冯玉祥、张治中、邵力子、白崇禧、王宠惠、陈铭枢、吴国桢等；知名人士沈钧儒、郭沫若、沙千里、方振武等。周恩来、王明、董必武、博古、叶剑英、叶挺、徐特立等同志也题了词，并分别在报上发表。

《群众》周刊，是理论性刊物，虽然读者没有《新华日报》那么广泛，但它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抗战胜利的必然性，阐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从理论上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团结的错误以至鼓吹投降妥协的谬论，所以深受各党派爱国人士、知识界的欢迎。

《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经常登载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等人的文章，认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围绕坚持全民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题，展开了多方面的宣传。针对一些错误的舆论进行适当的批评；对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谬论，用八路军的战绩给以驳斥；对散布对日妥协投降论调，给以严肃批判。《新华日报》在报导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战斗胜利和民主建设事迹的同时，也热情地报导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事迹。

《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每期都给延安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寄送，也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和中央机关以及前方部队的欢迎。事实上，处于秘密活动中的党组织和党员，就是通过《新华日报》来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形势的。许多爱国青年，也是通过阅读《新华日报》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武汉危急时，长江局即决定先派总经理熊瑾玎率部分人员到重庆筹建《新华日报》重庆馆，以便武汉失守后即在重庆接着出版。经过许多艰苦工作，又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协助下，在 10 月中全部准备妥当。日军迫近武汉时，只留章汉夫、林肖硖等七人坚持出版。10 月 24 日深夜，周恩来偕同秘书陈家康来到报馆，他口述了 25 日发表的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社论宣告：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人民手中。周恩来核批后即当场交工人排印出 25 日报纸清样。这是在武汉出版的最后一张《新华日报》清样，编号是 287。正付印时，日军已逼近市郊，要立即撤退，这一天的报纸没有出版。这张清样，也因战争环境没有保存下来。重庆的《新华日报》即于 10 月 25 日接着出版，继续担负起它的光荣任务。

## 出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

武汉时期国民党采取改善国共关系的一个重大措施，是邀请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1938 年初，蒋介石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改组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之前，国民党军队是没有政治部的，只有政训处。当时在武汉委员长行营中有个第六处（即政训处），陈立夫任处长，政治部是把第六处改组和扩大后成立的。下边设四个厅：总务厅，管行政；一厅；管军中党务；二厅，管民众组织；三厅，管宣传工作。蒋介石任命曾在十年内战中对中央红军进行过五次“围剿”的司令陈诚当部长，为表示对国共合作的诚意，蒋介石要陈诚亲自登门相请在大革命时期已充分显示出政治工作才能的周恩来出任副部长，为政治部撑起门面。这时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看中了周恩来这个人才，要副院长张群出面邀请他到行政院任职。周恩来和代表团研究后认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都没有解决，只周恩来个人参加到行政院或政治部，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能给国民党装门面，所以都婉言推辞了，并报告了中央。但蒋介石坚持要周恩来做政治部副部长，周再三推辞说，做副部长可能引起两党磨擦。蒋仍要周做，并表示不要怕磨擦，可以避免磨擦；政治工作方针是加强部队，发动民众；副部长职权可明确规定，能负其责；编制人事还未定，都可以商量；康泽（注：特务头子，已定为政治部二厅厅长）可以共事，不致捣乱。中共代表团研究后致电党中央说，政治部属军事范围，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我党影响，可以去担任职务。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有所借口。经过党中央同意，周恩来就出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抗战初期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出任的唯一重要职务。

蒋介石邀请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同时，还邀请从日本回来不久的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是有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1926 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并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途中，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起义军到广东潮汕失败后，经周恩来同意流亡日本十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上海，随即恢复了党的秘密关系。蒋介石是想利用郭沫若的声望来给他罗致人才。

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和郭沫若任职，是为了表示国民党“改组政府机构”。他还任命由邓演达（因反蒋被蒋杀害）组建的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当政治部副部长做陪衬，给他们以空头官衔，实权却掌握在蒋的亲信陈诚、贺衷寒、康泽等手里。

同蒋介石打过长期交道的周恩来，当然不会上他的当。周恩来向陈诚表示接受政治部副部长职务后，马上提出他拟起草《政治工作纲领》送呈蒋介石批准后，才能就职，否则思想、言论、行动都不统一，不好办事；他分工管三厅，他和郭沫若负责把抗日宣传工作搞好。陈诚一直是指挥枪杆子打仗的，不熟悉政治工作，只得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郭沫若本来不愿意到国民党机关去任职。加以陈诚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安排军统的刘健群任三厅副厅长去抓实权，又以请客吃饭名义骗郭沫若去参加他的“第一次部务会议”，还在会上大谈“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这些，都使郭沫若十分恼火。为了抗议国民党的这种做法，郭

沫若经周恩来的同意，离开武汉到长沙。2 月 1 日，政治部下属各厅除第三厅外，都已组成并开始工作。而副部长周恩来、第三厅长郭沫若都没有来，这使蒋介石和陈诚十分难堪。恰巧，刘健群因桃色事件离开武汉，由司法行政专家范扬任三厅副厅长，使事情出现转机。周恩来认为应从速把第三厅建立起来，以便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所以他派于立群（郭的夫人）带信到长沙，请郭沫若回武汉。

4 月 1 日，三厅正式成立。

郭沫若找阳翰笙（著名戏剧作家、党员）做他的主任秘书，协助他搞编制、安排人事和计划。按政治部组织规定，厅以下设两个处，每处三个科。在筹备中，蒋介石“手令”，第三厅要设个对敌宣传处，就成了三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胡愈之（文化界名人，救国会领导成员、中共秘密党员）任处长；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由田汉（著名戏剧家）任处长；第七处，掌管对敌宣传，由范寿康任处长。4 月 1 日，三厅正式成立，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如：张志让、洪深、杜国庠、冯乃超、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洗星海、张曙等都参加进来，真可谓群贤毕至。

周恩来决定出任副部长以后，亲自动手起草《政治工作纲领》，并指导三厅的组织和人事安排。三厅的问题基本解决后，他和郭沫若在 3 月 28 日才第一次出席政治部部务会议。

周恩来经常同郭沫若、阳翰笙、田汉、胡愈之等处长和科长研究工作。他针对一些党员不愿在三厅替国民党撑门面的思想，严肃地指出：我们到三厅，不是做官，而是工作、斗争，而且是一种非常尖锐复杂的斗争。我们应有高度的警惕性，要有很高的策略思想，不要盲目乐观，但也不要悲观。国民党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我们就宣传我们党的“十大纲领”，各人宣传各人的。对他们那一套，我们是不管、不理、不睬，怕它什么？为了在三厅实现党的领导，在三厅领导层组织一个秘密党小组，在各处的干部中组织一个秘密党支部，由冯乃超任支部书记。两个组织不互相来往，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支部则同南方局组织部联系。

政治部设在武昌，周恩来住在汉口第十八集团驻军汉办事处，所以他每天上午九时前就要过江赶到武昌政治部上班，或进行统战活动，晚上又要过江回到汉口来，处理许多急于处理的事情，因而，常常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召开代表团和长江局的联席会议。因为要汇报情况和讨论问题，会议常开到深夜，有时到凌晨才能结束。董老年纪较大，会开得太晚他常常要在躺椅上打个盹后再起来继续开会。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还要起草给中央的电报或审批李克农交来的情报，有时还要找同志谈话，所以他每天都睡得很晚，有时一直到天亮才能休息。如果上午有约会，他照样按时赴会。我当时是长江局的秘书兼机要科长，代表团和长江局开会，我做记录，因为白天整理记录、送记录（当时规定，头天晚上会议记录，要在第二天整理出来，经秘书长核批后，还要送给到会的人看和签名）、传阅电报，已经很累，所以一到晚上开会做记录时就常常打瞌睡，甚至做梦。有时乱划，第二天整理时，自己也不认识了。会完了，又要到周恩来办公室等电报，我拿到电报送机要科译发后才能入睡。周恩来找人谈话多在下半夜，有时还要排队。平时李克农也是住在长江局的，但有一天他的夫人赵瑛带孩子从安徽逃到武汉来，办事处钱处长安排他们一家到原来董老住的安仁里去团聚。当时周恩来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也没有说，临时有事叫李克农来，那时“工作第一”的观念很强，

就派车子把李克农接来，周恩来叫他坐在我的房子里等。等到其他同志谈完后己经天亮，周很疲劳想休息，叫李克农明天再谈。李克农白等了一夜，只好“ 哑子吃黄莲 ”了。

周恩来在政治部有个秘书叫谌志笃，是 1919 年在天津就认识的老朋友，忠实可靠，住在政治部。随身副官是长征战士廖其康，司机是从上海来的祝华（党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他一辆美国福特小轿车，来回过江时得搭军用码头的渡船，但当时日机常轰炸，一响防空警报轮渡就停驶了，无法按预约时间到办公地点，但是周恩来是闲不着的，他总是利用躲空袭的时间去看朋友或约人谈话。1938 年 5、6 月间，日军向武汉紧迫，武汉大学开始在大后方疏散，在珞珈山的一些教授宿舍空出来了，政治部要了三套分给周恩来、黄琪翔、郭沫若居住，这样到政治部开会、办公就较方便，同郭沫若和三厅同志的来往也更密切了。

三厅成立后打响的第一炮，就是举行了抗战扩大宣传周。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中共领导的在国民党区域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周恩来对这次宣传周的目的、方法等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说，这次扩大宣传，一要扩大宣传的对象，二要扩大宣传的范围。他要求宣传要深入到工厂、农村的劳动阶层中去，要扩大到前线部队中去，以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抗战意识和鼓舞激励战士的杀敌情绪。文字、图画等宣传品要通俗易懂，要迅速输送到前方部队，并派宣传队到前方和后方医院慰劳。

4 月 7 日，扩大宣传周的第一天，恰巧传来了李宗仁指挥的部队在台儿庄取得了歼灭日军万余人的大捷。这个消息在当时日寇步步进逼，我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是十分鼓舞人心的。上午，整个武汉市都欢腾起来了，抗战歌声、口号声、鞭炮声连续不断。这就增加了宣传周的热烈气氛。周恩来、郭沫若和三厅同志临时决定，把下午的宣传周开幕大会和庆祝台儿庄的胜利大会结合起来，并在大会后举行火炬游行。除了通知各自带火把外，阳翰笙还亲自带人到江边向渔民购买废纤籐火把；运到大会场。大会进行得很顺利，到会人数超过计划好多倍，火炬游行队伍也不断扩大，据估计，武汉三镇共有四五十万人参加。有些参加过北伐的同志说，北伐军打到武汉时，也没有这样的群众场面。

4 月 8 日，发表了周恩来等的专论《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大会和火炬游行。

看到人民群众真正觉醒了，国民党当局有些人害怕起来，千方百计对人民的抗日宣传加以限制或破坏。开始，他们借口宣传品中有一本歌颂台儿庄大捷的大鼓词，内容不妥，扣压下来，后来又说宣传品中使用“ 人民 ”、“ 祖国 ”、“ 岗位 ”等词不妥，强令改成“ 国民 ”，“ 国家 ”和“ 职务 ”加以刁难，遭到郭沫若严词驳斥。接着张厉生又提出组织审查委员会的主意，又被郭沫若坚决顶了回去。最后，发展到康泽直接指挥其喽啰坏群众大会。尽管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捣乱破坏，这次宣传周依然搞得很成功。

通过这次抗战扩大宣传周，三厅的名声大扬。原来有些人认为那些拿笔杆子的先生们，是否能有组织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本事，事实证明只要有党的领导，他们就能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长江局听了三厅党组织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关于这次宣传运动的汇报，认为这次宣传运动是成功的，应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准备在七七抗战一周年时，举行更大规模的抗战宣传活动，同时也要准备同国民党的当权派进行必要的团结与斗争。

三厅成立后震憾人心的一次宣传活动，是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

台儿庄的胜利，并没有阻止日军的进攻。5月19日日军攻占重要战略要地徐州后，又于6月12日攻占安徽的安庆。接着就兵分五路向武汉进逼。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高喊“保卫大武汉”了。为了鼓舞军民的抗战意识，周恩来先同三厅的党组织研究决定，要大规模地举行“七七”一周年纪念活动。周恩来说，要唤起每一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6月下旬，三厅即积极进行筹备，郭沫若拟了宣传计划，包括举行献金活动。计划很快得到陈诚和蒋介石的批准。因为蒋介石在武汉紧急时，也需要动员群众来“保卫大武汉”，并利用这个机会宣传他这个抗战领袖领导抗战一年的“功绩”。他批准计划后还破例地单独接见郭沫若，并当场批了1.5万元的特别费。郭沫若既奉了“圣旨”，又拿到了钱，实行计划就应该是通行无阻了。可是陈诚既怕动员群众过多，又不相信群众为了抗战愿慷慨解囊，忽然反对献金活动。他认为“有钱的人不愿献，愿献的人没有钱”，献金一定失败，失败了会影响国际观瞻，因为武汉有外国记者。由于郭沫若的坚持，并说是蒋委员长批准的，他才作罢。陈诚还怕募捐失败，他答应政治部献金一万元。武汉市长吴国桢也答应武汉市献金三万元。

纪念活动按计划顺利地进行，从7月6日起一连三天，每天分别在汉口、武昌、汉阳举行大会，晚上火炬游行，群众情绪十分高昂。活动的高潮是“七七”的献金台上。

一清早，各处献金台周围都挤满了人，献金的人争先恐后，络绎不绝地走上献金台，对灾难的祖国贡献一片心意。献金的人有国民党官员，有工商资本家，最感人的是穿着破衣的工人、农民、小学生、老太婆，还有乞丐。

给群众印象最深的是由中共代表团、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献金团”。那天，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参加了这项有意义的活动。我们乘坐的汽车挂着“中国共产党献金团”的横幅，格外醒目。沿途受到行人鼓掌欢迎。我们到达汉口江汉关献金台时，群众情绪达到高潮。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将1000元党费献上，接着，周恩来走上台献上在政治部7月份的薪金240元，王明、董必武、博古、林伯渠、吴五章、邓颖超六位参政员7月的薪金每人各350元（毛泽东在延安也打来电报捐献一个月参政员的工资），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战士捐献伙食节余1000元，叶剑英、李克农、钱之光、李涛、边章伍7月份的生活费各5元，我和赖祖烈、邱南章7月份的生活费各4.5元，廖似光、孟庆树、刘群先、龙飞虎七月份的生活费各4元，警卫员巴芳廷、刘九洲一个月生活费只有2.5元，也都捐献了。当群众知道了八路军将士的每月生活费最高只5元，低的才2.5元，现在又慷慨捐献时，都深为感动。在武汉的影响下，有些大城市以及香港和海外华侨，也都采取不同形式，为抗日战士进行募捐活动。周恩来还鼓励著名演员金山、王莹等到南洋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演出并募捐，取得了很大成绩。

由于周恩来、郭沫若的正确领导，阳翰笙、胡愈之、田汉、冯乃超等同志及三厅的中共党员、进步文化人士的共同努力，使三厅成为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不仅在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在斗争中提高了三厅全体人员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周恩来除了通过三厅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外，还利用各种机会和

方式，向陈诚提出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建议。他曾以进步人士李公朴、《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和《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等在前线搜集的部队政治工作薄弱和士气不振等材料，向陈诚提出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具体建议，受到陈诚的重视，并采取一些措施，收到实效。在这之前，周恩来还专门写了《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系统地阐述了抗战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内容、组织和方法。特别重要的是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的论点。此书曾在延安解放出版社作为《民族解放丛书》出版，在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队中都深受欢迎。

## 广泛开展各界统战工作

1938 年武汉长江局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与发展，开拓了一个更深更广的新局面。不仅在国内，而且也发展到港、澳和海外华侨集中的地区，以及国际方面。中共代表团、长江局的领导成员和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干部都做了许多统战工作。而交朋友最多、最广，又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和尊重的，首先要算周恩来。

国民党上层人物，不论是党政军，几乎都是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老朋友。不论他们的政治态度属左中，还是属右，周恩来都和他们恳切交谈抗战建国的意见，阐述中共的方针、政策。他同张治中、邵力子、张冲等关系都很密切，可以推心置腹地交谈各种问题。

当时的国共合作，主要是表现在共同抗战方面。所以，周恩来和长江局着重军事统战工作。长江局办公楼住着周恩来、叶剑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两个中将衔的将军，在三层楼上住着边章伍、张经武、聂鹤亭、李涛等十八集团军的高级参谋。王明曾口占一对子：“一门二中将，三楼四参谋”，形容长江局将才济济。还有罗瑞卿、张爱萍、罗炳辉等也都在长江局做过军事统战工作，同各地方派系的人物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促进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战争。

冯玉祥是原西北军的领袖，他一向爱国，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大革命时期，冯玉祥曾主动要求中共派党员到西北军做政治工作，刘伯坚、邓小平、宣侠父等都曾在他那里工作过。1927 年 6 月，冯玉祥与蒋介石、汪精卫联合反共，但他只是把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而没有捕杀。1930 年他同阎锡山发动反蒋战争失败后，隐居泰山读书时。请张友渔（秘密党员）等人给他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他身边一直有我党秘密党员（如赖亚力）在工作，所以他对中共的方针政策比较了解。虽然蒋介石又给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空头职务，没有实权，但他在西北军中还有不小影响。开始，他对直接和中共负责人见面还有顾虑，怕特务打小报告。周恩来便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名义，穿上军装登门拜访，相互交谈对抗战形势和前途的看法。周恩来针对抗战前一段华北和上海、南京作战的失利，阐明中共要动员全民参加抗战，主张同日军打运动战配合阵地战和游击战等。冯玉祥完全同意，并表示谈得很畅快，周恩来对抗战形势和前途的精辟分析和交谈中谦虚诚恳的态度，给冯玉祥留下深刻的印象，冯在当天的日记里对周恩来写下这样的评语：“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冯曾对他周围的人感慨地说：“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后来又在会客室写下八个大字：“吃饭太多，读书太少”。冯玉祥在国民党高层人物中是比较喜欢读书的，但在周恩来面前，他感到读得太少了。不久，他又主动找周恩来。当周恩来把日益严重的国共磨擦事件告冯时，他对“自己不努力，反要阻止他人活动”的人表示不满。周恩来还同他商量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积极支持，赞同由老舍主持文协工作，并邀请中共派人给他的随从人员讲政治课、游击战术等。他还主张派人去延安学习，给延安图书馆捐赠一批图书。从此，冯玉祥与中共的关系日益密切，周恩来同冯玉祥之间的友谊也不断加深，到重庆时，更加亲密了。这对于我党以后争取冯的旧部孙连仲、高树勋、何基沣、张克侠等都有重要影响。

白崇禧是桂系的首领之一。他参加“四一二”的反共大屠杀，残害过共

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后来红军长征到广西全州附近时，又指挥桂军猖狂拦击，使红军受到较大损失。但白崇禧和两广的其他首领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是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战的。西安事变时他们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1936年中共中央曾派人同他们联系，白崇禧在军事上有些本事，素有“小诸葛”之称，虽然反过蒋，但蒋仍重用他。“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用专机接他到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蒋介石为了利用战斗力较强的桂军参加抗战，还委任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徐州），并把桂军主力都调到第五战区。

周恩来把开展对白崇禧、李宗仁的统战工作当做重要任务。周任政治部副部长后，同白崇禧常常见面。1938年2月，广西学生军开赴前线途经武汉时，白邀周向学生军做抗战形势报告，介绍八路军敌后抗战经验。3月中，日本侵略军沿津浦线向徐州进逼，蒋介石派白崇禧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行前，他接受黄琪翔的建议，秘密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到他家里，请教对敌作战方针。黄琪翔、刘斐也参加了。周恩来向白崇禧建议，在津浦路南段，用桂系两个集团军兵力，在新四军第四支队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配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威胁津浦南段的敌军，使他不敢北上支援南下敌军；而在徐州以北，以主力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周恩来提到，徐州战役是大战役，有中央军和各系军队参加。因此，李宗仁必须有统一指挥的主权，特别有指挥中央军（如汤恩伯）的权力，才能行动一致，密切协同作战。这一点同白崇禧的看法完全一致，因为蒋介石保存嫡系力量牺牲杂牌部队的事，他们是深有体会的。白崇禧对周恩来的建议，甚为赞赏，他到徐州协助李宗仁作战时，基本上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同白崇禧谈话后，又商定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徐州去见李宗仁，劝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同日军打一仗，以振抗战军威，同时也可提高广西军队的威信。张爱萍到徐州见李宗仁，说明周恩来、叶剑英派他的来意后，详细分析了当前敌我形势和在济南、徐州间同日军打一仗的有利条件。特别指出，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面有八路军的战略配合；新四军支队可在津浦线以游击战破坏交通，集中力量在台儿庄一带山地打一个大仗是可能取得胜利的。李宗仁对此感到高兴，要张爱萍转达他对周恩来的感谢。1938年4月7日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国民党军队抗战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歼灭了日本侵略军矶谷师团万余人。这一胜利，挫败了日军的骄气，提高了中国军民的斗志，也得到了国际赞誉。《新华日报》对此次胜利作了充分报道，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金山、王莹领导的演剧二队曾到前线作慰劳演出，又编了《台儿庄之战》在海内外演出。这一胜利，实际上也是国共两党军事合作的胜利。

台儿庄胜利后，党同桂系的关系更密切了。7月，李宗仁到汉口时，周恩来在珞珈山寓所设宴招待，畅谈加强团结抗战问题。周恩来向李宗仁提出，战区应建立文化机构，以加强对军民的抗战宣传教育。李表示同意，10月，第五战区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由著名文化人士钱俊瑞（秘密党员）任主任，吸收了一批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去工作。

程潜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进步人士李世璋任一战区政治部主任，他是周恩来的老朋友，周介绍张友渔到该政治部任设计委员，对程潜进行统战工作。当时，河南大军云集，包括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各系统，周恩来和长江局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加强对各军队的统战工作，省委

为此成立了统战委员会，开展了对商震、张轸、于学忠、冯治安、何基沣等部队和地方国民党官员的统战工作，使河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组织都得到很大发展，也为以后敌后的武装斗争，准备了条件。

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是冯玉祥旧部，卢沟桥抗战的名将。1938 年初到汉口时，周恩来请他到八路军办事处会面。周称赞何说：“ 中山陵前，出了个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卢沟桥上，出了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沣将军。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使何深受感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他去延安参观，何表示同意。于 2 月秘密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何离开延安前，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 1 月，党中央批准他为秘密党员。河南省委通过何以七十七军工作团名义，派了 200 多名青年到他驻地桐柏山脉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以后开展敌后武装斗争打下基础。1948 年淮海战役开始阶段，何基沣和另一秘密党员张克侠率须所属七十七军和五十九军大部起义，对华东野战军得以顺利通过他们的防区直插徐州城下，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部队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参加解放战争。

在川军中，早就有党的工作，张曙时、田一平等已参加了刘湘的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1938 年 1 月川军首领刘湘病逝后，邓锡侯率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到山东参加抗战。2 月间，邓从河南前线到汉口，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他，希望川军同八路军、新四军协同作战。邓返河南后，曾几次给新四军支援枪支弹药。第二十二集团军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打得很勇敢，该部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战斗中牺牲，灵柩抵汉时，中共代表团参加了致祭，《新华日报》发了专文致敬。第一二二师师长陈离负伤到汉口医治，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前往医院看望，使陈离深为感动。陈和我党早有联系，在前线时，给了新四军不少支援。邓锡侯、陈离后在解放战争时都率部起义。

对云南滇军，周恩来、叶剑英也做了许多工作。1937 年 8 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防会议，9 日，龙云由昆明飞西安，朱德（早在云南时就同龙云相识）、叶剑英和龙同机（我也随行）到达南京，在机上就亲切交谈。到南京以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又同龙云继续会谈，并商定建立经常联系。1938 年初，滇军第六十军北上抗日，经过武汉，该军第一八四师师长张冲（他同龙云都是彝族），到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叶剑英、罗炳辉（云南彝族）接见了他，并答应张的要求，派党员薛子正、张子斋等到该师工作。薛先任张冲的秘书，后任师参谋长，以后又任第六十军军长卢汉（彝族）的随从参谋，对卢汉直接进行统战工作。滇军在徐州战役中打得英勇，我党的工作也起了重要作用。

长江局根据中央要加强华侨工作和国际宣传工作的指示，1937 年 12 月 27 日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廖承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香港是“ 国际宣传及华侨运动的中心地区 ”，旋即派廖承志、潘汉年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香港公开活动。周恩来在汉口同英国大使卡尔打了招呼，廖承志要在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以便接受、转运华侨及外国友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捐赠，请他通知香港政府。英大使表示愿予协助。1938 年 1 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廖承志力主任，潘汉年协助。周恩来指示廖承志，在香港要大张旗鼓地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募捐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宋庆龄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于 1937 年 12 月离开上海到香港，对华侨和国际友人宣传中国的抗战，号召他们以物资支援中国。1938 年 6 月，以宋庆龄为主席，

廖承志为委员兼秘书长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塞尔温·克拉克夫人、诺曼·弗朗斯等为委员。“保盟”一方面向国际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和需要，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为抗日军队特别是在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募捐药品、救护车、医疗器械和物资；一方面把捐献的物资大部分都交给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转运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再转送延安和前方，也动员了不少华侨回国参加抗战。

在武汉，周恩来和王明、董必武、博古、叶剑英等也做了很多华侨和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直接领导了长江局的国际宣传组工作，组长王炳南，组员章汉夫、陈家康、王安娜等。他们还组织了一批专家，翻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向共产国际刊物和外国杂志提供中国抗日战争情况，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战绩；同驻汉口的外国记者建立经常联系，给他们提供《新华日报》和延安新华社的新闻资料，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歪曲事实的宣传。

周恩来、叶剑英还代表八路军接见前来捐献的华侨代表。周亲自给泰国华侨杜英回信，回答他提出的有关抗战问题。这封信在《曼谷日报》发表后，轰动了泰国华侨社会。

周恩来和外国记者与作家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贝特兰、鹿地亘夫妇等，都有密切联系。

1938 年 1 月 20 日，由加拿大白求恩大夫率领的一个医疗队到达武汉，要求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工作。周恩来和博古很快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他，向他们表示欢迎。周恩来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交代八路军办事处钱之光处长，派人护送白求恩一行坐火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

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是应宋庆龄邀请来华拍摄新闻纪录片的。他在津浦前线拍摄战地纪录片后到汉口，周恩来特地到旅馆去看他。伊文思向周恩来要求去延安拍片，但国民党不让他去。周同伊文思商量，在汉口拍一组中共代表团研究抗战形势的纪录片。因为他没带照明设备，只好把一间采光较好的房间布置成会议室，墙上挂上列宁、斯大林画像和八路军敌后作战地图。又把许多张锡纸贴在几块木板上作反光板，伊文思当了导演，在办事处找了几个人当助手，爬到窗户外面把太阳光反射到房间里。然后，要叶剑英穿上军装，缀上中将领章，站在地图前面。再要周恩来、王明、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凯丰、李克农等人入席当“演员”。导演一声开始，叶剑英就拿着棍子在地图上指画，“演员”们一齐看着地图，伊文思的摄影机就滴滴嗒嗒地拍起来了。我也不含糊，拿着康泰司照相机沾光拍了几张，这才知道电影是这样拍出来的。伊文思以后把这组镜头编到他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四万万人民》的影片中。后来伊文思回忆说：“这次访问认识了周恩来，并得到他许多关照，也了解了中国的许多真情，同时也因此对周恩来的伟大、深谋远虑和文武全才有所体会。”伊文思又把他这架摄影机和三盒胶卷送给办事处转给延安，希望延安建立自己的电影队伍。周恩来动员了摄影家吴印咸到延安，就把这架摄影机和胶片送到延安。不久，周恩来又批准了电影名演员袁牧之、陈波儿到延安，并从香港买来一架摄影机和一些胶卷，交他们带回去。这样，就以他们几个人为骨干，又吸收了徐肖冰等青年，建立了摄影队，拍摄了许多有历史意义的电影片。

5 月 25 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王明、博古、吴玉章等在汉口一江春餐

厅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各党派、各群众团体以及日、美、英、法、苏、荷等国际友好人士 400 多人出席。周恩来、王明、学联代表和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先后讲了话，体现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团结与决心。周恩来又曾安排了世界学联部分代表到延安参观，也受到热烈欢迎。通过这次招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

6 月的一天，周恩来、邓颖超约了斯诺到武昌珞珈山寓所畅谈，从 1936 年在陕北初次见面谈到目前中国抗战形势。周恩来一再感谢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中外的影响，使广大读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揭穿了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希望他继续真实地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欢迎他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去采访。斯诺表示很高兴，愿意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报导。谈后他们共进午餐。周恩来、邓颖超都很高兴，邓大姐穿上一件新做的白底蓝格的旗袍，事先要我带照相机去，给他们合影留念。

不久，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 · 艾黎从上海到汉口，和斯诺等筹建“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简称工合）。主要是通过“ 工台 ”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中募捐。他们计划在全国各地组织工业合作社，建立小型工业，生产抗战必需物资，解决失业工人的生活困难，同时也进行一些文化事业的建设，如办学校等。周恩来接见了艾黎，并积极支持他们的活动，还介绍了一些党员和进步分子协助他们工作。“ 工合 ”总会在汉口成立，武汉失守后，迁到重庆，在西北、西南各地也都开展了“ 工合 ”运动。艾黎还把一些募捐来的物资送给延安。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支持下，“ 工合 ”迅速发展成为积极支持抗战和有一定国际影响的社会团体。

9 月 29 日，由队长阿尔泰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汉口。其中有柯棣华、巴苏等大夫。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在屋顶花园举行招待会。10 月 7 日，刚从延安开会回到汉口几天的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会客室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也请了印度援华医疗队参加。巴苏大夫在当天的日记里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去看望周恩来同志，他正在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部分是外国人。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倾听他透彻地分析中国军政局势，以及阐明怎样通过全面发动群众抗击敌人……。他侃侃而谈，精力充沛，学识渊博，长着一对机灵、谨慎的眼睛，还有中国少见的浓眉。看来他好像连每天刮脸的时间都没有。电话和通讯员不断地打扰着招待会。 ”“ 见到我们，并得知我们要去八路军那儿，他显得非常高兴。他说八路军将会给我们最热烈的欢迎。 ”

周恩来就是以他坚定的政治信仰、精辟的分析能力、渊博丰富的知识和诚恳谦虚的态度，赢得了众多国际友人的尊敬和同情。

周恩来除了同苏联驻华大使和武官保持经常联系外，也会见过英、美驻华大使，肯定他们国家某些援华措施，同时指出对日本侵略者采取“ 不干涉 ”和“ 绥靖 ”政策的危险性。美国罗斯福总统号召全美募捐百万美元救济中国时，周恩来会见了美国总领事戴维斯，代表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在武汉进行的国际交往，在国际上发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对外事工作的垄断，也为党的外事工作开了好头，为以后的外事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 武汉三镇的日日夜夜（下）

## 恢复和建立南方各省党组织

上地革命时期，由于党内“左”倾错误和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使南方各省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1935 年至 1936 年间，上海和北方的党组织曾分别派人到四川、湖南、广东、云南等地去恢复和联系了一些党组织。1937 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党中央又陆续派人到南方各省恢复和建立了一些党的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周恩来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比较熟悉，派出去的负责同志，大多数他都亲自谈过话。经周恩来和国民党谈判，“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陆续在上海、苏州、南京等地释放了一批党员。1937 年 8、9 月，周恩来、叶剑英和博古先后到南京，又营救了一大批同志出狱，经过审查，派陶铸、钱瑛、刘顺元等同志到湖北、安徽等地参加党的领导工作。1937 年 9 月，中央派了董必武到武汉，徐特立到长沙，指导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长江局成立前，在所辖范围内，已建立河南省委（朱理治为书记）、湖北省工委（郭述申为书记）、南方工委（张文彬为书记，指导广东、广西、云南党组织）、江苏省委（刘晓为书记）和湖南特委（任作民为书记）。四川省工委是 1937 年 10 月中央组织部从延安派邹风平、廖志高等到成都建立的，邹、廖分别任正副书记，当时直属中央。云南、贵州、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尚未建立统一的省级党组织。总的说来，南方各省党的组织力量是薄弱的，不能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1937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长江局时，曾明确提出：“特别在南方各地更要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要考查旧组织，建立新组织，着重建立地方党部与支部。”1938 年 3 月 15 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长江局认真执行了这些指示。

在没有省级组织的地方，建立省级组织。1937 年 12 月底，中央派了高文华、郭志洲等四人由延安到达汉口，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同他们谈了话。周思来说，湖南的工作已有基础了，你们四人去加强工作，并通知任作民来汉口汇报工作。1938 年 1 月 7 日，长江局开会讨论湖南党的工作，高文华、任作民都参加了。会议决定，特委改为省工委，高文华任书记，任作民为委员。2 月，根据中央批示，决定由邓止戈、秦天真等人组织贵州省工委，邓止戈为书记。3 月，改组广西工委，黄松坚任书记。4 月，撤销南方工委，建立广东省委，张文彬为书记。根据中央指示，从 4 月起，四川省工委由长江局领导。3 月底，长江局听取了由四川到汉口的罗世文汇报，讨论了四川的工作，并派程子健去任宣传部长。周恩来很关心四川党的工作，早在 1 月 21 日，他为长江局起草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四川已无疑地成为抗战最后根据地，成为连接西南和西北的枢纽，而且很快地会变成全国各党派、各实力派争夺的中心”，但“目前党的工作却极落后”，应该“迅速加强四川党的工作”。并请求中央派得力的川籍干部去四川主持党的工作；在延安各学校选派一部分四川籍学生回川工作；努力发展军事工作；运用上层统战关

系推动四川实力派抗战等。中央很快复电同意。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对开展四川党的工作发生重要作用，为以后南方局的工作做了重要准备。同时，长江局决定在皖中工委、安徽工委的基础上，组成新的安徽省工委，彭康为书记。关于南方十个游击区的党组织，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了十个特委。随着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在长江局和东南分局领导下，浙江、福建、江西都建立了省的领导机关。

省级领导机关建立以后，除建立组织、宣传部门外，根据各省工作开展情况，逐步又建立军事、民运（工青妇）、统战、文化等部委，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当时各地的救亡团体和文化团体很多，许多都是在党员和进步分子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

根据中央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南方局一方面强调要打破关门主义倾向，另方面又强调要讲求质量，除了在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外，同时要注意在工厂中吸收老工人、农村中吸收贫雇农。对新党员的教育，南方局指示组织新党员学习除党的基本知识即党章外,还要帮助他们学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各省党组织都很重视党员的发展工作，并取得很大的成绩。如四川省，1938 年 3 月间，只有 340 多名党员，到 10 月，已发展到 3400 余人；湖南省原来也只有几百人，到 1938 年冬，已发展到 7000 多人。1938 年 9 月博古向中央政治局报告组织情况时说，南方 13 个省总计党员数目已达 67000 多人。实践证明，中央的指示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发展的党员，绝大多数是好的，它以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中，经得起考验，当然也有个别党组织，在执行中没有按照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办，机械地执行“十倍地发展”，只注意数量，没有注意质量，吸收了少数不合格的或混进了个别不良分子。

长江局的组织工作，分工由博古负责，主要助手是黄文杰。组织部的成绩是显著的。周恩来对党的组织工作也很重视，长江局的会议对各省党的工作都专门进行过讨论，各地许多负责同志都参加过长江局会议，当面讨论该地区的工作。除此而外，周恩来总是要挤出时间和各地负责同志个别谈话，地方同志也很希望同他交谈，以便解决会议中来不及讨论的问题，并可以得到周恩来的更多指示。

关于党的工作作风问题，周恩来和长江局针对当时许多党员习惯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注意埋头做具体的实际工作；习惯于公开合法活动，忽视秘密工作方式，提出不要把“救亡作风”带到党的组织中来，要注意保守党的组织和工作秘密，以防止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破坏。总的说来是做得好的，但有些组织和党员没有引起重视，以致在国民党实行反共政策时就遭到破坏。

长江局时期，完成了党中央讨论的恢复和建立南方各省党组织和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为整个抗战时期南方党的工作建立了巩固的基础。

## 同叛徒张国焘作斗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从 1937 年起，每年清明节，国民党政府从西安派代表和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一同到中部县黄陵向黄帝致祭。这也是国共合作的一个象征。1938 的 4 月 4 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同祭黄陵。祭毕，张国焘对护送他来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然后带着警卫员张海钻进事先由国民党准备好的汽车到了西安。他住进高级的西京招待所，与国民党官员和特务进行多次密谈。4 月 7 日国民党方面安排他搭火车到汉口。张国焘到火车站后，才临时打电话给住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要林到车站谈话。谈话时，张企图以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的手段破坏党内团结，并说他要到武汉去了。林老加以劝阻，要张回办事处去商量，但劝阻无效。林伯渠立即回到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打电报，报告张国焘的去向。中央立即电周恩来等，要设法找到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4 月 8 日清早，我把林老和中央来的电报送给周恩来。他看电报后，要我立即送给王明、博古、凯丰等人看，然后找秘书长李克农和副官邱南章、吴志坚到他房里。周恩来把电报给李克农看，并说张国焘一直不改正错误，现在又私自逃跑投靠国民党，已上火车到武汉来了，你们立即打听西安来武汉的火车到站的时间，一起到火车站去，一定要把他接到办事处来，不要让特务接去，又问我们是否都认识张国焘。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在保安欢迎朱总司令和张国焘时，都见过，还听他讲过话。周叮嘱：见面时要以礼相待，说是王明、周恩来等负责同志派你们来接张副主席的。当时西安到汉口的客车，每天只到一列，时间是下午 19 时。我同邱南章、吴志坚吃完晚饭后，急忙到李克农房间集合，邱、吴都是周恩来的随从副官，身穿第十八集团军的军服，挂武装带，佩手枪，十分威武。胖胖的李克农穿一套便服，戴副眼镜，也颇有风度。唯有我穿一套灰制服，像个小秘书。李克农作了一些交代后，四个人即分乘两部小汽车到大智门火车站去拦接“张副主席”。19 时，火车按时到站，我们分头站在车厢门口，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可就是没见到张国焘。我们又走进车厢里找，也没见张的影子，只得回到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李克农估计，因林老发现张坐火车到汉口来，怕我们去接，就回到西安了。周恩来说，有可能，但你们明天照样去接，一定要接来。9 日，我们又按时到车站，还是没有接到。到 11 日，有人说，也许张国焘不坐火车了。李克农说，再去一次，一定要把他接来。19 时，一列从西安开来的客车到站后，我们再次分头注视着每一个下车旅客，仍不见张国焘下来。后来，邱南章跑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马上请李克农、吴志坚上车。李克农对张国焘客气地说，是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他的。张表现出惊恐的神态，护送张的两个便衣特务，看到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就不敢作声。李克农把张国焘和他的警卫员张海请下车，要他坐上我们的小车到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也急忙溜下车，一个去报信，一个仍在后面跟踪。张国焘执意不肯到办事处，一定要住在外面。李克农决定让邱南章、吴志坚两人陪张到江汉路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李克衣临走时，当着张国焘的面对邱南章、吴志坚说：“你们两人要负责保证张副主席的安全，照顾好他的生活。”邱、吴都是政治保卫局出身的干部，当然心领神会，当即回答：“报告秘书长，我们一定坚决完成任务。”李就和我带着张海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当天

晚上，李克农陪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张表示，是否可在相当独立性下与国民党解决党派问题。他认为边区如同“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这下就暴露了他要共产党对国民党投降的思想。王明等没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到办事处住，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解决。虽经耐心劝说，张仍坚持不住办事处。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并请示对他今后工作的指示。张迫不得已写了一个电报：“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周恩来最后对张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候中央的指示再说吧。周临走时，交代邱南章、吴志坚一定要时刻跟着张，并随时抽出一人用电话报告张的活动情况。周等回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12 日，中央书记处即给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回电“为表示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13 日，周恩来拿着毛泽东等致张国焘电，到旅馆当面交给张国焘看，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抗战形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十大救国纲领深受全国各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情况，又反复劝说张先到办事处住。一切都可当面商量。张国焘无言以对，只敷衍几句，仍坚持不到办事处住，周恩来回到办事处后，立即召开长江局会议，大家认为张国焘已决心投靠国民党，挽回的可能性很少。为做到仁至义尽，决定让张国焘自己活动一天，以观动静，明晚再去争取他到办事处来。

14 日，张国焘在邱、吴两人的监护下，还不敢多活动，只打了一些电话，这当然在西安就准备了的。从车上下来的一个特务虽然也往在旅馆，但不敢直接同张国焘来往，只是当“坐探”，向特务机关报告消息。

14 日晚，为争取张国焘住到办事处，周恩来和王明、博古、李克农又一起到旅馆去劝张。经过耐心劝导张仍不接受。李克农是同特务叛徒斗争的能手，他连劝带拉地把张国焘推上汽车，大家一起回到办事处来。

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不愿正式谈问题，总找借口外出。外出时，由邱南章或吴志坚陪同。他去见过陈立夫、周佛海（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后当了汉奸）以及已被党开除的陈独秀。他了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周恩来只好同意。得到蒋介石同意后，16 日上午，周恩来陪张国焘过江到武昌见了蒋介石。张一见蒋就卑躬屈膝地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接着张国焘语无伦次他说了一些边区政府的事。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只哼哈了几句。回到办事处后，周恩来立即批评张国焘对蒋介石谈话的错误态度。当天下午，张国焘又以配眼镜、看牙等为由再次上街，李克农派吴志坚随同，并让吴带上钱给张用。张一上街就到处乱跑乱闯，既没有配眼镜，也没看牙，只想摆脱吴志坚溜掉。在汉口转到快天黑了，他说要过江到武昌看朋友，吴志坚就紧跟在后面，到了过江码头渡轮边时，张故意躲在过江人群后头，当客人上了轮渡要关上铁栅门时，他忽然跳上去。想把吴志坚抛在铁栅门外。吴是个机灵的红小鬼，他眼明手快

腿快，一下就跳进了轮渡，紧跟张国焘不放。到了武昌已天黑，吴劝张回汉口办事处，张坚决不回。因乱闯了一下午，又累又饿又渴，吴把张拉到一个小旅馆去喝水、吃饭，边吃又边劝张回汉口，张执意不回，吴就在旅馆里定了一个房间，让张睡里面，他睡门口。在张国焘没注意的时候，吴偷着写了一字条，要茶房给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说他同张国焘在武昌某街某旅馆，要办事处快派人来。办事处正四处寻找张国焘时，忽然得到电话，立即派邱南章和警卫人员到武昌找到了张国焘，并说奉周副主席命来请张副主席回办事处。张不肯定，他们就连推带拉把张推上了轮渡回汉口。张又坚决不回办事处，邱南章就把张安置在汉口中山路的太平洋饭店住下。邱留下，让吴志坚回办事处报告和休息。这时已经很晚了，周恩来和王明、博古等听了吴志坚报告张逃跑经过后，认为张已决心叛党，为了尽最后努力，就商定明天上午去同张公开谈判，并商定了内容。

17 日上午，周恩来和王明、博古一起列太平洋饭店同张国焘谈判。周恩来对张国焘提出三条，要他考虑。第一，回到办事处，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第二，暂向党请假休息一时期。第三，公开脱党，党亦径告以开除决定。张不答应回党工作，但表示愿意在二、三条中采取一种办法，希望允许他考虑后再定。周等走后，张即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饭店谈话，表示他要公开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随后又约胡宗南司令部驻汉口办事处处长谈话。当天晚上，特务机关来了两辆小汽车停在太平洋饭店门口，从车上下来了几个便衣特务，直奔张国焘的房间。邱南章立即迎上去大声问：“你们要干什么？”特务们二话不说，两个人把邱南章抱住；另一个把张国焘拉到车上后，才把邱放开。特务们对邱吹个口哨，就把张拉走了。一个曾赫赫有名的“张国焘主席”，竟一下投到国民党特务的怀抱里去当走狗了！邱南章回到张的房间里，见到桌上有一张张国焘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内容是：“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邱南章马上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长江局当晚即召开会议，决定向中央报告经过。18 日早晨，周恩来即起草了陈、周、博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报告了张国焘脱党情况，建议中央公开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并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解释，应当利用开除张国焘的机会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

4 月 18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几天后，4 月 22 日的《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这个决定。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4 月 19 日，中央又向党内发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把张国焘的叛变当做党内的反面教材，收到很好的效果。

4 月 20 日，长江局机关支部（包括八路军办事处）召开支部大会，宣布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决定。周恩来详细介绍了张国焘从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发展到叛党的经过，教育全体党员在统一战线工作环境中，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阶级觉悟，自觉遵守党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经过热烈讨论，同志们一致拥护中央的决定，并表示革命到底，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决不叛党。每个党员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

张国焘叛逃时，他的老婆杨子烈和一个几岁的男孩还在延安，当组织把张国焘叛变的消息告诉杨子烈时，她表示要到武汉对张进行规劝。党中央同意她的要求，把母子送到武汉办事处。周恩来见到杨子烈，希望她规劝张，不要对党做得太绝了。杨表示同意。周派邱南章把杨子烈和儿子送到武昌胡宗南办事处同张国焘团聚。我们党对张国焘做到了仁至义尽，他却一意孤行，

自绝于党，终成历史罪人。

1939 年冬的一天，我从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走到化龙桥搭公共汽车进城，一上车就看到在车尾角角里坐着张国焘，戴了一副黑框的眼镜，寄着一件旧黄色风衣。我开始以为看错了，但越看越像，没错。这趟车是从磁器口开到重庆市区的，大概是对特务们讲完课后回到军统去的。我心里暗自好笑。想起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当“张主席”时，从不走路，总是骑马。长征过草地时，还是一人两匹好马换着骑，两匹大骡子给他驮衣服、被褥和食品，到了延安，虽然还没有小轿车（当时只一辆华侨送的救护车供毛主席专用），也同朱总司令、林伯渠主席一样，可以坐在卡车前头去开会，是当时的最高待遇了。而现在居然和我这个小干部一样搭破烂的公共汽车了。此时张国焘没有发现我，更没有想到，他向戴笠报告的策反对象之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科长童小鹏（办事处工作人员和家属部己向警察局登记），就在同一车上。

国民党自 1939 年 1 月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以后，国民参政会逐步变为制造反共舆论的讲坛，所以国民党就让张国焘这样的中共叛徒当参政员。当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等出席会议时，张国焘只能躲在角落里不敢作声，很多有正义感的参政员，也不齿于和这个叛徒为伍。

1948 年冬，张国焘逃到台湾，在台北租了一间房住下。这时，国民党已把他当成一双无用的破草鞋，既不给他工作，又不给他生活费，连房子也被国民党官员强占。1949 年冬，不得不和妻儿一起移居香港，化名“凯音”，参加顾孟余等人组织的所谓“第三势力”的反动活动，捞点生活费用，并投靠美国驻香港领事馆，贩卖一些过了时的“中共资料”，讨点港币，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恬。

大约在 1955 年，张国焘通过香港的友人向人民政府提出想送他唯一的儿子进广州中山医学院学医的请求。经周总理批准，张国焘的儿子回广州学习五年后成了医生，先到香港行医，以后又跑到加拿大多伦多去行医。1956 年，党的八大时，张国焘托人捎话表达想回中国大陆，党中央要友人转告张，只要他在报上公开承认错误，就可以让他一家回中国大陆，但他不愿意承认错误，只好留在香港。60 年代初，张国焘接受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用四年时间写出一部 90 余万字的《我的回忆》，书中对党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尽量掩盖他的机会主义和反党罪行。这是他用尽了解数的最后一次出卖。肯萨斯大学在张写作期间每月给他 2000 港元“研究费”。书稿先在香港《明报月刊》连载，1966 年正式出版，又得到一笔稿费。后来他老婆杨子烈写了一本《往事如烟》，也捞到一笔稿费。两人就靠这些稿酬维持生活。1968 年，张国焘（71 岁）和杨子烈由香港迁往加拿大多伦多，投靠儿子。1977 年张（80 岁），患中风，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把他送到教会慈善机关办的老人病院。1979 年 12 月 3 日晚，因盖的毯子滑掉床下又无人护理，冻死在床上。

## 华中游击战与“保卫大武汉”

1937 年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向长江局发出关于敌情判断和长江南北作战部署的指示，其中要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建议：国共军队共同建立苏浙皖赣边、鄂豫皖边两大军区和皖南、皖北等六个辅助军区，使敌攻武汉时处于我之战略包围之中。长江局接到指示后，在 1938 年 1 月 1 日进行讨论，提出“要用一切力量和方法阻滞敌人对郑州、武汉的占领，争取三至六个月的时间以组织和准备新的抗战力量”，并决定一面由周恩来草拟一书面建议送蒋介石，一面派大批干部到安徽、河南去发动与武装广大民众，阻滞敌人对陇海、平汉线的进攻。会上还作出关于鄂豫皖边、鄂豫边、湘鄂赣边三个游击区的决定，要求各区“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积极参加保卫家乡的斗争。”1 月 7 日，长江局指示河南省委，要发动广大的武装保卫河南的运动，要巩固原有的军事力量，并用各种方式争取创造与发展新的力量。1 月 11 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鄂豫皖红军的一部分不参加新四军整编，仍在鄂豫皖边力求发展，以扩大和发展中原的游击战争。14 日和 22 日，长江局两次作出决议，决定留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的第八团队由长江局参谋处直接指挥，归周恩来、叶剑英领导，留原地发展，以“保护后方根据地，保证进行党和群众工作，以及训练干部的工作。”对这项任务，周恩来抓得很紧。2 月 13 日，周恩来等向中央书记处建议，把彭雪枫从山西调河南负责军事工作。15 日，周恩来主持的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上决定：黄河与长江间成立一个军区，其下分为四个军分区，彭雪枫加入河南省委负责领导全军区军事工作。中央很快就批准彭雪枫调河南。3 月，彭雪枫作为河南省委军事部长来到竹沟，对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留守处主任。这样，竹沟就成为我党领导中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竹沟留守处在豫南各县进行广泛的抗战动员，建立地方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发展了武装力量，还办了干部培训班，着重学习游击战术。河南省委也在信阳开办训练班。竹沟、信阳两处共培养军政干部三千多人，这些干部后来成了鄂豫皖鲁开展敌后抗日的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在董必武指导下，湖北省工委于 1937 年 11 月，先后在老根据地七里坪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和抗日青年训练班。方毅任训练班主任，彭康为政治教官，余立金、吴克华等为军事教官。董必武、叶剑英、聂鹤亭都去上过课，共有学员六百多人。学员毕业后，一部分随第四支队东进抗日，一部分留在湖北做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

周恩来、叶剑英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要注意发展皖中的地方游击队，要安徽省工委把抗日游击战争的重点布置在原鄂豫皖苏区的中心金家寨一带，依靠老苏区的党组织和群众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江苏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加强了对已建立的游击武装的领导，逐步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江阴、无锡等游击区，在崇明、青浦一带掌握了部分游击武装。

1938 年 4 月，广东成立省委后，根据中央和长江局指示，专门讨论了建立抗日武装的问题。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以尹林平为书记。要求各地党组织努力建立民众抗日武装，共产党员必须积极参加各地方政府组织的军事训练，争取通过统一战线工作，掌握一部分国民党的保安部队；把古大存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地方部队，加以扩大，以便成为华南游击战争的中坚力

量。

中共长江局在开展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工作方面，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没有全面地贯彻中央指示，贻误了有利的发展时机。

1938 年 5 月 19 日徐州失守，抗战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毛泽东和党中央判断日本侵略军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之中心。因此，中央在 5 月下旬以后发出了一系列指示，要南方一些党组织发展游击队，建立根据地。5 月 2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长江局的电报中指出：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口）信（阳）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该省委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要河南省委动员平汉、陇海两铁路线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中去，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应大批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敌的游击战争。中央的方针就是要在华中地区迅速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

长江局收到这一指示后，周恩来、叶剑英立即召集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彭雪枫等到武汉，向他们作了传达，并确定具体部署。河南省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发展、壮大了游击队，并建立豫东、豫南两个根据地。湖北省委积极开展农村工作，组织部队准备在日军进攻的路线上开展游击战争。8 月，长江局责成安徽省工委组织部长刘顺元，立即组织皖东工委，领导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党的工作，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尽管做了上述的许多工作，除河南外，其他各省的工作，同中央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这主要是长江局对中央的指示没有全面地贯彻执行，没有充分利用徐州失守后的有利形势把发动农村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当成中心任务来抓。在王明右倾错误思想影响下，把长江局的工作重心放在保卫大武汉上。早在 5 月 15 日，王明、周恩来、秦邦宪三人就电请蒋介石“不惜任何牺牲坚决保卫武汉。必要时，当以武装负防御任务，俾不让马德里工人防守西班牙城之事迹得专美于前。”6 月 17 日，长江局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提出“徐州放弃后战争进入新阶段（第三期抗战）”，“战略中心应是保卫大武汉”。这与上述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是不一致的，以致影响对中央指示的贯彻执行，使华中游击战争的发展，丧失了有利时机。

6 月 15 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王明起草的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署名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新华日报》又连续发表社论，提出“第三期战争的中心是武汉的争夺战”，“坚持抗战，死守武汉，是服前全国军民的紧迫任务”等等。《意见》对于鼓舞军民抗战信心是有积极作用的，其中建议国民党，为保卫武汉采取政治军事上的某些措施也是对的，但是，根本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王明经常宣传马德里工人坚守城市的经验，现在又机械地搬用到保卫武汉的战役上来。事实上，不管马德里工人多么勇敢，甚至有国际纵队的支援，坚守了两年，但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的西班牙法西斯佛朗哥的长期围攻下，还是失败了。不仅城市没有守住，更重要是使革命力量受到了重大损失。日本侵略军为夺取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武汉，集中了九个主力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和大批的空军、海军和重炮，从水、陆、空三方面向武汉猖狂进攻。蒋介石虽然动员了 130 个师和海空军，并且亲任总指挥，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是由于他实行片面抗战和消极防御的方针，不敢广泛动员和武装工人、农民和革命青年参加抗战，没有在武汉外

围用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所以保卫武汉的会战，虽然消耗了敌人二三万人，争取了一些时间，可是终究守不住。10 月 24 日，蒋介石就下令部队撤退，日军还没有遭到顽强抵抗，10 月 25 日占领了武汉。王明的“马德里保卫战”之梦也就破灭了！

针对长江局的错误，中央在 8 月 6 日致长江局的电示中指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侧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可是长江局未能及时改正错误，致使我党在华中广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工作受到损失。这主要是王明的错误，但是周恩来和博古在《意见》上署了名，也是有责任的。1945 年 4 月周恩来在党的七大会上说过：“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所以在武汉时期，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没有能像华北一样，利用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广泛发展游击战争。”这些话，他曾不止一次说过，常以此为戒。

## 武汉撤退前后

1937 年 11 月王明回国以后，党中央派王稼祥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38 年 3 月，中央又派任弼时去共产国际报告工作。他们先后向共产国际如实地报告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形势和中国党内的情况，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抗战形势和党内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特别是了解了王明回国以后的表现，从而使共产国际做出了正确的指示和决定。7 月，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决定和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从莫斯科回国。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传达国际的指示和讨论抗战的新形势和党的任务。中央通知王明等长江局领导人回延安听取王稼祥的传达并参加会议。王明等接到通知后，曾要求王稼祥到汉口传达，中央没有同意。

8 月 29 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徐特立（从长沙前来）四人离汉口回延安参加会议，董必武、叶剑英、凯丰留武汉主持长江局工作。当时，我作为秘书，同副官邱南章、警卫员巴芳庭一起随四位领导同志回延安。四位领导人住在软卧车厢的一个包间里，我们三人就在相邻的餐车里睡在椅子上，为的是便于警卫。车长和车警们见到周恩来都毕恭毕敬小心警卫。经过一天一夜到了西安，在办事处住了一夜，第二天由办事处派了两辆卡车，王、周、博、徐四人分坐在卡车驾驶室里，卡车上堆满了运往延安的物资，我们和去延安的干部、学生就坐在物资上面。当时，西安到延安的公路全是土路，汽车很少，主要是走铁轮大马车，车辙很深，一下雨就变成泥水沟了。第一天，到洛川住了一晚，第二天下午才到延安。车到南门外，就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党政军负责人以及机关干部、抗大学生的热烈欢迎。我来不及打掉身上的黄土，赶紧从卡车上跳下来，请毛泽东、朱德、博古、周恩来、王明、徐特立站在一排，给他们照了一个集体相。高个子罗瑞卿、矮个子胡耀邦和滕代远挤在二排也一起照上了。然后，在夹道欢迎中进入延安城，大街上还高挂“欢迎陈、周、秦、徐诸同志胜利归来”的大横幅和标语。进城后，先到凤凰山下毛泽东住的院子里坐了一会儿，喝了一杯茶后就各自到住所去了。我就住在毛泽东院子里的一间平房，和机要秘书叶子龙一道吃饭。这是 9 月 3 日。9 月 5 日，在南门外广场召开欢迎大会，延安几乎倾城出动，到会几千人。大会主席台上挂有“延安各界欢迎陈周秦徐诸同志大会”的大横幅。毛泽东、王明作了简短讲话后，周恩来向大会报告了中共代表团在武汉的工作和目前抗战形势，号召全党全军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独立自主地大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周恩来正在台上作报告时，主席台的一角，毛泽东和王明同坐一条木板凳上亲切交谈，朱德、博古、徐特立坐在另一木板凳上注意倾听，充满着团结的气氛。我立即抓拍了这一镜头。

9 月 14 日至 26 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在会议第一天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说：“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他又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他谈话的主要内容：“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很显然，这是共产国际主席团和季米特洛夫，了解了王明回国以后和党中央及毛泽东的意见不一致，不经中央批准就以中央名义发表政见等错误，而作出了针对性的指示。这对于开好六届六中全会和加强中共党内的

团结，有着重要的意义。9 月 15 日周恩来向政治局会议作了关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内容包括：抗战形势和保卫武汉问题；国民党的统治及其政策；代表团在统一战线中的工作；各方面对统一战线的破坏情况等。26 日的会议上周恩来又发了言，他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毛泽东等同志报告，关于抗战形势，他认为抗战正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发展。在第二阶段要发展游击战争，并使正现战与游击战适当配合。新四军中的老干部要大胆放手去发展游击战争。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我们拥蒋合作，拥护三民主义是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我们必须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原则之下。

这次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工作需要，重新调整了各地领导机构，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成立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北方局常务委员会，杨尚昆为书记。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任务，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在延安城东郊桥儿沟天主堂内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前，我同叶子龙先去参观了会场，会场布置简单朴素，主席台后面正中挂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两边挂着马、恩、列、斯画像。坐的都是长木板凳。叶子龙征得毛主席、洛甫的同意后，由我先给全会主席团照相。主席团 12 人：毛泽东、洛甫、朱德、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刘少奇、陈云、王稼祥、康生、彭德怀。次序是没有人安排的，但王明自己站在前排的正中，而毛泽东站在最右边，周恩来站在最左边。这也可略见王明的心迹。接着照全体相。这次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17 人，中央机关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 30 余人，会议开得很成功。这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加强了党内团结，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9 月底，日军正集中兵力进攻武汉，情况紧急，中央决定，力争取蒋介石加强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周恩来在 9 月 30 日上午向全会做了统一战线的工作报告后，下午即带着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亲笔信，赶到西安。10 月 1 日乘飞机回到武汉，只有邱南章随行。

周恩来一回到武汉，又开始他极度紧张的工作。

他首先向汉口的长江局领导成员凯丰、董必武、叶剑英（博古、吴玉章、邓颖超去重庆准备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和李克农、黄文杰、潘梓年、吴克坚等主要干部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和六中全会的精神。随即根据他在延安为中央起草的 9 月 25 日关于武汉失守前工作布置的指示精神进行具体布置，对主要干部的行动也作了安排。确定董必武即去重庆准备参加国民参政会和指导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筹建工作。凯丰也去重庆，负责党报委员会工作。决定武汉的《新华日报》留少数精干人员坚持出版到失守，重庆版在此之前做好一切准备，武汉版停刊的次日，重庆即接着出版。指示李克农、潘梓年对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转移工作进行妥当安排。

10 月 4 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把毛泽东亲笔信交给蒋，并向蒋说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抗战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意见，特别提到中共六中全会决定下去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发展组织，中共党员公开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蒋很注意听并表示，武汉失守后，坚持抗战无问题。对八路军在敌后求

补充发展，表示赞成。谈完后，蒋要周将谈的意见用书面写给他。8 日，周将书面意见交蒋介石。

附：毛泽东致蒋介石亲笔信录文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几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的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佈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14 日，周恩来又见蒋介石。

10 月 22 日，朱德总司令从西安飞抵武汉。周恩来同他讨论了当前的战局后，又陪朱德去见蒋介石。朱德向蒋报告了十八集团军在华北对敌作战的情况，并向蒋要求扩充编制、增加经费和派部队到华中战场开展游击战争等。蒋只听，没有做肯定答复。朱德于 23 日上午乘战斗机离汉口到襄阳，然后乘车返前

周恩来几次见蒋介石，虽然没有解决什么具体问题，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同国民党长期合作和在蒋介石领导下共同抗战的诚意，对于坚定蒋介石的抗战信心，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在武汉失守前 20 多天的时间里，周恩来还做了许多重要工作。

10 月 12 日，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开始向广东进攻，周恩来连夜起草了致国民党军事当局意见书《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议》。意见书全面分析了战争的起因和特点，提出对日方针为“坚持华南抗战，以击破日寇冒险的进攻，以坚定英国对我的援助，以击破日寇的一切阴谋。”并提出九条具体建议。建议书受到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当时任军事委员会第一作战组组长兼军令部第一厅厅长的刘为章，详细看了周的意见书，并根据周的具体建议，为军令部起草了关于在华南补充军队和发动民众的签呈报军事委员会。同时，周恩来派黄文杰到广东，向广东省委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指示广东省委根据日寇进攻广东的新形势布置党的工作，特别强调要抓武装工作，在敌后放手发动游击战争。

对湖北省委的工作也作了具体安排。因省委书记郭述申还在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周便当面指示省委成员钱瑛、王翰，省委今后主要抓游击战争，把大部干部派到鄂豫皖老区郑位三处，沙市、宜昌、襄樊都要配备适当干部主持工作，要布置武汉失守后的秘密工作。

根据中央关于保卫武汉问题的指示精神和毛泽东《论持久战》观点，大力宣传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了《沦目前抗战形势》的长篇社论，在 10 月 7、8、9 日连续刊载。社论指出：“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的方针是确定的”，必须经过毛泽东所说的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又指出：保卫武汉重要，坚持持久战重要！只有坚持长期抗战，加强国内团结，才能克服困难，争取胜利地转入相持局面的基本方针。即使武汉不保，我们也还有可能继续长期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

10 月 19 日，周恩来出席文艺界召集的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在讲话中，强调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不退让，不妥协，困难愈大，更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他还为《新华日报》纪念鲁迅的专刊题词，号召要发扬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的民族精神。

周恩来还亲自指挥长江局机关、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撤退工作。10 月 22 日，日军已三面包围武汉。周恩来决定，长江局、“八办”和《新华日报》最后一批人员立即乘租来的“新升隆”号江轮向重庆撤退。由李克农率领的长江局、八办的工作人员边章伍、张唯一、夏之栩、龙飞虎、王炳南、王安娜，还有来长江局汇报工作的东北义勇军司令员李延禄、湖北省委的钱瑛、加拿大女护士简·尤恩等数十人；由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率领的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数十人及印刷机器、纸张等物资，一齐上了船，把船舱装得满满的。当时拥挤在码头上许多待船逃离汉口的难民，纷纷要求上船。根据周恩来指示，只要有可能，应让一些难民上船。于是有了几十名拖儿带女的难民上了船。周恩来亲自到码头送别。

当周恩来和副官吴志坚、司机祝华三人从江边回到长江局和“八办”原住地大石洋行检查有没有遗失东西时，国民党兵正在楼内放炸药准备炸楼。这里当然不能再住了，便搬到鄱阳街一号郭沫若家里住。当天下午，朱德总司令到汉口，也住在这里。郭沫若和朱德曾一起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到广东汕头失败后，他俩人就分别了。经过风风雨雨的十一年后又在战火临近的汉口重逢，自然倍加亲热又无限感慨，曾有诗互赠，后来郭老回忆这段往事时，记不起自己写给朱德的诗，却把朱德给他的白话诗记了下来。这首题为《重逢》的诗中写道：

别后十有一年，
大革命失败，东江握别，
抗日战酣，又在汉皋重见。
你自敌国归来，敌情详细贡献，
我自敌后归来，胜利也说不完。
寇深入我腹地，
我还须支持华北抗战，
并须收复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别，相见——
必期鸭绿江边。

这首充满革命豪情的诗，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谁会想到，长江局、“八办”和《新华日报》人员所乘的“新升隆”轮，23 日上午 9 时到嘉鱼县燕子窝停靠江边躲飞机时，被日寇飞机投弹炸沉了。幸亏李克农有防空经验，事先动员大部分同志上岸分散隐蔽，只留少数同志

在船上看管。敌机轰炸时，除龙飞虎等几个能游泳的跳江上岸外，船上《新华日报》的潘美年、李密林、项泰等 16 个同志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孙世实、徐挺荣、张海清等 9 个同志遇难。还有一批搭船群众也遇难了。新华日报社的机器、纸张都随船沉没，遭到重大损失！脱险的同志，在李克农、潘梓年的领导和群众热情帮助下，克服了各种困难。李克农率长江局、“八办”同志经过常德到达长沙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则分三批乘船到达重庆。为了悼念 25 位遇难烈士，12 月 5 日，重庆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驻重庆通讯处，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周恩来辽亲自布置了汉口情报站，向该站负责人当面交代的任务是收集日军占领武汉后的动态，并给他们配备了秘密电台。他又把八路军办事处电台台长萧贤法、报务员张元留下，亲自找他们谈话，要他们带上小电台在情报站负责人的领导下，建立秘密电台，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电台联络，提供日军情报。

10 月 24 日傍晚，周恩来回到鄱阳街一号，给即将上船的郭沫若、胡愈之等送别，然后独自一人在房间里考虑为《新华日报》撰写最后一篇社论。他交代祝华把车子准备好，今晚就要离开汉口。当天深夜，周恩来的最后一项工作是亲自到《新华日报》编辑部和留下来坚守工作的章汉夫、朱世纶、林肖硖等同志研究在汉口出版最后一张报纸的版面。他口述了 25 日最后发表的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由朱世纶笔录，自己又修改定稿。社论郑重宣告：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当时已停电，工人只好用手摇印刷机印报。当报纸印出几张清样后，得军方电话，说日军已迫近市郊，要立即撤退。周恩来即要章汉夫等上卡车撤退，并同地下党派来帮忙的印刷工人握手告别。他坚定地说：你们留下来坚持斗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说完就上车沿汉宜公路向沙市方向撤退。车上只有周恩来、吴志坚和司机祝华三人。这时已是 25 日凌晨，炮声已清晰可闻了。

事有凑巧，周恩来的车刚走到十里铺附近，见到全身戎装的白崇禧站在路边，他所乘的吉普指挥车因抛锚正在修理。周恩来即下车对白崇禧说，“敌人骑兵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远，赶快上我的车去长沙吧。”白崇禧问了司机，知道车子一下修不好，就坐上周恩来的车一同走了。当时国共关系比较好，两人在车上作了较长时间的交谈，从个人出身到国共合作、抗战形势等无所不谈。

白崇禧告诉周恩来，蒋介石已决定在桂林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指挥第三、四、七、九等四个战区的军事，要他当行营主任，仍兼军训部长与副总参谋长。周恩来向他表示祝贺，并向白崇禧提出，为了便于同新四军以及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建立联系、转运军用物资到重庆，须在桂林设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请白予以照顾，白即表示同意。关于国共两党合办游击干部训练班问题，白也积极赞成，因白的机要秘书谢和赓（中共秘密党员），早在武汉时就向他提出过建议，他认为可行。白崇禧还笑着对周恩来说：“你们（共产党）未到我们广西，我很感激！”周恩来回答说：“你们广西做法，像民众组织，苦干穷干之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去。”抗战时期，八路军驻桂办事处的工作比较顺利，桂林救亡文化活动及民主运动较为发展，与白崇禧、李宗仁等当时比较开明是有关系的。后来白崇禧参与几次反共高潮，1946 年积极参与打内战，逃到台湾后仍叫嚣“反攻大陆”，

也都是历史事实。

周恩来、白崇禧于 10 月 25 日到达沙市，26 日南渡长江到达湖南澧县，受到县长的热情接待，27 日晨渡澧水，又经常德渡沅江，经益阳渡资水，最后过湘江于深夜才到长沙。白崇禧到大本营归队，周恩来就住在长沙寿星街 2 号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一天功夫，走了几百公里的土公路，又尽靠落后的轮渡过了湖南的湘、资、沅、澧四条大江河，也算是艰难的征途吧。

这时叶剑英已先到长沙。李克农、边章伍、张唯一、王炳南、夏之栩等一行经过水陆跋涉，也于 10 月底到达长沙。周恩来除留下李克农等待商量工作外，其他同志都失到湘乡交通站休息。

10 月 28 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举行。10 月初，周恩来在武汉时就察觉了汪精卫等人的动向，曾和凯丰联名向党中央建议，为避免参政会被亲日派所利用，除已在重庆的董必武、博古、邓颖超出席会议外，在延安、西安的王明、吴玉章和林伯渠也出席会议，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11 月 1 日，鉴于大后方对投降妥协和坚持抗战问题议论纷纷，周恩来和叶剑英致电党中央和在重庆的我党参政员，建议：我党参政员应在参政会上发表宣言，声明拥护统一，坚持抗战，反对主和，并推动国民党的主战派和地方实力派质问外交为何有主和论调。这次会议，经过我党参政员团结国民党和各方主战派的斗争，终于使汪精卫的阴谋没有得逞。

11 月 1 日至 3 日，蒋介石在长沙主持了军事委员会会议，检讨武汉作战经过。周恩来参加会议，他在发言中强调游击战的重要意义。一开完会，蒋介石就搬到南岳衡山风景区住了。为向蒋介石当面提出今后抗战的军事方案，周恩来于 7 日晚从长沙和郭沫若同车去衡山。郭是为了三厅的事去找陈诚的。恰恰刘为章也要去衡山，为了谈话方便，刘为章也坐上了周的汽车。因为当时兵荒马乱，国民党军队的军车更乱，又是晚上，出长沙不远，就在一处黑暗的山道上，碰到一辆刚出交通事故要逃跑的军用卡车迎面而来，周恩来的司机祝华虽然机警地躲在路旁，可是还是被撞坏了车门把手，车上的人幸未受伤，但是受了一次虚惊。他们只得改坐刘为章的车到衡山。第二天，周恩来见了蒋介石，蒋同意周的建议，要他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来，并答应迅速合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这时，长沙军情紧急，军事委员会各部委都已陆续搬到衡山，张治中为主席的湖南省政府也已向湘西沅陵转移。

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周恩来和叶剑英在 12 日长沙大火前几天又进行了紧张的工作：

出席湖南省委和长沙市委会议，作抗战相持阶段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要加强湖南的统战工作，但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方针，把重点放在发动群众、抓武装工作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省委机关要迅速转移至湘西地区。

同徐特立、王凌波（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商定，把在长沙停留的人员物资转移完毕后，通讯处即移至邵阳。我们即准备在衡阳和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注意同他们联系。

同李克农研究建立衡阳、桂林办事处问题。周恩来告诉李克农，白崇禧已同意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决定由李克农任处长，并要他首先做好白崇禧、李宗仁、黄旭初等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办事处除了负责同新四军、香港八办联系，转运海外华侨捐赠物资等工作外，还要支持夏衍、胡愈之等

文化界人士的工作。为了方便转运在长沙的人员物资，决定先在衡阳建立办事处，由李涛负责，待桂林办事处正式建立，运输任务完成后即结束。李克农暂去衡阳主持，由吴奚如先去桂林做筹建办事处工作。这样，就使停留在长沙的人员物资按计划有次序地分批运送到衡阳。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于11月14日正式建立，并设立了电台和长沙、延安、重庆联络。

周恩来还亲自指导政治部第三厅的撤退工作，帮助他们制定计划，解决交通工具，并指示刚从广州逃难到长沙的夏衍，要他到桂林去自筹经费，恢复《救亡日报》，建立文化工作据点。

我在延安调齐了电台、机要人员后，于 10月中旬从延安乘卡车到西安准备返汉口。车上除了我和机要人员外，还有派到新四军工作的罗炳辉、张元培、姬鹏飞等干部数人，还有几个背驳壳枪的警卫战士，共约20人。中央组织部指定由张元培和我负责。到了西安办事处才知道平汉路已被日军截断，不通火车，组织上决定我们乘卡车经过陕南到湖北沙市过长江到长沙。我们乘坐的是一辆破旧卡车，当时的公路大多是抗战后才赶修的，陕西商县以南公路还在铺卵石，破车走石路，真像扭秧歌一样，有些路段走不动，只得下车来推。好不容易经过河南的邓县到达湖北襄阳，又经沙市过长江，再经湖南常德，沿途走走停停，历尽艰辛，才于11月10日到达长沙。我们向周恩来、叶剑英汇报了沿途的情况，周恩来说，长沙已紧急，当天好好休息，11日即转衡阳，并带一些人和物资去。要张元培到衡阳后协助李涛把衡阳办事处建立起来。让我留下来跟通讯处的最后一批人走，先到衡山等他。我是12日晚10时左右和几个机要人员带电台乘小救护车离开长沙到衡山的。这时长沙已是兵荒马乱，到处是撤退的人群，公路挤得满当当，行车比走路还慢，经过两小时才走上正道。

11月10日，日军占领了长沙北大门岳阳，严重威胁长沙。11、12日国民党的军政机关都已先后撤离长沙，湖南省政府除张治中主席少数人外，都搬到沅陵去了。12日上午，周恩来还参加了政治部三厅举行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晚上，送走了三厅最后一批撤退人员，回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住地后，看到全部人员按计划撤退了，才放下心来。他又打电话给陈诚、张治中，打听前方情况，二人都说没有什么动静。张治中特别说：“风平浪静”，周恩来放心了。因为两天来没有睡好觉，感到很疲劳，就同叶剑英、邱南章三人在通讯处楼上想睡一大觉再离长沙，还要邱南章交代司机王应絮把车子停在大楼门口等待随时出发。

谁也没想到，没有睡多久，13日凌晨二时，一场大火在长沙城到处燃烧起来了！当国民党兵把火放到寿星街时，司机怕人把车子烧了，就不管周恩来出没出来就把车开出长沙城到湘潭下摄司去了。当邱南章叫醒周恩来、叶剑英起来到门口时，放火的兵已在门口点火了！周、叶、邱三人只得冲出火区向下摄司方向走了。沿途都是拖儿带女逃难的人，但见不到一辆车子。他们和逃难的人群一同走出长沙南门外，走到半途，才碰上一辆政治部三厅的卡车，搭上卡车到了下摄司。这时郭沫若等已先到了。周恩来对长沙这次大火表示十分愤慨。郭沫若后来回忆说：“周公十分愤慨。他向来是开朗愉快的脸色，对于任何人，处到任何难局，都绰有余裕的恢宏的风度，在这一次，的确是表示着怒不可遏的神气。汽车不见了，还是小事，长沙烧成那样，不知烧死了多少伤兵、多少难民，而敌情怎样却是一点也不清楚。这些我相信，就是使得他不能不愤慨的原因。”

为了了解长沙大火的真相，周恩来不顾疲劳，又要叶剑英、郭沫若一起乘卡车回到长沙。周恩来等在长沙城外的一个高地观察，长沙全城都在燃烧，把天空都映红了，难民还在不断外涌，但没有听到枪炮声。周恩来是富有战争经验的，他肯定地对叶剑英、郭沫若说，看情况，敌人是没有进长沙的，如果进长沙，不会没有枪炮声，不会这样没有动静的。因为军警人员都逃离了长沙，没有办法进一步了解情况，就又乘车回下摄司，沿途还收容了一些三厅步行撤出长沙的人。14 日，周恩来又在下摄司指挥三厅清理撤退的人员和整理行李。郭沫若回忆说：“ 这一天的工作也全靠着周公的指挥和调度，从再度的混乱中又整理出了一个眉目。 ”

15 日，周恩来到达衡山，住在南岳半山上的一幢小别墅里，叶剑英和我同住一起。当天就长沙大火之事向蒋介石提出三项善后办法，一、拨款救灾：二、调集民工清理街道，安置灾民；三、惩办放火首犯。16 日，到衡阳，检查办事处设立情况，召集办事处和三厅干部开会，决定由洪深率三厅的部分干部及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赶回长沙参加善后救灾工作。同叶剑英、李克农、李涛等研究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准备工作，要叶剑英先准备军事、政治教员的名单，待正式成立后报中央批准。然后，周恩来、叶剑英又回到南岳山，准备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

在南岳，对长沙大火的情况完全弄清楚了，原来长沙大火，是按蒋介石的密令点燃的。

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在长沙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检查了武汉失守时没有彻底破坏的原因，确定了新的“ 焦土抗战 ”的方针。11 月 12 日上午九时，岳阳敌人还没有向长沙进攻，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要他的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给张治中打电话，传达蒋介石的命令：“ 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接着蒋介石又发来急电：“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先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

张治中对蒋委员长的命令，当然是要坚决执行的。他立即召集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权，给他们任务，指定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备，保安处协助。后来又搞了详细计划，指定了指挥放火的正副指挥。张治中说，他规定，须在我军从汨罗（岳阳、长沙之间的一个县城）撤退后，再下命令放火。为使百姓逃避，要先放空袭警报。

上面布置倒很周到，可是腐败的国民党官僚中有许多人怕死，为了逃命，12 日中午，长沙市内许多警察就撤走了，到晚上 12 时，警察局不仅关了门，还用竹板钉上了，连张治中也找不到警察局长。电话线断了，各方都失去联系。到下半夜两点钟，张治中还没有下命令，也没有放空袭警报，长沙城就到处起火了！结果是烧掉了五万多栋房屋，烧死烧伤了两万多人！有些伤兵在前线没被日军打死，到了长沙后方，却被蒋委员长的部下烧死了！

眼看到这样的惨局，周恩来能不愤慨吗？人民群众能不愤慨吗？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也深为愤懑。

在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和各方面的愤怒指责下，蒋介石不得不到长沙“ 视察 ”。当张治中向他报告起火的经过，并承认错误要求处分后，蒋介石模棱两可地说，“ 就这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是属于那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种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 ”他要张治中“ 赶快善后，收拾人心 ”，只拨 20 万元交张治中作救灾款。为了平民愤，蒋介石把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长沙

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枪毙，做他的替罪羊。又给张治中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张治中在湖南对中共和抗日救国分子的态度是比较开明的，所以当张治中处于苦恼之中时，周恩来对他做了不少工作，使他感到中共朋友对他是真诚的。张治中的回忆录中说：“长沙发生大火，各方面尤其党内平日不满意在湖南倡导社会改革运动的顽固分子对我的攻击更甚，我总不置一词，而中共朋友反为我解释，给我以慰藉。”

11 月 25 日至 28 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了有 300 多位高级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周恩来和叶剑英应邀出席。会议讨论了抗战新阶段的战略方针。白崇禧在会上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介绍给蒋介石。会议正式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游击战。训练班主任由蒋介石兼任，不久白崇禧，陈诚兼任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也担任国际问题讲师。周恩来、叶剑英当即电告中央，经中央同意后，即到衡阳办事处组织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代表团，干部主要是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撤下来的。代表团团长是叶剑英，军事教官是叶剑英、边章伍、薛子正，教游击战争。教材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实际经验编写的；政治教官是李涛、吴奚如、李崇，教材主要是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等编写的。分工编写后要经集体讨论审定，然后再油印成讲义，上课前还要做充分准备，所以很受学员欢迎。代表团一共 30 多人，住在南岳镇上一个地主花园“桔盈园”内。代表团还利用办训练班的机会开展统战工作。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的军官，平时对中共戒备很严，不易接近，通过训练班的接触，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了中共和八路军对于国共合作和坚持抗战的诚意，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代表团同志还和衡山各界人士交往，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叶剑英还到南岳半山亭寺庙里向僧尼发表讲演，题写诗词，宣传抗日。巨赞和尚深受影响，积极组织南岳、长沙等地佛教徒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主编《狮子吼》月刊，宣传抗日。1939 年 4 月，周恩来从新四军回重庆路过南岳时，除了给游击干部训练班做了题为《中日战争之政略问题》的报告外，又在叶剑英的陪同下，接见了南岳山的法师暮笳、演文、巨赞等人，鼓励他们对佛教界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为暮前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在宗教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战前期国共合作的又一成果。共办了三期，第一期有学生 1000 多人，办得比较顺利，收效也好；第二期，正值国民党开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时期，国民党也不重视了，参加学习的只有 400 多人，而且在训练班中开始散布反共言论；第三期，因南岳被日机轰炸，搬到湖南零陵，人更少了。我党为了坚持团结抗战，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的代表，一直坚持到 1940 年 3 月第三期结束，才撤回重庆。

周恩来在组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代表团后，于 12 月 3 日，经衡阳到达桂林。我随行到达桂林后即留桂林办事处任机要科长。周恩来和郭沫若见了白崇禧，提出《救亡日报》要在桂林复刊（1937 年在上海创刊），希望白支持，白答应，并表示可资助复刊经费。周恩来还接见了夏衍、胡愈之等文化界人士，给他们分析了桂林的政治形势，要做好对桂林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以便开展文化活动。同时指示文化界的党员同志，不要大露锋芒，要隐蔽，保存实力，作长期打算。

12 月 6 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了要把中共合到国民党的问题，周恩来严

词拒绝了蒋的要求。

周恩来在桂林的工作，既可以说是长江局工作的结束，也可以说是南方局工作的开始。他在桂林的工作结束后，即于 12 月中旬飞重庆，开始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负担起新的更艰巨繁重的任务。

# 到重庆开创大后方工作

## 雾都明灯——中共南方局

1938 年 12 月，周恩来从广西桂林来到重庆。

当时国民党政府、合中间党派、各界全国代表机构、各种势力的头面人物，以及各国驻华使团等都迁到这里。重庆成为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但是重庆政治环境恶劣，社会情况复杂。日寇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集中兵力对付占领区内中共军队的战略性转变后，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受到很大震动。各种政治势力和广大人民对这场战争怎样打下去以及战争的前途如何，种种反映，都在陪都重庆集中表现出来，使重庆和整个国统区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

1939 年 1 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了以防共、限共、反共为目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此后，蒋介石的大量军队，尤其是他的嫡系部队大部集中到了西南地区和陕甘宁边区周围，反共活动步步加强，对于在重庆和国统区中共党组织和党员的压迫日益加紧。广大中间势力，在这一现实面前，对蒋介石国民党能否把抗战进行到底疑虑重重；对中共的抗日主张和行动虽然很赞成，但中共过去对中间阶层的态度仍使他们心有余悸而不敢大靠近。重庆和大后方的广大民众，眼见祖国的半壁河山将沦丧，心急如焚。

周恩来一到重庆所遇的就是如此严峻的形势。其责任之重大，途程之艰险，虽在他意料之中，而心情也难免沉重。但是，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对这个混乱的局面、险恶的政治环境，他镇定自若地拨开迷雾，抓住主要矛盾，井井有序地展开党的各项工作。

当务之急是首先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领导抗战大后方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及其他工作。

1938 年 9 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党中央领导南方国统区和沦陷区党的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周恩来从武汉辗转到重庆后，两星期里，曾反复与董老、叶剑英、博古、凯丰等商议，并及时将认定的意见报告党中央。1939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将名称定为西南局，由周恩来、博古、凯丰、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张文彬 13 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收到党中央关于这一决定的电报后，与博古、凯丰等联名致电中央书记处，认为叫西南局名不符实，还是“以南方局名称为好”；另鉴于 13 位委员不常在一地，建议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6 人组成南方局常委会。1 月 13 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并指示华南、西南各省和“上海工作仍归南方局管”。周恩来于 16 日在住地召集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了当前时局和南方局的工作，决定了组织分工。南方局主要机构和负责人情况如下：周恩来除主持全面工作外，主要负责统战工作，董必武协助。董老也是统战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为叶剑英。组织部长是博古，1940 年 11 月回延安后，改由孔原担任。宣传部长是凯丰，1940 年 1

月回延安后，1941 年 9 月起由董必武兼任。社会部部长先由博古兼任，后由吴克坚负责。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是邓颖超。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蒋南翔，当时他不在重庆，南方局向中央提名调他。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凯丰，敌后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由周恩来兼。国际问题研究室负责人章汉夫。华侨组负责人叶剑英。我是 1939 年 3 月由佳林到重庆的，任机要科长。后来成立秘书处，辖机要、电台、抄写三个科。周恩来回延安时，我曾多次随行，后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我为南方局秘书长。此外，还有一些公开机构，如新华日报社，由吴克坚分管并担任总编辑，社长是潘梓年，总经理是熊瑾玎。群众杂志社社长是潘梓年，主编先是许涤新，后是乔冠华。四川省委分为川康和川东两个特委，分别直属南方局。至此，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会后，周恩来亲自拟定电稿将议决的各项报告中央书记处。党中央完全同意南方局 16 日会议议决的各项，很快派蒋南翔来到重庆，在以后的两三个月内，南方局的各部委先后组成。

南方局是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机关，要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里合法存在、公开活动，是不可能的，只能和在武汉一样，设在八路军办事处内。早在武汉沦陷前夕，周恩来就派周怡、钱之光到重庆，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活动，觅到机房街 70 号建立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通讯处。1939 年 1 月，通讯处撤销，办事处宣布成立，并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备案，由钱之光任处长，周怡任副处长。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一起办公，而对外只称八路军办事处。另外，在曾家岩 50 号设立“周公馆”，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及部分南方局工作人员在此办公。

在南方局成立会上，周恩来就提出，在党内尽速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对一些省区的领导机关和成员进行调整，南方局和各省、特委根据具体情况举办训练班，轮训党员干部等加强党内建设的意见。会议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作出有关决定。

会后，周恩来立即召开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要求大家认真组织学习讨论。接着，派出南方局常委博古、叶剑英到湖南、广东，派马子卿到云南等省去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南方局所辖的各省、特委都先后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对巩固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是很大的推动。

南方局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调整和加强了一些省、特委：l 月，在中共云南省特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以李群杰为书记的云南省工委；2 月，在中共湖南省工委的基础上正式产生了以高文华为书记的湖南省委；3 月，江西省委在南昌召开会议，调整了领导成员；4 月，成立了以钱瑛为书记的中共鄂湘西区党委；6 月，撤销了中共广西省工委，分别成立桂林、梧州、南宁三个特支，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领导。南方这些省的党的领导机构，经过这次调整、充实，增强了对时局变化的适应性，提高了战斗力。

周恩来早在来到重庆之前，就已经注意到党组织在大发展中存在着忽视质量的问题。1939 年 1 月以后，时局明显逆转，他感到党要在国民党统治区站住脚，只靠扩大党员数量，忽视提高党员质量和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是不行的。于是，他在布置充实、调整省、特委领导机构的同时，又指示各级党委在发展党员中一定要十分注意巩固党的组织，要求改变过去比较公开暴露的做法，在执行中央关于迅速发展党员指示时，注意党员的质量，防止拉夫倾向，尤要警惕奸细混入党内，严格审查党员，并要求从组织形式、领

导方式到工作方式上加以转变。

为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周恩来还尽可能地把省、特委的负责人找来，给他们讲形势，讲中央的意图，帮助他们分析认识一些重大问题。同时，他要求南方局和各级党委尽可能分别举办党员训练班，分批集中一部分党员干部，主要学习抗战以来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和秘密工作等方面的内容。南方局先后在机房街 70 号和红岩举办过几期训练班，参加集训的党员干部 100 余人，周恩来亲自给学员讲课，南方局的常委、委员们都分别承担一方面的课程。在此前后，各地都举办了党员训练班。这些训练班，对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清除“左”的或右的思想影响，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掌握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相继成立以后，工作人员增多，来往办事的人络绎不绝。而机房街地小房少，又处在闹市中，不利于我党秘密工作。周恩来指示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近郊另行选址。经过川东特委负责人廖志高介绍，找到爱国进步人士饶国模女士，她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饶国梁的妹妹，她的儿子刘参化、刘圣化都是中共党员。饶国模在红岩嘴有个占地 200 亩的大有农场，树木很多，住户很少，既便于党进行秘密工作，又有利于防空，是个理想的地方。周怡对饶国模说起我们很想在这里建办事处，她欣然允诺。她正准备在这里盖房子，办事处给她 3000 元，将原计划建二层的楼房改建为三层，由她负责建造。建好后对外宣称由办事处租用，实际上她未收租金。为加快速度，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积极参加了劳动，2 月开始动工兴建，到 5 月刚建了一多半，机房街 70 号就被日本飞机炸毁，住在这里的同志全部搬到红岩嘴，分别安排在饶国模住宅和她的雇工宿舍以及存放工具、柴草的茅棚里。这年秋天，我们自己动手建造的楼房竣工，结束了散居生活，搬入楼内集中办公，办事处设在底层（一楼）、南方局机关在二楼，中共代表都住二楼，机要科、电台和译电人员都在三楼。这座二楼一底的房屋，土木结构，看起来十分土气，但环境很好，室内设有俱乐部，大家又动手修了篮球场，自己种菜，都很高兴在这里工作、生活。南方局和办事处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在红岩坚持工作长达 8 年之久，重庆红岩因此名扬中外。

周恩来一直很重视《新华日报》，除博古和吴克坚两人分管外，《新华日报》的重大事情周恩来都直接过问，亲自解决。如：1939 年 5 月，国民党当局以重庆连遭日机空袭，各报单独出版有困难为由，令十家大报共同出联合版，企图借机吃掉《新华日报》。周恩来立刻警觉到此事非简单出于各报单独出版有困难，而是国民党另育图谋。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新华日报》不参加出联合版，可能遭到各报的非难，而有条件地参加进去，既能在舆论上获得主动，又利于我们在舆论界展开工作，仍可以保住我们的喉舌。周恩来为此指示潘梓年出面向国民党中宣部交涉，并亲自写信给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伦，要求说明期限。在得到叶的明确答复后，《新华日报》才参加出联合版。这样，《新华日报》虽然参加了联合版，而仍然坚守注自己的阵地，并于 8 月 13 日复刊。国民党的阴谋未能得逞，反而使《新华日报》与几家中间报纸的团结加深，还结交了一批舆论界的新明友。也就在 5 月里，周恩来除在南方局会议上反复强调抓好《新华日报》工作之重要外，还召集总编辑吴克坚和采访部主任陆治到红岩听取汇报，作出明确指示。《新华日报》新址的选点修建，搬迁期间人员的安置、工作和生活的安排，周恩来无不细心

过问。在他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使重庆《新华日报》面貌一新，经受住以后的种种压迫和艰难，八年之中始终高高举起团结抗战与民主进步的旗帜，动员与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抗战，成为党在国统区舆论战线上的一支强大的军队，雾重庆中的一盏指路明灯。

## 寻求合作，坚拒“溶共”

力更好地发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早在武汉时就提出各党派联盟的主张。周恩来向蒋介石说过：“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是可以的，你们是一份，我们也是一份，各有独立的组织。我们进到国民党里去，要保持我们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也可以像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但醉心于专制独裁统治的蒋介石总想在抗战中削弱以至搞掉共产党，企图通过所谓的容共办法来达到溶共的目的。

蒋介石的手法是将中共并入国民党。1938 年 12 月 6 日，他在桂林约见周恩来，提出：中共既信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果同意，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面谈。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来当即回答：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想法和目的不同，而且国共终究是两个党；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有害无益。这使蒋介石大失所望。

蒋介石碰了钉子以后，并未死心。12 月 8 日他由桂林抵达重庆，12 日即会见中共来渝参加国民参政会的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又提出同样的要求。蒋介石说，我的责任就是要将国共两党合并成一个组织。过去，我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他还对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这几位共产党人当然看透蒋介石的险恶用心。这次会谈进行了五六个小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辩，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这时国民党即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已命令有关人员起草限共、防共、反共的文件。但是，他又觉得与其在会上通过一些限共、防共、反共的办法，不如在会上宣布中共即将合并入国民党，“溶共”政策成功，更加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声望。周恩来于 12 月中旬由桂林来到重庆。1939 年 1 月 20 日，也就是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蒋介石又一次约见周恩来，再次提出国共两党并为一个大党的事，询问中共中央对此事的意见。周恩来明确回答说：此事还未得我中央的电告，但要将我党与国民党合并为一个大党“不可能”。并历数自上年秋以来国民党制造的反共事端，要蒋给以解决。蒋介石对周恩来的要求，不作明确答复，仍然要他就“一个大党”事再电告延安，希望在国民党五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能有一回电。第二天，周恩来将这次与蒋介石谈话的情况拟成电稿，即交机要科发电去延安。电报除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与蒋谈话的情况外，还说，我意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我党中央应有一表示。建议在给国民党五中全会的电文中，表明我党愿意同国民党加强合作，但要指出必须迅速解决在各地发生的国民党杀人、捕人、封报馆、制造磨擦甚至进攻陕甘宁边区等问题，以增互信。同时，向国民党提议：由两党中央组织共同视察团或委员会，前往各地解决纠纷，至少可以弄清事实，向两党中央报告，以便寻找进一步具体合作办法。

2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同意他的建议，同时将中共中央发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五中全会的电报稿一并发给周恩来转达。这个电报指出：“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

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24、25 日，周恩来将电报抄送蒋介石和国民党五中全会，并以自己个人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按目前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磨擦贯彻合作到底。信中历数了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许多反共事实以后，指出，国民党同志尚有此作法者，全因国民党中央对中共所取之态度迄未一致，迄未明示全党，致下级党部只能根据自身所见，各行其是。他希望国民党，能于此次全会中对国共两党关系与合作前途，有一基本认识。周恩来最后提议：目前为解决事实上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合往各地视察实际情形，可就地解决者，则解决之；不可解决者，则来中央商讨。中共中央的电文和周恩来给蒋的信，都明白地拒绝了蒋的“一个大党”主张，遏制了他以合并来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蒋介石眼见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态度鲜明，独立自主立场之不可动摇，不上并党的圈套，就在五中全会上确定防共、反共的基本方针，秘密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共文件。从此，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的压迫步步加强，在边区周围，在抗日前线，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袭击不断；在国统区，加强了对中共组织和党员的侦察、破坏、逮捕，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在重庆的公开活动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跟踪。1 月以后的三四个月内，国民党接连在博山、深县、确山、竹沟、平江等地制造了一系列血案，迫害共产党人，残杀革命战士。面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一系列背信弃义，置民族利益不顾的反共活动，周恩来及时向蒋介石和有关当局提出抗议，严正要求进行查处。6 月 12 日，平江惨案发生后，周恩来除立即指示重庆办事处向国民党军事当局交涉外，又亲自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提出抗议。他在 7 月 2 日、22 日、28 日，先后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政部长何应钦等，揭露国民党蓄谋制造惨案的经过及真实目的，指出：国民党制造此一事件，显系别有用心，其目的不止于反共，还在破坏抗战，走入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强烈要求由国共双方迅速派员前往，彻查此事件，严惩肇事祸首。并于 7 月 31 日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公布了平江惨案真相，重申我党的严正立场。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国统区党的组织，如规定严格禁止各级组织之间发生横的关系；停止上下级组织业务部门单独的联系与会议，禁止上级组织越级调下级干部谈话；减少交通和通讯联系。

深县惨案和平江惨案接连发生后，周恩来立即在红岩召开南方局会议，报告目前形势，提出应付时局的对策。指出，目前时局在急剧转坏，很可能有突然的大的反共事件发生。我们要力争时局的好转，但同时应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发生。强调党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须作必要的转变。指示南方局组织部门起草一个文件以南方局名义下达。6 月 29 日，南方局发出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拟出的《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强调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部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

## 拨开人民心中的迷雾

抗战以来，重庆和国统区广大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一直很高，希望早日把日寇赶出国门。但是，随着广州、武汉接连失陷，人们对这场战争的前途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虑。周恩来认为，在重庆及国统区民众中出现这种情况，并非群众落后，而是我们党的工作没有深入群众，我们的正确立场和主张没有被他们了解，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因此，他要求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各地党组织以及广大党员，务必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到民众之中去进行宣传动员。他指示《新华日报》，一定要高举坚持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旗帜，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大声疾呼，积极宣传我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努力报道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抗击日寇的战绩，充分反映各阶层大众要求抗战与民主的呼声，充分反映广大劳动群众的切身疾苦；要求《新华日报》利用“五一”、“五四”、“七七”、“八一三”等纪念日，发行特刊、增刊，扩大宣传活动。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寇，周恩来获悉后，当即指示《新华日报》发表声讨汪精卫的文章，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展反汪宣传，动员民众群起而攻之。为搞好《新华日报》的宣传教育工作，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其他领导人都亲自撰稿、审稿。周恩来还在《救亡日报》和《国讯》杂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和中央电台等发表演讲，阐明目前抗战形势和今后的任务以及中共的主张。并通过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组织，发动文化界爱国人士利用笔墨和艺术，向广大民众进行坚持抗战与民主的宣传。周恩来还亲自到学校、工厂以及群众集会场合会演讲抗战局势，宣传我党的主张，号召青年学生、作家、工人和广大群众，将自己的岗位和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坚韧不拔、坚持不懈地去进行奋斗，去争取胜利。1938 年 12 月下旬，他到重庆不过十来天，就到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向全校师生作了题为《第二期的抗战形势》的演讲。1939 年 1 月 7 日，他又到重属联中向师生们报告了抗战形势和坚持持久抗战问题，并为学生题词：“伟大的抗战时代，不要使他空空过去。青年们，要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1 月 9 日，又和邓颖超一同出席沙坪坝南开中学校友报告会，就抗战的形势、前途和青年们在抗战中的责任等问题作了长篇报告。10 日晚，在南开中学举行的新年聚餐会上，他发表了《抗战建国与南开精神》的演讲，希望南开校友们发扬南开精神，为坚持团结抗战，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不久，周恩来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草拟了抗战动员计划，随后又给《国讯》撰写《今后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文，在《国讯》第 196、197、198 期上连载发表。1 月 25 日，他和董必武、邓颖超一同视察由胡厥文等开办的合作五金厂，并题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2 月 14 日，出席在重庆社交礼堂举行的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茶会，向到会的 400 余人发表了坚持反对世界法西斯侵略，坚持把中国抗战进行到底的讲话。

周恩来不辞辛苦、不拘场合，满腔激情所进行的这一系列宣传活动，拨开了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心中的迷雾，使他们感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中国共产党不但把形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告诉大家，而且还把自己的立场、态度、主张以及将要采取的具体办法，都详细告诉人民大众，从而使他们感到中国共产党信任人民大众，依靠人民大众，它的主张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愿意靠拢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在重庆的一系列演讲、谈话，说理透彻，又通

俗易懂，句句话都说到了人民的心里，大家都喜欢听他的演讲。那时在重庆，只要听说周恩来有演讲，谁都想去一瞻他的风采，听他那鼓舞人心的讲话。凡听过他演讲的人，又都会赞不绝口，逢人便说。所以，周恩来每在群众中作一次演讲或谈话，都必然把一部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向前推进一步。重庆人民因此更加崇敬、爱戴他。

## 视察新四军和东南六省

1939 年 2 月中至 5 月初，周恩来在工作极紧张的情况下，挤出两个半月的时间去新四军和东南六省视察，解决新四军的发展和领导的问题，直接了解前线和敌后的许多情况。

新四军建立一年多来，力量有所发展，战绩也显著，为江南人民所称颂。但是，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强调所谓“江南特殊性”，不积极贯彻党中央要新四军“东进苏南，直逼京沪，渡江北上，进入华北”的战略部署，使新四军不能迅速向敌后发展。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部队的行动犹豫迟疑，不仅坐失了挺进江南敌后的有利时机，而且处于危险境地；同时项英对军长叶挺很不尊重，致使叶挺离开新四军。此种情况，使新四军难以应付异常复杂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负责解决。1939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在重庆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了叶挺离开新四军后国民党方面的反映和可能造成的严重不利，并提议：叶挺仍回新四军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实际为政委。10 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周恩来的提议，强调“尊重叶之地位和职权”。周恩来一方面致电项英，指出他的错误，要求按党中央指示办；另一方面设法找到了叶挺，希望他到重庆。2 月初，叶挺来到重庆，周恩来和叶剑英同他进行长谈。周、叶诚挚而又热情的谈话，使叶挺很受感动。叶挺当即表示愿意回到新四军，并在其后见蒋介石时明确告诉蒋，他将于近期内回皖南军部。

2 月 15 日，周恩来和叶挺以及警卫副官邱南章、刘九洲由重庆抵达桂林。在桂林停留的两天中，周恩来应白崇禧的邀请出席由白主持的军训部成立周年大会，发表了军训工作在抗战中之重要责任的讲话；到北郊路英村给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人员和文化界的党内同志共 200 余人，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当时，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正秘密住在路英村，等待机会回越南。他化名胡杰，每天用法文打字机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翻译成法文。周恩来与胡志明会见并交谈后告诉办事处好好照顾他。周恩来又同李克农、石磊（曹瑛）谈了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工作，指示他们要认真整顿组织，建立短小精干的领导机关；要注意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结合广西的具体情况，利用一切机会动员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 日是旧历大年初一，周恩来到达江西吉安，住在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招待所里。熊式辉到招待所看望周恩来和叶挺，双方交谈了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在吉安，周恩来还秘密会见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等，接着，他到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部，和顾祝同谈了国共两党两军应坚持团结合作、协同作战，共同抵御外侮等问题。当顾祝同等了解到周恩来将立即动身去新四军军部时，马上告诉了去的路线，并派出地方保安团护送。

2 月 23 日，周恩来一行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泾县云岭。陈毅、粟裕得知周恩来要到军部来，也从苏南敌后赶回云岭。在云岭的 17 天中，周恩来仔细听取了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又多次分别同他们进行交谈，语重心长地指出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确定“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战略方针。又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叶挺工作的意见。他多次找项英谈话，严肃批评项英说：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特别指出叶挺是热爱党、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他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更有利。在

周恩来的帮助下，项英作了自我批评。

在云岭，周恩来还同新四军干部和广大群众接触，他在新四军活动分子会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向部队和地方干部们讲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还到军部各部门召开座谈会，深入附近的机关、教导总队、连队和医院、战地服务团了解情况。在报告会、座谈会上，周恩来精辟地分析国际形势，讲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反复说明在当前的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我们一定不要破坏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以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党的方针是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这些有针对性的讲话，使新四军官兵们很受教育，很受鼓舞。因南方局缺少速记人员，周恩来从新四军速记训练班调了方卓芬、吴博两个女同志带回重庆。3 月 14 日，周恩来即将离开云岭，干部士兵们争先恐后的和他合影留念。叶挺、项英、袁国平、陈毅、粟裕等一直把周恩来送到青弋江边，直到乘坐的竹筏远去以后，大家才依依不舍地转身回去。

3 月 15 日，周恩来再次路过太平县境，受到当地开明士绅刘敬之的盛情招待，周恩来和刘敬之亲切交谈，充分肯定了刘在军地联防中的贡献，并为刘题词：“ 绥靖地方，保卫皖南，为全联导，为群众倡。 ”

3 月 17 日，周恩来抵达浙江金华。当时杭州已经沦陷，金华成了浙江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浙江省军政当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省主席黄绍竑亲自主持仪式。当晚，周恩来同第十集团军参谋长徐旨乾、《浙江潮》主编严北溟谈至深夜。在以后几天里，周恩来还应黄绍竑之邀出席浙江省专署及县府科长、区县国民党抗卫队军官谈话会，就国际国内形势及敌我军态势问题发表了演讲；视察了钱塘江南岸的抗敌防线和大头港兵工厂等。在这期间，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同黄绍竑商谈团结抗战和如何治理好浙江省政的问题。黄对中共的主张表示赞同，很钦佩周恩来的高瞻远瞩和坦诚待人。两人还就中国共产党参加地方工作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

28 日，周恩来回到祖籍绍兴，绍兴专员公署召开欢迎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讲了国内外时局，回到浙江的感想，并回答了各界人士提出的问题。次日即在亲属的陪同下瞻仰大禹陵和给祖先扫墓。以后两天中，周恩来在绍兴会见亲友，访问各界人士和各阶层群众，为工人、妇女、青年、知识分子题词，勉励他们为民族解放、为中国的光明前途努力学习，努力奋斗。在向故乡人讲解国内外形势时，周恩来勉励他们发扬大禹治水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气概，学习鲁迅和秋瑾的革命精神，同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在绍兴，周恩来为各界人士留下了许多题词。

4 月 1 日，周恩来从绍兴回到金华，在金华停留的五天里，听取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等人的汇报，并向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他指出，浙江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投降，打击汉奸、亲日派。他说，同在浙江的国民党其他官员相比较，黄绍竑是进步的，我们要支持他，也要积极争取黄的势力，他要求中共浙江地下党用交朋友的方式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工作，不论在国民党政府机关或群众团体工作，都要埋头苦干，不暴露，不突出，不刺激，办事情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照顾将来；同友党友军和其他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要不浮、不躁、不卑、不亢，以自己廉洁奉公的模范作用，争取更多的人同自己团结在一起工作。后来浙江省委把他的讲话整理成文件，在省党代表大会和

浙南特区党代表大会上学习和贯彻。

周恩来这次东南之行，还有一个任务，代表政治部部长陈诚到江西上饶参加第三战区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向顾祝同交涉释放被国民党逮捕的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的赖大超等 8 人，并亲自到监狱去看望他们，鼓励他们利用机会努力学习。

4 月 18 日，周恩来到达湖南衡山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了解训练情况，又应训练班之请于 4 月 18、19 两日为训练班的教官和学员们讲了《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周恩来要给训练班讲课的消息传开，附近驻军军官们亦纷纷要求前往听课，因此实际听讲的人数超过训练班本身人数，达 2000 余人。周恩来上这一课，在整个训练班引起很大反响，校方即将他的讲话《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全文铅印成册，发给学员和部队军官们。在南岳，周恩来和叶剑英广泛会见各界人士，并为祝圣寺和尚暮茄题词，号召和尚们为民族独立为国内和平贡献力量。和尚们响应号召，后来也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这里，他还召集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开会，听取了汇报，指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在党的组织发展上提出了“ 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 ”的方针。

4 月底，周恩来由南岳到达广西桂林。出席了桂林文化界夏衍、田汉、欧阳予倩等 100 余人力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会见了杨东莼、胡愈之、张志让、千家驹、周钢鸣、张铁生、刘季平、桂林、姜君辰等著名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还到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在桂林举办的日语人员训练班，为全体学员作了题为《如何粉碎敌人的阴谋》的演讲。

5 月初，周恩来一行回到重庆。

# 皖南事变前前后后

## 制止反共逆流，维护统一战线

在周恩来视察新四军和东南六省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的反共活动愈演愈烈。1939 年 5 月，陇东磨擦加剧，陕甘宁边区的镇源县被包围，栒邑县被攻占。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也受到严重摧残。4 月间，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西安分店突然被封闭，经理、职员被捕。周恩来回到重庆，顾不上休息，立即和南方局常委们商讨对策，并召开南方局干部会议，作出紧急部署。接着，他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并提出抗议，要求制止国民党军队对我军的包围挑衅，停止对我党和进步文化的迫害。同时，他根据所了解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目前危机》的报告，指出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共关系走的是向下发展的道路。虽然整个形势基本上还是抗战的，国民党表面上还是要团结的，但抗战中存在妥协性。国民党一部分人的反共思想和行动在发展，这是逆流，是日本、汪精卫之流可以利用的基础，可使反共超过抗战而走向妥协，这是目前的主要危机。

为了及时与中共中央商讨挽救时局的对策，也为了汇报半年来他和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情况，并研究和请示今后的工作，6 月 18 日，周恩来离开重庆回延安，这是他主持南方局工作后第一次回延安。

周恩来回到延安的第四天，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兼民军总司令张荫梧突然率领 5000 余人，配合日军对冀中各县进行扫荡，偷袭驻深具的吕正操部，杀害八路军指战员 400 多人。吕正操部奋起反击，经过一天激战，除毙伤外，俘张部旅长以下 2000 余人，张荫梧只率十余人逃走。7 月 2 日，周恩来从延安打电报给朱德、彭德怀，指出张荫梧将会恶人先告状，“务请你们将张进攻冀中实情详报蒋、何、陈、李（济琛）、冯（玉祥）等，并说明不得已自卫之原因，以证明责在张荫梧而不在我。”果不出周恩来所料，张荫梧逃脱后，致电蒋介石诬告八路军制造严重事件。陈诚竟电周恩来提出抗议，周恩来不得不复电陈述事实真相，说明日军扫荡时只有十八集团军贺、刘两师和昌正操部坚持抗击，鹿钟麟（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张荫梧却诬八路军见敌潜逃，进攻友军。冀深两县发生的武装冲突，都由于张部挑衅。“张部齐司令明礼尚在吕部驻地，不日即将带队归还张处，方可知此事。”于是真相大白。张荫梧逃窜时溃不成军，丢尽蒋介石的面子，后来终于被免去本兼各职。

在延安，周恩来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无故滋生事端，制造磨擦，挑动内江，阐明我党的立场和主张，指出投降妥协倾向是目前的主要危险，强调“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讧！发动全面战争，反对包办压制！”7 月间，又获悉湖南平江发生惨案，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主任涂正坤被打死，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八人被活埋，周恩来即致电陈诚提出严重抗议。并电徐永昌、何应钦、程潜、朱绍良等，要求迅速派员到各地调查磨擦冲突，查明深县、平江二地惨案真相，令其部属勿再故生是非，致使事态扩大。还写信给蒋介石，抗议秘密颁市《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时蒋介石顽固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严峻的局势难于挽回。

7 月 6 日起，周恩来接连多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还到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去作报告。7 月 10 日，他骑马到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因马惊坠地身受重伤，右臂骨折，穿衣饮食都很困难，但他想到国家民族、党和人民的事业，顾不得休息养伤，仍然坚持工作。

从 8 月 4 日至 15 日，周恩来忍着伤痛和行动之不便，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先后作了八次长篇发言，全面系统地汇报了皖南之行和国统区的现状及党的工作情况，并提出了今后应如何进一步展开党的工作的一系列意见。他对两年来的抗战和国内外时局作了透彻的分析，并根据两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和自己在第一线的亲身实践，对统一战线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初步总结。他认为中国的统一战线既是民族的、民主的，也是社会的。这三方面的特点是不平衡的。而又因为蒋介石的“思想基本是反共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是公开法定的”。发言还全面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的原则、策略和方法。对今后如何进行各方面的统战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在谈到新四军的问题时，提出其发展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发言对经济、文化方面的工作，也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方针、原则性的意见。周恩来的发言，引起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高度重视，在大家充分讨论之后，毛泽东发言说，南方党的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发展了统一战线”；“发展了党的组织”；“推进了战争动员”；“发展了青年和妇女工作”；“开始了工农运动”；“帮助了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这是在恩来领导下的成绩”。毛泽东的发言对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党的工作和这一长篇报告作了充分肯定。周恩来这个报告是一个“高水平的报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对后来南方党的工作以至全党的工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断断续续进行到 8 月 25 日才告结束。周恩来在以后的各次会上，还作过许多十分重要的发言。在 8 月 16 日讨论党的工作路线时，他强调，党的工作路线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方式去贯彻；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必须分开。在 8 月 24 日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作结论时指出：对时局的估计，大家是一致的。认为当前时局有突变的危险，在突变还未到来时，有局部妥协渐变的现实问题。毛泽东指出关于南方党今后的工作方针，非常中肯，为南方党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周恩来手臂骨折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效果仍然不好，有成残废之虞，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他去苏联治疗，同行的还有王稼祥、陈昌浩、李德等。9 月抵达莫斯科，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12 月下旬出院。1939 年 12 月 29 日周恩来向共产国际递交的自己撰写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全文共 5.5 万多字，分四大部分：一、中日战争的新阶段；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三、党的工作与八路军新四军工作；四、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1940 年 1 月间，他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中国统一战线问题》的长篇报告，历时两天。出席会议的有季米特洛夫、哥特瓦尔德、库西宁、曼努意尔斯基、拉科西、皮克、马尔蒂、伊巴露丽等。冈野进（野坂参三）和任弼时列席。他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以及其他执委讲述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和王明的错误。特别强调中共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了毛泽东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强调指出王明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周恩来这次去莫斯科住了近半年，不仅治疗了手伤，而且经过他的努力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声望，扩大了中国在国际社

会上的影响。2 月底，苏联派专机送周恩来回国，同机的有任弼时、邓颖超、蔡畅、陈琮英、陈郁、师哲、冈野进、阿里阿罕（印尼共产党领导人）等。

3 月 25 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他将季米特洛夫亲手给他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交给毛泽东，并作了扼要的汇报。接着，周恩来连续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在会上详细报告了中共代表团和自己在莫斯科的活动情况，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以及共产国际执委季米特洛夫等对中共的指导性意见。与会的中央领导同志围绕周恩来的报告，结合时局和工作实际，研讨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一部分有关方针、政策性问题，即在这时及稍后正式形成中共中央文件下发或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例如：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小党派及中间分子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对南方党的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对湖南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对东南局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五一”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指示等文件，都是根据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商定的原则和精神拟成的。

##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39 年一年中，国民党的反共事件层出不穷。

国民党顽固派在加紧军事反共准备时，加强在国统区域对中共的迫害。1940 年 3 月，在成都制造“ 抢米事件 ”，嫁祸于中共地下党，趁机查封《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逮捕有公开身份的该处负责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共产党员车耀先等 10 余人，杀害共产党员朱亚凡和洪希宗二人。面对骤然恶化的时局，刚从国外归来的周恩来，来不及洗去旅途的风尘，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5 月 10 日，周恩来率孔原、徐冰等一批干部分乘四辆卡车离开延安赴重庆。途经西安时，他会见了陕西省的军政要员蒋鼎文等，抗议国民党军队在边区周围制造磨擦，要求他们以抗日为重，迅速停止反共敌对行径。途经成都时，应邀出席了四川地方实力派邓锡侯（由他的代参谋长出面）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广泛会见了成都各界民主人士。在宴会上和会见中，周恩来坦诚说明中共的主张，希望大家共同坚持团结抗战，反对任何妥协投降活动。

周恩来于 5 月 31 日到重庆后，立即约见再次离开新四军已在重庆的叶挺，他在和叶剑英、袁国平一同会见叶挺时，对叶挺说，你是我们新四军的军长，负有指挥新四军全军军事工作的重大责任，中共中央信任你，相信你的军事才能和为人，也相信你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你离开新四军以后，蒋介石放出风声说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有派他人充任军长之意，这样于抗战与民主事业很不利。希望你能回到皖南军部去，带领这支革命军队，多打些好仗，为中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同项英的关系问题，项英应负主要责任，请相信党中央和我会负责解决好。听了周恩来亲切真诚的谈话，叶挺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将尽快告诉蒋介石愿意回到新四军去。接着，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同袁国平、饶漱石进行了几次谈话，传达了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指示，充分肯定新四军一年多来的成绩，严肃指出存在的问题，批评了项英的错误。要求新四军领导项英等必须尊重叶挺在军中的地位，支持叶挺指挥全军军事。再次重申新四军的发展方针，第一是江北，第二是苏东，第三是苏南和皖南；建立和发展根据地，首先是苏北、皖北，其次是湖北。并明确告诉袁国平，今后有关新四军问题的谈判，不再由袁同顾祝同在上饶进行，一律移到重庆由周恩来自己负责。周恩来还主持召开南方局常委会，听取了袁国平、饶漱石就新四军工作的全面汇报，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但是后来项英并没有认真执行。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越来越严重，我党不能不采取相应的方针、策略。6 月初，周恩来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要求全体干部清醒对待目前形势，努力做好工作。从 6 月 14 日起，他连续主持南方局会议，听取南方局机关、《新华日报》以及各省、特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研究讨论今后的工作。要求一切在国统区的我党各级组织，必须从组织上、领导方式上以及活动方法上来一个大的转变，完全转变为秘密的地下党，《新华日报》和办事处也应改变工作方法和斗争方式，一切公开活动必须与地下党分开，以便能在恶劣环境下，保存精干力量，继续展开党的各项工作。这次南方局会议，是我党在国统区里建设坚强的战斗的组织迈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

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三番五次地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一定要十分重视统战工作，强调要多做中间势力的工作，或是主动上门或是请他

们到住地，把时局的变化和中共对抗战对国民党的主张坦白告诉他们，也把中共对广大中间党派、人士的态度和希望如实地告诉他们，同他们进行坦率的商讨。周恩来只要一有机会，就到各阶层群众中去。比如：1940 年 9 月 29 日，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他演讲，他欣然允诺，讲了《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这次演讲原本安排在一个剧场进行，因到会的人太多，临时改到巴蜀学校广场。周恩来并不顾个人安危，同意到广场演讲。他从世界往哪个方向走；中国向哪个方向走；欧战向哪个方向发展；日美关系向什么方向发展；苏联保持什么立场；中国采取什么立场；日本能否结束中国事件；中国有没有严重的困难和妥协投降危机；中国怎样使抗战进步等九个方面剖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的前途，指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正在持续扩大，中国正面战场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妥协投降危险，但只要我们立足于自力更生，勿对美日冲突存在幻想，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他还用铁的事实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许多官员借抗日营私，发国难财的可耻行径。这次演讲，使大家耳目一新，兴奋无比，3000 多听众被周恩来深深吸引了。历时 4 个多小时，广场上鸦雀无声，连事先准备好前往捣乱起哄的国民党特务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听众一起鼓掌。周恩来的演讲一扫了当时弥漫于重庆的消极悲观气氛，广大民众受到极大鼓舞。

6 月初，周恩来约蒋介石面谈。他对蒋介石说：中共诚意抗战。并拥护蒋委员长，而国民党却在抗战中实行反共溶共剿共政策，这只能帮助敌伪。所谓中共要举行暴动推翻国民党，纯属造谣。中共的发展，主要是在敌占区与敌、汪争群众。蒋介石说：抗战团结都是有决心的，国共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军事上须服从命令。周恩来回答说：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服从，另一方面不应拿命令胁迫。蒋介石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最后，蒋表示国共关系问题可以商谈。此后，国共两党在重庆开始第一次正式谈判。

这次正式谈判，中共方面代表是周恩来和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代表是何应钦、白崇禧。周恩来首先向何、白递交了我党关于解决目前危局，加强团结抗战的方案。要求国民党政府保障各党派之合法存在；释放一切在狱之中共党员；停止查禁各地之书报杂志，给《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以法律保障，允许登载中共文件及领导人之言论、文章；援助人民武装，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承认陕甘宁边区隶属行政院，并按现有 23 个县的现状划界，以林祖涵为边区政府主席；准许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扩编为 3 个军 9 个师，新四军增编为 7 个支队；同意在利于对日作战情况下划分作战区域等。在约一个多月时间里，双方围绕我党提案进行了多次谈判，而其中谈得最多的又是承认边区，扩编我军和划分作战区域三大问题。国民党只承认边区包括 18 个县；八路军扩编为 3 个军 6 个师加 6 个团，新四军编为两个师；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老黄河北岸去。在这三大问题上，双方分歧很大，难于接近。至 7 月 16 日，国民党方面来了一个“提示案”，更要求取消边区，缩编八路军和新四军，并限定在命令到达一个月之内，全部开往老黄河以北。这在事实上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要求，使谈判陷入僵局。但是，为了团结抗战大局，周恩来仍然表示愿意携带这个“提示案”回到延安，和中共中央共同研讨，寻找两党继续谈判和解决问题的办法。8 月下旬，周恩来又回到重庆，将我党对“提示案”的复案及以自己个人名义提出的三项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办法，一并交给了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张冲转国民党最高当局。国民党方面本已无意再谈，这时苏北冲突又发生，便借此将我党的

复案丢置一边，只一再要求我军服从他们的命令，限期开往老黄河以北。国共两党这次谈判完全停止了。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坚持利用一切可能做一些工作，力图影响国民党的决策，维系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局面。

9、10 月间，国际形势发生急遽变化。德、意、日三国于 9 月 27 日在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三国轴心。在这前后，英、美也签订协定，组成同盟国。当时，这两大集团都在争取蒋介石，使得蒋踌躇满志。

国际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分裂的气焰更为嚣张，第二次反共逆流已在暗中涌动。蒋介石以为时机对他有利，觉得有恃无恐，于是便不仅加紧对我地下党破坏，还要对中共的军队下手了。

周恩来还在延安的时候，就估计到国民党顽固派必然要继续搞反共阴谋，为了把领导地下党的工作从南方局机关转移至外面，以便保证地下党的安全，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拟在四川建立中共西南工作委员会，在广东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作为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对西南和华南各地党组织实行分区领导。经书记处同意，并决定孔原为西南工委书记，方方为南方工委书记，张文彬为副书记。孔原即于 6 月同夫人许明搬到重庆郊区建立西南工委。因被原来认识他的叛徒发现，于 10 月撤回南方局。11 月，南方局派钱瑛负责西南工委工作。当年 11 月，由方方、张文彬建立了南委。

1940 年 10 月 19 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诬蔑八路军、新四军制造事端，并用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限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由于 19 日在电文韵目中代日是“皓”，所以此电被称之为“皓电”。同时，国民党军令部又向顾祝同部发出准备围攻新四军的密令。这时，南方局接到我地下党送来的情报，蒋介石已密令特务机关严密监视周恩来、叶剑英，不得让他们离开重庆。何白发出“皓电”，成为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信号，全国面临的内战、投降危机已空前严重。

何白“皓电”最初是发到八路军叶剑英参谋长手里，要求转发给朱德、彭德怀、叶挺。叶剑英接到电报后，立即与周恩来商谈对策。接着，周恩来把我找去，让我立刻把这份电文发回延安。那时，我们南方局的同志都感到政治空气的沉闷犹如山城的雾季，浓雾弥漫，时局的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那些日子，周恩来和南方局与中央的电报联系很频繁，电台一天 24 小时都有人值班，各地下电台与南方局往来电报也很多，我们机要电台的工作人员格外紧张。这一点，周恩来也早有预见，原来机要人员较少，他五月和八月两次从延安出来，都带来了机要和电台人员。

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同志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向党中央提出了对付国民党阴谋的重要策略和意见。10 月 24 日，他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提出：根据各种迹象证明，“反共高潮是正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周恩来认为，我们对“皓电”的原则和办法决不能同意，但不能置之不理。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指出：“国民党方面整个计划意在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同时就新四军的行动问题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是皖南新四军主力北移，让出江南，到江北坚持斗争；另一方案是皖南新四军一部分转苏南渡江，一部分就地打游击，但江北的部队不论怎样都要做应战的准备。10 月 25 日，我们电台接连收到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两份急电，指出：尽管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但我们应

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周恩来看了毛泽东的来电，认为在对目前形势的判定和策略上与中央是吻合的。11 月 1 日周恩来再次向延安发电，他同意毛泽东的全部分析，并且断言：“破裂的危机已至”，“反共局部战争会开始”。当天，他又在另一个给中央的电报中反映了反共高潮中的重庆各方意见：国民党元老派和各民主派“一致望我们拿出办法来，并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还转达了冯玉祥的建议：“要软硬两用，表面让步，实际自干”。同时建议中央：“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通电答复何、白”，表示皖南新四军在有充分保障的条件下，可以移到江北，但要保证在移动中不许友军袭击。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今日会议，讨论你东日（1 日）来电，仍主表面和缓，实际抵抗”。3 日，他又致电周恩来，说明中共中央的政策是：“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同月 30 日，毛泽东又电周恩来、叶剑英，说“在此情况下，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周恩来、毛泽东这几份电报，可以说是我党应付事变十分正确的方针、策略。

中共中央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并采纳了他关于皖南新四军行动的第一方案，于 11 月 9 日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对“皓电”作出公开答复，这便是“佳电”。佳电一方面坚决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造谣和攻击，另一方面又采取缓和态度，申明为了顾全大局，决定将江南正规部队“遵令北移”、“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佳电表明我们共产党对维护团结抗战是有诚意的。我方这个合情合理的立场，在政治上赢得了广大中间力量，包括不赞成分裂的国民党人士的同情。

为使世人进一步了解事实的真相，周恩来和叶剑英不辞辛劳，四处奔走，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各界进行大量的解释工作。那些日子，我们看到周恩来总是行色匆匆，时而奔赴市区，时而返回红岩，他会见了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张申府、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等。也访问了国民党一些元老派人士，如冯玉祥、覃振、于右任以及孙科等，向他们说明实际情况，并阐明中共关于团结抗战的基本立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的真实情况，争取他们主持正义，制止内战的发生。周恩来还同各国外交人员和记者进行广泛的接触。当时美国作家斯特朗从苏联回国，途经重庆，周恩来在曾家岩 50 号同她长谈了几个晚上，向她详细地介绍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历史和现状，国民党两年来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的真相，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即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谈话结束时，周恩来对斯特朗嘱咐道：“这些材料暂时不要发表，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同时，周恩来布置南方局的同志除组织口头解释外，还编印传单、小册子（内容包括半年来国共双方来往文电和国民党反共文件等）秘密运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向社会各界广为散发。还要外事组王炳南及其夫人王安娜（德国人）不断地通过外国朋友把材料带到香港，在国外宣传。南洋等地一些城市的街头出现了披露蒋介石反共活动的小册子，使得国民党大为恼火。由于周恩来和南方局及时地作了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这对皖南事变发生后社会舆论的向背有着重大的影

响。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与国民党谈判有关新四军北移问题，并表示，只要严重事件还没有发生，他仍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他和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刘斐、张冲举行多次会谈，主要内容是：（一）要求国民党停止在陕北、皖北和苏北的军事行动；（二）表示中国共产党的让步是有限度的；（三）警告国民党如不停止进攻就应负国共破裂的责任；（四）要求推迟新四军北移的限期，解决补给条件，保证道路安全。在谈判中，周恩来要求直接与蒋介石交涉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希望蒋介石制止国民党军队步步进逼，解除其对新四军造成的半包围形势。蒋介石总是推托不见。

1940 年 12 月 25 日，这天是圣诞节，也正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获释的四周年纪念日，周恩来应邀见蒋，夜里回到红岩后，便立刻将他与蒋介石谈话的情况写成电报报中央。凌晨，我被叫到他的房间，他把一份很长的电报交给我说：马上发往中央。因电报太长，我就叫三个译电员分三段翻成密码，要电台先给延安台打招呼，马上有特急电报。清晨把电报发完后，我报告了周恩来，他才安心去睡觉。电报中说：“蒋以极感情的神情谈话”，一开始蒋介石就对周恩来说：“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蒋还说：“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坍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后来蒋介石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你们“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果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至于“政治问题都好解决”，蒋还说：“你我是患难朋友”，还提议为“和平友谊干杯”。周恩来在电报的结尾部分强调说：“我对蒋的挑拨及攻击我们的话，均当场答复了”，并指出：蒋的许多承诺是“靠不住的”，“其实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并且一针见血地写道：“张冲回去认为出意外的满意，我倒认为系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的确，周恩来把蒋介石看透了，他敏锐地判断出蒋介石表面上说得那么好，大灌迷魂汤，实际上他是决心动用武力把八路军、新四军驱赶到黄河以北。

时局的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尽管中国共产党为挽救危局作了种种努力，但国民党顽固派仍一意孤行。就在蒋介石会见周恩来并说了那么多“好话”之后不到十天，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 冲破暂时的黑暗

1941 年 1 月 11 日，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的纪念日。这天，曾家岩、红岩的很多同志都去化龙桥虎头岩报社参加纪念活动。晚上报社准备举行晚会，我也跟随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一起去报社。我们和报社的同志都聚集在饭厅里开纪念晚会，会场内一派热闹的景象，周恩来走上讲台做报告，大家都怀着激动的心情倾听。这时，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两个机要人员满头大汗快步走进会场，把一封标有 AAAA 符号的特急电报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拿着电文的手在微微颤抖，目光急速扫视电文内容。从电报紧急送达的情况，我们已意识到发生了重大事件，全场人的眼睛都凝神注视着他阅读电文时的神情。他看完电报，立即以愤怒和沉痛的心情向全体同志宣布，我新四军军部 9000 余人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伤亡惨重，局势危急……。这时，饭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我们以为是国民党特务来捣乱，都在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可是，他巍然屹立，坚定沉着，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说：“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这时电灯又亮了，周恩来继续说道：“皖南事变是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重大阴谋，我们不要被反动派的阴谋吓到，要坚决粉碎他们的进攻。”最后他提醒大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还只是其分裂投降阴谋的开始，我们要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

周恩来讲完话后，立即着手布置工作。他首先指示《新华日报》社的负责同志第二天在报上将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阴谋透露出去。随后，我紧随着周恩来和其他负责同志赶回红岩。周恩来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方针，并向中央请示报告，直到深夜，他还给张冲写信，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张冲速报蒋介石，制止皖南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围歼暴行，尽速撤围让路。同时通知各单位负责人立即检查和销毁文件，告诉大家要准备应付突然袭击，要保持革命气节，准备坐牢。我立即到三楼向机要人员传达，除了必要需用的密码外，其他藏到安全地方。楼口日夜值班，听传达室电铃，即把手头的密码烧掉，绝对不落敌手，要大家绝对保密，准备坐牢，决不叛党。

后来延安发来新四军被围歼的详细情况的电报，事情发生在 1 月 6 日，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调动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兵力，在皖南泾县的茂林地区，对奉命正向长江北岸移动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 9000 余人，进行突然包围和袭击。新四军将士，奋力自卫还击，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由傅秋涛率领的两千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负伤，一部被俘。军长叶挺出面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遇难。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宵衣旰食，甚至是彻夜不眠，一方面同国民党进行坚决斗争；一方面，通知地下党采取应急措施，保护党员和进步分子的安全。

1 月 17 日晚，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布通令，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这就把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周恩来在曾家岩 50 号获悉这一情况后，义愤填膺，立刻打电话给何应钦，痛斥他：“你们的行为是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说完，忿忿地摔了电话听筒。随即驱车到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再返回到红岩。

周恩来回到红岩后，夜已很深了。这时办事处的全体党员，除了担任警戒和电台值班的外，都集合在二楼的过道等待他。我和大家一样内心很焦急。周恩来上楼后，站在过道的正当中，沉默了片刻，就开始报告新四军军部遭受围歼的经过。他沉痛又悲愤的声音，激起同志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限仇恨，也使大家为死难烈士而流泪。两个多月前，我们曾在这里欢送叶挺军长、袁国平同志以及新四军驻渝联络参谋萧正刚夫妇，他们都是回到抗日前线去的，谁会料到正在前线等着打他们的却是国民党的军队。当周恩来讲到国民党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的番号的反动命令，他愤慨地指出：顽固派的阴谋，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消灭八路军、新四军。他的讲话由悲愤的控诉，转变为清醒的分析，他说：“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国共两党藕断丝连的局面既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也有可能一刀两断，全面破裂。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准备反动派突然袭击，要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说到这里，他激昂的语言停了一停，举目扫视大家，接着说：“反动派搞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很大，他们主要目的是想攫取我党的机密：如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破坏地下党组织，打击同情我们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们是决不能让其得手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要去同蒋介石交涉。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一定要尽可能争取让蒋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全师而归。如果我们被抓起来，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如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都承认是共产党员，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的组织情况，可以告诉反动派，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红岩和曾家岩有一个支部，支委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书记就是周恩来。问别的，你们一概不知，可以叫他们去问支部书记，问周恩来，问我！”最后他号召我们要向烈士学习，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周恩来的讲话深深扣动了每个同志的心弦，大家都抱定了为党的事业，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决心。

周恩来讲完话，又作了一系列的布置。他把我和龙潜、袁超俊三人叫到他的办公室，指定我们成立一个保密工作小组，制定保密守则，检查保密工作，准备对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

这时，《新华日报》的同志来向周恩来汇报说，《新华日报》写的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评论文章，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全部扣压，禁止刊登。新闻检查所的人仍不放心，还在报社坐等要看第二天的报纸。周恩来听后略有所思对来人说：“你回去告诉章汉夫，把被检扣的两个地方用别的消息补上，印好几张报纸送检查；我要另写东西放在那两个地方，不送检，大量印发。除报丁报童外，动员工作人员出去散发。报社的同志走后，周恩来便愤然挥笔，写下了举世闻名的诗篇——“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当时已经是 18 日凌晨了，周恩来把诗和题词装上信封，写好“立送汉夫同志亲收”交给我，并要我把办事处副官岳仁和叫起来，要警卫班派一人同他一起把这封信经对面招待所山上翻过去到报社面交章汉夫。章汉夫收到后，立即按周恩来指示办，连夜

准备了两种内容不同的版面，一种是刊载周恩来题词手迹的，一种是专门为对付检查而安排的。把后者先印好几张后即送检查官看，他们以为没有问题了，就走了。黎明前，印有周恩来手迹的报纸印好了，报社的同志和勇敢的报童把报纸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从报社的后山偷运进城，送到广大的读者手中。当国民党顽固派发觉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来亲笔题词的《新华日报》时，大批的报纸已经冲破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封锁，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周恩来题写的这满含悲愤的 25 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国民党当局在震惊之余，立即下令搜查报纸、逮捕报童、报丁。周恩来知道后，又亲自找国民党代表张冲一起到警备司令部交涉放人和要回被扣的报纸，并气愤地对国民党官员说，如果不放人，那我和董必武等自己上街卖报。这样迫使国民党当局放回被扣的人。解放后有人写文章说，周恩来亲自上街去卖《新华日报》，这是讹传，没有这回事。

18 日，我们保密小组立即制订了保密工作条例，在对内部文件的保管使用、工作人员外出行动和应付突然事变的安全措施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当我们把这个条例交给周恩来审定时，他表示满意，批准立即宣布执行。条例严格要求各部门清理机密文件，全部焚毁；必须保存的密码写在薄纸上，随时准备销毁；办事处机关内部装置报警设备和石灰包、沙包，以便在遇到突然袭击时，可以一面抵抗，一面发出警报，争取时间，迅速烧毁文件；工作人员外出时要两人同行；在办事处内部同样要严格遵守纪律，不应知道的既不问也不说，夫妻之间也不能谈党的机密。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之间就严格做到了这一点。

正在紧张斗争的时刻，我意外地害了一场病。1 月 20 日，我从曾家岩回到红岩，走上石台阶的时候，感到两腿无力，勉强回到办事处，请刘子华医生试体温表，竟达 39℃，但他无法判断是什么病，马上报告钱之光处长，钱之光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决定马上送医院，机要工作由刘三源负责。刘原是中央机要科科长，1940 年 5 月随周恩来到重庆。本来周恩来曾批准我的请求到延安学习，工作由刘三源接替，因工作和形势紧张，就决定我不去学习了。我住在疗养院，领导同志一直很关心，叶剑英曾来看我，告诉医生好好诊治。恰巧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处长李克农等在重庆等车去延安，他的二女儿双凤（即现北京肿瘤医院副院长李冰）是护士，李克农要她在医院陪我几天，她还为我输过血。我住院十天，据说是副伤寒，烧退，我就回红岩休息。在紧张的战斗中，那里休息得下来，就又投身于紧张的机要工作。

为了使社会上明了事实真相，叶剑英于 1 月 19 日领导军事组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经周恩来核准后交《新华日报》社印成单张，通过各种渠道散发重庆和各地党政军民机关团体以及外国友人。

为了同国民党针锋相对地斗争，表明严正立场。1 月 20 日，中共中央提出处理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 1 月 17 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辛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中共中央并电告周恩来，蒋介石如下实行十二条，绝不恢复谈判。

国民党还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于 1 月 17 日发出诬蔑新四军的“通令”，诬称新四军“抗命叛变”，撤销新四军番号，对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我们也针锋相对，于 1 月 20 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战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实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 月 25 日，周恩来将十二条交给张冲转交蒋介石。这十二条义正辞严，合情合理，蒋介石、国民党难以驳斥，又不愿实行，十分被动。1 月底，日本侵略军乘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时机，以七个师团兵力大举进犯河南。蒋介石原以为他解决新四军日本人是高兴的，可以停止进攻，至少是“坐山观虎斗”，但事与愿违，蒋介石要新四军开到黄河以北，却触犯了日本人的利益，于是日本发动了这场进攻，包围了汤恩伯在河南的十数万军队，战况激烈，这对蒋介石无疑是一大打击。内外交困，国民党刚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顶点，便不能不悄悄退却。

蒋介石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和周恩来及南方局组织的有力反击，打中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痛处。越来越多的人看清分裂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同情。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进一步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他们建议：就皖南事变真相编印各种材料在国内发表；由新四军各支队发出通电，拒绝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和被扣捕官兵，退还枪支、器材，控告顾祝同、上官云相，要求严惩肇事将领。并声明在原地坚持抗战，决不接受任何命令，等等。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些建议。

为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周恩来与董心武、叶剑英在重庆广泛地同社会各界接触，并组织力量向各界人士宣传，散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国内国际舆论哗然，国内各界人士反映强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等进步人士联名致电蒋介石，痛陈大敌当前，当共御外侮，斥责其“剿共事实，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毁于一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也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抗战。各民主党派、中间人士对国民党大失所望，“痛感自由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周恩来两次去见冯玉祥，同他谈到时局问题，表示很难过。冯玉样在日记中写道：“我说到为国相忍的大道理，周先生这个人识大体，明大义，同时又很能忍耐。”冯将军还对左右的人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能挽救人民的反对。”那时，全国人民担心，国共会不会由此破裂？抗战会不会因此夭折？面对人心动荡的局面，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他对前去看望他的侯外庐、翦伯赞说：“中共的方针，就是要争取时局的好转，但同时还要准备更坏的局面出现，至于杭战能不能继续下去，那决不是蒋介石一人所能决定的。”侯外庐、翦伯赞都表示：“无论局势如何困难，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黄炎培也表示“当局如此措置是绝对错误”。周恩来做了这些工作。使中国共产党赢得同情，赢得人心。

为使国际上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周恩来还在外交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他前往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家里，向卡尔详谈了国民党制造皖南惨案，破坏抗战的具体真实情况。后来，卡尔大使不仅告诫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还电告英国政府对其施加压力。2 月 14 日，周恩来又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代表居里会见，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磨擦的材料，并说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而便于日军南进。居里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随后他向蒋介石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美国态度的骤然变化，对国民党是很大的压力。周恩来又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也就皖南事变对何应钦、自崇禧提出质问。潘友新并警告蒋介石：“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周恩来还动员国际舆论对蒋施加压力，他电告回到美国的斯特朗，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斯特朗遂即在纽约的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上，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周恩来做的这些工作，获得了国际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

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中和英、美、苏三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正如毛泽东致周恩来电报所估计的：“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

## 战斗在虎穴龙潭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非常担心处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周恩来和南方局同志的安全。当时中共中央担心蒋介石和我们破裂，于是 1 月 18 日至 20 日毛泽东与中央连续两次急电周恩来，要求南方局准备撤销各办事处、干部迅速撤退，并特别要求：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

周恩来看到电报后，立即召集南方局的同志在他的房间里开了紧急会议，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参加。周恩来将中央要求迅速撤回延安的电报向与会的同志讲了，要大家商量到底是撤回去还是留下。经过仔细的分析，大家认为时局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一是国民党尚有顾虑还不敢贸然全面反共，国共仍维持抗日合作关系。特别是周恩来和南方局、办事处同志们数日来的奔走，各界人士了解皖甫事变真象，国际国内舆论对蒋介石的责难，以及国民党已从气势汹汹的攻势开始转为被动辩护的守势等情况来看，第二种局面还是有可能的。如果这时撤回，我们将失去政治上进一步进攻的阵地，于我方不利；况且我党在国统区的力量尚未撤退、转移、疏散完毕，一旦全面破裂将不可避免大受损失。再说，现在都撤回去，国民党也不会轻易放我们走。大家一致认为此时难以离开。最后周恩来断然说：“我要坚持到最后！”会议商定：周恩来等少数人留在重庆，坚持斗争，其余同志转移或撤退回延安。会后他把会议结果电告中央，但中央担心他的安全，仍来电催促尽快回去。经周恩来反复陈说，中央最后终于同意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领导一部分留在重庆，叶剑英率蒋南翔、李涛、边章五等撤回延安。博古、凯丰则早已回延安了。周恩来率领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同志毅然坚持在重庆这个龙潭虎穴中，同国民党开展全面的政治反攻，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能作出这样的决定不仅需要不怕坐牢、不怕手头的大无畏气概，更重要的是要有为整个抗日大局着想的胸襟以及对复杂局面有审势和驾御的能力。

早在皖南事变前，也就是 1940 年秋冬，周恩来已觉察到敌人的反共阴谋，曾对国统区党组织作了相应的转移、隐蔽工作。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活动更加猖獗，为了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更大迫害，周恩来决定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除保留少数人员外，分别实行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一些留在重庆有危险的党外进步文化人，也都妥善、周到地安排他们转移，并给予具体的帮助。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进行疏散，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周恩来作了周密细致的部署，当《新华日报》疏散人员时，他亲自前去检查，一个一个地仔细询问，认真了解他们的经历、特长和短处，疏散的去向，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到达落脚点的证明，遇到盘查时的答话等等，并随时提出他所发现的漏洞和改进意见。对有条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区找到职业，甚至进入国民党军政机关工作尚未暴露的同志，指导他们就用这种方式转入地下工作，告诉他们“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重要意义，要求他们注意：三勤”方针，做到“同流不合污”。

由于当时需要撤退的人很多，周恩来常常是上半夜改稿子、写文章、拟电报，下半夜逐个审查准备撤退人员的名单和材料，找出漏洞指出应该怎样补救。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当最后一批撤回延安的同志离渝时，行前他紧握着车队领队人廖似光的手说：“你回到延安

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廖大姐不禁眼泪夺眶而出，哽咽地说：“一定遵嘱办理，请副主席多多保重！”由于计划周密，转移出去的人员都安全到达目的地。

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对我们留下来坚守岗位的人员进行了严格的气节教育和保密教育。他对我们讲了广州起义失败后陈铁军、周文雍在刑场上的故事，念了叶剑英写的纪念方志敏的诗，董老向大家讲了“二七”大罢工运动的经过，号召大家学习林祥谦、施洋等烈士“头可断、志不可屈”的革命精神。周恩来经常对大家说：我们现在的工作困难了。我们当共产党就不要怕困难，只要国民党还没有把我们抓起来，就要坚持工作。我们留下的同志要更加倍地努力。

由于有多半工作人员已撤退到延安、苏北，周恩来就指示《新华日报》精简机构，缩减报纸篇幅，由每天出版一大张改为半张，必要时出增刊，并指出这时的办报方针要结合国统区的斗争实际，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要敢于说出真理，也要善于说出真理，使《新华日报》真正成为大后方人民的喉舌。

周恩来坚持留在重庆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决策保存了中共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保存了国共联系的主渠道，也保住了团结抗战的局面和我党在国统区的合法的战斗阵地，对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很难想象，如果我们全部撤离重庆，将标志着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将兵戎相见，中国共产党必将采取抗日与反蒋并举的方针来争取民族战争和民主战争的胜利。但无论怎样，中国革命都将经历一个更加漫长更加曲折的道路。

由于我们的政治攻势发挥了作用，蒋介石遭到国内国外的责难，越来越被动，迫使他对中共不能不采取和缓的步骤。

2 月 7 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说：“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蒋介石）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不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局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斗争的焦点转到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是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上来。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原定于 3 月 1 日开幕，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表示：国民参政会召开，中共参政员的出席是必不可少的。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仍留在重庆，据说是专等观察国民参政会开会，以验证国民党所标榜的“民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离会议召开的时间越来越近，蒋介石也越来越焦的不安，他急于想把共产党人拉进国民参政会来，以减轻国内外对他的非难，摆脱困境。

周恩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参政员自然不能无条件地出席这次参政会。2 月 10 日，他拟好电文交我发往中央，向中央表示，应采纳民主人士的提议：以中共七参政员的名义将十二条要求提交国民参政会讨论，并以接受十二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很快我们便收到延安中央的复电，同意这一建议。这是很高明的一着，它不仅扩大了十二条要求在全国范围的政治影响，又进一步表明我党力求恢复国共团结，坚持一致对敌的立场，从而博得了国内外更多人的同情。

一场新的巧妙的斗争开始了。2 月 18 日，周恩来将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在十二条善后办法未得以裁夺

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同时将公函抄送各党派有正义感的参政员二十余人。这对国民党的震动很大。王世杰接到公函后十分紧张，认为这是中共表示要决裂，要张冲立即找周恩来收回公函。这段时间周恩来与中共中央的电报往来十分频繁，他几乎每天都要把与国民党各方的接触，把斗争情况向中央及时报告，我们的机要电台整天收发电报不断。周恩来关于同张冲谈拒绝出席参政会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就有数份。2 月 20 日他发给中央关于提出十二条和张冲交涉情况的电报中说：“张冲昨晚至今午接连以电话及公函请我暂行收回公函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介石约我谈话，我均严词拒绝。”“我当即指出：十天中政治压迫之严重和接连不断，无理已极，实属忍无可忍。”张冲劝说道：“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周恩来回答说：“已半翻脸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不能得结果。”事后，周恩来向中央建议：“目前还不是谈判的好时机，见蒋毫无结果，而且击退顽固方政治压迫，必须动员舆论和中间力量，故将此事经过叁政员来调解是必要的。”周恩来也考虑到在国民党的严重政治压迫下，这样断然的处置可能带来什么后果，但他处之泰然，向党中央表示：“我们一切都准备了，即他捕杀讨扣，毫无所惧。”很快接到延安的回电：同意恩来同志所取的立场，指示不拒绝谈判。25 日，周恩来又电告中央：“今晨张冲又来，约谈三小时，我坚决告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他苦苦哀求，甚至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都可以。’我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显然国民党方面已开始软下来了。第二天，周恩来面告张冲，我们中央的答复：“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张冲仍一再要求出席参政会，并说，“即使董、邓只出席一人也好。”周恩来讥讽道：“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来捧场，岂不是侮辱？”并再次肯定地告诉他，无条件出席是不可能的。

会期已经临近，各方面都在等待着中共参政员出席的消息。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国民党方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蒋介石侍从室不断用电话向王世杰询问消息。3 月 1 日参政会开幕那天清晨，张冲又奉蒋介石之命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遭到谢绝。当晚，周恩来电告中央：“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一百多国民党员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彩的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是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

周恩来配合党中央指挥的这场政治仗打得十分漂亮。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参政会是有足够理由的，但为了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参政会开会的第二天，周恩来又采取新的主动行动，致函张冲转蒋介石，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等等。这是周恩来、董必武于两天前向中央提出的建议并经中央采纳的。函中还说：“倘能蒙诸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敝党参政员届时必能报到出席。”接着，他又与董必武、邓颖超联名给各党派代表写信，告以我党为了顾全大局，“改定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此举“实已委屈求全”，倘能为当局接受，并有明确保证，我党参政员必定届时报到，如仍被拒绝，造成时局的恶化，也“问心可告无愧”。同时，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发表《中

共七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真相》的文章，但遭到新闻检查官的扣压。周恩来果断决定不经送审出版增刊，并将中共方面有关本届参政会的全部文件公开发表，让广大群众都能了解并作出公断。

这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虽仍未被国民党所接受，中共参政员也没有出席这次参政会，但中共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忍耐为国的气度已博得了广大群众包括中间力量的同情。由于国内外强大舆论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收敛其反共活动。3 月 6 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的演说中，虽仍大谈其“军令”、“政令”之统一，但又不得不表示“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该会仍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会的参政员。

国民参政会闭幕后几天，在政治上进退维谷的蒋介石于 3 月 14 日约请周恩来谈话。周恩来应约谈完回到红岩，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与蒋介石谈判情况的报告，写完交给我发出时，已是 15 日清晨。周恩来在电文中写到，这次谈话宋美龄也在座。蒋介石谈话的目的在于和缓对立空气，已不再有前一时期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一开始就表示：“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开会之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周恩来将新四军事件和近来各地政治压迫的状况说了一遍，蒋介石对新四军事件有意置而不答，对各地的政治压迫则推说，这是底下做的，不明白他的意旨；对周恩来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表示都可以做到。周恩来还提到防地、扩军问题，蒋对防地问题没有直接回答，也没有再讲开往黄河北岸的事，只是含糊其词地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会谈进行了半小时，最后蒋介石说下星期再见面，宋美龄并说还要请他吃饭。报告中还说，蒋在我们政治攻势下，为敷衍局面，采取表面和缓而实际仍在加紧布置以便各个击破。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3 月 25 日，宋美龄又出面宴请周恩来、邓颖超。蒋介石、贺耀组、张冲也在座。席间周恩来同蒋谈了停止军事进攻和制止政治压迫等问题，总的来看：“今天见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轻微缓和，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从此，时局暂时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军事进攻开始，而以政治失败告终。

这次反共高潮，前后经历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在这充满着惊涛骇浪的日子，国共两党的关系发展到破裂的边缘，问题的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极端严重的后果。周恩来在这些风云险恶的日子里，始终屹立在斗争的第一线。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大义凛然，从容沉着，密切配合党中央机智灵活地处理各种复杂事态，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巧妙而又恰到好处地击退了国民党的又一次猖狂进攻，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包括中间阶层的同情和信任。国民党无论是用硬的高压威吓，还是用软的哄骗哀求，始终奈何不了他。正如中共中央在 3 月 22 日的文件中所描述的：“蒋介石在这次斗争中，遭遇到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当时我们坚持在红岩工作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所惧。

# 隐蔽精干积蓄力量

## 贯彻“十六字方针”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在第二次反共高潮和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间，也就是从 1941 年春到 1943 年夏，虽然国民党当局没有和我们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仅仅是表面上的缓和，呈现“上松下紧”的趋势。国民党军警宪特到处抓人捕人，压制民主，制造恐怖，整个国统区的环境十分险恶，这就要求国统区党的工作必须有一个重大的转变，以适应新的形势。但是国统区的党组织仍习惯于国共关系比较融洽时那种半公开、半秘密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对国民党政策的急剧转变缺乏必要的警惕。许多党员参加抗日群众组织，到处公开活动，政治面目已经暴露出来。现在要隐蔽组织，改变工作方法，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而且国民党和我们经过十年内战，对我们秘密工作情况有所了解，迫害共产党是有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1940 年 3 月 14 日，“抢米事件”发生时，周恩来正在从莫斯科回延安的路上。3 月 31 日，中共中央来电指出，“成都事件”应引起整个南方局党组织的严重警惕，揭露反共投降分子的阴谋，干部和党员要调动和隐蔽。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博古采取了必要措施，避免了一些损失。周恩来回到延安后才知道这一情况，在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工作的会议上，周恩来提出：“领导机关要隐蔽起来，干部要职业化，隐蔽在群众中”的意见。随后，周恩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 5 月 4 日起草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这个文件明确提出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这就是著名的“十六字”方针。

周恩来于 1940 年 5 月底回到重庆，马上通知南方局所属各省特委负责人迅速赶到重庆，传达中央这一方针，并研究工作，制定对策。6 月初以后，钱瑛、徐特立、高文华、廖志高、廖承志、李克农、方方等人先后到重庆，周恩来连续召开会议，听取各地的工作汇报，就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和共产党应采取的方针策略等问题作了报告，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隐蔽精干的措施。他听取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的工作汇报后，肯定了桂林办事处的工作成绩，也指出有太暴露的弱点。南方局还作出决定，将广东省委划分为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何、白“皓电”发表后，局势进一步恶化。周恩来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设立两个地域性的工作委员会，使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同南方局领导的公开合法活动分开。这两个工作委员会，一个是西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南工委，管理川东、川康、云南、贵州、鄂西、湖南等地的工作，书记先是孔原，后是钱瑛，副书记是廖志高；另一个是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管理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香港、澳门等地的工作，书记是方方，副书记是张文彬。周恩来要求各地的党组织完全转入地下的同时，进行干部审查，把重点放在肃清内奸和打入社会两方面，撤退已经暴露的干部和党员。

尽管周恩来和南方局未雨绸缪，先作准备，抢在“皖南事变”发生以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鄂西特委和南委还是遭受了顽固派的破坏。

皖面事变发生前后，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同志对鄂西地下党十分关心。因为驻守恩施的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湖北省主席陈诚是一个坚决反共的顽固派，他诽谤共产党是披着革命外衣的“特种汉奸”，叫嚣说，“我们第六战区里面绝对不能有特种汉奸的存在”，“必须以军事力量彻底铲除之。”在这种情况下，鄂西特委的处境就十分危险了。董必武当时给民主人士、原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李范一写了封信，请他设法保护鄂西的党组织，李范一也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但是由于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何彬）对特委交通员向仲亚被捕之事没有引起高度警惕，以为与向仲亚单线联系的特委秘书郑新民的真实姓名、职业和住址向都不知道。实际上郑新民违反地下党的纪律，早已告诉了向仲亚，致使郑新民被捕。向仲亚和郑新民都相继被捕，最后导致何功伟本人的被捕以及鄂西特委遭到严重破坏。幸好特委组织部长王栋从外地巡视工作回到恩施时发现情况突变，赶紧在利川拦住了急欲赶回恩施的鄂西特委副书记马识途。他们立即分两路到各县组织撤退和疏散，否则损失将会更大。

南方局是 1941 年 1 月下旬知道鄂西特委遭到破坏消息的，后来利川县委书记王宇光奉命到重庆汇报工作时知道了详细情况。2 月 25 日，周恩来起草了一份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说：“1 月 20 日，湖北恩施（陈诚所在地）实行全城检查，计共捕去 400 多人。特委书记何彬（何功伟）被捕，现正设法营救中。”这个时候，董必武又给湖北省临时参议长石瑛去信，请他设法保全被捕的何功伟等人的安全。石瑛一再进言规劝，陈诚却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于 1941 年 11 月 17 日将何功伟等人枪杀。鄂西事件发生在 1941 年，搜捕持续将近四年，先后共捕去 1000 人，损失可谓惨重。

1941 年 5 月左右，钱瑛在重庆召集鄂西地下党有关同志开了一个会，讨论鄂西特委遭受破坏的教训及善后工作。周恩来说何功伟等人的表现很英勇，但跑街似的救亡作风害死人，对工作方法、组织方式转变不彻底的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鄂西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深感国统区地下党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的转变还不够彻底。必须进一步贯彻十六字方针，真正做到转入地下，扎根群众，才能使国统区的党组织成为秘密的、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

1941 年 5 月，中共中央接连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地方的党部坚决采取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认真地决心地将党的力量有计划地隐蔽和撤退。把党和群众工作的中心放在利用所可利用的社会习惯、政府法令与合法组织（如保甲联保等）的方面，去进行与群众联系的长期埋伏工作。”

接到指示后，周恩来立刻召集会议进行研究。会议要求各级党从组织形式到工作方法实行完全转变，各地方党组织与公开机关脱离联系，真正走向地下。会议研究了缩小各级领导机构、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尽量深入社会、严格秘密工作制度等措施。

周恩来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在他和南方局的领导下，国统区党组织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实行了转变，采取了许多从实际出发的具体方针和做法。首先是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上层活动和下层活动严格分开。办事处是合法机关，南方局虽是秘密的，但它的领导人和许多工作人员也都有公开的合法身份，因此，他们一般不同地下党发生关系。同样，从事秘密工作

的人员也不轻易到办事处去，一般也不同南方局、办事处的人员接触。地下党同南方局的联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由省委或特委的负责人亲自到红岩去汇报工作并接受指示；二是由南方局派交通员送去指示或接受报告，一些简单的事情就由交通员转达。在工作范围上，地下党主要做一般群众的工作，做上层人物工作的，只是南方局领导人或专门指定的人。做下层工作的党员同做上层工作的党员，即使在同一部门里，相互间也不交换情况，不发生横的关系，实行单线联系。党组织布置任务、研究和讨论工作，不用开会的方式，而是个别进行。党员向组织汇报工作，也采用这种方式。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员减少，机关地址常常变换，这些也只有少数负责联系的人知道。例如，领导重庆等地工作的川东特委的地址只有周恩来、董必武、孔原知道，但他们也不去。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住的地方，特委委员们也都不了解，因为经常变更。他的名字也常换，在川东工作五年，国民党还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名字。还有一种，就是充分利用合法的团体和组织，做发动和争取群众的工作，凡是有群众参加的社团、组织，不管它是灰色的、黄色的，地下党都要设法进到里面去。

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员该怎么办呢？周恩来强调，应该“职业化”和“社会化”。1939 年以前，做地下工作的党员没有职业和社会身份还可以生存，以后就不行了。皖南事变以后，更不行了。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一再强调：“每个党员及领导干部都要有职业”，“除了必要的少数人，一般的党员不能依靠党生活，要让党员在社会上为生活而斗争”，“要使党员社会化，不仅不脱离社会，而且要更深入社会”。周恩来又说，党员要“研究学问，学习主义，巧妙地实现党的政策，但不要随便发动斗争”，“要多交朋友”。后来上述精神被概括为“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这就是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领导人从对国统区党的工作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出来的，是对秘密党组织建设的创造性发展。周恩来要求南方局所属学生党员努力学好功课，争取优异成绩；在各部门工作的党员要搞好本身的业务；所有党员要广交朋友，要找到合法的社会职业，广泛地进入地方保甲、教育、经济、军事等团体，能取得较高的社会职业更好，一切言论、行动要同本身的职业和地位相称，反对急性和暴露。地下党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找到了职业，深入了社会。比如，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在重庆税务局谋到一份差事，荣高棠在电力公司当抄表员，是一个收入菲薄的小职员。马识途在鄂西特委遭到破坏后，经南方局批准考入了西南联大读书。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在红岩村会见三个美国兵的事早已世人皆知。这三个美国兵在昆明时就和马识途有密切的联系。

1941 年 12 月到 1942 年 1 月，周恩来把孔原、钱瑛等西南地区的领导干部调回红岩，总结两年来的经验教训，研究今后的斗争，会开了很长时间，我担任会议记录。周恩来最后作了总结发言，他说：为了贯彻中央规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必须把西南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为此，提出以下七个条件：（一）要使五千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二）要在主要的群众集聚的单位（工厂、学校、农村、大机关等）建立起一个乃至数个平行的支部。要在主要的工作部门和机关（如行政机关、团体、公司、交通经济部门等）保持有我党的组织或个人的联系。（三）要使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领导的能力和自信，不要怕犯错误，要能认识和改正错误。要善于

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党的方针能在每一项实际工作（组织的改编、干部和党员的审查、反奸细的斗争，秘密工作的教育等）中体现出来。（四）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使西南党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地下党，成为群众的党。（五）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政策、人物和活动，首先要知道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特别是特务机关的经常情况和紧急措施。（六）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这种工作是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七）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联系和党内联系相配合，但配合不是暴露。周恩来最后强调指出，“这七点都做到了，我们西南党组织就是一个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时机一到，立即可以起来战斗。”周恩来在会上还提出今后党组织应彻底地实行平行组织，党员转地不转党，并就彻底审查干部，支部工作，组织的转变，党的发展，宣传与学习和调查研究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继续巩固领导机关以及反奸细的斗争等问题作了指示。

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西南各省党组织贯彻会议精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尽管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破坏地下党，西南各省的党组织真正地做到了转入地下，扎根群众，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因而得到巩固和发展。抗日战争后期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高涨，可以说是这个时期工作的重要成果。

## “南委”遭破坏前后

对于南委的工作，周恩来也非常重视。1941 年 10 月 24 日，南方局开会总结大后方工作的教训，周恩来强调：大后方党的任务是建立秘密党，保存力量，不能搞武装斗争。会后他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南方局对南委工作的意见。针对南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国统区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路线，而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路线。且武装斗争的干部，不能同时领导秘密组织；做秘密工作的干部，更不能同时领导武装斗争。如两者同时进行，必会牺牲一种。因两者在大后方的政策是相矛盾的，只能勉强支持于一时，而不能保存在永久，而且必致破坏秘密组织。损失力量。他指出南委工作面临着严重的局面，其根本原因是秘密工作与武装力量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根据这种情况，他指示南委，要隐蔽组织，深入社会，而不是上山和武装斗争。他认为这要作为大后方的工作路线问题确定下来。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

尽管地下党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止党员的身份暴露，但是特务机关破坏党组织的事件，仍难以完全避免。南委所属的东南和华南地区，周恩来和南方局对它不能像对西南各省那样实行经常而具体的领导，面临的局势就严重得多，1942 年夏天，南委由于叛徒出卖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严重破坏。这是继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又一严重反共事件。

1941 年 7 月间，中共江西省委遭到国民党中统局特务破坏，省委书记谢育才被捕，省委电台台长林云生叛变，电台被中统局江西特务机关控制。中统大特务、叛徒徐锡根亲自到江西吉安参与策划。由于中统特务对外严密封锁消息，把在江西吉安的所有与广东有关的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全部拘捕，对江西全省进行大搜捕，并命原江西省委的电台人员，仍照过去的呼号、波长、时断时续地对南委电台发出呼叫，并询问延安台的呼号、波长，企图骗取南委电台和它通报，引起南委电台值班员的怀疑，使特务的企图没有得逞。到 1942 年间，江西省委所属党组织基本瓦解，44 个县委，200 多个区委和绝大部分的支部都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摧残，2000 多名党员被投入监狱。2000 多名农村党员被强行“管训”。对于这么严重的一件大事，南委几乎有大半年的时间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

南委对江西省委遭到破坏的情况毫无察觉，但对江西电台中断联系三、四个月还是有所警惕的，1942 年 2 月，江西电台诡称机器损坏现已修好，要求恢复联系。起初，因南委负责人有所警惕，要江西台说明中断的原因，汇报中断后的工作情况，并决定暂不给江西任何指示。江西台陆续发来一些假的情况汇报，南委书记方方交宣传部长涂振农、组织部长郭潜等研究，认为没有问题。于是方方决定派郭潜去传达指示和检查江西工作，并给谢育才发一封明文隐语的信，要谢 5 月中旬到曲江与郭潜见面。

这时，谢育才感到情势十分危急，为向南委报信，应付敌人，争取出狱，遂填写了自首书。特务们为了钓大鱼，把谢育才夫妇和未满月的婴儿放出监狱，软禁起来。

特务获得南委通知谢育才去曲江和郭潜联系的重要情报后，立即商议诱捕郭潜。特务询问谢育才有关南委的驻地以及“全福处”是人名还是地名等情况，被谢育才胡乱应付过去。谢育才知道这个“全福”是中共福建平和县

长乐地区区委书记张全福，找到了他就可能找到南委，情况已是万分火急，不能再拖了。他和妻子趁看守疏忽，弃下婴儿逃走，找到张全福，说明江西省委已遭到破坏。5 月 26 日，方方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发电报给郭潜，要他迅速撤离。但郭潜没有马上翻译电报，被特务逮捕，当晚郭潜就叛变了。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郭潜带领国民党特务捕去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破坏了粤北省委机关。方方得知消息后，立即电告重庆。周恩来心急如焚，要我随时和南委电台保持联系，一有情况，立即通知他，不管是什么时候都要马上向他报告。所以那天半夜当我收到粤北省委急电，得知郭潜叛变，李大林被捕时，马上叫醒刚入睡的周恩来。

周恩来看完电报，脸色就变了，连说糟糕，他皱着眉，沉思片刻，起草了一份给南委的急电，要方方速告在曲江的廖承志即到重庆，如走不了，也一定要住在他的母亲何香凝处。他知道郭潜叛变，事态将急剧转变，很为廖承志的处境担忧。很不幸，由于南委未与廖承志联系上，廖于 5 月 30 日被捕。6 月 6 日，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和宣传部长涂振农也被捕了。

6 月 8 日，周恩来得知廖承志被捕后，又致电方方，要求他：一、不仅与江西而且与粤北断绝一切来往，南委负责同志立即分散隐蔽；二、南委同承志同志及从香港归来的一切公开关系完全断绝；三、停止派人往桂林取款，以免波及；四、立即斩断一切上层的公开关系；五、你们直接管辖的下级干部暂停止活动；六、立即停止与江西电台联络，不知怎么回事，我们一直呼叫南委电台，都没有回声，这封电报终于没能发出去。后来才知道 6 月 3 日南委电台因一个摇马达的人向反动派告密遭到破坏，南委台当然不可能听到我们的呼叫。

由于劳累过度，6 月下旬周恩来小肠疝气发炎须动手术，住进了歌乐山中央医院。这时期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主持。在医院里，周恩来仍然十分关心南委事件，嘱咐我们要随时向他汇报事态的发展。手术是著名外科大夫王厉耕做的，做得很好，但需要静养，南方局把情况报告中央后，毛泽东为此给董必武发了一个电报说：“ 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 ”为让周恩来安心养病，董必武命令一律不准打扰周恩来，探视要经批准，也不准谈工作。

7 月 10 日，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老先生因病逝世，红岩的人都非常悲痛，但都不敢告诉周恩来。大家知道周恩来是极重感情的人，对父亲一向很孝敬，倘若让他知道老人过世的消息，精神上会受到刺激，对他养病不利。因此，董必武召集邓颖超、吴克坚、钱之光和我专门开会研究办法，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暂不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待他出院后再报告，周老先生灵柩“ 病有好转，请放心 ”。我和吴克坚怀着矛盾的心情去医院。在车上我们互相叮嘱要沉着气，不要露马脚，到医院后，我们没有露马脚。算是完成一项违心的任务。出了医院，我俩都汗流浃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周恩来同志面前说谎话。每想起此事，都很难过。

事情出乎意料，当 7 月 13 日周恩来出院回红岩二楼办公室，得知父亲去世己三日时，悲痛欲绝，恸哭不已。随后大声责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为什么不通知他。钱之光不敢回答。周恩来特别责怪邓大姐说：“ 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你为什么也瞒我？ ”邓大姐只得流着眼泪认错。一些同志闻声到二楼走廊，听到这些话，都为之感动得流泪。我更是泪流满面。这天晚上，周恩来为父亲守灵至拂晓。

17 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泽东立即复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中央领导同志之间的深厚感情，由此可见。

办完父亲的丧事后，周恩来又投入紧张的工作中。这时南委机关和闽西、潮梅等地方党组织仍然受到严重的威胁。8 月，经中央同意，周恩来向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发出电报指示：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活动；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一律转移到游击区工作，其余干部应利用教书、做工、做小商贩等各种社会职业做掩护，实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等“三勤”活动。何时恢复组织活动，等待中央指示决定。并要尹林平迅速传达到他所知道的党组织。这时潮梅特委委员张克因知道南委被破坏，来到重庆汇报。周恩来指示继续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南委所管组织暂时停止组织活动，上下级不发生关系，何时恢复活动，等待通知；暴露的干部坚决转移、撤退；要方方在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坚决撤退到重庆。要求一切以安全力第一，防止事态的继续扩大。

此时南委个别领导人仍然认为“这次撤退是逃跑，是仓惶溃散。”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和南方局有关领导断然决定：南委领导机关取消，工作停止，南委电台停止使用，秘密埋藏；南委书记方方一定离开南方；潮梅特委、闽西特委直接同南方局联系。1943 年 5 月，方方回到重庆。6 月底，随同周恩来返回延安。

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期后，原南委所属各省的党组织，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保存了力量，坚持下来了。1942 年底，南方局根据形势的发展，指示广东党组织以尹林平、梁广、连贯组成临时省委。1944 年后，各地党组织陆续恢复活动，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日寇侵占韶关打通粤汉线时，各地党组织动员大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东江纵队和各地抗日游击队，闽西南和粤东地区党组织的活动也恢复了，并开展了武装斗争。他们在抗战后期和迎接全国解放的斗争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 整风运动与审干

从 1942 年春到 1945 年春，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这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的南方局机关的整风和审干，在时间上和步骤上与延安中央机关是一致的，发展是健康的，成效也十分显著。

南方局对干部的学习，一直很重视。在整风运动开展以前，就学习了《联共党史》及党的政策、时事、中国历史等。还请了郭沫若、章伯钧等知名人士给干部做报告。

1941 年 5 月，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发表后，周恩来立即组织南方局有关负责人进行学习和讨论，开始了南方局整风学习运动的准备阶段。不久，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南方局同志都及时进行了学习。这一阶段，主要是学习党史，总结历史经验。在学习过程中，周恩来的讲话总给人以启迪，发人深省。他和董必武、邓颖超都分别参加所属的支部、小组活动，和党员一起参加讨论，并联系国统区工作实际和自己思想实际，进行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

1941 年 9 月，党中央作出高级干部学习的决定，开始学习“两条路线”文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0 月初，为贯彻党中央的这一决定，南方局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共 25 人组成的学习组，主要学习思想方法论和中共党史，学习时间为半年。这次学习，周恩来亲自讲述从建党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史，一共讲了十多次，一直讲到南方局整风学习运动全面铺开以后。

1942 年 2 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同年 6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周恩来立即在南方局会议上讨论整风学习办法。决定成立学习委员会，由周恩来、董必武亲自挂帅，南方局委员和各部门负责人，办事处、《新华日报》的负责人参加，宋平为秘书。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高级组，其他干部按工作性质和政治文化程度分别参加中级、初级组，三个组分别学习。由于许多整风文件国民党不准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地方党组织不容易收到，周恩来就电告中央办公厅通知新华社，每天专门按时向国统区广播，除播发前方战报和解放区建设新闻外，并播发整风学习材料，可公开发表的，用明码播出，不宜公开发表的，用比较简单的“党密”播出。这样，地方党组织只要一部收音机就可以直接收到学习文件，使整风学习可以同时在各地开展。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南方局又专门布置了在文化战线工作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学习，联系工作和实际，端正文艺思想，促进文化工作。

和延安一样，南方局也是学习文件，联系工作和思想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根据国统区斗争尖锐、环境复杂，周恩来特别强调在整风学习中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及和风细雨的方针，进行正面教育，不是把整风当整人。学习的各个阶段都由周恩来、董必武亲自作动员部署和总结报告，他们除参加高级组学习外，还分别参加其他组会议，及时指导。周恩来等领导人，既是领导，又是学习中的普通一员，并能认真地联系自己的思想

实际，严格地剖析自己，从不以领导自居，不以改造别人的面孔出现。他曾在大会上系统地讲述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先是“左”倾后是右倾错误对革命造成的危害，阐明他们都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结果。他特别把自己摆进去，不止一次地讲自己所犯的错误，当众作严格的自我批评，使大家深受教育，不少干部党员受到启发后，深挖自己的毛病，痛下决心彻底改正。他教导大家学习马列主义贵在联系实际，具体地分析问题，正确地解决问题。在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引导和教育下，南方局同志在整风学习中，坚持了高标准严要求，大家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自 1930 年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没有好好学习过。1936 年 6 月好不容易在瓦窑堡进红军大学学习，可是很快又调到军委二局工作了。以后虽然到红大听了一些课，但对共产主义 ABC 还不入门，西安事变后又调我到西安办事处工作。虽然很想学习，但是没有机会。恩来同志曾经批准我回延安学习，接替工作的刘三源也来了，但是后来又因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工作紧张没有去成。所以 1940 年南方局组织学习《联共党史》时，我就积极投入学习，在学习中提高理论和政治水平，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内路线斗争史，是听到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报告后才认识的。特别是经过整风学习，在思想方法、党性修养和工作方法等各方面，都有比较大的提高。这是党中央和南方局正确领导的结果。我同许多在红岩一战斗和学习过的同志，都认为红岩既是党在国统区的指挥部和战斗堡垒，也是理论密切结合实际的党校。不仅使大家完成了当时的艰巨任务，更为以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从政治思想和工作作风各方面，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段十分可贵的时光。

为帮助地方党进行整风学习，南方局曾调一些负责同志到红岩参加学习，或在招待所内单独学习，取得经验后即回到地方去领导学习。

南方局的整风除了干部学习以外，《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也开展了整风改版活动。1942 年年初，《新华日报》刊登了党外人士张申府《新华、新华，我看着你生长、长大——<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祝辞》。经《解放日报》转载，毛泽东阅后致电周恩来说，申府文章“表示对我满腔热情”。“他希望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这一点是很对的，新华、解放都应该实行。”还说要改进《新华日报》，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呼声。周恩来立即对《新华日报》的整风改版工作进行了讨论和布置。1942 年 4 月 26 日，《新华日报》在重要版面上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改造党报的通知》，并进行了一次广泛征求读者对改版意见的活动，收到读者大量的批评和建议。同时，又在内部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肯定了成绩，指出了错误和缺点，提高了大家的认识。经过大量的准备工作，《新华日报》于 9 月 18 日正式改版，用更多的版面反映党外人士和群众的呼声。为了帮助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开展整风学习，创办了《团结》专刊。周恩来写了发刊词《团结的旨趣》，他引用列宁的话：“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且学会克服缺点。”还说：“我们愿意认真检讨自己，我们尤其愿意诚恳纠正这些错误，我们愿意揭露错误的原因，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我们尤其愿意将这些原因和方法提供朋友们读者们做参考，做借鉴。”这篇短文反映了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坦白襟怀，赢得了普遍的赞许。《团结》刊头的两个字是毛泽东的手迹。这是怎么来的呢？说起来，事有凑巧。早在 1938 年 8 月，王明、周恩来、博古、徐特立回延安开六中全会，我是随行人员，带了一本日本造的棉纸本到延安请中央领导同志题字。我先请毛主席题字，他即题了“团结”

两字。后又请朱总司令题，大概这种纸好写，他便题了“坚持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多张。我带到重庆一直保存着。恰好我送电报给周恩来时，看到他正在写《团结的旨趣》，知道是为《团结》专刊写的，我突然想起还保存有毛主席的题字，便马上拿来给他看，他很高兴，把毛主席题字和他写的稿子送报馆，报馆即用木刻刊出。大家看到毛泽东题字后都很高兴。以后许多同志都根据整风精神在《团结》上发表文章。我也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谈党性与个性》。我的观点是：每个共产党员都有自己的个性，但党性是第一位的，个性应服从于党性。

在周恩来、董必武等的领导下，《新华日报》经过整风、改版后面貌一新，这张报纸对国统区文化思想战线的影响和指导作用越来越大，统一战线的宣传有了新发展，国际宣传也更有成效，全面实现了“编得好，出得早，印得清，销得多”的口号，深得当时国统区群众的拥护和好评。《群众》杂志的革新也取得一定的成果。

整风学习基本结束后，接着是审查干部。由于南方局管理的干部，都接受了两次反共高潮的考验，政治思想和工作表现，平常都有所了解，经过整风学习就更清楚了。对干部的审查是由南方局组织部统一布置，采取“三结合”的方式进行，领导、骨干、本人互相配合，共同完成审干任务，又使被审查的人能主动、自觉配合组织迅速完成审查任务。这样就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被审查人的积极性和革命责任心。各单位都不搞运动，不搞神秘化。审查结论同本人见面并可提意见。各单位负责人的审查，由南方局领导同志分工负责。审查结论经领导批准后，一律用电报报告中央组织部备案。周恩来强调审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审于是对干部的认识，而不是清党，因此结论鉴定都要慎重，应不怕麻烦地允许本人申诉。当延安开展“抢救运动”的时候，有几位在南方局工作的干部被指控为潜入党内的××分子。材料转到南方局后，周恩来，董必武分别找到有关干部谈话，和风细雨地开导这些干部，使其历史地、细致地说清自己过去的经历，特别是对白色恐怖下搞地下工作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又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国民政府被迫释放“政治犯”时而无条件释放的干部，开导工作做得更深入，使他们放下包袱，解除顾虑。例如：某部门负责同志被揭发是国民党派进来的人，南方局领导同志根据对这个干部的了解和调查，根本否定了此事，并作了妥善的处理；又如国民党特务机关施用“反间计”，诬陷地下党中一对夫妇，经南方局领导审查后，作出了没有问题的结论。周恩来、董必武就是这样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对干部的友爱之情处理问题的，使当事人十分感动，其他同志也受到教育。

# 回顾历史总结经验

1943 年 5 月 22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一决定事先征求过包括中共中央在内的许多国家共产党的意见，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是它的一个支部，不少共产党员把共产国际看成是上级领导，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这件事，使党员的思想产生很大波动。

周恩来对共产国际是有深刻了解的，从 20 年代至 40 年代，他多次到过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都有过接触。国际的决议发出的第五天周恩来召开南方局扩大的干部会议，宣布这一决定，着重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做出这个决定是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到各国斗争的发展和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建议解散共产国际。我党中央表示同意共产国际的建议。他还指出，中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周恩来的讲话，使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人有了正确的认识。

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大作文章，酝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张治中告诉周恩来：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曾研究过对付中共的办法，有两种意见，一是中共交出军权、政权，组织可以合法；二是同国民党合并。有人叫嚣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面对这种局势，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告周恩来：“共产国际解散，中央即将开会讨论中国的政策，请你即回延安。”

6 月 28 日，周恩来和林彪、邓颖超、孔原等 100 多人分乘 4 辆卡车离开重庆，于 7 月 16 日回到延安。

8 月 2 日，中央办公厅举行欢迎晚会，周恩来在会上热情洋溢地说：“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二十二年党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周恩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他的讲话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周恩来回到延安，立即投入正在深入发展的整风运动。当时，审查干部的工作在进行中。担任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正在搞所谓“抢救失足者”。他夸大党内和边区内部的敌情，认为特务多如牛毛，要把这些“失足者”“抢救”出来。在康生领导下，延安各机关、学校普遍地开展“抢救运动”，许多干部无端受到怀疑，然后大搞“逼供信”，弄得人人自危，恐怖气氛弥漫着延安以至边区许多地方。国统区的地下党员更是普遍成为怀疑对象，因为康生等人在中央机关一些单位搞出了所谓“红旗党”（亦即伪装“红旗”的假共产党）。说甘肃、四川、河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十多个省的地下党都是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红旗党”。由于这些省的地下党组织大都是由周恩来领导的，这使他处境相当困难。但是他还是尽力保护了一些同志。他要中组部把南方局对干部的审干结论写出来，亲自为一些同志写证明。南方局机要科的苏艾芬，是从四川地下党调来的，在延

安学习时，被诬为“红旗党”关押在社会部，中组部将南方局对她的结论转到社会部，苏才被释放出来，当时边区政府整风运动负责人李维汉问周恩来：这（指所谓“红旗党”问题）是怎么回事？周恩来明确地回答：正在清理，没这回事。但恐怖气氛和“逼供信”现象仍然持续了不短时间，后来毛泽东发现这种搞法背离了审干的正确方向，立即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

在高级干部进入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阶段时，周恩来积极参加了这次学习和总结。

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在整风的高级学习组中，或在每个阶段的动员和总结报告中，已多次谈了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问题。但由于重庆环境险恶，加上工作繁忙，资料缺乏，使他难以集中时间，系统地思考问题，整理自己的思想。回到延安后，条件具备了。这年 8 月到 11 月，周恩来在参加高级干部的学习时，认真学习研究文件，阅读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写出了 5 万字笔记，并在一些会议上作了发言。

周恩来对 1928 年至 1930 年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的关于中国党的指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他认为：1928 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案是其中“最好的”一个，是召开中共六大的指导思想。它对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任务都作了正确的规定，既反对右倾余毒，又反对“左”倾高调。他说：六大决议还不如它，因未着重和彻底地反“左”倾。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周恩来是这次大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大会的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并在会上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六大决议的缺点，他也有一份责任。胸怀坦荡的周恩来，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出发，明确地指出了这个问题。

1929 年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党的四封信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对中国党影响至为深远的国际文件。第一封信，中心是反右倾，深怕中共不认识革命高潮不久就要到来。第二封信，中心是反对联合富农。第三封信，中心是发展赤色工会。第四封信，中心是反对一切国内外敌人，首先是反对改组派，认为形势已是全国危机和革命高涨。周恩来认为这四封信“都有错误”，因为当时中心应反“左”倾残余，仍着重反右倾，对富农、对工运、对改组派等的政策都偏“左”，而毫不重视利用间接后备军与开展群众日常工作问题。

1930 年 6 月和 10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党的两次决议和指示，周恩来认为也是错误的，是不正确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提出反对一切，迎接决战。立三路线是犯了“左”的错误，它仍认为右倾是主要危险。他指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正处于困难时期，在形势上，工运似还没有到革命新高涨，而只是有一些新高涨的征候；农村却有了新发展、新高涨，然而也是不平衡的。而对这样的现实，共产国际却一直坚持反对所谓“右倾错误”提出“准备总罢工和暴动”的口号，都是不从中国实际出发，以致一切指示都偏“左”。

周恩来的这些论断是正确的。1929 年，共产国际举行第十次大会，这次大会调门很高，认为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直接革命形势”，各国党都应该发动总罢工，总暴动，否则就是右倾。它还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直接撤换许多国家的党的领导人，推行着一条“左”的路线。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陆定一，曾把这次大会的详细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给这个报告加上一个题目叫《共产国际第十次大会的

总结》，发表在 1930 年 1 月的《布尔塞维克》杂志上，可见李立三对共产国际“左”的路线是坚决执行的，而且使它影响了全党。周恩来指出了这些问题，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工作中产生错误的国际原因。教条主义者把共产国际奉为神明，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都坚决执行。周恩来能够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错误，表现出他的胆识，也说明他与教条主义者的明显区别。

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本小册子，周恩来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写出了题为《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长篇笔记：他指出，在国际形势上，王明是急于要证明中国能首先胜利；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王明是急于要转变；在时局估计与任务上，王明是强调高潮，急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在党的任务上，王明是急于实现全国的进攻路线；对于长沙事变，王明认为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证明，而怪立三事先未作准备，所以不能坚持。这些都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认为王明对李立三错误的批评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李立三的观点本来基本正确或“还不很错”的（如关于革命对象问题），而王明“站在‘左’倾观点来反对”，强调反富农、反资产阶级、反对中间营垒的作用，“反而更错了。”第二种，李立三的观点已接近托洛茨基观点（如革命转变问题上的“不断革命”论），但王明同李立三一样，“也是急于转变论者”，把李立三的“左”倾观点保留了下来。第三种，李立三的观点确是错了（如促进革命形势问题上），可是王明同他也“只是程度之差”。总之，王明对当时立三路线的批判，完全是站在“左”倾的不正确的观点上去发表意见，不仅未击中立三路线的要害，还暗藏了许多托洛茨基的观点，这就给了新立三路线以全部思想根据和理论根据。周恩来还指出：六届三中全会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左”倾的错误，王明却说立三路线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更是大错。

周恩来在同刘少奇、洛甫、任弼时、李富春等座谈六届四中全会的情况后，对四中全会的决议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全会肯定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处于新的高潮，任务是进攻，这说明“仍然不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四中全会的决议“没有解决任何当前紧急的问题”，却“给了党以无穷的恶果”，“给了以后整个内战时期以失败的主要因素”。对四中全会这种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在三个月的学习中，周恩来对自己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的斗争历程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回顾过去时，他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他从不文过饰非，对自己在斗争中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作了认真的检查。六届二中全会是他和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他认为，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念”。三中全会决议“批评过去太温和”，在军事上反对游击主义，强调红军正规化、最大限度集中化，也是错误的。

在谈到到中央苏区的情况，当时他是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上海的中央多次指示要攻打中心城市，要求占领南昌、吉安、抚州，将几个苏区联成一片，威胁武汉，争取湘、鄂、赣首先胜利。他曾将困难电告中央，但由于没有更多地请教长期在苏区工作的同志，决定攻打赣州，贻误了向南京发展的大计划，他承担了责任。

博古、李德到中央苏区后，使“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都得到全面贯彻，特别在军事上直接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退出中央苏区。周恩来归纳李德军事指挥的实质是：战略上分兵以使敌人消耗，集中以使敌人消灭，短促突击以使敌人碉堡靠近，堡垒防御以暴露自己兵力。他认为，中央苏区和大量中央红军，就是这样被断送的。他总结中央苏区失败的原因说：（1）路线错误为主要的；（2）保卫苏区计划亦错误；（3）领导不健全；（4）“左”倾群众工作路线促成最后的失败。这些教训使他认识了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

对抗日战争以来党的工作，周恩来认为，为实现抗战，反对投降主义，特别是在上层活动方面取得了成绩。在孤立蒋介石及顽固派，教育和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利用英美反对内战等方面，都有显著成绩。在党的工作方面，坚持中央的隐蔽政策，在党员中组织整风学习，为党积蓄力量，教育、培养了干部，这是南方局和中共代表团在中央领导下所取得的成果。在检查这一时期工作中的缺点时，周恩来认为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的观念，对王明在抗战中的机会主义和统战中的投降主义有容忍退让的地方，这些，主要是在武汉时期出现的问题，事实上，他一向是尊重中央的，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特别是从 1939 年 5 月到 1943 年 6 月回到延安前这四年，他实行的路线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

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周恩来，在整风学习中不居功，不诿过，认真检查自己的缺点与不足，在小会上讲，也在大会上作报告。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也常常听他谈起过自己的失误，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严以责己的自我批评精神。

# 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上）

## 推动民盟的建立和发展

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和消极抗战，使许多爱国人士深为不满。1939 年 9 月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结束后，国统区掀起宪政运动高潮。这年 10 月，在董必武的帮助下，沈钧儒、邹韬奋、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以及青年党、国社党负责人张君励、左舜生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将参政会中热心国事、主张团结抗战和实施宪政的人士初步组织起来。这些人士大都和周恩来有过往来。1940 年 5 月，周恩来由苏联返国回到重庆，听说沈衡老、张表老他们要组织起来非常高兴。他在南方局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强调要加强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并多次同中间派负责人谈话，争取他们和共产党一起进行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斗争，制止顽固派挑动内战。

但是爱国进步人士的言论、行动却受到国民党顽固派越来越大的压力。1940 年 12 月，国民党改组参政会，取消了张申府、章伯钧、杜重远、章乃器的参政员资格，大批反共分子进入参政会，参政会被他们所左右，进步性日益消失，“皖南事变”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会议，某些中间派和无党派人士处境更加困难。为了团结抗战，促进民主，并争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深感必须加强团结，与共产党更密切地合作，这样原来组织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已不能适应需要，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张君励、左舜生等多次秘密集会，酝酿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团结中间力量进行争民主反内战的活动。为了得到共产党的支持，他们多次找周恩来商量这件事。周恩来非常赞同，坚决支持。1941 年 3 月中旬，他们在重庆鲜英的住宅特园开秘密会议，参加的有 17 个人，其中有国社党的张君励，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第三党（后来的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职教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等，商议正式成立组织。会上推定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起草组织的政治纲领，章伯钧、李璜、罗隆基起草组织法。3 月 19 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召开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选举黄炎培、张君励、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为常委，黄炎培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为什么沈钧儒没有参加会议呢？这是因为青年党的人认为沈钧儒和他领导的救国会太左了，暂时不要邀请他们参加。而救国会的人则觉得这个组织的政治情况太复杂，对这个组织不感兴趣。但民主政团同盟中的多数人却从整个国家利益出发，欢迎救国会参加。几十月后，救国会也参加进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就成了三党三派的联盟组织。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同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保持着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周恩来只要在重庆，总是应邀来参加他们的座谈会、聚餐会，相互交谈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对他们的困难，周恩来也尽力帮助解决。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是秘密组织，他们派梁漱溟去香港办《光明报》，准备把这个组织公诸于众，并发表政治纲领。但他们去香港办报困难很多，周恩来得知后，就介绍梁去找在香港的廖承志，要廖在人力财力方面给予帮助，使报纸办了起来。中国民

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在报上披露时，国民党方面才知道，但是已是既成事实了，想要干涉也为时晚矣！民主政团同盟的成员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国民党当局想取缔它又怕引起一场政治风波，反复权衡利害后，不得不默认。

在民主政团同盟中，青年党是一个比较大的政党，四川是它的重要根据地，而且左舜生身兼中常委和秘书长两职，盟务实际上操纵在青年党手里，许多盟员感到不满。不久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由张澜继任。张澜是无党派人士，便于调和各党派的关系，受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推重。这时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大批参加民盟，其中不少是著名的教授和自由职业者，无党派关系的人超过原来三党三派的人，在昆明等城市也成立了民盟的支部。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表示它不是以“政团”为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此后它的发展就更快了。

民盟从成立开始，就在政治上和共产党合作。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多次就抗日反蒋问题同周恩来等同志秘密协商，它已逐渐成为国共两党以外有影响的党派。1945 年 10 月，民盟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以和平建国为目标的新纲领，代表们争论很激烈。周恩来为帮助民盟把这次会议开好，多次到大会会址特园和张澜、沈钧儒等商谈，又约见各方面的代表，分别情况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他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民盟这样一个由几个党派联合组成的团体，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是必然的，作到求同存异就行了。坚持原则是好的，而非原则问题则可以适当让步，以利于人民事业。依靠进步，团结中间，帮助落后，反对敌人，这条原则是不能含糊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将来政治上一定范围内的分化，这对于各种政治集团来说也许难免，不过到非分化不可时分化了，不一定是坏事，但现在决不能闹翻。”他分析问题全面透彻，以理服人，对民盟开好一大，拟好政纲，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前各党派酝酿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几经反复协商出国共两党和民盟各 8 名。民盟内部把 8 名代表分配完后，张申府提出救国会分南北两派，他是北派代表人物，也应作代表。民盟内部颇感为难。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到特园民盟总部，对民盟领导人说，民盟 8 个名额确实不好安排，中共可让出 1 个名额，让民盟占 9 名，中共只要 7 名。这样问题解决了。周恩来以国事为重、顾全大局的精神，使在场的人无不感动。张澜激动地说：“共产党真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在政协会议期间，民盟和我党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国共和谈中，除少数人想走中间路线外，领导人尤其是张澜、沈钧儒和我党的合作是坚决的。建国后的 1949 年 11 月 5 日，民盟在北京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全体与会委员，在讲话中给民盟高度的评价。毛泽东肯定民盟“不仅过去起作用，将来还要起作用。”周恩来赞扬民盟“在中国革命中是有贡献的”，“团结了知识分子走向进步”，“包罗各方，取得进步，这正是（民盟的）伟大之处。”这里，周恩来为它倾注多少心血啊！

## 团结国民党民主派

国民党是一个成份复杂的政党，它的成员包括各个阶级、阶层的人。1927年“四一二”后，国民党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但是在它的上层人物中，仍然有一批人坚持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宋庆龄、何香凝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

宋庆龄以她在国民党中的特殊地位，在许多关键时刻支持帮助了中国共产党。30年代初，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宋庆龄和蔡元培、鲁迅等成立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了共产党人廖承志、陈赓等。她同共产国际和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抗战爆发后，她先在广州、后去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宣传中国的抗战，争取广泛的国际援助，募集来的资金主要用于解放区的医药救护、生产建设和儿童福利事业。周恩来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在广州与宋庆龄相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离开香港来到重庆，起先住在孔祥熙家中，国民党特务竟对她严密监视，对她的一举一动，都列入每天都要专送蒋介石的《情报辑要》。周恩来对宋庆龄的处境非常关心，特派邓颖超前往探望。几经周折，两位老朋友才得以见面。窗外却有人在监听，邓颖超还没有开口，宋庆龄就压低声音提醒她：“谈话谨慎，有人监视”。谁能想到，蒋介石对这位“国母”竟是这种态度。周恩来曾将这个情况向中共中央汇报，1942年4月发往延安的《关于重庆反共形势》的电文中，有一条说：“孙夫人住孔家，不仅不能见客，连其住屋内都借口房子不够，有人同住监视。每逢群众会，故意推孙夫人为主席团，但并不通知本人，企图使群众失望。”保盟总部迁到重庆后，周恩来特地把廖梦醒（廖承志的姐姐，中共党员）从澳门调到重庆，继续担任宋庆龄的秘书，以便保持联系。王炳南的德籍夫人王安娜也经常协助宋庆龄工作。在重庆期间，宋庆龄继续在政治上、物质上帮助共产党。1943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纪念，请宋庆龄题词，她欣然命笔，写了“发扬抗战国策，争取最后胜利”。这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诬蔑攻击共产党。宋庆龄感到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能沉默，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她严正指出：“应该实现总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民众，使他们都有平等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各党各派，也应给予同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党员得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争取最后胜利。”针锋相对地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至于物质上对共产党的支持，不仅是难以计数，而且是千方百计运到解放区。抗战初期，保盟就曾帮助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或扩大好几个国际和平医院，帮助过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1939年，保盟派出一个给八路军运送援华物资的大型车队，又为新四军募集购置医疗器械和药品的基金，由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到上海、香港洽购秘密运到解放区。1944年外国捐赠一台大型X光机，她决定转送延安，但如何送去是一个大问题。她让廖梦醒去找史迪威的副官杨孟东求援，史迪威当即同意派出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飞机运送，延安终于有了这种大型的医疗器械。宋庆龄对我党我军抗战事业的支持，是十分巨大的。

周恩来同何香凝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他一向很尊敬这位廖夫人。1924年他从法国回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就是由于廖仲恺的推荐。在广州，他和廖家亲如家人，廖梦醒一直叫周恩来“大哥”，周恩来则叫廖承志“小

廖”，直到廖承志已经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这个称呼也未改变。这说明他们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抗战期间，由于蒋介石的阻挠，何香凝不能到重庆来，周恩来仍非常关心她，常常通过在香港的廖承志了解她的情况。何香凝始终支持共产党，两个子女都参加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风雨同舟。“皖南事变”时，她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非常愤慨，与宋庆龄等通电给予严厉谴责。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周恩来非常担心何香凝的安全，指示香港党组织派人护送她到内地。

李济深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对日寇的退缩妥协。抗战开始后，他积极支持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武汉期间，有一天，周恩来去会见李济深，向他阐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深得李济深的赞同。李济深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蒋介石，建议组织最高国防会议，请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等抗战派出来主持。蒋介石对这封信置不答复。1938 年年底，李济深经衡阳、桂林辗转到达重庆，不久即邀请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在他的家中举行茶话会，在座的还有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中共代表同时和好几位国民党上层人物聚会，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周恩来和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也阐述了中共对团结抗战的政策。那时国民党顽固派在许多地方制造磨擦，周恩来希望朋友们协力制止这种逆流。南方局成立后，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同李济深建立了和衷共济的合作共事关系。1939 年 3 月，国民党在重庆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蒋介石任主任，李济深任第一副主任，主持工作。南方局派张友渔、梅龚彬等中共党员到这个委员会工作。李济深对他们给予信任和支持。他们出版了《战地通讯》、《战地评论》等刊物，并经常邀请在重庆的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加强团结抗战的宣传。战地党政委员会中有一批国民党的左派，南方局通过李济深对他们做工作。如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王葆真兼任冀察党政分会副主任，王赴任后得到李济深的同意，到解放区会晤朱德、彭德怀、后来又陪朱、彭到洛阳会晤卫立煌。抗战开始后，李济深和我们的关系是比较好的。

1940 年 6 月桂南战事失利后，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改为桂林办公厅。蒋介石觉得李济深留在重庆对他不利，调他担任桂林办公厅主任。这个单位名义上管辖四个战区八个省，实际上只是一个承转机关，没有实权。但李济深仍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他到任后，周恩来多次指示在桂林作统战工作的同志应充分认识李济深的重要地位，努力做好李济深的工作。起先由李克农与李济深建立良好关系，“八办”撤离桂林后，由在桂林负责统战工作的李亚群同李济深联系。同时，在李济深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如胡希民、张威、林伦彦、刘为群等，经常向李济深传达中共的政策主张，向南方局反映李济深的意见和要求。此外，还通过救国会和中共党员、上层民主人士如沈钧儒、胡愈之、杨东莼、范长江、李仕仁、陈劭先、陈此生、千家驹等，与李济深频繁接触，及时向他反映情况，说明中共的意图。这说明周恩来对李济深的重视，这些工作也确实取得良好的效果。李济深在桂林做了很多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工作，对我党的帮助很大。1940 年，国民党顽固派正准备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华侨赠送给八路军、新四军的物资要经过桂林办公厅批调车辆转运，常常受到顽固分子的阻挠，李克农、夏衍直接找了李济深，他亲自批给车辆，解决了运输的困难。在桂林以及途经桂林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李济深总是保护他们的安全，或给他们提供方便离开桂林，“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退，周恩来发电报请李济深给予照顾和

帮助。李立即指示有关人员，对“八办”人员的撤退和物资的转运要尽量给予方便，并派他的随从参谋张威去了解情况，及时向他报告，使“八办”的撤退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当国民党特务准备捣毁“八办”和抓人，李济深知道这一消息，亲自写条子通知李克农：“克农即走”，使得李克农逃出特务的魔爪。“皖南事变”后，张友渔从重庆转移到桂林，李济深设宴招待，并替他购买到香港的飞机票。桂林办公厅行政处长问李济深，“张友渔是共产党，给他买飞机票好吗？”李巧妙地回答：“张友渔是共产党，把他送走，不让他在这里‘捣乱’，不很好吗？”在李济深的帮助下，张友渔安全撤到香港。1941 年 3 月 4 日，邹韬奋从重庆转移到桂林，找到民主人士陈此生，邹告诉陈，他是从重庆秘密来桂林的，急须转往香港。陈即去找李济深，李即设法买到飞机票。次日，邹飞香港。他离开桂林两小时后，蒋介石发来急电，要李“坚决挽留”邹韬奋。李复电说，“人已走了”。这使邹韬奋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文化界著名共产党员陈翰笙隐居在桂林，被特务侦悉，准备逮捕，李济深得知后，便通知陈翰笙离开。对叶挺及其家属的照顾也很周到。“皖南事变”中叶挺被扣，李济深打电话给顾祝同，要他派医生给叶挺治病，又打电报给陈诚，要他对叶挺的安全关注。叶挺两次被押解到桂林，李济深购买一座房子供叶居住。蒋介石把叶挺转移到息烽后，叶的家属一直受到李的照顾。

李济深在桂林时，采取开明政策，桂林的民主空气是比较浓厚的，允许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开展活动。建立党领导的“新中国剧社”进行抗日宣传。桂林文化界举办大规模的“西南剧展”，李济深担任大会的名誉会长，支持剧展的工作。1943 年，南方局布置重庆、桂林、昆明地下党利用十月革命节机会举行集会，宣传苏联红军的伟大胜利，以鼓舞人们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信心。南方局派在桂林工作的同志商得李济深同意，在桂林举办纪念会，李济深不仅主持大会，而且题写了在《广西日报》上援苏专栏的标题，旗帜鲜明地支持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由于李济深的积极态度，使桂林的进步文化活动得以在“皖南事变”后又活跃起来。蒋介石对此深为不满，把他调回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以便就近控制。李济深迟迟没有去上任。1944 年夏季，日寇进军西南，桂林、柳州眼看将落入敌手，两广也将成为敌后。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遂即决定调 359 旅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赣粤边抗日根据地，南方局根据中央这一战略方针，进一步加强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周恩来通过地下党的同志向李济深转达口信：日寇南侵主要占领交通线，敌后还有大片国土，若桂林沦陷，先生最好回到苍梧家乡，组织民众武装，以民众自卫的形式，配合地下党游击队共同抗日。李济深接受了这个建议。南方局即把这个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任公也向梧州撤退，这是他们的新出路……他们开始不要做得太突出，仍以抗战口号斗争。”李济深和张发奎商议在南部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并联系他的旧部张炎、谭启秀，准备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桂林、柳州、梧州、南宁相继沦陷后，南路孤悬敌后，形势非常紧张。周恩来派人向李济深说：你以前是八路军的总指挥，我们现在用的是八路军的名义在北方抗日；你当过第四军军长，我们又用新四军名义在南方抗日，八路军和新四军两支力量，在北伐时期都有过光荣历史，我们要永远保持这种光荣历史，希望你不要忘记这段光荣历史。李济深听到这里，从座位上猛然站起来，问这些话真是周恩来说的吗？这位同志说，个别字句也许有出入，大意决不会错。李济深听后非

常激动。1945 年 6 月，李济深到玉林各地巡视。广西省政府玉林行署专员将他的行踪电告蒋介石，蒋即令宋子文、陈诚打电报要李济深回重庆。李复电说，只要蒋介石放弃独裁，实行抗日民主，他就到重庆，对蒋的劝回置之不理。李济深在玉林召集各界开会，宣传“自治、自卫”主张，批评蒋介石的独裁、腐败政治。中共对李济深的行动给予有力的支持。但是张炎在南路的武装起义失败，张炎牺牲，这对李济深是一个沉重打击。他要求从东江纵队借几个团的兵力，经过磋商，决定由东纵代为训练军事干部，兵源问题通过地方组织解决。7 月，李济深又派人和东纵联系，正好周恩来给东纵来电说：我党赞成李济深所提倡人民起来自治自卫的主张，其具体方案应是发展人民武装，实行地方自治。电报还说，粤桂各县布满蒋系特务，李的行动皆有报告，请转告他要深加警惕。不久日本宣布投降，此事也就没再进行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内战。南方局通过狄超白向李济深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希望李济深同何香凝等组织政治团体，促进实现民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李济深接受这个建议，从家乡到达广州，邀请当时在广州的蔡廷锴、李章达、梅龚彬等人商议，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6 年 3 月，李济深离广州去重庆，周恩来授意由冯玉祥、张澜出面，联合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4 月 28 日，周恩来、董必武在离开重庆前，宴请了李济深、冯玉祥、陈铭枢等人，交换对时局的意见。当时政协决议已被蒋介石所撕毁，内战已不可避免。李济深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坚决反对内战，并准备和蒋介石决裂。这年 11 月，周恩来从南京回延安前，指示党内做统战工作的同志把有可能遭到国民党迫害的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在港的中共地下党员要做好接应工作。李济深于 1947 年春到了香港，我党同志对他和家属的生活都作了妥善安排，并协助他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 年 5 月，李济深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于这年年底毅然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李济深脱离国民党统治集团，跟着共产党走上光辉道路，在许多重要关头，和周恩来都是息息相关的。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继续和冯玉祥密切往来。冯玉祥是真诚和共产党合作抗战的。1939 年，他的旧部鹿钟麟出任冀察战区司令长官，部队和我八路军比邻。鹿钟麟行前向冯辞行，冯告诉鹿要和八路军搞好团结。但鹿到任后，竟和我军搞磨擦。冯亲拟电稿给予指责，告诫他要和八路军搞好关系，团结抗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后，许多进步人士被捕，周恩来请冯玉祥帮助营救，冯都尽心尽力，先后营救了张申府、周茂藩等人。冯对国民党顽固派这种行径非常气愤，曾大骂何应钦是法西斯。

1941 年 11 月 14 日，是冯玉祥六十寿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伯渠都致电致词祝贺。周恩来亲笔写的祝辞词情并茂，感人肺腑。他称颂冯玉祥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在在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赞扬他“知士兵生涯，民间疾苦，也最懂得军民合作之利，这是今日抗战所必需”。“先生能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冯玉祥看到周恩来这篇祝辞，非常高兴。蒋介石来祝寿时，当天就看到了，默默无语，何应钦看后大为不满，在另一个场合说：“中央有一位大员，共产党把他捧上了天，此人不用提名，大家也知道。”就在这时，冯玉祥收到一封匿名信，打开一看，

竟有一颗子弹。信上写着：“你如与共产党来往，决以此弹对待。”这是国民党特务的恫吓行动。冯王祥冷笑着把子弹装进信封里，派人送交蒋介石。蒋假惺惺地回信说：“陪都重地，竟有此狂妄之徒，殊堪痛恨，已饬戴笠限期破案。”后来自然没有下文。

1946 年春，国民党一面和共产党谈判，一面积极准备内战。冯玉祥获悉第六绥靖区司令官周岳在花园口设立中心指挥部，企图在潢川平原诱歼我鄂豫皖边李先念、郑位三率领的新四军五师和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在这紧急关头，正好周恩来来访，冯玉祥对周恩来说：要吸收“皖南事变”的教训，不要相信蒋介石的和谈，中原部队应该转移到陕甘边区去。周恩来回来后急忙进行布置。6 月下旬，蒋军向中原部队大举进攻，但他们的主力被我军诱向东去，我中原部队主力已西越平汉线，安全撤退到目的地。

由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冯玉祥深为不满，他的许多言论和行动，使蒋很恼火，于是给他一个赴美考察水利专使的名义，把他送出国门。临行前周恩来去看望他，谆谆相告应把不能同行的子女先送离上海，以免发生意外，冯玉祥很感激周恩来对他的关怀。到达美国后，冯玉祥仍很关心国内的情况，在美的中共党员和民盟旧友，成立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推选冯玉祥为主席。冯应允了，并以主席的名义向杜鲁门、马歇尔和美国国会提出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1947 年 12 月，美国国会要讨论援蒋案时，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调查组邀请冯玉祥出席作证，冯讲了两小时，美国国会原来准备给蒋介石 6000 万美元，冯讲话后改为 1800 万美元。蒋介石对冯玉祥在美的活动非常不满，竟开除了他的党籍。这年冬天，冯玉样在美国作了数十次演讲，给蒋介石戴了四顶帽子：一、制造共产党的厂长；二、无底洞洞主；三、运输队队长；四、屠宰公司经理。他还用英文发表两篇文章，一篇是《我为什么与蒋决裂》，另一篇是《致蒋介石的公开信》，劝蒋立刻下台，以谢国人。美国曾经要拉拢他，派人对他说：美国政府是反对共产党的，只要你不要共产党，我们愿意帮助你们，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火有军火。冯玉祥义正辞严地拒绝了。1948 年，为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冯玉祥决定回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乘着苏联邮船返回祖国，不幸途中轮船起火，冯被窒息遇难。1953 年冯玉祥的骨灰安葬在泰山，周恩来亲自为墓碑题词。

张治中是深受蒋介石器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向畀以重任。张却始终和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周恩来私交很深，不仅国共合作的融洽时期如此，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以后，他的态度仍然不变。早在黄埔军校建立时，周恩来和张治中就共过事，周对张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对联共亲共身体力行，非常赞赏。张对周学识渊博，精明干练，非常钦佩。他们的友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一开始就出现了左右两派的斗争。张治中思想左倾，言词激烈，常常站在共产党一边。右派对他很不满，背后称他是“红色教官”，并把和他往来密切的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合称为“黄埔四凶”。由于受到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的影响，张治中向周恩来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很高兴地对他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目标较大，国共两党曾经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但今后保证一定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张治中虽然没有被接受入党，和周恩来的友谊却日益加深。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长时，曾向蒋介石建议：为了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职，最好请周恩来担任，他历充黄埔军校和东征军的政治部

主任，经验丰富，干练多才，担任此职最为适宜，但为蒋介石所拒绝。在十年内战中，蒋介石对江西苏区进行五次“围剿”，张治中退而办教育，躲避两党斗争的风暴。他虽曾五次统率大军，指挥过 1932 年上海“一二人”和 1937 年“八一三”抗战，但始终避免与中共军队作战，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未参与反共战争的稀有的一人。

抗战爆发后，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中共中央派徐特立为八路军代表到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王凌波任主任。张治中和我党在十年内战中中断的关系又接通了，张、徐合作得不错。有一次，国民党浏阳县长逮捕一名中共基层组织负责人，借故以刑事犯予以处决。徐特立告诉了张治中，张查明属实，即把那个县长撤职查办。长沙大火之后，周恩来见到张治中惊恐憔悴，既指出他的责任所在，也给予温言劝慰，张治中拟以国民党中宣部和政治部名义，发布《长沙大火真相说明》，稿子送周恩来审阅，周批评了国民政府“焦土抗战”方针的错误，但对文稿字斟句酌，多次修改，特别对起火原因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张治中对此由衷地感激，认为正当各方责难纷纷、落井下石之际，只有周恩来这个老朋友能对他持谅解态度。

1939 年 2 月，张治中到重庆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周恩来和张治中的公私往来都很多。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和张治中也有不少交往，互相之间以诚相待，共同为巩固国共合作和坚持抗战到底出力。“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濒于破裂，张治中忧心忡忡，但他无能为力，只得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利害。而在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仍尽力而为。

抗战后期，国共继续谈判，张治中是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这方面的情况将在后文论述。但有一件不寻常的事要在这里详细说明。抗战初期盛世才在新疆执行亲苏政策的时候，我党中央派了一批得力干部，包括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前往新疆帮助他工作，并派一批年轻党团员去学习航空，加上去苏联治病路过新疆的同志，为数不少。苏德战争后纳粹德国军队长驱直入，莫斯科已兵临城下，盛世才错误估计苏联必将失败，于是由亲苏转为反共，1942、1943 年两次把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全部逮捕入狱。1945 年 10 月，蒋介石派张治中去新疆处理伊犁、塔城、阿山暴动问题，周恩来和邓颖超到上清寺桂园访晤张治中，向他提出要求说：我们有一批同志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明，释放政治犯是写入《双十协定》的，你到新疆后务请设法将他们放出来。新疆情况很复杂，回内地路途又很遥远，请你派人将他们送回延安。你到迪化（现乌鲁木齐）后请先调查一下，几个重要人物如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还在不在。听说他们处境很坏，生活很苦，务请先改善一下。这里头有杨之华，你是认识的，你可和她联系，了解情况。邓颖超也对张夫人洪希厚说，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务请你们多多帮忙。张治中慨然答应。周恩来还说，托你带一点钱。张说，钱不必带了，这点事我还办得了。到了迪化，张治中即派屈武去看杨之华，竟遭到主管监狱的警务处长、军统特务胡振国的拒绝。张治中一怒之下，叫胡振国马上来见，当面训斥他：“我是蒋委员长派来的，我派人去见杨之华，你竟敢阻拦，是什么意思？”胡振国诚惶诚恐地当面道歉，答应让屈武再往。屈武和杨之华见面，又慰问狱中同志，并给他们送钱。同志们疑心是耍什么花招，经说明这是张治中的钱，张是周恩来多年的老朋友，请不要猜疑，他们才收下来。1946 年 3 月，他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4 月初到达迪化，遂即批示对狱中同志立即改善饮食；准许在狱中自由行动；每日供给报纸并代购书刊；准许

配偶会见。他先后三次给蒋介石去电，恳切陈词，要求释放这批中共人员，最后蒋介石不得不勉强同意。张派人向狱中同志宣布将释放他们，这些同志们有疑虑，提出先释放在迪化住一个时期，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报上刊登消息，然后再走。张治中判断，他们是怕上国民党特务的当，被弄出去在半路上杀掉。于是请他们派代表来。来的是杨之华等 6 人，张治中秘密和他们谈话，并请吃饭，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多心，释放并护送你们到延安是真的，这不但是毛泽东主席在重庆时提出的要求，也是周恩来先生谆谆嘱托。恩来先生从大革命起就和我是好朋友，我从重庆来新疆前，他们夫妇亲自到我家再三嘱托。你们一出狱就走，不能停留，更不能见报，否则有危险。”这样他们才相信了。张治中把护送的事交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办理，陶把这一任务交该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刘拟出了护送计划，对所需车辆、药品、医生、警卫、事务人员以及动身的日期、沿途路线都作了安排。临行前张治中特别召见刘亚哲谈话，作了周详的交代，指出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护送不是押送，要注意礼貌和态度。你护送到兰州，将有人接替你。迪化到兰州路远，又极不平静，虽有一排武装人员护送，仍须十分警惕。沿途要和驻军取得联系，必要时请他们协助。每到一地来电话或电报，有困难随时请示，只要遵照我的指示办事，一切由我负责。出发前，张治中分别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陕西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打电报，主要强调释放这批中共人员是经蒋介石同意的，由行营派人护送回延安，请沿途放行并妥善接待。同时也把这件事的简要情况和动身日期电告周恩来。他们动身前，张治中还派屈武代表他到狱中和中共人员见面、送行，祝他们一路平安。6 月 6 日，被释放人员由迪化出发，131 人中包括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高登榜、杨之华等党的高级干部，共乘 6 部大汽车，另有两部是武装人员和工作人员乘的。到达兰州后，原定由行营谭高参接替刘亚哲护送。杨之华等觉得刘办事负责，招待很好，致电张治中请求继续让刘护送，张立即复电同意。由兰州出发到达平凉，已是胡宗南的辖区，胡是反共著名的，来电指令将中共人员送咸阳招待所，不许直趋西安，听候处理。刘亚哲深知胡宗南不怀好意，咸阳可能成为中共人员的集中营，因此急电张治中报告请示，还没有收到复电，恰巧杨之华来告诉刘亚哲，说有一个同志突然高烧，很严重，要求急送西安抢救。刘亚哲灵机一动，心想这是个好借口，如连夜急行军，就可以闯过咸阳，到西安再设法。主意已定，马上发车，深夜一点钟经过咸阳，检查站只有一名哨兵，刘佩少将领章，站在车头一呼而过，哨兵不敢阻拦，后面的车鱼贯风驰跟上，不久即到西安。刘担心胡宗南知道就不好办了，心里很焦急。就同高登榜等商量和中共办事处联系，办事处负责人周子健闻讯立即把全部中共人员接到办事处，第二天胡宗南知道了，多方留难。刘亚哲急电张治中，张立即电胡宗南指出这批人员是蒋介石批准释放的，同时致电蒋介石请胡宗南放行。车队于 7 月 8 日到达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派人来接，刘亚哲即向来人办理全部移交手续。由于刘亚哲的机灵干练，护送任务胜利完成了。周恩来对张治中鼎力帮助深为感激，说这是“文白先生做的一件好事，在国共关系上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这时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这些同志如果不及早送回延安，后果将不堪设想。建国后，刘亚哲在铁道部工作，并任过全国政协委员。

周恩来对其他国民党上层人物，也都尽可能做团结合作、共同抗战的工作，通过有关人员和他们联系，使他们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于右任是国

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周恩来通过于的女婿屈武开展工作。他对屈武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一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于先生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上爱护他，帮助他认识两党合作团结抗战问题的重要性，对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于右任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蒙蔽，听信所谓国军在前线抗战，八路军挖国军的墙脚，收缴国军的枪枝，不打日本鬼子，一味扩充自己的势力。屈武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宣传告诉了于右任，并列举大量材料说明国民党军队在前方后方都围剿八路军。于惊奇地问：这是谁告诉你的？屈武说：主要是王炳南告诉我的，有些是周恩来先生亲自对我说的。他对屈武的介绍深信不疑，认识有所提高。“皖南事变”发生时，于右任拍着桌子大声说：“这种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

为了团结抗战，周恩来心胸宽广，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他说过，在团结群众交朋友中，“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1936 年 2 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即派张冲到西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谈判。张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过去曾是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是策划陷害周恩来的所谓“伍豪启事”的主谋者。但后来他主张与中共联合抗日。1937 年到 1941 年的 5 年国共谈判中，周恩来和张冲交往频繁，张冲也能做到及时把我党的意见向国民党蒋介石反映，在沟通两党关系中起了积极作用。“皖南事变”发生，张冲很气愤，曾对人说，“这使我没有脸见人。”张冲因病去世，周恩来送去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又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悼张淮南先生》，文中说：“淮南先生逝世将三月了。每念公谊，迄难忘怀。”“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周恩来这种诚挚的感情，也使国民党中一些人受到感动。

## 争取地方实力派

抗战期间，西南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龙云、邓锡侯、潘文华等，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他们有地盘，有军队，蒋介石采取的策略是既拉拢又处心积虑想要吃掉他们。因而这些人和蒋介石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皖南事变”后，为“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领导同志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鼓励他们支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同共产党互相配合。这些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早在 1938 年 4 月，周恩来在汉口时，知道刘文辉也在汉口，即派吴玉章和刘密谈，鼓励他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并接见刘的代表邹趣涛。刘文辉在四川地方军队中曾经一度是力量最大的一支，拥有 10 多万军队和 70 多县的地盘，后来被刘湘与邓锡侯、田颂尧的联军所击败，被迫退到西康。为摆脱困境，他施展了“多角外交”，企图东山再起，被人称为“多宝道人”。周恩来要邹趣涛转告刘文辉，希望他“变多宝为一宝”——坚持抗战，并指定四川的中共负责人罗世文和邹保持联系，1938 年夏天，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到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路过成都，曾到方正街刘宅和刘文辉会晤，谈话的主题是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妥协投降。这使刘文辉详细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这是刘文辉和我党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刘文辉自称，这次会晤为他“亲共开辟一条坦途”。1939 年夏天，重庆接连受日寇飞机的大轰炸，军政机关都疏散到乡下。国民党当权派中所谓“抗战亡国论”又抬头了，董必武、林伯渠在曾家岩潘文华家再次会晤刘文辉，向他分析国内外形势，阐述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这次会晤作用很大，刘文辉说：“尔后我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能坚决下来了，这次会晤是有重大影响的。”1942 年 2 月，通过民盟的朋友联系，周恩来和刘文辉直接见面。当时重庆布满国民党特务，他们只好在极秘密中进行。双方都不带随从人员，深夜里才到机房街实业界人士吴晋航家中。晤谈时在座的只有他们两人。周恩来针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况对刘文辉说：“当前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他表示：“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措施要坚决反对和有效抵制，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予支持。这次会晤后不久，周恩来请示党中央同意，起草了八路军与刘文辉二十四军之间《抗日合作协定十二条》，根据这个协定，周恩来派王少春偕夫人秦惠芬带一个小女儿和报务员杨作爱（不久因病回红岩，由石励代替）到雅安刘的司令部设一个秘密电台，与延安党中央直接通报。王少春每天通过电台收听新华社广播，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刘文辉传达，同时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这个电台只有刘和极个别亲信知道，因而经历过将近 8 年，一直到刘起义。但是，当中也有一个小波折。1947 年 3 月延安失守以后，刘文辉忽然停止了供给王少春等人的生活费。王少春即给“周公”发了一个电报报告此事，我在城工部收到电报后即转报正在陕北的周恩来。周即给刘文辉发了一个电报说：如自乾（刘文辉号）兄认为不需用电台，请代为王少春等购机票送往香港。这份电报给刘文辉将了一军，又立即恢复供

给生活费。以后周恩来谈到此事时说，这是刘文辉对当时时局估计有些动摇的表现。

1943 年和 1944 年，刘文辉部在川康边境，蒋介石有如芒刺在背，一直想拔除它，不是以“对藏用兵”企图将它消灭在康藏高原，就是要派蒋的军队进入刘的驻地，刘文辉一年到头都惶惶不安。王若飞通过刘的代表给他分析形势，指出蒋介石集团是外强中干，如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蒋就会知难而退。刘文辉接受这个意见，坚持了反蒋斗争，终于一次次地化险为夷。他感动地说：“这就是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对我的有力支持。”刘文辉与共产党的联系，可能蒋介石也并非全无察觉。有一次，蒋和刘谈话试探，刘对蒋说：“我是大军阀、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样样占全了，共产党搞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哪里还会要我。”这些话竟把它遮掩过去了。但这也反映了他内心深处或多或少对共产党还有疑虑。刘文辉毕竟是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它与蒋介石有矛盾，有反独裁要民主的一面，而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保住他在川康的统治地位，有时难免产生动摇。1944 年底到 1945 年初，日寇有入川趋势，抗战又进入艰难阶段，蒋集团中妥协论调有所抬头，为加强对刘文辉的工作，王若飞派张友渔到成都和刘作长时间的谈话，着重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国内外形势作深入具体的分析，特别是如果日军入川，蒋介石逃往西北，西南必须进行自保，以及解放区的情况等等。每天谈一两个小时，谈了一个多月。从刘文辉的认真态度看，对他的帮助是很大的。他说过，这次长谈“等于进了一次政治学校。”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发动内战，刘文辉和我党继续保持友好关系，但顾虑较多。1946 年春天，蒋介石在重庆找刘文辉谈话，周恩来知道后，当晚即找他，要他认清形势。2、3 月间，政协闭幕不久，周恩来通过民盟的朋友转告刘文辉：“政协决议能否实现，联合政府能否组成，要看蒋介石下一步如何走，现在还不能定。但是无论怎样演变，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蒋介石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他特别提醒注意：今后的政权问题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如果人民不要他，谁也站不住，希望刘把西康的工作做得好一些，以取得人民的支持。刘文辉觉得周恩来这番话，不但是向他讲解了政治形势，而且是给他指明了政治前途。他深感蒋介石集团视他若眼中钉，在政治上排斥他，在军事上压迫他，必欲除之而后甘心；而共产党则向他伸出友谊之手，诚恳地关心他，热情地支持他，这种切身经历使他作出抉择，扬弃蒋介石集团而跟着共产党走。1949 年 11 月 30 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仓皇逃到成都，当天下午即召集刘文辉、熊克武谈话，要他们配合王陵基在成都顽抗，并拿出 5 万元外汇要他的家属先去台湾，遭到刘的婉言拒绝。12 月 7 日上午，蒋介石的侍从室打电话给刘文辉，说蒋约刘于下午 4 时去谈话。刘感到再拖下去不行了，即于当天下午 1 时从成都出走到彭县，与邓锡侯、潘文华通电起义。他们的起义对国民党军队影响很大，紧接着董宋珩、罗广文、陈克非几支大部队相继起义。刘文辉走向人民，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成果，这里凝聚着周恩来多少心血啊！

邓锡侯也是四川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担任过四川省长、二十八军军长等要职。他也是主张抗日的，抗战初期即请缨杀敌，被任命为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到山西前线。1937 年深秋，天气已很寒冷，士兵衣衫单薄，他请二战区司令官闫锡山补发装备，闫置之不理，连一张山西军用地图也不给。这时周恩来正在太原，知道这件事，亲自送来在平型关战役中缴获的日

本军用地图，并详细介绍山西抗战情况。邓锡侯大为感动地说，“你雪中送炭，真是患难见知已啊！”从此邓锡侯对周恩来十分敬重，对共产党也有了好感。他的部队在山西洪洞整训，朱德总司令亲自去访问他，交谈团结抗战问题。邓也邀朱德向川军讲话，传授游击战术，从此两人过从甚密，后来邓调回四川任重庆行营副主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1938 年，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路过成都，1939 年彭德怀路过成都，都和邓锡侯会晤，为他分析抗日形势，增强他的抗日信心。吴玉章、张友渔、罗世文也都和邓锡侯会见过。由于蒋介石对四川地方军队一贯分化瓦解，出川抗战又备受歧视，而在与共产党的接触中，亲身体会到团结友谊的可贵，两相比较，邓锡侯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愿意接近共产党。1940 年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国民党特务准备逮捕中共党员杨伯恺，邓锡侯托人向杨透露消息，使杨得以脱险。抗战胜利后，邓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因内战需要，蒋介石要即加征壮丁 12 万名，军粮 10 万担，被邓婉言拒绝。蒋介石大发雷霆，逼着邓辞去省主席职务。1948 年 6 月，蒋介石为了分化成都地区异己力量，任命邓为川陕绥靖公署主任，并要调他的部队九十五军离川到汉中，协同胡宗南部防守川北大门，邓锡侯借故拒不赴任，把部队留在成都。我第二野战军进军四川时，派人向川军将领传达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对川康军人的期望，并带来二野电台的通讯呼号和密码。邓锡侯即设立新电台，和二野电台保持联系。这时他已下了起义的决心。成都兵临城下，邓锡侯看到时机成熟了，终于与刘文辉、潘文华通电起义。

周恩来对潘文华也做了不少工作。潘曾是二十三军军长，抗战开始后，率部出川抗日，后来回四川就任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统率刘湘系统的 5 个师、两个独立旅和 16 个保安团的兵力，可谓实力雄厚。1938 年夏，董必武等路过成都，曾和潘文华会晤，阐述中共的抗日救国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潘文华表示拥护。这年 6 月，周恩来派唐午园到潘文华部任联络员。这时潘是川陕鄂边绥靖公署主任，驻在四川阆中。潘委唐为绥署政治部副主任，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经常联系。一年后，唐午园调回南方局，我党再派甘树人担任联络工作，潘委他为绥署中校秘书，以掩人耳目。此后潘文华与董必武、王若飞、林伯渠都曾秘密会晤，交谈坚持抗战、加强川康团结等问题。为了使联系加强，南方局派钱松甫、江洪夫妇到潘部设置秘密电台，将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和新华社的重要电讯提供给潘文华，也将潘的意见要求和川康的军政动态向南方局汇报。设置这个秘密电台只有潘和他的儿子巴山警备司令潘清洲和绥署电务处长宋子丰三人知道。电台设了一段时间，直到抗战胜利绥署撤销，钱松甫夫妇平安回到重庆。

潘文华的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校尉级军官，或被聘请为顾问。他曾任命共产党员田一平为《华西日报》经理，田又创办《华西晚报》，这两份报纸的进步倾向使国民党视为眼中钉。特务准备逮捕田一平，潘文华立即把他调任上校机要秘书，把他保护在部队中，使特务不敢动手。受他保护或营救的共产党员还有好几个。除靠拢中共外，潘文华还积极支持民主运动。1944 年，经张澜介绍，潘文华和刘文辉都秘密参加民盟，为张澜长期提供政治活动经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潘文华非常忌恨，把他的部队分别调到几个地方，分散他的力量，并受到监视，但他仍通过在上海的张澜和我党保持联系。1949 年 12 月 9 日，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这是他长期和共产党紧密合作的结果，也是周恩来等同志对潘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成

果。

龙云是西南地方实力派中势力最大的人物，是云南省主席，又握有重兵。“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召集各省军政长官参加。朱德、叶剑英也应邀出席。他们到达西安时，正好龙云从昆明乘飞机经西安准备转飞南京，他们和龙云同乘一架飞机到南京。我作为朱德、叶剑英的随行人员，也乘这架飞机。这时周恩来已到南京。在南京，龙云曾邀请周恩来等三人吃饭，恰巧周因事不能参加，朱德、叶剑英和龙云谈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以及各方面团结抗日的问题。龙三都表示赞同，并对朱、叶说：“我想派一些干部到你们那里学习游击战术，好吗？”朱德回答：“打游击要长时间才能学到经验，时间短是不行的。”龙云又问：“以后我们怎么联系？”朱德说，“用无线电联系。”朱送给龙云一个密码本。周恩来知道这些事情，很高兴，感到龙云是我们必须争取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南京也和龙云见了面。抗战初期，云南地方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日益尖锐，1939年南方局成立时，周恩来指示：“要充分利用尤云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决定由原云南工委书记李群杰专门做云南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通过他们的亲戚、省政府秘书长间接向龙云宣传中共对时局的政策主张。1940 年 11 月，《新华日报》专门派记者到昆明访问龙云，向他介绍抗战面临分裂投降的危险以及中共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龙云态度很明朗，表示“敌人图谋加紧挑拨离间，全国应该加紧团结，抗战到底。”龙云的谈话在《新华日报》发表后，对西南后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很大的影响。1940 年 4 月，何应钦专程到昆明，敦促龙云建立党政军联席汇报会，加强对中共及其他民主力量的防范和镇压。云南工委及时通过统战对象，向龙云陈述利害，指出若成立这个机构，国民党特务乘机插手云南，一是对抗战大计不利，二是挑动骚乱不利地方。龙云接受这个意见，借故拖延不成立这个机构。“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带着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的名单到昆明，策动反共浪潮，龙云以“拿不出证据”为由，拒绝实行大逮捕，使顽固派在云南的反共计划落空，蒋介石大为恼火。这年 7 月，何应钦再次到昆明催促龙云成立党政军汇报会，龙云无法推诿，组成由他亲自挂帅的汇报会，抵制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有趣的是汇报会的秘书、担任会议记录的人，是前中共云南工委书记李群杰。国民党要抓人，他就及时通风报信。在“皖南事变”后的险恶形势下，由于云南地下党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龙云权衡了自己的利害得失，对顽固派的反共措施作了各种形式的抵制，使得中共组织和党员得以继续潜伏下来开展工作。

我党对龙云以诚相待，做了许多团结、争取工作，使龙云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和信任。1943 年 8 月，龙云通过罗隆基邀请周恩来到昆明会晤。云南工委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南方局。周恩来派华岗作为中共代表到昆明秘密与龙云建立直接联系。华岗的公开身分是云南大学教授，主要则是做龙云等人的工作。南方局决定，要我派报务员杨才去昆明，在滇黔绥靖公署内架设电台，建立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联系。此后龙云进一步实行开明政策。1940 年地下党发动“五四”纪念周活动，龙云对何应钦提出的镇压措施采取敷衍办法推脱过去。10 月 10 日，地下党组织昆明各界 6000 人纪念双十节，号召保卫大西南，龙云派警察到会场进行保护。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发展，被称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龙云的态度使蒋介石深为忌恨，抗战胜利后蒋就准备对他下手。龙云却以为国共已经在谈判，国家可以和平安定了，放松警

惕。蒋介石要他的滇军赴越南受降，他派卢汉率两个军去越南。南方局和云南地下党洞察蒋介石的阴谋，通过各种渠道劝阻龙云调动滇军出境。华岗回到昆明直接对龙云说：蒋介石对和谈诚意不够，要他提高警惕，又没有引起龙云的注意。滇军赴越后，蒋介石即下令驻昆明的第五集团军司令社聿明发动突然袭击，将他软禁，免去云南省主席等职务，强行送往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后来又软禁于南京。龙云想逃出虎口，周恩来、董必武都热情帮助，曾通知上海情报负责人吴克坚协助他从南京或上海乘船离开，没有成功。1948 年 12 月 9 日，经抗战时驻昆明的美国空军飞虎队陈纳德帮助，才乘飞机逃到香港。1949 年初，李宗仁、何应钦多次电邀他到南京“共商国是”，他断然拒绝，并发表致李、何的公开信，劝他们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同时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年 8 月 15 日，龙云公开声明脱离国民党集团，拥护中国共产党，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 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下）

## 组织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统区，坚持高举抗日民主旗帜，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采取灵活方式，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尽量利用合法手段开展多种多样的斗争，除了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进行正面宣传外，主要通过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全国抗敌文协等合法组织，团结文化界广大人士做这几项工作：一、推动文艺运动深入发展，展开广泛的抗日民主运动；二、引导和支持学术理论界开展学术研究，用研究成果占领思想理论阵地；三、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批判封建法西斯反动理论和批判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四、支持自然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进行研究工作，明确政治方向。通过这些工作和斗争，使国民党统治区中，宣传舆论阵地和学术思想领域，进步力量始终占有优势。这些工作都是在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下进行的，由于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在群众中具有崇高的威信，文化界人士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虽然政治环境险恶，生活条件困难，都压不垮这支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他们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主事业的发展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在文化方面统一战线工作，政治部第三厅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武汉失守后政治部三厅迁到重庆，虽然人员减少，生活条件更加艰苦，仍坚持工作，深入前线、后方进行宣传。三厅在群众中的影响使得国民党非常害怕，特别是当时国民党上层一部分人酝酿着妥协投降，三厅积极宣传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与国民党宣传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是完全对立的，因而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便对三厅的活动进行限制，对各地演剧队、宣传队、战地文化服务社进行迫害。他们三次强迫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都遭到抵制。1940 年 8 月，蒋介石竟下手谕：“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第三厅”。三厅中共组织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亲自我当时任政治部长的张治中，提出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派的文化人，在社会上很有名望，他们是为抗战而夹的，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张治中一听感到事情严重，连忙报告蒋介石。蒋召见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阳翰笙，说要在政治部里另外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宗旨是对文化进行研究，要三厅的人留下来继续工作，很显然，蒋介石的用心是把这批文化人拉住，以这个研究机构来束缚他们的手脚，不让他们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活动。郭沫若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恩来说：“就答应他吧，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开展我们的工作。”大家研究之后，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即以郭沫若为首组成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个机构于当年 10 月 1 日正式成立。这时周恩来已不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实际上他仍对这个机构起着指导作用。它的委员和工作人员，包容了比第三厅更广泛的各界代表人物，有著名作家茅盾、老舍，教育家陶行知，历史学家邓初民、翦伯赞，自然科学家卢于道，文学家胡风。还有一批记者、诗人、音乐家等，队伍非常壮观。

文化工作委员会筹备过程中，周恩来提出进行合法斗争的策略。他说：国民党当局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但我们可以通过政治部所属机构的合法地位进行工作，不受他们的束缚，跳出圈子，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进行活动。我们处在无权无势时，还能在地下干，现在给我们地盘站住了脚，难道还怕干不成事情吗？在国内政治形势逆转的情况下，大家坐下来深入研究，用研究成果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占领阵地，同时同顽固派的封建法西斯思想文化进行斗争，推动抗战民主事业。他鼓励大家说：“形势不利于大规模地搞公开活动，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有研究能力的人，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来搞点研究。抓紧时间深造自己，深入研究几个问题，想写什么书，赶快把它写出来。”他意味深长地说：“等革命胜利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呢。到那个时候，大家就更忙啦，你们想研究问题，写书，时间就难找啦！”周恩来这些话使许多人心胸豁然开朗，认真埋头从事研究工作和著述。这一时期，文工会许多人在哲学、历史、经济、文艺理论、文学创作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会外一些进步人士受影响，也写出了一批有价值的著作。真是硕果累累。

首先在历史学方面，1941 年，吕振羽完成了《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2 年，邓初民写出了《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写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也在这个时候出版。翦伯赞写的《中国史纲》开始出版，他还写了大量历史论文。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也是在重庆时期完成的。这些历史论著都努力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宏观角度，阐明我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深受文化、学术界的欢迎。影响最大的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它深刻总结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在《新华日报》连载后，国民党顽固派大为惊恐，《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进行攻击。周恩来对这篇史论给予高度评价，带到延安后，中共中央把它作为整风文件之一。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鼓励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在哲学方面，杜国库在几年时间里，写出了《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问题》，对墨子、公孙龙子的研究尤为深入。他还与侯外庐、赵纪彬合作，开始了《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

在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方面，王昆仑出版了他的名著《红楼梦人物论》，蔡仪完成了他的《新美学》。优秀的文学名著有老舍的《四世同堂》，茅盾的《腐蚀》，巴金的《寒夜》，沙汀的《淘金记》，沈从文的《长河》等。聂绀弩、廖沫沙、宋云彬、秦似都写出了一些受读者欢迎的杂文。

文工会人员以及进步人士除了埋头著作之外，也跳出“只准研究”的圈子，举办各种讲座、演讲会、报告会，以学术活动方式联系群众，推动民主运动。主持人都是社会名流、著名学者专家和作家、艺术家，如张澜、沈钧儒、邵力子、冯玉祥、张友渔、王芸生等。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讲座和文艺演讲，卢于道的“人类进化问题”，邓初民的“清国史”，翦伯赞的“新史学”等讲座，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冯玉祥讲三国故事，老舍讲小说，田汉讲戏剧，贺绿汀讲音乐，张志让、潘念之讲国际形势，等等，也深受群众欢迎。当时不少国际问题演讲，如苏德战争前途、抗日战争前途、太平洋战争分析，都是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有力地驳斥了妥协投降理论，影响很大。文工会还通过中苏文协办的《中苏文化》和叶籁士等办的世界语刊物《中国导报》，开展了国际宣传。这些活动，占领了大后方的思想学术阵地，对

推动持久抗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戏剧活动的活跃至今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进步戏剧活动多方压制，戏剧界进步人士沈浮、应云卫非常气愤，对阳翰笙提出“我们在这里等着挨打不是办法，要干，要演戏。”阳翰笙报告了周恩来，周对此很重视，认为这个办法可以作为开展新斗争的突破口，要阳翰笙提出一个初步计划来。随后，周恩来在南方局文化组一次会议上提出重庆这个“死城”把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面对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必须想个办法予以冲破。留在重庆的文艺界朋友，也静极思动，应当因势利导。在各种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容易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观众又多是年轻人，影响比较大。因此，冲破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应当首先从话剧方面发起。阳翰笙与郭沫若研究，决定联络一批文艺工作者筹组“中华剧艺社”，由应云卫负责，陈白尘、陈鲤庭、辛汉文、刘郁民、孟君谋这些知名人士组成一个不到 30 人的精干班子，开始行动起来。剧艺社第一场上演了陈白尘创作的《大地回春》，打响了第一炮，接着又上演了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剧中鞭挞了韦昌辉一伙搞阴谋破坏太平天国的团结，导致革命失败的罪行，引起很大反响。当剧中人洪宣娇说出：“大敌当前，我们不应当自相残杀”时，观众中立即引起暴风雨般的拿声。在为郭沫若祝贺五十寿辰时，演出他的剧作《棠棣之花》。剧中歌颂爱国抗敌，鞭挞卖国投降，演出很成功，这使郭沫若大大激发了创作热情，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写出了名剧《屈原》。

在郭沫若创作《屈原》的过程中，周恩来曾到郭沫若家里去，探讨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他对郭沫若说：屈原在当时受迫害，才忧愁幽怨而作《离骚》；现在我们也受迫害，这个题材好。他对剧中的《雷电颂》很欣赏，有这样一段台词：“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将一切沉睡在黑暗怀抱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周恩来说，屈原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能写出来，这是郭沫若借屈原之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声，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屈原》由名演员金山主演。这次演出轰动了山城重庆，出现了空前盛况。《新华日报》、《新蜀报》、《时事新报》都出版演出特刊，大力宣传这个戏的成功。《屈原》的演出，确如最初设想那样，在政治上、文化上突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在国统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周恩来也一向关心他们，既从政治上帮助，引导和推动他们配合抗战和民主运动进行活动，又对他们的工作给予热情的支持。1939 年春，周恩来指示潘梓年出面，通过少数党员联系科技界的爱国人士，秘密成立“自然科学座谈会”。成员有梁希、潘菽、金善宝、谢立惠、于铎、涂长望等 20 余人，每两周开会一次，主要学习《新华日报》社论、专论，了解中共中央的精神，学习唯物辩证法，提高政治觉悟和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1940 年初，由“自然科学座谈会”负责，在《新华日报》创办了《自然科学》副刊，宣传科普知识。在敌机疯狂滥炸重庆期间，这个副刊连续发表了《工业建设防空》和《毒气空袭防御》等文章，介绍防空知识。此外，也发表了介绍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然科学飞跃发展的状况。1942 年，为纪念伽里略逝世、牛顿诞生 300 周年，《群众》周刊出了特刊，发表了社论和一批纪念文章。社论和文章指出，我们要接受科学巨人遗交给我们的大火炬，继续我们伟大的征途。民族的革新和人类的进步，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坚

实的基础上，科学是帮助我们获取智慧和光明的巨大力量。这些文章在提高群众对科学的认识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周恩来对“自然科学座谈会”非常关心，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和科学界的朋友谈心。有一天，他和董老邀请梁希、潘菽等 7 位科学家到新华日报社共进午餐。他们到后，看到桌上摆着寿桃和酒菜，很是惊讶。周恩来说：“今天是梁老（梁希）六十寿辰，我们为他老人家祝寿。”他端起酒杯走到梁希面前说：“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那时候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梁希激动地说：“我无室无家，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梁希回去后，夜不成寐，写了三首七言律诗，两首送周恩来，一首送《新华日报》。周恩来对朋友的关心，使他们无比感动。

1944 年，随着民主运动的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益扩大，周恩来指示潘梓年，要他向“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传达他的意见，希望他们团结更多的科技工作者，组织公开进步的科技团体。为了取得科学界上层人士的支持，周恩来亲自出面做李四光、竺可桢等著名科学家的工作。1944 年底，“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拟定了一个《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的文件，向国统区各大城市征求科技工作者参加发起，很快得到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李四光、任鸿隽、严济慈等 100 多人的赞成，共同发起筹备。1945 年 7 月 1 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成立，理事长竺可桢，监事长李四光，实际负责具体工作的是秘书长涂长望和副秘书长谢立惠（中共党员）。“中国科协”的章程中明确提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造福于人类，但如用之不当，亦能有害于人类；自然科学工作者是不可能超阶级的；我们应常常想到要用科学知识为广大人民谋利益，不要做反动派压迫人民的帮凶；要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条件是土壤，科学是花果，要使我们的社会条件能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必须积极参加反对日本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爱国民主运动；科学工作者要团结起来，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奋斗，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要改革贪污腐化、不民主情况，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中国科协成立后，在重庆出版《科学新闻》，由潘菽任主编，主要内容是宣传科学工作者要加强团结，争取民主，并广泛报道科技界的各种活动，以及国际上科学技术的新发明和动向等。也时常举行座谈会、演讲会。中国科协的建立，迅速得到全国科技界的响应，许多城市相应建立分会，甚至影响到国外，英、美、法等国也成立科协的分会。一年后，会员发展到七八百人。中国科协还参加了“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筹备工作。1946 年 7 月，“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在伦敦开成立大会，中国科协派涂长望前往参加，并当选为“世界科协”的理事。

在国统区另一个进步科学工作者的组织是“民主科学座谈会”。它是 1944 年在周恩来帮助下，由许德珩、潘菽、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税西恒等学者专家等组成的。“民主科学座谈会”以继承“五四”精神，争民主、争自由、反对独裁统治、要求团结抗日为宗旨。许多科学家同时参加两个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来改名为“民主科学社”，抗战胜利后又改名为“九三学社”，它在成立宣言中发表了 8 项基本主张，鲜明地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后又多次提出反对内战，要求实现政协决议等。它在民主革命中成了一个进步的政党。

在对文化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周恩来十分注意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反对搞孤家寡人政策。1941 年 5 月，周恩来致电香港党组织负责人廖承志，指示如何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和党与非党的问题时说：“第一，不能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因他们已进步了，已经经过一次考验了。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待他们，因他们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以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我们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去测量他们，去要求他们。”要求廖承志对朋友不要要求过高。1942 年夏衍到重庆工作时，周恩来和他作了一次具体生动的谈话。他很赞赏夏衍在广州、桂林、香港的时候，结识了一些国民党军政方面的人物，如过去曾经反共的林庚白、国民党师长韩练成，都成了好朋友。认为这样做很好。他还强调指出：“现在到了重庆，交朋友的面要更广一些，对于政治上、文艺思想上意见不同的人，对他们也要和和气气，切忌剑拔弩张，这方面我们犯过错误，吃过亏，千万不要再犯。”他鼓励夏衍：多和戏剧电影界人士搞好团结，广交朋友。党内许多同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文化界广交朋友，使越来越多的人团结在党的周围，扩大了党的影响。

在理论学术问题上，周恩来明确指示，要坚决反对危害抗战和团结进步的封建法西斯思想理论，对复古倒退主张和其他理论学术观点可以开展必要的讨论，但不是主要矛盾，这种讨论不能妨碍文化界团结抗战、争取民主的大局。当时在党的领导下，进步学术工作者中间有一个读书会，周恩来也常常参加。在一段时间里，他们曾把主张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冯友兰、贺麟视为对立面，每次聚会就分析他们的政治动向，研究他们的每一篇文章。一次周恩来来了，听了这个话题，便平心静气地对大家说：“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矛盾固然是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的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的《唯生论》。”这些切中要害的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这次聚会杜国序也在场，他特别兴奋，会后很长时间，还对周恩来的话称道不已。1942 年，侯外庐、杜国库等成立“新史学会”，顾颉刚、张志让、周谷城等著名学者都来参加活动，互相砥砺切磋，气氛很活跃。有一段时间，重庆、香港一些文化工作者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写真实”有不同意见，发表一些批评文章。周恩来明确表示这是内部问题。他强调要培养良好的学术作风，认为学术上的问题要通过深入研究、充分讨论、详尽说理来解决，决不能强加于人。

周恩来对文化界爱国人士，从政治上、工作上到生活上处处关心，这里我举几个例子。

陶行知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早在 30 年代初，他就倾向于共产党，主张抗日。他在南京办的晓庄师范，师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有的因为进行抗日活动而被捕牺牲，他也因此受到通缉。后来他出国宣传抗日，并考察各国教育文化情况。1938 年 8 月，陶行知回国，不久应聘为国民参政员。1939 年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周恩来、董必武都予以积极支持，并派党员帮助他的工作。该校选送了一些优才生到延安深造。陶行知经常去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对他非常尊重，和他促膝谈心，讲解政治形势，询问他的工作情况。他参加民主斗争，从事教育活动，大都是在周恩来的支持和指导下进行的。陶和我党的关系日益密切，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有一次陈立夫恐吓他说：“你的学生和朋友中，很多是共产党。”他义正辞严地回答：“他们是否共产党，

我不知道。但就是共产党，他们办事认真，又有能力，一心为抗战，为国家，为人民，又有什么不好呢？”对陈立夫的威胁置之不理。1940 年，国民党为策划“皖南事变”制造舆论，陶行知与邓颖超、许德珩、陈嘉庚等参政员在国民党参政会发表谈话，呼吁“抗战必须精诚团结，停止磨擦”，反击国民党的阴谋。国民党准备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0 年 9 月，周恩来、邓颖超专程从重庆到北砖陶行知家里，对他说国内形势紧张，应当提高警惕，采取措施，有备无患。又同育才学校地下党负责人研究形势恶化后党员教师的转移问题。“皖南事变”发生后，陶行知受特务严密监视，周恩来很关心他的安全，提醒多加留意。陶是挣挣铁骨的硬汉，表示要留在重庆坚持抗日民主活动，尤其是要为办好育才学校继续战斗。周恩来提出将校内一部分不能公开活动的党员撤离重庆送往延安或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没几天国民党军警特务就来抓人，人已转移了，结果扑了一个空，陶行知因为名气大，国民党才没有对他下毒手。有一次，他由红岩返回家中，在路上对他的夫人吴树琴说：“去时腹中空，回来力无穷”。这表达了陶行知对周恩来等的信赖，也反映了他和共产党肝胆相照、水乳交融的关系。在周恩来的鼓励下，陶行知除办好他的育才学校而外，又积极参加民盟的工作，他担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在民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来重庆和国民党谈判要返回延安时，陶行知到机场送行。毛泽东对他说：“将来中国教育事业要靠你，教育部长就要你担任。”可惜陶行知没能活到新中国的诞生。

周恩来和马寅初的友谊，也是十分动人的。马寅初是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当时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抗战初期，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蒋介石的包庇、纵容下，强取豪夺，大发国难财。他无比愤慨，多次公开发表演讲，痛斥这些大官僚，乘国难之机大发横财，甚至把矛头指向蒋介石。他说：有人说蒋介石是民族英雄，我马寅初认为他不够格，他只称得是家族英雄。由于马寅初在国内外有很高的威望，国民党不敢贸然采取强硬手段，而是想拉拢他，请他出任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马寅初对此嗤之以鼻，严词拒绝。利诱不成，即进行恐吓，特务寄去附有子弹的信件。马寅初依然不为所动，照样敢怒又敢言。1940 年 12 月，蒋介石亲自下令逮捕马寅初，投进息烽集中营囚禁。周恩来和南方局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同重庆各界人士一道设法营救。《新华日报》立即以迂回方式把马寅初被捕的消息公布于众，很快传遍了整个山城，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愤慨。1941 年 3 月，重庆大学进步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为营救马寅初，准备在 3 月 30 日举行“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启事刚在《大公报》和《新民报》刊出，就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惊恐，下令两报立即撤版停止刊载。3 月 24 日，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登出一则消息说：“立法委员、重大商学院院长、中国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今年欣逢六十大寿，重大全体同学为庆祝热心抗日救国之前辈起见，特定于本月三十日（星期日）下午三时假该校大礼堂举行庆祝大会，并于当晚进行游艺，望各界马氏知友贲临参加庆祝。”国民党为了制止这次活动，蒋介石还亲下“手谕”严禁召开祝寿会。重大师生冲破种种障碍，祝寿会如期举行。寿堂挂满各界人士送来的寿幛寿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送来董必武所作并书写在红绸子上的对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落款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鞠躬敬祝”。与会者都称赞这幅对联寓意深刻。马寅初回国 30 多年，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可以说桃李满天下了，可是寿堂上不见老寿公，因此“坐帐无鹤”。

鹤和龟都被比喻为人的高龄。今天，马寅初被囚异地，关山阻隔，身边又无亲无友，只能以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是一个典故，这里“龟”字一语双关，既喻长寿，又与“归”同音，暗指正义一定战胜邪恶，马寅初必将归来。第二天，重庆各家报纸有关庆祝马寅初寿辰的报道，都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扣下。《新华日报》在周恩来指示下，采取了特殊的斗争方式，在头版显著地位登出一个加框的“重要声明”，“本报纪念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之稿二篇，奉命令免登。”既向广大群众透露了有强烈反对情绪的祝寿会举行了，又揭穿国民党压制言论的卑劣行径。检查官虽有意见，也无可奈何。

由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强大，蒋介石被迫于 1942 年 8 月释放马寅初，但仍将马教授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家中，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和发表文章，也不准任何大学聘请他去教书，使他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陷入困境。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对当时在南方局宣传部工作的许涤新说：“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大力支持。”《新华日报》即派一名记者去访问，拿回文章，周恩来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说：“写得很好嘛！明天《新华日报》用一个版面一次登完。”并指示给最高的稿酬，以这种特殊方式给马寅初予接济。马寅初非常感动，十分感激周恩来在他危难中鼎力相助，1944 年 11 月，周恩来从延安来到重庆，一天上午，郭沫若匆匆来到马寅初家中，进门就喊：“大好消息！大好消息”，马寅初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连忙问道：“什么好消息？”郭沫若用手指有节奏地敲响书桌，口中吟哦道：“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周公从延安飞回来了，你的灾难也有禳解之日了！”马寅初精神为之一振。接着郭沫若又说：“周公说他将尽一切努力，要求国民党尽快恢复你的自由。”马寅初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拉住郭沫若，又取出一瓶老窖来，两人畅饮起来。不久，经周恩来和各界人士多方营救，国民党迫于内外舆论的压力，只好在国民参政会上宣布恢复马寅初等政治犯的自由。此后，马寅初和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更积极地投身到反蒋斗争中，他特别把周恩来视为知己。建国以后，马寅初发表他的“新人口论”，遭到不公正的批判，但他对周恩来仍是一往情深。周恩来去世时，马寅初已是 94 岁高龄的老人了，而且下肢瘫痪。他坐着轮椅在家中面对披着黑纱的周总理像老泪涟涟，内心极度悲痛。他对子女说：“我要去向总理告别。”子女们担心他看到总理遗容，会悲伤过度，老人受不了，劝阻了他。老人固执地说：“我一定要去，无论如何也要去，死了也要去。”儿女们只好遂着老人的心愿。从中看出马寅初对周恩来多么敬重，感情多么深厚！

周恩来对文化界爱国人士的关心、帮助和爱护，真是书不胜书。“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党与非党干部及和我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的撤退、疏散和隐蔽作了周密的研究，拟出撤留安排的名单，仅 1 至 5 月，安排离开重庆的有一百多人。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很快就沦陷，在港文化人和爱国人士面临遭到日寇杀害的危险。周恩来急电在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他们将在港的朋友先接到澳门转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有的可去马来亚。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应派人帮助他们离港。大批文化人于 1942 年 1 月初起，陆续隐蔽集中澳门，分批由武装人员护送进入东江游击区，再转送内地。从香港抢救脱险的文化人共有 300 多人。周恩来对文化界人士在生活上也非常关怀。剧作家洪深在政治压迫、贫病交困中全家服毒自杀遇救，周恩来派人前往慰问。作家王鲁彦贫病中逝世于桂林，周恩来从重庆发出唁电，并嘱冯雪

峰送去资助费。许多文化人在同周恩来的接触交往中，得到鼓舞和力量。巴金在回忆周恩来时说：“ 他让我在困难中看到光明。他把坚定的信心传染给我们。他就是有这样一种力量。 ”曹禺说，“ 周恩来的话，使我坚强，给我力量，我相信共产党是坚决要抗战到底的，从那时起，我靠近了党。 ”许多文化人认识共产党，坚决跟共产党走，是由于他们从周恩来的身上看到共产党人的形象，认识了共产党的伟大、正确。

## 把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过来

抗战期间，民族工商业越来越困难，和官僚资本的矛盾日益尖锐。但民族资产阶级大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视为正统，敢怒而不敢言；对共产党则怀着恐惧心理。为了抗日，统一战线必须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是不容忽视的。

南方局成立时，周恩来就对这个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1939 年 1 月 25 日，他刚从武汉到重庆，就去参观胡厥文的合作五金厂，他赞扬工商界对抗战的贡献。1940 年 9 月 29 日，周恩来应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在重庆巴蜀小学广场的那次演讲，有不少工商界人士参加，他号召工商界为抗战贡献出人力、物力和财力。1942 年 1 月 15 日，周恩来、董必武与四川著名企业家康心如参观余名钰的渝鑫钢铁厂，应邀作了“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的题词，充分肯定民族工业对国防生产作出的贡献。

当时我们的同志对于做民族资产阶级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一些老党员也有抵触情绪。有一次，周恩来找一位同志谈这个问题。这位同志说：“资本家是剥削者，民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虽然存在着区别，但作为剥削阶级，那是一致的。同民族资本家交朋友，建立统战关系，那我的阶级立场那里去了呢？”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他反问道：“你拥护统一战线吗？”这位同志说：“当然拥护。”周恩来又说：“党的统一战线难道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外边吗？连国民党蒋介石我们还要同他搞统一战线，何况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也有爱国主义的一面。从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来说，这个阶级的爱国主义的一面，就是我们同他们搞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据。”说得这位同志心悦诚服，有类似看法的同志思想也通了。南方局为了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成立了经济组，由许涤新当组长。钱之光、潘梓年、熊瑾玎都交了不少工商界的朋友。这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了。

重庆经济、实业界在 1939 年成立一个叫“西南实业协会”的组织，它的成员很广泛，有 500 多人，包括工商金融界和一部分经济界名流学者，声势很大。这个协会的理监事中，既有国民党政界的重要人物，如张嘉璈、吴鼎昌、张笃伦、翁文灏等，也有金融界的巨头，如钱新之、陈光甫等。吴蕴初、穆藕初、胡西园、李烛尘、范旭东、侯德榜是从上海、天津来的企业家。刘航琛、卢作孚、康心如、胡子昂、古耕虞、缪云台是四川、云南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理事长是张群。他把协会的实际会务让给和他有特殊关系的常务理事张肖梅主持。张肖梅是张嘉璈的弟媳，留英的经济学博士，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所以“西南实业协会”的政治背景就是国民党的“政学系”。它所主办的“星五聚餐会”在西南很有影响。但张肖梅自称是无党派人士，对邓颖超很敬佩，和史良也往来密切。她把会内所编的《西南实业通讯》和《四川资料》定期寄给邓颖超。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做这些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他们还请周恩来去演讲，后来不少人和我们关系很密切。

为了引导民族资产阶级起来争取经济民主，周恩来亲自写文章对官僚资本的本质和危害进行深刻的揭露。1940 年 6 月，他写的《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1941 年 6 月 15 日，他写的《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等文章，都把矛头指向官僚资本，维护民族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新华日报》

也经常刊登黄炎培、胡厥文、李烛尘、关蕴初、缪云台、胡子昂、古耕虞等人的文章和谈话，抨击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掠夺政策。

除了舆论的支持以外，周恩来对民族工商业的困难也尽可能给予援助。范旭东的化工企业中国制碱公司，抗战爆发后毅然迁到大后方重建新厂。新厂进口的机器全部被蒋介石的远征军征用，国民政府决定给 300 万元贷款。新厂建成后，在当时毫无进口货的情况下，保证了国内对纯碱的需要。可是国民政府突然变卦，要把贷款作为公款，企图并吞新建工厂。同时，由于原材料价格暴涨，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使这个著名的民族工业濒临垮台。为了求得企业的生存，范旭东打算自己创办“建业银行”，以取得周转资金。但困难颇多。周恩来知道后，指示龚饮冰与刘少文、卢绪章（他们都是为党在社会上做经济工作的）商量，又与范旭东晤谈，决定参加建业银行的筹建，以党的营运经费参加，在资金（起先是 17%，后来 44%以上）、人力（龚饮冰任常务董事，后任总经理）方面给予支持，终于使这家闻名国内外的民族工业顶住了官僚资本的并吞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渡过了难关。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对民族资产阶级做了大量工作，有时他亲自去访问或接见他们，也常参加工商业者召开的座谈会。鲜英的特园是经常聚会的地方。有一次，周恩来在特园和“猪鬃大王”古耕虞、宝丰公司总经理康心远等几位工商业者见面，他平易近人、态度亲切，使工商界人士像遇到多年不见的朋友一般，谈话非常融洽。周恩来对他们讲形势和革命的道理，揭露官僚资本的掠夺和国民政府的腐败，工商业者们深受启发。一席话使得他们如沐春风，感到很温暖，过去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消除了一大半。刘鸿生是上海的大资本家，有“火柴大王”之称。日军入侵后他的企业损失达 1000 万元，他毅然把一部分企业迁来四川。刘鸿生曾到红岩看望周恩来，回来后对他的儿子刘念智说：“周恩来完全不像国民党的大官，非常谦逊，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他知道我是刘鸿生，但没有因为我是大资本家而敌视我。他恳切地希望所有热爱中国的人们团结起来，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卖国贼而奋斗。”刘鸿生自称，他对共产党有一个“从怕、疑、服到拥护”的过程，由于受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影响，才最后拥护共产党。

许多工商业者，对周恩来的广博见识很佩服。有一次，周恩来在重庆白象街与胡子昂等工商界朋友座谈，用四大家族控制外汇、外贸对民族工商业巧取豪夺的事例，教育工商业者起来反对官僚资本。他举出国统区每年出口猪鬃、桐油、生棕的数字和获取的外汇数，由于四大家族是以纸币向出口商结算的，外汇与纸币的差值，加上通货膨胀物价朝夕变化，使出口商蒙受巨大的损失。到会的人听了都为之一惊。他们说：这些数字，我们搞了多年出口业务，都弄不清楚，想不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周先生，对经济情况如此了如指掌，真叫人钦佩又感动。和周恩来接触较多的古耕虞，是个百万富翁，四川临解放时，他公司的资产达 900 万美元以上，属他本人名下的也有 100 万美元，而且都在国外，他自己说过，我所拥有的资产，完全可以到美国去当寓公，但由于受周恩来的教育、勉励，使他逐步靠拢中国共产党，进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周恩来一声召唤，他从香港回来担任中国畜产公司经理，成了国家干部。由于周恩来对民族资产阶级做统战工作的成功，朋友越来越多。许多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把周恩来看成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对他非常崇敬。胡厥文回忆与周恩来的交往时说：“他给人以教益，却又不自

居于人师，他思想极为敏捷，但毫无锋芒毕露。……从来没有听到他对朋友指手划脚，说‘你应该干什么’。他的讲话朴质无华，总是给人以启迪，使人不愿离席。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他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断做团结教育工作，使人不知不觉之中为之折服。”胡子昂回忆在重庆的一次活动说：“各方面的人士和他接触，就敬佩他，……他和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流泪。”可见工商界人士对周恩来多么尊敬。1944 年周恩来从延安到重庆，在一次会上说：“这次我到重庆，请他们到我家里吃饭座谈都来了，这还是空前的。”国民党中的许多人对此很不理解，社会部长谷正纲惊奇地说：“周恩来飞来飞去，人心惶惶，奇怪的是连产业界也和他往来。”

抗战后期，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也更加厉害，与工商业者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几乎天天有几个行业请愿、提要求，开记者招待会，弄得国民党穷于应付，狼狈不堪。民族资产阶级敢于同国民党斗争，并能得到一些利益，他们认识到必须组织起来。这与周恩来做了促进工作是分不开的。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上层知识分子，经过长期的酝酿，抗战胜利后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他们和我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周恩来曾对南方局的同志说：“1941 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 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这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和周恩来在贯彻执行中取得的重大成就。

## 广交国际友人关怀侨胞

抗战时期，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同时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太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在远东的结合地。在这里设有反法西斯国家的 30 多个大使馆，有 40 多个国家设有外交机构，还有各种国际性的组织和 10 多个中外文化协会。太平洋战争后，西方国家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来到重庆。为了做好对外友好人士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周恩来和南方局同志做了大量工作。

1940 年 9 月，周恩来在巴蜀小学广场的那次演讲，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他预言美日矛盾最终会走向冲突，指出应该利用他们的矛盾冲突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应尽力争取英、美援助，使他们同情中国抗日，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打败世界法西斯集团。他对国际局势的正确估计和对胜利充满信心的演讲，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他在 1941 年 6 月 29 日发表的《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和 1941 年 12 月 14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星期发表的《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等文章中强调：我们应该认清东西法西斯早已勾结在一起，我们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更应该联成一体，休戚相关。要知道太平洋的胜利亦即大西洋的胜利；欧洲的失败亦即亚洲的失败。这些深刻的论断，指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和战略。局势的发展和周恩来的预料是一致的。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不仅是共产党派驻国统区的代表，而且也是共产党派驻整个外部世界的代表，因此他需要和外国人士广泛接触。而许多外国人也常常主动来访问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领导人。周恩来既会见政界人士、高级官员，也和民间代表以及新闻记者、一般士兵交朋友。在这段时间里，和他往来的外国人士难以计数，其中美国人居多，有副总统华莱士，总统行政助理居里，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魏德迈，美国总统派来担任蒋介石顾问的拉铁摩尔，美军总部代司令兰诺和海军武官肯宁，驻华大使赫尔利和使馆秘书谢伟思、武官包瑞德，还有著名作家斯诺、斯特朗、海明威，14 航空队总部士兵海曼、贝尔、埃德尔曼。其他国家的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薛穆和使馆秘书赫戈登、武官哈米。有苏联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以及加拿大、法国等国的使节。有新西兰进步作家艾黎。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他田幸子……他和外国人士、朋友们交谈的主题大都是有关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但也针对不同的对象谈了他们所感兴趣的问题，态度诚恳，不亢不卑，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常常受到外国朋友的赞赏。

外国人士在和周恩来的交往中，周恩来总是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曾任延安观察组组长的美军上校包瑞德，多次会见过周恩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起周恩来时说：“我简直就完全相信他是极其超群出众的人，但如果那时我事先还不知道这一点，那么听到他的回答之后，也就完全知道他的聪明机智了。他不仅诚实可嘉，而且还胸有成竹地要求自己对于一位忠于他的祖国的美国人的可能冒犯缩小到最小的程度。”美国作家海明威 1941 年在重庆访问周恩来后，给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写的一封信上说：“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他的夫人、女作家和记者也说：“我们认为周恩来是

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一位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的话，那么未来就是他们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多次和周恩来会晤，他在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说：“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周恩来在国际上有那么大的影响，受到那么多人的尊敬，在我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广泛接触外国人士，他们在口头上或者写了大量文章，对周恩来备极赞扬产生的结果。

对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周恩来也做了很多工作。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领导同志，通过廖承志、潘汉年等领导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进步团体、党外人士，对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宣传抗日战争和共产党的主张，保持广泛的接触和联系。皖南事变后，在桂林办《救亡日报》的夏衍转移到香港。周恩来要廖承志通知他：“在香港建立一个对南洋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通过夏衍和邹韬奋、金仲华、范长江和乔冠华等的共同努力，1941 年 4 月 8 日，《华商报》在香港创刊。5 月 17 日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也在香港复刊。这些报刊使得海外华侨更多地了解祖国的情况。许多爱国华侨运来大量物资支持国内的抗战，不少热血青年回国来参加八路军、新四军。

两位华侨领袖陈嘉庚和司徒美堂，和周恩来也有良好的关系。1940 年 3 月至 7 月，陈嘉庚率领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回国慰劳、考察，叶剑英、董必武、周恩来先后与他们会晤，交谈了国共两党间的磨擦和谈判的情况。5 月底，陈嘉庚不顾蒋介石的阻挠，率慰问团第一组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朱德及广大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陈嘉庚回南洋后，在华侨中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和西北的观感，引起很大反响。后来他撰写的《南侨回忆录》，对蒋介石国民党颇多批评，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和廉洁作风，则备受赞扬。这次回国，陈嘉庚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41 年冬，司徒美堂经过香港到达重庆，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在八路军办事处热情接待了他，并就抗战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交谈。他回美国后，积极动员在美爱国华侨从财力、物力上帮助八路军、新四军。海外华侨对共产党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

# 重开国共谈判的大

## 努力打开谈判大门

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之后，国共关系有所缓和，但是，国民党在各地的反共和摩擦事件，还在不断发生。周恩来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观察着形势的发展。

1942 年 7 月，蒋介石提出要和中共谈判，解决国内问题。原因是这两年来，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德、日法西斯进攻下，英、美、苏三国不能不联合起来进行反击。1942 年 5 月，苏联和英国签订对德国及其欧洲盟国作战及战后互助合作的条约。6 月苏、美两国又签订合作协定。美、英、苏同盟国要求中国坚持抗战，以牵制日本的军事力量。他们关心着中国国共两党的关系。罗斯福曾通过他的私人代表转告蒋介石：中国在三年之内不要发生内战，并进一步提出，美国援华的军火不得用于反共。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这年 7 月 7 日给蒋介石的贺电中，也说过中国“抗战五年由于坚持统一战线”的话。英、美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的态度使蒋介石在处理国共关系时不得不有所顾忌。

另一方面，英美向中国输送军火物资的唯一大动脉——滇缅公路，因这年 4 月日军占领缅甸的腊戍后被切断，蒋介石在外援运输方面只能改为空运，空运不仅数量有限，而且飞机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困难重重。因而更有赖于经过苏联的陆路交通线，他也不得不考虑同苏联和中共改善关系。

国内情况是，国民党军事失利，反共摩擦也占不到便宜，有的国民党将领对反共军事已感到厌倦，而且物价飞涨，财政和经济危机加深，人民不满情绪增长，这些因素都促使国民党谋求改善两党的关系。

我们方面，在抗日的前提下与国民党和解是我们的一贯方针。自从日寇发动“五一”大扫荡后，解放区的面积大大缩小，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形势十分严重，也需要缓和同蒋介石的关系。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共谈判的大门开了一条缝。

1942 年 7 月 17 日，蒋介石派张治中作代表来见周恩来，并吊唁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老先生去世。周恩来向张治中提出，希望同蒋介石面谈，解决一些问题，并在当日将这一情况电告毛泽东。21 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说他已指定张治中和刘斐（为章）同中共谈判。军事委员会的联络参谋将继续去延安。8 月 14 日，蒋介石又约见周恩来，表示想好好解决国内问题。周恩来也表示愿与张治中、刘斐商量解决问题的途径。接着，蒋把后转入正题，并说他一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同毛泽东会面，请周恩来电告延安。

会见结束后，周恩来立即赶回红岩，马上致电毛泽东，报告他同蒋介石会面的情况。周恩来分析蒋介石这次约见毛泽东，在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但在其初步解决新疆及回回问题之后，他自己又北上布置，其目的“未可测”。周恩来提出两个办法供中央选择：一是毛泽东称病，以刚从苏联回国的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二是要求蒋带周恩来到西安，然后由周飞延，偕一人（林彪或其他人）回西安见蒋。周恩来估计：前一个办法可行，后一

个办法不易得到蒋介石同意，除非偕同出来的是朱德。

8 月 17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回电，同意采取周恩来的第一个办法。电报说：“毛现在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可是 19 日毛泽东又打来电报，说关于他见蒋的问题，中央尚未作最后决定，并表示“依目前形势，我似应见蒋”。

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虽然有用政治办法解决国共关系的表示，但是具体问题在他两次会见时都没有谈起，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压迫未见减轻，会见地点又在西安，因此觉得蒋、毛会晤时机尚未成熟。当天，他又回了一电，建议：“最好林或朱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

这个时候，毛泽东仍然倾向于出来和蒋介石谈判。他先后打来电报说：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见蒋后确定我去时间。”“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那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日期。”

收到这份电报，我疑虑重重。看来毛泽东是准备到西安会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时我随周恩来住在张学良公馆，张学良一去不返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联想起这件事，我深感蒋介石是不讲信义的人，毛泽东到西安会见他，安全没有保障。我真想把我的想法向周恩来提出来，但是他工作很紧张，没敢打搅他，我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电报后和董必武等同志开了一个会，详细研究了当前的局势和毛泽东出来谈判的利弊。会后周恩来起草了一份很长的电报，坚持认为毛、蒋见面时间略早。电报说：

我们认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提到愿回迎接林或朱出来亦不许），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一）蒋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三）毛出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

经过几次的电报往返，反复磋商，毛泽东终于接受周恩来的建议，暂不

出来和蒋介石会晤，先由林彪来西安见蒋介石。

看到这几份电报，知道毛泽东不出来，我的心也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林彪于 9 月 14 日从延安动身，由于连日暴雨，道路被冲坏，交通受阻，到西安时，蒋介石已经回重庆了。蒋临走时留下话，让林到重庆再谈。

10 月 7 日晚，林彪一行到达重庆。这一天晚上，办事处的同志都很高兴。当晚，林彪随周恩来、董必武住在曾家岩，随行人员伍云南等七人住在红岩。

10 月 13 日，林彪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和蒋介石见了面。首先说，毛主席很愿意见蒋委员长，不巧患了伤风不能来。蒋介石也礼貌性地表示问候。接着，林彪围绕如何抗战建国与团结统一，以及对两党争论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蒋介百对林彪谈话起初频频点头，但听到批评国民党有人主张内战时，则一再看表，明显地不愿再听下去，谈话就此中止。

16 日，周恩来、林彪和张治中在桂园会谈。林彪说明中共有几十万军队在敌后抗击日军，要求“三停、三发、两编”，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饱、发弹，允许中共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张治中虽然对共产党一向持友好态度，但他只能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说话。他打断话头，要求中共方面不要再提老一套，如真想缓和空气，最好多谈一般原则，不涉及具体问题；如真要解决问题，则必须改变态度，不可片面要求国民党方面让步。最后张治中建议林彪先和各方面多谈谈，然后再同他谈。后来周恩来和林彪即与刘斐会谈，刘表示一切都可以谈，具体问题却一个也没有涉及，而是要周、林同张治中谈。

根据以上情况，周恩来判断这时蒋介石等趋向于政治解决中共问题，避免军事破裂。但他们并不急于解决，而以为时间拖得越长，中共的困难就越大，有利于使中共就范；而且政治解决，前提是听从他们的命令，决非民主合作平等协商；而且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军事为主，要我军服从调遣，变更防地。现在不仅蒋介石不先提要求，连张治中、刘斐也不先开口，而要看中共能作出什么让步。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认为这次谈判我们不可能实现全部要求，如果坚持，必使关系弄僵，不利于形势的缓和。他把这些意见都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他主张谈判要采取灵活的做法，在林彪再和蒋介石会见时，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或提到愿听调遣，但有困难，请求停打保持接触。虽然通过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的时机并不成熟，但林彪此行完成以下两个任务却是可能的：一、缓和两方面的关系；二、重开接洽大门。毛泽东完全同意周恩来的看法，认为这次谈判重在缓和关系，重开接洽大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彪二次见蒋后即回延。

此后谈判停顿了近一个月。11 月份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公开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今后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割据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能履行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之宣言，服从政府命令，忠实的实现三民主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委员郑延卓到陕甘宁边区发放救济款。对上述变化，周恩来和毛泽东都非常重视。他们一致认为：国民党十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已不再是内战危机的扩大，而是由军事解决到政治解决的开始，也就是好转的开始。它给四个年头的国共关系作了一个总结，指出了国共继续合作及具体谈判与解决过去存着的两党争论的途径。

根据这个新的情况，毛泽东主张尽快开始与国民党谈判，并向仍在延安的郑延卓透露了中共方面关于具体解决两党关系的主要意见。这就是：边区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军队则请编四军十二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发饷发弹发药”。毛泽东并称赞蒋是全面人才，说国民党大有希望，现在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至于社会主义须条件具备后实行，它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只会在他们之后，且三民主义也可以发展到社会主义。毛泽东还写了一封信托郑延卓带给蒋介石，信中称：“前承宠召，适染微疾，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

对于中共的态度，蒋介石自然也十分重视。

12 月 14 日，周恩来在南方局党员大会上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他总结了 1936 年以来国民党对待共产党关系的变化，指出目前是“空气缓和”，“关系恢复”，趋向好转，但能否解决问题，尚“在两可之间”。提出好转中仍须注意两个事实：双方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很大距离；局部压迫并未放松。但各种因素将使国民党继续改变其对中共的方针，“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促使其变”。“基本方针仍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和民主”，具体的是“争取好转，不忘防御”；“争取合作，不忘斗争”；“争取发展，不忘巩固”。

12 月 16 日，蒋介石再次约见林彪。事先周恩来向林彪嘱咐了见蒋时的谈话要点。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林彪会见了蒋介石。林彪表示拥护国民党十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的新精神。在谈到两党关系时，林彪要求彻底实行“三停三发两编”。蒋介石说，统一团结问题，国民党是诚意的，不是政治手段，希望能真团结，大家在政令下工作。为此，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应求解决，并要整个解决，很快的解决，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的零碎的解决。只要他活着，决不会让中共吃亏，并夸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国家是爱惜人才的。但是蒋介石对于如何解决边区与中共关系问题，也还没有具体办法，而且对新四军问题绝不让步。当林彪在谈话中提到新四军时，蒋介石马上制止说：“你们既然拥护政府，拥护委员长，而又提新四军，在报纸上、文章中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蒋介石还假情假意对林彪说：“你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说。”

这次会谈虽没有解决具体问题，但蒋介石的语气是缓和的。周恩来把这些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主张主动与张治中谈具体问题。经与中央商量，确定提四条：“甲、共产党合法化，国民党可到中共区域办党办报，共同实现三民主义。乙、扩编四军十二师。丙、边区依现有区域改为行政区，直属中央，改组华北地方政权，实行中央法令。丁、战后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保证战后完全做到。情况许可时，可磋商部队移动事宜”。12 月 24 日，周恩来和林彪约张治中谈判，郑重提出上述四条，并声明：“如认为这些条件可谈，林彪就继续留下来谈下去；如果认为相差太远，请蒋委员长提出具体条件，交林彪带回延安商量。”张治中逐条记下后答应报告蒋介石。

过了新年，1943 年 1 月 9 日，张治中约见周恩来和林彪，正式答复中共所提四项条件，同国民党方面希望相距较远，与何白皓电及《中央提示案》

精神也“相距甚远”。决定仍以《中央提示案》为基础，且正式谈判仍由何、白出面主持。张治中个人意见认为，党与政府两项问题不大，但军队编为 12 个师太多，军队北移必须限期开动。周恩来答复说：所提四项与皓电精神“并无根本不合处”，距离只在军队的数目和移动的时间。周恩来将这些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复电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判断，目前并非解决问题之时，他建议在造成中共态度好、愿意解决问题的空气，证明国民党故意为难，以便宣传和保持下次继续谈判之门敞开的前提下结束这次谈判。

2 月初中共中央复电同意，甚至愿意在军队数目上以减少一两个师来进一步表示诚意。可是在蒋介石召开的临时紧急军事会议上，大部分将领都认为中共所提四项条件不能接受，蒋介石也不置一词，只在散会时说：“好吧，再谈吧！”这样一来，国共谈判事实上尚未展开即告失败。随着何应钦去印度，两党接触也告停顿，国民党特种委员会并且通过决定，在目前情况下原则上不解决问题，一切留侍以后解决。所以 3 月份何应钦回重庆后于 28 日又与周恩来、林彪再次会见时，没有谈到任何实质性的问题。这时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宣称中国之命运的决定“不出于二年之中”。届时，他将把“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军阀”全部铲除，锋芒直指中共。此后，两党军事摩擦再度频繁起来。随着 5 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国民党估计中共将陷于严重困难，更无意与中共进行谈判来解决问题。6 月 4 日，张治中正式通知周恩来：谈判“须搁一搁”。至此，国共两党的接洽与谈判也就停下来了。

6 月 7 日，蒋介石接见了周恩来和林彪，允许周恩来和林彪回延。这是皖南事变后一年半来，他第一次允许周恩来离开重庆。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负责。

6 月 28 日清晨，周恩来、邓颖超、林彪、孔原、吴克坚、伍云甫、方方、高文华等一百多人乘着四辆卡车带着药品、无线电器材，从红岩村出发，向延安进发。当时林彪身上揣着一封蒋介石写给毛泽东的信，是张治中在饯行宴会上嘱林彪代转的。

蒋介石一面同意周恩来、林彪回延安，一面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6 月中，蒋介石密令胡宗南把驻守在山西黄河东岸的两个军调过河西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闪击延安。7 月 4 日，毛泽东致电重庆董必武说，蒋介石正增兵包围我陕甘宁边区，内战可能爆发，请发动国统区广大群众及各界人士起来呼吁停止内战，同时，对张治中、刘斐及各国驻重庆使馆说明，我们正在研讨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的办法，以赢得同情和制止内战的爆发。

7 月 6 日，西安特务头子张涤非，冒用“群众团体”名义，召开座谈会，并到处发电报，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陕甘宁边区”等，制造反共舆论。

7 月 9 日，周恩来、林彪一到西安，就收到毛泽东来电，要周恩来即向胡宗南交涉，撤离包围边区部队，以免爆发内战。但胡宗南不承认有进攻延安企图。他表面上还若无其事地宴请周恩来和林彪，并称周为“老师”，林为“同学”。谈话中，胡宗南还谈起 1935 年 6 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在四川松潘城。他说，如果那时候红军进攻松潘，他可能当俘虏，因为那时他孤立无援。他还笑着说：“不过我相信，如被俘，周老师认识我，不会把我杀头的。”引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周恩来也笑着回答说：“红军是不杀

俘虏的，何况是你老兄。”周恩来以后同我们谈到这个故事时说，从胡宗南口里也证明了当时张国焘反对执行松潘战役的罪过。如果当时把松潘打下来，消灭了胡宗南主力，那么，红军就不要过大草地了。

周恩来一行在西安活动三天，16 日安抵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张闻天等的欢迎。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也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 动员各界共建联合政府

1943 年，随着抗日战争日益接近胜利，战后中国的命运与前途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蒋介石虽然企图在战后仍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继续实行独裁统治，但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不得不作一些姿态。在当年 9 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表示要在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并说“中共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9 月下旬，国民参政会召开三届二次会议，蒋介石在演讲中又表示愿意实行民主政治，组织宪政促进会与党派协进会。对于蒋介石的这些言论，延安也作出了反响。10 月 5 日，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提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当时周恩来正在延安，毛泽东打电报结留在重庆主持工作的董必武说，对国民党要采取缓和态度。15 日，董必武出席了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会议。这是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两党关系又开始出现缓和的局面。

这年年底，英、美、中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当时美国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但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它希望中国能继续牵制日本的兵力。罗斯福对蒋介石说：抗日战争还在继续的时期，你们必须与延安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蒋介石是要靠美国援助的，罗斯福的意见他不能置之不理，尽管他并不愿意，也要虚情假意应付一番，于是由何应钦、白崇禧向董必武表示，欢迎延安派人来谈判。国民党在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也向毛泽东表示，要求林伯渠、朱德和周恩来前往重庆，并提到何白皓电和西北军事问题。毛泽东答复说：谈判可以何白皓电为基础，反攻时胡宗南部与边区部队可按比例开往前方。他还对郭仲容说：中共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不变。

1943 年冬和 1944 年春，以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目标，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地纷纷组织各种政治性团体，利用报刊和集会，讨论宪政，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专制统治。1944 年 1、2 月，黄炎培等在重庆召开“宪政座谈会”，张澜在成都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要求实行约法、尊重人民自由、刷新政治、革除弊端、全民动员、武装人民等项主张，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

针对国统区争取民主斗争空前活跃的形势，同时我们已经表示愿意随时恢复两党谈判。1944 年 1 月 16 日，毛泽东约见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告诉他中共拟在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中选一人，或三人同行，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3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3 月 5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政运动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说：我们的态度是要坚持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参加宪政运动，表明我们愿从政治上解决。3 月 12 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 19 周年大会上，作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讲演。他说：国民党及其政府如果要实施宪政，就必须真正拿革命三民主义做基础，必须首先实行保障人民自由、开放党禁和地方自治这三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如果真愿用政治方式合理解决国共关系，就应该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其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其所管辖、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番号；撤消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周恩来还说：我们很希望国共关系能够恢复到孙中山

先生在世之日的那样密切的合作，但只有做到了上述各点、国共团结了，才具备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的讲演以及董必武以参政员的身份参加宪政运动，对大后方的宪政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也为它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4 月 29 日，林伯渠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偕王若飞、伍云甫等离开延安到达西安，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进行谈判。林老离开延安前，周恩来提出了这次谈判应采取的方针。他说：这次林老去，与林彪出去时不同。这次我们不提方案，目的只在和缓国共关系，表示我们是要与国民党合作，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扩大对社会各界的活动。5 月 11 日，毛泽东又致电林伯渠，告诉他可按周恩来同志 3 月 12 日讲演中所提的五条，同王世杰、张治中谈判。5 月 17 日，林伯渠、王若飞和王世杰、张治中同机由西安飞抵重庆，继续谈判。由于国民党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二民主义的方针，谈判进展很慢。6 月 5 日，林伯渠、董必武和王若飞联名致电毛泽东，报告十天来的活动及各方面的动态。电报说：同国民党的谈判，我们完全遵照中央指示进行。蒋介石目前虽极困难，但绝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今天只是作出谈判姿态给中外看。此点苏美英人士、中间党派、地方实力派及孙科、许宝驹、王昆仑都同我们看法一致。我们态度是“不闭谈判之门，也不存急切解决之想”，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宣传我党实行民主抗战的成绩及力量上，用在推动国民党内外一切不满现状的人积极起来争取民主运动，并使这一运动互相配合。电报还说，我们已同美国武官详谈两次，他目前最关心的是华北、华中敌军的行动。同苏联武官也已谈过，本周内还将与英国武官会谈，中间党派及地方实力派曾有恐我党与国民党单独解决的心理，现在他们已清楚了我们的态度，都说蒋无诚意解决问题。我们力量强大，不怕拖，也不怕打，增加了他们争取民主运动的信心。对左翼文化界、妇女界均开过座谈会，并个别和一些教授、学生、工业家谈过，他们都不满现状，要求民主。在国民党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我们可以推动他们起来争取民主。这封电报，非常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当时国统区内人心的向背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

国民党对谈判缺乏诚意，因此没有取得什么成果。7 月 1 日，周恩来在延安答新华社记者说，国共谈判从西安到重庆，已历时两个月。尽管双方提案“内容相距尚远”，商谈仍在继续。中共中央正研讨国民党的提案，期谋合理解决。在有利于团结抗战及促进民主的条件下，中共无不乐于商讨。

这段时间内，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为了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从 1944 年 4 月起，日军向国民党战场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发起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性进攻。在这一线上的国民党军队由于何应钦等人指挥失宜，加上士气低落，除少数外，大多数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4、5 月间，日军先后夺取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线。6 月至 8 月，又先后占领长沙、衡阳，随即又向广西进攻，桂林、柳州、南宁相继沦陷，日军一直打到贵州独山，举国上下为之震动，重庆的政府官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战场却出现这样惊人的大溃退，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从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怒。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专制独裁、特务横行，经济上的横征暴敛、物价飞涨、民生凋敝，更使人们感到忍无可忍。而这时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局部反攻，打得很好；解放区一派生机勃勃，成了鲜明的对照。于是，长期积郁在人们心中的愤怨终于迸发出来，

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易辙，立即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宪政，以挽救抗战危局，已成为人们越来越强烈的普遍要求。国际上的有识之士也认为国民党已经腐败，对其统治失去了信心。

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需要提出新的政治主张。9 月 4 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在 8 月中旬提出的意见，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的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电文用十分明确的语言强调：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后来，周恩来又指出，“联合政府是取消独裁政府的方针”。9 月 15 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报告了四个月来国共谈判的经过，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指出只有坚决地变革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机构，才能团结全国人民，认真准备反攻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为此，必须立即召开各抗日党派、抗日军队、地方政府、人民团体代表组成的紧急国事会议，来讨论解决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17 日，《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了林伯渠的这个报告，重庆各大报亦全文登载。

10 月 10 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中共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第一，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自己推选代表，人数应根据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按比例规定；第二，国民政府于最近期间召开国事会议；第三，在国事会议上，根据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要；第四，在各方面制订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第五，联合政权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成立联合统帅部；第六，在联合政府成立后，即着手成立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他还指出：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中国的正面战场却节节败退，而敌后战场是节节胜利。正面战场胜利与否，“是中华民国胜败兴衰的关键”，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正面战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实施一党专政、排除异己、压迫人民、横征暴敛的法西斯主义的政策所造成。”他强调挽救目前危机的唯一正确方案是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口号一提出来，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国统区内掀起了一场以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目标的广泛的民主运动。9、10 月间，各界纷纷召开会议。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内的民主派的代表董必武、张澜、沈钧儒、冯玉祥等 500 余人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重庆、成都、昆明等地人民团体也纷纷集会，通电全国，呼吁成立联合政府。如：10 月 4 日，成都的四川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 5 所大学的 7 个学术团体发起在华西坝体育馆举行国事座谈会，到会 2000 余人，张澜在会上高呼“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这是 1940 年“抢米事件”以来成都第一次公开举行的大型集会。即使在国民党领导集团内部，不少有识之士也认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合情合理，主张“作真诚的让步以求团结各

方人士”。这些情况表明，在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的旗帜下，国统区出现了进步力量更加团结、中间力量在政治上活跃并趋向进步的新局面，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当中国的联合政府问题成为举国关注的热门话题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美国政府对此也极感兴趣，并且直接介入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问题的谈判。

这是为什么呢？

早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已向蒋介石提出，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不要发生内战，才能牵制日本的兵力。蒋介石并没有真正要解决国共两党矛盾问题，内战危险依然存在。这个时候，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作战中，实行“蛙式战术”（也称“跳岛战术”），取得了节节胜利，战火逐渐燃近日本本土。而在中国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大溃退，政府面临崩溃的危险。美国派来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官兼中国战区司令官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对国民党调动军队包围边区和蒋介石拒绝援助共产党大为不满，与蒋的矛盾很深。这对美国在亚太战场的战事很不利。1944 年 6 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敦促国民党迅速着手改善中苏关系和解决国共矛盾。同时，美国政府还有更长远的考虑，对日作战已胜利在望，而国民党政府如此腐败，军队不堪一击，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他们在向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美国政府担心战后如果中国爆发内战，胜利者将是共产党。因此它要扶植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希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统一全部中国军队，并改组政府使它带有某些“民主”色彩，实现中国的政府统一，美国则可以控制这个中国政府。

9 月 6 日，曾担任美国陆军部长的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让其居中调处国共关系。史迪威则被调回国，由魏德迈继任。10 月，赫尔利开始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他来华的任务是：一、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作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三、使蒋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间关系和谐；四、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五、为击败日本计，统一中国境内的一切军事力量。一时赫尔利成了处理中国问题的中心人物。

这时，中共中央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既愿同美国友好和在美国调处下与国民党谈判，又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蒋介石的反动政策。10 月 17、18、23 日，董必武、林伯渠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同赫尔利进行了三次会谈。会谈中，赫尔利表示得很痛快：他代表罗斯福帮助中国的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分配的东西也决不偏重某一方。他表示：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应当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中共党员参加。并对中共的宽容忍耐、以国家为重，加以赞扬。10 月和 11 月之交，在延安的美方人员戴维斯、谢伟思等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探讨了中共领导的军队同美军合作的可能性。周恩来代表中共表示：对美军准备在华北采取的军事行动，中共愿在军事上给予合作。

11 月 7 日，赫尔利飞抵延安，周恩来和包瑞德前来迎接。当周恩来看到这位身穿考究军装，佩带大量勋章的将军时，问包瑞德：这位是谁？包瑞德回答：这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少将。周恩来立即把毛泽东请来。

第二天上午双方开始会谈，中共方面参加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美国方面参加的是：赫尔利，包瑞德、一名译员和一名秘书。赫尔利首先表示：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而只是打算做那些可能有助于最后打败日本人的事情。他声称：蒋介石同意由一个美国代表团来促进民主，并通过统一的中国军事力量来加速打败日本的步伐。他们进行了三天会谈。赫尔利带来了经蒋介石修改同意的《协议的基础》的文件，其中虽然也提到“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根本没有谈到成立联合政府，却规定：“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等等。这样的条件实际上是保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有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为此而改组政府是必要的。推迟这一改组直至击败日本以后，这就是蒋介石的决心所在。他还强调指出：应该改组的军队，决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国民党的丧失战斗力、腐败不堪和一打就散的军队。经过谈判，赫尔利表示赞同共产党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全文如下：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10 日上午，毛泽东与赫尔利分别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了字，还留下了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地位。签字前，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重庆），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当日下午，周恩来与赫尔利同机到重庆，准备同国民党商谈实现“协定”的具体事宜。

周恩来一到重庆，便立刻同分别年余的各界人士广泛接触。11 日，适逢郭沫若、沈钧儒设宴欢迎刚从桂林来渝的柳亚子，周恩来与董必武等便一同前往参加。宴会后，他向大家介绍了国内的时局和他这次到重庆的任务。两天后，他又出席文工会举行的宴会，向在座的 100 多名文化界人士讲话。他还先后宴请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张申府等人；会见接替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魏德迈；接见谢伟思；参加了美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和白修德等举行的宴会，向他们

介绍中国国内政治形势，说明他到重庆的任务。周恩来在这些讲话中突出强调：政府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中国共产党主张成立联合政府。

但是，10 天过去了，蒋介石对延安签定的那个协定草案却迟迟不表态。11 月 20 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蒋在目前至多只能接受联合统帅部、请客式政府，决不会答复协定。我们须以联合政府及解放区委员会去逼求，最后关键恐在华盛顿。”

周恩来预料的情况果然发生了。赫尔利本来认为，他在延安与毛泽东签定的协定，以国民党实行某些民主改革为代价，可以换取共产党支出军队的目的，这对国民党是有利无害的。但蒋介石却不同，他一向靠独裁统治维持其地位。在权力问题上，他是寸步不让的。在他看来，延安的协定最终会导致共产党控制政府。因此，蒋介石拒绝了《协定草案》，另行提出三条反建议。赫尔利也随即变了卦，支持蒋介石的意见，背弃了他在延安的诺言。11 月 21 日上午，赫尔利约见周恩来，递交了蒋介石提出的三条反建议案，它的要点是：

一、国民政府允许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

这三条反建议，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否定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存在，实际上就是要全部取消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已经取得的成果和赖以夺取抗战胜利的基本力量。因此，周恩来看完后，立刻一针见血地提出，“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赫尔利回答，“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周恩来明确指出：“对于国民党方面建议我们参加军事委员会做委员这件事，我有两个意见：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挂名的，不但没有实权，而且从不开会，冯玉洋和李济深就是例子。而且我自己做过政治部的副部长，知道得很清楚，此其一。其次，只要共产党参加军事委员会而不参加政府，你知道，蒋委员长一切以命令行事，因而我们仍不能参加决策。”赫尔利说：蒋介石告诉他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但不愿写在建议上。实际上，这又是一个骗局。

下午，他们继续会谈，周恩来要赫尔利就联合政府问题明确表明态度。他问：“赫尔利将军是否仍同意我们为实现中国团结必须以组织联合政府为前提的主张？”赫尔利躲躲闪闪地回答：“我不能使用同意的字眼。因为我不是谈判的当事人，我只是见证人。我认为你们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适当的，但我并不处在同意的地位。”周恩来又问，“参加政府，是否说我们只能处在观察者的地位，而不能有实权？”赫尔利无法回避，只能回答：“并不等于有实权。”在周恩来的一再逼问下，赫尔利越来越狼狈。事实表明，赫尔利同蒋介石商谈后已自食其言。周恩来认为自己再继续留在重庆已毫无意义，要求中印缅战区司令部提供飞机送他返回延安。赫尔利建议他在行前见一见王世杰、张治中。他答应了。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董必武如约到赫尔利寓所，王世杰、宋子文已在座。周恩来说明，他这次出来谈判，目的在于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以谋全国团结，抗战胜利。而国民党方面的协定草案没有这个精神，我们是不同意和不满意的。但由于中国人民的需要，友邦的好意，抗战反攻的急迫，我们一面仍坚持联合政府的主张，并愿为之继续奋斗；另一方面我们也愿从我们协定和你们协定当中先找到共同点，来作初步的解决，以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准备步骤。他问王世杰：“政府准备何种措施使党派合法？”王世杰说不出

来，只能回答：“现在还没有具体考虑这个问题，并无具体计划。”周恩来又提出国民政府并不准备放弃一党专政，王先生意见如何？中共代表如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是否有职有权？王世杰的回答都含糊其辞，不着边际，于是他换了个话题问，请毛先生和蒋先生见面的事，据周先生观察如何？周恩来回答：毛泽东同志很愿出来，但出来必须能够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辩论，现在民主政府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还不是他出来的时候。

当天，他们又应约同蒋介石会面。蒋介石表示希望毛泽东和朱德来重庆。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对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仍坚持的，并愿为它奋斗到底。”但他也留了余地：“民主联合政府是指政府的性质，并非要改国民政府的名称。”蒋介石连忙说，“好，我们革命党就是为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周恩来毫不退让，严正指出：“我应该声明，对三民主义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该调换的改组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面对周恩来的凌厉词锋，蒋介石只能含糊其词说：“是的，是的。”当晚，蒋介石宴请部分国民参政员时，他便说中共要求联合政府，他不能接受，因为他不是波兰流亡政府。

周恩来正要启程返回延安，飞机驾驶员却突然病了，延安大雪也没有融化，飞机暂难起飞，他只得在重庆再停留几天。12 月 2 日，周恩来将毛泽东来电中提出的三点意见转告赫尔利，该电指出：政府所提三条与延安签定的五条距离太远，我党认为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是解决目前时局问题的关键。此问题既不能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因此无法挽救危局。

12 月 4 日，赫尔利、魏德迈、麦克卢尔、包瑞德再次与周恩来会谈，试图尽力说服周恩来接受蒋介石的三项建议。这是一次唇枪舌剑的辩论。赫尔利首先提出，“联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参加政府，参加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则已答应，我希望你们参加进来，然后一步一步改组。你认为如何？”周恩来回答：“联合政府本为毛主席在延安向赫尔利将军所提出者，赫尔利将军亦认为合理。至于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举，即令做到，也不过是做客，毫无实权，无济于事。”赫尔利说：总希望你们参加，先插进一只脚来。周恩来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回答：“我自己从西安事变以来，八年之中近七年时间是留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我做政治部副部长时，每星期有三次参加军事汇报，有意见也无法讨论，即令提出，蒋委员长也不过说好好而已。老实说，我对这样做客，实在疲倦了。”

赫尔利企图用物资诱惑，说：“只要参加政府，就可获得承认，就可获得美国军官帮助训练和作战，就可获得物资的供给。你们拿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强大起来，为什么一定要改组政府呢？”周恩来严正回答：联合政府“这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抗战不仅要军事，而且要政治、兵役、粮食、供养，乃至生产，都要政府来办理。政府不改组，就无法挽救目前的危局。”

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尔也来参加劝说：“我们美国有句话，叫要舍身救火。现在一把火烧起来了，你们得救。”周恩来巧妙地回答：“不错，火应当救。但是要两只手能动，才能救火。现在请我们来做客，也只能坐在旁边看火。”

利诱不成，赫尔利改换手法，企图用名誉来打动周恩来。他说：“如果

你们在不满意的条件之下，竟能参加政府，那就表示你们是最大的爱国者。”会谈已进行了很长时间，周恩来感到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参加政府，就要替人民负责。现在我们参加进去，不能负责。这样的政府，我要参加，我就是不信上帝，我的良心也过不去。譬如政府要我参加，我党要我考虑，我个人都要拒绝。”

在原则问题上，周恩来寸步不让，赫尔利也不好再提什么12月7日，周恩和董必武、包瑞德同机飞延安。飞行中还出了点问题，驾驶员迷失航向。包瑞德建议作180度的转弯后向前飞，到达渭河上空才朝北飞。这天天气晴朗，渭河看清后驾驶员向北飞行，终于化险为夷，到达延安。董必武回延安是中央早些时候作出的决定。11月7日中央来电，由王若飞留渝主持工作，组织工作委员会，以王若飞、刘少文、徐冰、钱之光、熊瑾玎、潘梓年和童小鹏七人为委员，王若飞为书记。在讨论有关工作时，许涤新、张友渔、章汉夫等可列席。

在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同包瑞德会谈。毛泽东说：蒋介石提出的建议相当于要我们完全的投降，而交换条件是给我们一个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我们不能接受。美国开始同意我们的条件，后来又要求我们接受国民党的，我们难以理解。我们欢迎美国帮助我们进行军事训练，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帮助要经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出了全部让步，我们不能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我们将为另外组成一个独立政府作准备。周恩来也写信给赫尔利，指出：国民党方面“对我们最低限度五项建议之拒绝，即明白表示不同意我们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建议。同时又提出他的三点反建议案，这样就阻止了我回到重庆从事进一步谈判的可能。我们发觉在这些新建议里面，不可能找到基本的共同基础。我们认为，为了告知民众，并使政府改变其态度，现有公布我们五点建议案的必要。”赫尔利复电周恩来说，他将双方的建议都看成谈判中的步骤，他不相信谈判已经终结。希望不要公布我党的五点建议，并希望周恩来能再次来渝谈判。

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王若飞，嘱他转告已回重庆的包瑞德：“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并声明：“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这就既坚持了原则，也没有把国共谈判的大门完全关闭。在赫尔利再次电邀周恩来希望他能到重庆商谈后，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说明我党不愿在关于联合政府问题上继续进行抽象讨论。因此提出了释放一切政治犯，如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大批被监禁的爱国志士；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大军；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等四点要求。并请赫尔利转告国民党当局，“看他们是否决心实行民主和团结。”

1945年1月7日，赫尔利在与蒋介石商谈后，又致函毛泽东和周恩来，提议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11日，毛泽东复电函赫尔利，建议在重庆召开国事会议的筹备会，国共两党、民盟代表三方参加，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行动的自由。此议如获国方接受，周恩来将前往重庆磋商。20日，赫尔利在得到蒋介石同意后致函毛泽东，说明了在国民党政府计划中的某些变更，并估计这些都不可能得到我党同意，但希望我党不要马上予以

拒绝，建议派周恩来或其他代表到重庆“作一短期访问”。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再次到重庆。

1 月 24 日，周恩来到达重庆，赫尔利到机场迎接，把他送到曾家岩住地。当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设宴为周恩来洗尘，陪同出席的有赫尔利、张治中、王世杰。宴会后，宋子文说明政府准备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一个行政委员会，由国共和其他党派三方面出人参加。周恩来说：“这次我来重庆，是为了召开党派会议。上次我曾声明，我们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不放弃，并声明要继续为这个主张而奋斗。有了主张，没有步骤不行，因而提出召开党派会议。联合政府是立场，党派会议是方针，一个是立场，一个是方针，必须弄清楚。”周恩来已经看出，国民党的所谓“变更”，毫无实质性的变化，不过是在玩弄文字游戏而已。他明确指出：“国民党主张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一个新机构，但是整个系统不变。这个系统，就是一党专政。新机构属于行政院，行政院属国防最高委员会管辖，国防最高委员会又属国民党中常委管辖。蒋主席也不是人民选举的，是国民党中常会推选的。这一套系统不改变，我们也无法参加政府。”

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连续进行谈判，反复提出召开各党派国事会议及改组政府问题，均为国民党方面拒绝。第二天，赫尔利告诉周恩来，昨晚同国民政府方面人士商谈了五点：一、去年 11 月 21 日的三条仍要做；二、行政院设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性的新机构；三、成立有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各一人参加的整编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四、为中共军队设一美军官作总司令；五、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合法。这是企图将我党军队完全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周恩来当即断然拒绝这种无理主张。他指出，这个建议的实质，是取消全国人民关于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的主张，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是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具体表现。对周恩来的答复，毛泽东十分满意。他在来电中说：你拒绝了赫尔利的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的军队，尤其是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

2 月 2 日，周恩来把他起草的一份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交给王世杰，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先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讨论和解决如何结束党治，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与此同时，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也交出他所草拟的关于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但这个方案里没有改组政府的字样。2 月 13 日，周恩来由赫尔利陪同，会见蒋介石。蒋竟宣称：“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这等于拒绝将谈判再进行下去。周恩来怒不可遏，决定立即返回延安。15 日，他就国共谈判问题发表声明，驳斥前一天王世杰在招待外国记者时发表的歪曲事实的谈话，说明由于国民党政府在谈判中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坚持不结束一党专政，反对民主联合政府，所以使谈判毫无结果。2 月 16 日，周恩来即飞延安。

周恩来这次到渝期间，更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士。他先后同邵力子、孙科、王昆仑、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陈铭枢、杨虎、杨杰、谭平山、柳亚子、马寅初、左舜生、黄炎培、雷震等交谈，阐述他对时局和国共关系的看法。他在离渝前，又在特园宴请于右任、孙科、左舜生、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钧、李璜、冷遹、王昆仑、屈武、陶行知、杨杰、陈铭枢、郭沫若、邓初民、谭平山、鲜英、黄炎培等，向他们报告此次国共谈判经过，揭露了

这次谈判被破坏的事实，使我党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士所理解，所同情。连美洲的十家华侨报纸也要求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可见我党主张也得到海外拥护。

为了同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主张相对抗，3 月 1 日，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公然宣称：他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并宣布将在 11 月 12 日召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蒋介石的顽固立场更激起了国统区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1945 年，上半年，国统区的各民主党派、文化界、妇女界、工商界、青年学生、工人等以重庆、昆明、成都为中心，发表宣言，举行集会，一致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集会规模由几十、几百发展到上万人参加；斗争形式由座谈、演讲，发展到示威游行。高涨的民主运动，发展壮大了进步力量，成都、昆明、重庆等地先后建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同时，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与一些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系更加密切。这场民主运动使国民党更加孤立，人民群众受到了教育，实际上，它也揭开了战后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序幕。

1945 年 4 月 23 日到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刘少奇分别作《论解放区战场》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在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说，并在 4 月 3 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这个发言系统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总结了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同盟军思想的理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6 月 19 日，又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 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

## 为人民争胜利果实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历时八年，取得了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领导八路军、新口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敌后坚持斗争，经过大小十二万次战斗，消灭日伪军一百七十余万人，其中日军五十二万余人，俘虏敌伪军约三十万人。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十九个解放区，面积近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人。建立了正规军一百二十余万人，地方民兵二百六十万人。抗战胜利后我们的目标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开过党的七大后，周恩来继续留在延安。忙于筹备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中央决定：如果国民党独裁地召开所谓“国民大会”，我们就在 11 月召开解放区代表会议与它对立。我是 7 月 1 日随王若飞陪黄炎培、章伯钧六参政员飞延安的，住在杨家岭周恩来院子窑洞内，他要我看整风运动中编印的《两条路线》和七大文件，我就一直住了下来。

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8 月 10 日，中央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

10 日，周恩来起草用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要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限期接受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的敌伪投降，如遇拒绝投降缴械，应予坚决消灭。11 日，又连续起草延安总部第二至第六号命令，令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所部，即从现地出发，向辽宁、热河、察哈尔进发；令冀热辽边区的李运昌部，即向辽宁、吉林进发：令贺龙、聂荣臻部向绥远、察哈尔进发。各部都应向敌伪侵占的城市、交通要道举行进攻，迫使敌伪军无条件投降，如遇抵抗，则坚决消灭之。

16 日，周恩来又为中央起草发给重庆局（当时董必武出国参加联合国会议，王若飞在延安，由张明和徐冰负责）的指示电，指出：数日来，蒋介石以更大力量在扩大内战宣传，企图嫁其责任于我，欺骗人民，好便于他放手内战，继续独裁。“我为揭穿蒋之欺骗阴谋，应集中于宣传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主四个口号。”“你们应在报纸上，在中外人士中，配合延安广播，坚决地予以严斥，以压倒蒋之反动宣传，推动各方。”

各解放区遵照中央的指示和总部的命令，立即紧急动员，迅速集中分散的部队，组成强大的反攻大军，向日伪军送出通牒。从东北到华北、华中以至华南各战区，都向日伪军陆续发起了全面反攻。自 8 月 10 日到 8 月 22 日，华北八路军收复了威海、涿县、平山、辉县等 70 余座城市；华中新四军解放了溧阳、金坛等县城 17 座，重要市镇近 200 个。

正当解放区军民乘胜进攻日伪，收复失地的时候，一直躲在重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介石，为了垄断受降，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于 8 月 11 日同时

发出三道命令：令国民党部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而令共产党部队“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12 日，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令中国战区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日，蒋介石对日本侵略军司令冈村宁次发出命令：“在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与交通。”

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8 月 13 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地拒绝”他 11 日的命令，指出他的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同时，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新华社评论，严正指出，蒋介石的命令，是在挑动内战。并呼吁全国同胞，世界盟邦一致起来，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15 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给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发出说帖，请他们转达其政府。严正声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下，“有权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同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冈村宁次及其侵华日军，向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投降。同日，朱德再电蒋介石，提出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等六项合理要求。

各解放区根据中央指示，在反攻中取得了很大胜利。晋绥部队相继攻占了左云、文水等八座县城；晋察冀部队于 8 月 25 日攻占了张家口，并先后攻占遵化、阳曲、涞水等 30 多座县城；晋冀鲁豫部队收复了济源、沁县等 30 余座县城；山东部队 25 日解放了烟台，并先后占领了莱芜、章邱等 30 余座县城；华中部队解放了兴化、句容等 30 余座县城；华南部队攻克了宝安县等。

为了把参加七大后仍留在延安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送回前线，周恩来要叶剑英、杨尚昆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交涉，派了几架 C47 运输机把一批将领送到太行山根据地，再转到前线。第一批是林彪、张际春等 11 人，于 8 月 20 日起飞；第二批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滕代远等 10 人，于 8 月 26 日起飞。他们到达目的地后，立即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指挥所部对日伪实行胜利的反攻。

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在争取抗战胜利果实的日子中，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从 8 月 11 日至 9 月 2 日止，我军共占领了县以上城市 146 座和附近广大乡村，解放了大批人民群众，歼灭了一部分日伪军，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大量战争物资，扩大了解放区，壮大了我军力量，为制止蒋介石的内战作了充分准备。

9 月 2 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但是，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 陪同毛泽东到重庆

蒋介石发动内战时机辽未成熟，所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一面作出和平姿态。他接受政学系吴鼎昌的“假戏真做”主意，在 8 月 14 日、20 日和 23 日，接连三次打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定大计”。他们估计毛泽东是不会到重庆来的。如果毛泽东不来，他就可以宣称共产党拒绝谈判，把内战的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来了，他就利用谈判逼我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欺骗舆论，作内战的准备。

然而，延安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党中央反复讨论，研究对策。那几天，延安的枣园与往日有所不同，梨树林中，增添了毛泽东安详踱步的脚印。他的办公室和中央书记处会议室，彻夜灯火通明。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开会，分析国内外形势，权衡毛泽东亲自去重庆的利弊。8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收到斯大林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中共中央电，要中共与蒋介石妥协，并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亲自到重庆去。23 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够取得的，英、美、苏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他所以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因为上述诸条件约束着，周恩来和蒋介石打过多年的交道，对他有深刻的了解，对局势的判断也很精辟。他说：从抗战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我们是争取主动，逼蒋妥协。也有可能一面谈一面打，我吃亏他理亏。

这次会议决定先由周恩来去重庆谈判，毛泽东应去重庆，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定。周恩来在谈自己的任务时说：中央决定我出去，我个人的想法这是一个侦察战，最重要的是看蒋介石开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的，当然不能失去我们的立场。大家关心毛主席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出去：也不能作下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作决定，对于蒋介石是否搞阴谋，也必须考虑。

周恩来紧张地进行谈判的准备，他草拟了对国民党政府紧急要求十一条，内容包括：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解放区和抗日军队有权派代表参加处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严惩汉奸，解散伪军；释放爱国政治犯；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和对新闻出版的检查条例；召开政治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紧急措施；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毛泽东看后增加了两条：救济被难同胞；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这些内容，都符合人民的要求与愿望。

8 月 24 日，毛泽东在接到蒋介石 23 日第三次邀请电后，又接到美军司令魏德迈的邀请电。25 日晚上，政治局七位同志与 7 月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一起，再次讨论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同意毛泽东去重庆，周恩来、王若飞同行。第二天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昨晚讨论的情况。他说，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自然，去谈判必须作一定的让步，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当天，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

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说明我们党对谈判的方针。要点是，在谈判中，我方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以击败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我党在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并对各解放区的斗争作了原则的指示，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了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党中央的方针，全党同志是拥护的，但不少人深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那时在延安的一些同志议论纷纷，一些人认为："蒋介石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一面又请毛主席去重庆，这是一个大阴谋，毛主席不能去。"有人说："蒋介石是不讲信义的，毛主席不要成为第二个张学良。"有人说："顶多周副主席去就够了。"一些解放区部队和地方党政负责人还打电报给中央，建议毛主席不要去重庆。

25 日深夜，重庆办事处三楼的小电台收到延安来的 AAAA 急电，机要科立即翻译出来，是周恩来给钱之光和徐冰、张明的电报，说毛主席要到重庆谈判，对毛主席的安全警卫、注房、饮食等都做了具体指示，连要给毛主席准备洗脸盆都说到了。译电员立即把电报送给钱之光。26 日清早，钱之光、徐冰、张明即召集有关同志开会，照周恩来指示一一落实各项工作。同志们都以能直接为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服务感到责任重大又无尚光荣。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知道后，都十分高兴，渴望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但也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尽管议论纷纷，大家一致相信中央是经过审慎考虑的，我们有广大解放区和强大的人民军队，有全国人民的拥护，还有国际上舆论的同情，蒋介石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毛主席下毒手。

8 月 25 日，毛泽东答复蒋介石表示要去重庆谈判的电报，也经新华社发到重庆。蒋介石原来估计毛泽东不会来，故作一番姿态，想假戏真做，结果是弄假成真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决定乘专机赴延安迎接毛泽东，蒋介石也派张治中随行，他们于 8 月 27 日飞抵延安。

8 月 28 日这一天，延安天空特别晴朗，宝塔山在阳光照耀下格外雄伟，党政军干部和工农兵群众很早就来到机场，欢送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10 时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随员胡乔木、陈龙、尤飞虎（警卫人员）及我一同来到机场，张治中、赫尔利也同时到达。人群中的欢呼声、口号声震荡着延河两岸的山谷。11 时，他们同中央领导同志握别后上了专机，毛泽东站在机舱门口挥动着巴拿马帽子向大家告别，专机即朝南方飞去。

8 月的重庆，正是酷热的时节，人们的热情和天气一样要沸腾起来了。到重庆九龙坡机场欢迎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以及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谭平山、冷御秋、郭沫若等，中外记者几十人。中共方面有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负责人、工作人员钱之光、熊瑾玎、徐冰、王炳南等。下午 3 时 45 分，专机降落，当毛泽东出现在机舱门口舷梯上，频频挥手向欢迎者致意时，人群中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走下专机后，受到了中外记者团团围住，争着要获得第一手新闻，机敏的周恩来看到这个情况，心生一计，高声喊着："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里来拿吧！"这才把记者吸引过去，这礼物就是毛泽东的书面谈话。于是周恩来把各界人士向毛泽东

一一介绍，他们亲切地交谈起来了。

毛泽东的书面谈话说明了他到重庆的目的，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这个书面谈话，义正辞严，给人们看到了和平的前景，新中国的曙光。

当天晚上，蒋介石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赫尔利、魏德迈、张群、王世杰、邵力子、陈诚、张治中、吴国桢、周至柔、蒋经国作陪。宴会毕，毛泽东等三人即住在蒋的别墅林园。毛泽东在林园住了两天两夜，周恩来一直陪着他，先后同张治中、蒋介石、王世杰、张群、邵力子等进行了会谈。张治中把他在上清寺的公馆桂园让给毛泽东办公住宿，并派了宪兵警卫。蒋介石派了一辆小汽车给毛泽东使用。为了安全和工作上的方便，毛泽东住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只到桂园接待客人。30 日，办事处的同志知道今天晚上毛主席就要到办事处来，新华日报社和曾家岩的同志也都纷纷到红岩来，大家的心情无比激动。为了表示对敬爱领袖的欢迎，把刚刚竣工不久的礼堂打扫干净，摆上凳子。因为重庆的电压低，电灯不明，电台的同志特地买了个 110W 的大灯泡，把会场照得格外明亮。当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山下下车后爬上百多个石阶到红岩办事处进入会场时，白绸衬衣己被汗水湿透了。他仍神采奕奕，笑容满面地向同志们打招呼，问同志们好。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欢愉心情真是难以言喻。接着举行欢迎晚会，演奏了陕北的“郿鄠调”，表演了一些小节目。小乐队用胡琴拉起了秧歌调，女同志请毛泽东、周恩来跳了几曲交谊舞。因怕毛泽东疲劳，主持人宣布散会。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毛泽东从此就住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二楼东北角一间较大的房间，因为这里比较安静，干部轮流在室外高地上放哨，以保证安全。周恩来无时不在考虑毛泽东的安全，他除了随时随地亲自检查安全措施外，特别对负责保卫工作的陈龙、龙飞虎、蒋泽民、颜泰隆、朱有学等同志交代“要机警细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不许有任何一点疏忽。”办事处的李泽纯副官负责毛泽东的饮食，专备了一个洋铁皮澡盆，毛泽东按照医生规定，每晚就寝前要洗一次温水澡，为了不干扰毛泽东休息，办事处规定，三楼电台人员值班、译电员送电报，都不穿皮鞋，只穿布鞋或打赤脚走路。原来我和爱人紫非带了一个两岁男孩住在二楼，她和小孩就搬到一楼去了。周恩来往在毛泽东对面，毛泽东休息时，他就脱了皮鞋穿着袜子走路。

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多次会谈，也会见了许多中外人士，参加各界举行的集会。周恩来除了和国民党代表举行谈判以外，其他时间几乎都和毛泽东在一起，朝夕相处，形影不离。9 月 1 日，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鸡尾酒会，由会长孙科主持。出席酒会的有孙夫人宋庆龄和国民党要人冯玉样、覃理鸣、翁文灏、邵力子、王世杰、陈诚、张治中、陈立夫、朱家骅等，民士人士沈钧儒、马寅初、左舜生、谭平山、李德全、王昆仑、史良、高崇民、刘清扬等。文化界、新闻界郭沫若、茅盾、阳翰笙、王芸生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武官罗申。这是抗战以来重庆空前的盛会。当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到达中苏文化协会门口下车时，黄家垭口的街上行人都停下来了，争相趋前一睹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的风采，

一时把交通都堵塞了。毛泽东等进入会场时，楼下楼上都挤满了欢迎的人群，争着趋前握手攀谈，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以海量著称，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代他喝了一杯又一杯盛情难却的醇酒。散会出门时，大路上还挤满了冒着细雨等待看望毛泽东的人们。

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多次会见了宋庆龄，对她忠诚不渝地信守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献身于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和国内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表现出革命者的崇高气节，表示了由衷的敬意。这使宋庆龄和我党的关系更加密切，并进一步从道义上、物质上支持我党领导的解放事业。

早在抗战期间，周恩来同许多民主人士已建立了友谊，这次毛泽东来重庆，多次在周恩来陪同下，与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以及沈钧儒、黄炎培等会见并举行会谈。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明了中共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并和周恩来一起表示支持民盟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政治会议的主张，这使民盟许多朋友认识了中共对于重庆谈判的方针是正确的，反映了进步人士以至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国民党方面的人士，毛泽东也和他们广泛接触。冯玉祥第一次和毛泽东见面，他称颂毛泽东的到来象征着国内的和平团结，是喜事临门，并设宴欢迎毛泽东。毛泽东也称赞冯玉祥的爱国行动，并鼓励他为国共合作而努力。

抗战中从沿海地区迁入四川和川康资本家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和“西南实业协会”等三个团体，也派代表请求毛泽东接见。9 月 17 日下午，毛泽东在桂园接见了刘鸿生、潘昌猷、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颜跃秋等产业界人士。他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能够发展的只有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现在抗战胜利了，中国应该建成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民族工业方有发展的前途。他也坦率地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但是现阶段，我们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之间利害关系的政策。共产党不会把工商业者当敌人，而是当朋友看待。三个小时的座谈，拓宽了工商业者的视野，消除了一些疑虑，很快在三个团体的范围内迅速传开，在西南国统区工商业者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还会见了一些国家的使节。他们应邀参加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的宴会，席间毛泽东、周恩来热烈祝贺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又访问了英、法和加拿大驻华大使。美国大使赫尔利，曾要充当国共两党的调解人，向新闻界吹嘘过他一直关心两党的团结，在重庆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曾频繁接触。可是谈判进行了大约三个星期时，他偏袒国民党的面貌便暴露无遗，还以回国相要挟。毛泽东、周恩来不买他的帐，指出“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他嚣张不起来了。9 月 22 日，谈判还在进行中，他悄然回美国去。到了美国，朝野有识之士对他颇多非议，不久地不得不辞去大使职务，从此消声匿迹。

毛泽东接见的国际友人，还有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对日本反战朋友深表敬意，高度评价他们站在正义一边。一件有趣的事是，抗战中一批美国飞行员来华参加对日作战，他们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和解放区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对共产党有良好的印象。特别是有 80 名在解放区遇险获救的，对共产党更是感恩戴德。9 月 16 日，在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龚澎

带领下，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个美国飞行员到红岩来，送上一个内有几盒香烟的小包，上面写着向毛泽东问候，祝贺谈判成功，署名为“三个美国兵”。这三个名叫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的飞行员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待。毛泽东知道此事，连忙抽空接见他们，和他们畅谈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意义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谈话后又设宴招待他们。三个美国兵受到启发，高兴地要求和毛泽东合影留念。毛泽东也欣然答应。我选了办公处西门口的芭蕉树作背景，两个美国兵分站在毛泽东两侧，一个蹲在前面，钱之光、龚澎、乔冠华、罗青、刘昂、章文晋等都挤在一起，合照了一张象征中美友谊，有着特殊意义的照片。

毛泽东来到重庆，这是难得的机会，在南方进行秘密工作的同志希望能亲聆他的指示，中央也要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川东特委、重庆市委以及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一些同志，都秘密来到红岩，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一一向他们作了具体指示，使这些同志都感到斗争的方向更加明确，信心大大增加了。

在重庆的 44 天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在他亲自领导下，有关工作人员以最高的政治热情和责任心，完成了各项工作。不仅保证了毛泽东的绝对安全，还使他得到了较好的休息，能精力充沛地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

## 谈判，波折迭起

国共谈判，从 1935 年到 1945 年，实际上已经谈了十年。周恩来一直是唱主角的，这是因为他同蒋介石、国民党有着特殊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中，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担任这个角色。这次重庆谈判，是涉及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唱主角的自然又是周恩来。

这一轮国共谈判，可以追溯到 1945 年 6、7 月间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对延安的访问，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与他们会谈中，一致同意“停止国民大会”、“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还提出具体的建议：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统一与扩大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战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出在召开前确定下列各点：

一、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三方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方代表数），并经他方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

二、政治会议之性质：1.公开的：2.平等的；3.自由的；4.一致的；5.有决定权的。

三、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1.关于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2.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的举国一致的政府）；3.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4.关于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

四、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

五、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其具体内容。

这是中共对解决战后国内问题的见解，也是这一轮国共谈判的基本立场和主要内容的建议。参政员们不是国民党的当权派，但是他们对政局有一定的影响。

重庆谈判则是同国民党当权派的直接谈判，其重要性是中共领导人与参政员们的会谈不可同日而语。中共对这次会谈是十分认真的。但蒋介石国民党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到重庆来，更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因此没有准备任何的方案。

9 月 2 日，双方进行了一次交换意见性质的会谈，中共方面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国民党方面由王世杰等人参加。

在谈到自由的问题时，毛泽东同意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抗战结束后，关于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事给人民予一般民主国家在平时享有的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关于政党问题，毛泽东表示应给予各政党以合法地位，不反对制定政治结社法，但结社不应受到限制。

在谈到释放政治犯的问题时，毛泽东提出应该写在共同声明之中。王世杰说，此事政府准备主动办理，恐怕不能列入共同声明之中。至于何人应当释放，可以向政府提出具体的名单。

谈到解放区问题，国民党对“解放区”这个名词非常忌讳，称为“收复区”。王世杰说，政府至多只能作这样的承诺：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人员，

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情使他们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歧视。毛泽东问：解放区内民选的地方政府将如何处置？王世杰没有直接回答问题，笼统地说，制度应当一致。

改编军队，这又是一个棘手问题。毛泽东提出中共军队应改编力 48 个师。王世杰无权也不愿谈这个问题，只是说，请注意两点：以前谈到中共军队编为 12 个师，是中央尚未裁军时所定的数目，最近几个月中央已裁去 80 多个师。

最后谈到受降问题，毛泽东表示，南京总受降是盟国的规定，如不能加派中共人员，分区受降必须指定若干中共将领在区域内执行。

国民党代表对这个问题不置可否。

这一天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9 月 3 日下午，具体问题的谈判正式开始，地点在重庆中山四路德安里 101 号，中共方面由周恩来、王若飞参加，国民党代表是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因为国民党方面没有提出具体方案，为了便于会议的进行，周恩来只好拿出我方准备的两党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请转交给蒋介石。主要内容如下：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民国十三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八、结束党治过程，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

（一）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以各党派代表及若干无党派人士组织之，由国民政府召集讨论事项如下：

1.和平建国大计。

2.民主实施纲领。

3.各党派参加政府问题。

4.重选国民大会。

5.复员善后问题。

（二）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其程序应由下而上。

（三）解放区解决办法：

1.陕甘宁边区、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

2.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

3.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

4.参加东北行政组织。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

（一）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中共部队改编为 16 个军 48 个师。

（二）重划军区，实施征补制度，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苏北、皖北）

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即中共现驻地区）。

（三）保障整编后各级官佐。

（四）参加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各部队工作。

（五）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

（六）安置编余官佐。

（七）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作自卫队。

（八）实行公平合理之补给制度。

（九）确定政治教育计划。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

（一）释放政治犯。

（二）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

（三）取消特务机关（中统、军统）。

这个方案，国民党代表立即转给了蒋介石。第二天，蒋介石召集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对两党谈判要点作了指示。一开始，蒋介石态度强硬地说什么“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第二条具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者即不应提出。我方可根据日前余与毛泽东谈话之要点，作成方案，对中共提出。”

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谈话要点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强调他的“军令政令之统一”，没有把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对于军队问题与解放区问题，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只准中共军队编力 12 个师；解决解放区问题的办法，他认为“绝对行不通”，只能由他的“中央”经过考核，延引中共人士参加省、县的工作。关于政治问题，蒋介石提出抗战结束后，准备改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将来召开国民大会后，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政府。以前选出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中共方面如果要增加代表，可以酌量增加名额。

双方的方案距离太大了。

当天晚上 9 时，双方就实质问题进行谈判。会议一开始，周恩来提出：上次双方提出前四天任意交换意见，以奠定谈话的基础，现在四天过去了，昨天有雪艇先生（王世杰）与毛先生的谈话，我们也提出十一项具体建议，可否以此为根据进行商讨？

张群提出，要使商谈成功，有一个先决问题，即必须有互谅互信的精神作为谈话的基础，随后他认为中共“所提条件，距离尚远”。他主张“如同作战，首先攻坚，困难问题先聚精会神来商讨，集中力量来解决”。邵力子认为中共方案中九、十两项，“实在令政府为难”。

既然国民党代表谈到谈判的精神和问题的症结所在，周恩来即接着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解决具体问题遭到困难，自在我们意料之中，毛先生这次来重庆，完全是一种友好的活动，自然希望能解决问题，国共第二期谈判，政治、军事问题都没有解决。现在抗战结束，国家需要和平建设，国共第三阶段的谈判极为重要，我们在延安即考虑到这次谈判要尽可能的让步，如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所以方案中没有提出，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方式，国民党认为有推翻政府的顾虑，我们根本未提党派会议；第三，国民大会的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但雪艇先生与毛先生谈话时认为不可能，中共虽不放弃主张，但也不反对参加，现在也不在北方另行召开会议。凡此让步，都是这次谈话的政治基础，足以

保证这次谈判成功。

邵力子承认中共“已有若干让步”，但又为国民党辩护，说“中央之让步亦已达到最大之限度”，照此方案提出的解放区处理办法，“将形成南北朝”。张群也说：方案中“九、十两条，实为问题症结所在”。他强调军队数目和驻地问题，只能按照蒋主席的意见办。解放区问题必须“政令统一”，如“解放区为国家内部另一种政权”，“与国家政令统一背道而驰”，将“导致国家于分崩离析之局”。

周恩来坦率地指出，我们提出解放区解决办法的四点，有两个原因，一，我党对国民大会的选举现已让步；二、国民大会以后无论在政府在议会，我党都处于少数党地位，这样我党的政治地位有什么保障？所以我们主张在一省一市我党占多数的，其主席与直辖市长由我党推荐，占少数的由我党推荐副主席副市长。这是为让步合作设想，使两党不致对立。我们提议政府承认我党现有地区的政治地位，所推荐的行政主管人员，仍由国民政府任命，各省行政，仅为我党推荐人员办理，并非由我党一党垄断。总之，我党此项建议的办法，其目的在促成国民大会的召开，并促成会后全国政治安定，两党均可安心。我们决非在中央体制与法令、规章之外，另外成立一种相反的法制与法令系统。

张治中说，我们必须朝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决不可再蹈军阀时代的覆辙。中共是否必须争地盘争军队，才能保证其地位？我以为不然，中共如能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则其在国家的地位与国民中的声誉，必更高于今日。兄等应承认这一事实，国家为酬劳将领，决不能学古代的裂土封侯。我以为兄等的文武人员应安置的，可向中央陈报，何人可任行政工作，何人可任军长师长，何人可以受勋，编一名册送来，中央必尽量采纳。

周恩来反驳说，兄等以封建军阀割据比拟中共，我不能承认。我们两党之拥有武器，且有 18 年的斗争历史，这是革命事实发展的结果。今日我们商谈，即在设法避免武装斗争，而以民主和平的方式为政治上的竞争。又向国民党代表诘问：我们认定打是内外情势所不容许，只能以政治解决。本此宗旨，我们党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不知中央准备的具体方案如何？

因为国民党没有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他们的代表无言以对。

这次谈判直到午夜 12 时才结束，因为双方“相距甚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从 5 日起，谈判中断了三天。

从 9 月 8 日到 12 日，谈判进行了四次。

在 8 日的会谈中，周恩来驳斥国民党报纸诬蔑中共“割据”。他指出，本来我方提案主张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如能通过，即可结束党治，实行普选，而一切军队之整编，省区问题之处置，皆可由联合政府办理，不必再如今日就个别问题来商谈，只因此提案未获得政府同意，所以这次毛泽东同志来渝，即不再提联合政府，而改提目前的十一项建议。这一建议的精神，在于承认国民政府的法统和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参加政府。我方已作了很大的让步。其他军队问题和省区问题，我们也都提出切实的方案，而兄等认为不能考虑，究竟政府有什么想法，我方极愿知道。

国民党代表则以为中共要其整编的军队太多，划分省区与国家统一的原则不符，没有提出具体的意见。其实，中共方案中已提出承认国民政府的法统与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怎能说是与国家统一的原则不符呢？

周恩来觉得国民党方面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不能不再次说明：依据我方的建议，我党的军队已裁去一半，地区亦退出一半，政府既提不出方案，又不同意我方的方案，总不能要求我方一概让步，一概退出。

这天的谈判没有任何结果。谈判快结束时，张群将一份国民党拟定的《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交给周恩来、王若飞。这个“答复案”虽然也承认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中共参加受降工作，在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原则上赞成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但对解放区问题，只是重弹老调，只准中共提出在抗战中卓著勋劳且在政治上有能力之同志，经中央考核，酌予留任：中共军队只能编为 12 个师。同时还提出，中央军队经过解放区时，中共军队不应阻其通过。

这个“答复案”虽然也有某些积极因素，但对症结所在的军队整编和解放区问题并没改变原意，周恩来看过后答称，我方当加以研究，已获得双方同意的，即可认为问题已解决；未获一致的，再继续商谈。

军队与解放区问题已形成僵持局面，10 日下午继续谈判时，周恩来提出先讨论政治会议问题。

周恩来成竹在胸，评述了政治会议的性质和任务。他说，所谓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政治会议所协商的事项有五点：一、和平建国大计；二、施政纲领；三、各党派参加政府问题；四、国民大会问题；五、复员善后问题。会议由四方面人员组成：一、中国国民党；二、中国共产党；三、其他党派（包括青年党、民主同盟等）；四、无党派人士。四方面各选 9 人，另请蒋主席参加，共 37 人。

张群为青年党争地位。他说，青年党是第三个较大的政党，如果加入所谓“第三方面”，恐怕他们不愿意。周恩来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协商。

张治中提出：这个会议可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不同意称为党派会议。双方没有异议。

邵力子说，无党派人士遴选颇不容易。周恩来回答：曾赴延安的六位参政员中的傅斯年、王云五、胡政之都可以，国民参政会中代表产业界、文化界的无党派人士亦可遴选。

接着张群提出，会议中意见不能一致时如何办法？周恩来回答：我们可以尽量事先协商一致，即令会上有一二人持异议，亦不难说服。既然是协商，自应有几个大的原则以资约束。

这一天的会议，许多解决办法是周恩来提出的，显示了他解决复杂问题的才能，双方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逐渐接近。

周恩来提出，国民大会事关重大，为慎重计，应当延期。国民党方面虽然主张尽快召开，但对周恩来的意见并不反对。显然，谈判取得了进展。

11 日的会谈，由于要讨论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国民党中央的叶楚伧和内政部长张厉生也参加。叶楚伧强调战前选出代表 956 人，除去死亡和犯刑事案件的 57 人外，这些代表都是合法的。按区域与职业尚未选出及由国民政府遴选未定的代表共为 480 名。国民党代表指出，其中 240 名力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只能在另外的 240 名中给未选出的地区、职业代表和中共等其他党派。

王若飞对这个说明很不满意，指出过去所选的代表，是国民党一党执行时期所产生的，不足以代表各方面，而且代表任期只有六年，至今任期已满，自不能再代表国民。叶楚伧辩解说，实际上他们没有履行职务，不能认为任期届满。周恩来提出，应增选总数的三分之一代表。张厉生没有直接回答这

个问题，只是说，国民大会的任务不过是制定宪法，至于根据宪法产生政府，是第二次国民大会的任务。周恩来接着诘问：如果确定这次国民大会为制宪会议，就只能制宪而不能行宪了。张厉生讲不出多少道理，只是坚持国民党的主张。

会谈快结束了，周恩来抓住时机向张厉生将了一军：今天趁内政部张部长在此，可否谈谈取消特务机关的问题？张厉生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十分尴尬。

12 日继续谈判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代表坚持他们的主张，毫不松口。周恩来表示，为了“谅解政府的困难”，重选代表一事，我方可以让步。

谈到政治会议问题。周恩来说，他和毛泽东商量，认为国共双方人数不妨减少，以便延揽较多的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张群同意这个意见。接着谈共同纲领问题。周恩来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提出的“我们的共同要求”，即是我党所希望通过的共同施政纲领，希望政府方面也提出方案，共同协商，以便交付政治会议讨论。国民党方面对这个问题没有表态。谈到参加政府的问题。邵力子提出两种方式：一、参加国防最高委员会；二、参加行政院。周恩来补充，还可以参加军事委员会。张群说，现在将改国防最高委员会力政治会议，自较参加行政院为妥当。讨论这些问题，没有引起激烈的争论。

9 月 12 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午餐，就军队整编问题进行交谈，蒋介石老调重弹，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此后谈判着重谈解放区和军队两个“症结所在”的问题。

对于解放区问题，周恩来再次申述，现在由我党控制的有 19 个解放区，已实行减租减息和民选政府，我们建议实行普选，自省县以迄区乡的行政官吏，均可在中央与各党派监督之下，实行民选，以选举的结果提请中央任命。这种由下而上的选举最为公开而彻底，也不许一党包办。但我们顾及中央政令的一致，在全国其他地区未实行普选之前，不愿单独实行普选，所以这次提出切合实际的提案，主张某些地区己由中共负责的，由中共推荐主席，其他党派仍可参加地方政府，彼此合作。总之，关于解放区问题，我党在尽量让步。王若飞补充说，解决解放区问题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普选，请中央承认人民所选举的政府，否则只能采取我们现在提出的办法。

张群诘问：请问兄等所谓 19 个解放区，以什么为界限？共有多少个县？有多少个县长已经民选？周恩来回答：我们所提五个省中，除山西外，河北、山东等省几乎全部是解放区，山西除阎百川先生所管者外，也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县份是解放区。山东 119 个县，何思源能治理的只有三数个县，我们有 80 多个县，都有民选县长。张群说，山东已有中央任命的省政府，中共所占各县，自亦有政府任命的县长。王若飞很风趣地回答，中央虽委有县长，但都未进入县境，就像过去东四省主席远离省境，驻在重庆一样。国民党代表再说不出道理，仍以”有悖政令之统一”，使问题得不到解决。

军队问题的谈判相当激烈。在 15 日的谈判中，周恩来指出，现在国民党有 263 个师，而中共只要求 48 个师，尚不及六分之一。我方现有军队 120 万，一旦裁减为 12 个师，实在不可能。必须分期实施，将随国军之缩编而缩编。国民党代表仍坚持只能编 12 个师。为了打破这个僵局，中共再作让步，在 19 日的谈判中，周恩来对国民党代表说，昨天我和毛泽东同志讨论的结果，有两件事情可以奉告：第一，我方拟在比例上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

原有 263 个师，我方应编为 43 个师，以后中央的军队缩编，中共也依此比例缩编。比如中央缩编为 60 个师，中共则为 10 个师；第二，关于军队驻地与解放区，岳军先生（张群）提出两个问题一并讨论，我们赞同，我方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八个地区的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的军队撤退，将 43 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以及山西之大部和绥远之小部与陕甘宁边区。解放区亦随军队之驻地而合一，即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与陕甘宁边区主席由中共推荐，天津、北平、青岛三特别市副市长亦由中共推荐。但对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中共军队尚未撤退之前，其专员、县长均由中共委任。张群仍说所提方案甚难考虑，但又说他“无何意见”，等请示蒋主席决定。张治中则认为，军队整编不是数目大小的问题，而是根本观点不同的问题，中共的观点是有军队、有地盘，控制军政机关才有保证；政府则认为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于中央，否则民主乃分裂之民主，统一乃分裂之统一，中共军队悉数撤退到黄河以北，“岂非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王若飞听了气愤地说，汉奸部队已获得中央的委任，而中共抗日部队反而得不到中央的承认，应当知道，即使没有得到中央承认，中共军队也能得到生存与发展。

会议不欢而散。

21 日，就军队问题继续谈判。张治中在发言中承认共产党的新方案有所让步，他说，为了顾及中共的困难，可以增加数个补充师，至多不超过 16 个师。其次，关于军事指挥机构，只能由中共按照军事指挥系统给予适当的指挥名义指挥军队。至于军队的驻地，不能笼统说“黄河以北地区”或“陇海路以北地区”。华北四省主席由中共推荐也不能赞同，这是“割据地盘”。王若飞发火了：那末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周恩来虽然态度和缓，但语气也强硬，他指责国民党的观念是自大的。不以平等对待中共，因此国民党及其政府都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自西安事变以来一贯如此。我们今日既讲民主团结，彼此都应站在平等的地位，如果说，“我的是我的，你的也应给我”，这是什么民主？昨天毛泽东同志与陈立夫先生谈话，陈即要我们放弃外国的观念，放弃一党的武力政权，共图新中国建设。实际上是完全抹煞我党的地位。我党的一切都应交给国民党，殊不知我党所有军队、政权并非不愿交出，倘依照去年我党的提案，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成立联合统帅部，则我党军队与政权皆可交出来。但现在政府仍在国民党一党统治时期，我们怎能将军队和政权交与一党的政府呢？

谈判又陷入僵局。

三个星期的谈判，中共一再让步，表现出谋求和平的诚意和愿望。国民党则是软硬兼施，企图迫使中共就范。中共代表感到无法再谈下去，为了使外界了解情况，周恩来向各党派如民盟、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以及文化、新闻、产业界人士解释中共的主张，说明谈判陷入僵局的原因。许多人对中共表示同情。

在这期间，民盟、青年党以及一些社会团体、知名人士、海外华侨、国际友人纷纷发表声明，希望国共两党谈判成功，国家和平统一。举国人民都翘首盼望谈判能取得协议，避免爆发内战。国际上英、美、苏都表示不愿看到中国内战发生，蒋介石有所顾忌，担心和谈破裂无法交代，不得不稍为改变顽固态度。谈判中断三天后，他们着急了，主动找中共代表要求重开谈判。

25 日，张群在国民参政会宴请周恩来、王若飞以及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等，表示军队问题基本已有结论，现在商量政治问题和解放区问题。

27 日，双方继续会谈。

首先张治中提出中共军队要缩编至规定数目，尚须经过相当的程序和步骤，此中技术问题是否可由军令、军政两部及中共代表另组小组会议，共同商讨。周恩来表示这个意见很好。后来中共方面派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代表，与国民党方面的军政部次长林蔚、军令部次长刘斐，组成三人小组，解决军队整编的有关问题。

张群问中共代表对解放区的解决办法有什么新的意见？周恩来复述中共三次让步的情况后说，只能暂时维持现状，即各省政府能治理的地方，由各省治理；省政府不能治理的，由解放区治理。这个办法如不能同意，只好交政治会议解决了，张群对中共的几种方案不能实行作了辩解，认为维持现状不是真心解决问题，但他又说，在宪法颁布以前，也只能暂时维持现状了。

谈判的气氛显然有所变化了。

9 月 28 日，10 月 2 日和 5 日，又开了三次会，主要谈政治会议与解放区问题。

关于政治会议，双方的意见比较接近。同意在实施宪政以前，设政治会议，由国民党召集，各党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参加。代表人数也确定为 36 人。

继续谈判解放区问题时，张治中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以行政专区为单位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数县联成一片的，由中共推荐行政督察专员。周恩来说，苏北、皖北可以用这个办法，冀、鲁、热、察四省，大部甚至整个省区都在我们治理之下，自不能相提并论。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周恩来提出，将一个多月来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其中总的方针、军事问题、政治会议问题等，双方同意或彼此意见接近的，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慰人民的渴望。在 10 月 5 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将他整理的谈话记录交给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一一传阅。张治中表示，这个文件大体正确，请邵先生将政府方面的意见修改后，即可作为发表公报的根据。周恩来告诉国民党代表，毛泽东同志来重庆已经一个多月了，准备在下周返延安。张群立即表示要将这个情况向蒋主席报告。

## 《双十协定》终于签字

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谈判桌上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坚决斗争，我党又作了心要的让步，加之我军在上党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大量军队已进入东北，民主党派和广大群众都迫切希望国共谈判有个结果。这样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双方代表商定个纪要发表，把双方已取得协议的问题肯定下来，把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公布。10 月 8 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举行会谈，商定即将签署的会谈纪要，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定名为《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纪要》经过蒋介石和毛泽东同意，定于 10 月 10 日在张治中公馆桂园由双方代表签字，12 日公布。因为毛泽东已离开延安四十天了，决定在签字后于 10 月 11 日回延安。蒋介石也因新疆伊犁事件（即伊犁地区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反对国民党的压迫，要求民族平等权利的斗争），急需派张治中去处理。

张治中在和平谈判中，当然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但他始终是希望国共合作共同建国的。他对毛泽东、周恩来都很敬重，为表示对毛泽东的欢迎和欢送的情意，于 10 月 8 日晚在军委会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国民党参政员、党政军要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各方人士五百多人参加，盛况空前。

张治中先致词，他高兴地向大家报告，这次双方商谈的大原则大前提完全一致。如在民主、和平的基础上建国，在蒋主席领导下实行三民主义，这是毛先生提出来的。大家都认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是今天中国所必须遵从的大原则。在抗战结束后，我们要向和平建国的途程迈进。他也指出，还有些问题双方还有距离，还要继续商谈。他还很自豪地宣布：毛先生来重庆是他和赫尔利大使去迎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去延安。

毛泽东也讲了话。他感谢蒋先生的邀请和招待，感谢张先生及夫人举行这样盛大的宴会。他高度估价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人民获得了光荣的胜利，我们中国尤其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他说，“我们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的问题，具有异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商谈的结果，“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还有些问题亦将继续商量解决，而且我们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他又说：“困难是存在的，我们大家不怕困难，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大原则下，在蒋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我们互谅互信，共同一致，克服困难，一定可以建设新中国。”毛泽东光明磊落的讲话，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宴会充满着和平、团结的气氛。

宴会后，举行文艺晚会，观看名演员的精采表演。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等正为演员热烈鼓掌时，一件震惊重庆的突然事件发生了：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廖仲恺的女婿）从曾家岩乘坐小汽车送柳亚子回沙坪坝，归来途中，被国民党的兵用枪击毙了！司机已把李少石送到市民医院。当周恩来在会场上听到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来人报告后，内心很震惊，但他很沉着冷静，没有惊动毛泽东和张治中，不动声色地一个人离开会场到休息室，立即找到宪兵司令张镇和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周恩来用严厉的口气问

张镇，“刚才听到报告，我的外事秘书李少石，从沙坪坝坐汽车回曾家岩的路上，被你们的兵用枪击毙了，你知道不知道？是否有计划的暗杀？”张镇听了也大吃一惊，立即回答：“我不知道此事。”周恩来又说：“那请你立即负责查明真相。”随即要张镇和钱之光一同于 8 时 50 分赶到医院看望李少石。李因弹中肺部，流血过多，已经去世。周恩来流下眼泪悲愤地说：“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到凶杀……”因晚会快要结束，周恩来又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立即对张镇说：“晚会结束后，请你负责保护毛主席的安全，他坐在你的车上，你亲自送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张镇立即答应照办。散会后，周恩来先把毛泽东送上张镇的车后，他才把李少石被杀的事告诉张治中，张治中也答应要调查。周恩来回到红岩，简要地向毛泽东报告后，又立即同王若飞、钱之光等研究调查李少石被杀的事，并通知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同志，此事正调查中，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但仍照常工作，不要惊慌。当晚 12 时，张镇派宪兵司令部官员查验受伤汽车和李少石尸体。我背上照相机同钱之光一起到曾家岩陪他们，先对汽车检验照相后，又到市民医院检验尸体并照了相。

李少石遇难之事，发生在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又恰恰在红岩村附近的公路上，司机将李少石送到医院后又不知去向（司机是在重庆参加工作的）。这不能不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有意破坏国共谈判的阴谋。甚至有谣传，特务本来是要暗杀周恩来，因李少石的眉毛粗黑像周恩来，把李认作周恩来错杀的……但周恩来沉着应付，一面当面交代钱之光和陈龙、龙飞虎等加强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以防万一；一面催促国民党当局迅速破案，又亲自找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有关同志详细询问司机同他们接触的情况，并派人到出事地点向在场群众调查。

经过反复查证，到 10 日案情已经清楚。事情的经过是：8 日下午，国民党左派柳亚子到曾家岩周公馆来了解国共谈判情况，周恩来已经外出，由李少石接谈。约 5 时，柳亚子要回到沙坪坝寓所，李少石出于对柳老的尊重，叫了办事处的小汽车陪着柳老回沙坪坝。车子回来经过红岩村附近时，有一批新兵正在路边休息，因车行过速，不慎碰伤了一个新兵，他们叫停车，但司机没有听到仍向前开。新兵排一个班长就举起步枪向汽车射击，子弹穿过汽车工具箱从李少石的后背穿入肺部。司机听到枪声又发现李少石受伤，立即加速把李送到市民医院，说明是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请医院抢救。司机熊维屏怕责任重大不敢直接向办事处领导报告，开车到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报告了此事，并带了两个同志到医院看了李少石。接着又将车子开回曾家岩车棚，自己跑到民生路，将汽车钥匙交给营业部，要他们赶紧向办事处报告，就称病逃跑了。营业部同志一面打电话报告办事处，一面到军委会礼堂向周恩来报告。

李少石被杀的消息传开后，震动了重庆山城。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抗议，要求追查凶手和阴谋策划人。蒋介石得到报告后也很紧张，下令戴笠彻查。重庆卫戍总司令王赞绪、警察局长唐毅也派出专人调查，派法医验尸。

进步人士闻讯后都表示愤慨。9 日上午，宋庆龄、邵力子、郭沫若、茅盾、刘清扬、张西曼等人士，都到市民医院向李少石遗体致哀。遗体停医院太平间，当晚入殓。10 日上午，灵柩两旁摆有中国共产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送的花圈。宋庆龄亲往吊

唁并送鲜花，对李少石夫人廖梦醒、女儿李湄表示慰问，参加吊唁的还有许多知名人士。下午 1 时，灵柩和花圈装上卡车，周恩来、钱之光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的部分工作人员乘车送到小龙坎墓地安葬。周恩来回到城里，又亲自到医院看望受伤的士兵，表示慰问，深深感动了伤病员和医务人员。

毛泽东离渝前题了“ 李少石是个好党员 ”几个字送给廖梦醒作纪念，给了刚失去亲人的廖梦醒和李湄以极大安慰。这张极为珍贵的题字，几十年来一直挂在廖梦醒住宅的墙壁上。

为在社会上澄清事实真相，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于 11 日发表钱之光处长的谈话，说明，“ 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偶然事件 ”，并“ 感谢宪警治安机关医院法院的努力及各方人士的关心 ”。谈话详细说明了事实的经过。并表示愿意负责受伤士兵的医疗费用，如果因重伤去世，愿负责殓葬与抚恤。

李少石事件自始至终都是周恩来亲自处理的。在那种斗争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沉着坚定又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风格，给我们同志以深刻的教育，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使国民党的军警人员也受到感动。我们曾在重庆工作过的同志，几十年后都不能忘怀。在西花厅工作时期，周恩来曾几次当面对罗青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和我说：“ 张镇当时是宪兵司令，但是很快查清了李少石事件的真相；亲自护送毛主席回红岩，做了两件好事，一定不能忘记。 ”对于个别同志写回忆录时，仍说李少石是特务暗杀的，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邓大姐对这样不实事求是的说法也很有意见，曾要我告诉这样写回忆录的同志，一定要改正。

尽管发生了李少石事件，但国共双方商谈和准备签订协议的工作，仍旧照计划进行。

10 月 9 日，毛泽东至山洞林园出席蒋介石、宋美龄举行的午宴，周恩来、王若飞及宋子文、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应邀作陪。最后毛泽东和蒋介石单独会谈。蒋介石仍要中共改变方针、政策，把军队和解放区交出来。毛泽东说，不能同意。

10 月 10 日是国庆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举行庆祝国庆招待外宾的鸡尾酒会。下午 4 时半，蒋介石到桂园张治中公馆访毛泽东，会谈十多分钟后，一同到国民政府参加酒会。我事前得到消息，即赶到桂园等候，本来想给蒋介石照相的，因看到警卫森严就没敢照，只在传达室偷偷看到毛泽东送蒋介石到门口，他们各自上车赴酒会去。酒会上，毛泽东向蒋介石祝酒，毛泽东说：“ 蒋主席万岁！ ”引起全场中外人士的注目。约至 5 时半，酒会结束，毛泽东回到桂园楼上休息。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离开会场到桂园。六时，在张治中公馆的客厅，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签字。毛泽东从楼上下来会见了双方代表，表示祝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共双方代表共同签字的协定，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和有原则的让步，终于诞生了。因为是在双十节签订的，所以通称《双十协定》。

《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共十二条，规定“ 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在“ 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 ”；“ 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 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关于解放区政权和国民大会问题，纪要规定“ 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双方军队的整编方案未达成协议。

当天晚上，毛泽东偕周恩来同赴林园向蒋介石辞行。11 日早晨继续会谈，蒋介石仍坚持不肯承认解放区政权。毛泽东告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渝继续商谈未了事宜。

11 日上午 9 时 15 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陈诚、张治中，都从林园来到九龙坡机场，前来送行的邵力子、张镇、张澜、陶行知、郭沫若、章伯钧等知名人士以及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部分人员、中外记者等，早已在机场等候。毛泽东在机场回答记者说，“中国的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不过困难都可以克服。”他同陈诚、周恩来、张澜等主要人士握别，随即登上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张治中、王若飞陪同送到延安。9 时 45 分，专机起飞，于当天下午 1 时半安抵延安，受到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干部、学生、群众二万余人的盛大欢迎，欢呼毛主席平安归来。毛主席在机场作了简短的讲话，说明这次谈判已取得初步结果，虽然还有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他在讲话中特别感谢前次接他去重庆，这次又陪他回延安的张治中，并介绍张治中向大家讲话。张治中在热烈的掌声中讲了活。他说：奉蒋主席之命，能够欢送毛先生，实为一生之最大荣幸。他盛赞谈判的成就，强调中国从此即将步入长期的和平团结时期。当晚，张治中受到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的热情招待，并参加了欢迎晚会。12 日早晨，毛泽东、朱德等同张治中共进早餐话别。9 时，张治中、王若飞与朱德、彭德怀等欢送人员握别后，乘原机回到重庆。这是张治中的第二次延安之行。

周恩来和我们在重庆工作的同志，一直关心毛泽东的安全。我从机场回红岩后，就一直要电台保持同延安台的不断联系，以等待毛泽东安全回延安的好消息。周恩来虽然很劳累还不肯休息。下午 1 时半，电台收到延安的急电，我到机要科一起翻译，当看到“毛主席已安全返延”几个字时，就立即下楼向周恩来报告，这时他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安心地睡了。

毛泽东在重庆住了 44 天,每天都通过办事处三楼的秘密电台同延安党中央保持密切联系。他和周恩来、王若飞白天多在城内桂园接见客人（王炳南专住桂园为毛泽东安排会客日程和时间），或拜访友人，晚上回到红岩处理电报，来往电报多是打三 A 或四 A 的急电。周恩来先同毛泽东一起商量处理来电和发电，然后回到自己办公室亲自起草重要情报报中央。一般的是由我将王炳南、吴克坚及其他方面来的电报摘编成电报稿由周恩来批发。我在南方局一直主管机要工作，所以我每天晚上总要奉陪到他把电报处理完，然后拿到机要科去译发。延安的来电，也都是由我当面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看的。机要科和电台全体同志都以高度的政治热情日以继夜地工作，严格遵循周恩来对机要工作要绝对做到“秘密、准确、及时”的要求，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这一光荣的任务。当时的困难是很多的。本来自 1938 年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建立后，就架设了一部 50 瓦的公开电台，经过了重庆卫戍区司令部登记批准的，那时和延安的无线电通讯还较方便。但到了 1943 年，何应钦的军政部以各办事处不准在重庆设电台为由，把我们的电台封闭了，改由军政部的无线电总台同延安总部电台联络，为我们收发电报。我们除一般的电报送军政部电台代收发外，机密的紧急电报只得用秘密小电台与延安通报。送军政部总台发出的电报数量不多，不能反映谈判时来往电报多的情况，我们就乱写许多“无字天书”给他们发。一方面掩护了秘密电台，一方面吸引国民党专门破译我们密码的专家们去啃这些“无字天书”。我们

重要的机密电报，就完全由秘密小台（只有 5 瓦）来收发。因为电台太小，重庆电压又不够（名义 220V，实际不到 150v），电台多，干扰大，报务人员就把电源改成 110v，利用深夜或清晨干扰少的时间，以高度集中的精力和最快的速度收发。加上天气热、蚊子多，所以特别辛苦。但大家愉快地工作，完成了任务。

这里还要补充说一说张治中送毛泽东回延安的缘由。

毛泽东要离开重庆时，周恩来十分关心毛泽东回延安的安全。8 日上午，张治中通知周恩来：蒋主席同意毛先生《纪要》签字后回延安，并用他的专机“美龄号”送。张治中并透露，蒋主席要他在《纪要》签字后，即飞兰州去新疆迪化解决伊犁地区问题。周恩来脑子一转，只派专机，如没有政府的人陪送，安全还没有保障。他灵机一动地对张治中说：“那你能不能先送毛主席回延安，再飞兰州呢？”张治中是心直口快的人，立即答复：“可以，但还要请示蒋主席。”当天上午，张治中就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先送毛泽东回延安，再到兰州去。周恩来听到后，也就放心了，他对张治中表示感谢，也请张转达对蒋主席的谢意。张治中也以此为荣，所以他在 8 日晚宴时，就高兴地向客人宣布，他将陪毛先生回延安。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是用尽了他的聪明才智。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张治中先生对毛泽东、周恩来的真诚友谊。

毛泽东回到延安的当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向政治局报告了在重庆谈判和工作的经过。他说，《双十协定》的意义，“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同志们对毛泽东在重庆四十多天的艰苦工作和取得的成就，都表示满意。

17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由于他在重庆时过度疲劳，中央政治局决定让他疗养一个时期，中央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

## 艰难的谈判在继续

《会谈纪要》签订后，尽管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没有解决，但它使各阶层看到了和平的曙光，除少数顽固分子外，广大人民是欢迎的。

毛泽东回延安，周恩来和王若飞留下来继续谈判没有解决的问题，先后举行了十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直到 10 月 20 日才举行，商谈各方面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人数问题。在周恩来、王若飞的坚持下，最后在 21 日会上确定国民党 8 人，共产党 7 人，民主同盟 6 人，青年党 5 人。无党派人士 9 人，蒋介石为会议主席。

21 日的会议上，棘手的解放区问题又提出来商谈。由于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不让步，使得这个问题的谈判极为艰难。会上王世杰提出解放区问题与军事问题在召开政协会议时国共两党进行会外讨论。周恩来反对这个意见，他说，如果将解放区与整军问题列入会外讨论，将妨碍政协会议的进行，应在会前双方商谈有个眉目，他也好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因为中共方面先后提出四个方案，国民党都不同意。周恩来希望国民党也提出方案，国民党始终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方案。张群谈了所谓“个人意见”，说什么对解放区不致完全不承认事实与功劳，应尽最大努力加以解决。实际上国民党是不会承认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一年后 1946 年 12 月 18 日，周恩来在延安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的报告中，回顾重庆谈判时说，“我们的方针是要争取承认我们己有的民主政权，由此推向其他地方使之民主化”，“我们用各种方法想使他们承认，但他们还是不承认，中心就是他们不愿中国人民得到一个民主的根据地。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革命不可能是平衡前进，中国的革命就是这样的走出来，起起伏伏，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发展。所以对中国人民来说，根据地比什么都重要。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这就是解放区问题不能解决的症结所在。

如果说抗战胜利以后到毛主席在重庆的 44 天中,国民党还要唱点和平高调的话，那末，在《会谈纪要》签字的前夕，国民党的调子低得多了，并且积极地调兵遣将，准备打内战了。10 月 8 日，国民党运输机一架因迷失方向，降落在河南焦作附近，被我方查获蒋介石送给阎锡山的《剿匪手册》两本。国民党加紧向解放区进兵，周恩来不能不把这一事态的严重性予以揭露。他说，阎锡山在山西继续进兵至 300 余里，最近 13 个师几乎全军覆没；傅宜生（作义）进军平地泉；胡宗南部队从陇海路推进石家庄；李延年部进军泰安；李品仙部进驻津浦南段……都有引起冲突的危险。因此我方要求中央军停止前进，恢复交通。国民党代表虽然也承认战后三个月来，一方面双方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局势日趋恶化，但他们又强调进军是为了受降和维持治对这个问题，周恩来、王若飞也是口气强硬，不作让步。当王世杰提出中央军为了受降与复员必须经过中共地区时，中共军队不应加以阻扰和袭击。周恩来严正指出，中央军经过中共军队驻地，难免发生冲突。事实上，现在沦陷区许多县城都在中共军队包围之中，这些地区，中央应划为中共军队的受降区，始称公允。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条途径，一、规定双方停止攻击，各就原地不动；二、规定受降区，各自执行，不得相犯。王若飞指出，美国军队不断在华北登陆，美国空军大量运输中央军队进入解放区。进入解放区的中央

军已达七十余万，而且利用敌伪军队作前锋，进占城市与交通线，这种行动不发生冲突是不可能的。他提出，中共军队包围的敌军地区，由中共军队受降，冲突即可避免。但国民党一直不愿指定中共的受降区。

在 22、23、26 日的会议上，进军问题成了谈判的主题。张群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一、交通必须恢复；二、在铁路线以外，中共得指出其现在占领的区域，暂维现状；三、希望叶参谋长（剑英）早日来渝，出席军事小组会议，商谈中共军队驻地问题。张群还说，我们希望军事以外的其他问题，如政协会议的召开等，也能同时进行。张群是个经验丰富的政客，讲话措词委婉，但内容却是咄咄逼人的。周恩来感到国民党真是欺人太甚，态度强硬地反驳：事态日趋复杂、严重，中央如不立即停止进兵，而必欲占领所有的交通线，势必与交通线上的我军发生冲突，这就是战争。截止现在，我军仍不能受降，一似我方的军队都是非法军队，中央之视我军，连日本军队都不如。日本军队今日在中国境内，尚得保持武器，受命维持交通。而中共军队则须退出交通线，有这种道理吗？我方破坏交通，就是要阻止中央军的进军，这是当然的事。倘若中央军要以武力把我军驱出交通线，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王世杰提出，如果政府保证不占领中共的地区，不攻击中共的军队，可考虑恢复交通吗？王若飞回答，只要中央军不进军即可办到。但国民党要进攻解放区，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

周恩来将蒋介石的三点意见电告延安中共中央，并且提出了四点作为答复。中共中央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在 10 月 30 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将延安的复电转告国民党代表：

一、为坚决避免内战迅速恢复交通起见，中共方面提议：

1.停止进兵、进攻、进占；

2.停止利用敌伪；

3.在八条铁路线（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北段、陇海东段、津浦、胶济、北宁西段）上，双方均不驻兵；

4.政府方面如需向平津青岛运兵须经协商。

二、军事小组只能在上述原则决定之后，方得拟具体办法，否则无权解决此事。

三、如万一问题不能事先商得协议，中共方面不反对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开会时，必须先解决避免内战恢复交通问题。

四、在周恩来回延安前须向政府方面问明关于国民大会的意见。

国民党代表表示对这些意见要进行研究。31 日的谈判中，国民党方面在答复我方四点主张中避开停止进攻一条，并提出“由路局警察维持铁路秩序”，以抵制我方提出的都不驻兵的主张。在 11 月 8 日的谈判中，周恩来回答对方 10 月 31 日的答复：为了停止内战，国民党军应该全面停止向解放区进攻，从侵占区全部撤退，从八条铁路线撤退；取消各地“剿匪”命令；保证再不进攻各解放区，针对美国军队先后在塘沽、秦皇岛、青岛等地登陆，并帮助国民党运兵向解放区进攻的情况，周恩来指出：接受日军投降工作不若想象之困难，不需要美军在点上与线上驻兵。国民党代表辩解说，是为了帮助接收东北主权。周恩来又指出，美军司令魏德迈所说美国准备给中国 50 个师装备和在华剩余军火物资的计划，就是要以武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国民党代表辩解说，是为了接收东北主权。

11 月 17 日，是最后一次谈判。这时，东北问题已日益暴露，国民党军

队在美军的支援下，已于 16 日攻占被八路军接收的山海关，并继续向锦州挺进。周恩来提出此事，张群反而问周恩来，中共是否要向东北发展？周恩来坦诚地说，东北过去未经过国民党的党治，我们不反对政府接收沦陷区，但希望东北成为民主、平等的实验区，和平的模范区。周恩来要求停止在北宁线上运兵。

在一个多月的谈判中，周恩来曾要求就避免内战、解放区政权、受降、国民大会等问题继续商谈，由于国民党代表的阻挠，这些问题都没有深入讨论。重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

事实充分证明，正如党中央 11 月 8 日致周恩来、王若飞电报所说的："目前的谈判，彼方全为缓兵之什"，"彼方一切布置，均为消灭我党"。在这种情况下，谈判设法继续下去，只有各打各的了。

在谈判的过程中，我军坚决执行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平绥线、平汉线、津浦线都坚决打击了进犯的顽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谈判斗争。

早在 9 月间，蒋介石下令傅作义，率其主力 4.7 万多人，沿平绥铁路东进，占我集宁、尚义等地，并向张家口地区挺进。中央军委命令聂荣臻、贺龙统一指挥晋察冀和晋绥我军主力 5.3 万余人，从 10 月 17 日起发动平绥战役，至 12 月 4 日结束战斗，共歼敌 1.2 万多人，粉碎了傅作义集团进攻张家口，夺取察哈尔、绥远两省的企图。

10 月中旬，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高树勋、马法五统率三个军及民军 4.5 万人，自河南新乡出发，沿平汉线北进，企图进抵石家庄配合胡宗南继续北犯，抢占北平、天津，牵制我向东北、冀热辽地区前进的兵力。中央军委命令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还击。我军集中主力 6 万多人，在 10 万民兵配合下，在河北邯郸地区对进犯敌军展开大规模的歼灭战。经过十天的血战，至 11 月 2 日结束战斗，毙伤敌军万余人，俘虏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官马法五以下 2 万亲人。高树勋率部万余人战场起义。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指挥下，在邹县、滕县一带发动了津浦战役，从 10 月中到 11 月底，歼敌 1 万多人，活捉第一军军长王怀安，控制了津浦铁路百多公里，破坏了国民党经津浦线运兵计划。

在谈判期间，重庆各界纷纷发出呼吁，或举行集会，反对内战，要求成立联合政府。他们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呼声，使得蒋介石坐卧不安。

蒋管区群众反内战争民主群众运动的高涨，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已深入民心，成为制止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一股强大力量。

在紧张的谈判中，周恩来多次向民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报谈判情况，抓住机会同各方面的人士接触，开展统战工作。10 月 12 日，他出席东北民主政治协会的学习会，对高崇民、阎宝航等人说，希望大家争取尽快地回到东北去，或到东北解放区，或仍在东北蒋管区，继续从事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统一的民主运动，后来该会派了于毅夫等 20 人（有部分党员）回东北。高崇民也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离开重庆。东北解放后，他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于毅夫等也参加了省的领导工作。

10 月 19 日，这一天周恩来格外忙碌，他参加了两个会，一个是西南实业协会的星五聚餐会，他作了《当前经济大势》的讲演，阐明了中共对工业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意见：一、政治环境问题。他说，一国的经济建设，不能

离开政治而独立，政治环境不良，足以影响经济建设，所以我们要求第一是和平，第二是民主。二、资本问题。应有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合作资本，今后必然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同时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三、发展问题。为发展工业，首先要进行农村改革，工业建设应该按照地区情况分别规定。四、税收问题。关于关税，我们采取各种货物不同的税卒，以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至于年地税，工业税在原则上应该课得比较轻一些。五、劳资问题。厂方劳方一定要在互让原则下来求得劳资的合作。按此努力，在二三十年后，可以使中国成为富强、独立、民主的中国。这次讲演使实业界人士了解中共的经济政策，消除了工商界人士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

另一个会是重庆文化界人士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大会。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全国如何进入和平建设，这是全国全世界人士所关心的。这次政府与中共的会谈，决非两党的事情，这是关系全国人民的事，自然也为文化界所关心。”他引鲁迅的话“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来勉励文化界人士。

经中央批准，周恩来于 11 月 25 日飞返延安。王若飞仍留重庆。12 月 1 日，昆明各大学举行反对内战集会，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镇压，打死学生、教员四人。中共云南工委立即领导学生和各阶层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昆明到重庆、成都一直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和各阶层群众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暴行，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高潮。12 月 9 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周年和声援昆明学生反内战大会上讲演说：我们正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昆明青年学生表示强烈抗议。

# 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 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

回到延安，周恩来向中共中央详细报告了《双十协定》签字后继续谈判了七个星期的情况。12 月 5 日，他写了一份《关于国共谈判》的书面报告。他指出：反内战求和平的方针深得人心，今后我们应当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实行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确定《双十协定》为我方提案的基本内容，来进行“边谈边打”的谈判。在内战尚未停止的条件下，军事三人小组自无协商的可能与必要。在目前，应以政治协商会议为我方进行政治攻势的主要讲坛，辅以国共的幕后商谈。他充分估计到这次会议和继续谈判的困难，没有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他说：“不要希望这次商谈有什么大结果，要准备在‘政协’中以政治攻势和国民党撕杀一场，也可能在撕杀中得到一些结果。为在‘政协’中采取政治攻势，其提案应着重于民主问题，国共商谈亦当以此为标准。”

周恩来还建议恢复中共南方中央局（或名重庆中央局），以董必武为书记，王若飞为副书记，刘少文、徐冰、华岗、钱瑛、钱之光、潘梓年、熊瑾玎为委员，章汉夫、王世英、童小鹏、王炳南、许涤新、张友渔、夏衍为候补委员，领导国统区的工作。另外，提出了中共代表团的人选，他们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王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代表团负责谈判和出席政协会议。

12 月 9 日，中共中央电告在重庆的董必武、王若飞：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应在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并通知我党政协代表周恩来等七人名单。要向国民党交涉代表团办公和住宿的地址，并安排就绪，以便代表团到时即可开始工作。董、王接电后，即将我党政协代表名单通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并要求在重庆市区拨给中共代表团办公和住宿用房。三天后，国民党就将重庆中山三路 263 号中国银行盖的一连四幢三层的小楼房交给我们使用。由钱之光带干部去接管。这几幢小楼房间并不多，总共约 30 来间，作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使用，还是可以的。地势比较高，只一个大门出入，便于做警卫和保密工作、交通也方便。但在大马路边上，噪音很大，因为马路不平，坡度又大，破旧的公共汽车一到这里就要加大马力才能上坡，更是吵得说话都听不清。但是，比起红岩办事处来，还是方便多了。

12 月 15 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当前形势，他说：国民党准备在月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有利于它的条件的停战，成立请客式的联合政府，保持旧国大。中共代表团的任务是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准备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我们出去将向国民党提出：全面停止内战；制定共同纲领；召开国民大会，提出宪法草案原则，充实以新民主主义内容；实现双十公告；在政协开幕前释放叶挺、廖承志；解决东北问题。会议确定了去重庆谈判的这个纲领和方针，通过了出席政协会议的七人代表的名单和周恩来关于正式成立南方局（目前称作重庆局）的提议。

12 月 16 日，周恩来车中共代表团成员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已在重庆），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工作人员李澄之（山东大学校长）、何思敬（延安大学法学系主任）、王世英（十八集团军总部

副参谋长）、沈其震（解放区救济委员会常委）、李金德（机要科长）、萧贤法（电台台长）等共 40 来人，分乘三架美军 C47 运输机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政协会议秘书长雷震和董必武、王若飞、钱之光等同志以及许多记者都到机场欢迎。叶剑英在机场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如何停止军事冲突，是急待解决的问题；中共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抱着和平的希望，希望双方先停战；军事三人小组的成立及开会商讨军队整编的事，要看政治洽谈情况来定。

代表团一行乘车爬过歌乐山走了几十公里到达驻地时，天已经黑了。大家进到自己的房子里（都是宿舍兼办公室）稍事休息、洗面后，即吃晚饭。我拟了一个代表团已平安到达重庆的电报给党中央，送周恩来批发后即由秘密小电台发到延安。周恩来刚吃饭，就交代我通知代表团成员、齐燕铭和南方局、八办、《新华日报》的主要负责同志钱遂、刘少文、徐冰、王炳南、钱之光、潘梓年、章汉夫等饭后到代表团会议室开会。他还交代我多准备几根蜡烛，开会时关上电灯只点蜡烛。当时时间紧急，来不及细问，我就匆忙去下通知，布置会议室和准备会议用的文具等。会议室不过 20 平方米大，除了摆一张办公桌供主持人和记录（都是我担任）用外，再放上十几张木椅子就摆满了。

约一个多小时后，我先到会议室把电灯关了，点上几支蜡烛，大家都觉得奇怪。人到齐了，周恩来宣布开会。他首先说明，据可靠情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从美国情报机关得到秘密窃听器，可通过电灯线收录到被侦察对象的谈话机密。这几幢房子是最近才接受使用的，为防万一，代表团开会不点电灯。商谈机密的事，可到红岩或曾家岩，个别的可在室外谈。这时，我和大家才明白关了电灯点蜡烛的道理。

接着，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政协代表团的名单和任务，关于恢复南方局（目前称重庆局）的决定。并布置明后天即开展对国民党主和派、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的工作，准备举行记者招待会等活动。周恩来又宣布，齐燕铭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主管对外联络、宣传等工作；童小鹏为副秘书长兼秘书处处长，主管秘书、机要工作。秘书处的两部分，对外公文由何成湘负责，李金德为秘书处副处长，专管机要工作。代表团的行政管理工作，由办事处钱之光处长负责。

会后，周恩来又留下王炳南和我，并通知李金德、萧贤法来谈建立专门电台和延安及有关重要电台联系问题。他说，代表团来后，关于政协会议和国共两党谈判问题的电报很多，又很急，国内外许多重要情况也要及时向党中央报告，军政部的电台根本不能依靠，秘密小电台更负担不起这些任务。上次毛主席来谈判时，曾向何应钦交涉，启封八路军办事处电台，他们不同意。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向美军司令部借一部功率较大的电台给我们，特别要强调停战谈判以及将来军事三人小组成立后有关停战、整军的许多问题都要及时向延安党中央和总部报告，没有专用电台不行。要王炳南明天即向美方交涉，并请他们派技术人员代为安装，要我和李金德、萧贤法将原有和今天从延安带来的机要、电台人员组织好，建立专台后，同延安电台保持 24 小时的联系，保证密码安全。对军政部电台，仍要保持联系，并经过他们多发些一般的政治情况的电报。秘密小电台仍要保持专发绝密电报，等等，都作了详细指示。我们一致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17 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陆定一就分别访问孙科、王

世杰、邵力子、张澜等人，把我党代表团名单和对政协会议，停战谈判的方针通知他们，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王炳南向美军方面交涉借用电台一事进行得很顺利。当天下午，美军司令部通信部门就派了四名技术人员带上一台 400 瓦的大电台到了代表团驻地，王炳南也来了。由萧贤法等协同他们很快就架起了天线和收发报台，接通电流试调。因昨晚就用小电台给延安打过招呼，今天可能建大电台，并发去了新台的呼号和波长，所以很快就叫通了，而且效果很好。除了有 400 瓦的大功率（我们办事处电台是 50 瓦，秘密小电台只 5 瓦）外，更重要的是有变压器，可保持稳定电压。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很高兴，要厨房里立即准备一些酒菜招待美军技术人员，并很快接见了他们，感谢他们的帮助。美方技术人员当然很激动，没有想到中共的代表团长、将要和马歇尔五星上将平起平坐的周恩来将军，这样平易近人。他们表示愿意保证电讯的畅通，需要什么器材，有什么困难，可随时找他们。周恩来因要给中央发电报，就要王炳南向他们介绍我党政策和解放区情况，并留他们吃晚饭。6 时，周恩来在一个小房间里，用简单的酒菜宴请了美军人员，王炳南、乔冠华、龚澎、萧贤法等作陪。周恩来举杯感谢他们及时的热情援助，美军人员一再感谢周恩来将军的热情款待。他们立即拿出照相机拍下了这一难得的镜头。自此以后，代表团电台除 24 小时同延安保持联系外，并很快同十八集团军总部、北平军调部、苏北新四军军部、中原军区建立了直接联系，为及时通报情况起了重要作用。这部电台，美军一直保证器材的供应，代表团迁至南京时仍继续使用，一直到 1947 年 3 月 6 日，董必武率工作人员撤退前一天，才交还美军司令部。我们对美国朋友的这一帮助，是不会忘记的。因为是美军司令部供给周恩来将军使用的电台，所以我们根本不去重庆卫戍司令部登记，而他们的电讯监察部门也不敢来检查了（过去对八路军办事处电台每月都要检查）。可是他们并不会不管的，他们抄下我们的电码，还请了美国专家来破译。由于我们严格遵照周恩来的密码保密方法，我们的核心密码没有被他们破译出来。

12 月 18 日，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全体代表都出席了。周恩来介绍了中共代表团这次来重庆，一方面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另一方面是继续进行国共谈判。当前首先要解决内战问题，尤其是解放区一万万人民现在处于被进攻的状态中，更是迫切要求停止内战；其次要讨论出一个和平建国方案，它将包括共同纲领、政府改组、复员善后问题，解放区问题要在讨论全国地方自治问题时解决；军队国家化问题，由于现在的政府还是一党专政的政府，我们不能把抗日军队交给它，也反对参加请客式政府，由它来统一全国军队；关于东北问题，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去接受主权，这是应当的，但是如何建设东北，却是内政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周恩来的一席谈，实际上是昭告全国，中共代表参加政协会议和继续进行国共谈判的立场、方针和具体内容。

19 日，周恩来在宴请国民党谈判代表邵力子时又提出：中共希望政协迅速开幕，开幕前停止内战，其他具体问题可以在战争停止后用商谈方法求得解决。

这个时期里，国内、国际出现了对和平有利的局势。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屡屡受挫，说明蒋介石扩大内战的军事部署远远没有完成，而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不能不再一次作出和平姿态。在国际上，12 月 15 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美国对华政策声明，提出应停止国共双方的

敌对行动，召开政党会议解决争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中共中央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同一天，社鲁门任命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衔命来华调停国共争端。马歇尔虽然不是中国通，但他曾于 1923—1926 年在天津的美国步兵十三团服务过，和吏迪威成了密友，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而且二次大战后，马歇尔在美国有着十分显赫的地位。马歇尔要来华，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令人瞩目的大事。

马歇尔于 12 月 21 日到达南京，蒋介石作为一国的元首，本来不必专程去南京迎接。但为了讨好美国，蒋介石不惜降低身份，到南京恭候，和马歇尔作短暂晤谈。22 日，马歇尔飞往重庆，周恩来到机场迎接。

23 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拜访了马歇尔。周恩来对马歇尔说，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抗战整整八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已经 14 年了，牺牲重大，中国不能再有内战。我们主张由政治阶商会议草拟宪法，然后由改组了的政府筹备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使中国成为实行宪政的国家。也谈了中共对改编军队的看法。学识渊博的周恩来，对马歇尔谈到美国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如华盛顿时代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世界各地都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摆脱贫困的自由、摆脱恐惧即反侵略的自由）；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工业化等等。富有政治经验的马歇尔，在南京已听到蒋介石对中共的恶意攻击。当他听到周恩来说明中共的主张以后，当即意识到双方的分歧在于：国民党方面主张统编中共军队应在联合政府建立之前；中共则坚持组成一个他门在其中有真正发言权的联合政府，这是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的先决条件。

召开政协的前提条件是内战必须停止，中共代表团坚持这个主张。27 日，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恢复国共谈判。周恩来将中共代表团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的建议书交给国民党代表转交蒋介石，其中提出：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暂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的一切问题如受降、解除敌军武装、解散伪军、恢复交通及解放区、收复区等，在军事冲突停止后用和平协商方法解决；三、为保证上述两项，在政协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考察团分赴有内战的各地区考察，随时报告事实真相，公诸国人。这次会议，双方的分歧不大。31 日，周恩来和王世杰会谈中，王递交了国民党的复文，同意停止一切军事冲突、组织军事考察团，对所有同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受降有关的事项。由国共双方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商定办法。

看来好像停止内战立即可以实现了，事实并非如此，国民党在谈判桌上也主张停战，但并没有停止进兵，而是要在军事上取得优势。12 月中，杜聿明部队从葫芦岛登陆后，即向西侵犯冀热辽解放区，企图夺取已被我军解放的赤峰和多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津浦线徐州到济南一线也打得很激烈。东北方面，10 月国民党政府在沈阳设立“东北行营”，派熊式辉为主任，但兵力很少。11 月，国民党调动大量军队由葫芦岛登陆及从北宁路经山海关进入辽西，蒋介石还决定再派五个军到东北，国民党运兵不断，并无停战的迹象。

31 日，蒋介石决定：1946 年 1 月 10 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停战已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1 月 1 日，周恩来和马歇尔会谈，马歇尔表示，如果中共接受政府关于三方会谈的提议，他建议国共美三方备出一人组成委员会（后称三人会议或军事三人小组），处理有关停战、恢复

交通、受降事宜，取得一致协议方式，每方都有否决权，一切决议通过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才能生效。三人委员会可以在离冲突地区较近的地方设立一个机构处理有关的一切具体问题。周恩来对马歇尔这个建议是赞同的，但他并未立即表态，只是说：中共欢迎外来友谊，但希望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

周恩来向延安请示后，于 3 日再次和马歇尔会谈，转告中共中央欢迎他参加有关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的协商。马歇尔又提出，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已取得停战协议的政策，监督停战，公正地作调查。军调部下设四个中心、八个小组。马歇尔强调美国有义务帮助国民党运兵去东北。周恩来回答，东北有特殊性，但如何规定尚在考虑。

这几天来，周恩来真是宵衣旰食，很少有可以稍事休息的时间。1 月 5 日，他既与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谈判，拟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随后又同马歇尔会谈，讨论《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的具体条文，接着又参加洗星海作品演奏大会。他在会上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纪念洗星海的自由，是大家多年来奔走呼号才得到的，全国人民必须站起来，为自由和民主权利而奋斗。这给参加这次大会的重庆各界人士予极大的鼓舞。

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的三人会议于 7 日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国共双方分歧很大。张群同意全国停战，但又提出东北和华北的赤峰、多伦例外，理由是“政府要接收主权”。赤峰、多伦虽曾经被苏军占领，但早已为中共军队接收，国民党非要夺回这两个城市不可，我们自然不能答应。周恩来明确表示反对。从这一大起到 10 日上午，三人会议开了五次会，都没有结果。

9 日上午，周恩来约见马歇尔，表示中共反对政府方面的无理要求。这时马歇尔也着急了。明天政协会就要开幕了。如果停战令不能下达，会就开不成，即使开了会也会吵架，蒋介石还是不愿停战。马歇尔对蒋强硬地说，如果不停战政协会开不成，下一步就是三国干涉，你要考虑，蒋介石这才无可奈何地同意撤回接收赤峰、多伦的要求。

9 日晚上，周恩来住在红岩办事处，马歇尔通知 10 日上午开会讨论停战协定，因为障碍扫除了，停战协定得以在匆促中签字。10 日早晨 7 时半，刚吃过早饭，周恩来要我背上照相机随他进城，我立即随他下山到马路上上车，车开到牛角沱马歇尔住处。周恩来要我在门外等，他立即到马歇尔会客室。由张群、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双方在《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上签字，马歇尔也出席，同时签字的还有《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等文件。命令规定，从 1 月 13 日起，“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国民党军队向东北的调动除外。签字完毕，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等一同到门口，我就立即抓拍了几张照片。签字仪式除美国摄影记者外，国民党也没有记者在场，我算是意外的收获。周恩来和马歇尔、张群握手言别后，即到代表团驻地，准备参加上午 10 时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可惜当时我没有想到办个《新华日报》摄影记者证，政协会议的精彩镜头就没有机会去拍了。

中共是认真执行停战协定的，10 日当天，毛泽东主席即发出电报给各级党委、政府和军队，指出停战协定必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国民党也由中央社发表蒋介石向国民党军队下达停战命令。以后的一段时间，双方确实没有发生冲突事件，内战暂时停止了。

## 会内会外的不懈努力

10 日上午 10 时，国内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了。会议代表 38 人，国民党 8 人，共产党 7 人，青年党 5 人，民主同盟 9 人，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9 人。蒋介石出席会议致开幕词。他不得不唱一些高调，表示政府准备“接受会议一切决议，只要这些决议有利于国家建设，有裨于人民的幸福，有助于民主的推进。”还提出了四项诺言：人民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各政党有合法地位，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

从 1927 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双方兵戎相见达十年之久，抗战初，双方还能相安无事，以后则是摩擦不断。周恩来在这些斗争中，都是处于第一线，中共的领导人中，没有人比他更加洞察此中情况，也没有人在这些斗争中所做的工作能与周恩来比拟。今天，国共双方郑重其事地坐在一起开会（包括第三方面），周恩来心中不免百感交集。在开幕式上致词时，他说，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还是创举。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作的方案。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中共代表愿以极大的诚恳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他欢迎蒋介石提出的四项诺言。当他说到我们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使中国永远不发生内战时，声音特别宏亮。开会时，国民党的电影制片厂也来摄制纪录片和录音，录下的周恩来的声音很大，而蒋介石致开幕词时却声调低沉，不断地“这个”、“那个”的。据说摄影人员受到了蒋介石的责备。

政协开幕的第二天，军调部三方代表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决定于 13 日赴北平执行任务。叶剑英参加政协开幕式后，即于 13 日飞赴北平。

11 日和 12 日两天，政协举行全体会议，周恩来先后在会上作“关于停战商谈经验教训”和“国共会谈经过”两个报告。他回顾 1936 年以来的谈判历史，提出四点：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通情达理，语重心长，说出了两党要真诚合作应有的态度。

会议主要讨论了五个问题：改组政府问题、施政纲领问题、军事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宪法草案问题。会议有时举行全体会议，有时按问题举行小组会。周恩来在大会或小组会上，都是受人瞩目的人物。他以政治家的胸怀，高瞻远瞩，顾全大局，促使会议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在会外，他和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肝胆相照，使尽可能多的代表为着共同的目标不懈地努力。董必武、王若飞等其他代表，也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耐心地进行了许多有效的工作。

会议进行了 22 天，开了十次大会，它作出的决议有利于国家的和平建设，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取得这个成就，是由于各党派能够互谅互让，而中共的正确方针，周恩来杰出的斗争艺术，代表团的共同努力，是很重要的因素。比如在讨论改组政府和施政纲领时，国民党坚持要在政府中占绝对优势。中共代表根据联合政府的主张和三三制的原则，认为最大的党在政府中所占的名额不能超过三分之一；现在中共则同意国民党在国府委员中占二分

之一，在行政院中占大多数。在讨论宪法草案时，中共坚持宪法的民主原则，但也作出了某些让步，如接受英美式的初期民主，如解散议会制度。

军队问题是个棘手的问题，在讨论中，周恩来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他表示中共赞同军队国家化的原则，但坚持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必须同时进行。军队国家化的标准是军队属于国家，属于人民。属于国家只要听命干统一指挥就可以做到；属于人民则军队应当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一点不容易做到，但我们主张必须做到这一点。他批评国民党军队提出“军人第一”的口号，说“军人第一”就是超过人民，“老子第一”，必须向军人进行“老百姓第一”的教育。这段发言，深受第三方面人士的赞扬。他还表示，缩编问题中共将按照协议进行。

在讨论国民大会代表问题时，国民党坚持抗战前选出的代表有效。周恩来指出：旧国大代表选在十年以前，那时一党统治，中共处在地下，许多党派也无选举权，选举方法根本不是直接、平等、普遍、自由与无拘束的民主选举，这样选出的代表，我们自然不能承认他们为合法代表。但如果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下这个问题未解决，是否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与政府党决裂呢？当然不能。所以，尽管中共不能承认旧代表，并不因此不参加国民大会。民盟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不让步，周恩来还劝说他们不要为着这个问题，而把当前为和平、民主和统一而召开的政协会议弄破裂了。

在大会和小组会上，周恩来有时语惊四座，提出某些人们料不到的问题。谈到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权利时，周恩来声调高亢地说，蒋主席在本会宣布的四项主张，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办起来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应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他指出，九年前的西安事变，“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若没有他两人的赞成，也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这些话受到许多代表的赞扬。由于蒋介石一意孤行，张、杨竟不能获得释放，周恩来还同国民党政府多次交涉，要求释放廖承志和叶挺，中共释放在邯郸战役中被俘的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在我党代表一再要求下 1 月 22 日，廖承志首先释放，周恩来曾亲自前往迎接。廖承志一到代表团住处，就受到代表们和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他真是一个牢里出来的人，穿着一套黑色的破西装，头发蓬乱，胡子拉茬，手上拿着一根在牢里自己做的竹烟斗。可是精神抖擞，以无限兴奋的心情回到党的怀抱。正在大家争着同他握手的时候，我即抓拍了一个镜头。邓颖超大姐也很高兴，立即拉着承志靠近她，要我给她俩照个合影。周恩来要我立即给党中央拍电报报告。在我党代表团的多次交涉下，3 月 4 日，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留囚禁长达五年的叶挺将军也获释了。自然大家都很高兴，争相同这位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握手表示欢迎。特别感人的是叶挺和他的爱女扬眉的团聚。1942 年，叶挺夫人李秀文，为设法营救叶挺，曾带着女儿扬眉到重庆来，因叶挺未获释，她自己回到澳门去了，周恩来、邓颖超把她的女儿扬眉送到延安学习。1946 年 1 月 30 日，周恩来从延安回重庆时，估计叶挺快要出狱，就把叶扬眉带上飞机到重庆来等待。现在果然等到了，小扬眉真正扬眉吐气了。当办事处把她从红岩送到代表团驻地时，小扬眉一下投到父亲的怀抱里，高兴得又笑又流热泪，叶挺是英雄汉，在国民党牢里铁骨铮铮，可是一见离别几年的爱女，英雄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当天，周恩来就打电报给住在澳门的李秀文，告以叶挺已出狱，速携幼子来重

庆团聚。第二天，叶挺就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7 日，中共中央复电叶挺，热忱的接受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欢迎他全家到延安去，几天后，李秀文带了幼子小九和保姆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早就给叶挺一家安排了较大的房间让他们在红岩团聚。这时，红岩大有农场里的桃花，正竟相怒放，好像是有意笑迎叶挺将军的出狱和他一家的团聚。叶挺带着扬眉、小九高兴地爬在桃树上，夫人李秀文则靠在树干上，笑着让我给他们照了一个“半家福”（有几个孩子不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还开了欢迎会，庆祝廖承志和叶挺恢复自由。

政协会议开了十几天后，虽然有时辩论很激烈，但总算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协议，即将签字时，周恩来和陆定一于 1 月 27 日飞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请示。

当天，中央书记处即举行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停战、政协的谈判情况。他说，解放区问题我们把它放在和平建国纲领中作为一般的地方自治问题去解决，这样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打破了国民党的“割据”之说；军队国家化问题，我们提出与政治民主化平行解决，承认军事三人小组，来打破 CC 派取消中共军队之说；国民大会问题，我们坚持宪法草案的民主原则。这些意见，都取得了民盟的同意和合作。军事三人小组负责整编全国军队，国民党口头同意我们整编为 20 个师，经过力争定为统一整编。改组政府，国民党同意我们和民盟在国府委员中占三分之一（14 名），可以保证行使否决权。会议认为代表团取得很大成绩，方针都是正确的。

28 日，书记处继续举行会议，商定中共参加政府的名单为：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争取由周恩来担任行政院副院长。会议同意代表团商定的政协各项文件。授权代表团签字。

29 日，周恩来、陆定一和工作人员启程飞返重庆，参加政协决议签字和闭幕式。由于气候恶劣，飞机只得在西安降落，滞留一夜，30 日上午他们又登上飞机。这是一架双引擎的军用飞机，只有座位 12 个，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共 12 人，还有一个叶挺的小女儿扬眉，是周恩来带她去重庆准备迎接叶挺出狱的。她个子小，就让她挤在工作人员座位上。当飞机经过秦岭上空时，突然遇到一股强大的冷气团，使飞机蒙上一层厚厚的冰甲，飞机被压得直往下沉。驾驶员几次使它上升，都升不起来。于是机长命令机械师打开舱门，把行李一件件扔下去，以减轻飞机的载重量。行李中，有几箱子是从边区银行领来的“法币”，准备带到重庆用的，工作人员舍不得抛掉，请示周恩来，周说，救命要紧，都抛下去，工作人员才忍痛抛下去。为防万一，机长又不得不要求乘客从座位下拿出降落伞背上，随时准备跳伞。周恩来背上降落伞，又帮助别人系伞。因只有 12 个伞，扬眉没有，她就哭起来了。周恩来看到，立即从摇晃着的机身中几步跨到扬眉面前，迅速解下自己背着的伞包，给扬眉背上，鼓励她说：“小扬眉不要哭，你要像你爸爸那样勇敢、坚强，要与困难和危险作斗争。”同机的人说，扬眉个子小，和别人同用一个伞就可以了。但周恩来不同意。这是生与死的紧急关头啊！周恩来把生的希望给了扬眉，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这种无比崇高的精神境界，深深受到人们的赞颂。幸好飞机冲出了冷气团，沉重的冰甲融化了，人们脱险了。飞机又飞回西安，当天下午继续飞行，傍晚才到达重庆。

周恩来终于赶上了延期两次、于 1 月 31 日举行的政协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五个协议后，即举行闭幕式。周恩来致词对政协会议给予高度的评价，

他说：“今天通过的各项协议，证明了这次会议得到很大的成功。”“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他也坦率指出：“虽然这些问题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虽然各方面的见解和认识也有一些距离，但是我们愿意承认，这些协议是好的，是由于各方面在互让互谅的精神之下得到的一致结果。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

这一天，他还和马歇尔会谈，并转达毛泽东对马歇尔的谢意，感谢他为促进停止内战所作的努力，希望他再促使东北停战。马歇尔表示他要说服蒋介石解除对中共动机的怀疑。

中共是决心认真执行政协决议的。政协闭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给各地区军队党委发了电报，指出政协会议已获得重大成果，强调：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第一次伟大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现已陆续公布，望各地在党内外，特别在各大城市，要分别进行适当的广为宣传，举行庆祝大会，发出庆贺通电，要求政府立即实行决议，而在我们自己方面，则准备为坚决实现这些决议而斗争。

2 月 7 日下午，重庆大学学生爱国运动会邀请周恩来去演讲。时间未到，大饭厅已被 3000 多人挤得满满，后来的同学只能站在窗台上和外面操场上，附近学校学生也要求教师停课，赶来听讲。一个学生对记者说：“我们盼望周先生来演讲，己盼了几年了。”周恩来在演讲中说，世界朝着和平、民主、建设的目标而奋斗，这是总趋势，中国也不能违背世界总的方向，因此才有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抗战胜利只是奠定民族独立的基础，政治协商会议才是开始了民主的道路。他对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关系作了形象比喻说，二者好像两条腿，忽而这个在前，忽而那个在前，是平行的，互相配合的。政治民主化要有一个过渡的共同纲领，以后还要有一个长期的宪法产生，让我们走向康庄大道。

但是，周恩来对国民党能否实行政协决议，并不是很乐观的，2 月 8 日他出席张治中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的联欢会上讲话，告诫国民党：写在纸上的文字要去做，去执行。要遵守诺言。希望大家倾听人民的呼声和意见，实行政协决议。

重庆以至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政协会议成功的欢乐之中。人们以政协路线来衡量是非，谁坚持政协路线，谁就赢得人心；谁破坏政协决议，谁就遭到谴责。在国民党这个成分复杂的政党中，对政协的态度很不一致。许多下层党员，拥护政协决议，他们也希望出现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上层中的民主派，也是愿意执行政协路线，反对内战。但顽固派则对政协及其决议深恶痛绝，这部分人就是 CC 派、复兴社和军校出身的一部分军人，以及中统、军统的特务分子。他们不但恨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也对国民党中的民主派不满。

还在政协会议期间，“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在沧白堂连续举办演讲会，每晚请代表演讲，并听取各界人民的意见。1 月 16 日晚，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讲话时，国民党特务就在会上起哄，使演讲会进行不下去。17、18 和 19 日的三个晚上，特务变本加厉，先是大喊大叫，接着大打出手，2 月 10 日，重庆各民众团体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大会，庆祝政协成功，有近万人参加。周恩来也来到会场。突然，国民党特务四处喊打，大会主席团成员

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被殴受伤，台下群众被打的也有数十人。周恩来、陆定一、邓颖超和刚被释放的廖承志等到医院慰问。当晚，政协代表举行会议，推选周恩来、陈启天、李烛尘、张君劢去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蒋于 11 日飞上海，避而下见。周恩来等 11 名政协代表联名致函蒋介石抗议较场口事件。

国民党特务进一步进行猖狂的破坏活动。2 月 12 日，署名“冠英”的特务，竟卑鄙的寄了一封打上十十十的恐吓信给周恩来，信中还附上一颗驳壳枪子弹。周恩来收到信后，置之一笑，立即交给《新华日报》公布这一无耻行径。2 月 22 日，国民党特务又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举行了“反苏游行”，混杂在游行队伍中的特务打手，公然捣毁了民生路的《新华日报》营业部，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营业部也遭到破坏，工作人员十多人受伤。在中共代表团住地旁边的公安局第七分局门口，竟贴上“打倒赤色汉奸”等反动标语等等。事情发生后，周恩来非常气愤，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事实真相，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显然与政协的民主希望相违背，是把战场上的挑衅移到城市来。他严正声明：中共始终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建设的神圣事业奋斗，决不受这类反动阴谋分子的挑衅，或因此而退却。当天，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

政协决议的执行蒙上了阴影。面对这一严峻的局面，周恩来异常愤慨，但又以极大的克制态度，继续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各项问题的途径。2 月 25 日中午，周恩来会见马歇尔，对他指出国民党中一些人，特别是 CC 派，在尽力要破坏和推翻我们的这些共同成就。马歇尔也已看出这种情况，承认说这几天是很困难的日子，他们（指 CC 派）正在不择手段地企图破坏政协会议的决议。

蒋介石的态度又如何呢？起先他耍两面派手法，在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上，他还告诫顽固分子要冷静处事，不要有过激行动。顽固派的活动很嚣张，连参加政协的部分国民党代表也遭到攻击。蒋介石也斥责过顽固分子。但事情也奇怪，谁遭到斥责，谁就升官。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也没有看出蒋介石的真面目。邵力子曾经对周恩来说，执行政协决议在国民党内部有困难，但蒋介石不致变卦。实际上蒋介石对于政协决议也不满意，他在政协会议上的讲话只是蒙骗世人。决议墨迹未干，他已经一步一步准备撕毁了。

3 月 1 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这是政协会议后国民党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蒋介石亲自主持，人们对它很关注。这次会议不是讨论政协决议问题，而是一片反共叫嚣。这说明蒋介石已经揭去他的假面具，把真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3 月 17 日，国民党二中全会闭幕，第二天，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愤慨地指出：国民党的二中全会的结果令人失望，因为它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他尖锐地质问国民党：“你们一方面要求人家来做，另一方面又把违反政协决议的东西写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上，这不能不说其中包含了欺骗。”他严正地警告国民党：“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执行政协决议，每走一步都是极其困难的。周恩来逆流而上，在艰难中奋勇向前。

首先要解决的是整编军队问题。这个问题在重庆谈判中谈了多次，政协决议没有确定整编细则。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多

次开会讨论，确定整编时国共双方军队为五比一。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一年内全国陆军整编为 108 个师，其中国民党 90 个师，共产党 18 个师，每个师人数不得超过 1.4 万人。军队驻地也作了大范围的规定。各省保安队按省份大小，最乡不得超过 1.5 万人，编余人员 12 个月内复员完毕。这个任务完成后的半年内，进行第二阶段整编，共为 50 个师，其中国民党 40 个师，共产党 10 个师，并规定国民政府主席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各个政党不得有自己的武装，也即实现了“军队国家化”。2 月 25 日，这个定名为《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由张治中、周恩来和作为顾问的马歇尔在重庆中四路尧庐签字了。

这个方案能够达成协议，除我方让步外，张治中和马歇尔也都起了积极作用。

当时，我们在关内的部队包括正规军和地方军在内，共计 95 万人。东北有 30 多万。我们向马歇尔提出的数字是 132 万。政协闭幕后磋商这个问题时，党中央指出至少应整编为 20 个师，编成 7 个军。另外东北部队编成 3 至 4 个师。国民党代表口头同意共编为 20 个师，这次同意编为 18 个师，是我们再次让步的结果。第二阶段的整编要以军为单位，国民党方面提出我们一个师和国民党两个师合编为一个军。这种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两种军队作风完全不同，而且长期对立，合编后不好相处。更严重的是，国民党军队数量多，装备较为精良，一旦要消灭我们，我们是难以对付的。党中央对代表团指出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周恩来也考虑到这一点，因此反对这种做法。几经磋商，后来取得了折衷办法，规定我军 8 个师和国民党 4 个师合编为 4 个军，以我方人员为军长；另外我军两个师和国民党 4 个师合编为两个军，以国民党人员为军长。这样我们才在协议上签字。

在签字仪式上，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宣布：我们签字的文件都要使它百分之百地实现。张治中强调这件事情“意义重大”。马歇尔对它的期望也很高，说这个协定“是中国的希望”。

但是事实和三方面签字人的愿望相反。蒋介石只想整编中共军队，他们的军队是不愿整编的。他们提出先军队国家化，而后实行政治民主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我们交出军队，而政治上仍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政府仍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我们就更不容易争得合法地位和在政府中的发言权了。因此，周恩来多次提出，先政治民主化而后军队国家化，或者两者同时并行。国民党始终没有同意。

从 3 月份起，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就不断发表破坏整军方案的言论。3 月 23 日，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在国民参政会上讲话时对整军方案只字不提，鼓吹军队越多越好，要充实力量才能维护国防安全与国际和平。显然他不要整编军队而要扩充武力。何应钦也明目张胆地反对整军，胡宗南纠集一批国民党高级军官，声言当时正在“酝酿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能整编军队。在整编军队方面，国民党始终没有采取具体行动。整军方案只是纸上的东西。

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问题，分歧也很大。政协讨论改组政府问题时，王世杰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只是在国民政府委员名额中增加三分之一，由原来的 36 人增至 48 人。新增的 12 人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充任。同时在行政院设政务委员若干名，容纳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我们和民盟都反对这个方案。因为这种扩大了的政府仍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府，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只是装潢门面而已，起不了任何作用。行政院只

是执行机关，一切听命于国民政府主席，政务委员即使担任部会长官，也只是被捆起手脚来做官而已。中共和民盟力争国民政府委员会成为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最高国务机关，有任命行政院政务委员和各部会长官的权力，立法、监察的两院委员必须由这个委员会同意，举国大事要在这个委员会决定。经过多日争论，政协通过的决议案中，国民政府委员会基本上具有上述这些权力。我方也作了让步，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同意国民政府委员会中 40 名委员国民党占 20 名，其他 20 名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这 20 名委员如何分配，会上没有确定。

中共是认真对待参加政府问题的。周恩来再次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提出参加政府问题。2 月 6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根据周恩来的电报研究参加政府问题并提出由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参加国府委员会。这个名单和上次名单不同的是没有朱德，而增加了范明枢。范明枢是解放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不在延安。中共中央打电报征求他的意见，并准备他如果不愿出任，则改由彭真担任。同时决定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加行政院，周恩来任副院长，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则担任部长或不管部的政务委员。

改组政府，本应在政协闭幕后即着手进行。但蒋介石无意放权，迟迟不见行动。而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通过了反对政协的决议，蒋介石还公然声称：政协“关于改组政府的协议案，在本质上不能代替约法”，“决不能承认”。而决议案中 20 名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分配，他们又大作手脚，坚持 8、4、4、4 方案，即共产党 8 名，民盟 4 名、青年党 4 名，无党派人士 4 名。共产党和民盟 12 名，加上无党派人士由中共推荐 1 名，一共只有 13 名，民主力量达不到三分之一，不能行使否决权，国民党仍可垄断一切，中共参加政府就没有实际意义了。2、3 月间，东北局势紧张，国民党又到处寻衅，蒋介石的四项诺言没有实现，在这种气氛下，国民党要求中共交出参加政府名单，周恩来自然不能交出。4 月 15 日，蒋介石约见政协综合小组各代表举行茶话会，商谈国大和政府改组问题。周恩来严正指出：这两个问题要与停战、整军及政协各项决议的实施同时解决。而国民党没有这种诚意，改组政府的工作搁浅了。

国民大会问题争端也很多，首先是代表问题。政协期间其他代表包括青年党在内，都认为旧代表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人，不少是上豪劣绅，甚至有投敌的汉奸，那次选举应属无效。国民党坚持这批代表有效。各方顾全大局做了让步，经过协商决定，增选台湾省和东北几省的代表 150 名，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700 名，连同旧代表共 2050 名。当时商定，由中共指派和解放区选出的代表为 390 名。中共中央做了研究，决定其中 30 名由中央直接分配，其他由南方局、各解放区分配和选举产生。我方坚持一点，国大必须有四分之三的代表赞成，才能通过宪法，也就是中共和民盟代表必须占四分之一，才能做到不让国民党随意修改宪法。

政协闭幕后，国民党又提出要增加代表名额，而且片面决定在 5 月 5 日召开国大。这两项都是我们所反对的。4 月 15 日，蒋介石要求各党派在 4 月 20 日前提出国大代表名单。周恩来指出 5 月 5 日召开国大事实上不可能。蒋介石无法辩驳，不得不同意指定张群、张厉生、邵力子为代表，雷震协助，与各方面商讨全面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谈判中，各党派和许多无党派人士都提出许多重大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大会准备工作也没有完成，国民党

不得不宣布国大延期召开。

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国民党二中全会提出要修改宪法草案的原则，也就是取消它的民主精神，遭到中共和民盟的反对。4 月中旬政协综合小组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宪法草案修改小组，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从 16 日以后，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宪草审议工作从此停顿了。

由于国民党设置重重障碍，执行政协决议的前途一片黯淡。

## 坚持实施政协决议

停战协定生效后，关内是停战了，东北的局势却日益紧张。造成这种局势的根源，是蒋介石迷信他可以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

实际上，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从来没有进入东北。“九一八”以后，蒋介石要张学良的东北军不得抵抗撤入关内；日军占领期间，东北义勇军和抗日民主联军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而国民党军队没有在东北打过一回仗；抗战胜利后我们派大批干部和军队进入东北，最初是在热河、冀东的李运昌部 5000 人，随后去的有万毅、萧华、黄克诚部数万人。当时大城市由苏军驻扎，我们解放许多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我们曾提出东北实行地方自治，国民党坚决不同意。他们海、陆、空三路并进，调去大量军队。国民党根据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的规定，要求苏军撤退后，由国民党军队占领苏军所到的地方。美国站在国民党方面，就这个问题向苏联进行外交斗争。苏军不得不把中国长春铁路沿线的某些大城市交给国民党军队。苏军驻扎的地方，只要有国民党军队，我们就不能去。11 月下旬，虽然我军已发展到 20 万人，但受这个约束，不能解放更多的地方。这时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东北我军撤出大城市，只控制中小城市和乡村。为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周恩来、王若飞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谈判，希望东北成为民主的实验区，实行地方自治，取消行营，建立地方联合政府。国民党不同意。12 月，蒋介石决定再派军队到东北，政协开幕前后，国民党运兵不断，由于停战协定刚刚签字，而且规定国民党进兵东北不受限制，我方竭力避免冲突。我们退让，蒋介石则步步进逼，又派精锐部队新一军、新六军进入东北，抢占中长路以外我军活动的地区和城市，1 月中政协开会期间，营口就发生了严重冲突。周恩来同马歇尔谈了这件事，当时马歇尔尚能主持公允，建议由军事三人小组指示军调部立即派遣一个执行小组前往营口，并提出将来东北发生此类战争，军调部应立即采取同样行动。张群于 1 月 28 日通知马歇尔的总部说，蒋介石担心执行小组内出现一个美国人，可能引起与苏联的麻烦，不同意向营口派执行小组。实际上这是一种借口。由于事态继续发展，2 月 14 日，周恩来接到营口方面又发生冲突的报告后，再次向马歇尔提出这个问题。马歇尔找了蒋介石，蒋仍拒绝派执行小组去营口。这时马歇尔醒悟了，他得出结论：蒋介石不愿派执行小组的原因，是他要避免承认东北有共产党的军队，而是把他们当“土匪”，这样东北就不存在停战的问题。东北战云密布，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2 月 24 日，周恩来电请中共中央注意：东北问题将成为战争的焦点，对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请予防范和准备。

2 月 28 日起，军事三人小组先后到华北和华中巡视，了解停战协定执行情况和整编军队中的问题。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及部分工作人员离开重庆，我也作为周恩来的随员和他们同行。这次乘马歇尔专机先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了解情况后，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也同行。三人小组到过张家口、集宁、北平、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于 3 月 4 日到达延安，在机场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等和几千群众的欢迎。毛泽东和马歇尔谈话时说，停战令应适用于东北，军调部应派去执行小组。当天晚上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了欢迎会，朱德、张治中、马歇尔先后致词。朱德说：中共对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已在忠实执行，整军方案也一定切实执行，务使其彻底实施。张治中说：政府签订的几个协定，是促成国内和

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几个伟大文件，政府当不折不扣的百分之百的付诸实施，贯彻到底。他在结束讲演时还说：我刚才和毛主席说过，将来你们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一句：“张治中曾三到延安”。博得了热烈的掌声。马歇尔也表示，愿为中国的和平复员努力，他将进一步帮助整编全中国的军队。3 月 5 日，三人小组离开延安飞抵汉口，6 日飞回重庆。

张治中的讲话，中共方面相信他是真诚的。他以三次到延安（即 1945 年 8 月 27 日陪美国大使赫尔利飞延安，28 日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10 月 11 日他陪送毛主席回延安，这次是三到延安）引为骄傲，并要求中共把这件事写到历史上，也是应该的。但是他的讲话，并不能阻止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的行动。“张治中三到延安”，只能成为国共关系中的一段佳话被人传颂。

三人小组回到重庆以后，蒋介石还是固执己见，不同意往东北派停战执行小组。由于马歇尔即将返美述职，他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正在争取美援，不敢得罪马歇尔，不得不答应了。3 月 10 日，三人小组讨论具体方案，周恩来提出政治问题应与军事问题同时解决，国民党不同意。蒋介石提出五项具体条件，最主要的是执行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国民党军队可以占领一切地方，而中共军队必须撤出。周恩来指出蒋介石真是蛮横无理。马歇尔急于回国，不愿多谈这个问题，对周恩来说，这个问题以后再协商。第二天，马歇尔回美国去了，由吉伦中将代表他参加三人小组，执行这个任务。

3 月 13 日，苏军从沈阳撤退，国民党即进入沈阳，随后又进占铁岭、辽阳。3 月下旬，苏军决定 4 月底全部撤离东北。中共代表团判断国民党军队将从沈阳向北推进，和我们争夺长春和哈尔滨。周恩来即与张治中和吉伦举行三人小组会议，商谈东北问题。会上一致同意派遣执行小组去东北。3 月 27 日，三人小组在重庆桂园张治中公馆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决定于 29 日派四个小组去东北执行停战调处工作。

国民党不顾信义，协议刚刚签字，即派兵向营口、本溪、四平街大举进攻。4 月 1 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强词夺理他说什么“军事冲突的调处，只能在不影响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也就是他对调处根本不予理睬。虽然蒋介石燃起东北的战火，我们仍然派出人员参加执行小组。4 月 2 日，耿飚、张经武、许光达等 40 余人由北平飞抵沈阳，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竟借口他们未带军调部护照，在机场非法留难三个小时。同一天，国民党军队进占海城、鞍山，东北内战日益扩大。4 月 9 日，蒋介石接见美国记者公然表示，他已决心消灭共产党，现在只看美国的态度如何？

东北的局势使全国人民忧心忡忡。民盟出面进行斡旋。4 月 10 日，张澜、沈钧儒在鲜英的特园宴请国共双方代表，我方出席的有周恩来、陆定一、吴玉章、邓颖超。张治中已出任西北行营主任，由陈诚接替他的职务。民盟提出三点建议：一、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共产党不要阻碍；二、国民党军队停止前进五天，以便共产党军队撤离铁路沿线据点，避免冲突，在这五天中，双方协商解决政治问题；三、双方依据政协决议，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对于民盟的热忱周恩来很是感激，这个建议也是可行的，当时即表示可以接受。他还说，停战不是暂时的，应是全面的、永久的。陈诚重弹“接收主权”的老调，断然予以拒绝，他摆着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咄咄逼人地透露国民党军队不仅准备接收长春，还要进军哈尔滨甚至齐齐哈尔。

面对国民党准备在东北大打，我们只好采取相应的对策。

周恩来看透国民党的企图，4 月 5 日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转东北局和北平的叶剑英、罗瑞卿（时任军调部中共方面参谋长），说明东北情况在张治中走后国民党一直拖延谈判，东北应准备大打，不要幻想国民党能让步。中共中央复电指出：“情况估计及应付方针甚为正确，望坚决执行。在目前国际国内反动逆流下我党必须有通盘计划以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中央决定，只有大打才能刹一刹国民党的威风。

激烈的战争在四平街爆发。这场保卫战我军打得很出色，大出国民党的意料之外。战争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也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的顽固态度。4 月 11 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转东北局，指出由于四平的战争，国民党不能在苏军撤退时进入长春，我们应在两天内派兵进入长春。12 日，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按周电办”。我军遂于 4 月 19 日占领长春。4 月下旬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尽管国民党军队受挫，他们仍寄望于增兵以后，可以挫败中共军队而不停战。

马歇尔于 18 日回到重庆，周恩来曾到机场迎接。这时东北战事正激烈进行，马歇尔知道蒋介石不愿停战，因而也不急于同周恩来会谈。直到 22 日，周恩来才又见到马歇尔，对他说，我们是愿意实行 3 月 27 日协议的，而国民党不愿意，反用武力占领我们 7 个城市。他们既然不遵守条款，我们便被迫采取自卫行动。周恩来还向马歇尔分析国民党不愿在东北停止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不愿意承认中共在东北的部队，甚至诬为“土匪”加以讨伐。他列举“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领导的军队在东北奋勇抗战的历史和战后东北局势演变的事实，来驳斥蒋介石的诬蔑。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进攻，我们便要抵抗。但我们仍然愿意停战。

4 月 27 日，周恩来又同马歇尔会谈，向他指出苏军已经撤完，东北不存在着什么主权问题，应该无条件停战。马歇尔转告蒋介石的意见，中共军队退出长春，然后停战进行谈判。周恩来表示，先停战然后进行谈判。双方都坚持己见。二天后，马歇尔说他对调停已感到无能为力。

几个月的接触，马歇尔非常赏识周恩来的才干。在这次谈话以后，马歇尔对张君劢和罗隆基说：周恩来是他未遇过的外交对手（另有一说，马歇尔说周恩来是他遇到的最出色的交涉家）。

另一个问题是中原告急。

我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郑位三部在抗战期中一直活跃在鄂豫皖边境大别山区周围，并发展到平汉路以西。抗战胜利后，从广东北返的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 359 旅南下支队和从河南中部南下的王树声等率领的嵩岳军区部队，三支部队汇合组成了中原军区。国民党对这支抗战有功的部队视为眼中钉，非得把它拔除而后快。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中原军区非常困难，缺乏粮食、药品，缺少军费。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曾谴责国民党这个错误行径，并提出我中原部队可以北撤。当时国民党当局也表示同意，但并未履行诺言。停战协定生效的第二天，即 1 月 14 日，国民党军队即进占豫鄂交界的光山县城，有可能引起一场内战。周恩来向刚刚成立的军调部指出事态的严重性。军调部派了一个执行小组到汉口负责制止中原战争。国民党代表宋瑞坷、陈鼎勋，我方代表王震，美方代表福尔德，在河南罗山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方多方忍让，委曲求全，并未要求国民党军队退出停战协定生效后占领的地方，只约定双方维持 1 月 23 日的位置。三方达成协议。但国

民党军队一直没有停止进攻。对平汉路以西的中共部队也不断地进行袭击。

周恩来对中原局势非常关切，他一再在三人小组会议上提出，我中原部队北撤是双方达成的协议，而且要执行整军方案也非北撤不可，国民党军队不应包围、袭击。他还提出具体的方案：四万武装部队转移到苏北或华北整编，二万人就地复员。为了先了解中原军区情况，周恩来派我乘美军运输机到汉口，把中原军区驻武汉办事处处长郑绍文接到重庆向代表团作详细报告。准备派董必武和郑绍文由重庆飞武汉，代表中共中央慰问中原部队，视察当地情况，帮助解决停止冲突和粮食困难等问题。国民党蓄意要置我中原部队于死地，既提不出反对我方建议的理由，又不让我们执行北撤的计划，一味拖延敷衍，董必武、郑绍文等一行于 3 月 24 日由重庆飞汉口。因中原军区供应困难，董必武一面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准予中原军区在汉口采运粮食、药品等；一面向爱国民主人士周苍柏、杨显东等进行工作，请他们尽量予以协助。30 日董老一行从武汉乘车到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和军区领导人商谈对策。4 月 7 日，董老一行离宣化店返回武汉，国民党军队竟无理留难，阻拦和非法检查达 6 小时之久。他们所带的地图、报纸、照相机都被扣留。董老提出抗议，才被放行。董老回武汉后，通过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任正副署长的周苍柏、杨显东争取了美国人沙克诺夫给中原解放区运送了几批粮食、医药、被服等救济物资，解决了一些困难。4 月 18 日，董老返抵重庆，中原战争已至一触即发之势。

就在周恩来为东北问题、中原问题日夜焦思的时候，4 月 8 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儿扬眉、小儿子阿九和保姆同机）和邓发等同志 13 人，乘坐一架美国飞机从重庆回延安时，因遇到恶劣气候，不能下降，改变航向后，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坠毁，我方人员和美军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消息传到重庆，办事处同志如五雷轰顶，周恩来更是悲痛万分。这几位都是他多年的战友。王若飞是他和国民党谈判的得力助手；秦邦宪（博古）原来不是政协代表，是后到重庆谈判修改宪法草案问题的；叶挺早在北伐时候，他们就已共事了，在组建新四军时候，他们配合得很好，这次叶挺是带着家属回延安；邓发是出席世界工联代表大会回国后，经重庆回延安的。被称为“4·8 烈士的牺牲，是我党的重大损失。4 月 19 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会，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烈士生平事迹时，痛哭失声。他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悲愤他说：烈士们“意外的牺牲，使我们更加感觉到这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如果没有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也就没有你们这次冒着恶劣天气飞回延安的必要。”“烈士们，同志们，你们的责任已尽。我敢向你们保证，有中国人民在，有中国共产党在，有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力量在，我们决不让反动派破坏政协、破坏停战、破坏整军的阴谋活动成功”。“你们坚持的方针，是全中国人民的方针。和平、民主终必会在全中国实现。”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将烈士骨灰安葬在清凉山下，并建立了四八烈士墓。

由于国民党还都南京，以后继续谈判将在南京进行了。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南方局人员，也都要离开重庆到南京去。

周恩来在离开重庆前，对今后西南的工作作出布置。首先要公开成立中共四川省委。4 月 14 日，南方局致电中共中央，呈报四川省委的名单和分工，由吴玉章任书记，王维舟往副书记。委员为傅钟、于江震、魏传统、梁国林、杨超、郑怕克、廖志高；候补委员：周文、何其芳、赵世兰。4 月 19 日，中

央复电说，除廖志高不能达到外，其他均同意，并调程子健参加省委民运工作。22 日，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董必武代表南方局出席会议，宣布了这个名单。国民党方面认为王维舟是搞军事的，对他耿耿于怀，也由于其他原因，后来副书记一职改由张友渔担任。这是 6、7 月间的事。

4 月下旬，中共代表团、南方局和办事处迁移南京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28 日，周恩来在曾家岩 50 号举行向重庆文化界话别茶话会，应邀出席的有二三百人。由于东北战人越来越烈，谈判处于僵持中，大家对此非常关心。周恩来报告了东北的情况，也谈了和国民党谈判的经过与我党坚持实施政协决议，主张全盘解决问题的意图。会上，周恩来无限感慨地谈了和国民党谈判的困难。他说，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在这样长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艰苦的一段路。这是周恩来发自肺腑的一席谈话，反映了谈判的前途并不乐观，但我方决心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的成功。

4 月 30 日，中共代表团举行在审庆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向重庆新闻界告别。周恩来表示希望在南京的继续谈判能取得结果，并把吴玉章、王维舟、傅钟、周文等同志向新闻界介绍，示意中共代表团离开重庆后，四川及西南地区的工作，将由四川省委领导。

许多未解决的问题，都将由重庆带到南京。

5 月 3 日，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等十余人，乘飞机离开重庆赴南京，继续为党为人民进行更为艰苦的斗争。

# 继续为国内和平奔走（上）

## 率中共代表团到南京

早在 1945 年底，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重庆局根据国民政府将返都南京，谈判中心也将转到南京的情况，曾多次研究中共代表团迁南京及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和代表团工作机构问题，并进行了许多准备工作，首先是要解决房子问题。

1946 的 1 月，周恩来派长期在上海工作的刘少文到上海，恢复和建立新的情报系统和建立秘密电台。同时，利用社会关系在上海、南京为代表团和新华日报社找房子。后来又派祝华、陈展去。4 月 2 日，周恩来亲笔写信给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求在南京拨房屋两幢，在上海拔一幢，供两个办事处用。信的全文如下：

子文院长先生勋右：

敬启者，抗战胜利，政府还都在即，兹为与各方联系及时协商起见，敝团亟应在京、沪两地筹设办事处。又，第

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亦需迁住南京办公。敬祈饬属在南京拨予房屋两幢，在上海拔予房屋一幢，俾便派员筹备，以利建国工作。用特奉恳，并请赐复为感。专此，祗颂勋绥！

周恩来　　谨启

四月二日

当时国民党接受大量敌伪房产，这个问题本来不难解决，但他们不想解决，一再拖延。4 月 4 日，周恩来又写信给行政院代院长蒋梦麟，希望迅速拨给房子，没有得到回音。4 月中，又派龙飞虎代表中共代表团、刘恕代表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石西民代表《新华日报》，去南京交涉用房问题。他们到南京后，通过邵力子多次交涉，仍迟迟不得解决。到 4 月下旬，龙飞虎以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即将来京为由再次催促，才由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雷震出面，将梅园新村 30 号移交给周恩来往，对面的 17 号作代表团办公和宿舍。由国民参政会临时借给两辆军用小吉普车做交通工具。

1946 年 5 月 3 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代表邓颖超、秘书长齐燕铭以及中共中央重庆局（原南方局）主要负责人廖承志、钱瑛、王炳南、童陆生、章汉夫，宋平、章文晋和电台机要人员共十余人，乘马歇尔专机到南京。中共代表团代表陆定一亦于当天乘民航机到达。我和部分电台机要人员带上从美军借来的 400 瓦大电台于 15 日乘美军运输机到南京。董必武、李维汉等三十余人，因飞机发生故障，16 日才到。17 日，代表团顾问何思敬、李澄之等 20 余人，最后一批乘中航飞机也到京。大家一到南京，就立即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其余工作人员和家属，则分批乘船先后到南京。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有百把人，先后到了南京以后，两幢房子根本住不下。只有采取挤的办法。周恩来、邓颖超住 30 号的主房，一间办公室兼小会议室，一间卧室，算是最好的了。董必武一家四口，就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其他同志都挤得满满的，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后来，经周恩来、董必武决定，把隔壁的一幢小楼，以廖承志夫人经普椿名义，用 35 根金条（每根十两）买了下来。董老、李维汉、廖承志才得到稍宽的住室兼办公室。因工作开展，房子还不够，就采取“搭积木”办法，把车库、传达室以至大门上面的小平台都盖成房间。我是

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那里有空就挤在那里，曾搬过五次“家”。有一段时间和钱之光两人住一间小房，后来他的夫人刘昂从上海来，我没地方搬，就赖在那里给他夫妇守门。以后形势紧张，疏散了一批同志回延安，最后我才得到一间在门楼上搭起的“斗室”，已是很满意了。至于食堂是在 17 号的一块小空地盖起来的，大约有 20 平方米，是最大的一间，也就作为周恩来的记者招待会的会场了。上海国民党一直不肯给房子，是自己用金条顶租了马思南路（今思南路）一幢小花园洋楼作为“周恩来公馆”登记的，公开的代表团办事处和秘密的上海工委，设在这里。上海的《新华日报》筹备处和南京的《新华日报》办事处，都是我们自己设法租或买来的。

周恩来 5 月 10 日从汉口回南京后，一面为东北停战和中原停战进行紧张的谈判活动；一面抓机构的建立和人员分工，及时地有条不紊地开展全面工作。

在一次代表团成员和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根据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团对外代表党中央同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谈判，对内即是中共中央南京局（取消重庆局名义），统一领导谈判斗争、统战工作和秘密党的工作，由周恩来负总责。领导成员：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吴玉章兼四川省委书记，仍留重庆，领导《新华日报》和联系云南省工委、贵州党的组织。设立中共代表团重庆办事处，对外活动。叶剑英仍在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南京局领导上海工委、四川省委、湖南省工委、广东区党委、港澳工委等地方党组织。代表团和南京局是一个机构，对外称代表团办事处。主要的分工：

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副秘书长童小鹏、何成湘；

代表团办公厅主任钱之光、副主任重小鹏（下辖秘书处、行政处）；

代表团发言人，先后由范长江、梅益、王炳南担任；

南京局组织机构：

组织部长钱瑛；

宣传部长陆定一（先）、李维汉（后）；

外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副书记廖承志、王炳南（兼秘书长）；

地下党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副书记李维汉；

群众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邓颖超（包括职工、青年、妇女各组）；

财经委员会书记董必武，副书记钱之光，秘书长刘恕：

党派组组长齐燕铭，副组长宋黎；

军事组组长童陆生；

资料（情报）组组长吴克坚（先）、徐光霄（后）；

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宋平；

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先后由宋平、范长江、梅益担任；

第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钱之光。

上海工委（主管公开的统战工作、文化宣传工作。设在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即周公馆内）：

书记：华岗，副书记：章汉夫委员：华岗、章汉夫、刘宁一、潘梓年、夏衍、熊瑾玎、许涤新、冯乃超、陈家康；

候补委员：萧贤法、乔冠华、龚澎、胡绳、张铁生；

秘书长：刘恕（代）、萧贤法（先）、刘昂（后）；

下设：职工、青年、妇女、外事、经济各组；

上海代表团办事处发言人：陈家康；
周公馆馆长：祝华；
《群众》周刊杂志社社长：潘梓年，
主编：章汉夫；
《新华日报》上海办事处主任：徐迈进；
解放区救济总会驻沪办事处处长：伍云甫。

这时，宣传工作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多办几份报纸，宣传我们的主张，团结教育人民，争取同盟者，打击反动派。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即与周恩来、王若飞商定，立即派出一批同志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香港等地，筹备和复刊《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报刊。上海具有特殊的地位，决定先在上海设立《新华日报》总馆，待还都南京后，把总馆迁南京，南京、上海两地都出版《新华日报》，然后在其他地方逐步出版。

1945 年底，重庆组织“陪都新闻记者团”，到南京、上海参观访问，《新华日报》派徐迈进参加。周恩来即嘱咐他到上海后，先找地下党上海工委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张执一、梅益等，说明他来上海筹备出版《新华日报》。上海党组织非常支持，筹备工作开始进行。同时，周恩来从香港给在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会议的董必武汇款，订购了一架印报卷筒机，1946 年初已运到上海。

1946 年 2 月，周恩来亲自过问了《新华日报》上海版的筹备工作，派潘梓年带着他给上海市长钱大钧的亲笔信，来上海进行筹备工作。这封信全文如下：

慕尹市长勋鉴：

睽违数月，弛念时深，政协圆满成功，大局至堪庆幸，想革命旧游，定当同此欣喜。

兹有恳者，《新华日报》自始即随国府播迁，由宁而汉，由汉而渝；现国府还都在即，《新华日报》应追随东下。兹特派该杜社长潘梓年君先行来沪筹备出版事宜，并嘱趋奉候，藉聆教益，至祈不吝指示，俾得知所遵循，实为至幸。

耑此敬颂

公安！

弟　周恩来拜

二月二十一日

信中所述“革命旧游”，系指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钱大钧则是军事教官兼校本部参谋处长，信仰虽不同，毕竟是同事。

潘梓年到上海，即持信趋访钱大钧。钱大钧并不积极办理，而是例行公事地将信转给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这时政协会议闭幕才一个多月，蒋介石的“四项诺言”就包括言论出版自由，吴开先给周恩来复信还比较客气，说“执事来函一件，为《新华日报》登记事，嘱办理等因，一俟潘君梓年将申请登记书送来，当即提前办理。”可是当潘梓年按照规定送交申请书，吴开先先是束之高阁，继又找出种种理由借口推托。5 月 5 日，周恩来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和上海工委书记华岗专程从南京来上海，与新任的上海市长吴国桢交涉，吴国桢仍婉言拒绝《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

但《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依旧积极进行，报社办公地址也觅定了。吴开先以重庆已有《新华日报》为由，不让在上海再出版。

《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遇到挫折，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中共南京局即

决定先出版两份杂志，一份是英文的《新华周刊》，由龚澎任发行人，任务是向各国宣传我党对中国政局的立场态度，5 月 17 日出版了创刊号。另一份是《群众》杂志，它是 1938 年在汉口创刊的，领有国民党内政部的登记证，后来移到重庆出版。这时决定先在上海出版，由李维汉负责。李维汉不能到上海，由潘梓年任发行人，章汉夫等筹备《新华日报》的班子任编辑，并申请办理登记手续。上海市政府无理阻拦，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一方面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先行出版，造成既成事实。6 月 2 日，《群众》第 11 卷第 5 期在上海出版了。周恩来曾为这个杂志写社论，读者对它很欢迎，起先报摊也能公开出售。国民党对这两份刊物十分害怕，首先对《新华周刊》下毒手，6 月 4 日即下令查禁，《新华周刊》只出版了两期就夭折了。《群众》继续在艰苦中奋斗。

由于局势恶化，国民党把“言论自由”的遮羞布彻底撕掉了，出版《新华日报》上海版的事，竟惊动了蒋介石，他责令行政院长宋子文处理。宋子文以“极机密”快邮代电给了他在上海的亲信、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刘攻芸转告吴国桢称，奉蒋主席令，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持周恩来函，要求拨敌伪产业为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之用，如果中共果有此请求，要予以婉拒。这指的就是《新华日报》要求拨敌伪产业一事。这是要使《新华日报》在上海无立足之地，报纸当然就办不成了。蒋介石出来干预，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就更没有希望了。

《群众》杂志的日子越来越难过。9 月 2 日，上海市警察局无理搜查《群众》杂志社，并未搜出他们所想得到的机密材料。9 月 12 日，吴国桢约见潘梓年，声称要查禁《群众》杂志。第二天，上海市警察局通知潘梓年，禁止《群众》出版。潘梓年拒绝在禁令上签字，但杂志不得不转入地下继续出版，直到 1947 年 3 月 2 日，中共代表团即将全部撤退，才告停刊。但周恩来早有布置，1946 年 10 月，他就决定章汉夫、许涤新、乔冠华、龚澎等转到香港，筹备《群众》杂志在香港出版，1947 年 1 月，《群众》杂志就已出版了。

## 竭力扭转中原局势

周恩来到南京时，中原的局势十分严重。蒋介石以 30 万大军包围中原军区李先念、王震等部 6 万余人，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5 月 3 日，周恩来到达南京的当天晚上，不顾旅途疲劳，即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住处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除了阐明我方对东北问题的态度以外，着重指出要在南京重开谈判，首先应就停止中原内战达成协议，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内战。

第二天，周恩来即到宁海路 5 号访马歇尔。在东北问题上，马歇尔和蒋介石的态度基本一致，他希望东北为国民党军队所控制，以便成为同苏联对抗的基地；对于关内问题，他们两人的态度是有差别的，马歇尔还不愿意看到关内战争的全面爆发。使他的调停工作彻底失败，国此他主张制止中原战争。周恩来就利用他们之间的差别，抓紧对马歇尔进行工作。周恩来对马歇尔说，政府军队即将在 5 月 4 日至 9 日之间，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这是新的全面内战，我方将自卫反击。为制止进攻，希望政府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我中原部队转移问题。马歇尔赞同周恩来的建议，并表示他可以派北平军调部执行组美方代表白鲁德明天就由北平直飞汉口。这时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徐原是阎锡山的部下，和我们有点旧交谊。1937 年他的部队驻在南京，我们刚在南京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没有自己的电台，曾通过他用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驻南京办事处的电台和延安联系。抗战胜利后，我办事处从重庆迁南京，徐永昌又以军令部长的身份帮助我们解决船只问题。周恩来和他谈中原问题时，他同意派执行小组到中原军区视察。

5 日下午，周恩来和徐永昌飞抵汉口，与由北平飞来的白鲁德会合，将到我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视察。可是徐永昌说是有病不去了，派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作他的代表。6 日早上，大雨滂沱，三方代表、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共 60 多人，分乘四辆吉普和两辆卡车向武汉以北 1oo 多公里的宣化店进发。

由于连日大雨，山洪暴发，三方代表等一行人路过的黄陂县滠河，河水陡涨，冲断了公路桥梁。他们找来了当地的乡长、保长，却找不到群众帮忙。王天鸣和白鲁德商量后对周恩来说：“ 周先生，您看是否转回汉口，等水退了改日启程。 ”制止中原战争是火烧眉毛的事，周恩来焦灼万分，那容得拖延。他要随同他来的原黄陂县委书记任士舜找当地群众帮助过河。任士舜找来了几个人，周恩来对他们说：“ 乡亲们，我们要到宣化店和平谈判，你们有办法帮助我们过河吗？ ”一个老大爷成竹在胸地回答：“ 有办法。 ”他叫来十几个壮汉，带着绳子、杠子，把吉普车捆起来，壮汉们把坐在车上的王天鸣、白鲁德抬过河。其他美蒋方面的人员，也被农民背过河去。

周恩来走到河边，农民们争着要背他。他恳切他说：“ 乡亲们，你们为了争取和平，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我很感谢你们。二万五千里长征，跋山涉水，是我们共产党的本领，今天我们不能再麻烦你们了。说着他便脱下长裤，由警卫员扶着，赤脚淌过这条一百多米宽，水深及腰的河流。

当晚，他们在河口镇姚家大湾歇息。周恩来住在一个贫农家里，吃饭时，他到橱房揭开锅盖，看到农民锅里尽是野菜。他叫警卫员买来一些大米，倒入锅里，煮成野菜粥，和这家人同吃。老乡看到过意不去，周恩来却笑着说：“ 我们是一家人，就应该同吃一锅粥啊！ ”

8 日上午 11 时，他们到达宣化店，当地军民吹起唢呐，敲着锣鼓，前来欢迎。下车后，周恩来先领着国民党和美国代表到礼山中学休息，他自己匆匆赶到宣化店街上中原军区司令部，听取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同志的汇报，研究同国民党和美方代表谈判事宜。李先念铺开军用地图，向周恩来汇报部队的情况和双方的态势。周恩来仔细看着地图，不时用红蓝铅笔打了记号。听完汇报，周恩来说，和平已不可能，内战难以避免，中原部队要一面拖住对方，一面随时作好迎击对方突然进攻的准备。

下午，在礼山中学举行三方面的会谈。到会的还有中外记者 40 多人。会谈一开始，李先念愤慨地历数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的大量事实。国民党代表无法辩驳，只好说："李将军息怒，待兄弟返回汉口，呈禀上峰，再作处理。"白鲁德没有就具体问题发表意见，只用探询的口气问道："周先生，依你看，4 个月来停战和谈的成绩如何？"周恩来严肃地回答："4 个月来停战和谈应该说是有进展的，但是中原地区的形势很严重。"他对"严重"二字特别加重语气，并对王天鸣说："李先念司令员刚才揭露贵方军队破坏停战协定的一切行动都是事实，应该知道，中原战争如果爆发，必将宣告和平结束，成为全面战争的起点。我希望白鲁德先生和王先生要秉维护和平的精神，竭力做出有益的贡献。"

会谈后，周恩来不顾劳累，抓紧时间到附近军区机关、部队去慰问。他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干部战士们都高呼"毛主席万岁！"他肯定中原军区拖住了几十万蒋军，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和华北战场，祝大家取得更大的胜利！他的讲话，大大地鼓舞了干部战士的战斗信心。

当晚，军区举行欢迎晚会。李先念致欢迎词后，周恩来讲了话，他说：如果中原发生内战，很可能爆发全面性的内战，故应首先使这种局面安定下来。我在南京曾向马歇尔将军提议，欲解决东北问题，应先解决中原问题。马歇尔将军及徐永昌将军均已同意，故有此行。

晚会结束已是深夜，周恩来又同李先念等回到司令部，继续听取汇报。他赞扬中原军区指战员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他最关心的是部队的士气。军区领导人汇报说，生活虽然艰苦，绝大部分干部和战士士气高昂，坚决主张武装突围打出去。但也有极少数的同志害怕战争，幻想和平。周恩来反复指示，你们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幻想国民党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也同意采取突围的办法打出去，又嘱咐军区领导人，对幻想和平的，即使是极少数人，也必须认真抓紧进行教育。深夜了，周恩来仍旧和军区领导人一起，在油灯下仔细察看地图和军区制订的突围方案，对选定的路线以工地形、敌情等，都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和研究。对给养、伤病员等问题，也作了指示，一直工作到清晨。

9 日上午，三方代表回到汉口。第二天，周恩来即与徐永昌、白鲁德会谈，并在汉口杨森花园签订了停止中原战争的协议（又称汉口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双方指挥机构之指挥官，应即下达命令，制止本地区小规模战斗及步哨冲突。

二、凡违反原停战协定之部队移动应立即停止。

三、立即停止新堡垒及永久工事之建造。

四、双方指挥官应迅即于司令部及对峙部队单位内互派必需之联络军

官，以确定对峙部队之界限。

五、由中共中原军区运送伤病员 1000 名，眷属 100 人，以及照顾与医务人员 60 人至安阳。凡确定为政治犯或战俘，应于 6 月 1 日前释放之。

六、保证中共军队为整军而复员人员，由中共中原军区地区至其目的地途中及到达后之安全。

协议发至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武汉行营及中共中原军区司令部，要求立即转达命令该区双方指挥官遵照执行。

为贯彻协议的执行，三方同意增设军调部第 32 执行小组驻宣化店。当天，周恩来和徐永昌、白鲁德飞返南京。中原紧张局势得以暂时和缓，使中原军区赢得了准备突围的时间。

国民党签订停止中原战争的协议，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仍加紧对中原军区压缩包围圈，准备发起围攻。我党对国民党代表签订的协议，并没有存在幻想。周恩来回南京后即向各方面宣布协议，呼吁各方共同来监督协议的执行。中共中原局、中原军区利用时间加紧进行突围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曾屡电指示中原军区要“团结内部，准备艰苦斗争”，“巧妙避开敌之打击，分途突出包围圈”。6 月 23 日，中央接到中原军区即准备突围的报告后，立即回电：“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6 月 26 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及半个月前刚在汉口签订的停止中原战争的协议，以 30 万军队从信阳、罗山、商城、黄安等地分四路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从此开始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原军区即按原定计划，以第一纵队的第一旅作掩护牵制敌人外，主力分两路向西突围。由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中原局、军区机关及一部主力 1.5 万余人于 26 日晚从右路突围，于 29 日晚从信阳以南突破敌人封锁线，越过平汉路，向陕南、鄂西北前进。并创建根据地，于 8 月初组成鄂豫陕军区。其中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根据中央指示，继续向北挺进，于 8 月 31 日胜利返回陕甘宁解放区。由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率领的 1 万余人，同时从左路突围，于 7 月 1 日越过平汉路，进入以武当山为中心的地区，创建根据地，并于 8 月 27 日组成鄂西北军区。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一旅 7000 余人，完成任务后向东突围，于 7 月 20 日进入苏皖解放区。

中原军区部队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粉碎了蒋介石消灭我中原部队的阴谋，给了他发动全面内战的当头一棒！这是中原军区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指示的胜利，而周恩来为争取这个胜利也费了不知多少心血啊！

## 谋求东北和平

周恩来从宣化店回到南京后，东北局势又紧张起来，他就集中精力处理东北问题。

本来我们准备放弃长春，让国民党军队进驻，这是为谈判而做的让步。国民党不接受。5 月 12 日，蒋介石与马歇尔晤谈，一再表示中共军队如下撤出长春，他决不答应或同意任何解决办法，并进一步提出必须完全控制东北，否则不进行任何谈判。他要求马歇尔不要枉费心机和中共讨论东北问题，态度十分蛮横。

5 月 13 日，周恩来往访马歇尔。马歇尔正提出要中共军队撤出长春，国民党军队也暂勿进驻，在长春设立军调部的前进指挥所，这样可以就军事和政治问题一并谈判。对于蒋介石出尔反尔和马歇尔的偏袒态度，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同恩来提出三人小组应积极开展工作。马歇尔无可奈何地哀叹，现在的局势三人小组无法召开会议，三人会议和执行部威信下降，这是中国的悲剧。第二天，周恩来再访马歇尔。马歇尔表示，要改变蒋介石这一企图是不可能的。

代表团电告中共中央，说明在东北问题上，马、蒋双方意见已相去不远，在关内问题上，美我双方关系也日趋对立，形势真正好转绝无可能，必须动员群众，以待决战。15 日中央复电指出：同意代表团的分析和对策，但又指出：一、停战一星期；二、长春国共双方不驻兵。对马歇尔意见不作正面拒绝，也不要一口答应，可以进行试探性商谈，准备再作让步。当时我东北部队经过 32 天的激烈战斗后，于 5 月 19 日撤出四平街，5 月 22 日，宣布自动放弃长春，以求得进行谈判和实现东北和平。

但是我军撤出长春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即进入长春。当天下午，蒋介石、宋美龄飞抵沈阳。原来蒋介石表示，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后再谈谈判问题，长春被他们占领了，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谈判姿态，由宋美龄致函马歇尔，提出所谓“与中共达成谅解的三十条件”：

一、停战谈判依其精神及文字绝对实行（1 月 10 日协定）；

二、复员及整军应按计划实施（2 月 25 日协定）；

三、交通之恢复应予实施（2 月 5 日协定）；

马歇尔把这封信给了周恩来看后，周表示我方同意三个条件。其实这是蒋介石在故弄玄虚，这三条是双方早已达成的协议，我们自无异议，具体问题却没有提出。25 日，我方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厉生以及政协秘书长雷震在邵力子公馆进行来南京后的第一次谈判，主要谈东北问题。双方分歧很大，谈判没有取得结果。

蒋介石在离开南京之前，节外生枝提出所谓执行小组和高级参谋小组意见不一致而陷入僵局时，美方人员有“决定权以及执行和解释之权”。这是个丧权辱国的做法，我方严正提出反对。这也成了谈判的一个大障碍，并成为双方争论的一大焦点。

实际上蒋介石提出三个条件，并非为了谈判，而是在欺骗人民。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蒋介石踌躇满志，得寸进尺，指挥着军队继续向我军进攻。宋美龄再次从沈阳给马歇尔写信，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要马歇尔与国民党一致采取强硬态度，迫使中共继续让步。这使马歇尔也感到为难，他要求蒋介石发布命令停止进攻，并允许军调部前进指挥所进入长春。蒋介石回电只同

意前进指挥所进入长春，对停止进攻一事不作正面回答。

针对这个情况，周恩来于 6 月 3 日同马歇尔会谈，指出蒋介石有意把战争拖长，以引起全国的破裂。他还揭露国民党准备组成一个容纳除中共以外的合党派临时政府的计划，声明没有中共参加的政府在中国不能说是民主政府。他批评美国的两面政策，一面表示帮助中国实现和平民主，一面仍以租借法案援助国民党，帮助它运兵到东北、华北打内战。他指出，停战谈判变成了争论美国“最后决定权”问题，这是蒋介石在转移目标，国民党正用各种方法欺骗美国，把美国推到与中共对立的地位。周恩来一针见血提出这些尖锐的问题，马歇尔很难驳倒，只表示待蒋介石回南京后商谈停战问题。

6 月 3 日，蒋介石回到南京，6 月 4 日，马歇尔即与蒋介石长谈，希望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这时国民党军队正需要时间为新的行动作准备，因此蒋介石同意停止东北军事行动 7 天。马歇尔认为 7 天的时间大短，提出停战 10 天。他把与蒋介石商谈的情况告诉周恩来，同恩来认为 10 天的时间也大短，难于完成和谈任务。最后蒋介石同意停战 15 天，并决定由军调部派执行小组进入长春。

当时中共代表团已看出蒋介石毫无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诚意，所谓停战 15 天，无非是缓兵之计。但只要有谈判的机会，我们仍不放弃谈判。6 月 6 日，陆定一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指出，我们下放弃任何机会求得和平的实现，中共同意停战 15 天，并愿尽一切努力谋求谈判成功，希望国民党方面能具最大诚意，使过去一切协议见诸实施，使暂时休战成为长期休战，永远停止进攻。可是国民党方面还在积极部署战争，好战分子大肆叫嚣，国民党中某些上层人物对此也很不满。

6 月 7 日，周恩来、陆定一乘马歇尔座机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中央立即举行会议，讨论停战 15 天的对策。中央决定目前基本方针是在不丧失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竭力争取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陆宁一留在延安，周恩来于 9 日飞抵南京，第二天即访马歇尔，说明中共中央的方针是争取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并提出应以 3 月 27 日调处东北冲突协议为基础进行商谈。马歇尔没有表示反对。周恩来强调，国民党接收东北主权须经协商，同时提醒马歇尔说，政府正在开军事、行政、粮食会议，准备 15 天后大打，目前战争危险日益严重，迫使我们不能不抵抗。

这时第三方面也频繁和国共双方接触，希望停战 15 天成为永久的停战。但他们要求我方对“最后决定权”作出让步，周恩来没有同意。

6 月 17 日，蒋介石又玩弄花招，突然对整军方案提出所谓补充办法，规定东北中共军队只能驻扎齐齐哈尔、海兰泡和延吉三地，让出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安东（今丹东）、白城子；热河、察哈尔两省我军也应退出；山东应退出烟台、威海卫；东北中共只准驻军三十师；华北中共应减少两个师，马歇尔把蒋介石这个方案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异常气愤他说，蒋介石真是逼人太甚，简直要使谈判不能进行，这个方案我们无法接受。代表团向中央请示，中央指示这个方案绝对不能接受，并指出应提出针锋相对的方案，如果蒋介石要我们减少东北、华北的驻军，则我应要求国民党在东北、华北的驻军和我们比例相等，华中、华南国民党军队可以增加。蒋介石要求我们退出哈尔滨、牡丹江等地，我们则要求他们退出大同、石家庄、新乡、济南等地。对蒋介石关于东北问题，停战问题，最后决定权问题的无理要求，应予揭露，使群众看到蒋的无理，站到我们一边来。

马歇尔也感到蒋介石的条件太苛刻，他向徐永昌、俞大维（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探询蒋介石可否撤销这些条件，徐永昌为蒋介石辩解。马歇尔说，如果共产党同意这些条件，他们就完全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些条件共产党是不可能接受的。

和谈根本无法进行，而停战 15 天的期限已到。6 月 21 日，马歇尔和蒋介石商谈延长停战期限，蒋同意再延长 8 天，到 6 月 30 日中午止，但又提出两点附加要求：一、胶济铁路沿线中共军队也必须于 8 月 1 日前撤退到铁路两侧 30 公里以外地区；二、三人小组和军调部的一致表决程序必须于 6 月 30 日以前修订。第一点是要我方军队从山东一切重要城市退出；第二点是要三人小组和军调部各个执行小组中，美方人员有最后决定权。这样只要美蒋双方一致，可以不顾我们的意见，作出一切决定，我们必须俯首听命。这种条件我们怎能接受呢？其实蒋介石心里也明白，这些条件中共是不会接受的，他的目的在于他提出和谈条件，中共不接受，这就可以把和谈无法进行的责任推给中共。周恩来用文件的形式给予答复，指出蒋介石提出这个方案完全出入意外，这是企图将中共军队在整军期间排除出大城市和铁路沿线，以便消灭之。坚持美方代表的最后决定权，则是保证这个方案的实现。这种情况我方无从考虑。文件送政协国民党代表转交蒋介石，也以同样的文本送交马歇尔、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

当时全国人民也已看到蒋介石的顽固态度，对时局十分担心。6 月 23 日，上海数万群众为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在北火车站广场举行集会，欢送人民代表马叙伦、阎宝航、赘延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雷洁琼、吴耀宗，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等赴南京请愿。代表们到达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毒打。马叙伦、阎主航、雷洁琼、陈震中被打成重伤。民盟派赴车站迎接的人员叶笃义以及《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晚报》记者浦熙修也被打成重伤。国民党置若罔闻。经民盟和我方向孙科、邵力子、李济深、冯玉祥以及马歇尔呼吁，直到午夜 12 时，才在宪兵的维护下，将受伤人员送中央医院。这一天办事处非常紧张，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滕代远等，在深夜 1 时赶到中央医院慰问受伤人员。周恩来握着马叙伦的手对受伤的人说：“ 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郭沫若也去医院慰问。25 日，毛泽东、朱德致电马叙伦等表示慰问。

25 日，代表团得悉，国民党特务要利用苏北逃亡地主及流氓，以所谓“ 苏北难民代表 ”名义，扬言 26 日要到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和民盟总部“ 请愿 ”，对我们采取暴力行动。当晚，周恩来、董必武立即开会研究对策。会上，有个别同志主张组织力量抵抗，大家认为特务和亡命之徒是蛮不讲理的，不能吃眼前亏，应避免冲突。我们把这件事告诉民盟朋友，并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要他们保护我们机关和人员的安全。当晚即作了具体布置，制定了第二天分组出去的名单，把不要的文件烧毁，机要文件和密码，则分别转移至可靠朋友家里或隐藏好。26 日早饭后，办事处只留少数人看守，大部分人分头去游玄武湖和灵谷寺。周恩来上午去莫愁湖，下午拜访马歇尔，就整军方案和中原部队从湖北撤退的问题进行协商。董必武也暂时避开，到一个旅馆休息。李维汉白天往访郭沫若，晚上与滕代远在梅园新村向民盟介绍中共对整军方案的对策。上午 9 时，有将近 500 人在国府路东方中学集会，叫嚷“ 反对共产党搞上改 ”、“ 打倒共产党 ”等反动口号。国民党因害怕出事故，派了一些军警在梅园新村和兰家庄民盟总部“ 保护 ”。一群外国记者闻讯带来照像

机和小型电影摄影机，准备拍摄重要新闻。大概是国民党怕控制不了局势，造成严重后果。不仅要负破坏和谈之责，而且会在国内外声名狼藉，这群“ 难民 ” 集会后便散开，没有来捣乱。

也就是在这一天，国民党 30 万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原军区第五师主力向西突围，于 29 日突破封锁线，越过平汉路。中原战火引起了全面内战的爆发，这是周恩来早就预料到了的。

## 决不屈服于内战压力

1946 年 7 月，国民党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和谈实际上已经破裂，但是谁也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都不宣布停止谈判。在国民党方面，是利用谈判作烟幕，来掩盖内战的扩大；在我们方面，主要是通过和谈来揭露国民党和美国，教育群众，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这一点马歇尔也看出来了，他曾经说过，中共继续参加谈判，目的在于宣传。

7 月 2 日，周恩来和蒋介石会晤，蒋咄咄逼人，无理要求中共接受他的整军方案补充办法。周恩来怎能接受呢，他说目前形势严重，必须通过谈判才能解决，军事问题由三人会议解决，政治问题由政协综合小组解决。蒋介石又提出，先就目前任务达成协议，然后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这就是说，中共先接受他在军事上那些无理要求，然后开会解决政治问题。他还违反政协决议，强调我军必须在政府改组前从苏北撤退，行政人员和保安队也不能留，其他问题可以讨论。这种条件我们怎能接受呢？这次会晤除了由蒋介石指定陈诚、王世杰、邵力子继续和我方谈判以外，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就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会晤的第二天，国民党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义，宣布决定于本年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事先既没有和我方商量，也不向第三方面打招呼，片面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和某些第三方面人士，都把它看成是国民党要关闭和谈大门的一个信号。中共代表团发表声明指出：我们不受一党执政机关的决定的任何约束。民盟也就这件事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7 月上旬，国共双方代表举行了四次会议，主要讨论苏北问题，国民党非要我们撤出不可，我方驳斥他们的无理要求，会议只是一番争吵。中旬，国民党采取行动了，调动 50 万军队进攻苏北解放区，使内战空前扩大。同时，对民主人士下了毒手，特务机关在昆明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国民党这种行径，连他们上层某些较开明的人士也反对。邵力子曾就李闻事件发表谈话说，这是中国的大不幸，是一部分人最愚蠢的无耻行为。

当周恩来获悉李、闻被暗杀的消息后，气愤万分。他称李公朴“是一个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战士”，并和董必武等电唁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公朴的牺牲必然激起全国人民反法西斯暴行及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潮，敝代表团誓为后援”。17 日，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指出中国目前最严重的，一是内战、二是政治暗杀。内战已从局部向全面发展。昆明两次政治暗杀，是从根本动摇全国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当局合作的大局。他和董必武等致电闻一多夫人高真说：“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消灭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

这时著名民主战士陶行知患病，周恩来要上海工委劝陶休息，话未传到，得知陶行知脑溢血，他即和邓颖超赶到医院探望，陶已去世了，周恩来握着陶行知尚有余温的手，悲痛万分。他随即嘱咐潘汉年、伍云甫：“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还致电中共中央，说“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进攻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常常以“返乡团”打头阵，这是一些地方的地主武装，也掺杂有其他成份的人，这些人许多是在土改中被斗跑出来的，对

苏北的民主政权怀有仇恨。我们在土改中确有过火行为，影响到第三方面人士对我们的看法。早在 5 月初，周恩来就打电报给中央提出：最近上海、南京、重庆等地接到许多关于苏北清算斗争的信件，众口一词，提出过火。来信者多与我方原有好感，故不能一律以斗争初期不可免的判断答之。建议可否在苏北之斗争择较温和的办法，以便争取上层中产者阶级。直到 7 月 19 日，中央才打来电报给周恩来、董必武称，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才能为国家工业化、民主化打下巩固基础。除敌伪大汉奸土地外，一律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先生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的办法解决之。过火行为是个别现象，是难免的，请向民盟说明中共的土改政策。苏北土改并未都按中央精神来做，树敌过多，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7 月中旬，周恩来辽就救济物资和黄河堵口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交涉。二次大战后，为了救济难民，医治战争创伤，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由美国操纵）。国民政府也相应成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它们对解放区难民的救济是很不公平的。周恩来专程由南京到上海，向联总、行总机关交涉。他指出：解放区难民占全国难民五分之三，所获得的救济物资只有 4367 吨，占联总运华救济物资 66 万吨的千分之六强，这种现象极不合理。他提出，中共应有代表出席或列席将于 10 月 17 日举行的联总远东区委员会，派员参加行总各级机关工作。黄河堵口问题是抗战初期蒋介石下令在黄河花园口决堤，企图阻止日军前进，结果日军未受阻，而使黄河改道，流经淮河入海，使豫东泛滥成灾，造成大片黄泛区，人民遭受巨大损失。抗战胜利后，他们准备堵口复堤。但黄河流入故道，将使下游解放区造成水患。我方提出应做好下游准备工作而后堵口，而且工程分配和人员待遇也应解决。这些问题联总、行总都没有具体答复。事关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周恩来非常重视。7 月 14 日，他偕同联总上海分署署长普莱斯等人飞开封，视察黄河堵口工程实况。在开封，周恩来听取中共冀鲁豫区党委负责人张空、段君毅等人的汇报，指示他们在谈判具体问题时应采取的策略，并要他们转告刘伯承、邓小平，从整个形势看，靠谈判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要靠自卫战争，迎击国民党的进攻。21 日，周恩来回到上海，就堵口工程问题与行总署长蒋廷黻及联总人员会谈，获得如下协议：拨款救济居民；由三方组成委员会，视灾情合理拨款。这个问题的解决，黄河故道内人民可按计划迁移。当时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主席是董必武，秘书长伍云甫。周恩来、董必武指派伍云甫为中共参加行总工作的代表。解放区救济总会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由解总秘书长伍云甫任处长。

7 月初，杜鲁门任命司徒雷登力驻华大使，美方的调停人除马歇尔外，增加了司徒雷登。司徒出生在中国，长期居住中国，自称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他和马歇尔的立场、态度完全一样，即是调停人，却又偏袒国民党。

7 月下旬，周恩来分别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会谈，提出解决目前形势的两个办法：一、实行全面长期无条件的停战；二、改组政府，按照政协原则处理地方行政问题。二者可以平行进行。马歇尔飞庐山将周恩来的意见转告蒋介石。8 月 1 日和 3 日，周恩来又两次会见马歇尔，就阻止内战蔓延提出三项办法：一、立即宣布在全国停战；二、派执行小组到冲突最严重的地区去；三、军事问题同政治问题一道解决。如果这三个办法都被拒绝，证明政府要扩大内战。他还指出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和向山东解放区全面进攻是空前严重的事件。马歇尔承认军事冲突的严重性，但他提出组织联合政府作为

解决问题的第一个步骤。南辕而北辙，会谈没有任何结果。

司徒雷登参加调停后，经过马歇尔同意，向蒋介石建议组织一个小型的、非正式的小组，国共双方代表各二名，连他共五名，以他为主席，讨论政府改组问题。这个小组后来被称为五人小组，成立这个小组是有利于国民党的，因为当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它占领四平街、长春之后，又向我中原、苏北解放区发动进攻，这时讨论政府改组问题，势必压服我们接受他们的条件。这个建议立即被蒋介石所接受。蒋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军事优势来取得政治优势，如果我们参加改组政府问题的谈判，非接受他们的条件不可；如果不愿意谈判，则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蒋介石胃口太大，提出先决条件是中共军队要在 1—6 个星期中从苏北等三个地区撤退，然后他才宣布停战。周恩来已经洞察蒋介石的诡计，当司徒雷登把他的建议和蒋介石的态度告诉周恩来时，周立即表示我方绝不能接受，国民党没有解决分歧的意向，这个建议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他还严肃地对司徒说，蒋介石如此无理，应负内战责任。美国实际上驻兵助械借款，也不能推卸参加中国内战的责任，希望他们按照杜鲁门总统的声明进行有效的调解。会谈五个小时，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会后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蒋为大打，必先多方要求，而美亦有可能放手让蒋大打一阵再谈。如此，我须一面在准备大打的基础上，打两三月再谈，也可能谈不成，而全面大打下去。”另一面在大打的情况下，“要准备蒋把问题提到联合国”。8 日中共中央复电说：“蒋的五条绝对不能接受”，“你的答复很对……各解放区正在动员全力粉碎蒋的进攻”。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看到国共双方所提条件距离很大，难于取得一致意见，在 10 日发表联合声明，说停战问题“似无获得解决可能”。实际上这是承认他们的调停失败，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

这时周恩来仍没有放弃谈判斗争，同时又在考虑如何在战场上对付国民党。这年夏天，他在南京秘密接见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张克侠，听取他的汇报，指示他多做蒋军高级将领和带兵人的工作，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回击蒋军，而且要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8 月 20 日，他致电中共中央转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说：据张克侠反映，原西北军冯治安、刘汝明部等不愿内战，但现在又不敢独立，在蒋形势恶化的时候，有举义的可能。建议我以一小部兵力牵制，而另以大力向国方空虚和薄弱的地方突击，如此必然得手。

当时我们对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虽然有所批评，但还是把他们作为“调人”看待。对美国也不是一概反对，而是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策略和态度。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非常注意，给南京代表团发了电报指出：我们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仍应尖锐批评，并以各种方式控诉美帝分子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和把中国殖民地化的罪行，但为了争取更多美国人民与进步官员对我们了解与同情，在一切宣传中必须严格掌握美国的政府和人民（后者为一般地和一贯地同情与支持我们的民主势力）之间的区别，美国政府人员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与民主分子之间的区别，美国政府人员中决定政策者与不决定政策者之间的区别，美国政府今天的政策与明天可能改变的政策之间的区别，甚至同一个人（如杜鲁门、马歇尔）今天与明天态度的区别，同一个人同一个机关所发的一篇声明或谈话中不同语句的区别，不要笼统反对，更不要笼统反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后，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电报指出：过去调处失败，是由于美国援蒋错误政策的必然结果，对美错误政策可彻底清

算与批判，但对马、司个人，仍取某些保留态度。我们并不想和马、司闹翻。中央来电和周恩来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仍继续与马歇尔、司徒雷登接触。

7 月 10 日以来，国共双方代表没有接触，谈判都是通过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转达。8 月 15 日，周恩来同马歇尔会晤，明确指出蒋介石的五个条件是内战独裁的路线，他打算八、九两月大打，所以要停战就现在停，否则必定大打。马歇尔又飞庐山找蒋介石谈。19 日，马歇尔向周恩来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蒋认为他没有必要再发布停战令，现在需要的是中共停战。这纯粹是颠倒黑白。

这时司徒雷登仍热衷于他的改组政府建议。他于 21 日和周恩来会谈，又提出先进行改组政府的谈判。周恩来反问，中共要求在谈判前弄清三个问题；谈好改组政府之后，国民党能否保证放弃五条（即蒋介石的五个条件）？能否立即停战和根据政协决议商谈成立国府委员会？假如这三条没有保证，谈判仅仅便利于国民党拖延时间。司徒询问马歇尔后，告诉周恩来，马歇尔对以上问题不敢断定。

第二天，周恩来再与司徒会谈，周恩来得知俞大维表示五条暂时不谈，司徒又提出非正式五人小组先开会谈改组国民政府问题。周恩来表示，最好一面开非正式小组会议，一面谈停战。司徒雷登没有具体答复。

28 日，周恩来同司徒雷登会谈时，得知蒋介石已要宋子文派两个人参加非正式小组会议。为了让人民看到蒋介石的阴谋，周恩来于 29 日会见马歇尔，表示同意成立非正式五人小组。9 月 3 日，国民党方面出席五人小组会代表吴铁城、张厉生来访，周恩来和董必武接见他们。周恩来指出：政府方面如何保证停战？吴、张回答：只奉令谈改组政府，军事问题未在权限以内。周、董表示，不保证停战，改组政府无从谈起。第一次非正式接触，就在停战问题上卡了壳，注定了五人小组会议难以正式开会。这时中共中央打来电报指出：蒋军已占我 20 余县，其中有承德、淄博、台儿庄等要地，因此必须开始考虑此种要求：一、蒋军退出被占领之解放区；二、蒋军从东北、华北、华中、西北撤退二分之一，开往华南各省，方能保证停战之后下打，否则无保证。电报还说：“我军现在开始动员起来，决心将蒋军驱出解放区。”

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五人小组自然就搁浅了。

这时蒋介石大耍其两面手法，同意召开五人小组会是幌子，背后正策划把第三方面某些人拉入国民政府，撇开共产党。他对马歇尔说，共产党的目标是推翻政府取得政权，他不相信政府发布停战令后中共会停战。并向马歇尔试探，如果国民政府包括少数党代表和其他有名望人士而加以扩大，不包括共产党，美国是否会把这看成是走向联合政府的真诚行动？老谋深算的马歇尔比蒋介石高明，他看到全面内战对蒋介石国民党不利，回答说，中国漫长的交通线和边境山地，有利于共产党运用游击战术，战争大打起来，将导致国家经济崩溃和政府的垮台。他告诫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委员中必须包括共产党，实行政府真正的改组。一向过高估计自力、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蒋介石，听不进马歇尔的净言，一意孤行地要在军事上压倒中共，而后在政治上压倒中共，继续调兵遣将扩大苏北和山东的内战，同时策划攻占张家口和延安。

蒋介石这个方针是瞒不过周恩来的，他针锋相对地进行统战工作，在南京和上海同民主人士广泛接触，说明中共希望停战，蒋介石如自行改组政府，召开国大，那是分裂行为。美方仍助蒋内战，不撤兵停助，我即宣布美方调

处失败，执行部失去效力。许多民主人士同意我方的态度和政策。周恩来多次和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谭平山、柳亚子、黄炎培、章怕钧、罗隆基、章乃器、周建人、梁漱俱、许广平、沙千里、吏良、包达三以及青年党、民社党的人士会晤。罗隆基、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都表示绝不参加分裂的国大，张君劢表现动摇。周、章商定由章伯钧同张君劢谈，主张民盟应采取一致行动。民盟这个第三方面最大的党派，蒋介石也争取不到。

内战的扩大，并没有使蒋介石国民党占到多少便宜。他们直接向解放区进攻的正规军共 151 个旅，这是他们所能调动到前线的最高限度。从 7 月 13 日到 8 月 21 日，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热河和胶济线除外，我们已歼灭其 10 个旅，蒋介石占领我们一些城市，有生力量的损失却很严重，代价很大。

8、9 月间，马歇尔八上庐山和蒋介石密谈，除担任翻译的宋美龄外，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些什么。谈判中我方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仍提出我方要参加政府，并交出国大代表名单。周恩来提出召开五人小组会议讨论改组政府问题，首先必须解决中共委员九名民盟委员五名或中共委员八名民盟委员六名，召开才有意义。我方要求召开三人会议讨论停战问题，又遭国民党反对。9 月 19 日，周恩来在上海接见联合社记者时表示，本人暂时退出南京政治谈判，不与政府和美国代表进行无意义的磋商，除了蒋主席同意召开三人会议，本人将不返南京。

9 月间，我们已经看到和谈没有希望了，开始作撤退的准备。首先要解决经济问题。抗战初期，我们就在香港、上海、重庆办了几个公司，经营棉纱、布匹和土特产。抗战后经常从烟台运海产、名酒等到上海销售，也从解放区带来法币和黄金，这样经费就没有问题了。这时为了撤退的事，南京办事处电召连贯从香港来上海，周恩来对他说，有些民主人士、文艺界人士和我们的干部，将转移去香港等地。这些人中能教书的就教书，能办报的就办报，能做别的事情的，就帮他们找社会职业。他还介绍连贯与沈钧儒、郭沫若等认识，以便他们到香港时予以接待。后来因为干部到香港的逐渐增多，还成立了香港工委，由章汉夫任书记，连贯任副书记。局势恶化后，在上海工作的冯乃超、夏衍、许涤新、萧贤法、乔冠华、龚澎等都先向香港转移了。

9 月 29 日，国民党军队进攻怀来，打了五天，经我军反击才撤退，这是进攻张家口的重要行动，也是蒋介石决心和谈破裂的明显表现。9 月 30 日，中共代表团写信给蒋介石，声称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和谈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一切后果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10 月 1 日下午，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有七、八十人到会。周恩来说，政府使用 9 个军的兵力，由冀、热、绥三路向张家口进攻，中共不能不认力政府业已最后决心使和谈破裂。要在内战炮火中召开国大，不仅中共不能参加，政协中的其他民主分子也无法参加，这种国大势必成为分裂之国大无疑。中共决不屈服于内战的压力。

这时马歇尔就五人小组与三人小组会议同时召开的可能性征求董必武的意见。董必武问：政府是否有明确的态度？马歇尔说，蒋介石没有明确答复，只说要同参谋人员商讨后把决定告诉他。董必武把这个消息告诉在上海的周恩来。周给马歇尔一份备忘录，强调停止进攻张家口是中共同时参加两个会议的先决条件。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国民党一方面进攻张家口，另

一方面又要开会谈判，这种会议能有什么效果呢？但马歇尔看到这份备忘录，当场发了脾气，表示双方的行动方针他都不同意，恼火他说，一系列指责反指责，建议反建议，使他很难充当调人。他也给蒋介石一份备忘录，指责政府以武力解决基本分歧的政策，又指责我方无意以真诚的态度合作，要分裂政府，夺取政权。最后他说，除非觅致协议基础，否则他将向杜鲁门总统提出调他回国。

马歇尔的备忘录由司徒雷登转交蒋介石。蒋介石还要利用谈判来掩盖他的军事进攻，非拖住这个“调人”不可。10 月 2 日，他给马歇尔一份备忘录，作出“让步”姿态，说在国府委员中中共八名、民盟四名外，无党派中一名委员可由中共推荐；迅速规定 18 个师的驻地，并按照规定进入驻地；双方就这两个问题达成协议，同意召开三人会议。对进攻张家口问题却只字不提，周恩来看出蒋介石无非是以“让步”来安抚马歇尔；同时，企图以三人会议使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方合法化。两个条件我们都不能接受。周恩来再次送去备忘录表示这个态度。蒋介石立即和马歇尔会谈，要求他不能停止调停，但又坚持不能停止进攻张家口。马歇尔看到蒋介石没有真正让步，表示一定要向杜鲁门提议调他回国。

马歇尔果真致电杜鲁门，电报由美国国务院转交。当司徒雷登把这个消息转告蒋介石时，蒋慌了手脚，对司徒雷登说，他愿意停止进攻张家口五天。马歇尔又电告美国国务院电报暂缓交给杜鲁门。

10 月 6 日，司徒雷登同王炳南会谈，转告蒋介石已同意三个问题：一、停止进攻张家口 10 天；二、10 天内由美方组织小组监督停止冲突；三、在 10 天中依照蒋介石在 10 月 2 日备忘录中所提两项条件开会讨论，司徒又通过梁漱溟出面邀请周恩来回南京。王炳南向周恩来汇报上述情况，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同志商量，觉得蒋介石并无诚意真正要解决问题，回南京也是徒劳，即告诉王炳南口头答复司徒雷登两点意见：一、停战不应限定日期；二、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会议不应只讨论蒋介石提出的两项条件。并转告司徒雷登，他暂时不回南京。

王炳南向司徒雷登转达周恩来的口头答复后，司徒雷登大感失望，立即去找马歇尔商谈，并发表联合声明，把 10 月 1 日到 8 日谈判的具体情况公布出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也发表谈话，说蒋主席允许停止进攻张垣 10 天，为中共所拒绝，把责任推给我方。这对我们是不利的，不明真相的人会以为是中共不愿意谈判。这时第三方面人士出来斡旋，梁漱溟担心我们陷于被动，对董必武说，恩来先生住在上海，极易引起误会，想赴上海劝说他来宁。董必武表示赞同，并把这个情况告诉在上海的周恩来。

马歇尔也很着急，决定亲自出马，于 10 月 9 日到上海邀请周恩来回南京。马、周会晤时，周恩来对马歇尔说，只要国民党停止进攻张家口，并撤回原来驻地，中共即同意参加三人会议。五人会议或政协综合小组会议。马歇尔无法替蒋介石作出答复，会谈没有取得成果。

就在 10 月 9 日晚上，蒋介石发表国庆讲话，竟说什么政府对于阻挠统一、企图分裂的叛变，自下能熟视无睹。只要共产党能停止军事行动，不再攻击国军，则国军可立即发布停止冲突的命令。明明是国民党军队在进攻张家口，包围苏北、山东我军，却说是中共军队在“攻击国军”，真是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

和谈的前景更加黯淡。

# 继续为国内和平奔走（下）

## 死马当活马医

第三方面人士对时局深为优虑，民盟朋友希望双方让步，实现和平。也有人担心我们打不赢。连日来，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励、郭沫若、左舜生、陈启天、钱新之等人，在上海集会决定，分访孙科、周恩来后，全体赴宁，促进谈判的开展。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已自感无能为力，也希望第三方面提供有效办法。10 月 10 日和 11 日，第三方面在沪代表 9 人，同访孙科，提出政府军队应无限期停止进攻张家口，按政协决议和程序办法召开综合小组会议，并商定孙科于 12 日赴南京。他们也访晤周恩来，希望他回南京。周恩来表示，他们对政府所提的建议正是中共的一贯主张，愿与各位代表共同努力。第三方面代表决定于 13 日赴南京。这时梁漱溟从南京来上海，向第三方面代表报告在宁与各方面接触的情况，代表们决定提前于 12 日飞南京。梁漱溟也访晤周恩来，陈述南京情况。周恩来是冷静的，没有被一些假象所迷惑。他对梁漱溟明确表示，国民党如有诚意恢复和谈，必须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并将部队撤回原防，否则中共不参加任何谈判。

可是，就在 10 月 11 日这一天，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张家口，蒋介石得意忘形。当晚 8 时，由国民政府下令国民大会如期于 11 月 12 日召开。

第三方面代表中许多人，对国民党的行径十分恼怒。梁漱溟 11 日夜车离沪，12 日晨到达南京，看到报纸上刊登国民党攻占张家口的消息，大夫所望，并向记者们愤愤他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在上海的民盟代表在张君励家中紧急集会，取消今日晋京的决定。

这时，国民党又一次大耍其两面手法，一方面在军事上大打，另一方面煞有介事地派人大肆为和谈奔走呼号。他们想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时候如期召开国大，中共如不参加，就拉第三方面参加，孤立中共，并把破坏和谈的责任推给中共。10 同 13 日，吴铁城、王世杰、邵力子、张厉生联名宴请梁漱溟、李璜，请他们转告在上海的第三方面代表，政府希望他们来宁继续为和平作出努力。

10 月 14 日，蒋介石召集孙科、吴铁城、邵力子等商讨对策。会上孙科报告他在上海和第三方面接触的情况。会议提出一个包括避免冲突、整军、改组政府等问题的方案，可谓面面俱到了。会后孙科发表谈话，表示要为打开和谈僵局而努力。又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民盟代表，说明这个方案和国民党的态度，希望他们转告周恩来。同时说，政府将派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来上海与第三方面人士商谈。

15 日一早，雷震和莫德惠到上海，先后与民盟、青年党代表会商。民盟代表还是寄予希望，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励到“周公馆”访周恩来，转达国民党的方案和继续谈判的意见。周恩来看透国民党纯粹是在玩弄权术，对这个方案始终不置一语，但对民盟的朋友还是热情相待。朋友们的幻想没有破灭，连忙在张君励家中开会，将协商一致的两点意见告诉雷震：一、政府须切实表示愿意停战的诚意；二、应派更高一级的官员来沪，进一步表明态度。

雷震回到南京，向蒋介石和孙科汇报。蒋介石已与马歇尔、司徒雷登研究了一个更为详细具体的谈判条件，用蒋介石的名义发表声明，供同时召开的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会议讨论。这个声明于 16 日公布。共八条，内容包括恢复交通、军事、改组政府、地方政权、宪法草案等。这个貌似公九的条件，实际上只有利于国民党，比如停战时“共军与国军暂驻现地”，即要我方承认 1 月 13 日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军队占领解放区大片土地的既成事实，再如它提出所谓“地方政权”问题，这原是我方针对苏北地方政权问题提出的，这时苏北已为国民党军队占领，地方政权已不存在问题，蒋介石却无的放矢地提出来讨论。而中共要同意这些条件后，蒋介石才下令停止军事冲突。

周恩来把蒋介石的八条和第三方面力促重开谈判的情况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八条我们不能接受，但要给第三方面以面子，以免这些朋友对我们误解。中共中央于 17 日回电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10 月间，我方知道和谈即将破裂，在南京、上海的日子不多了，加速撤退了人员。这时国民党对我们的监视更加严密，连周恩来也被盯梢。10 月 16 日，周恩来去外白渡桥苏联领事馆，汽车一出门，特务的车子立即跟上。副官何谦发现这一情况，车子绕了几条马路，仍没有把尾巴甩掉，车子不得不停下来，特务的车子也只好停下。周恩来义正辞严地训斥特务，问他们是那个单位的？特务倒也老实，说是卢家湾警察分局的。周恩来打电话质问这个警察分局，他们回答说是奉命而为，这次苏联领事馆没有去成。第二天，周恩来在福州路一家饭馆为夏衍、乔冠华、龚澎赴香港饯行，特务又来跟踪，周恩来很生气，回办事处后，即打电话质问上海市长吴国桢。

国民党代表继续促使重开谈判，第三方面人士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为和谈奔走。10 月 17 日，吴铁城、邵力子、雷震到上海，一下飞机就到“周公馆”访问周恩来，表明国民党的态度，希望周恩来回南京谈判。当时有人开玩笑说：吴铁城等三人是“肉请帖”。晚上，他们又与第三方面接触，希望劝说周恩来回南京。第三方面推出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李璜、左舜生、胡政之向周恩来转告与政府代表谈判的经过。周恩来表示，这八条不能作为重开谈判大门的基础，对于回南京一事，既未表示同意，也不断然拒绝。18 日，第三方面代表向吴铁城等转告和周恩来会谈的情况，他们认为只要再作努力，恢复和谈是有希望的。会后，他们在张君劢住宅范园宴请国共双方代表。7 月份以来，关于和谈问题主要是由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居间斡旋，双方人员也偶有接触，代表们都坐在一起这还是第一次。

19 日，上海 12 个群众团体开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表示，只要和平有望，我们仍下放弃和谈。其实我们已不抱什么希望，但如拒绝和谈，有负于第三方面朋友连日来仆仆于沪宁之间奔走呼号的热诚，也容易在人民中间造成和谈大门由我关闭的印象，所以周恩来表示要继续谈判。尽管对谈判不抱希望，他对中国民主前途还是充满信心的。他在会上说：“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

当天下午，吴铁城在他的住宅望庐，邀请各方代表商议。当周恩来说到和平是我一贯主张，他愿意去南京时，吴铁城立即趋前和他握手，各方代表也热烈鼓掌欢迎。会后，吴铁城设宴招待代表们。

10 月 20 日，周恩来到万国公墓为鲁迅扫墓，一方面是对鲁迅先生的敬仰，另一方面也为即将离开上海留下纪念。周恩来在濛濛细雨中，亲手种植

了两棵松柏树，潘梓年在白绢上写了“鲁迅先生十年祭”系在树枝上，一起去植树的还有邓颖超和李维汉。

重开谈判似乎已有一线曙光，实际上双方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吴铁城、孙科宣称和谈将以蒋介石所提的八条为基础，关键是中共能否接受。中共代表团不得不表态，由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的八条无疑是最后通牒，中共碍难接受，成败利钝的关键，仍操在政府手中。重开谈判的前景已可窥见。

周恩来离沪前，邀请郭沫若、许广平、马叙伦、马寅初等到上海办事处叙谈，告诉他们代表团将要撤回延安，但不论是南京还是上海，我们一定要回来的。席间郭沫若赋诗赠周恩来：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
根节构盘错，梁木庶可遭。
驾言期骏骥，岂畏路迢遥？
临歧何所赠，陈言当宝刀。

周恩来还邀请著名演员周信芳、白杨、丹尼和剧作家、导演于伶、黄佐临谈话，指出我们必胜，国民党必败，使他们加强信心。他又指示于伶、刘厚生，地下党组织要从思想上、艺术上帮助地方戏曲艺人。

代表们毕竟是到南京去了。10 月 21 日，李维汉与第三方面人士郭沫若、胡政之、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蒋匀田、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干、余家菊、杨永浚等乘中航机由上海飞南京，随后周恩来乘美军专机飞宁。他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即接见，蒋与各方代表一一握手寒暄，表示欢迎，并说我等你们很久了，你们赶快商谈吧，政府方面由孙科作代表，我原定前两天去台湾，为了等你们，今天才能走。说完他就走了，接见时间前后只有 8 分钟。这给代表们当头打了一个闷棍，各方代表浩浩荡荡来到南京，你蒋介石却走了，国民党对和谈还有什么诚意？人们都知道，没有蒋介石的首肯，什么问题也谈不成，孙科怎么能替他作主呢？在关键的时刻走开，这是蒋介石为了避开谈判多次采用的伎俩，我们早已领教过了。蒋介石一走，有些第三方面人士冷了半截。

当天下午，第三方面人士在孙科官邸和国民党代表会谈。张厉生提出要中共先同意蒋介石的八条，政府才能下令停战。第三方面人士知道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连倾向于国民党的民社党党魁张君劢也提出异议，说吴铁城、邵力子在上海并来说过会谈要有这个完决条件，如果这样，我们只好回上海。国民党仍不让步。

24 日，周恩来到美国驻华使馆访司徒雷登，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蒋介石的八条。

双方没有谈判的基础，第三方面人士还在“死马当活马医”，继续在交通银行商谈，并与国共双方代表频繁接触。由于双方都不让步，代表们到南京三天了，正式商诙还没能开始。

这时国民党军队加紧进攻。10 月 25 日，攻占东北解放区的安东。第二天上午，周恩来还未获得这个消息，他和马歇尔会谈时，只谴责国民党一方面要重开谈判，另一方面加紧军事攻势，企图以武力取得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而且蒋介石离开南京，继续谈判已无必要。他还向马歇尔透露，中共中央要他回延安。马歇尔非常着急，要求周恩来不能在这个时候回延安，否则将铸成大错。他还说，第三方面正在和政府商讨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蒋

介石回来后可进一步讨论，他也将为停战作出努力，重开谈判还不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

26 日晚上，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到梅园新村，周恩来、董必武和他们在客厅中商谈。当梁漱溟透露国民党军队攻占安东的消息，周恩来正在喝茶，盛怒之下把茶杯摔得粉碎，愤愤他说，我们要回延安，从此以后不再谈了。蒋介石和我们打了十几年交道，并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从无到有，从最底层翻上来，哪怕国民党的压力？怕压力当初就不会有共产党。黄炎培、梁漱溟力劝周恩来不要回延安，以免不明真象的人误解。他们还表示要加强和中共合作。周恩来和他们商定，以后有什么主张和行动，彼此先通通气，以免蒋介石利用第三方面孤立中共、欺骗人民。

这时国民党决定召开国大的日期已经临近，如果提不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重开谈判将流产。第三方面人士很着急。作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尤力焦躁不安，他想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第三方面有些人说这是幻想，不可能做到，梁漱溟则说，如果第三方面不能起到这个作用，我们只好甩手不干了。他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谁也没有医好和谈“死马”的灵丹妙药，只好同意梁漱溟去提折衷方案。28 日，梁漱俱把他的折衷方案提出来了，共有三条：

一、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就现地停战。关于停战，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双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方案处理，其驻地分配，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

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

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会，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参加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

第三方面在讨论这个方案时，有人认为这三条有利于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军队已占领中共许多地方,和中共提出的恢复 1 月 13 日停战协定生效时双方军事位置大相径庭，中共不会接受。但谁也提不出什么新办法。于是把这个方案交黄炎培、莫德惠、梁漱溟继续讨论，对第一条和第二条作具体规定。他们三人在第一条加上：“东北中共驻军地点为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第二条又加上：“沿长春铁路各县地方政权，除经中共接受者外，应由中央派县长和警察接受，第三方面未再细加研究，即复写三份，给国民党一份由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三人交给孙科，给马歇尔一份由罗隆基送去，给中共的一份由梁漱溟、李璜、莫德惠拿到梅园新村来。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方案引起了一场风波。

28 日下午 3 时，梁漱溟等三人到梅园向周恩来送交这个方案，董必武、李维汉也在场。梁漱溟并说明已把其他两份分别送给国民党和马歇尔，刚刚讲到第二条时，周恩来神色骤变，以手制止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他首先斥责梁漱溟等不遵守有什么提案和行动要事先商量的口头协定。并严厉地说，这个方案是完全有利于国民党的，国民党进攻我们，想不到你们第三方面也从背后捅我们一刀，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你们还要踩上一脚。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打的，我们还可以打游击，但要考虑你们的前途，并愤愤地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关照？当时，我和一

些同志听到客厅里这样紧张的讲话，都站在门外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从来没有看到周恩来对人发过这么大的火。

梁漱溟自知理亏，茫然不知所措，李璜出来转圈，提出赶紧把文件收回再说。梁漱溟立即驱车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找来梅园新村商量，大家一致决定收回。

于是，由黄炎培、罗隆基、莫德惠、李璜到孙科官邸。到了门口，见到车马盈门，他们知道国民党已在讨论这个方案，非常着急。进门后，看到孙科、陈诚、王世杰正在客厅里。陈诚对莫德惠说，你们帮了共产党的大忙，这个方案我们不能接受。黄炎培说，这个方案漏抄了一条，应当补上。孙科把文件交给黄炎培，问漏抄了什么？黄炎培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急忙把文件交给罗隆基，文件就这样取回来了。给马歇尔的那一份，由罗隆基去取，罗隆基到马歇尔寓所时，文件还没有拆阅，他就顺手带回来了。两份文件都送到梅园新村让周恩来过目，事情就这样平息了。

其实，梁漱溟并不是有意偏袒国民党，只是求和心切，对形势不加分析，考虑不周到，后来他也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梁漱溟遭到这次挫折，对和谈不再积极了。

事后孙科对第三方面表示，这个方案政府可以接受，并称蒋介石也同意。马歇尔也了解到一些情况，对蒋介石说，共产党没有投降之意，政府方面也应作出让步，促进和谈重开。蒋介石顽固不化，毫不让步。10 月 29 日，蒋介石分批接见第三方面人士，表示不同意这个方案，却要他们交出参加国大名单，目的在于拉拢第三方面，孤立共产党。

第三方面再也提不出什么方案，他们知道即使提出了也不能被接受，只好建议三方面直接商谈。周恩来表示同意。10 月 29 日，三方面代表在孙科官邸举行非正式会谈。孙科提出首先从改组政府入手，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周恩来提出首先延期召开国大，因为政府决定的会期已经逼近，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能改组国民政府与行政院，这不符合政协决议，孙科不能作肯定答复，因为蒋介石不会同意延期召开国大。和过去一样，什么问题也没有谈成。

11 月 8 日，蒋介石突然颁布停战令，但是同时又重申国大如期召开，并举行三人小组会议。周恩来看出这是一个委罪于人的手段，无疑是说，我宣布停战了，中共还不参加国大，破坏和谈的责任在于中共。我方也针锋相对地发表两项声明，指出发布停战令既未与我方协商，而且命令中说除“为防守现地所必须者”外停上军事行动，那么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可以解释为“防守现地所必须”。至于政治方面的内容，则是违反政协决议的。如果蒋介石真有和平诚意，应立即停止召开一党国大，撤退入侵解放区的军队。周恩来也向马歇尔表示，他愿意参加三人小组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但如果国民党一定要召开国大，中共代表团就将回延安。

经第三方面和马歇尔的斡旋，非正式的政协综合小组会议和非正式的三人小组会议，分别于 10 日和 11 日召开了。国民党代表表示国大无法延期，这还有什么好谈呢？

这时国民党军队加紧包围延安，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已准备撤退，最后决裂已是眼前的事了。

## 和谈大门被蒋介石关闭

11 月 11 日下午，蒋介石突然宣布“国大”延期三天召开，这简直像儿戏，说穿了，却又是个阴谋，他知道延期三天，中共也不会参加，但第三方面有些人正在动摇，延期三天，他们就可以多拉几个人，来粉饰门面。民盟代表表示绝不参加国大，12 日，民盟主席张澜从重庆打电话通知在南京的民盟政协代表说：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即失去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14 日，张澜又对记者表示：民盟绝不参加一党“国大”。这一天，周恩来、董必武在梅园新村宴请民盟领导人，并摄影留念。民盟拒绝参加“国大”，使国民党要孤立共产党的阴谋没有得逞，后来周恩来把第三方面许多人没有参加“国大”看成是谈判的一个成果。无党派人士有一部分人向国大报到了，青年党决定参加国大，由曾琦向蒋介石面递名单。

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在 15 日上午开场，和谈大门由国民党关闭了。

16 日，周恩来访马歇尔，告诉他由于“国大”的开幕，和谈大门已被国民党关闭，他不得不返延安。中共仍将在南京、上海、北平保留一些人，即使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也便于今后一旦重开谈判就能够有人出面，并告诉他董必武将留在南京。马歇尔觉得国大已召开，没有理由挽留周恩来了，只表示他将为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人员回延安提供交通工具。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梅园新村 17 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严厉谴责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是破坏政协决议，违背全国民意，企图使独裁、内战、卖国合法化的“国大”，中共坚决反对，决不承认。中共愿和全国人民为真民主真和平奋斗到底！周恩来还指着墙壁上挂着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形势图说，国民党如进攻延安，那我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并宣布中共代表团将于日内回延安，但南京、上海两办事处仍将保留，由董必武、钱之光主持。中外记者来得特别多，把会场都挤满了。代表团工作人员则在窗外旁听。

这天晚上，民社党宣布“有条件地参加国大”。

17 日晨，国民党还假惺惺地派张群来挽留周恩来。张群居然说什么政府并未关闭和谈大门，希望周恩来先生再等几天。周恩来直截了当回答，和谈大门已由政府关闭，留在南京是无益的。

当天晚上，周恩来写信给郭沫若夫妇，信中说，“沫兄回沪后，一切努力，收获极大。青年党混入混出，劢老（张君劢）动摇，均在意中，惟性质略有不同，故对劢老可暂侍保留态度。民盟经此一番风波，阵容较稳，但问题仍多，尚望兄从旁有以鼓舞之。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政协阵容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时如仍需和，党派会议，联合政府仍为不移之方针也。弟等 19 日归去，东望沪滨，不胜依依。”这封信对第三方面作了正确的估计，表示了我方继续争取的方针，并反映了他的无限惜别之意。

11 月 19 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 10 余人，乘美军专机回延安。到机场送行的有董必武和办事处部分同志，邵力子、吴铁城的代表和马歇尔的代表也来送行。起飞前，记者问周恩来，什么时候回南京？周恩来对记者说：总有一天要回南京来的。

到达延安机场时，他们受到朱德总司令等负责人和许多群众的欢迎。

当晚，周恩来在延安接见记者时说，中共将同意与南京重开谈判，唯谈判须以下述三点为目的，即重新成立各党各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召开新国民大会。

李维汉高兴地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这是党的统战工作的最大胜利！”

11 月 21 日，周恩来在中央的会议上报告了国共谈判和蒋管区的情况。他说：谈判一年多，党的和平、民主、统一、独立的主张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蒋介石的独裁内战在人民中暴露了，把美国企图独霸中国的面目也弄清了。我们的方针还是要民主、和平、独立、统一，为了实现这一方针，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毛泽东、刘少奇都充分肯定了代表团一年来的工作。会议决定：今后的要求是恢复 1 月 13 日停战令时的位置和实行政协决议。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后，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改为中共驻京办事处，由董必武主持；上海代表团办事处改为中共上海联络处，由钱之光负责。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下，继续坚持同美、蒋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和各方面的工作。

11 月 23 日，周恩来指示叶剑英、董必武：力争在国统区的京、沪、渝、平、春（长春）五地保留公开机关，以便宣传群众、联系群众、教育群众，现在和平之门已关闭，国统区情况将更加恶化，要求马歇尔在紧急时派飞机将我公开机关的同志送返延安，同时要加强学习，也要准备进集中营。董必武收到电报后，即向南京和上海的主要干部传达，要坚决遵照中央指示开展各项工作，并要党支部加强保密教育和气节教育，准备应付任何恶劣情况。坚持在南京、上海工作的全体同志，在董必武的领导下，坚持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完成了党的任务。

周恩来回延安以后，蒋介石不承认他关了国共和谈的大门，仍要他真内战假和谈的反革命两面手法，以欺骗国内群众和国际舆论。11 月 30 日，蒋介石对各战区发出侍天字第 70 号密令：“明年上半年各部队作战目标，应以打通陇海、津浦、同蒲、平汉与中东铁路诸线，肃清冀、鲁、晋、陕等地境内股匪”，“在今后一年内，彻底消灭万恶之奸匪。”可见蒋介石对中共切齿痛恨的狰狞面孔。可是蒋介石全面进攻的力量还未准备好，为了欺骗人民和国际舆论，又玩弄花招，散布“和谈”空气。

我党早就看穿了蒋介石的阴谋诡计，立即加以揭穿，并提出恢复和谈的条件，以教育人民。

12 月 4 日，董必武把周恩来致马歇尔的电报以备忘录转给马歇尔，内容如下：

马歇尔将军阁下：

周恩来将军嘱我将下列电报递交阁下：

由于一党操纵的‘国大’之召开，政协协议已为蒋介石主席撕毁无遗，国共两党间已无谈判的基础，然为符合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民主之愿望，本党主张，如国民党立即解

散刻在开会的非法‘国大’，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令时之军队原防，则两党仍可重开谈判。乞将上述各点转致蒋主席。

董必武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四日

于南京

12 月 9 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司长叶公超对中外记者放出空气：政府现正考虑派员飞赴延安访晤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及该党代表周恩来。当天，《中央日报》记者就此消息到梅园访王炳南。王炳南回答：中共的最后态度已明白表示，即一、政治方面须解散“国大”；二、军事方面须依照一月十三日停战令。若政府不接受此两点，即派员去延安也无意义。过两天，《中央日报》记者又问董必武，董老回答：自周恩来返延后，我未与国民政府及美国调人方面接触，关于此事，中共迄未接到通知。12 月 12 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双十二”会上演讲，重申中共对恢复和谈的态度，指出“立刻解散正在开会的一党包办的非法的分裂的‘国大’，承认恢复一月停战令所规定的双方军队的位置，国共谈判便可重开。”12 月 28 日，周恩来在延安应新华社记者的访问，谈到国共谈判的前途问题时指出：“谈判大门是国民党政府拿它的‘国大’的手关闭的，如果重开谈判，国民政府必须：（一）根据停战协定，承认恢复 1 月 13 日双方驻军位置，实行停战；（二）根据政协路线，取消非法‘国大’及伪宪，重开党派会议协商一切。”

国民党一党包办的非法“国大”在通过宪法草案后于 12 月 25 日闭幕。几天后，蒋介石又耍和谈花招。31 日晚蒋介石发表 1947 年元旦广播词说：对中共问题以政治解决，国民政府决不关闭谈判之门，而且还期待中共参加政府。接着，邵力子于 1947 年 1 月 2 日到梅园中共办事处访董必武。同日，国民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奉蒋介石电召到达南京。邵力子、张治中是长期同中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所以就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和猜测。1 月 9 日，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发表谈话说：政府对于停止冲突及改组政府等问题的具体办法，甚愿与中共竭诚商谈，以期和平统一能早日实现。王炳南于 10 日即给以批驳说：国民政府一方面在解放区实行大规模军事进攻，一方面侈谈迫切需要和平，如国民政府愿与中共恢复和谈，则应该接受所提出之两项要求，即恢复 1 月 13 日军事位置及重新拟定宪法。1 月 10 日，孙科又发表题力《对时局问题的一个建议》的书面谈话时说：“我以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好于不久的将来各党派负责代表（自然连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内）再来举行一次圆桌会议。”这一切，都是故意渲染和谈空气的表演。

1 月 15 日，蒋介石约司徒雷登谈话，并交给司徒雷登一份重开谈判的四点方案，一、政府希望派代表团前往延安或请共产党派代表回到南京继续商谈，或者由他建议举行所有各党派圆桌会议。二、政府和共产党应立即各自发布停火令，共同商讨实施停火令的有效办法，三、政府愿意恢复讨论整编军队和恢复交通的实施计划，计划将以“前三人小组”的原则为依据。四、政府希望和共产党立即达成协议，以便公开而合理地解决争议地区的政治控制问题。蒋介石要求司徒雷登将重开谈判一事告诉中共驻京代表，但不讲上述四点方案，只讲张治中已被初步确定为代表国民政府的人选，代表团有讨论重大分歧的完全自由。16 日，司徒雷登将国民政府派张治中赴延安的决定通知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王炳南。

当时董必武正在上海，南京办事处工作由王炳南（对外）和我（对内）负责。王炳南和我商量，认为此事很重要，除立即电告中央外，由王炳南立即去上海向董老报告，并将董老致中央的电报稿带回即发中央。17 日，中央给董必武回电，指出：美蒋提出的和谈是欺骗，是为了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同时也为了对参加三月莫斯科会议的美国能有所交代。我党必须坚持两条：恢复去年 1 月 13 日军事位置和取消伪宪法。要多向民盟及第三方面解释，莫

空谈和平。我们收到中央指示后，即报告董老。18 日上午，王炳南当面通知司徒雷登：中共中央对和谈问题坚持过去所提的两项条件，一、遵守停战协定，恢复去年 1 月 13 日双方军事位置；二、取消伪宪，重新制定宪法。如果国民政府同意此两项原则，恢复和谈即刻可在南京开始。否则，如国民政府仍然拒绝此两项原则，即使派人赴延，亦无补于事。

由于我党坚持恢复国共和谈的两项原则，国民党的假和谈面目被揭穿。为推卸责任,国民党中宣部于 1 月 20 日发表国民政府对于商谈的愿望及其经过的说明。但是民主同盟和第三方面的多数人士，都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已经起不了欺骗作用了。

1 月 24 日，在经过周恩来修改的党中央致董必武、王炳南电中，指示董暂驻上海不回南京，王应对美蒋洽谈，拒绝国民党所提四条，而要美蒋接受我党提出的两条。否则，不能开谈。因此，国民党喧嚷一时的“和谈”空气就消失了！

对蒋介石坚持武力消灭中共又玩弄假和谈阴谋，以及中共坚持两项原则的一贯严正态度，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是看得很清楚的。在这样情况下，使他们感到艰难处。加以美国在调处中支持蒋压中共的立场，日益为中国人民所识破，特别是 1946 年 12 月 24 日美国兵在北平强奸中国女学生的暴行被揭露，引起了全国学生掀起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爱国运动以后，连许多崇美的人也改变了对美国的态度。因此，美国政府于 1 月 6 日宣布调马歇尔回华盛顿报告中国局势，马歇尔于 1 月 8 日回到美国。美国国务院当天发表了马歇尔对中国时局的声明。声明中避开美国和蒋介石对中国的内战责任不谈，而说中国“和平最大的障碍是国共双方彼此完全以猜疑相对”，而且把谈判破裂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共身上，他说：“中共现已提出最后要求而促使谈判中断，他要求解散国民大会，并恢复 1 月 13 日的军事位置，这都是政府所不能接受的。”

针对马歇尔的声明,周恩来在 1 月 10 日延安各界声援全国学生爱国运动及纪念政协一周年大会上发表《评马歇尔离华声明》的演说，严正驳斥马歇尔声明中对中共的攻击和污蔑，指出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的是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所采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周恩来说，恢复去年 1 月 13 日的双方军事位置，取消蒋宪与重开党派会议，是最公允的妥协，也是最低限度的和平民主要求。他希望马歇尔返国任国务卿后，重新检讨对华政策，停止援助蒋介石政府进行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不再干涉中国内政，重新调整中美关系。

l 月 29 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已决定终止其对三人小组会之关系，军调部之美方人员，尽速撤退。司徒雷登邀王炳南至其使馆，将美国政府上述决定通知中共。

1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分局及董必武、叶剑英的指示，指出：美国撤出三人小组和军调部是我们的一大胜利，我们可表示：一、美方结束三人会议，表示美方已最后地破坏停战协定，不再受其约束了，但我仍愿为实现一月停战协定而奋斗。二、美方结束军调部，表示美方已公开退出调处，我们主张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但美国应停止对蒋的一切援助。三、要求美国撤退在华一切海、陆、空军及军事训练机构。

董必武 2 月 1 日在上海对上海各界人士谈美军退出军调部时说：中国的

和平民主决不依靠外力，自己可以获得。

由于我党对蒋介石真内战假和谈的阴谋以及美国积极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反动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揭露，使全国人民更认清了美蒋的真面目，进一步赢得了人心，取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

## 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由于时局的日益恶化，南京、上海两个办事处都必须有计划地安排干部和工作。

周恩来在南京的时候，南京局和南京、上海两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有百多人。估计到国共谈判破裂我公开机关人员必将撤离或被扣留的情况，代表团和南京局研究，根据工作的需要和干部的情况，确定分疏散、隐蔽、撤退三种方式处理。1946 年 10 月，周恩来就在上海亲自布置章汉夫、刘宁一、夏衍、许涤新、萧贤法、乔冠华、龚澎等去香港工作。11 月，形势很紧张了，南京局组织部长钱瑛，根据南京局的决定，带上南京局所属地下党的关系和部分平、津学生中的党员关系，转到上海隐蔽。南京局和上海工委同秘密组织完全分开，使公开机关撤退后，有秘密组织继续领导斗争。1947 年 1 月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分局，由刘晓任书记，钱瑛即参加了上海分局，但下面的组织仍分工领导，不互相联系。有少数江、浙籍干部可回家或能找到社会关系隐蔽的，即暂时回家，把关系转到上海地下党，由地下党设法和他们联系。大部分是公开活动又无法隐蔽的，就利用美军飞机直接送回延安或经北平转延安，少数经上海解放区救总办事处搭乘运救济物资的船只到山东烟台。除办事处工作人员外，还有云南爱国将领张冲，因同我党有密切关系，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董必武同意云南工委建议，张冲以“国大代表”名义到南京，然后将他化装乘飞机到北平军调部转送延安。任弼时的妹妹任培辰和妹夫单先麟，从上海到南京要求去延安，我们把她夫妇送到北平军调部，任弼时写信劝他们仍回上海，可为党做工作。他们回到上海后，单先麟在上海任警察局看守所长，我把他的关系转给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并同他联系。单先麟在这段时间，为掩护和营救我被捕人员作出了贡献。我在南京先后布置了三部秘密电台，工作人员七人，全部移交给吴克坚系统在南京的负责人何以端，以后他们在南京、上海为党传递情报发挥了作用。

经过一再疏散转移，最后剩下南京办事处 41 人，上海联络处 13 人，上海新华日报社、群众杂志社 20 人，共 74 人。在国民党特务的包围监视下，我们仍不放弃任何工作机会。1946 年 11 月，我接待了从湖南宁乡来的李石锹。当时我的爱人紫非因交通困难带了两个孩子从重庆到湖甫宁乡父亲（地主、在地方有点声望）家隐蔽，等交通畅通再来南京。她发现李石锹常和她父亲、伯叔等秘密串联，似有秘密活动，但又不能明说，就暗示李到南京梅园来看我，告我她们母子情况。李本来知道紫非到过延安，我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很高兴地找到了我。李说明了紫非情况和他真实来意，要求找到党的关系，领导他们在宁乡一带搞秘密武装，准备迎接解放军。我报告了钱瑛，并一同接见了李。钱瑛因忙于准备去上海，就交代我和组织部的梁华给他看文件，听了李详细汇报后，给他谈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的任务，鼓励他们在农村组织群众，利用可能条件进行合法斗争，可能时就组织武装迎接解放军。他回去以后就积极工作，组织了一部分群众和秘密武装，配合了解放军解放宁乡。

12 月初，新疆伊犁地区革命领导人、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阿巴索夫，是新疆的“国大”代表，利用到甫京开“国大”的机会，秘密来到梅园访董必武。他要求中共承认新疆共产主义同盟，向新疆三区派政治、军事、经济工作人员，并希望帮助建立电台同延安中共中央联系。董必武报告中央，

中央指示：中共愿与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友谊关系，可先派电台人员去同延安建立通信联系。根据董老指示，我派了电台台长彭国安携带小电台和密码，化装成阿巴索夫的亲戚同他一起到达迪化。因条件困难，通讯不畅，就每天收抄延安新华社电讯，提供三区革命领导人传阅。有些消息就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使新疆各族人民听到了延安的声音。彭国安一直坚持到新疆解放，并继续在新疆电信局工作了一个时期。

美国政府 1947 年 1 月 29 日决定撤出三人小组和军调部，宣布了美国‘调停”的失败，这表明美国要支持蒋介石进行全面内战。国民党特务对我党在南京、上海、重庆、北平等地公开机关的限制、监视也加紧了。我们除了提高警惕加强保密纪律外，仍照常进行各种正常活动。随时准备被迫撤退以至进集中营。

2 月 6 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大使司徒雷登博士，本日已通知中国政府，及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谓美国政府将协助受委任之中共人员，返回可能通行之共党区域，并协助国民政府执行小组人员，返回原来之站头，直至 3 月 5 日为止。

这就是美蒋共同谋划而先由美国大使馆放出逼迫中共机关自动撤退的信号。

中共中央洞察美蒋的阴谋，一面公开揭露，一面指示我京、沪、渝人员，一定要坚持非赶不走的原则，坚持斗争。

2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蒋介石准备于北平执行部中共代表及工作人员撤完后，企图以各种手段达到扣留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处联络人员，逼迫中共人员自动撤退的目的，特发表声明指出：京、沪、渝三地中共联络处之设立与存在，以前皆为国美双方所要求，及国方所许可。其任务为与中外各方联络，包括与联总、行总之联络在内，除非国方决心从此以后不再谈判，正式通知中共撤退此等机关，或中共方面自行决定撤回，则决无取消之理。如果国方既不正式通知中共方面撤退，还要阴谋扣捕中共人员，则一切后果应由国方负责。

2 月 20 日晚上，我得到可靠消息，蒋介石已决定要赶走中共驻京、沪、渝三地联络机构和封闭《新华日报》。我立即电报中央。因为没有什么秘密了，为争取时间，我立即先用长途电话报告上海董老、钱之光，接着又以长途电话直接告诉重庆张友渔，告诉他们立即动员做准备工作。使他们提前一星期作了准备。

21 日，中央致电董必武、王炳南，指示坚持不自动撤退京、沪、渝的我党联络办事机构，表示决不由我方关死谈判之门。

我们遵照中央指示，动员全体同志坚守阵地，并将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散发给中外记者和各方面朋友，表明中共决不自动撤退联络机构，决不由我方关闭谈判之门。

21 日，驻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代表叶剑英，借参谋长薛子正、新闻处长黄华等最后一批 21 人，乘美军飞机返回延安。北平军调部就此结束。我们得此消息后，对外仍不动声色地照常工作，内部则加紧准备撤退，开始销毁文件，加强气节教育，准备应付特务突然袭击。

26 日，中央再次电示南京董必武、王炳南、童小鹏，重庆吴玉章、张友渔：京、沪、渝联络办事人员，一定要坚持非赶不走的原则，到处揭穿蒋介石的恐吓手段，以鼓励进步群众和中间人士与蒋斗争的勇气。我除立即派人

到上海向董必武、钱之光报告外，即和王炳南商量把中央指示精神通知民盟和进步朋友，坚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即使中共联络机构被迫撤退，或者人员被扣留，他们的斗争也不会是孤立的，强大的解放区军民和蒋管区革命人民就是他们的后盾，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蒋管区人民的革命斗争高潮，必将使民主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朋友们都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蒋介石知道中共联络机构要坚持斗争，他逼迫中共人员自动撤退的阴谋失败后，即于 2 月 27 日开始下“逐客令”了。28 日凌晨 3 时，重庆警备司令部，派军官送给重庆化龙桥新华日报社一个“通知”，限令《新华日报》自即日起停止出版，所有工作人员“停止活动，听候处理”。随即派来军、警、宪、特 2000 多人，全副武装，如临大敌，把报社团团包围，并把人员集中，限制行动自由。同时，又包围和搜查了中共驻渝联络处和四川省委机关曾家岩五十号、红岩原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在城内的所有办事处地点，并将中共在渝的所有工作人员 249 人包括中共代表、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国民参政员吴玉章集中软禁在几个地方，搜查了所有的办公室和宿舍，抢走了部分财物，《新华日报》的材料也被“点交代管”。经吴玉章向重庆市长张笃伦、警备司令孙元良提出抗议，质问是谁的命令，要求他们撤退军警。他们只答是上司的命令。在吴玉章领导下，二百多人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经过周恩来、董必武的交涉，吴玉章、张友渔等 249 人于 3 月 8、9 两日，分乘四架美军飞机安全回到延安，《新华日报》自 1938 年 1 月 11 日在武汉出版至 1947 年 3 月 1 日被封闭，共出版发行了 9 年零 49 天。连最后一张未印完的全部报纸，均运回延安，以后又运到北京，成为党史、文化史的宝贵资料了。

28 日，南京、上海两地的警备司令部同时通知中共南京办事处、上海联络处，限于 3 月 5 日前撤返延安。军、警、特务立即进入上海联络处，禁止行动和打电话。因为我们事先早有准备，所以都从容对待，抓紧准备撤退工作。南京是首都，中外记者多，也很敏感，连日来都不断到梅园来打听消息。国民党怕外国人批评，除了加紧包围、监视外，还不敢闯到办事处院里来。当然，我们早准备他来的，只保留几天用的、随时可消毁的密码，他们什么也捞不到。

周恩来在延安十分关注京、沪、渝三地的工作同志。28 日晨，他还未收到我们的电报，先听到了南京中央社广播，渝、宁两地当局已下“逐客令”的消息后，立即致电董必武、钱之光、王炳南、童小鹏并转告香港方方等，对我人员被迫撤退一事作了详细指示。主要内容是：一、顷据蒋方广播渝宁两地均已下逐客令，估计上海必跟着来，剩下解总联络处，为时不会久。二、蒋此次逐客，系用地方当局出面，以保护安全的形式，但我们须逼国民党负最后破裂之责。办法有五：甲、由周电蒋；乙、由董（必武）、王（炳南）在沪宁分别以口头及书面询问吴铁城、吴鼎昌或宋子文，国民党政府是否已知道京渝两地地方当局此种行动。如知道，则请其以正式公文通知中共驻京代表董必武，我联络机关自当撤退，但必须限期延长；丙、蒋若对甲、乙两项不答复，我则向中外公布；丁、动员京、沪中外记者质询蒋方人员、逼其回答，以明责任；戊、党在撤退前发表谈话，并宣布交涉经过。三、王炳南立即向美方说明经过，交涉撤退所需全部飞机。四、解总人员将来撤退，应要求联总、行总由海路送烟台或其他口岸。当日，周恩来就致电蒋介石，对

限令我人员撤退之事提出抗议和质问。并指出，为判明谈判破裂的责任与手续起见，要蒋以正式公函通知中共驻京代表董必武，并须延长撤退时限至 3 月底。我们接到电示后，立即报告在上海的董必武、钱之光、王炳南。3 月 1 日，董必武到上海市政府找市长吴国桢，吴以有事推托不见，又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找宣铁吾，董老气愤地质问宣铁吾说：“我们中共代表是你们政府请来谈判的，为什么下令包围我们，剥夺我们的人身自由？”宣支支吾吾不作正面回答。董必武告诉宣铁吾：“我立即要离开上海去南京，联络处和《新华日报》人员也即将去京，你们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宣铁吾只得答应。上海联络处因受特务包围、限制不让外出活动，也不让记者来访，发言人陈家康就站在阳台上向记者和过路群众大声宣布：蒋介石最后关死谈判之门，决心全面内战，要把我们赶回延安去了。我们就要同上海的朋友们分别了，但我们坚信，人民总是要最后胜利的，我们一定要回来的！除记者外，过路的人都站着听，越来越多。陈家康就这样开了一个特别的记者招待会。

民主人士听到中共人员要撤退，都很关心。黄炎培托人送信给董必武表示慰问，柳亚子、马寅初斥退特务的阻挡到联络处拜访董必武。

董必武离开上海前，3 月 1 日在特务的包围监视中，参加了上海联络处一次特别的支部大会。他先分析了革命形势，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但斗争中还有许多困难，还要流血牺牲。接着董老就对大家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要同志们做最坏的准备，或进集中营，或被一个一个抓起来。不管怎样，也要保持革命气节，要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同志们都表示，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决不做违反党的利益的事。

3 月 2 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就蒋介石强迫中共驻京、沪、渝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一事发表声明，指出：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是表示蒋方已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大门。蒋介石这一荒谬步骤，如不立即改变放弃，那真是他自己走到了绝路，一切后果由他负责。我们收到后，即用新华分社通讯稿印出四处散发，一直寄到国民党党政机关中。

同日，王炳南将周恩来致蒋介石电送交吴鼎昌。同时，将中央决定京、沪全部人员撤回延安的电报转报董必武。董老于当晚偕夫人何莲芝及孩子等乘火车离沪于 3 日晨 7 时回南京梅园。王炳南和我即向董老汇报撤退的准备工作。董老稍事休息后又往访张治中、张群和邵力子，当面谴责国民党最后关闭了和谈大门，并商谈我驻京、沪、渝三地人员撤退之事，要求他们保证上述三地中共人员的安全和撤退时的飞机。董老还义正辞严地提出，上海联络处的人员不到南京，不保证重庆中共人员回延安的飞机，我就不走，董老又去看望了司徒雷登，谴责国民党关闭和谈大门、监禁中共人员的罪行，要求美国保证我驻京、沪、渝全部人员返回延安的飞机。董老回梅园后，即决定于 7 日返延安，并报经中央批准。

当晚，中共南京办事处复函南京警备司令部，指出：“美方协助之空运工具，未能于你部规定之期内充分拨用，须延至本月 7 日，如气候无故障，我处留南京人员眷属，决于 7 日飞延。”

4 日，周恩来致电民盟主席张澜，商请民盟代表保管中共在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财产，因事先我们已向罗隆基及民盟秘书长周新民等打过招呼，民盟总部表示同意，并将周恩来致张澜电转给在上海的张澜，张也表示同意。当天，罗隆基正式通知国民党当局，如获允许，民盟即行接管。国民党当局

只好勉强同意。5 日，郑介民正式代表国民政府通知董必武，同意中共委托民盟代为保管京、沪、渝、蓉、昆所留的房屋及器材。5 日，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和民盟代表，在律师的证明下，当着警备司令部官员的面，办好移交手续，并正式登报声明。

周恩来出的这个好主意，一是保留中共的合法产权，不让国民党没收；二是民盟的物质条件比中共困难，托民盟代管，实际上也是让他们使用。1947 年 10 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中共财产就连同民盟财产一起被国民党没收。可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只经过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过大江”，蒋介石盘据 22 年的南京就归于人民了。于今，蒋介石的“总统府”和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代表所住的梅园，都成了历史的见证，历史已证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压迫人民投降帝国主义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必然要灭亡！代表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必然要胜利！“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已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大课堂。看到周恩来铜像，使人想起当时这位伟人领导蒋管区人民走向胜利的坚定意志。当年同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代表乘坐的那辆黑色“别儿克”小轿车，也成为重要的革命历史文物了。

5 日上午，董必武在南京梅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董必武就国民党逼迫中共驻京、沪、渝三地人员撤退，对记者发表了谈话。董必武最后表示：盼能与诸位重晤于南京。

当日下午，上海联络处和《新华日报》工作人员钱之光、华岗、潘梓年、陈家康、刘昂等 13 人，在国民党军警严密监视下，乘火车到达南京梅园。他们把在特务包围中隐藏起来的几十根金条，又巧妙地取出来分藏在身上带到南京，撤返延安时上交给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当时，蒋经国正在上海表演“打金老虎”的闹剧，如果黄金被发现，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有很大损失，在钱之光的领导下，他们冒着极大危险保存党的经费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6 日下午，一切撤退工作都准备好了，我们利用从美军借来的大电台，将撤退的准备工作和全部人员的名单以及几天来各方面的反映，给延安党中央发出最后一批电报。南京报务员同延安报务员打了最后一个“88”（亲密的）符号后，关闭了机器。章文晋请来美军技术人员来点收，他们如数点收后运走了。我们一再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

6 日晚上和 7 日凌晨，我们的秘密小电台同延安通了最后几次电报，完成了它的最后光荣任务，就装箱侍运回延安了。

为了使南京各界人士及时了解我们撤退的真相，经董必武审批了的中共南京、上海全体工作人员的《告别启事》指出：“当此世界趋向和平，国人厌战已极之际，必武等虽与各方好友暂时睽隔，再见之期，当在不远。”这个启事，经梅益交给友人《南京人报》记者王孚庆于 7 日见了报。

1947 年 3 月 7 日，南京天气晴朗，但有春寒。上午 9 时，曾经在南京、上海艰苦战斗了 10 个月的 74 名党的战士：钱之光、华岗、王炳南、潘梓年、梅益、童小鹏、陈家康、刘昂等，在德高望重的董必武率领下，分乘几辆汽车，从军警特务的包围圈出来，告别了梅园新村，直奔中华门外大校场机场。前来送行的有：国民党代表张治中、邵力子，民盟代表罗隆基、叶笃义，美方代表柯义上校及中外记者数十人。董必武对他们表示感谢，并发表书面谈话，称：“十年来从未断绝的国共关系，从此今已为国民党好战分子一手割

断！”“ 目前虽战祸蔓延，中共党员将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 ”并指出：国民党反动派“ 终必失败，好战分子将自食恶果 ”。董老同张治中、邵力子等握手道谢后即登上飞机，并挥手对送行的人说：“ 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三架美军飞机相继起飞，于 12 时安全到达延安，受到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丰富春、林伯渠、叶剑英、邓颖超，陆定一、李维汉等许多同志的欢迎。

# 在全国解放战争中

## 组织中央机关撤离延安

1947 年 8 月，党中央正式决定周恩来兼军委总参谋长。他以其丰富的指挥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参与重大战略决策和战役的制定与指挥，成为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的主要助手。

自 1946 年 6 月到 1947 年 2 月，我各解放区军民浴血奋战、8 个月内共歼敌 67 个旅，71 万人，平均每个月歼敌 8 个旅，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变化。敌人虽占领了我 105 座城市，等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蒋介石能用于第一线进攻的兵力，从 1946 年 10 月最高峰的 117 个旅降为 85 个旅。1947 年 3 月起，被迫放弃全面进攻的战略，采取“重点进攻”的方针，他集中了 90 多个旅，近 70 万人的兵力，以陕北和山东为其“重点进攻”的目标，妄图先占领我陕北和山东两翼，然后进攻华北解放区，将我军各个击破。

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中央军委决定继续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一面在山东、陕北采用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术，逐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组织其他战场的我军，寻机各个歼灭敌人，配合山东、陕北作战，以粉碎蒋介石的阴谋。

当时陕北的形势是很严重的。蒋介石除以其嫡系胡宗南装备精良的 20 个旅担任对延安的主攻外，还调集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的 12 个旅、榆林邓宝珊的两个旅共 23 万人，向陕甘宁边区全面进攻。当时我西北战场，仅有 4 个旅，1.5 万人，加上后来从晋绥调来的两个旅，共 6 个旅，2 万人，而且装备较差，弹药缺乏，供给困难。加上在延安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边区政府机关和各种学校几千人，需要疏散，更增加了运输和供给的困难。蒋介石早就知道这种情况，所以就下决心先夺取延安，以壮士气。2 月 28 日，蒋介有在南京召见胡宗南，要他立即部署向延安进攻。胡字南气势汹汹地叫嚣，要“三天占领延安”，摧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等首脑机关，三十月内聚歼我军于陕北地区，或逼迫我军东渡黄河，“解决陕北问题”。

在这样紧急情况下，党中央决定撤退我党在上海、南京、重庆的办事机构和北平军调部人员后，立即组织延安保卫战和紧急疏散延安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周恩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组织实施中央决定的各项任务。1947 年 3 月 7 日，我随同董必武回到延安，一下飞机，见到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和许多战友们来迎接，自然无比兴奋，同时也思绪万千。回想 1936 年 12 月 16 日，党中央应张学良先生的要求，派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商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我有幸随周恩来就在这个机场上，乘张学良的专机飞往西安，后来即一直在蒋管区西安、南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1946 年 5 月又随中共代表团到南京局工作，在国民党特务包围下工作共 10 年又 3 个多月，今天平安地回到党中央的怀抱来，是多么艰难又光荣的一段经历啊！10 多年内，虽然无大建树，但完成了党支给我的任务，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无愧于党，也无愧于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和培养！等全部走下飞机后，我们一批人便随着齐燕铭到杨家岭中央城市工作部。齐燕铭说，中央决定，城市工作部是专管蒋管区工作的，部长周恩来兼，副部长是李维汉，他是秘书长，

我是秘书处长，仍主管秘书，机要工作，周子健（原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是副处长，主管行政工作。我当然表示服从党的分配。可是心里总有点嘀咕，在重庆时，许多同志都回到延安马列学院或党校、抗大学习过，我也于 1939 年要求回延安学习，并经过周恩来批准。后来因为需要一批干部坚持工作和斗争，我留在了重庆，失去了学习机会。这次回延安，本想提出学习的要求，可是一听说胡宗南就要进攻延安，中央机关要紧急疏散，不能再提出这个要求了。回到延安，我的工作尚未开始，就要和中央机关一起撤退了。

关于中央的撤退工作，周恩来早就开始抓了。还在 2 月 18 日胡宗南部队分五路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的时候，他就召集了专门会议做了布置，确定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实行坚壁清野，党、政、军、民、学各口负责同志亲自动员、布置、检查、落实。要做到不给胡宗南留下一个群众、一匹牲口、一袋粮食和片纸只字。当时运输力量主要是靠骡马和毛驴，有少数胶轮大车，除机关自己的外，由边区政府动员群众支援，有计划有组织地先把重要文件。物资和老弱病员、幼儿转移到延安东北百余里外的瓦窑堡、永坪一带，除党中央、中央军委、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留下少数干部坚持到最后撤退以外，其余机关、团体、学校等，都分批转移到瓦窑堡一带，然后再东渡黄河到晋绥地区工作。

周恩来除统一指挥、布置和检查各方面的撤退工作外，他还亲自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指定专人将党中央、军委的重要档案文件，特别是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提前转运、妥善保管。指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曾三负责带队，将中央档案运过黄河到晋绥分局，交贺龙负责安排隐蔽。他还亲自检查是否彻底清理和转运。

二、同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副总编辑范长江等研究确定，新华社广播电台分几个步骤转移，采取接力的办法，以保证党中央的声音不间断地传到人民中去。第一步，立即派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带上一套发电机和收讯台、广播台到瓦窑堡山沟里准备好，当延安紧急，新华社广播电台随中央撤离时，瓦窑堡广播台即刻用“陕北新华社”电台接着广播。第二步，中央即通知晋冀鲁豫中央局太行山根据地选择一个地形和条件好的地方，组织新华社的临时总社，配备电台和干部，准备在瓦窑堡广播台转移时，太行山即继续以“陕北新华社”名义广播，重要稿件，由中央直接发给他们。第三步，由廖承志率领总社大部人员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到太行山根据地与临时总社合并，最后移到哪里，看战争形势的发展再定。由范长江带精干的小班子和一部电台组成一个工作队坚持在延安，随中央行动。经过周密的安排，延安广播台于 3 月 18 日随中央撤离延安后停止广播，19 日设在瓦窑堡好坪沟口一个小庙里的广播台立即开始播发文字新闻，口语广播则在迁移中停止了。3 月 25 日，周恩来还亲自到好坪沟新华社广播电台看望了工作人员。由于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重视，及时在大行山区涉县建立了新华社临时总社，4 月 1 日就正式接替了陕北的广播。国民党反动派曾用地面和空中的各种手段侦察新华社广播电台的确实地址，想以空军轰炸破坏，可是始终摸不清楚，1948 年春，在党中央到达晋察冀根据地平山县西柏坡之前，新华社又在西柏坡附近建立了广播台。5 月，新华总社移至西柏坡同中央会合后，即由西柏坡电台广播。因在解放战争中缴获了更大功率的发电设备和电器材料，新华社广播电台，就以更强大的声音，用几种语言和文字，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播放中国

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以及蒋管区人民的斗争情况，成为鼓舞人民斗志和震撼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强大武器。周恩来在这方面是付出了不少心血的！

三、布置负责蒋管区工作的中央城市工作部和负责收集蒋管区党、政、军各种情报的社会部的转移，因为这两个部门每天都要保持和蒋管区地下组织的秘密无线电台的联系，他指定我和社会部的秘书长罗青长，组织一个联合秘书处，我任处长，罗任副处长，从中央机要处拨一个译电科，从军委三局拨两部电台，于 3 月 9 日晚上开始独立行动，每天保持同蒋管区电台的密切联系，将中央指示及时传达有关党组织，将蒋管区的情况，及时转报中央。

我 7 日才从南京回延安，8 日下午参加了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会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伯渠都到会，并讲了话。晚上，周恩来找罗青长和我当面交代任务。他要中央办公厅和军委三局给我们派的机要科和电台都来报到。我们 9 日准备了一天，集中了队伍，中央机要处派邹群科长带了十来个译电员，军委三局派刘富龙台长带了报务、机务员十来人。我们用一辆骡马大车拉上电台设备和一些被褥。我自己当时没有什么东西，除一床夹被单外，衣服都已穿在身上，两架照相机也自己背上，唯一的宝贝是从南京带回来的照片和底片，临时用木板钉了一个箱子，放在大车上，我们一行于 9 日晚动身，按计划经过瓦窑堡、绥德，经碛口东渡黄河，到山西临县的三交镇。因为我们沿途要按时架设电台通报，所以行动比大队伍慢一些。我们这个小分队，除了我和一个炊事员年纪超过 30 以外，其余都是 20 左右的青年，所以走起路来轻松愉快，有说有笑，还不时唱上几句陕北的“信天游”小调或“白毛女”歌剧，一天走七八十里路也不觉得累，大约经过半个月，干 3 月下旬到达临县三交镇附近的后委驻地双塔村，了解到各自机关的具体地点后，就各自归队，恢复正常工作。当时中央机要处和三局驻在孙家沟，城工部驻在王家沟，社会部驻在刘云沟。全部是窑洞，工作方便，更是防空的好地方。

四、考虑到进入大城市和全国解放后需要外事干部，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军委驻地王家坪召集从北平、南京回来的外事人员开会，并决定编成一个小队，队长薛子正，副队长黄华，支部书记王炳南，还有柯柏年、章文晋、陈浩、王光美等十余人，配备了行政人员和一些牲口，过黄河到三交地区。后来就成后委的外事组，由杨尚昆直接领导，驻双塔村。

由于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加以西北野战军的有力阻击，当 1947 年 3 月 19 日胡宗南带上十几万大军趾高气扬地占领延安时，只得到一座空城和许多空窑洞，只有延河里混着许多泥沙的水照样流着，可供胡宗南的人马食用。

## 转战在陕北高原

3 月 8 日，中央机关按计划有秩序地向瓦窑堡方向转移。10 日，中央军委得到隐藏在胡宗南处的熊向晖的情报，胡宗南已将他的主力 15 个旅 14 万人在洛川、宜川之线集结完毕，拟即向延安进攻，并准备用伞兵袭击延安。周恩来即起草电报命令刚在陇东西华池结束战斗向延安前进的新四旅，要在两天之内赶到延安附近，保卫党中央和延安，他们如期到达，周恩来交代旅首长，立即研究歼灭敌人伞兵的作战方案，一定要确保延安飞机场不被伞兵占领。并要他们告诉指战员，伞兵并不可怕，他们刚从飞机跳下来，方向都摸不清，只要沉着应战，是可以把他们歼灭的，大概因为敌人害怕伞兵跳到延安山沟里被消灭，没有实行这个计划。3 月 11 日上午，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刚乘飞机撤离，下午，美国支援国民党的轰炸机就开始对延安施行狂轰乱炸。

3 月 13 日，胡宗南指挥他的主力在空军的掩护下，从洛川、宜川向延安大举进攻。16 日，我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司令员、习仲勋副政治委员率领 6 个旅，2.6 万多人，抗击胡宗南的进攻。经过六天六夜的阻击，歼敌 2000 多人。18 日下午，敌人已进到三十里铺附近，延安已听到炮声了。毛泽东还在王家坪接见保卫延安的新四旅团以上干部。他说，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背上了包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要告诉大家，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一定要回到延安来的。周恩来针对一些干部和战士对撤离延安想不通，也进行耐心的解释工作。他对警卫部队说，毛主席和我们都不愿意离开延安，但是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我们暂时离开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现在走是为了将来不走。17 日，他给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写信说：“ 目前国内外形势，日益向有利于人民的方面发展。 ”“ 倘以边区现有之力，能箝制与削弱胡之主力于此区，则对于争取全国胜利将帮助甚大。故现时边区正以全力进行此长期战争，并不望敌人退出也。 ”

毛泽东、周恩来的伟大预见，正逐渐变成现实。

18 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等在炮声中从容地吃了晚饭，经彭德怀的一再催促，7 时左右，才坐上吉普车出了王家坪，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住了十年的古城延安，沿延、榆公路向东北驶去，边走还边回头看看巍峨的宝塔山。此时，延安城除作战部队外，机关人员和群众已全部撤离。

3 月 19 日，西北野战兵团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撤退任务后，主动从延安撤退。为吸引敌人主力北去，以两个营的兵力佯装主力，边打边往安塞方面转移，将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青化砭地区，待机歼敌。

胡宗南主力占领延安空城后，他一方面误认我军主力已向安塞“ 逃窜 ”，集中五十旅往北追击。并立即向蒋介石“ 报喜 ”，谎报战绩，吹嘘“ 匪军不堪一击，已仓皇北窜 ”。蒋介石发电报给胡宗南说：“ 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 ”陕西省主席祝绍周还在西安挂国旗、放鞭炮，庆祝“ 陕北大捷 ”。南京国防部大吹大擂，要组织上海、南京的中外记者到延安参观访问。胡宗南为宣传他的“ 战绩 ”，亲自在延安假设“ 战俘管理处 ”，要一些士兵化装“ 共俘 ”，还搞“ 战绩陈列室 ”欺骗记者。

可是蒋介石、胡宗南笑得大早了！正在他们宣传“ 陕北大捷 ”的时候，我西北野战兵团于 3 月 25 日利用敌三十一旅在拐峁补充了粮食，进入青化砭

地区我预设的袋形阵地后，以五个旅的兵力四面夹攻，不到两个小时，将三十一旅旅部及所率一个团近 3000 人，全部消灭，敌旅长李纪云及副旅长、参谋长、团长都被活捉，给了蒋介石、胡宗南当头一棒！胡宗南以近 3000 官兵、2000 多支枪、30 万发子弹，作为占领延安后的第一个见面礼。我解放区军民和蒋管区人民听到此消息，都很高兴，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的正确方针。

党中央、军委撤出延安后，即朝东北方向隐蔽行动，于 3 月 28 日到达清涧县的枣林沟。因已知道国民党有测量电台位置的测向台设备，毛泽东、周恩来决定中央的电台在转移中停止工作三天，使敌人摸不清中央的去向。周恩来还起草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负责人电：“蒋敌现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但对小电台因电波弱，不易辨别。因此，愿你们在作战前部署期间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由于中央军委和各野战军采取了这些措施，使敌人始终摸不清楚党中央和各野战军司令部的确切地址。

为使中央军委便于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又使中央机关能在安全地区进行正常工作，党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书记，东渡黄河，到华北解放区，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叶剑英为书记，到晋西北解放区负责后方工作。

中央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紧张地进行一系列的组织工作。

首先，组织一个短小精悍、机动灵活的支队，为中央和军委工作。为了保密，毛泽东命名为昆仑支队，由任弼时任司令员，化名史林；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长，主管宣传工作）任政治委员，化名郑位；叶子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下分四个大队：一大队就是司令部作战机关，除首长外，包括军事组，有五六个作战参谋；机要科十几个人。龙飞虎是大队长，负责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的警卫工作。二大队是军委二局部分工作人员，负责情报工作。三大队是军委三局的电台工作人员（有三部电台）和电话排。四大队是新华社，负责新闻宣传工作。总共只 300 来人。警卫部队是中央警卫团的四个连（一个手枪连、两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共 400 来人）。组成支队后，周恩来还亲自进行动员工作，特别嘱咐叶子龙、汪东兴、龙飞虎等同志，一定要负责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朱德也对警卫部队讲了话，把负责毛主席安全的重任托咐给他们。

为了具体布置中央工委的转移和中央后委的工作，周恩来带着两个警卫员骑马经绥德，在军渡过黄河，于 4 月 2 日到达三交同朱德、刘少奇、叶剑英、杨尚昆等会合。详细研究了中央工委的行动路线，确定经过晋绥边区的兴县、岢岚、神池等地，再经过晋察冀解放区的代县、阜平到平山地区，由晋察冀中央局负责安置。后委即分布在三交附近的村庄。周恩来向中央机关负责干部传达了中央枣林沟会议的决定，当宣布毛主席、任弼时和他三人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坚持在陕北与敌周旋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时，一些同志都感到惊讶，纷纷议论，担心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解释毛主席和党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伟大意义，说明陕北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完全有保障，请大家放心。并宣布了中央工委将到晋察冀边区平山地区工作，

首先是筹备和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后委即在三交附近工作。

中央工委在三交附近稍事休息后，即由朱德、刘少奇率领往晋察冀边区转移，所属机关有组织部、宣传部、政治部、党校、解放日报社、工青妇委、中央办公厅和卫生部、供给部一部分。周恩来亲自交代伍云甫要做好工委机关的行政管理工作，对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的生活要适当照顾。伍云甫开始对做行政管理工作思想有些不通，经周恩来说服后，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不仅保证了中央工委的工作和生活需要，也为 1948 年中央机关全部到达西柏坡做了充分准备。

中央后委驻三交附近的双塔村。所属单位有社会部、城工部、中央办公厅、外事组、军委作战部、军委二局和三局、中央机要处、供给部等共 3000 多人。周恩来对后委的工作做了布置。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负责招待了一些老人如吴玉章、谢觉哉等，周恩来亲自交代处长金城，要特别注意他们的安全与健康。周恩来对城工部的工作作了更具体的交代。除了及时向蒋管区的党组织传达中央精神，及时将蒋管区的报告转报中央并提出意见外，要分组对抗战以来蒋管区的党的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群众斗争和武装斗争等进行研究、总结，对当前蒋管区的人民斗争提出意见。

接着，周恩来又到临县晋绥分局驻地同贺龙（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兼晋绥军区司令）、李井泉（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等见了面，请他们注意掩护中央工委安全转移到晋察冀边区，帮助解决中央后委机关的粮食供应。他对晋绥边区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倾向，进行了批评，要晋绥分局注意纠正。

周恩来为了赶回中央，只带两个警卫员西渡黄河，经过几天后于 4 月 10 日到靖边的青阳岔和毛泽东会台。第二天，他就为中央起草电报，把中央机关分为三部分的决定和工委、后委的负责人名单通知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4 月 12 日，昆仑支队转移到安塞县一个小山沟里的王家湾。这个村子很小，只一 20 孔窑洞，有的破烂得连门窗也没有，交通不便，给养也困难。但是老苏区群众很好，保密条件也好。党中央就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中，停留了 56 天，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战争。

刚到王家湾的第三天，即 4 月 14 日，西北野战兵团以四个旅的兵力，在瓦窑堡以南的丰马河围歼了孤军深入的敌一三五旅 4700 余人，首创西北战场我军全歼敌人一个整旅的范例，给蒋介石、胡宗南又一次严重打击。毛泽东向各战区通报这一战役胜利时指出：“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毛泽东 4 月 15 日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羊马河我军告捷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中共中央及其主力在绥德附近集结”，要胡宗南主力九个旅自蟠龙、永坪向绥德迅速北进，并要榆林的邓宝珊部向南策应，企图南北夹击，将我一举消灭。可是蒋介石得的是假情报，我中共中央不在绥德，而在绥德以西百多公里的王家湾，我军主力则在瓦窑堡附近待机歼敌。正当胡宗南主力九个旅在绥德

一带武装大游行，拖得疲劳不堪时，我西北野战军于 5 月 4 日集中优势兵力，向孤立踞守在蟠龙补给站的敌一六七旅及地方部队进攻，将敌 6700 多人全部歼灭，俘敌旅长李昆岗，缴获大量粮食和军用物资，军服 4 万多套，子弹百万余发。这是胡宗南运输大队长的“伟大贡献”！等胡宗南下令九个旅由绥德回援蟠龙时，蟠龙的物资已搬得一空，搞得他们既疲劳又缺粮。而我两北野战军已转移至安塞附近休整了。

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的 40 多天中，我军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大战役的胜利，军民斗志昂扬，而胡宗南虽然占了几座空城，但损兵折将两万多，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到处扑空、挨打。

5 月 9 日，新华社播发了经过周恩来修改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辛辣地指出：“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又指出，不到两个月，丧失三十旅，“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

西北野战兵团接连取得三次大捷以后，下一步如何行动？5 月 10 日，周恩来从王家湾出发赶到安塞县马家沟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同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开会，分析了西北战场的敌我形势，确定了下一步出击陇东的作战计划，并电告毛泽东。为了壮我军志气，灭敌人威风，决定 5 月 14 日在真武洞召开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大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出席讲话。

真武洞，在延安以北 90 华里。召开祝捷大会的消息一传出，周围几十里的群众都赶来了。野战军则穿上刚从蟠龙缴来的新军衣，背上美制新式武器和饱满的子弹袋，雄纠纠地进入会场。为防止敌机空袭，大会在下午 4 时举行。但群众在 3 时前就来了，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兴高采烈地站满了会场，会场容不下，就坐在会场外围的山坡上，真是人山人海。主席台上有彭德怀、习仲勋、林伯渠等领导同志。当台下群众发现周恩来副主席时，特别兴奋，都议论纷纷，猜想毛主席一定也还在陕北。彭德怀宣布大会开始后，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我代表中共中央祝贺你们，代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他用宏亮的声音宣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自从撤离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同边区的全体军民共同奋斗。热烈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动了山谷。周恩来又说：蒋介石、胡宗南梦想赶走中共中央、消灭西北解放军，征服边区人民，但是，一件也没有做到。他介绍了全国各战场都取得了很大胜利的情况，号召边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彻底消灭胡宗南，早日收复延安，解放全西北，解放全中国！这次大会，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

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恼羞成怒，责怪他的忠实走狗胡宗南无能，不仅没有“消灭共军”，反而连吃三次败仗；又怪情报机关和空军，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一直在陕北，总是弄不清楚他们在那里。根据周恩来在真武洞出现的情况，他们判断中共中央在青阳岔、王家湾一带，又梦想要一举消灭中共中央和我西北野战军。胡宗南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刘勘，率四个半旅人马，在空军掩护下，由延安、蟠龙一带气势汹汹地向青阳岔、王家湾扑来。

毛主席和党中央早就估计了敌人这一手，派周恩来到真武洞出面，就是要把敌人主力吸引到陕北的深山沟里来，拖得他们精疲力竭，以便我西北野战军能顺利进行陇东战役。毛泽东估计敌人此次行动有三个企图：一是把我消灭在王家湾一带；二是逼我们过黄河；三是把我们赶到北边沙漠地带困死、

饿死。可是敌人连遭三次失败后胆小如鼠，又怕遭到我主力伏击被歼，所以只敢大集团的并行前进。他们那里知道，毛泽东在这里布置了一个“空城计”。西北野战军已于 5 月 21 日按计划西进，到了离王家湾几百里地的陇东。党中央机关的警卫部队只四个连。6 月 8 日，敌人先头部队已到离王家湾五里远的山头上，警卫部队一面加强警戒，一面帮助地方干部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后全部转移。听到枪声时，周恩来还亲自检查住的窑洞是否遗留有片纸只字，然后才同毛泽东冒着大雨率领昆仑支队离开了住了 50 多天的王家湾。为了迷惑敌人，毛泽东、周恩来商量留下警卫团团长刘辉山指定一个连长带一个步兵排，配一挺机枪，在王家湾、小河一带吸引敌人。周恩来还亲自交代了任务和办法。这个排灵活地采用了毛泽东的“蘑菇”战术，到东边放几枪，引着敌人往东走；又到西边放几枪，引着敌人往西走，拖得敌人疲劳不堪，又找不到粮食，只得往南退去。我中央机关就在敌人的旁边安全转移。6 月 17 日，昆仑支队就在离王家湾几十里路的小河村（均属靖边县）安然地住下来，又开始“运筹窑洞之中，决战千里之外”了。同志们都称赞毛主席不仅“用兵如神”，而且也“料敌如神”。

蒋介石、胡宗南既未达到“消灭共军主力”的目的，又未实现“把毛泽东赶过黄河”的梦想，只有自欺欺人的要“中央社”广播什么“共军已从陕北溃散”，“毛泽东已离开陕北，到达山西兴县”等鬼话。

党中央在指挥西北战场的同时，粉碎了蒋军对山东战场的进攻。

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的不断胜利，使得蒋介石的“重点进攻”遭到惨重的失败！

由于蒋介石的大部分主力部队被吸引并牵制在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就为其他解放区的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各个战场上，都捷报频传。晋冀鲁豫解放军在 4、5 月间对敌发动了攻势，全歼蒋介石的第二快速纵队和暂编第三纵队，共 4.5 万多人，解放了豫北、冀南大片土地，控制了平汉铁路 300 多公里，破坏了敌人在山东、陕北两个战场之间的联系，为下一步刘邓大军南下创造了有利条件。

## 小河会议决定战略反攻

小河，是陕西西北边城靖边县的一个小山沟，一条用几块石头摆成跳石桥的小河，日夜不停地向东流入大理河，到绥德汇人无定河再流入黄河。小河西边和山坡上有 30 几个窑洞，住了 30 来户人家。中央机关就挤在群众让出来的一些窑洞，各大队分别在附近的小村里。

中央住在小河村时，解放战争即将进到第二个年头。解放战争第一年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需要加以总结，第二年里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基本任务应该加以确定。为此，中央决定要在这里召开一次会议。

早在王家湾的时候，毛泽东根据战局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我的形势，就开始了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伟大部署。毛泽东 5 月 8 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的电报，指示刘、邓所部争取于 6 月 1 日前休整完毕，6 月 10 日前渡过黄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陈、粟所部准备于 6 月 10 日以后配合刘、邓大军大举出击。6 月 30 日晚，刘、邓大军四个纵队约 13 万人，在山东济南和河南开封之间宽约 300 里间的八个渡河点，一举强渡成功，蒋介石鼓吹黄河能抵 40 万大军的神话，完全破产，他的中原防线也被冲破。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把这件事当作“六卅事件”，说“六卅事件决非好兆”。

刘、邓大军过河后，利用敌人张皇失措的时机，立即发动了鲁西南战役，经过 28 天的连续作战，全歼敌人四个师部和九个半旅，共六万余人，俘虏敌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等一批高级将领。这一胜利，揭开了全国大反攻的序幕，打开了跃进大别山的通路，迫使亲自到开封坐镇指挥的蒋介石心焦如焚，除在河南地区调兵遣将外，还从陕北、山东等地抽调了 11 个师，这给敌人的重点进攻以沉重打击，打乱了敌人在南线的战略部署。

这一胜利，为中央小河会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为了小河会议的召开，周恩来事前做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他打电报给各野战司令部，把从去年 7 月到今年 6 月一年中，消灭了敌人的多少个师、旅、团、营的建制，消灭人数和缴获的武器弹药详细地报军委，以便统计向中央报告。他对张清化、张明等参谋人员说，我们的战报一定要确实，不能虚报、假报，假报对敌人无损失，只能欺骗自己，失掉群众的信任。什么叫消灭敌人呢？就是要整连、整营、整团、整旅、整师地全部消灭。打垮的不能算。因为我们提倡歼灭战，歼灭他一个团，他就少了一个团，如果只把他打垮，他回去一整理又来了。对我军一年来的损失和增长的数目也要如实统计。五六个参谋人员就为统计一年战果和在地图上标记等，忙了一阵子。参谋人员统计后，周恩来还要自己核算，有些不准确的，还得打电报去问清楚。在准确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周恩来又亲自起草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提纲。会场的布置也是他亲自主持的。为了便于当面商量问题，毛泽东已从半山坡的窑洞里搬到河摊边周恩来、任弼时住的窑洞旁边，窑洞前面有一个小院子，周恩来要警卫部队用杨树枝搭了个凉棚，凉棚下摆上两张从群众家里借来的桌子和几条长板凳。到会首长的住宿、伙食等也作了具体指示。小河是一个小村庄，供给困难，所以专门派人到靖边去采购食物。

当时蒋介石命令特务机关加紧侦察中共中央和新华社广播电台的具体位置，在陕北各地布置了测向台，准备派空军和地面部队进攻。在北平、西安、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也布置测向台，企图发现我地下电台后加以破坏。为

研究对策，周恩来电告中央后委，要军委二局局长戴镜元、三局局长王诤、中央机要处长李质忠和主管蒋管区秘密电台的罗青长和我，于 7 月中从三交过黄河到小河参加机要工作会议。我们按时到达，因周恩来忙于准备中央会议，我们只能等到中央会议开完后才正式开会。我恰好带上了徕克照相机，所以得有机会拍下了有历史意义的小河会议的照片。

中央军委原定要陈赓、谢富治所率领的山西太岳纵队在 6 月底或 7 月初西渡黄河，加强陕北军事力量，与西北野战兵团在内线歼灭胡宗南主力，夺取大西北的任务。由于刘、邓大军己南渡黄河，情况发生了变化，又考虑陕北地区人口稀少，供应困难，而豫西地区在胡宗南部大部调到陕北后，兵力空虚，如把陈、谢纵队使用到这个地区，不仅必将迫使胡宗南分兵救援，有利于西北野战兵团各个歼敌，而且对刘、邓大军的南下可起到配合作用。军委为此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征求意见，同时通知陈赓先到小河面谈。7 月 19 日，陈赓由河东来到小河村。毛泽东、周恩来同陈赓商议后，决定将陈谢纵队改为南渡黄河向豫西挺进。

陈赓对于党中央和军委的命令，从来都是坚决服从的，他是革命乐观主义者，不怕任何困难。这一次接受了新的任务特别高兴。因为他可以在敌人薄弱的豫西地区大显身手了。20 日一清早陈赓就起来了，一下子窜到我和叶子龙住的小窑洞里来，把我们的被子掀起要我们起床。我们睁开睡眼一看是他，就开玩笑他说，你睡足了，我们还没有睡够呢，不要捣乱。他郑重其事他说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不来陕北吃小米，要到河南去吃白面、大米了。我和叶子龙听后也为他接受了打出去的光荣任务而高兴，并说祝贺陈赓胡子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可是不要忘记我们这些还在吃小米的人啊！他作个鬼脸一笑就走了。

小河会议于 7 月 21 日至 23 日开了三天。到会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外，还有彭德怀、习仲勋、贺龙、王震、陈赓等由前方回来的将领。他们就坐在凉棚下的几条木板凳上讨论关系全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战略问题。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并先讲话，他说，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但还未到绝对孤立。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战绩，是有可能的。原来计划陈赓和边区部队集中打，现在决定分开打，从战略上和粮食供应上看都有利。边区在军事上、财政上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贺龙统一领导这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

周恩来在会上，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取得的成绩，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趋势。他说，过去一年内蒋军有了极大的变化，敌正规军原有 248 个旅，已被歼灭三分之一弱，我缴获枪支 70 万支，占总数三分之一强；从质量说，不止降低三分之一。敌军在去年 7 月至 10 月，占领了解放区 104 座城市，兵力更分散了；11 月至今年 2 月，敌军逐渐集中兵力，但在此期间我歼敌最多，城市则得失相当；3 月至 6 月，敌军攻势己成强弩之末。除山东、陕北外，我均转入反攻，得城市 62 座。预计明年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还将在数量上超过敌人。今后发展必须求之于新区，主力的发展则求之于地方部队的升级。

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军委提出的实行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的方针。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陈、粟、谭和华东局

的电报，建议刘邓所部“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陈粟谭率鲁中兵力并在刘邓到大别山后指挥陈（士榘）唐（亮）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陈谢集团至豫西后，受刘邓指挥作战。”

会议结束后，前线将领立刻回到指挥部去执行中央决定。全国性的战略大反攻，就要开始了。周恩来向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作了报告。他说：去年的作战方针是战略上防御，把敌人引到解放区来消灭，现在我们已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我们只有实行打出去的方针，才能取得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摧毁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他又找我们开了机要电台保密会议，会后，我们就离开小河回到山西三交地区各自执行任务去了。

7 月 31 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电：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下辖三个纵队另两个野战旅，共约五万人。

中共中央不等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不等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敌人，就下决心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力主要突击方向，实行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直插敌人的战略后方，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从而改变整个战争的态势。这个战略决策是十分英明果敢的。战争的形势，就是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伟大预见发展的。

当时，对于我军的战略进攻行动，毛泽东曾做了生动的比喻：蒋介石把他的主力集中于陕北、山东，搞“重点进攻”，好比他把两个拳头同时伸出去，他的胸膛就暴露出来了。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很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两头力量强，还有攻势，中间薄弱，处于防御。我们就攻其薄弱部分，从中央突破，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胸膛。

发动全面内战的蒋介石和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做梦也想不到就在陕北的小河村子里的凉棚下，决定了他们彻底失败的命运。

为了实现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中央军委做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布置。“三军配合”是刘邓大军实施中间突破，直趋大别山；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并指挥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为左路，在山东西渡过黄河，挺进豫皖苏地区；陈赓、谢富治率领大岳兵团两个纵队和三十八军为右路军，自晋南豫北交界处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三军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相配合，机动歼敌。“两翼配合”是：以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主力围攻榆林，调动陕北敌人北上，将敌人的“左拳”拉到沙漠边缘；以山东内线部队在胶东展开攻势，调动山东敌人主力向东，将敌人的“右拳”拉到渤海之滨。这样，就使敌人更加分散，更加“胸膛袒露”，便于南下三路大军之行动。

为了靠近西北野战军总部，便于商定彻底粉碎胡宗南的进攻，中央机关由小河时的“三支队”改为“九支队”，由周恩来兼任司令员和政委，于 8 月 1 日离开小河村，沿大理河向东转移，经过 19 天的艰苦行军，于 8 月 20 日到达米脂县的梁家岔才停下来。这里离西北野战军的总部住地东原村只有 20 里。

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于 8 月 6 日开始围攻长城边塞榆林城。胡宗南果然又一次“听从”毛泽东的“调遣”，迅速抽调了十个半旅 6.3 万多人，分几路北上，妄想先解榆林之围，再寻找我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主力

决战，歼灭我军于榆林、葭县、米脂三角间的狭小地带，或逼我过黄河。西北野战军果断地撤出榆林战斗，于 8 月 12 日将主力隐蔽集中于米脂县沙家店地区，待机歼敌。以小部队佯做东渡黄河。胡宗南根据电台测向和空军的侦察报告，误以为我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主力要东渡黄河，下定“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的决心，并狂言“一战结束陕北问题”，急令各路敌军迅速追击。胡宗南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五个旅，由绥德北进；令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两个旅，从榆林南下镇川堡。西北野战军随即以一部兵力阻击刘勘，集中六个旅于沙家店地区，准备歼敌。钟松的三十六师，是胡宗南主力，他解了榆林之围得到胡宗南表扬。现在又急于立功，远离主力，进入西北野战军的伏击区。8 月 20 日，西北野战军发动攻击，经过一天激战，全歼三十六师师部和一个旅，并在常高山以南歼灭该师的另一个旅，共六千余人，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被俘。这是西北战场上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它改变了整个西北战局，打破了蒋介石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使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进攻。同时把胡宗南主力拖在陕北，也有力地配合了陈谢集团挺进豫西的行动。

沙家店战役的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同彭德怀等开会。毛泽东称赞这一仗打得好。他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陕北战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西北野战军手中了。

沙家店战役后，陈赓、谢富治指挥太岳兵团于 8 月 22 日、23 日分两路南渡黄河，进人豫西，威逼陕南。胡宗南急令刘戡、董钊率领陷在绥德以北的八个旅，撤回延安以南。因怕被我各个击破，采取了密集行军、交替掩护办法南撤，沿途受到我军追击、侧击，恐慌万状，走了一个月才到延安地区集结。我军乘胜追击，到 9 月中，收复了葭县、吴堡、靖边、子洲、横山、吴旗、安塞、志丹等县城，接着收复延川、延长。10 月 11 日，攻克清涧县城，全歼敌整编七十六师 8000 多人，活捉师长廖昂，迫使胡宗南放弃延安以北的据点。

西北战场已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但是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不过黄河，仍在困难情况下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8 月 24 日，中共中央由梁家岔转移到葭县的朱官寨。

9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朱官寨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指示总结了第一年作战的伟大胜利后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这个指示，为我军打到国民党区域指明了胜利的方向。

这时全国各战场都出现了大反攻的形势。

刘邓大军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英勇行动，战胜了黄泛区泥泞道路和强大敌人阻击等困难，解放了 23 座县城，迅速地在大别山区站稳了脚跟。陈谢兵团强渡黄河进入豫西地区后，歼敌 4 万多人，有力地支援了陕北、大别山地区作战，占了县城 19 座，建立了八个军分区和 21 个县级政权，成立了豫陕鄂军区和行政公署，根据地初步形成。陈粟华东野战军主力越陇海路南下，解放县城 24 座，完成在豫皖苏边区的展开。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大地，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把蒋介石的战略防御体系完全打乱了。这是对战争发展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

东北民主联军于 9 月 14 日发动了秋季攻势，歼敌 6.9 万余人，占领城市 17 座，迫使敌军退守到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及其附近地区，陷入被动局面。

华东野战军留在山东进行内线作战的山东兵团，发起了胶河战役，击败敌人 11 个旅，歼敌 1.2 万多人，我军转入反攻。

晋冀察野战军，自九月起进行外线作战。在清风店战役中，歼敌两万多人，生俘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在朱德总司令的直接指导下，他们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攻占了华北重镇石家庄，歼敌 2.4 万余人，开创了人民解放军攻占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先例。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当时驻在平山西柏坡的中央工委和各解放区打通了直接联系。

为了便于同各方面联系和解决供养问题,中央机关于 9 月 21 日离开朱官寨，23 日到达葭县（现佳县）西南 15 里的神泉堡。神泉堡是比较大的一个乡村，在一个山坡上，地势险要，从悬崖边上有一条小路进村，村口的隘路上，用条石砌了一座堡垒式的大门，门上方刻有“神泉堡”三个大字。村内有一家地主的大院，大门口有一对精刻的石鼓，鼓上面还有一个小狮子。大院内有一排石拱窑洞。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住在这里，这是从延安撤退后半年以来居住条件较好的一个地方。加以敌人已向南撤退，也是很安全的地方。这里离葭县近，给养没问题，从葭县过黄河，就是山西的临县，到中央后委住地三交的双塔村也不远。因此，中央就在这里工作了两个月。

这时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都已打到蒋管区，彻底打破了蒋介石的防御体系。但是，困难还很多：蒋介石拼命从各方面抽调兵力对我军阻击、追击；我军远离后方，长途行军、作战，损失不少；新区群众对我还不了解，人生地疏，语言不通；给养困难，生活艰苦，部队出现一些思想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无时不关心的问题。为了及时同前线保持无线电通信，周恩来在部队离开朱官寨前一天，就要三大队先派出电台到神泉堡同各路大军沟通电台联络，部队一到就可以收发电报。当中共机关到神泉堡时，前方就发来电报，使中央及时了解前方的情况。周恩来规定，电台和机要科都要 24 小时值班，电报随收随译随送，绝不耽误。收报译好后即送周恩来，凡十万火急以上的急电，不管他睡了觉，也要叫他起来看。但当毛泽东休息后，除非特别紧急的立即送给他看外，一 般都要等他醒来后才送，好让他多休息一会儿。毛泽东常常是彻夜不眠的，当他将要休息时，常常习惯性地自己到机要科去问有没有电报，如有电报正在翻译，他就等到看完电报甚至起草了回电才去睡觉。他常常一起来就叫叶子龙科长要电报看，如没有电报，也会自己到机要科去。当时，我正在神泉堡参加机要工作会议。有一天早晨，毛泽东刚从机要科窑洞里出来时，我立即抓拍了一张照片。有一个上午，他看到前方打胜仗的电报很高兴，坐在窑洞门口的石阶上，和机要科全体同志照了个合影，这是我摄影史上的光荣一页。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在小小的窑洞里靠电报了如指掌地及时了解和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周恩来刚到神泉堡几天，得悉在北平和我地下情报系统有工作关系的民主人士余心清等二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情报系统一个地下电台也被国民党特务测向台发现而被破坏，周恩来立即电告主管部门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破坏的扩大和设法营救余心情，同时通知戴镜元、李质忠、罗青长和我迅速赶到神泉堡去开机要工作会议。我们四人从三交骑了两天的马于 9 月 28 日上午到达，正好听到了周恩来当天下午向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做的形势报告。周恩来报告的主题

是“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他对当前的战争形势做了详细的分析，他说，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后，党的方针是要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但蒋介石不要和平，动员了 300 万军队进攻我们，经过一年自卫战争，被我们消灭了 110 多万。我们胜利的原因是：一、人民拥护我们作战，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做事的；二、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是人民的子弟兵；三、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得好。过去一年，我们是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现在我们在战略上也是进攻，提出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是适当的。蒋介石有三个弱点：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我们则充分具备了大反攻的条件，首先是我军愈战愈强，第二是土地革命，第三是扩大了解放区。战争的第二年是要打出去。我们的方针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我们打倒蒋介石是有把握的，当然不是说再打一年就能解决问题，要到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我们要解放全中国，整个形势的发展是定了的。报告结束时，他举手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全场一致跟着高呼，并热烈鼓掌。

这是一个十分鼓舞人心的报告。我们听了报告后，都增加了胜利的信心，也增加了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感。

9 月 30 日，周恩来、任弼时召集我们开机要工作会议。针对国民党特务在美国情报局的大力支持下要侦破我在蒋管区的地下组织和秘密电台，用测向台多方侦测我党中央、各野战军司令部电台，并妄图破译我核心密码的种种阴谋。他们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百忙中，抽出时间听我们的工作汇报，同我们研究对付敌人空中侦测、地下破坏、密码破译等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周恩来特别强调这是一条秘密战线的对敌斗争，只能胜利，不能失败。这是关系到解放战争胜利与失败的严重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因为他们很忙，不能每天同我们一起开会，只能抽空来参加，所以要我们就此先进行研究。首先是密码的编制、使用、保管的问题，要做到万无一失。对公开、秘密电台如何避开敌人测向，如何迷惑敌人，也要总结经验教训，订出一套可行办法来。经过我们反复研究和不断得到周恩来、任弼时的多次指示，会议前后开了 20 多天，取得了完满的结果。会议最后，周恩来对我们在机要战线上同国民党的斗争性质，做了极为重要的科学分析。他说，这种斗争，是政治与技术相结合的斗争。我们在技术上落后于国民党，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进步，总有一天能赶上他们；但在政治上，我们是先进的，我们的人员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严格的制度，这是他们永远赶不上的。他们虽然有技术，但政治上是腐朽的，官僚主义，官官相护，上下相欺，制度不执行，有许多漏洞我们可以利用。只要我们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执行制度，又注意技术进步，就一定能战胜他们。这是对机要战线上斗争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这次会议，对于加强我党机要通信工作，保障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为建国后加强党的机要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任弼时还抽空高兴地带我们一道走到黄河边的一个白云山上，参观了历史悠久的白云观，参加了庙会，并摄影留念。晚上还一起点起蜡烛打扑克。十月底，除戴镜元继续留下领导二大队工作外，我和李质忠、罗青长都高兴地回到三交自己的机关，立即采取措施贯彻会议的决定。

毛泽东领导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期间，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召开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土

地会议。会议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等组成的主席团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机关的负责同志和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冀热辽、陕甘宁、晋绥等解放区代表共一百零七人。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会后，中央工委即向中央报告了会议情况并将《中国土地法大纲》报中央审批。党中央在神泉堡讨论了中央工委的报告，于 10 月 10 日做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连同《中国土地法大纲》经新华社向全国宣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以后，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老区已经得到土地的农民欢欣鼓舞，认为他们得到的土地有法律保障，得到党中央的正式批准，从而更加努力生产和支援解放战争。在前方作战的子弟兵，也更加勇敢地为保卫家乡已得到的土地而战斗。新区的农民，也渴望能够根据土地法大纲得到土地，更积极帮助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武装，建立民主政权。

这时，刘邓大军虽然已初步完成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建立了 17 个县的民主政权，但是蒋介石深恶痛绝地要拔出插到他胸膛的这把尖刀，拼命调集大军妄图把刘邓大军消灭在大别山区。

毛泽东和周恩来身在神泉堡，心系大别山，每天都关心刘邓大军能否扎下根来。除随时提供敌情给以指示外，做出了给他们增加兵力的决策。经过同晋冀鲁豫中央局商量后，决定将留在内线作战的第十、第十二两个纵队，带上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愈归队的指战员，运送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元，南下中原。这两个纵队经过长途跋涉和沿途作战，按照军委计划达到指定地区，加强了中原野战军的力量，提高了粉碎敌人围攻和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信心。刘怕承司令员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中原野战军的“雪里送炭”。

10 月间，蒋介石集中在大别山北部的兵力六个多师，妄图合击光山、新县地区的我军主力。我军以一部分兵力牵制和迷惑敌人，主力转到外地寻机歼敌。首先在皖西六安县东南的张家店，把在运动中的敌人八十八师六十二旅全部消灭，创造了我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消灭敌人正规旅的新纪录。接着，又于 10 月 26 日，在湖北蕲春县的高山铺地区，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将钻进我埋伏圈的蒋军四十师师部和两个半旅共 1.2 万多人，全部歼灭。当武汉敌机到高山铺上空投下馒头、烧饼时，我军毫不客气地收下了。

10 月 27 日下午，当刘邓大军把他们的胜利消息报到神泉堡中央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十分高兴。毛泽东得到刘邓胜利的消息后，兴奋得没有睡好觉。当天晚上，他就给刘邓发了祝贺电报，第二天一清早，他要叶子龙通知周恩来、任弼时，放假一星期，不开会，搬到白云山下的一个村子里去休息，除了紧急的电报外，不要送文件给他看。叶子龙一面报告周恩来和任弼时，一面通知汪东兴派人到前面打前站，准备毛泽东休息的地方。吃完早饭后，毛泽东带着警卫人员往白云山走。神泉堡到白云山只十来华里，饲养员给他牵来马，他只骑了一段就下了马，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走路，一路有说有笑地走着，不多久就到了白云山下的一个村子里，前站人员已经向群众借好了几孔窑洞请毛泽东休息。他只稍微休息一会儿，喝了几口茶，又精神抖擞地沿着石阶爬到白三山顶的白云观参观游览。白云观是唐代始建的古迹，当每年庙会时，黄河两岸都有许多群众来参加。山上有不少苍松古柏，山的东面是滔滔的黄河，河东是山西临县。这是陕北难得的一个风景点。

当我和罗青长得到毛泽东游白云山消息后，也赶去参观，正要上到山顶时，毛泽东已从山上往下走，要我给他照个“背靠黄河”的相。这是个很难

得的机会，我立即把徕克镜头对着他，以黄河为背景连照了两张，他高兴地下山了，我也跟着下山。

从这天起，毛泽东就在白云山下住了一星期，白天是上白云山或到黄河边散步，有时到群众家里闲谈，晚上就约三个同志打麻将。他的麻将技术是很高明的，常常是他和，而且规定无翻不准和，他一和就是多少番。当他把别人的筹码赢到一堆在面前时，就像打了胜仗一样，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那时候，恰巧谢觉哉从山西临县三交附近的甘泉沟过河到了神泉堡。谢老是中央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他和王明、吴玉章、何思敬等在甘泉沟研究宪法问题，他特意来看望毛泽东并报告宪法研究情况。毛泽东同他详细交谈，10 月 29 日又一同上白云山游览，老战友战地重逢，分外高兴。他俩人正在住房门口坐在木板凳上促膝交谈时，我拍下了这个珍贵的场面。

说起来也真奇怪！我那几天在神泉堡和白云山上，给周恩来、陆定一、任弼时和夫人陈琮瑛等都照过相，回到三交王家沟城工部时，我自己冲洗后印成相片时，包括在小河照的小河会议、毛泽东同机要人员合影照等都很清楚，唯独不见毛泽东“背靠黄河”那张照片！是胶卷走光？是冲洗坏了？我一直没有找出原因。这是多么可惜的一张珍贵照片！这是我 50 多年摄影史上最大的失误！是无法补救的，成了我终身遗憾的一件事！罗青长一提到这件事时就批评我，不知批评过多少次。我一直后悔没有在南京撤退前设法多买些胶卷带回延安来，如果胶卷充足，还可多照许多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啊！

毛泽东在白云山下，好容易休息了一个星期，身体、精神都更好了。任弼时的高血压病也有所好转。唯独周恩来仍以高度负责和不知疲倦的精神抓全面工作。为了让毛泽东、任弼时得到较多的休息，除了特别重要的电报送给他们看以外，一般都先处理，待他们休息过后再送阅。周恩来和我们游了一次白云山，打了几次一百分（扑克），算是最难得的休息机会了。这段时间内，他除指挥解放战争外，同时也很关心蒋管区的工作。他约了从重庆回来准备回到蒋管区工作的于江震和杨超来作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研究蒋管区目前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指出在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形势下，蒋管区工作的总方针是：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开辟第二战场。对蒋管区的工作，随时电告城工部和社会部予以指示。他致电中央工委和各中央局：为着眼于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我华北、西北各解放区，现在就应尽量收集和抽出长江以南各省籍的大批干部，于今后派往刘邓、陈粟、陈谢三处，交给他们分配工作，取得新区经验，以便于明年时机成熟时随队过江。这是多么伟大的战略眼光！

蒋介石是不会让他的对手毛泽东、周恩来得到休息时间的。自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在大别山、豫皖苏、豫陕鄂胜利展开，创建根据地后，蒋介石十分恐慌，既怕我军在中原生根，又怕我军南渡长江和突破大巴山防线进入四川。为固守中原，阻止我军攻势，于 11 月在庐山脚下的九江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统管豫、皖、鄂、湘、赣五省党政军大权，企图以“总体战”来对付我军，与我争夺中原。蒋介石纠集了 33 个旅的兵力，对我大别山区展开围攻。

中央军委针对敌人的包围，及时指示刘邓、陈粟、陈谢：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与巩固，是中原解放区能否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战争全局的发展。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配合，全力粉碎敌人的围攻。指示刘邓主力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陈粟及陈谢破击陇海路及平汉路，尔后以主力沿平汉路南下，攻

克一切可以攻克的城镇、车站，歼灭一切孤立分散的敌人，以直逼武汉之势，迫使进攻大别山的敌人回援，支援刘邓主力打破敌人的围攻。我中原三路大军，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他们互相支援，密切配合，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因为陕北的战争还未完全取得胜利，中央决定仍坚持在陕北。为了顺利过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商量决定，于 11 月 14 日率中央机关离开神泉堡，向南转移，到居住和供给条件比较好的米脂县杨家沟。中央机关于 11 月 22 日转移到杨家沟。杨家沟是米脂县较大的村庄，有 200 多户人家。有一条小河向东一直流入黄河，沿河两岸滩上有较肥沃的土地，群众称这里是米脂的米粮川，所以就成为地主剥削农民和称霸的地方。全村有几十户大小地主，最大的地主就是当时蒋介石的反共干将杜聿明的家。杜家有一个大院，院内有一排十来孔的石砌大窑洞，管理人员给毛泽东分了一套三间相通的窑洞，周恩来、任弼时各住两个相通的窑洞，这样就把卧室和办公、会议室分开了。这是他们转战陕北八个月来居住条件最好的、办公室最宽敞的一个地方。

## 在杨家沟制定胜利纲领

自小河会议决定实行战略反攻以后，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取得很大胜利，各野战军也先后转入反攻。到 9 月间，人民解放军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战争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为总结 18 个月的解放战争的经验，解决与战争密切联系的土改、统一战线问题，根据战争胜利发展的新形势，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纲领和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中共中央决定于 12 月在杨家沟召开中央会议。

12 月中央会议是在中国革命伟大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已在杨家沟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外，还有陕甘宁边区负责人彭德怀、林伯渠、习仲勋、张宗逊、马明方、张德生、王维舟，晋绥边区负责人贺龙、李井泉、甘泗淇、赵林，中央后委机关负责人李维汉、王明、谢觉哉、李涛等 19 人。中央工委和其他解放区负责人因交通不便没有参加。这是延安撤退后规模较大的一次会议。为了在会前做好准备工作，从 12 月 7 日至 24 日，开了 18 天的预备会议，主要是讨论毛泽东所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稿。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和大家一起座谈研究。周恩来除了参加各个问题的讨论外，还要抓解放战争一年半的总结，对敌我双方的各种统计数字，亲自同参谋人员一起计算核实，并且统管会议的组织和秘书、行政等工作。

25 日至 28 日正式开会。毛泽东在 25 日就他的报告作了说明。他主要讲了敌我形势、统一战线、美苏关系三个问题，接着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12 月 26 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他对战争第二年各条战线的发展、解放区的情况、蒋管区群众运动状况，以及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都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

在讨论中，周恩来对财政经济、土地改革、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多次发言。他对土改和整党中发生的一些“左”的倾向，提出了批评。

在 28 日会议结束的那天，毛泽东作结论时说：这次会议是一次令人高兴的会，与洛川会议相似，都是在时局发展中召开的。20 年来未解决的革命力量在斗争中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的开展，胜利可期。虽然我们工作中还有严重的缺点，困难还很多，但都是可以解决的。这次会议所制定的政治、经济纲领，比《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纲领有进一步的发展。会议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议认为这个报告是“在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交新华社公开发表后，在党内外和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收到后，大大提高了对形势的认识和胜利信心，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向工人、学生、各界爱国人士进行宣传后，团结了更多的群众，扩大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使反内战、反饥饿的群众斗争更加发展。陈毅从华东赶到杨家沟时，会议已结束一周。他看了会议文件，了解了会议情况。毛泽东、周恩来和他详谈了向江南作战略跃进的问题。陈毅于 1948 年 2 月 4 日返华东。从 1948 年 1 月至 3 月 21 日中央离开杨家沟这个时期，集中力量解决新形势下关于土改、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特别注意纠正当时党内主要的“左”的错误倾向，使各种工作循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毛泽东根据十二月会议精神为中央起草了一系

列有关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指示。1 月 18 日，他根据十二月会议中讨论的政策问题，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2 月 3 日，起草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的指示。2 月 11 日，起草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2 月 15 日，起草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指示。2 月 27 日，起草了《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3 月 1 日，起草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指示。以上这些指示，对于巩固和发展解放区和保障解放战争的胜利，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党中央在十二月会议期间，同时也指挥解放军在各个战场进行胜利的反攻。

经过历时半年异常艰苦复杂的斗争，我中原三路大军密切配合，机动作战，共计歼敌 19.5 万余人，彻底打破了蒋介石的中原防御体系，调动和吸引了蒋军南线全部兵力 160 多个旅中约 90 个旅于自己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对我全面战略进攻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西北人民解放军经过 9 个月的艰苦作战，越战越强，已经由原来的 6 个旅，2.5 万多人，增加到 5 个纵队 16 个旅，共 7.5 万多人。收复了大片夫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林彪、罗荣桓领导的东北野战军 10 个纵队又 12 个独立师，于 1947 年 12 月至 1948 年 3 月 15 日，在四平街至大石桥的中长铁路沿线和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路沿线，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连续作战三十月，共歼敌人 15.6 万余人，攻克战略要地四平街和工业基地鞍山等城市 18 座。争取了营口守敌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率部一万余人起义。迫使东北敌军退缩固守长春、沈阳、锦州等大城市。

晋察冀、晋冀鲁豫，胶东、苏北等战场，也不断取得胜利，收复大片失地。

各野战军经过冬季整训之后，又相继发动了春季攻势。

宜川大捷，彻底粉碎了胡宗南对陕北的进攻，我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延安的收复，也指日可待。为了便于指挥伟大的战略决战和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各种工作，中央决定离开杨家沟东渡黄河，经晋绥边区转至华北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央工委合并。3 月 20 日，即离开杨家沟的前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写

了在陕北的最后的一个文件：《关于情况的通报》，要点是：一、最近几十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改、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二、对那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声明反蒋反美、联共联苏的民主人士，我们应当采取团结的政策，对他们的某些错误观点作适当的批评。在将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邀请他们一部分人参加政府工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三、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尚未成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四、我各野战军经过冬季休整，采取了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发动了全军指挥员战斗员的高度的革命积极性，提高了纪律和军事技术，极大地增长了战斗力。我军经过 12 个月的作战，兵力也大大地增强了。总计我军现有十个兵团，正规兵力已达 132 万余人。尚有非正规军、地方部队、后方军事机关、学校等，116 万余人。全军总计为 249 万余人，比 1946 年 7

月以前，兵力和战斗力都大大加强了。五、国民党军队不仅战斗力大大降低，数量也减少了。1946 年 7 月以前，其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连特种部队、海空军等总共 430.5 万人。而在 1948 年 2 月，总共 365 万人，即是说，减少了 65.5 万人。通知指出：“ 估计再打一个整年，即至明年春季的时候，敌我两军在数量上可能达到大体上平衡的程度。 ”“ 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六、目前南北两线敌军除在大别山和淮河以北地区尚有机动部队，还有主动权外，“ 其余一切战场的敌军，全是被动挨打。 ”

这个通报发到各野战军和各解放区后，大大提高了军民的胜利信心。这个通报中所列举的敌我两军的统计数字，是非常精确的，这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几个参谋长期积累、精细统计出来，又经过周恩来亲自核算过的。

1948 年 1 月 11 日，周恩来在西北高干扩大会上作了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他详细叙述了一年来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他说：“ 我们中央已经决定一直打下去，不要再走弯路，一直走到胜利。 ”“ 我们可以这样看：三、五年消灭蒋介石，全国胜利。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他特别强调政策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军队打到外线后要注意政策，“ 掌握政策的基本方针是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集中力量打击消灭当前主要敌人，而不应多树立敌人 ”。“ 城市政策更重要，不要毁坏，在韩城搞得不好、犯了纪律，连学校的钢琴亦没收了，真是乱弹琴！ ”他特别强调反“ 左 ”的倾向，尖锐地指出：“ 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时间短，易纠正，‘ 左 ’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因为你以为很左就很光荣，但客观上是帮助敌人。 ”“ 在土改中有些连中农亦不要了，很容易孤立。……我们一方面防止敌人捣乱，一方面要掌握政策。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打出去的胜利，开展大西北的局面。 ”

周恩来很注意土地改革的问题，他尽可能地进行一些调查研究。1 月 6 日他在审阅关于执行《土地法大纲》的指示的草稿时，加上了几段为了纠正“ 左 ”的偏向的内容。《指示》草稿提到中农问题时，周恩来加上了“ 各地在平分土地时，仍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 ”《指示》草稿中讲到抗战时期与我党合作过的开明绅士时，周恩来加上了“ 对这些过去同过患难的人士，应当加以照顾，并应当区别这些党外人士过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与压迫关系。一般的，开明绅士过去均是以地主身份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只要他今天赞成实行土地法大纲，我们没有理由责备他过去不该剥削，而其对农民的压迫行为，也必须区别是发生在参加三三制政权以前或以后。如果是发生在参加以前，则其参加三三制政权对全国人民的利益已足抵补对一个地方人民利益的损害，我们应负责向当地受损害的人民解释，免予斗争。 ”他还写上“ 在土改深入的地区，必须吸收农民中尤其是贫雇农中最积极分子入党，增加党内新的血液。 ”

2 月 22 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在老区与半老区中，大致应分为土地改革较为彻底、不彻底、很不彻底的三类地区，应该根据地区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针。“ 每一个乡村土改与整党问题的解决，均必须酝酿成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方能作出决定，采取行动，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同时，对于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又必须耐心说服，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要犯尾巴主义的错误。 ”“ 土改与整党均应采取有重点的，波浪式的逐步推广的方法。凡无得力的领导者或健全的工作团的地方，宁可

暂缓发动，不要急于求成，致走弯路。”

2 月 23 日，周恩来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平分土地问题给阜平中央局的指示》，对土改中的许多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

我军相继占领一些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后，发生了一些违反纪律的情况。周恩来特别注意城市政策问题。三月份，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多次指示，告各野战军前委：务使每个干部战士都懂得党在新区和城市中的正确政策，必须严令各部队在攻入城市后，“遵守城市纪律，坚守城市政策，不得丝毫违反”。为防止部队进入城市后触犯外交政策，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前委电：“凡有关外交行动及外交政策之决定，必须报告中央并得中央批准后，方得实行。一切违反中央外交政策及处理外侨方针的行动必须禁止。”另外，周恩来还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和统战工作，发出许多指示。

3 月 8 日，周恩来和任弼时指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廖志高、汪东兴、叶子龙、邓洁等召开机关行政会议，研究中央机关由陕北转到华北的准备工作。随后，审查批准了他们的方案，并指示他们注意检查群众纪律。由于战争影响，陕北群众粮食困难，除通知晋绥支援外，周恩来和任弼时决定，将中央机关未用完的小米和黑豆几十担，留给当地政府救济粮食困难的群众。

3 月 10 日，周恩来在杨家沟给中央直属机关全体人员做了形势报告。他宣布：一年来，敌我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央决定东渡黄河，移住华北。

21 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告别住了四个月的杨家沟，经过两天路程，于 23 日从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边区的临县地区，于 24 日到达中央后委驻地三交镇双塔村。

从 1947 年 3 月 18 日撤离延安，到 1948 年 3 月 23 日东渡黄河，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共一年零五天。在这一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几百万兵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转入了全面反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当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机关从晋绥暂移到晋察冀途中，4 月 22 日，收复延安的胜利消息传开了。中央 24 日给彭德怀等首长和西北人民解放军贺电说：“去年 3 月 19 日国民党匪军占领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断言这种占领将标志着国民党匪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年多来，一切事变，充分证明了这一断言。”

一般人都说，毛泽东、周恩来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我说，应该是“运筹窑洞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更为确切。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人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周恩来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补充一些具体事实，使读者更具体地了解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的情况。

这个司令部的主帅，当然是毛泽东，副帅就是周恩来。他直接领导五六个精悍的参谋人员，夜以继日地收集敌情（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我情（解放区军民、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和人民）以及友情（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地方势力、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以至国际友好人士），加以分析研究，及时

报告毛泽东，参与决策，并向各中央局、野战军司令部通报，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每个参谋人员都是专家。专管敌军的，凡国民党的军队每天驻扎在那里，向那里调动，长官的出身、经历、指挥能力，部队的人数、武器装备、战斗力如何等等，都了如指掌，而且每天要在毛泽东、周恩来墙上挂的五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上插上蓝色旗子和箭头；专管我军的也一样这样做。在每一次战斗后，都要及时精确统计我方和敌方的损失和补充的数字，一问就能对答如流。其他管敌情侦察、机要译电、无线电通讯以及行政管理等各种工作的，都是政治觉悟高，业务熟悉的干部。因而人数虽少，工作效率是极高的。中央后方机关及时向中央提供情况，提出建议，对中央决策和战争胜利，同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还有一直长期隐蔽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党的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刘少文、吴克坚等同志，隐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沈安娜以及其他地下工作者，为中央及时提供国民党党政军的各种重要情报，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要忘记他们。而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

周恩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作用，让我引一段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参谋张清化的回忆来说明。他说：“在这个阶段，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周副主席在军事上是党中央、毛主席完全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当时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军的拥戴。凡是党中央研究，毛主席下了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部署和如何执行等，都是周副主席具体来抓的。无论前方或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或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的组织指挥。周副主席的军事修养很好，对毛主席的战略战术领会得很深，运用得很好。”

毛泽东 1936 年写的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过：“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我认为，党中央转战陕北一年中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导演的，各野战军将领和解放区军民参加演出的人类历史上最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 领导蒋管区的第二战场

## 制定方针指挥第二战场

1946 年 11 月 19 日，周恩来从南京返回延安，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同时，领导着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和人民的爱国运动。当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他预见到中国政局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凭借自己二十多年来同国民党较量、周旋的丰富经验，开展着多种形式的斗争，包括学生运动、职工运动，发展统一战线和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工作、农村武装斗争。1947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通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会上周恩来分析了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第一次把蒋管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提高到同第一战场——解放战争相配合的战略地位。

为了加强和统一党对国统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于 1946 年 4 月 29 日改组中央城市工作部，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齐燕铭为秘书长，我任秘书处长。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兼任副处长。城工部的任务是在中央领导下，统管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并负责训练干部。中央又规定在解放区的中央局、分局和有关区党委，均设立城工部，进行国统区的工作。周恩来还领导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部长是康生，副部长李克农。1946 年 6 月，康生参加解放区的土改，后来由李克农任部长。社会部主要负责国民党党政军情报工作，争取军队起义，也配合地下党进行统战工作。同年 5 月 23 日，在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中，进一步强调，要“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随后，周恩来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完整地提出蒋管区工作的总方针：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斗争的策略是：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第二战场与解放战争相辅相成，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起了巨大的作用。

以学生运动为先锋的第二战场的斗争，早在 1945 年昆明“一二·一”反内战，反独裁运动就开始了。这年 11 月 25 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 6000 余人，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邀请几位赞成和平、民主的教授演讲。云南国民党当局竟出动大批军警包围学校，开枪恫吓学生，并在学校周围戒严。26 日，南方局领导下的中共云南工委决定，全市 30 余所大中学校三万余名学生联合罢课，并成立昆明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制止内战，要求和平等四项要求。学生上街演讲，抨击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云南国民党当局竟对学生下了毒手，指令军警特务于 12 月 1 日攻打西南联大等院校，南菁中学教员于再和西南联大学校学生共四人惨遭杀害。惨案发生后，国统区各大城市学生纷纷抗议和示威游行，掀起了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在国统区引起很大的震动。

1946 年底，内战已全面爆发，国民党当局需要美国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给予援助，不惜丧权辱国，让美国扩张在华势力。美军在中国领土上横冲直撞，作恶多端。1945 年 8 月到 1946 年 11 月，美军在平、津、京、沪、青五

个城市制造暴行达 3000 多起。人民群众无不发指。1946 年 12 月 24 日，美军一士兵公然在北平东单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愤慨。12 月 30 日，北大、清华、燕京等高等学校学生一万人在北平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召开了群众大会，控诉美军侵华罪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外交政策。周恩来清楚地看到在这场爱国运动中，蕴藏着巨大潜在力量和光明前途。12 月 31 日，他起草了《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对当时还在国统区的董必武、吴玉章、张友渔、叶剑英、刘晓等同志指出：北平学生因美军强奸女学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律闻亦将响应。希望平、津、沪、渝、蓉、昆、港、杭等城市党组织及海外华侨发动游行声援，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外卖国及“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为了使运动向纵深发展，周恩来又提出斗争的要求和口号：由中国法庭审判犯罪的美国兵，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出卖军火、借款助蒋打内战，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1947 年 1 月，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开封、重庆、昆明、武汉、广州甚至台北等城市，共 50 多万学生相继举行抗议罢课和示威游行。学生们围绕“美军退出中国”的主题，打出“抗议媚外外交”、“要求和平民主”的口号，获得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和声援，也打击了美国助蒋内战企图使中国沦为殖民地的对华政策，迫使美国政府撤退部分驻华军队，又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看清国民党政府内战独裁卖国的面目。3 月 8 日，“全国学生抗暴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以推动斗争向前发展。这次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标志着国统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为了适应国统区斗争的形势，配合解放区人民的自卫战争，准备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1947 年 1 月，经中共中央决定并由周恩来起草了致董必武等同志的电报，对蒋管区党的组织系统作了调整，主要是：南京局由董必武主持，直接管理上海工委、重庆分局、香港分局及一部分统战关系中的党员；另设上海分局，将刘晓、钱瑛两处领导的秘密组织统一管理，惟下层仍不打通；上海分局由刘晓、钱瑛、张明（刘少文）等组成，负责领导与发展蒋管区秘密工作。香港分局由方方、林平、潘汉年、刘宁一、梁广、章汉夫、夏衍、连贯组成，管理南方工作。这个调整方案初步理顺了抗战胜利以来地方党组织与中央局之间的关系，形成上下严密健全的组织网络，便于贯彻党中央的指示。

当时中央对国统区工作的重大决策，用电报直发上海局、香港分局和华北局等，具体工作则由城工部与上海、香港和华北局的城工部联系。华北局城工部设在河北沧州附近的泊头镇，部长刘仁，直接领导北平、天津地下党的工作。平、津的学生运动，分属北平市委和上海局联系的党组织领导，简称北系和南系两个部分。两个系统在组织上不打通关系，但工作上配合得很好。

当时因为内战扩大，国民党军事失利，经济崩溃加剧，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越来越困难，加上 3 月 7 日国民党驱逐中共南京、上海办事处和重庆联络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群众对于蒋介石国民党彻底与共产党决裂异常愤慨。学生对此尤为敏感，都按捺不住要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时周恩来指示蒋管区城市民主爱国运动“应暂保持平静态度，不作过于刺激过于突

出的进攻性的发动，而多作防御性的合法形式的呼吁和声诉。一切带全国性的政治斗争，应从参加这一斗争的群众本身的生存问题上着想，有计划地转移到带地方性的经济斗争中去，以深入和巩固群众斗争的基础。”同时，对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周恩来的这种斗争策略，既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又能发展斗争力量，保护了群众。

上海分局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向各地党组织布置，把抗议美军暴行这一爱国政治运动引向与群众有切身利害关系和最迫切要求解决的经济斗争方面。斗争的要求和方式是：公教人员和各业职工要求公平配给，解冻生活指数，开展各种形式的怠工、罢工。学生以增加公费、保障学业、改善生活和学习杀件为突破口，发展到反对借外债打内战，增加教育经费，职业学生（国民党特务）退出学校。这些斗争的特点是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提出合理的要求和采取合法的形式。上海分局从这些分散的经济斗争的发生和发展分析，向中央汇报时推断：“抗暴运动以后第二十高潮又将很快到来，辰月可能是这一新高潮的开始”。周恩来了解到群众爱国运动这种新形势，要求蒋管区党组织及时抓任行将成熟的斗争时机，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在斗争中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智谨慎。党的组织要严守“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领导，不转关系，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开与秘密分开”等原则。这些指示，为掀起一次影响更大的学生运动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奠定了基础。

这时中共中央决定，上海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由刘晓、刘长胜、钱瑛、张明组成，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管辖范围包括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上海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听取各地党组织汇报情况后，决定在南京首先发动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以中央大学为主的南京学生提出了增加教育经费、学生公费等口号，打出“反饥饿、反内战”的旗帜。

5 月 15 日，中央大学等校学生 3000 人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提出反对饥饿、增加伙食费等要求，并支持中大教授会提出的增加教育经费等五项要求。学生们质问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国家的钱哪儿去了？”“国家财政有困难，为什么还要打内战？”南京学生的斗争，迅速得到各地学生的响应与声援。学生们提出“向炮口要饭吃”等口号。18 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面对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怒潮，蒋介石发表谈话，以高压手段对学生进行威胁，说：“国家何贵乎有如此之学校，亦何惜乎如此恣肆暴戾之青年？”宣布要对学生“采取紧急之处置，作有效之制裁。”各地学生并不被蒋介石的恫吓所吓倒，而是更被激怒起来。5 月 19 日，上海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竟派警察局马队阻拦并冲散游行队伍。北平，天津等地学生也行动起来。5 月 20 日，上海、苏州、杭州等城市派代表到南京，和南京学生一起举行示威游行，并上书蒋介石，表明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正义立场。国民党当局派军警马队进行镇压，以水龙头向游行队伍喷射。有百余学生被打伤，血染南京街头。“五·二○”惨案发生后，各地群众对反动政权以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表示愤激。上海局决定组织全国学生总罢课，抗议当局的暴行并向社会揭露真相，争取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当时正是陕北战局紧张的时刻，敌众我寡，我方还处于不利地位。在戎马倥偬之际，周恩来仍非常关注国统区的斗争。5 月 23 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上海局的《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指示》首先肯定这次学生运动的发展“完全循着我党的指导方针前进。望即坚持此项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要求上海局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尽管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

各地学生的斗争一直坚持着，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手段也变本加厉。6 月 1 日，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宪特冲进武汉大学，开枪打死陈如丰等三名学生，受伤的数十人。这一血案更加激起了各地学生的义愤，学生的斗争誓不罢休。国民党政府进行大迫害，在上海、北平、天津、重庆、成都、开封、青岛等地逮捕学生、教师、记者约 3000 人。“六·一”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发出指示，要各地党组织成立“营救被捕学生委员会”，派代表向政府交涉，被捕学生家长、教授也赴京请愿。许多有正义感的知名人士挺身而出，进行营救工作。如在上海的唐文治、张元济两位清朝的翰林、进士陈叔通也和其他几位有社会地位的名人联名写信给上海市长吴国桢，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由于各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陆续释放被捕人员，表示要增加学生公费，解冻生活指数。

这次“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反对美蒋的学生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遍及 60 多个城市，在全国震动很大。这次运动是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和上海局有组织有计划的须导下逐步展开的。周恩来一向对各地党组织强调要注意斗争的策略，要从实际出发，掌握斗争的灵活性。早在“五·二〇”运动发生以前，他就提出在斗争中“须根据不同地点、时间与条件；因时因地制宜”；要“掌握一切斗争形势与组织形式，并懂得从一个形式去替换另一种形式。”指出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在敌人疯狂镇压的不利条件下，要“避免硬碰”，以免遭到屠杀。指出“这不是保守，而是领导群众变换方式，绕过暗礁”，以“保存力量，利于今后的新斗争”，“五·二〇”运动后，平津两地部分学生激于义愤，曾以“华北学联”名义公开宣布 6 月 2 日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总罢工、罢课、罢教、罢市，这无疑是极不策略的。地下党根据周恩来“避免硬碰”的精神，说服了学生，及时作了改变。6 月 3 日，周恩来在复上海局电中，肯定了平津学生停止上街游行，改在学校开会的办法“是对的”。指出：这样“便于集中要求可能实现的条件（如释放被捕学生、教员……等），然后再改变斗争形式，继续进行要和平、要饭吃、要自由的运动。”

对于周恩来“第二战场”的战略思想和 1947 年以来的两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毛泽东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在这年 5 月 30 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

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第二战场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尽管国民党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先后发布过《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清除匪谍安定社会秩序四项注意》等法西斯法令，下了勘乱令，设立特种刑事法庭，实行大逮捕等，企图操刀一割，斩草除根，学生运动仍然此起彼伏。国民党中央社在显然缩小的统计数字中，也承认：从 1946 年 12 月到 1948 年 6 月，共发生学潮 109 次，506 天。惊呼：“学潮”与中共的“一切号召和要求是完全密切呼应，若台符节”，“此伏彼起，层出不穷”，“公然在政府后方开辟所谓第二战场”，“反饥饿运动”已“变质为反征兵、反征粮、反内战的叛乱运动”，“严重性已达到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全，非彻底肃清不可。”广大人民的群众运动，是国民党反动派所“肃清”不了的。第二战场的学生运动，以其排山倒海之势，震撼着蒋家王朝。这个胜利的取得，是周恩来对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他那炉火纯青的正确指导，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后，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工人店员以及一般市民，生活尤其困难，他们纷纷起来同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1947 年 2 月 28 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给各地党组织的指示中指出：由于“财经危机，人民既忍受不了”，“蒋管区群众斗争。固然要经过一些迂迴起伏，但总的趋势必然会继长增高，问题就要看我们领导的斗争策略如何，组织力量如何，以决定群众斗争增长的快慢与可否避免一些挫折。”

当时一些大城市不断发生小规模的罢工斗争。“五·二○”运动中，职工对学生也表示支持，并罢工声援。学生运动对职工运动又起了推动的作用。1947 年 2 月 9 日，上海百货业职工在劝工大楼举行爱用国货运动，矛头是指向国民党政府让美国货充斥市场，损害民族工业的利益。国民党特务对参加的人大打出手，打死了永安公司职员梁仁达，打伤多人。参加会议的郭沫若、邓初民等知名人士，由群众保护才从窗外走脱。梁仁达烈士牺牲后，群情愤激，百货业职工要抬棺在南京路游行。上海局及上海市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敌情动态，按照周恩来“避免硬碰”的精神，说服职工不采取抬棺游行的做法，而采取扩大同情运动、吊唁等方式进行斗争，使国民党政府准备大肆逮捕镇压的计划未能得逞，陷于各界人民谴责、抗议的窘境。

1947 年底，武汉被服厂工人斗争中，发生了“一一·七”惨案，曾引起武汉工人的罢工示威。东北等地也发生小规模的罢工斗争事件。影响最大的则是 1948 年 1 月底发生的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的罢工斗争。这次斗争起初只是提出一些经济上的要求，如要求补发配给品和被扣工资以及按生活指数发给年偿等。2 月 2 日，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特务，武装包围申新九厂，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亲自指挥军警向工人进攻，甚至动用装甲车攻入厂内，结果三名工人被打死，60 多人受伤，百余人被捕。惨案发生后，上海各业工人在上海市委领导下，组织“申九惨案后援会”，开展广泛的抗议活动，国民党政府才被迫释放大部分被捕工人。此后工人罢工斗争仍有发生，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在垂死挣扎中，疯狂镇压人民也更加严重。

鉴于这种情况，1948 年 8 月 22 日，党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对目前蒋管区斗争策略的指示》，强调指出：蒋近已决心撕破伪装民主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因此，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

义的错误。并且指出：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一般地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这是最失策的事。当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张承宗回忆说：“恩来同志根据黎明之前一段黑暗的形势，对地下党必须坚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作了精辟的论述，使上海地下党避免冒险倾向，深入隐蔽，发动群众，最后配合解放军的进攻，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同年 9 月，上海局根据中央指示，由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在党内作报告说：当前上海地区我党的中心是，积极发展革命力量，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为彻底解放京沪，准备接管而斗争，围绕这一中心，开展反对国民党屠杀，反出卖，反搬迁，以及开展保厂、保校、保业、保命的斗争，以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与接管上海。上海局改变了斗争的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解放前夕，上海地下党组织了人民保安队约六万人，其中职员、工人、教师、学生约二万人为骨干，保护工厂、机关、学校，进行反屠杀、反破坏、反搬迁的斗争，配合解放军完成了接管上海的光荣任务。许多大城市在解放前夕，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才避免了国民党政府的疯狂镇压，保存了我们的力量和国家财产免受严重损失。

## 关心与保护民主人士

统一战线是第二战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周恩来得心应手的工作。在南京、武汉、重庆时期以及抗战胜利后，又回到南京、上海，他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辉煌的业绩。解放战争期间，他仍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尽力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国民党反动派。伪国大召开时，民盟以及有的无党派人士拒绝参加，这对国民党孤立共产党的阴谋是一个重大打击，周恩来对这些人的行动一直表示赞赏，引为朋友。但是第三方面人士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出动摇是难免的，必然的。也有不少人仍幻想走“第三条道路”，对他们，国民党是诱、骗、吓、打，力图分化他们，把他们拉过去，孤立我们。而周恩来则在坚持对敌斗争的同时，在统一战线内部，坚持了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对非原则问题善于妥协，照顾同盟者的利益，以维护团结；原则问题则揭示本质，晓以利害，善意批评，并依靠进步分子去帮助他们，使他们坚定进步立场，求得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正如他在 1946 年 11 月离开南京前给郭沫若、于立群的信中所说的：“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对卖身投靠蒋介石的，他则立场鲜明，不惜决裂，以教育、争取大多数。

有几件事情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伪国大召开前夕，第三方面背着我们给蒋介石写信，建议“国大”延至 12 月召开，还以“弟等先交名单”作为建议的第一条。周恩来当即指出这是“自投火坑”！本来有些人签名时就有犹豫，听了周恩来的指点，当即抹去自己的名字。

翌日，周恩来出席第三方面人士会议。有人说出了给蒋介石写信的内情，青年党的左舜生、陈启天大为恼火，说什么：“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极尽挑拨之能事，把矛头指向中共。周恩来当即痛斥他们：“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造福人类；鸡最可耻，只知抢粮食吃。共产党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

经过反复斗争，阵线已经分明。伪国大召开前夕，民盟主席张澜宣布：民盟不参加一党国大。青年党、民社党和一些“社会贤达”则投靠蒋介石，参加一党国大，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分化出去了。当国民党召开的一党国大通过所谓“民主宪法”时，民盟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如张澜、罗隆基、谭平山、李济深、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分别在不同时间、地点或发表声明、谈话，或联名通电致书国民党当局，不承认“违背了政协决议的程序”的国民大会及其“人民无权，独夫集权”的宪法。这对共产党是很有力的支持。

在解放战争期间，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投身于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周恩来返回延安后，留给郭沫若的信中还说：“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里应那一面，需要民主爱国阵线的建立和扩大，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那时我们或者又携手并进，或者就演那里应外合的雄壮史剧。”词意恳切，充满激情，表达了希望郭沫若能为巩固和扩大民主阵营不懈努力的殷切期望。

国民党因为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加上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被搞得焦头烂额，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日益严厉，在许多城市宣布戒严，实行宵禁。1947 年 5 月，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晚报》三家民营报纸被封

闭。下黑名单到处抓共产党，民主人士也是他们要迫害的对象。周恩来对蒋管区民主人士的安全非常关心，多次打电报给地下党转告他们作长期打算，“已取得社会地位的进步人士（如郭、马）只有暂时韬晦。民主人士只要坚持原来立场不参加政府，其作用自大。……各种民主爱国团体，利于分散团结，暂勿作大规模活动。”1947 年 10 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下令解散。民主人士在蒋管区难以立足，这是周恩来意料之中的事，他早就指示香港分局连贯作好安置来港民主人士的准备工作。张澜、罗隆基、章伯钧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周恩来也致电地下党转告他们转移。11 月起，郭沫若、沈钧儒、茅盾等都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1948 年 8 月起，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在输送解放区城市工作所需的科技、工程、医务等干部约二千余人以后，也尽力保护民主人士的安全，将马寅初隐蔽起来，送黄炎培离沪赴港。12 月，接中央通知，护送张志让、叶圣陶、郑振铎等 32 人去香港，转赴解放区。1949 年 1 月 19 日，中共中央电告刘晓、潘汉年，设法将毛泽东、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信妥送上海面交，并安排宋北上。由于她决定留在上海未去。

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也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解放区的。朱学范在重庆时即和我党有过合作，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受到排挤。当朱学范就世界工会大会一事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建议由劳协组织包括解放区工会代表在内的联合代表团参加大会，派邓发作为代表团成员。邓发遇难后，周恩来派刘宁一继续与朱学范保持联系，终于使朱学范毅然与国民党分道扬镳。1948 年朱学范抵达哈尔滨出席第六次劳动大会时，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称：“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行动，表示热烈欢迎。”这给朱学范以极大的鼓舞和安慰。

1948 年 5 月“五一”口号发表后，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周恩来亲自拟定代表名单，征求蒋管区地下党意见，安排护送代表来解放区的路线，并派钱之光到香港接应。11 月 3 日，周恩来致电东北局高岗、李富春：“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在香港分局和上海局同志的通力合作下，开辟了一条香港至大连的航线。鉴于香港环境复杂，有国民党特务在活动，海上又有国民党军舰巡弋，有不少风险。周恩来一再指示，对民主人士的接送要绝对保密，确保万无一失。香港分局把行动计划向周恩来作详细汇报，经同意后进行，共分四批 70 余位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 1949 年春安全护送至解放区。

1948 年秋，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对进步人士的迫害更加疯狂。周恩来对文化界人士的安全也关怀备至，许多文化、新闻、电影、戏剧界人士，经他的指示后撤离蒋管区。于伶、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张骏祥、柯灵、曹禺、张瑞芳、舒绣文、欧阳予倩、白杨等，先后来到香港。对党员与非党同志，他都一视同仁。1949 年初，国民党政府胁迫上海知名人士到台湾，地下党委托著名剧作家。戏剧教育家熊佛西同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周信芳恳谈，这两位具有爱国赤诚的大师对蒋政权的腐败和卑劣行径早已深恶痛绝，毅然决定留在上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由于中国共产党深受全国人民的拥护，党中央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视，加上周恩来与各界人士肝胆相照，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蒋管区中许多杰出的人物都留在大陆，跟着国民党去台湾的是极少数。这些进步人士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精心指导争取敌军工作

周恩来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一贯十分重视。他认为国民党不是铁板一块，统治阶级中可能分化出一些人来，和我们站在一边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解放战争中，双方的消长使得我们由劣势变为优势。到 1948 年，我方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介石国民党必将彻底失败的形势已经十分清楚。蒋军中一部分人已经不愿再为蒋介石卖命，而要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或者在解放军兵临城下他们除了被消灭而外别无可以选择的出路。周恩来惮精竭虑，派人通过各种渠道，做国民党军官的工作，策动他们弃暗投明，为解放战争减少阻力，人民的生命财产少受损失。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

早在抗战期间，周恩来就和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建立良好关系，又派人和龙云联络，1949 年他们或起义或从香港来到解放区，都是周恩来、董必武及南方局其他同志长期做工作的结果。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周恩来对于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始终没有间断。这项工作是极为机密的，稍一不慎，就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由于他缜密思考，措施适宜，往往取得成功。1946 年 9 月，他和进驻海南岛的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联系。韩本来思想进步，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排斥异己深为不满。当周恩来提出要韩从实际出发，以个人的影响和权力尽可能保护正处于困难之中的琼崖党组织和游击队。韩练成接受这个任务，终于使琼崖党组织和游击队免遭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后来韩练成在莱芜战役中起义，对莱芜战役的胜利起了配合作用，他也成了我党的高级干部。

张克侠、何基沣的起义，是解放战争中引人注目的事件。张克侠原是冯玉祥的旧部，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他在西北军中早就秘密参加共产党。何基沣曾是二十九军旅长，芦沟桥事变时曾指挥部队奋勇抗战。后来秘密到延安，1938 年参加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他也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1946 年夏天，周恩来在南京时，约见张克侠。国民党高级将领要和周恩来见面，在什么地方见是煞费苦心的事。最后决定在往中山陵路上的汽车中见，周恩来指示他多向蒋军官兵做工作，指明出路，要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的声势，瓦解敌人的士气。1948 年 11 月初，淮海战役刚刚开始，张克侠、何基沣率领三个半师 23000 人在贾汪、台儿庄驻地起义，对淮海战役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策反国民军三十六军的起义，又是另一种方式。1946 年夏天，经冯玉祥、李济深、章伯钧搭桥，周恩来与三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建立了联系。周恩来通过章伯钧告诉吴化文，欢迎吴先生站到人民方面来。随即密电陈毅与吴化文取得联系。争取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起义，往往不是很顺利的，既要时机成熟，又要他解除了疑虑，常常要长期做工作，耐心等待。1948 年秋，济南战役开始后，吴化文摆脱王耀武的指挥，率三个旅二万余人起义，为解放济南作出了贡献。

1948 年底至 1949 年初，战场上捷报频传，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平津战役拉开战幕，国民党军队大有招架不住之势，官兵都厌战怕战。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提出重开和谈。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谈的八项条件。周恩来致电上海局潘汉年、吴克坚：毛泽东对时局声明意在揭穿美蒋和平阴谋，望把声明印送各方，注意收集反应意见。指出这一阶段

的工作重心在于分化国民党上层人物。重庆号巡洋舰是英国政府赠给国民党政府的，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的巡洋舰。为策反重庆号起义，周恩来专门给上海局负责情报工作的张明打电报指示：对重庆舰策反对象，要派人与之进行工作。在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下，经上海局多方面的努力，重庆舰成立“士兵解放委员会”，争取到舰长邓兆祥的支持。1949 年 2 月 25 日，邓兆祥率领重庆舰 500 官兵，在上海吴淞口宣布起义，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拦，开抵解放区海港烟台。这不仅削弱和动摇了国民党凭借长江天险建立的军事防线，甚至为我军后来的海军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9 年渡江战役前后，国民党已临末日，士气已经瓦解。上海局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要求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地下党员加紧行动，尽力做动摇，瓦解京、沪等城市和其他地区驻军的工作。许多国民党军官面临严峻的形势，也受我党政策威力的影响，不少人弃暗投明。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率部（蒋介石警卫团、陈诚警卫团）起义；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在解放军兵临上海城下时投诚。湖南程潜、陈明仁的起义影响最大，湖南是国民党政府粮源、兵源的主要基地之一，1949 年证兵配额达 25 万人。能争取到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起义，对解放军渡江之后解放湘、粤、桂等省会起重要作用。中共湖南省工委通过程潜的亲属、部下做工作，起初程潜顾虑重重。当周恩来了解到程潜派人到香港和我党联系，立即致电在香港的乔冠华，要认真进行争取程潜、陈明仁、李默庵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经过地下党和各方面耐心细致的工作，程潜终于下定起义的决心，向党中央、毛泽东递交和平起义备忘录，很快收到毛泽东复电勉励。8 月 14 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起义通电。次日，湖南耆宿唐生智、仇鳌等百余人通电响应。我军在湖南境内，避免了一场恶战。

周恩来也曾经派一些人在国民党军队中做秘密工作。如熊向晖在武汉时期就受周恩来、董心武派遣到胡宗南部任机要秘书，受到胡的信任，胡宗南部队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了如指掌。1946 年夏天，熊向晖来南京向周恩来请示工作，周恩来派我秘密到他家把他带到梅园新村，面授机宜。

在解放战争中，我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特别是先后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之后，全国军事、政治形势出现根本变化之时，经我军、地下党组织和情报部门的联系和工作，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纷纷起义。民革的李济深、朱蕴山等也进行了一些有效的工作。据统计，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陆海空军中师以上重大起义事件多达 60 余起，15 个整师、1000 多名将领、72 艘舰艇、26 架飞机，官兵有数十万人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这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减轻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招商局、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都在香港宣布起义。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驻港员工也宣告脱离国民党政府，还有一些国民党外交官也投向人民政府，都受到党和政府的欢迎。这些成就的取得，党的威力和毛泽东的决策起了关键作用，周恩来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真是难以计数。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有不可胜数的同志在白区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革命先烈，有的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在死亡的威胁下保持革命气节；有的钻进敌人心脏，沉着机智，勇敢地获取情报，使我方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有的历尽艰辛，建立地下电台，根据党的需要，长期秘密工作。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任劳任怨，艰苦奋斗，周恩来常常提起他们的功

劳。有一次他在讲话中谈到毛泽东对党的白区工作的评价时说：董老从重庆回到延安，专门向毛主席汇报南方局的工作，主席听了汇报后说：“ 这次听了董老汇报，茅塞顿开，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很艰苦，很努力，有很大的成绩。 ”在解放战争期间，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路线更加成熟了，取得的成就也更加巨大。这一方面是这些同志的努力，也是周恩来正确领导的结果。

## 推动蒋管区农村武装斗争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是由北向南的，因为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首先调动大批兵力进攻北方的解放区。全面进攻受挫后，改变为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同时以大批精锐部队在东北和我争夺。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国民党军队的分布是南线 157 个旅，北线 70 个旅，在后方的只有 21 个旅，兵力分散，数量少，又要对付各地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这就显得后方空虚，顾此失彼。1947 年 3 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晓转曾镜冰、华东局的电报，指出蒋管区后方的许多省份只有保安团，没有正规军，东南各省更是如此。如果蒋介石政府在前线不断失利，有些地方连保安团也会抽赴前线，而财政经济愈破产，人民生活会愈艰难，不论城市乡村群众的斗争情绪和要求将会高涨。周恩来认为，在蒋管区发动与组织农民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与时间已经完全具备。为了有利于群众斗争，提出的斗争口号应多从人民为生存着想。对于斗争的策略，他也作了具体的指示，指出：斗争的口号应多从人民为生存着想，在斗争形式和组织上，先从合法斗争形式上建立群众基础，先从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地方发动武装斗争，求得存在和发展。尤其在组织上，开始不要铺张门面，过份刺激敌人，反易招致敌人过早过大的打击。

上海局、香港分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分别向华南、西南以及江浙地区党组织作了部署，各省区选择有一定群众斗争基础、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首先发动群众进行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斗争，并在条件较好的地方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游击根据地，然后逐步向外发展，以点带面，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

由于抗战胜利后我们和国民党签订的《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和在谈判中规定，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队大都北撤，现在要恢复武装斗争，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许多地方的星星之火已经点燃起来了。1948 年，四川农村普遍开展了抗丁、抗粮、抗税的“三抗”运动，这年 8 月，在华蓥山地区发动联合武装起义，全省都受到震动。由于国民党军警的镇压，起义失败，只好化整为零，进行潜伏活动。川东党组织吸收教训，改变了策略，以武工队，游击战的灵活形式进行斗争。川西地区建立川西边游击纵队，利用国民党政府公布的“二五减租条例”，在大邑发动农民进行武装减租斗争，沉重打击了反动政权以及刘文彩这样的恶霸地主。

湖南省工委也根据上海局的意见，对湘南的武装斗争作了周密布置，游击队广泛出击，给退守湖南的白崇禧部队很大的威胁。湘西、湘中、湘南也分别建立人民武装。1949 年 5 月，全省游击武装已发展到 4 万人，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部队 1 万余人。攻占或协同解放军解放 20 余座城镇。

浙东地区 1947 年有 300 余武装人员，活动地区从四明山区、天台山区伸延到浙赣铁路以西。许多农村展开了以反抽丁为主的群众斗争。这支武装到解放前夕已发展到六个支队，连同地方党员干部近万人。后来它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第二游击纵队，有力配合华东野战军解放浙东各城镇。

广东东江纵队抗战胜利后曾大部北撤，中共广东区委遵照中央和香港分局恢复华南武装斗争的指示，以东江纵队留下的人员为基础，组织游击队、武工队，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袭击或摧毁乡村政权武装，建立游击点。1947 年 5 月，周恩来曾两次发出对华南工作的指示，指出华南一带国民党军队几乎都调往前线，闽粤赣、赣南、湘南各地尚存在分散的游击力量，

有利于组织农民进行游击战。要求这些地区“于闽粤赣边区党委外，建立粤桂边，粤桂湘边、粤赣湘边三个工委”。又致电华东局选派二三十位可以到广东、闽西、赣南做军事工作的粤赣干部回内地领导农村武装斗争。此后，广东这些边区武装斗争积极开展起来。海南岛琼崖纵队也非常活跃，解放区不断扩大。中南解放军渡海作战时，他们动员了大量船只、船工配合作战。

坚持在闽粤赣边的党组织，是抗战时期以方方为首的南方工作委员会所依托的基点，20 年红旗不倒，1947 年夏季按中央指示成立闽粤赣边总队，在香港分局具体领导下，广泛开展农村游击战争，支持农民反抗征兵、征粮、征税。1949 年初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纵队，到同年底边纵所属武装队伍已发展到 3 万余人，并以解放粤东、闽西南的 30 座县城的战果迎接南下大军，为解放闽粤赣边区和华南作出自己的贡献。

周恩来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时，很重视云南的工作，云南的农村武装力量也有一定的基础。1947 年 10 月，上海局指示云南工委在全省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滇东南最先举行武装起义，很快发展成一支 1500 人枪的队伍，组成“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并向桂西发展。后来云南四面八方游击队都非常活跃，打击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权，并联合各少数民族并肩战斗。滇、桂、黔三省的人民武装，曾牵制国民党五个军的兵力，活动地区达 90 几个县，解放军解放云南时，它是一支重要的配合力量。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下，周恩来对南方各地农村武装斗争进行具体的指示，使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为配合解放军实行里应外合的作战方针，作出了重要贡献。

# 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

## 从双塔村到城南庄

1948 年 3 月 26 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胡乔木、师哲等率部分干部，带上电台，乘车离开双塔村到兴县蔡家崖晋绥分局和军区驻地。他们在这里住了九天，听取了贺龙、李井泉等关于晋绥边区的军事、土改、整党、工农业生产、工商政策和支前工作等汇报；召开了贫农团代表、土改工作团和地方干部的座谈会。

4 月 1 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4 月 2 日，毛泽东又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了重要谈话，给《晋绥日报》指明了办报的方向，直到现在，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 月 4 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离开兴县，乘车继续东进。因太原、忻县有阎锡山部队，就绕道晋北解放区的苛岚、五寨、神池，经雁门关、代县到五台山。山上正值大雪，公路不好走，晋察冀中央局派保卫部部长杜理卿（建国后改名许建国）、秘书长周荣鑫来迎接，并动员群众扫雪，疏通公路。周恩来也亲自察看行车路线。4 月 9 日，车队通过 2800 米高的五台山公路最高点鸿门崖，于 13 日到达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驻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受到聂荣臻、萧克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欢迎。

当时，邓颖超正在阜平参加土改和整党试点工作，她和周恩来自去年 3 月从延安分别后，已经一年多没有见面了，周恩来的老战友聂荣臻当然知道她的心情，很快让她和周恩来见面，并安排在一个窑洞里，让他们畅叙别情。这一对革命战友和伴侣，为了工作和战斗的需要，经常分开而各在一方。但这一年多岁月里，他们是在激烈的战争环境里度过的，虽然有过书信来往，却总想早日见面。两人见到彼此身体健康，特别高兴。连毛泽东看到他们那样高兴的情景，也不禁对邓颖超开起玩笑来，批评她这个“后勤部长”不到陕北来慰问周恩来。可是工作紧张，那里有时间让他们多谈心呢？第二天，又各自忙自己的工作去了。

周恩来在城南庄住了十天，他忙于参加座谈会，搞调查研究，同聂荣臻等研究工作，还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批准徐向前关于夺取临汾的战斗计划等。

中央原来决定毛泽东到苏联去一次，在城南庄住下来休养身体和做准备工作。周恩来、任弼时就于 4 月 23 日率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到平山（原叫建屏）县西柏坡，同刘少奇、朱德等会合。从此，结束了从延安撤退一年多来行动多变的战时生活。

5 月 1 日，中央宣布在西柏坡开始办公。中央前委、中央工委和后委即告结束。

毛泽东在城南庄期间，除同聂荣臻等研究晋察冀边区的各项工作以外，着重考虑解放全中国建立全国政权等重大问题。4 月 25 日，他打电报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要他们在西柏坡讨论若干问题，然后到城南庄商定。主要问题是：邀请平，沪、港等地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代表到解放区商量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今冬召开二中全会；酌减人民负担和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取消某些无政府状态和缩小地方权力；区、乡、

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大纲草案；陈粟兵团的行动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在西柏坡就上述问题交换了意见，于 4 月 30 日一同到城南庄。中央另通知了陈毅、粟裕、李先念、薄一波也到城南庄来。

4 月 30 日至 5 月 7 日，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举行了几天会议，除了五个书记外，陈毅、粟裕、薄一波、聂荣臻等也参加。30 日的会议上首先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五一”劳动节口号，共二十三条。第二条中，明确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第四条：“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于当日由新华社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这个“五一”口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5 月 5 日，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人民，认为中共“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这时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很快，毛泽东不宜离开国内，中央决定他暂不去苏联。由于国民党暗藏特务的告密，5 月 18 日，毛泽东住地曾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幸亏警卫人员保护及时让他转入防空洞，才只受了一场虚惊，平安无事。当晚，聂荣臻请他移住到比较隐蔽的花山村居住。在西柏坡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闻讯后，都很关心毛泽东的安全，即发电慰问，并嘱聂荣臻要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周恩来于 18 日专程乘车去城南庄，了解情况，并到花山村去看望了毛泽东。5 月 24 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25 日为中央起草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26 日，即离开城南庄到达西柏坡。朱德同毛泽东一见面，就谈起敌机轰炸城南庄时，他们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的事。毛泽东诙谐地说：“我倒是觉得好玩，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飞机在我头上丢炸弹呢。”

## 五大书记运筹西柏坡

中央五个书记在西柏坡集中办公后，就在这“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数百万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完成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历史任务！

西柏坡是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风景美丽的山村，在太行山东麓，村后有柏坡岭，滹沱河从村前流过，村两岸土地肥沃，一年稻麦两熟。80 来户经过土改获得土地的贫下中农，积极参军、支前，发展生产，是抗日老根据地。向东走五里有个郭苏镇，是太行山区和冀中平原的交界处，有一些商店和手工业作坊，五天一集，相当热闹。周围有大小自然村多个。东经平山县到石家庄 90 公里，可通汽车，交通相当方便，的确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农村指挥所。5 月初，中央即在西柏坡定居下来，先借群众住房，后一边办公并筹备土地会议，一边组织人力物力，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帮助下，在柏坡岭下建起了几十栋和当地群众一样的土平房，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办公地址。如果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是“运筹窑洞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话，那么，到了西柏坡后，便是“运筹土房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了。

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对解放战争作出战略决战，为此，事先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准备在华北和中原进行战略决战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5 月 9 日作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决定》。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个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个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董必武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原中央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并宣布：中共中央已与中央工委合并，中央工委即行撤销。

5 月 15 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通报了中央和军委的部分机构和人事任命，其中较重要的是：中央成立财经部，董必武兼部长。这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各解放区财经统一领导的需要。周恩来因要集中精力抓总参谋部工作，不再兼中央城工部部长，由李维汉担任。杨尚昆为中央副秘书长，仍兼军委秘书长；李涛为军委作战部部长；杨立三为军委后勤部部长；苏井观为军委卫生部部长；傅钟为军委政治工作研究室主任。这是为了准备大规模进行战略决战的需要。

东北形势的发展，需要与它相适应的机构，6 月 4 日，周恩来就东北党政军机构的设置及分工问题，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热河分局并各中央局、各前委电：（一）东北局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洛甫、林枫为常委，林彪为书记，罗、高、陈为副书记，高兼秘书长；军委会分会以林彪为主席，罗荣桓为副主席。（二）林枫、张学思（按：张学良的弟弟、中共党员）、高崇民（民主人士）仍为东北政委会正副主席；政委会下财经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陈兼政府党委会书记。（三）热河分局以黄克诚为书记。

6 月 26 日，周恩来为党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电：为便于了解和

决定各项重大问题，中原局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张际春，李雪峰为常委。邓子恢任中原军区第一副政委、张际春任第二副政委。中原野战军分为两个兵团，李先念为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锡联为第一副司令员，陈再道为第二副司令员，苏振华为副政委；陈赓为第三兵团司令员，谢富治为政委。同时，为中央起草致西北局电：西北局以贺龙、林伯渠、习仲勋、马明方、王维舟、贾拓夫、马文瑞、李井泉为常委，以习仲勋为书记，马明方为副书记。

为了培养干部，五月，中央决定创办华北军事政治大学，由叶剑英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任华北中央局委员；副校长萧克，副政委朱良才。校址设在石家庄。七月，中央决定在华北创办高级党校，仍沿用延安马列学院的校名，刘少奇兼任院长。马列学院于 11 月 8 日在平山县李家沟口开学。同时，中央又决定创办华北大学，以吸收新解放城市和北平、天津的青年学生，经过学习后再分配工作。校址设在河北省正定县，校长吴玉章，副校长成仿吾，教育长钱俊瑞。当时吴玉章住在李家庄城工部，周恩来特地写了一封信要我转给吴老，征求他的意见，并约请吴老到西柏坡面谈，嘱咐我派吉普车送他去。吴老到西柏坡同周恩来谈话后，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为党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

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仍是周恩来的主要工作。先期到达西柏坡的李涛、叶剑英、杨尚昆商量，为适应指挥重大战役的需要，在靠近朱德、周恩来的院内，由行政部门建了一栋五间宽的军委作战室。这是中央和军委机关的最大的办公室。由于前委、工委、后委的参谋人员十来人都集中了，作战部就分为作战、情报、战史资料等科，都围着几张大木桌，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四周墙上挂满了各个战场的军用地图，值班参谋将每天敌我军的位置用蓝色和红色的小旗子插在地图上，朱德、周恩来、杨尚昆（叶剑英到石家庄办军校去了）经常到这里向参谋们了解敌情和战况，同他们研究作战方案。这里虽然还是世界上最小的总司令部，但比起转战陕北时，无论在人力物力、通信联络以及交通运输方面，都要强得多。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军委作战部的同志们，以严肃、紧张、准确、有效的工作作风完成了任务，他除了每天将战况用书面报告毛泽东外，还经常到毛泽东的平房里当面报告，商谈。毛泽东有时也走到周恩来的小办公室里商谈战局。1949 年 1 月的一天，我到西柏坡向周恩来报告政协筹备工作情况，在周恩来那间挂满作战地图的办公室里，恰好碰到毛泽东同他坐在沙发上开怀畅谈，我立即拿起徕克照相机把这个场面拍了下来。后来西柏坡纪念馆的原馆长白占基拿去，现在放成大幅照片陈列在西柏坡纪念馆的进口处，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了。

从毛泽东 5 月 26 日到西柏坡以后，到 9 月辽沈战役前，为了把解放战争进一步推进到蒋管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中央军委指挥了几个较重大的战役。在这个时期，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许多重要电报，策划各友军配合作战，指导战役的顺利进行。他还经常关心各野战军兵员的补充和弹药、给养的供应。

中央到西柏坡后，周恩来还负责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和解放战争后勤供应工作。他经常在晚上先把军事电报处理完后，约杨立三、薛暮桥（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等有关同志到办公室研究财经和后勤供应问题。为了解决西北的财经困难，他和刘少奇约了负责西北财经工作的贾拓夫当面来讨论。并

向毛泽东报告，提出把西北财经工作统一于华北财经体系的方案，得到了中央批准，使西北财经困难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周恩来身在西柏坡，就考虑到全国胜利后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6 月 11 日，他和董必武联名致电在香港的许涤新，询问我党在上海、香港的经济研究机关和工作情况。并指出：“我们需要全国资源、银行、交通、工厂、矿产、贸易、农林畜牧及财政收支、官僚资本活动等等有系统的调查统计材料，有些材料应利用在官方工作的朋友代为搜集，并指定若干有研究兴趣的同志长期作经济研究工作，暂时不做政治活动，保证材料不受损失。”这个电报既是为了摸清国家财政经济的家底，也为培养经济研究工作的干部作了准备。周恩来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和各种统计资料，1942 年在重庆的时候，他领导南方局各部门和各级党委，根据中央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动员党员和进步朋友，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方面进行了一次大范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将材料整理出来送到延安，给中央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

6 月 21 日，周恩来写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反对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针的”，“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的”。提纲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旧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区别，工业与商业的区别，金融斗争，税收政策，公营、私营与合作社三种经济，国家权利如何运用以及工业的科学管理等问题，都提出了大略的设想。这表现了周恩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由于华北、华东、晋绥、西北几个解放区已经联成一片，为了逐步统一货币和有利于支援战争，中央决定，原由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逐渐通用。7 月 21 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各有关中央局、分局电：华北、华东两区固定比值后通用。华北、晋绥、西北三区货币也应采取同样办法，通用开始日期为 8 月 15 日。后来因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央又通知推迟通用时间。

早在 5 月间，在刘少奇、周恩来的指导下，华北局召开了一次金融贸易会议，会上通过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今后的经济建设，不但要发展农业，而且要发展工业，不但要建设乡村，而且要建设城市。我们有可能和必要从分散的地方经济逐渐发展到统一的国民经济。货币发行，首先保证生产建设，其次保证战争供给，同时要掌握发行数量，避免物价急剧上涨。必须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所有权、经营自由权以及正当的营业利润，慎重处理工商业中的劳资关系。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7 月 30 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了致华北、华东、西北中央局、晋绥分局并转各政府党团和各财办电，转发了这个报告。

这个时期，周恩来还多次致电香港分局及潘汉年，迅速将香港各民主党派对“五一”口号的反映报中央。又派钱之光到香港协助香港分局、潘汉年等，妥善地将民主人士护送到解放区来参加政协筹备工作，并直接指导中央城工部及时了解情况报告中央，同时准备接待民主人士的工作。

## 历史性大决战的前夜

解放战争进行两年以来，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必须根据解放战争已转入总反攻的新形势规定党的战时方针和任务，党中央于 9 月 8 日至 13 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等七人；中央委员贺

龙、徐向前、聂荣臻、滕代远、曾山、薄一波、叶剑英、邓小平、饶漱石、陆定一等十人，候补中央委员邓颖超、廖承志、陈伯达、刘澜涛等四人。重要负责人员李维汉、杨尚昆、胡乔木、傅钟、李涛、安子文、李克农、冯文彬、黄敬、胡耀邦等列席了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为了充分了解情况和交流经验，会前先开了 11 天的预备会议。当时物质条件较差，这样的重要会议是在中央机关食堂开的，开会时就把饭桌拼在一起当会议桌，散会后又就在这里就餐。当时形势一派大好，参加的人心情都非常舒畅。

9 月 8 日，毛泽东做了报告，报告中提出大约五年左右（从 1946 年 7 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任务。为完成这任务，需要建军五百万，并再次强调他在 5 月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的“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 ”三条要求。

会议围绕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作了重要发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以五年左右时间根本打倒国民党的计划，是根据两年来的经验作出的谨慎的估计，很有实现的可能，如果给蒋介石的打击很严重，加上他财政的崩溃，内部倾轧，蒋介石可能垮得早些，胜利来得快，我们也应有此准备。但也有可能遇到曲折，时间就会长一些。我们要估计到这些，不要因胜利太快而没有准备，也不要因胜利推迟而不耐心。当然，今天主要还是争取五年胜利。他详细地报告了第三年军事计划的要点。他说，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他特别提出：“ 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 ”并说：“ 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加。 ”他还说：在第三年的作战计划中，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线，各战场上的战役协同增加了，战争的计划性更增加了。为了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周恩来对人民解放军提出，军事组织要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人民解放军要统一建制，今后成立新的部队要报告，不准擅自增编，番号要全国统一排列起来；要建立若干正规制度；要向建立特种部队的方向努力，特别是要建立炮兵。要把部队后勤工作同地方的财经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要保证前线供应，但要力求节约，前线缴获要归公。

毛泽东最后作了总结发言。他详细论证了中央作出用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根据，分析了国际和国内的有利条件，充分肯定了能够实现这个任务的可能性。同时又指出，对困难也要充分估计，要有克服各种困难的精神准备。

这次会议，使全党在国内局势发生大变动的前夕明确了前进的方向，统一了行动的步调。

毛泽东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要情况，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于 10 月 10 日发至全党。通知中指出在 1946 年 7 月至 1948 年 6 月两年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歼敌 264 万人，其中俘敌 163 万，缴获枪炮近百万件，解放军由 120 万人增至 280 万人。解放区面积 235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 24.5%；有人口 1.68 亿，占全国人口 35.3%；现有县以上城市 586 座，占全国城市 29%。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会议认为，建设 500 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 1946 年 7 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 500 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 100 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 750 万人左右（平均每年 150 万人左右），

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通知还指出，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将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团结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我党周围。组织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 1949 年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央通知发出后，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行动。中央九月会议为组织伟大的战略决战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党中央、中央军委认为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即连续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当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及任弼时都住在西柏坡的一个院子里。在那指挥战略决战的紧急时刻，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集中在毛泽东的小平房或在小院前讨论战局、作出决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而周恩来除参与决策外，还要为贯彻军委决策进行许多组织工作，随时了解和研究各方面的战况并及时加以指导，给各战场提供准确的敌情通报，组织后勤供应等，更是紧张和繁忙。

由于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进攻，取得了歼敌 94 个师 152 万人的伟大胜利，迫使蒋介石放弃“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的计划，而采取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重要的战略城市和交通要道。1948 年 8 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在讲话时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讽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他把两年来在军事上的惨败，完全归咎于战场指挥官的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会议决定，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将兵力集中，修筑工事，组成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等五个战略集团，想使人民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

人民解放军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同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决战。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经过考虑，首先指示华东野战军攻取了具有坚固设防和重兵把守的济南，接着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济南是蒋介石反动集团支撑华北残局的一个战略要点，由他的嫡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以 11 万重兵防守，并设置了坚固的防御体系，蒋介石妄想凭借济南，阻挡我解放军南下。但是济南已在解放区包围之中，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采取“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以 7 个纵队共 14 万人，组成攻城兵团，以 8 个纵队共 18 万人，布置在济宁、滕县、兖州地区，准备阻击和歼灭来援的敌人。战役于 9 月 16 日开始，在我军强大火力的攻击下，敌西守备区总指挥、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于 19 日夜，率领所属三个旅约两万人举行战场起义，使我军迅速进入他的防区，动摇了整个防线。经过我军八天八夜的激烈攻击，于 24 日攻克了济南城，共毙伤俘敌八万余人，起义二万余人，生俘了守敌司令官王耀武。

济南战役的胜利，严重打击了蒋介石“重点防御”计划，动摇了国民党固守大城市进行顽强抵抗的信心。同时，锻炼和加强了人民解放军的攻坚力量和信心。济南的攻克，山东全境基本解放，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联成一片，解放区后方更加巩固，为伟大的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9 月 29 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人民解放军的贺电：庆祝你们解放济南歼敌十万的伟大胜利。你们

这一勇猛果敢敏捷的行动，并争取了吴化文将军所率九十六军的起义，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 在三大战役指挥中枢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组织和指挥的。首先，以东北战场为初战的方向。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在敌军方面，它虽有四个兵团，14 个军、44 个师，共 55 万人，但被我分割于长春、沈阳和锦州及周围的据点里，且地区狭小，补给困难。在我军方面，野战部队已有 12 个纵队，还有炮兵纵队，铁道兵纵队，共 70 余万人，地方兵团有 33 万人，共计 103 万人。这是在兵力数量上超过敌军的唯一战场。还有广大解放区已联成一片，土改完成，群众条件好等优越条件，是敌人无法比拟的。但是在东北战场上的作战方针上，究竟是先打长春或先打锦州更有利于战局的发展呢？军委的意图是先集中力量于北宁线并攻下锦州，以达到“关门打狗”的目的。但林彪主张先打长春，强调南下作战的困难。经过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批评、督促后，林彪纠正了错误，9 月 3 日作出主力南下作战的计划，使战役得以顺利发展。

9 月 7 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明确提出：必须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10 月 10 日军委明确电示东北野战军：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占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的都未达到，只要攻下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为确保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阻止关内敌人向关外增援，军委命令华北野战军二、三兵团于 9 月 14 日发起察哈尔、绥远战役，歼敌 2.1 万余人。华东野战军攻占济南，也给东北战场以有力支援。

东北野战军于 9 月 12 日发起辽沈战役，以大军先向北宁线开展猛攻，包围了锦州，经过七昼夜的攻坚战斗，于 10 月 15 日解放了锦州，包括外围战斗，共歼敌 13 万人，生俘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以下 9 万人。同时，在塔山的六昼夜的英勇阻击战中，歼灭敌人 6 万多人，有力地保证了锦州战役的胜利。在我大军包围长春、锦州解放的大好形势下，固守长春的敌六十军，在军长曾泽生的领导下，率领一个军部和 3 个师共 2.6 万人，于 10 月 17 日起义，当即将阵地交给我围城部队，使我军控制了长春城内的东部地区。周恩来即向毛泽东建议，困守长春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系黄埔一期学生，可争取。毛泽东同意由周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指出：“郑现已动摇，可努力争取之。”18 日，周恩来给郑洞国写信，促其起义。信中说：“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倾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郑洞国因不肯同蒋介石决裂，没有接受起义要求，但愿意和平交出长春。他于 19 日上午，率领所部第一兵团直属机关第七军军部及四个师，共 8 万余人向我投诚。长春市又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在蒋介石亲自督促下，由廖耀湘率领蒋军主力新一军、新六军等 12 个

师，共 10 余万人，沿北宁路西进，企图夺回锦州，打开向西逃跑的通路。又以另一部沿中长路南下，占领鞍山、海城、营口、企图控制海港，保持从海上逃跑的通路。我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先采取诱敌深入至黑山地区进行阻击，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围歼。10 月 28 日，在辽西地区，将敌全部消灭。兵团司令廖耀湘和他的军长李涛、向凤武、郑庭笈等一起被活捉。

11 月 2 日，我军解放沈阳，敌“剿总”司令部、第八兵团、两个军部、十一个师以及技术兵种等十三万守敌，全部被歼。

11 月 9 日，锦西、葫芦岛敌人乘船逃往天津、上海。东北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 52 天，我军以 6.9 万余人的伤亡，歼灭国民党军队 36 个师，共 47 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决战阶段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大战役。11 月 11 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满怀喜悦地致电各中央局、各前委指出：九、十两个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已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估计再有一年左右就可以完成了。

正当东北解放军在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的紧急时刻，蒋介石气急败坏，于 10 月下旬飞到北平，乘我华北野战军主力在察哈尔、绥远作战石家庄兵力空虚的时候，同傅作义策划了一个袭击石家庄及西柏坡党中央驻地的大阴谋。傅作义接受任务后，于 10 月 23 日命令他的嫡系鄂友三的骑兵十二旅和郑廷铎的九十四军等组成突击部队，配备四百辆汽车和大量炸药，限四天集结保定，而后向石家庄和西柏坡袭击。同时蒋还命令山西阎锡山从太原出兵配合行动。妄图制造一个“惊人消息”，挽回他已经丧失的军心民心。

可是，当傅作义刚开始布置的时候，25 日晚上，周恩来就获得了蒋介石所策划的全部计划。这是华北局城工部所领导的北平地下工作者《益世报》采访主任刘时平，从他的同乡、同学鄂友三那里得到的确实情报，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以特急绝密的电报发给中央的。当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院子里看电影。周恩来收到电报后没有惊动别人，只把作战部长李涛找到办公室，迅速作出粉碎敌人偷袭计划的周密布置，并报毛泽东批准。主要措施是：一、电令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立即命令各地方部队和民兵，紧急动员，准备就地阻击敌人进攻；二、急电在内蒙作战的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杨成武部，日夜兼程回冀中，准备歼灭敌军主力；三、中央和军委所属机关立即做好转移准备工作。先将老弱病员转至安全地带。在 10 月 27 日凌晨 4 时半至 7 时两个半小时内，他连续三次用书面向毛泽东报告布置情况。军委决定，在军事上积极准备的同时，通过新华社揭露蒋介石、傅作义的阴谋，并号召军民动员起来，沿途阻击敌军，准备诱敌深入，予以歼灭！

敌军一出保定，就受到解放区军民的阻击，损失 2000 多人，才知道我有充分准备，躲在北平圆恩寺行邸的蒋介石，只好下令将部队撤回保定。一场梦想，就告破灭！

济南战役后，敌刘峙集团纠集了 79 个师共 70 万人置于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企图阻止我华东野战军南下；以 23 万人置于平汉铁路南段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牵制我中原野战军。

为粉碎敌人的企图，早在 10 月 11 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就提出准备以一个半月至二个月的时间，分三个阶段完成淮海战役。并明确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中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11 月 6 日，中央军委决定华东、中原两大野

战军及地方部队 60 万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江苏海州，西至河南商丘，北到山东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发动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刘峙、杜聿明集团的主力于长江以北。

为了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于 11 月 16 日决定成立由中原和华东两个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和谭震林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以邓小平为书记，并有“临机处理一切”的权力。

为了在战役第一阶段中歼灭盘踞在徐州以东陇海路要地新安镇的黄百韬兵团，攻占宿县，孤立徐州。11 月 6 日我军开始进攻。8 日，防守徐州东北面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均系中共秘密党员），率第五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 2.3 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立即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动摇了敌军的阵线。在我军强大兵力进攻下，黄百韬率部向西逃窜，企图向徐州集中，11 日，被我军包围于碾庄地区，经过 11 天的激烈战斗，共歼敌 10 个师，约 10 万人。敌军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被击毙。与此同时，中原解放军于 11 月 15 日，攻占了徐州以南的重镇宿县，切断了敌人南逃的道路，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第一阶段的战斗，共歼敌 17.8 万余人，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黄百韬兵团被歼后，蒋介石于 11 月 24 日电召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到南京开会，决定三路会攻宿县，打通徐（州）、蚌（埠）联系，企图把困守徐州的三个兵团撤出，退守淮南。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中央军委批准了总前委的第二阶段作战目标是：粉碎敌人三路会师宿县，打通徐蚌联系计划，包围杜聿明集团，歼灭黄维的第十二兵团。作战方针是：中间围歼，两头堵击。黄维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部队，武器装备精良，有 4 个军，1 个快速纵队，共 12 万余人。他奉蒋介石命经蒙城向宿县前进，11 月 25 日进至我预设的包围圈内，我将其包围于宿县西南的双堆集狭小区域内。蒋介石尽了一切办法去挽救。他怕黄维兵团军心不稳，慌忙地将该兵团副司令胡琏用小飞机从南京送到双堆集，协助黄维指挥，以稳定军心，并带去大批签有“蒋中正”三个字的“总统嘉慰令”，鼓励“固守待援”，说：“现在李延年兵团正在协同你们作战，……杜聿明副司令率领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沿津浦路南下，三路大军会师的时间不远了……”同时，用运输飞机空投了一些烧饼、馒头。但是都无济于事，在我军炮火猛攻和战地政治宣传攻势有力配合下，敌人更加动摇，自动投诚的日益增多，军心更加涣散，部队濒于瓦解了。

12 月 6 日，总前委下令发动总攻，经过十天的艰苦战斗，16 日清晨，红旗飘扬在双堆集上，全歼了黄维兵团。除副司令胡琏乘坦克只身逃脱外，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关绍周，均被我军从企图逃跑的坦克里活捉出来。人民解放军又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伟大胜利！

正在黄维兵团被困的时候，蒋介石于 11 月 28 日电召杜聿明去南京，决定由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放弃徐州，向西经永城南下，企图袭击包围黄维兵团的我军侧后，以解黄维之围，然后共同南撤。12 月 1 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及“剿总”直属机关部队等 30 多万人，还有一万多辆卡车及其他车辆、马匹、物资，撤离徐州经肖县向永城方向狼狈逃窜。当天，我华东野战军解放徐州后即紧紧尾追敌军，给予堵击、侧击，打得敌人十分惊慌和混乱。我军从四面向敌军压缩包围圈，将杜聿明集团包围于肖县、永城之间的陈官庄、李石林、青龙集狭小的地区内。6

日，孙元良兵团妄图突围，大部被我歼灭，孙元良化装只身潜逃。

黄维兵团很快被歼，杜聿明集团已陷于外无援兵，内缺粮弹的困境，本来可以集中大军将其歼灭。由于平津战役已提前于 11 月 29 日开始，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定从塘沽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并给被围困的杜聿明集团造成更大困难以利歼灭。中央军委决定对杜聿明集团暂时围而不打，令淮海前线部队从 12 月 16 日起进行 20 天的战场休整。在休整中，进行政治教育和敌前练兵，补充弹药、粮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对敌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毛泽东亲自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了一个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于 12 月 17 日由新华社广播电台和前线广播站广播，并用各种办法散发到杜聿明集团的队伍中。投降书号召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学习长春郑洞国、孙良诚（国民党第一百零七军军长，11 月 13 日率领该军军部和一个师共 5000 多人于江苏睢宁西北投诚）的榜样，“ 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 ”杜聿明和他的高级军官虽然坚决顽抗不肯投降，但他们的许多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看到“ 投降书 ”及其他宣传品后，军心更加动摇，不断成群结队地向解放军投诚。

1949 年 1 月 6 日傍晚，我军发起总攻，经过四天四夜的激烈战斗，10 日上午，将杜聿明集团全部歼灭，俘虏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只有李弥化装成士兵只身潜逃，至此，战役第三阶段完成，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

淮海战役历时 66 天。敌人先后投入总兵力达 80 万人，出动飞机 2000 多架次。我军总兵力 60 万人，少于敌军。由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总前委的正确指挥，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正确方针，加以鲁、苏、豫、皖、冀

五省五百多万民工的直接支援，我军以 13 万人的伤亡，取得了歼敌 55.5 万人的伟大胜利，基本上歼灭了敌人南线的精锐部队，解放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直接威胁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和上海，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平津战役是在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已取得第一阶段胜利的时候进行的。中央军委原来预定是在 1949 年 1 月拉开战幕，因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时间，

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不待休整，提前隐蔽入关，配合华北野战军及地方武装力量，提前于 1948 年 11 月底发动平津战役。

辽沈战役的巨大胜利，淮海战役的顺利发展，使蒋介石的战略防御体系濒于瓦解。这时在华北，蒋介石、傅作义两系军队共有 4 个兵团 12 个军，约 55 万人，收缩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山海关、秦皇岛、唐山、塘沽，西至宣化、张家口的千余里铁路线上，陷于孤立无援境地。他们预感到下一步，我东北和华北野战军又将联合消灭他们，因而恐慌万状。当时，美蒋和傅作义各有打算，因而对平、津是守是撤，是南逃或是西窜，陷于举棋不定的矛盾之中。美帝国主义企图从塘沽直接援助傅作义，使他固守平津、牵制人民解放军南下，以掩护蒋介石在长江以南布防。蒋介石企图以东南行政长官的职务引诱傅作义南撤，以增强江南防务，保持半壁江山。傅作义自知非蒋嫡系，如南撤，必将受到排挤，部队被分化瓦解，拟西撤到绥远老巢，保持实力。1948 年 11 月，蒋介石和傅作义在南京开会研究平津地区防务问题。

他们没有估计到东北人民解放军会那么快入关，平津战役会那么快发动，就确定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蒋介石要傅作义把兵力集中于平、津、塘三角地区，控制塘沽海口，维持平绥交通，并准备南撤，但是傅作义只把蒋系的 24 个师布代在北平、天津、塘沽三个地方，而把自己的 16 个师布置在北平、张家口之线，准备西撤的后路。

中央军委从全国战局出发，认为无论傅作义集团南撤或西逃，都对解放全中国的战局不利。11 月 17 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指示电说：“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 24 个师及傅系步骑 16 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于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为此，中央军委电示东北野战军似两个纵队组成先遣兵团向北平附近前进，威胁北平。指示华北野战军停止攻击归绥，将其 3 个纵队驻于绥东地区，阻止傅作义部队向绥远逃跑。又令华北野战军停止攻击太原，以免刺激傅作义下决心逃跑。军委于 11 月 16 日到 18 日，连续电示东北野战军火速隐蔽入关，出敌不意地与华北野战军一起对平津塘一带之敌实行战略包围。11 月 27 日，军委命令东北先遣兵团及华北第二兵团的 3 个纵队，三兵团的 3 个纵队包围宣化、张家口等敌，切断北平、张家口联系，以抓住傅系，拖住蒋系并掩护东北野战军顺利切断平津、津塘诸敌的联系，为开展战局作准备。为统一指挥东北 80 万、华北 20 万共 100 万大军的行动，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为书记。

12 月 11 日，中央军委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为了防止敌从海上逃跑，对西线之敌“围而不打”，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由西向东逐个将敌人合围，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再予以各个歼灭。

1949 年 1 月 16 日到 31 日，是平津战役的第三阶段，即争取北平的和平解放。

北平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有世界闻名的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古代建筑，有北大、清华、燕京等著名高等学府，市民共 200 万。如果守敌顽固抵抗，人民解放军只有采取武力进攻办法来夺取，必将使文物古迹和人民受到很大损失。1 月 16 日，中央军委在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电报特别明确提出，要“积极准备攻城”，但是又指出此次攻城，必须作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定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占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和解的方法使其缴械……。要使每一个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解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指战员听到传达后，都坚决拥护。并提出口号：“要坚决把北平打下来，但不能打坏。”“要让枪炮也长眼睛。”

在积极准备打的同时，尽量争取傅作义放下武器或起义。估计到傅作义是爱国将领。1933 年参加过长城抗战，1936 年他坚决抵抗日寇和伪蒙军对绥远的进攻，受到全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称赞。1937 年在山西抗日前线，同八路军协同作战，建立了友谊关系。在解放军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外逃无路的

形势下，是有可能争取和平起义的。在刘仁领导下的华北局城工部，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为此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一方面动员地下党组织迎接解放军攻城的指挥部，为解放军送情报、提供敌军的目标，并在机关、工厂、学校成立纠察队，开展护厂、护校的斗争，保护文物古迹和档案资料等。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对傅作义进行统战工作，对他晓以大义，争取和平解决。1948 年春，北平地下党就对傅作义周围的上层人物开展工作。如傅的至交密友、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爱国将领，抗战时曾几次到延安，同毛泽东、朱德见过面）以及他的老师、拜把兄弟、同乡等人对傅进行了工作。10 月，地下党又派人与傅作义进行接触，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但是傅作义当时对美国和蒋介石还有幻想，手下有 50 多万军队，还不想谈判。

11 月 2 日辽沈战役结束以后、傅作义迫于形势，才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希望我党派南汉宸去秘密商谈。12 月 3 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香港潘汉年电，指示可请冀朝鼎（著名经济学家）应傅之邀北上任“华北经委会”副主任，以便做傅的工作，“动摇傅之抵抗决心”，并影响华北产业界人士乃至某些外资代表“坚留华北”，“反对南迁”，“尽一切努力保全华北经济系统中的各种生产设备、科学器材及专门人才，以利我军入城后的接收”。12 月中，傅作义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采访部主任李炳泉（地下党员）到我军驻地，和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见面，试探我军态度，提出恢复抗战时期的合作关系。刘亚楼向他们表明了我党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放北平的愿望，劝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他们留下了电台联络办法和密码，开始建立了秘密联系。

在我军迅速完成对平、津分割包围，特别是傅作义在新保安、张家口的部队被歼以后，傅焦急万分，坐卧不安，思想斗争激烈。恰在此关键时刻，刘仁根据聂荣臻的指示，将在天津《大公报》工作的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地下党员）调到北平，直接对傅作义进行争取工作。当傅冬菊出现在傅作义面前亲昵地叫声“爸爸”时，使傅发生惊疑。傅作义对爱女直截了当地问：“你是军统还是共产党？”傅冬菊毫不含糊地答：“共产党。”“你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毛泽东派来的。”“派你来干什么？”“劝您停止抵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这是一场很不寻常的父女之间的对话。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短促的对话后，父女平静地坐下来，傅冬菊详细地分析形势，宣传党的政策，解除他的疑虑，明确告诉傅作义，全国胜利的局势已定，跟蒋介石走只是死路一条，如果举行起义，使北平古都和平解放，就是立了大功，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傅冬菊一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谈话，起了别人不能起的作用。傅冬菊（建国后改名傅冬）不愧是个好党员。

在各种因素促成下，傅作义下决心同中共谈判。1949 年 1 月 6 日，傅作义请他的老友周北峰（抗战时期周曾代表傅到延安与我商谈山西合作抗日问题）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代他谈判。他们于 8 日到达蓟县我军前线总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同他们进行了几次谈判，讲明只要傅率部队起义，一律可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所有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等地被俘的军官，不咎既往，一律释放，对傅先生和他的高级干部，一律给予适当的安排。他们共同整理了《会谈纪要》后，交周北峰、张东荪带回北平给傅作义看。但傅作义仍在动摇中，不肯下决心。

1 月 10 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傅作义从陆上南逃的路被切断。14 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布了八项和平条件。15 日，天津解放，守军全部歼灭。这一切，打破了傅作义企图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幻想。为促使傅作义早下决心，16 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向傅作义发出了最后通牒，提出了和平解放北平的两项办法：一是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以及公文档案，我军则保证他们生命财产安全；二是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通牒最后规定,必须于 1949 年 1 月 21 日午夜 12 点前答复,如果坚决抵抗到底，将实行攻城。“ 攻城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这时，傅作义派全权代表邓宝珊来了，傅作义表示接受第二项办法，商定了协议，双方代表签了字。邓宝珊回去后，傅作义最后下了决心全部接受我方的条件，同意我方派代表进城，谈判和平接收北平的办法。我方派了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进城谈判具体实施办法，就双方交接过渡期间的问题达成协议，成立了以叶剑英为主任的联合办事处，负责处理过渡时期的一切军政事宜。谈判的整个过程，一直是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

傅作义于 1 月 21 日宣布北平城内的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并将协议内容经通讯社公布全国。北平守军两个兵团部、8 个军、25 个师共 20 多万人，于 1 月 22 日开始履行协议开出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1 月 31 日，将北平防务全部移交完毕，当天下午，北平所有城门，军政机关和要地，都换上了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守卫。规模巨大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2 月 3 日，我军举行了盛大而庄严的入城式，步兵、炮兵、骑兵、机械化部队，雄纠纠气昂昂地经前门进入北平城，受到北平各界人士和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都为北平古都不放一枪就回到人民手中而欢欣鼓舞。三大战役从 1948 年 9 月 12 日开始，历时 4 个月零 19 天，歼灭敌人正规军 144 个师（旅），非正规军 29 个师，共 154 万人，给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毁灭性打击，蒋介石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了。为我军南渡长江解放全国，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三大战役所取得的伟大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也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才能的充分体现。作为毛泽东主要助手的周恩来，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组织才能也得到充分发挥。据当时任军委作战部参谋刘长明的回忆说：“ 对解放战争的全面指导，对重大战役的组织指挥，毛主席承担着最主要的任务 ”，“ 周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是毛主席最得力的助手，为贯彻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为协助毛主席实施战略战术的指导，进行了卓越的工作。 ”我们在中央机关工作的许多同志都知道，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特别是三大战役中，做了极其繁重的工作。他不断掌握敌我情况变化，及时向毛泽东报告，提出分析意见，使毛泽东对战况了如指掌；他参预了一切战略决策和战役的制定，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许多重要的作战命令和指示。在三大战役中起草的重要电报就有 20 多份，对于兵力部署、作战指挥和兵员物资补充等问题，都要作详细的指示。我每次送中央城工部收发的重要电报给周恩来批阅时，常常都看到他在起草作战电报或同作战部长李涛及作战参谋研究敌情、核算敌我军队数量和了解其他情况。除特别紧急的事外，我总要等到他写完军事电报后才能挤得进去办我的事。

## 擘划万里长征又一步

中共中央“一月政治局会议”文件曾经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1949 年 1 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淮海战役也以我方获得全胜而告终。逐鹿中原胜利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已是饮马长江，准备解放全中国。中共中央决定尽速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 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

周恩来为筹备这次会议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准备有关的材料外，连警卫工作都是他在管。当时华北的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西柏坡百里之外便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为了保证会议绝对安全，周恩来找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要他汇报准备情况，并详细询问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等。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考虑非常周密，不仅想到敌人从地上来，而且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怎么办。因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对敌人已经不是秘密了。周恩来对方志纯等负责警卫工作的人员说：“这次警卫任务很重要”，因此，“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又不要神秘。”并且帮助他们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周恩来还从前方调来了几门高射炮，布置在西柏坡四面山坡上。我们从李家庄去西柏坡时，就要经过东柏坡的一个高炮阵地的旁边。

七届二中全会于 3 月 5 日下午 3 时半开幕。会场设在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里。会场正面，挂有毛泽东、朱德画像，两边是以镰刀斧头为标志，写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红旗。毛泽东主持会议，宣布开幕。接着周恩来报告会议日程，到会人数等事项。共计到会的中委 34 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康生、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王明）、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中委中有 10 人因工作离不开岗位不能到会。候补中委 19 人：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云泽（乌兰夫）、赵振声（李葆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方、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候补中委也有 9 人未到会。列席人员 11 人：李井泉、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李维汉、高文华、陈刚、刘少文、李涛、傅钟、杨立三。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是这次全会通过由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的。开幕当天，毛泽东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保证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会议还及时地向全党提出了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等问题。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勉励全党同志戒骄戒躁继续前进。会议开幕时，我和电影摄影师程默，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批准，进行会场拍照。程默拍了不少照片。我当时

正收到在香港工作的龚饮冰同志送我的 16 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就忙着摄电影。因当时无法冲洗，进北平以后冲洗了又不知搁到哪里去了，真是个损失！

在这次会议上，批准了由我党发起，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周恩来是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 3 月 13 日，才在会上发言。他说：三年多来，党中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大家非常团结，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党的发展，不是突然而来的，而是斗争中发展的。我们党内过去有错误，但我们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他强调在工作中，原则性和灵活性要结合，离开原则会出乱子；原则性太强，则会变得生硬、急躁。周恩来的这一主张，他自己确是身体力行的，在各项工作中都表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

当时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稳操胜券的。已往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既有中央的统一领导，也存在着各个地区因地制宜分散独立领导的情况，现在存在着分散与统一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说：现在我们正处于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走向完全打倒国民党的过渡时期，正在由分散到统一。这不是几个月而是要几年才能走完的。过渡时期是特点，我们要抓住这一特点，不然会犯错误。由于地区的不平衡，因而又产生了区域性的问题，分权的问题。中国不是联邦，但是带区域性的。这么大的中国，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会办不好事。所以组织形式上不能一下子都集权，一定要授权地方，才能发挥积极性，但中央必须成为掌握政策的司令部。根据过渡时期的特点，统一的方针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统一。

在谈到战争和生产的关系时，周恩来说：现在是前方打仗前进，后方搞生产。后方生产，第一是要恢复，支援前方，争取全国胜利。今天还不是转入建设。现在 110 万野战军南下，加上民伕超过 300 万，后方一定要指定地区支援前线：以华北的大部支援西北野战军，以东北与中原支持东北野战军，以华东与华北加上一点东北支援华东野战军。中央的作法是：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这样中央也坐稳了。他还对金融、交通、工业、城市接收、兵工生产等各方面都提出了系统的意见。他的重要发言，为统一与分散问题，战争与生产及支前问题，进城以后经济等方面的某些方针政策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

会议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他谈到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时说：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许多曾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一致认为，周恩来确是担任总理的最合适的人选。博大精深的学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统战等多方面的丰富经验，在国内外的崇高威望，这一重要职务确是非他莫属了。在此的一个多月前，斯大林派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了解中国的情况和听取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意见，曾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思来、任弼时进行了三次会谈，又和周恩来单独谈过一次。这次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讨论了战后的经济建设、交通运输等恢复工作；成立新政府的总体规划与设想；对外关系问题，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开展与管理；发展或建立各种社会组织、群众团体和对它们力量的运用与发挥；在中国有多党存在，它们的作用和意义等。这些正是周恩来为之朝思夕虑精心探索的问题，他勾划出了新中国的一幅蓝图，给米高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对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真是所见略同。

3 月 23 日，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开车前，毛泽东对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讲话，他说：我们就要进北京了，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京，是要继续于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心情都非常舒畅，谈起笑话来。周恩来对毛译东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汽车离开西柏坡，沿着山间公路向东北方向驰去。这个车队共有 11 辆小汽车和 10 辆 10 轮大卡车，卡车里坐的是警卫战士和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当晚住宿在唐县附近的淑闾村，24 日到涿县，从涿县火车站乘上专列向北平进发，25 日上午，到达北平清华园车站，受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党政领导和从香港、上海来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柳亚子等人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检阅了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走完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从此，开始了迎接全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